Seuil

私人生活史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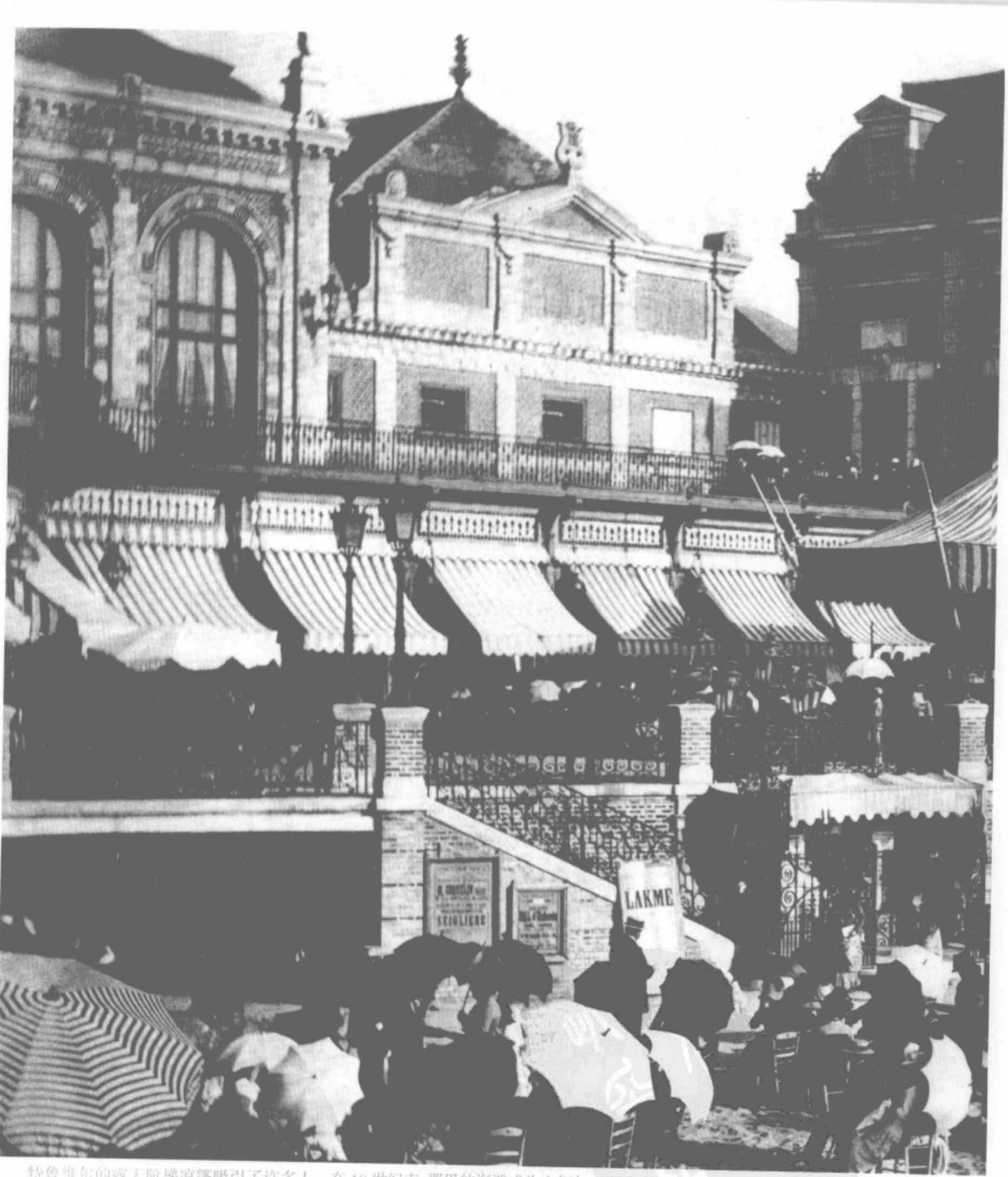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法] 菲利浦·阿利埃斯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周鑫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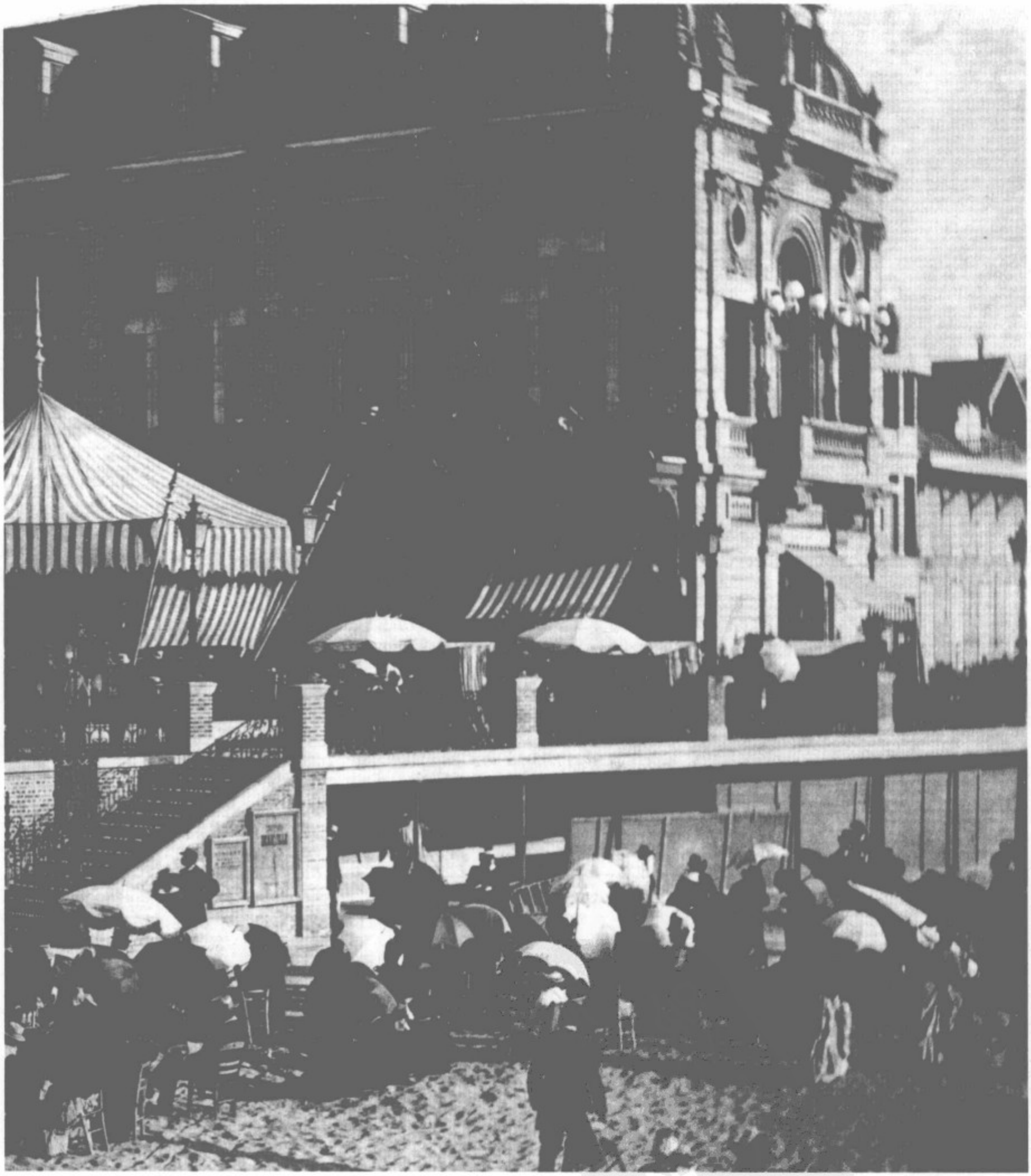
演员与舞台

——从大革命烽火到世界大战

北方文艺出版社



特鲁维尔的露天阶梯凉篷吸引了许多人。在19世纪末,那里的海滩成为人们与亲朋聚会的好去处,而不用太在意海浪和骄阳。



弗朗索瓦·热拉尔的《危险中的祖国》，约1797~1799年。市场中的革命；公众责任高于私人生活。

前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们，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一直在私人生活的门槛外徘徊。他们因谨小慎微、能力欠缺等因素而受阻挡，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公众人物才是值得称颂的英雄和历史（国家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创造者。

要跨越这个门槛就需要转变价值观。私人领域是与灾祸、禁忌和黑暗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是一个快乐和奴役、冲突和梦想并存的地方，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被认为是人们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值得参观，需要仔细研究的对象。隐私是当今时代的体验。

许多因素，包括一些大事件和知名著作，共同作用，形成了现在在私人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政治。集权国家的专制和民主国家对甚至像风险管理这种被忽视的领域的过度干涉，导致了政治在权力机构上的体现，以及对其进行反对的方式（不管是以小群体还是以社会的触手或独立的个人方式）的探索。今天的工人把他的家看作是远离老板的监视和工厂的规章制度的个人避难所。在西方社会，人们将个人财产传给孩子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实践并不单单是资产阶级化的结果，也是针对死亡恐惧的一种抗争形式。

在20世纪初，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思想意识、讨论和实践开始迎合“大众”而被改变了；然而，随后就逐渐开始强调个性和差异。现在，我们不是以阶级而是以年龄、性别、种族和地域差异来分析社会的。妇女运动强调性别差异是历史的原动力。年轻人认为他们

自己是另类群体，并在服装和音乐上采用另类的风格。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自传中讲述的自我都主张生命力。分化、分裂和传播的过程随处可见。

这些复杂的现象增加了对公众与私人、集体与个体、男性与女性，以及外在与内在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之外尚有大量的文献，我所能提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些大作家的主要作品。当艾伯特·赫希曼还在关注公众参与和私人目标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时，其他作家已经开始阐述根本性的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诺贝尔·伊莱亚认为私人化和文明是同质的，通过对伊拉斯谟之后有关“礼仪”的论著的研究，他揭示了以“谦逊”著称的高雅是如何使诸如擦鼻子、排泄和做爱等行为在公众场合出现却又不那么显眼的。因为对身体的新态度引发的自我意识本质上的变化导致了吃饭、洗衣服和做爱的全新方式，因此也就形成了私人生活的新形式。

路易·迪蒙把个人主义的发展看作是区分西方与东方整体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在印度，个人兴趣就必须服从于必要的社会目标。文艺复兴标志着一种根本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男子和市民权利宣言》就是这种改变的纲领。然而，使抽象的合法的个人成为现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这个过程涵盖了本书所涉及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整个时间跨度。

尤根·哈贝马斯和理查德·森尼特谈到的都是启蒙运动后相对信仰时期的自己。他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能在公众和私人领域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按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一种不时被打破的平衡。然而，他们对这种平衡的解释又不尽相同。哈贝马斯的论述利用了各种形式的排斥和不满，他假定了实现社会和谐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而森尼特关注的是私人生活的专制，这种专制把18世纪和19世纪资产阶级城市中十分著名的公众人物都驱逐了出去。

19世纪是私人生活的黄金季节。在那个时期，语言中和现实中的私人生活成形了。作为一种观念，隐私被精心地打造了出来。虽然像同心圆一样被概念化了，但实际上，私人生活、亲密联系和个人生活这些概念是重叠的。

本书所涉及的是19世纪私人生活的历史。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喧嚣，在这个时期，卢梭梦想的社会透明度超越了社会差异的现实而出现了。自大革命开始，这个自相矛盾的大事件就贯穿了整个

19世纪。本书止于现代化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大战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有时这种演变会遇到阻碍，但有时会得到加速或者改变方向，但这种演变从不会完全停止。

为了叙述这段历史，我们参考了大量确切的原始资料。因为私人化是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当今政治、道德和医学所关注的问题，因此它带来了无数关于家庭的理论文章。然而，公众档案很少有涉及私人生活的内容，国家也不愿意介入到界线模糊的家庭生活中去。只有家庭冲突，这种令人不安的暴力之源出现时，才会引起国家的介入。在18世纪，警察是大家的朋友和保护人，而到了19世纪，他们不再扮演这种角色了。受害人不再向警察寻求帮助，而警察逐渐开始自行干预这类事件。人们转向法庭以寻求帮助，开始借助法律的力量来代替私人间的报复。然而很不幸，直到最近，法国的法庭记录都一直被保存在当地的档案室里，而且因为不受重视，被丢失了不少。只有档案局里的记录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在使用“个人”文件时还有法律的时间限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犯罪记录还是帮助历史学家们攻破了秘密的城墙。

私人档案室是私人生活最直接、最丰富的原始资料库，这些档案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存在数量上的差异。就像去维护它们一样，要接近它们完全要看机遇。只有在保管恰当、有兴趣去保存前人的记忆、把私人文件变成纪念物，或者文件被前人的历史或血统所笼罩的情况下，私人档案才会被保留下来。现在对这些家庭财富的评价是很高的。而私人信件和诸如日记、自传和回忆录之类的个人文学作品虽然是很珍贵的证据，但它们还不能组成真正的私人生活的文献。因为自吹自擂的需要，它们的内容是按特定的规则记录下来的。它们之中，最常见的是书信，最有深度的是自传。然而，这种巧妙的掩盖与展示至少还是把我们带入了先辈的世界。

19世纪的小说更多地涉及了家庭阴谋和私人戏剧，它们比其他从实际经历而来的作品显得更为真实。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非常谨慎，而且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然而，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会一直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而我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小说的旋律的影响。

对私人生活的探索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所以在缺少分析的情况下做一个综合是很有必要

的，我们被迫把叙述与不完整的发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促进进一步的研究、深入、挑战或者说是对我们目前研究的否定，那就说明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有价值的。

在这里还存在其他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问题的原始资料的本质完全不同，而这种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对城市问题不恰当的强调。在民俗学中很少出现的农村私人生活常常不为我们所了解；在城市中，大家所关注的也都是资产阶级。尽管一系列研究人员做出了显著的努力，但这些阐述还是加深了我们对此的印象，而看不到其他的事物，因此资产阶级也就完全占据了我们的视线。然而，我们不仅要小心地审视私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要意识到私人生活的多种形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只是区别亲密和渴望的产物，而是为了特别目标的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在一卷书中涵盖整个西方世界的内容。原始资料的丰富、问题的复杂、该主题先期研究的不足以及最重要的“国内部分”的结构使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此法国社会就成了我们阐述的中心。除此之外，我们只涉及了英国的情况，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的私人生活形式是最发达的，而且人们对英国社会的私人生活最为了解，其对法国的影响也最大。

研究私人生活史需要特殊的方法。标准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历史人口学必不可少，但它只不过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历史人类学和心理史更加有用，因为它们把不同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了一起。就像来自社会学的建议一样，来自民族方法学和微观历史学的建议也是非常有效的，所有这些学科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也许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现代男女平等主义者对公众和私人的态度、不同生活的构成以及家庭和社会中的两性关系。

我们不可能通过镜子来了解私人生活的外在和公众化的一面。在这个范畴内，可表述的变成了不可表述的，广为人知的变成了不为所知的，被撤回的、不知道的和不可认知的但却是我们想弄清楚的事物扩展了知识的范围，找出了大量神秘莫测的秘密。也许我们还需要借用符号论和心理分析学来解释这些事物。我们还会碰到许多未知领域。我们要想超越私人生活的社会史，也就是说不是写群

体史和家庭史，而是写个人的表现和情感的历史，写一部个人做事、生活、感受和爱的方式，心灵和肉体的原动力以及幻想和梦想的历史的话，就必须涉及这些未知的领域。巴尔扎克写的是家庭的阴谋史，奈韦尔写的是欲望和音乐史，而普罗斯特写的则是亲密史。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6位作者研究1000个人物的工作。这是一部涉及19世纪的法国的历史。对于序曲我们有特别的双重含义：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式家庭。接下来被我们推上舞台的演员是家庭和其他人。地点是某座房子和花园。舞台的包厢里是某个孤独的人，有着他或她自己的秘密。舞台背景则是仍旧模糊不清的神圣雕像：国家的影子。因为私人生活史并不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轶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

目 录

前言/米歇尔·佩罗/1

1. 幕起/1

前言/3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法国大革命不稳定的边界/7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6

萨德侯爵的革命/29

家的乐趣/37

卡德伯里家族/51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59

2. 演员/77
前言/79
成功的家庭/81
家庭和财产/93
工作与家庭经济/96
家庭：性与血缘/103
家庭类型和私生活/105
家庭生活/111
问题与冲突/119
冲突方式/130
角色与人物/145
父亲的形象/145
婚姻与家庭/156
家庭生活：女人的复仇？/163
父母与孩子/169
兄弟姐妹/191
大家庭/195
中产阶级的礼仪/229
对于回忆的渴望/229
早、中、晚/235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261
生命中的大事/269
结论/290

3. 舞台/293
在家中/295
私人空间/309
庄园日历/319

从空想的共产村庄到企业的生活区/340
人人有家/356
新的公共住宅/363

4. 幕后/383
前言/385
个人的秘密/389
人身威胁/407
了解和自我控制/428
精神错乱/438
独白的催化剂/447
独处的悠闲和秘密的财富/463
亲密关系/479
感性的教育/495
浪漫时代的性爱/504
危险的时代错误/516
性爱的来临/517
呐喊和低语/537
个体苦难的表征/537
医疗改革/567

5. 结语/587

1
幕　起

瓦尔特·德弗雷尔：《宠物》。一个单身妇女站在通向英式花园的门廊处与小鸟聊天。

前　言

在18世纪，公众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其表现就是由国家支配的公众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曾经没有意义或者有负面影响的私人成了幸福的同义词，被重新评价。在家庭和空间的意义上，人们已经理解了这种变化，但这种理解还应该包括社会干预的各种形式。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非常具有戏剧性，又非常突然地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将其长期与短期的后果区分开。在当时，“私人的”或者特有的兴趣被认为可能对鼓励阴谋和叛国有些许影响。人们认为透明度也即个人之间不存在障碍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革命党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灵和习惯，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且希望在这个新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与以前相比在外表、语言和感情上完全不同的新人来。这项工作由外及里，革命教会了市民新的符号和手势，而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最内在的自我。

长久以来，大革命加大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并通过对政治化的男人和内政化的女人之间的对比，来说明不同性别的作用。虽然还是实行家长制，但大革命承认了离婚，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家长的权力。它主张个人权利，并以安全权利的形式制定了最原始形式的人身权利原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这项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早在1791年，《刑法典》

第184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无故搜查和占有私人住所的侵犯行为的严厉处罚。

详细描述大革命的混乱历史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因为大革命对私人生活，无论从法律、风俗，还是文艺描写和日常实践都产生了冲击。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这个时期的专家林斯·亨特就大致描述了一件其光芒一直照耀着19世纪的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下一章中，卡特琳·阿尔把公众与私人（这里指家庭）的差异以及19世纪初在英国日益严峻的两性作用的差异，看作是福音派说教、功利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分离。

找到了自身真实身份的英国中产阶级在这种新的家庭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观念也从中产阶级传到了工人阶级那里，但是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目的来接受这种观念的。同时，绅士们发展了更私人化的社会生活风格，并把他们的城堡变成了乡间别墅。从保育室到花园，家的快乐都在“家庭天使”的翅膀下洋溢。

这种观念对寻求生意与快乐之间的平衡点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法国上层阶级中，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通过旅行家、纨绔子弟、被流放者、商人、牧师和家庭女教师来传播的。这种影响可以在各种领域中看到，比如说卫生习惯，衣服的款式，诸如“家”、“宝贝”和“舒适”这样的单词以及运动、求婚和做爱中的时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深入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00年前后，工人主义者号召在公园、城市美化、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开展英国标准的竞赛。

英国受到重视非常正常，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随后，文化上很有建树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的吸引力增强了，有时甚至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我们可以问外国的影响对法国甚至阿尔萨斯、尼斯和萨瓦等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私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在卢梭和司汤达的时代，许多法国青少年旅行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初步学会了如何去爱，并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像吉纳维芙·布雷顿这样一个法国姑娘就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但其他众多法国人都是这样的吗？在19世纪，什么时期欧洲北部、东部或者南部受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管怎样，文化影响是一回

事，私人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风格并不是诸多自然天成的个人因素的简单综合，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

在对外来影响的包容性方面，法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国度。在法国，开始时是出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2.9%，占巴黎人口的6.3%。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性是个性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性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法国大革命不稳定的边界

左页：路易·莱奥波德·布瓦利：《马拉的胜利》。男女混杂的革命群众，有老有少，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围在马拉这位“人民的朋友”和“私人利益”的倡导者的周围。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性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阴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阴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法会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干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交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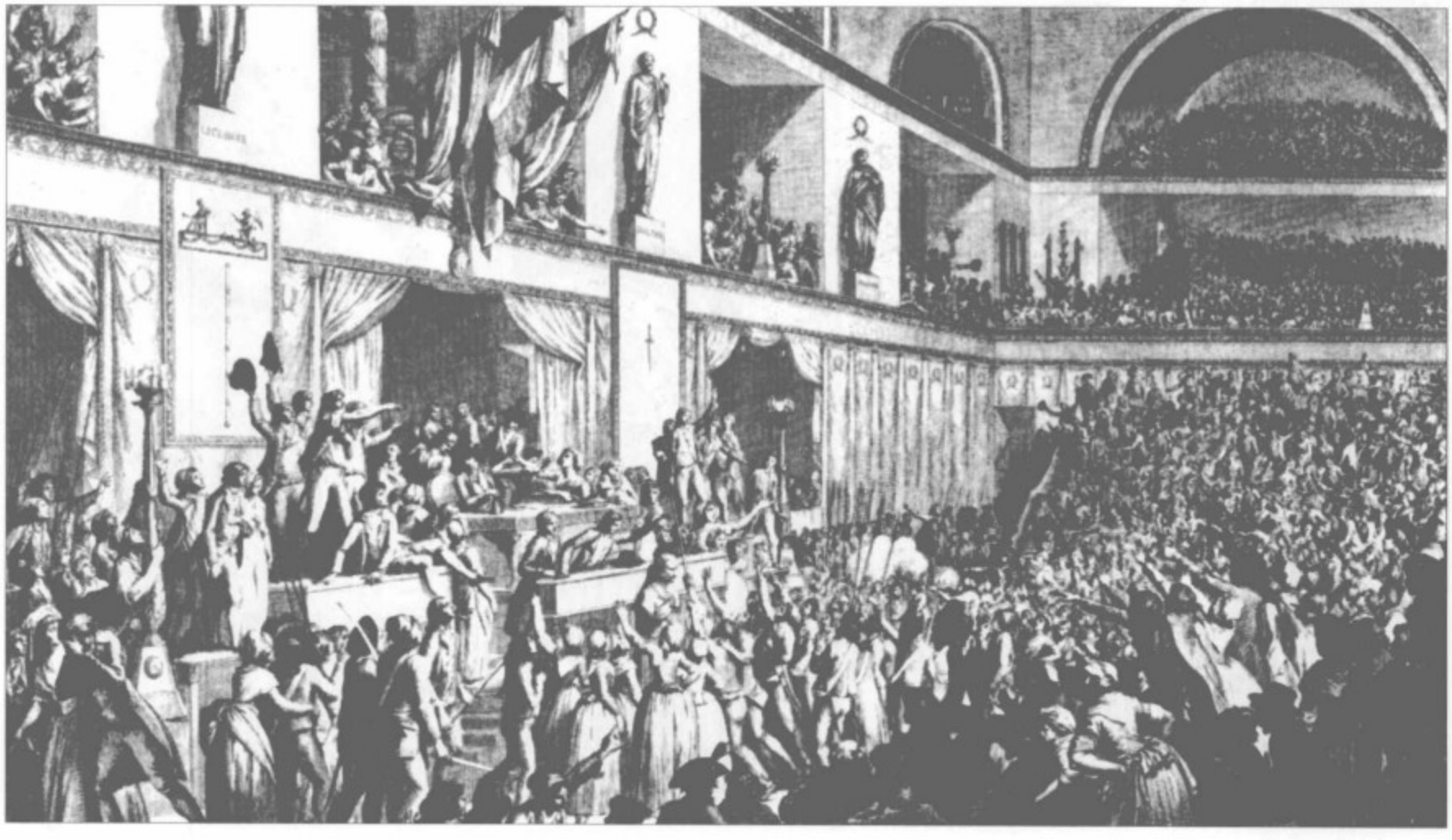
这种强制性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

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性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穷人和具有爱国心。他不再堕落下去，他拥有了国家的外衣，特别是那些没有荣誉头衔和共和主义头饰的人”。衣着、语言、对穷人的举止、在城市和陆地上的工作，这一切都成了爱国主义的范畴。那又是什么把私人与公众人物区分开的呢？

路易·大卫，带斗篷的市政官员服装（1794年）。最伟大的艺术家来帮助确定新款式。大卫为市政官员设计了这种新制服；他借用了古代文艺复兴以及城市共和时的款式。

随着私人与公众精神特征的合并，政治行为并不限于巴黎地方性议会和更为根本的报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就是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名为《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的演讲。为了证明“在大革命中人民政府的主要动机是既高尚而又恐怖的”，这位公众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把共和国的高尚与君主制的堕落做了比较。他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名誉，用准则代替习俗，用义务代替财产，用理性的王国代替专制的方式，用对堕落的蔑视代替对不幸的蔑视，用骄傲代替傲慢，用灵魂的崇高代替自大，用对荣誉的热爱代替对金钱的渴望，用功勋代替阴谋，用天才代替智慧，用真实代替光彩夺目，用充满魅力的快乐代替无聊的肉欲，用人性的伟大来代替偏狭。”他接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道德就是失策，堕落就是反革命。”

虽然革命者认为私人利益不应该在公众政治舞台上出现，但他们确信私人特征与公众道德还是密切相关的。1793年11月，在里昂成立的共和国临时警戒委员会正式提出：“每一个市民都必须经历真正的共和，把自己投入到改变法国命运的大革命中去……那些仔细权衡利益得失的人，那些计算着每一块土地、每一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



一个革命的夜晚：共和主义者入侵了国民会议。虽然妇女是人群的一部分，但她们的出现也是血腥暴力的一部分。

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液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变化的外表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服饰指南或者服饰的战争。新的资产阶级嘲笑那些不吸取大革命的教训、还穿着旧式贵族服饰的人。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色，“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色衣服，戴着黑丝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色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色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

路易-马林·博内：《巴士底的毁灭和国家之鼓》。孩子们的游戏提供了一个市民教育和展示新的服装款式的机会。

年轻的法国妇女在去练兵场训练的途中。

装饰有帽章和胜利纪念品的墙纸，约1793年或1794年。大革命对卧室和客厅的装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干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性所反对的。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必须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性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性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

“奥尔良妇女”们列队前进，她们的帽子上插着花，肩上扛着枪。

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性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色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日常生活中装饰的变化

私人空间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热情标记。人们可以在富裕的爱国者家里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联邦之床”。各种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画上了共和国的图案或者装饰。鼻烟盒、剃须杯、镜子、各种柜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画上了革命的场景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底座。自由、平等、兴旺和胜利都以各种年轻可爱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私人空间里。甚至连可怜的裁缝和鞋匠都会用一个革命的日历来预约时间，而在他们家的墙上到处

勒絮尔：《爱国妇女俱乐部》。正派和慈爱的妇女们都戴着宪法规定的帽子。女子俱乐部于1793年11月被取缔了，因为它们与妇女纯粹的私人作用相冲突。

都是共和国的装饰图案、革命者的人像和古代英雄或者是重要的革命事件的历史性场面。当然不可代替的是圣母和圣徒的木刻和雕刻，我们不能肯定通过政治教育，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私人空间里对公众符号的依赖是建立革命传统的基本要素。而且正是所有的波拿巴画像和各种表现他胜利的画像帮助树立了拿破仑神话。私人空间的重新布置，实际上是表达公众对于革命领袖和追随者政治上的感激之情。

变化的语言

就像在欧洲，许多政治符号侵入到日常的私人生活领域那样，许多私人生活的符号也渗透到了公众领域。比如，本来在熟人之间使用的“你”字就走进了公众领域。1793年10月，共和主义者向国民会议呼吁：“应该不分性别地在语言中使用‘你’字。”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用法将“减少傲慢、减少差别、减少敌意、明显增加亲密度、增强人性化的趋势，因此也将更加平等”。代表们拒绝公开使用“你”这种形式，但是在最激进的革命圈内，“你”已经被

普遍使用了。在较底层的阶级中，熟人间已经广泛使用“你”字了，但是在公众场合使用还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威胁到公众演说的正常规则。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粗俗的词汇进入到公众的书面的政治演说中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绘成与理想化妇女相对的倒置形象：是野兽，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是妓女而不是妻子；是生产变形生物的怪兽而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最极端、最不道德的例子，那些革命者害怕妇女们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会变得像她一样，这是对女性性别丑恶的诋毁。这种丑恶的诋毁似乎需要通常只在男士衣帽间的故事中才使用的排斥的语言，在公众领域，它被用来破坏高贵、敬重的气氛。

在许多方面，语言反映出公众和私人界线之间的变化。革命化的国家试图通过以法语代替方言和土语的规定来调整私人语言的使用。巴瑞克是这样来解释政府的地位的：“自由民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并且与其他人的语言一致。”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对抗成了语言上的对抗，新学校，尤其是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的学校都被要求教授法语，而且所有的政府法令都用法语出版。因此，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公众演讲是公有化的，在实践中方言和土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私有化的。

对一些人来说，创造私人语言是对丧失私人生活的一种补偿。被征召入伍而失去私人生活的士兵创造出了老兵的俚语，这把他们和普通市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装备、制服、军队部门、战场情况、报酬，甚至扑克牌中的数字都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把德国敌人叫做“酸菜脑袋”，而英国则简单一点叫“该死的”。

玛丽安和共和国家庭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家族的标志生发出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当共和国的象征——罗马的自由女神出现在政府的印章、雕像和图案上时，她看上去很抽象，又有些遥远。但在很多图画中，她呈现出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母亲的亲昵。很快，她就以最普通的女孩的名字玛丽安而闻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带着嘲笑意味，但随后人们就非常热爱这个名字了。在妇女缺乏最具体的政治权利的时期，一个女性形象仍然能成为新共和国的偶像。1799年，以拿破仑本人为图像的雕刻使她从争论和分化的深渊里解脱了出来。权力有效地

一个光环围绕着这个具有母亲般胸膛的共和国妇女。她的帽子上装饰着高卢雄鸡，她的脖子上挂着象征平等的木匠水准仪。

控制着感情，因此它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大家所熟悉。

政治演讲和革命时代的图像材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国王被画成一位仁慈的父亲。他能认识到王国内的问题，并在刚成年的儿子的帮助下，把这些问题安排得井井有条。1791年6月，当他试图逃离国家时，这条秘密路线不可能保守住了。现在更加激进的儿子们进一步要求有根本的改变，并最终坚持由他们共同来取代父亲的地位。随后，淘汰专制父亲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补充，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位从没被当成母亲的女人。玛丽安的通奸是对国家的侮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下场。革命的兄弟关系替代国王夫妇成为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保护着脆弱的自由和平等的姐妹。在新共和国的代表中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形象，而且除了他们小时候的形象之外，母亲也基本上不存在了。父母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了，只有兄弟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和保护他们还年幼的妹妹。偶尔，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性的力量。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

基督教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集

共和历第三年（1794年），由P-L·德比古设计并雕刻。

会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干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性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的抵抗行动。在共和国历第七年，人们在荣纳省的维勒西赫村找到的小册子上发现了“无畏的苏珊”发表的反对文章。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这里的政府专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自由和最崇高的。但同时，我们又受到了严密的管制，在美妙的星期天我们不能唱歌和游玩，甚至不能跪下向上帝表示敬意。”

在政府和更为坚决的城市革命者的冲击下，宗教变得非常私人化了。1794年，在经过移民、辞职和结婚，再加上被处以关押、流放和死刑之后，几乎已经没有牧师还在从事公共宗教事业了。虔诚只能在家里，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小型的值得信任的团体中。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只要存在着限制，私人就会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被当作仓库、马厩、硝石制造点、鱼市和俱乐部集会处的教区教堂得到了恢复，并再次被神化。神器和圣衣从埋藏之处被挖了出来，有些人恳请来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找不到一位牧师，就可能由一位小学老师或者前任官员来提供此项服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城镇外，共和国历的休息日是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而到了星期六村民们就会聚集起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种公众事务和私人事务混杂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宗教实践的结构，那就是，妇女成为教会的支柱，她们坚定地保护着教会，而男子最多不过是偶尔去去。公众生活的新形式，酒店和咖啡馆里大多是男

性人群。

家庭和公私的边界

在家庭生活领域，公共当局的侵入是最显而易见的。婚姻被世俗化了。人们认为仪式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当着一位市政官员来举行仪式。在旧政权下，婚姻就是双方表示同意的一种形式；牧师只是这种表示的见证人。根据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官员不仅要管理登记，而且还要宣布夫妇关系的合法。现在公共当局在组成家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决定婚姻的障碍；重新建立并规定采取的过程；给私生子以权利；确定离婚；并限制家长的权力。国会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推行这样一个准则，按丹东的说法，就是“孩子们首先是属于共和国的，然后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波拿巴自己也坚持认为：“法律让孩子出生，为他提供教育，为他提供一个职业，并规定了他结婚、旅行和选择职业的条件和方式。”

共和国卫兵在上帝面前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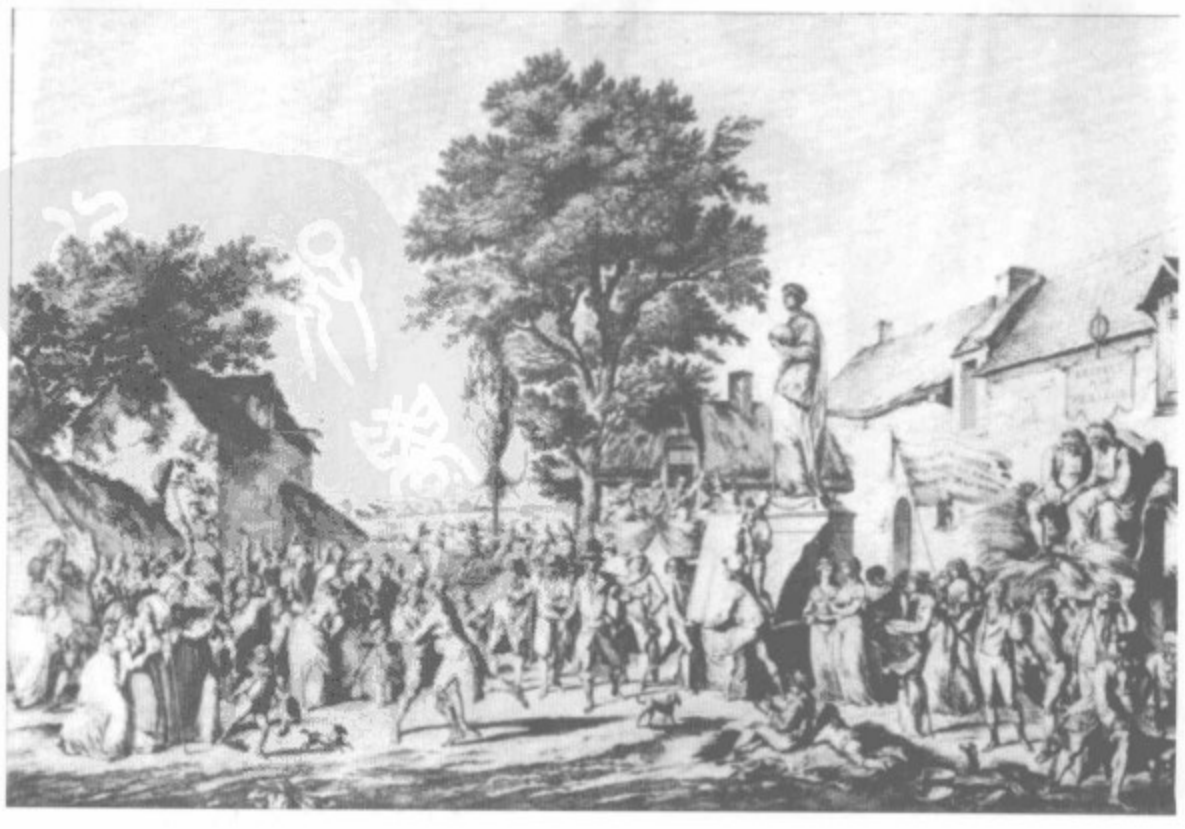
佚名，象牙微型画（1793~1795年）。没有戴帽子、身边有一把剑的自由女神正在给一个象征平等的木匠水准仪套上花环。

这个共和主义教师有一个罗马式的侧影，一个处女的纱巾和少女的胸膛。她教授的课本是《男子与市民权利宣言》。

有关家庭生活的法律显示了与革命政府的竞争事务。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加强政府控制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在全国国民大会期间，革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个人免受可能出现的家庭或者教会暴力的迫害。盖章的书信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们常常被家庭用来拘押那些反叛和挥霍的孩子。不过，1790年8月成立了家庭法庭机构，立法者通过它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离婚问题。但《民法典》对于个人的关心却远远不够，特别是妇女的快乐和自由，它强调的是父亲的权力。本来属于家庭法庭的权力要么回到父亲的手里，要么被国家法庭所接管。总的来说，政府限制家庭和教会的权力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力；它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家庭的团结，并限制家长的权力。

离婚的权利

在离婚案件上，个人的权利、家庭的维持和政府的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离婚案件在大革命时期才首次出现在法国历史上。离婚是1791年宪法所表述的自由在逻辑上的延伸。宪法第7条把婚姻世俗化了，它是这样表述的："从此，法律认为婚姻是民事合同的一种。"如果婚姻是双方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民事合同，那就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先前的条件给了这些理由更进一步的可



迪普莱西-贝尔托：《老人节》。孩子、成年人和市政官员们在这个欢快的乡村节日上一起为老年人庆祝。

让-雅克·卢梭，《埃米尔》第4卷中的《共和主义者向上帝致敬》。

世俗婚姻的新规定注重的是双方同意和公众官员的参与。而被保留下来的宗教部分就是诸如祭坛、女神以及要在上帝的注视下。

能。在民法中，神职人员是与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在许多社区，许多夫妇拒绝在宣过誓的教士面前举行结婚宣誓。除了世俗化的婚姻之外，政府还控制了其他的民事登记，并取代教会拥有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最终权力。除了法律提出的新说法之外，关于离婚的争论并不是十分广泛，人们提出了离婚的其他原因：解放不幸福的夫妇；婚姻专制主义下妇女的解放；而且对于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这也是一种良心上的解脱，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禁止离婚的。

1792年的离婚法案是非常开明的，它认可了离婚的7个理由：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犯罪、暴行或者给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的；道德沦丧的；被抛弃两年以上的；失踪五年以上的；移民国外的。在这些情况下，准予立刻离婚。另外，夫妻双方同意，经过4个月之后，也可以离婚；而且因性格不合，并经过调解6个月之后，也可以得到批准。离婚后再次结婚需要等一年的时间。离婚所涉及的法律程序并不复杂，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要求；更为突出的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样适用。在当时，

这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律。

根据拿破仑法典第六章的规定，离婚的理由被减少到三种：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暴行的；有通奸行为的。按照拿破仑对家长权力的重新确认，妇女权利被大为减少了。丈夫在妻子有通奸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婚，而当丈夫把情妇留在家里时，妻子却无权请求离婚。另外，如果妻子被判通奸罪，就会被送到监狱去呆上两年，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丈夫却可以逃避惩罚。虽然协议离婚条款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也被加上了许多限制，例如丈夫必须满25岁；妻子的年龄必须在21至45岁之间；婚姻存续期间必须在2至20年之间；必须得到家长的许可。从1792年到1803年，法国共有3万起离婚案，但在此之后这个数字就有所下降。让我们举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例子，在里昂，从1792年到1804年，每年有87起离婚案，但从1805年到1816年，每年只有7起。在鲁昂，从1792年到1816年之间的1129起离婚案中，有43%是发生在1792年到1795年之间的，而1803年以后，每年只有6起。

体验离婚

离婚的可能性是否会对共和国新公民的私人生活产生真正的冲击？在城市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乡村，情况远不是这样。例如，在图卢兹，从1792年到1803年，共有347起离婚案，但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在雷瓦尔和穆雷，每年只各有两起。在里昂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到1802年为止，那些在大革命中建立并至少有7年以上的婚姻已经有3%到4%破裂了。1884年重设离婚之后，到1900年前后，离婚率是6.5%，这个比例也许并不比18世纪90年代高多少。离婚的夫妻来自城市的各个阶层，不过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更容易离婚。很显然，妇女从新法中受了益。在里昂和鲁昂，由单方提起的离婚案中，有2/3是由妇女首先提出的。大多数离婚不是双方同意的，只有1/4到1/5的离婚案是由双方共同提出的。

根据1792年的法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遗弃和长期失踪。接下来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感情不合。甚至最枯燥的统计数字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在里昂那些常见的遗弃案中，有1/4是一方控告另一方已失踪了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半数以上的配偶失踪了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让法律联系实际的机会，而这个实际包括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男性与女性在提出离婚时，

以遗弃和不合为理由的情况相差不大，但是我们是否会对妇女更多地以暴力作为理由而感到吃惊呢？家庭法庭和后来的民事法庭的记录中充斥着丈夫攻击妻子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常见的暴力工具是拳头、扫帚、陶器和火炉用具，有时甚至是小刀。

离婚立法并不单是为了把个人从不幸福的内部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要求，不幸福的夫妻必须通过家庭法庭或者家庭会议对离婚做出安排。丈夫和妻子一起挑选亲友组成法庭双方当事人，然后由法庭来决定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财产的安排和孩子的监护。很显然，离婚是十分容易被接受的，因为只有1/3到1/2的请求会被撤回。但是由于离婚是新生事物，再加上教会的抵制，离婚案件能达成圆满的很少。甚至最遵守宪法的主教们也只有在另一方活着时不可能再婚的情况下才接受离婚。不过，仍有1/4的离婚男女再婚了。离婚申请很少会产生监护权之争，这也许是因为寻求离婚的人很少会有未成年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法庭和父母都不会把孩子看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有大量的反对意见，但是有证据表明，后一种情况下，在父母的证词和法庭记录中，孩子很少被提及；即使有辩论，也很少有关于孩子监护问题的决定；而且当夫妻们偶尔提到他们的孩子时，也不会提到孩子的名字和家中有几个孩子。

在大革命期间，离婚过程是可以观察私人情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窗口之一。我们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个人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诺格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儿怀孕的故事，孩子是一个有妇之夫的。她的母亲假装自己怀了孕，这样她们就能到乡下去等待孩子的出世，因此也就能保住女儿的名誉。看来大革命并没有触及到这位模范母亲，她们碰到婚姻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和1789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并不是大革命创造了对妻子的殴打。但离婚的可能也会对婚姻产生某些影响。现在是妇女，例如利奥奈斯·克洛迪娜·拉梅想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在许多情况下，相爱成为婚姻的基础。结婚已经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尚：在路易十六时代年平均结婚数为23.9万，而到了17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7万。这些婚姻并不都是由于相爱。那些丈夫不满25岁，比妻子年轻10岁以上的婚姻从9%到10%上升到1796年的19%，这也许是因为这是避免被征兵的最好方式。

佚名，象牙微型画（1796年）。一位妇女给监狱中传递消息。她的篮子也是一件武器。

1792年的法律使离婚变得非常容易，但这并不明智。

上图：勒絮尔：《离婚》。

下图：《离婚》（1793年）。

重要公众人物的私人情感

要想去观察那些革命者的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政治领袖的回忆录不带感情色彩。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公众生活，这与旧政权中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与建立新国家的实践无关，那么私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像爱情、婚姻关系和个人健康是不会被公开的，即使是在很久以后才写成的回忆录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19世纪20年代初，韦里埃-勒佩奥在写他的回忆录时，写了许多自己早年经历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中间关于“革命之前的私人生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占三卷中的一章而已。似乎随着革命的来临，私人生活也终结了，而且只有从公众生活中退下来以后，才重新开始私人生活。在书中，韦里埃-勒佩奥把早年与后来昂热中等学校的副校长的约会作为他私人生活的典型例子来讲述。革命中的公众生活经历几乎占了回忆录的全部。在韦里埃-勒佩奥的回忆录中唯一谈到私人生活的是他家庭生活的大事件，例如，他是如何寻找伴侣的，以及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感情。当具体谈到革命经历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他的政治判断，而对其他方面绝口不提。他绝不把私事和政治混为一谈。

甚至罗兰夫人也是用这种惯常的风格来写作的。面对着断头台，她写下了她的“大革命小传”。这非常像政客的回忆录，里面都是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不过，她也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把回忆录当成是私人经历的一个练习，“我建议用我在狱中的空余时间来收回那些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在这些段落中，她详细描述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而且比韦里埃-勒佩奥更多地涉及了私人的情感。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另外，她还很公正地评价了她对罗兰先生的最初看法。她说：“他的严肃，他的精神，他的习惯全都奉献给了工作，这令我认为，他是没有性欲的或者说他是一位理性的哲学家。”

在18世纪80年代写的信中，罗兰夫人试图将对政治的兴趣和日常生活中的迷恋联系在一起。不过，1789年那充满吸引力的公众生活及其飞速发展使得她不可能成为革命年代的塞维尼夫人；她更多地涉足到当时的各种事件之中，而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写信。她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冲击，1789年9月4日她这么写道：“只有在照亮整个国家的爱情圣火被点燃之后，高贵的男子才能跟随着爱情的火炬。”1789年是她私人生活的重要分界线，因为这一年是

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水岭。结果是，她较个人化的“私人回忆录”只不过记述了革命开始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在去世之前，罗兰夫人还能表达她对女儿的感情，“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安安静静、默默无闻地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涉足公众生活会毁掉一个母亲的私人生活，因此她希望女儿的命运会有所不同，能拥有一个远离公众目光的、幸福的私人生活。

生与死

对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人们的私人感情，我们能了解到的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当时人们重视的首先是革命进程，其次是对国家的建设，只不过，每个人的形式不同而已。儿子们被送去打仗；牧师被驱逐；教堂被挪作非宗教的用途，然后又得到恢复；被拍卖的土地因移居国外的家庭的返乡而被购回；结婚的庆祝方式多种多样；离婚也成为一种可能。甚至个人的名字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1793年和1794年，孩子们经常被取名叫布鲁图、米修斯-斯卡弗拉、佩里克勒斯、马拉和热玛贝，甚至是纳瓦特、贝特拉夫和梅西德瑞斯。与女孩相比，男孩子更容易被起一个革命者的名字，而且这种状况在非婚生和被抛弃的孩子身上更常见。1794年后以革命者的名字来取名的风气很快就过时了，不过到了19世纪，偶尔还会有叫普拉热尔、埃皮克埃-戴莫克拉蒂或者玛丽-利伯蒂（意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个人的名字成为公众传统的承载者。

对革命事件的关注也可以从普通人的书信和自传短篇中看出来。一个巴黎的玻璃工雅克-路易·梅纳特拉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他在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虽然日记是他自己创作的，但他经常使用热月党领导者的语言：“法国人呼吸的都是鲜血……罗伯斯庇尔的国民会议只不过是控告者的贼窝，这些带有报复心的人试图摧毁一个党派，然后另建一个新的。”巴黎的书商尼古拉·吕安特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巴黎反反复复运动和国家的政治，而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上述两个人都只是偶尔才写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当吕安特唯一的儿子死了以后，他中断了书信的写作，随后他是这样来解释自己的沉默的：“高烧，要不就是医生夺走了我们最亲的人。现在，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梅纳特拉讲述了他女儿的离婚和再婚，他希望女儿能忘掉第一个野兽丈夫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在1795年的那场苦难中，他自豪地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们根本没有感

受到饥荒的存在……我们有很好的食物。”

那些生活更加可怜的人几乎没有留下讲述他们私人生活故事的东西。除了1747年之外，1794年、1804年和1814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在充满危机的年份，自杀的人数也是最多的。在1789年至1801年之间，这个数字在不断地上升，到1812年达到了最高点。在拿破仑时期，巴黎每年有150人自杀，而几乎所有的人的自杀方式都选择了跳入塞纳河。在自杀的人之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天主教教义的禁条对妇女更有约束力。巴黎的自杀者并不是那些想在首都结束他们不幸时光的无业游民，他们只是落魄的人，看到生存状况会变得更差，因此承受不了而已。他们留下的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能让亲戚、朋友和邻居来辨认尸体的证明物。实际上，我们对于他们的内心情感并不了解，只知道他们宁愿死在塞纳河的泥水中也不愿意去继续奋斗。

萨德侯爵的革命

在描述革命中的私人生活时，我们通常要用到社会史的数字和来自少数上层人士的直接证明。这些上层人士偶尔会写下他们个人的想法。我们对于大多数人的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士兵在帐篷里时、罪犯在牢房里时、激进分子的妻子在做饭时、妓女在街上行走或者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瞬间的个人意识是否对革命年代的人们意味着很多。但这里有一个个人感觉不能被忽视的极端例子——萨德侯爵的个人意识。萨德研究的是性的外部限制，这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方面，他的研究还为现代意识做了很好的定义。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在1785年到1800年之间写成。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西斯·德·萨德的早年生活并没有预示着他会成为《朱斯蒂娜》、《客厅中的哲学》和《索德梅的120天》的作者。像许多年轻贵族和显赫家庭的未来首脑人物一样，他在加入皇家陆军之前是在路易-勒格朗受的教育。在23岁时，他结了婚，几个月后他就被关进了樊尚，随后开始因长期的放荡行为而不断入狱。在1778年到1790年间，他在樊尚和巴士底度过了11年，1801年后他被永久地关进了监狱。虽然是贵族后裔，但他还是设法从巴黎的革命中幸存下来，在1794年入狱前他写过剧本，甚至还为

路易·莱奥波德·布瓦利：《王宫的长廊》。旧政权末期以及大革命中浪荡子聚会的场所。后来，王宫中充斥着私人店铺和买卖，还有不少妓女在那里招揽生意。

一个革命官员服务过。

在1789年前，萨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子，在大革命中，由于他的著作，他变得更加臭名昭著了。他的《朱斯蒂娜》自1791年出版之后的10年里再版了6次。这本小说只有三百多页，但到1797年《朱斯蒂娜的消息》出版时，已经变成了810页，而同年出版的《朱利埃特》则长达一千多页。《阿林和瓦尔考》和《客厅中的哲学》是1795年出版的。作为《朱斯蒂娜》的作者，萨德经常遭到报纸的谴责，而作为《朱斯蒂娜》系列小说的《朱斯蒂娜的消息》和《朱利埃特》使得他被最后一次投入了监狱。《朱斯蒂娜》再版的次数和持续的坏名声使萨德在大革命年代广为人知。迪克雷-迪米尼尔的著名小说《洛洛特和方方》再版了至少10次，但迪克雷-迪米尼尔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1795年后，巴黎新建的阅览室不断增加，小说创作不断增多，读者的品位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这样的年代，萨德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性爱权利宣言

萨德的心理学故事不断损害着革命理想，他不是拒绝它们而是把它们带入了最令人讨厌的可能情况。按布朗夏的说法，“他系统性地阐述了性爱权利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人的天性和理性就是为完全的自我意识服务的。传统道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邪恶。萨德自己说：“在天性的手中，我只是一部机器，她是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来运转的。”在完全平等的新世界里，只有力量、野蛮和残暴是至关重要的。在革命政权面前，出生和特权等所有的差别都不存在。这里面没有法律。萨德的小说颂扬自由、平等和友爱。自由就是追求快乐而不去考虑法律、传统和其他的意愿。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存在着平等，没有人生来就拥有这种权利。只有最自私和残忍的人才能赢得这种权利。

在萨德的诸多小说中，《私生活》描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对最极端、最残暴的享乐是必需的，而且几乎总是被描述成一座监狱。就像巴尔泰所说的那样：“萨德的隐居只是僻静处的戏剧形式。”洞穴、地窖、地下通道和坑道是萨德的主人公最喜欢的地方，而最秘密的、最偏僻的地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城堡，因为它们与外界隔绝。黑森林中的西林城堡是《索德梅的120天》中的故事现场，而在《朱斯蒂娜》中则是圣-玛丽-德布瓦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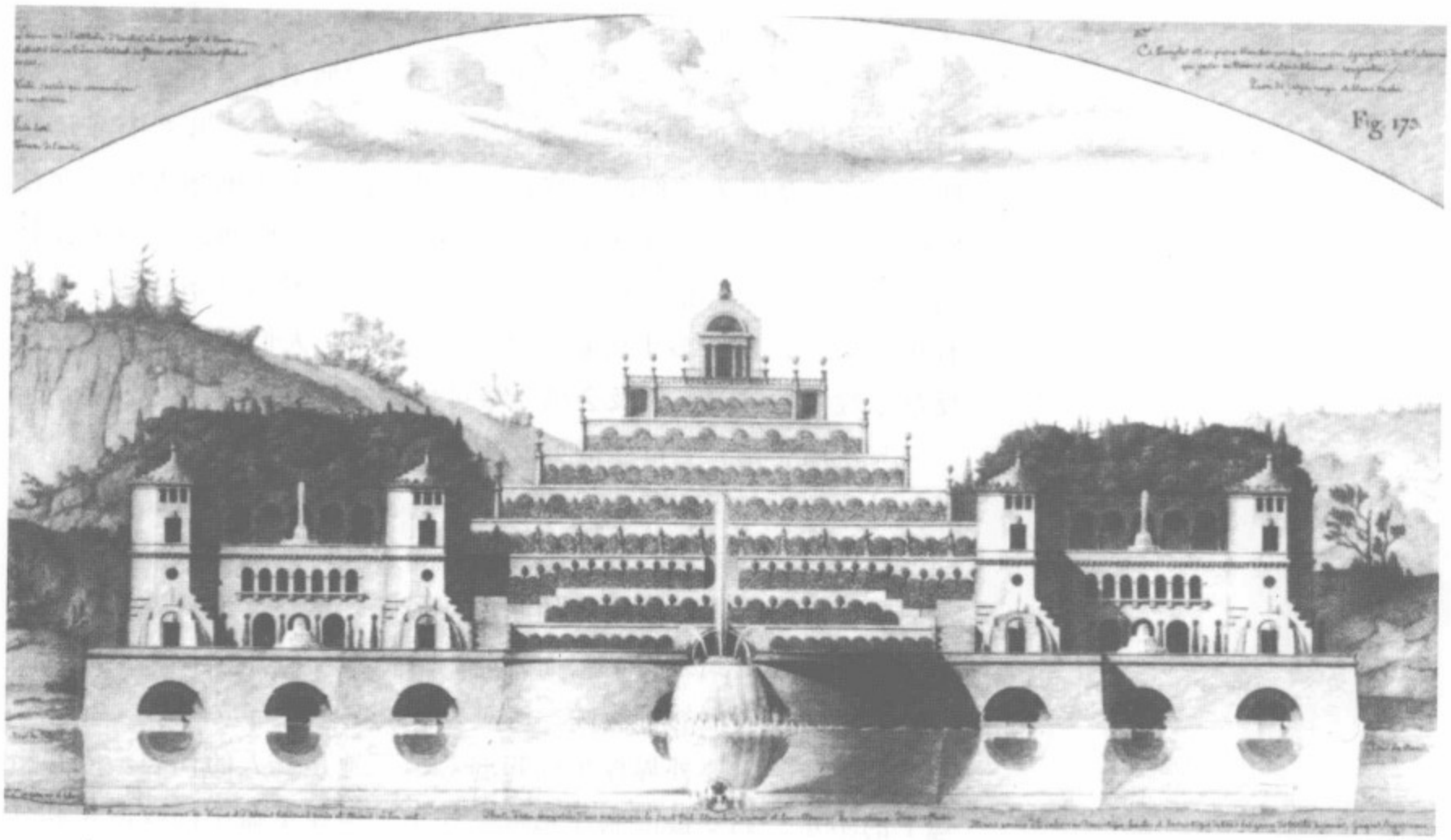
对城堡外部的描写很少，而其内部总是被描绘成监狱的样子，不同的只是结尾和叙述的顺序。在西林，“我说，必须建起所有的门，这样有人就可以进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像被包围的要塞的地方……希望是肯定的；我们把自己关在里面，甚至都无法找到门在哪里，我们在里面安顿下来。”一旦进去后，就与外界隔绝，这完全是私人的领地。接下去是预计的顽强的抵抗。性变态并不意味着混乱；它只是彻底地推翻了禁忌和规则以及与各种限制的冲突，甚至是快乐所需的恣意糟蹋。

萨德笔下的女性

在这个高度私人化的空间里，寻欢作乐的对象和规则规定的对象通常都是妇女，“颤抖、猜测、服从、期望，也许还不是最可怜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物外，萨德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也很少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快乐。“与人分享的快乐就不是快乐。”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异性恋非常少见；阴道总是被忽视，而其他的洞总是大受欢迎。妇女是男性侵犯的对象，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身份。朱利埃特好像是个例外，但她也只有依靠不停地杀人和抢劫才能生存下去。在扭曲中，男子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只有在他们压迫妇女的时候才会出现。许多女性牺牲品是贵族，但在萨德的世界中，新人又在独立的城堡中重建了一种封建权力。

萨德对妇女的态度并不能认为是典型的，不过萨德的作品提醒了我们妇女在私人住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在萨德的小说中，私人住处是男子出于性需求而关押和拷打妇女的地方。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的观点认为妇女应该待在私人场所，这难道不正是典型的萨德观点的反证吗？革命者把妇女的作用限制在依靠丈夫、兄弟、母亲和姐妹上，而萨德则把她们变成了职业妓女或者容易被男子征服的妇女，她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男性的性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都没有独立的身份，至少男性人物不希望她们拥有。妇女都被描绘成潜在的颠覆者，很显然，她们不愿意接受被分配的角色。另外，为什么当妇女争取成为公众人物的权利时，雅各宾党把产生的混乱说得十分严重？另外，为什么萨德会对封闭的城堡如此着迷？因为“没有城堡去抵御外来的攻击并不可怕，来自内部的侵害要恐怖得多了”。

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



让-雅克·勒科：《爱之岛》。这幅画描绘了令人着迷的充满爱的岛屿。这是文学神化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在宫殿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花鸟和动物，它是各种影响和想象的具体化，所有的事物都是完美的对称。

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

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性奴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特权的痕迹；而1972年1月3日通过的法律则确保了

在革命第二年就提出的私生子的权利。还有什么方法能比这种形式更好地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令革命原则“现代化”，并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呢？

家的乐趣

左页图：埃德温·兰西尔爵士：《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与大公主在温莎宫》（局部）。王室夫妇：理想的婚姻。

在英国，1820年是查理王后的年代。她是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受伤的英国王后”，是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乔治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婚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是夏洛特公主。当乔治把卡罗琳扔在家中去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和朋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政治阴谋时，卡罗琳还必须过着受约束的王室生活，虽然丈夫从不出现。她那德国平民的方式，或者按乔治的说法，她谈吐的鲁莽和轻率使王子大为恼火，一心想把她除掉。面对他无情的敌意和对女儿的控制，卡罗琳离开了英国到欧洲大陆去寻求一种流浪贵族的生活。

卡罗琳，“受伤的王后”

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了。自从国王疯了之后，一直都由摄政王代替父亲在执掌大权，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君主制国家完整的王权。但卡罗琳会被承认是他的王后吗？乔治四世决定她不能成为王后，并坚持把她的名字从祈祷书中划去。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否认而产生愤怒，卡罗琳乘船返回了英国。她的登陆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她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热烈欢迎，这些国王的敌人很高兴终于有了可以攻击国王的机会。国王的大臣们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但他们无法说服国王。国王坚持要同他的妻子离婚，并利用英国王室的特别程序来达成这个目的。

1820年，对王后的公审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这种场面在以前从

乔治四世和卡罗琳：王室肥皂剧的开始。

来没有发生过。连着几个星期，当贵族们在倾听相关的丑闻，女主人和仆人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没有爱情婚姻的证据时，王室的丑事已经开始充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对那个与王权和国王斗争的女性的审判由议员们来主持。但公众的观点并不都是支持国王的，而且，因为国王扩充军队、召集密探、安排证据，加之从不到庭，令民众对他产生反感。同时，因为王后是进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唯一女性，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她污秽行为的细节被展现出来后，她的支持者反而大大增加了。因为证据都是由外国仆人提供的，而这些仆人的忠诚和诚实越来越令人怀疑。幸好她的鲁莽没有影响到她的支持者们对此事的愤怒。她受到的不公正是一位自身也不检点的人所控告的，她成为腐朽的王室和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卡罗琳不应当为贵族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的本质而付出代价。

对卡罗琳王后广泛支持的实质是关于男子与妇女间的适当关系、婚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不能保证长久的结合。王后的拥护者把她当作正义的女英雄，一个男子对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其他人对她的援助变得非常必要。她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她的获救只能依靠那些为她的利益而战斗，披着铠甲骑着马来保护她的骑士所具备的骑士精神。必须举起高尚勇敢的武器来使她免受伤害，从而也能挽救英国的美名。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都被号召牢牢地站在妇女的阵营一边。卡罗琳的无助、孤单和依赖性是战斗号令的实质。她不能保护自己，其他人就必须来保护她。英国文明的亮点就是其“国内道德”。除非这点得以维护，不然就会出现腐化和衰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伦敦的黄铜铸工和铜匠们开始民主游行以支持他们的王后。游行的队伍以八名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为前导，他们的帽子上缀着白色的羽毛，还带着扈从。游行队伍里的人都带着铜棒，有一些还戴着铜盔，整个队伍都是由与铜为伍的人组成的。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骑士精神得到了回归。但那些前去援助那位无助女性的英勇骑士们，都希望能弄清楚他们从王室手上救下的人是一位纯洁的杰出女性。

卡罗琳不太像是这样一个角色。但她的小错误被狡诈的意大利仆人不怀好意地夸大了，她被重新塑造成脆弱的、有依赖性的牺牲品和一位被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室中，与她那

些堕落淫荡的故事相比，她那神话般的地位对公众的想象更有吸引力。作为不受欢迎的国王的受冤屈的王后，卡罗琳比平民化的、随随便便的她更令人同情。在妇女与神话之间实力悬殊的对比因她的倒下而被揭露了出来。她的希望，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迫害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

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淫荡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

来自新教的信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对妻子不满的人也支持王后，并帮助建立一种能联系圣公会与上帝以及托利党与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在此期间新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新的定义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良好的男女关系。

这种新论述发展的高潮在19世纪末福音派出现后，这是圣公会里的一种变革运动。由于社会低层教友的呼吁，也受循道宗教义的影响，福音派主要通过对富人和上层社会的影响来改革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变革运动主要依靠落魄贵族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尔向上层社会呼吁必须要使英国生活重获新生。福音派主要关注的是原罪、犯罪和赎罪的可能性。皈依，看到光明并了解罪人的本质是必须的。如果人们不了解人类原罪的深重以及赎罪的可能性并通过基督来拯救自己，那就没有希望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福音派世界观的实质，他们把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看作是18世纪社会精神和道德丧失的根源。社会已经烂到了根上，但这种腐烂是宗教虚无的结果。名义上的基督徒会去教堂，会读圣经，但他们从不用心去聆听上帝的福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从皈依的那一刻开始，那些把自己当作罪人并寻求拯救的人可以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他们可以寻求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这包括打破所有的旧习惯，认真检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以及以基督徒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

这种信仰更多地需要长期坚持。它旨在把每个人本身转变成信

仰基督的新人。这就要求有力的支持，包括内在的检查，可以用清教徒的方式，也可以用日记和宗教杂志表现出来。当然这还需要来自牧师和其他信仰者的外部帮助，这样能有助于不停地努力直到成为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种努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仆人和雇员的关系、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以及每餐的进食和追求的快乐，而且不论这种细节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是在教堂还是在马厩。上帝在观察和聆听，而那些全视的眼睛和全听的耳朵必须变成内在的良心。仔细检察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每天、每小时和每分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每个行动和每个想法都经得起永恒的审判。对自我的了解是获得拯救的基础，就像福音派的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所写的那样。

能了解自我和自身灵魂的状态是“最有智慧的”。其次重要的职责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其他人，也就是传播福音。福音派从自身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然后就是改造整个社会。这种热情不断增加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给英国上层社会带来了恐慌。由于对法国事件的害怕，英国的一些阶层开始就最重要的优先权是保证每个人住所状况良好的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激进派的重建秩序强调重建政府和对旧政权的腐败进行批判，而对福音派来说，这就是关于原罪和不道德的问题。使社会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如果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不进行一场革命的话，这样的事件就会在英国重演。

而这种革命必须从个人做起。每个灵魂通过基督团结在一起，重获新生的经历是挑战道德腐败和衰退的基本先决条件。放弃自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妇女这样写道：“自我必须被放弃，自我必须死亡，基督才是一切的一切。”整个身心都要神圣地服从，就连意志也要学会服从。祈祷者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考虑。福音派认为个人信仰是宗教经历的实质，并强调阅读、研究圣经和祈祷的重要性。这种通过日记和宗教杂志进行的个人内省需要家庭祈祷的帮助。当宗教家庭每天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时，他们可以互相检查和指引对方，讨论每个人堕落的具体表现，并会为基督的理解和原谅而一起感到宽慰。

阿瑟·休斯：《就寝时间》，1862年。晚祈祷：母亲的职责。

这种宗教家庭能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骄傲和原罪，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需要寻求能藏身于基督世界的宁静和与世隔绝。在这里，戏院或者会议室中虚假的愉快，会被了解了救世主后产生的内在宁静所取代。在福音派里，男性对“世界”的抛弃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被认为对宗教活动非常有害，而中层和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被认为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实践。对福音派来说，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清教徒已经证明了家庭是躲避外界压力的安全避难所和一块宁静的地方，在那里主人和主妇可以自由地指挥他们的孩子和仆人。福音派把家庭当作改革举止和道德实践的中心。家庭可以成为清教徒梦想中的小型教堂，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而且不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在家庭里都可以追求真正的基督教的实践活动。

汉纳·莫尔的家庭道德

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福音派要求改进行为准则。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汉纳·莫尔擅长描绘基督教的典型人物，那些人物为实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引导。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己土地的绅士，他的收入微薄，因此他的女儿们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养活她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皈依之前，莫尔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著名演员和经纪人大卫·加里克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她还是“兰袜子”的成员，这是一个文学女性的组织，她们每天在伦敦聚会，谈论当天的出版物。像她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一样，她皈依严肃的基督教不是心血来潮。宗教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态度和价值观。她开始为严肃的基督教服务。在18世纪80年代，她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旨在动摇英国上层阶级的满足感并鼓励他们进行道德改革。

就像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法国大革命也为汉纳·莫尔提供了一个分水岭。部分出于政府的需要，她的学说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说服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去相信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她著名的系列书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抵御武器。18世纪90年代福音派试图通过宣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与基督教振兴运动相结合来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在为穷人而写的那些小册子中，莫尔鼓吹对当权者绝对服从，并强调进入神圣家园的乐趣。在上帝的眼中，谦卑、恭

约翰·菲利普：《长老派的教义传授》。在家庭住所阅读《圣经》。

顺和辛勤工作就意味着快乐。在政治上，莫尔和大多数福音派一样都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嘲笑世俗的事物，只关心内在的精神生活。但莫尔在政治上的保守与她在宗教上的激进以及坚持重新生活的主张并不一致。她作品中精神上的热情和道德的确定性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尔最基本的探索就是为了获得宗教拯救。她认为家庭对拯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认为家庭责任对于开始基督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灵魂，因此生命才会永恒，但男性和女性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莫尔的早期作品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举止和风格上的恰当行为。这些书中的一部分非常流行。但她后期的作品太急于寻求对她思想的支持，其中既有规劝也有引导，虚构的成分比较多。她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1807年出版的《科埃莱布斯寻妻记》。这本小说当时立刻成为大都市和小乡村谈论的话题，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本书是为中产阶级所写的，因为莫尔已经放弃了她对上层阶级的独家呼吁，她当时认为中产阶级是道德重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福音派是从贵族的外围发展起来

在19世纪的英国，当父亲在读《圣经》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倾听。两幅画分别表现的是虚心和死板的态度。

右图：佚名，《家庭敬神活动》。

下图：塞缪尔·巴特勒：《家庭祈祷》（1864年）。

的，但它很快就发现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中产阶级。商人、制造业主、银行家、农场主、医生、律师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工匠和新的牧师组成了大多数的教区，在那里福音派得以发展。但它从来没有得到穷人的大力支持，穷人的宗教倾向是循道公会。

《科埃莱布斯寻妻记》一书集中体现了莫尔对男女之间适当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应该如何以不懈的方式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科埃莱布斯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能从土地财产中得到令人满意的收益。自从父母去世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妻子。这篇小说寓教于乐，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对孩子的关心和对仆人的责任；男子的商业地位和妇女在家庭内的职责；花园的养护以及指导穷人如何组建一个家庭。在旅行的过程中，科埃莱布斯首先去了伦敦，他被大都会生活的肤浅所震惊，那里的人们就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地追求快乐。他发现他所遇到的年轻妇女都是思想空洞、举止轻佻的。因此他又回到了乡下，一个与遭到严重腐蚀的城市完全隔绝的地方，按福音派的观点，这对宗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在乡下，科埃莱布斯碰到了斯坦利一家，他们是他父母最好的朋友。他最终和他们一起生活。

斯坦利一家是最完美的宗教家庭，他们不仅鼓励同住者恰当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为来访者指引道路。这个家庭的创建人斯坦利先生是男性基督徒的典范，他具有福音派认为的新型男性所必需的所有品质。他真正的宗教生活贯穿在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支撑着他所有的行为。斯坦利先生并不像18世纪传统的绅士那样成天忙着打猎、射击、钓鱼、喝酒和吃饭，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地主，决定履行对佃户的责任，他把这些责任不仅仅看作是经济责任、道德和宗教责任。他对待家庭职责非常严肃，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父亲。在斯坦利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照顾周到的丈夫和父亲。汉纳·莫尔告诉我们，以家为根本，能享受家庭生活，愿意承担对子女的责任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以性生活放荡、喝酒和生活放纵来表现男子气概是令人厌恶的。新一代的男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的职业作为生活的中心，不论这个职业是农场主、商人、神职人员还是律师。不论什么职业，他都需要有敬业的精神。他必须表现出他作为工作和家庭主宰的权威，同样地还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爱心。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男子和妇女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在左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家中的妇女、孩子和仆人。

左图：《埃米莉阿姨来访》，约1845年。现在是下午茶时间，为了埃米莉阿姨的来访而拨火。

右图：同时，在伦敦交易所里，男人们正在做生意。

两个阶层：公众男人和家庭妇女

福音派男教徒被认为是关心公众世界并有责任感的人，女教徒则被认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汉纳·莫尔认为男性和女性生来就属于不同的领域，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习惯和规矩。大自然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规定，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价值；任何超越各自领域的企图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莫尔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憎恶不仅是因为她抛弃了18世纪90年代的佩尼特激进主义，而且因为她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要求的两性平等是反自然和不道德的。她相信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就显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妇女去追求与男子在同一领域的成功，就是对上帝赋予她的特殊任务和职责的否定。她这样写道："很显然，鱼拥有鳍，鸟拥有翅膀，这是身体力量上的优势，而男人拥有更强有力的大脑组织，因此他可以主持复杂、大胆的行动或者会议场面，比如，担任复杂的政府职务，进行武力争斗，面对科学的复杂性和深度，陷入商业繁忙之中，或者进行其他需要更强的理解力和更广泛才智的职业。"莫尔详细说明了看得见的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以及她认为是属于男性或女性一系列自然特征。

福音派关于女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之上的，而这种假定认为女信徒是与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密不可分的。夏娃的堕落是由

于她的公然纵欲，但基督的母亲玛丽亚通过生下耶稣给妇女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包括莫尔在内的所有福音派教徒的指导人——圣徒保罗教导妇女，她们的职责就是管理家庭。妇女的职责就是当好妻子和母亲，家是她的影响力和行动的理想场所，广阔的公众生活舞台并不适合她。她是丈夫太阳身边的月亮，她的光芒可以照耀整个家庭；她是羞涩的紫罗兰，只有有时间和耐心的人才能发现她的美丽。

福音派教徒坚信所有人，不论男女，都有获取拯救的权利，但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上的平等。男性与女性在行动范围上的差异或者说妇女只能涉足较小的圈子，意味着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妇女只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圣徒保罗是这样写的："妻子们，把你们自己交给你们的丈夫，主认为这是正确的。"谁还有权威去挑战它？但这并不是说妇女缺乏影响力。男子拥有所有的权力，但妇女可以影响男子，这是她们的特殊技能。用这种方式来关心男性是她们的特殊职责，这样，男性会去听她们说，注意她们的建议，重视她们的话。在一个受福音派影响的家庭中，精神生活是主要的。妇女因与男性的关系而拥有自身的尊严和地位，但这还需要她们的特有技能的帮助。

福音派赋予中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以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方式和对过去经历的新的理解。在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时，旧的头

衔和土地已远远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宗教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土地和家长式作风的尊重，但它认为能进入精神生活才是更为重要的。就像中产阶级最喜欢的基督教诗人威廉·柯珀写的那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最骄傲的就是能与基督同行。具有这种道德倾向使严肃的基督徒们具有在上帝的葡萄园里辛勤工作的力量和热情。

“与其闲死不如忙死”是维多利亚时期卓越的福音派们最喜欢的格言。这句箴言对其他人也适用。他们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上帝而工作。福音派开始时是针对圣公会的改革运动，但几十年来，它一直无法确立其优势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在圣公会中，福音派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不论是教会还是在国家中，它的支持机构越来越多。这是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培训牧师，授权于教区；建立学校和主日学校来讲授福音派的教义；印制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筹集资金来传播上帝的福音；不论什么时间和场合，只要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这种四面出击的计划必定会四面树敌。从科贝特的谩骂到狄更斯和萨克雷的漫画，福音派成为了敌对的“笔杆子”们的攻击目标。但另一方面，这种敌意也说明了他们的成功。在新的城区，他们大建新教堂和分部。而在英国乡下的教区，他们换掉了不履行义务的兼职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牧师。他们逐渐赢得了支持，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了，即使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也是如此。

19世纪早期，不信奉国教而信奉福音派的教派的兴起有力地声援了圣公会福音派发起的旨在拯救英国免于道德腐化的运动。18世纪不顺从国教的主要派别，如贵格会、一位论派和长老会都幸存了下来，但信徒大为减少，而且连很多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同时，支持新教的教徒迅速增加，包括像循道宗、独立派和浸礼会。新教和圣公会在关于皈依与拯救和宽恕的力量上的信仰是一致的。另外，它们都认为目前所面临的斗争就是为了赢得英国人的宗教生活的精神斗争，而且圣战军队必须与具有圣灵亮光的敌人进行战斗，不管他们是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危险的激进分子或者无神论者。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尽管圣公会和新教在教会与

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为了反击不信仰宗教的威胁，严肃的基督徒准备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一起努力。

这些基督徒还同意相信关于男子和妇女角色的假定，特别是由汉纳·莫尔表述的关于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讲道，要求对18世纪晚期的讲道进行重新修订成了他们新的正统的做法。汉纳·莫尔和福音派诗人威廉·柯珀一起写了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的乐趣的文章，为新生的男性和女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参照标准。男性基督徒会照料家中或者雇员的家属；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他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他身体上的强壮；虽然他的生活舞台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但他也热爱他的家。女性基督徒则通过她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她会从对家和家庭的职责中寻找到满足感。直到19世纪中叶，柯珀和莫尔向贵族和绅士的男子化没有宗教感情的观念以及沃斯通史拉夫特和她的同志们所持的男女平等的危险论点发起了挑战。他们的观点成了严肃的基督徒和英国中产阶级共同的臆断。

大众化的家庭生活

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到1820年公众会认定英国国王不应该鄙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汉纳·莫尔是如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而被牧师们引用、为大量课本所赞誉的？为什么关于妇女贪婪的性欲的早期观点被抛弃了，而转为强调妇女的羞涩和天生的冷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家庭财政中两性间伙伴关系的臆断被新的认为男人的职责就是为妻子和孩子提供财政帮助的想法所代替了？为什么现在已婚妇女劳动力被认为是适合于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她们的职责看作是当好妻子和母亲的，而这时男子已发现许多不同的新技能和新工作了？为什么中产阶级会相信并以此来组织他们的生活？

牧师为不同职业的男子和妇女祈祷并在教会组织中追随这些信仰。男子发挥着积极的公众作用，而妇女的作用则是维持性的和私人化的。男子可以进入内阁，而妇女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有不同意见的小教堂里，男子开始担负更多的责任。18世纪非正式的小教堂到了19世纪会变成有实力的大教堂。教友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再加上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有新的机会，需要新的设施和认可新需求。

伯明翰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镇，其富有是建立在金属工业

的基础之上的。下面，让我们以伯明翰市中心的一个独立派小教堂为例来说明。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卡尔街教堂就已经打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相对富裕的基础。它有一座建造特别并不断改进的大型教堂，有两位全职牧师以及主要由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组成的经常超过千人的星期天教会。从1805年到1851年，那里的主要人物是约翰·安杰尔·詹姆斯教士，他以布道和写作闻名全英国。在他广受欢迎的作品比如《青年男子的朋友和使生命不朽的指导》、《女性的虔诚》、《家庭监视员》或者《对家庭幸福的帮助》中，詹姆斯教育大家，男人应该是家庭中的国王和主人；已婚妇女应该把她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投入到家庭中，以及宗教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牧师是由为他的服务付钱的教友们指定的。然而，在选牧师的时候，只有男性教友有投票权；只有男性教友才能成为委托人并对小教堂的财政负责；只有男性教友才能得到教堂中新设的职务。例如，执事的职务是由男性教友来担任的，其主要职责就是支持和帮助牧师的工作。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妇女能成为教堂的教友是因为，“不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论是被囚禁的还是自由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上帝面前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精神上的相同并没有反映在教堂中的社会关系上。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男子和妇女在教堂中占据了不同的领域。在卡尔街教堂的会议中，妇女被允许发表讲话，但并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教堂都赋予妇女这项权利。教堂欢迎她们充当教堂工作的助手，比如说分送宣传册、在女子主日学校教课、拜访穷人家庭、充当志愿者和执行牧师的逐客令等。这是她们作用的延伸。

在中产阶级学校中，并不只是宗教学校才试图建立不同的性别领域。基督教福音派对于建立新文化的冒险活动非常积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女活动的区别经常被写入其章程，并被铭记在这些社团的习俗和实践中。以文学和心理机构或者在许多城镇中成立的艺术社团为例，男子和妇女都能得到教友身份，但因为性别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委员会中男子很活跃，出任各类职务，他们在特殊领域的贡献得到了教堂的承认；他们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并使用各种提供的设施，但另一方面，虽然妇女也付同样的教友费，但她们不能加入各类正式的机构。通常她们只能由别人代为投票，而且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由男性参加的

年度晚宴。像许多其他的学校一样，伯明翰哲学学院也不允许妇女使用阅览室，因为人们认为阅览室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场所，是一个让男人避开女性的聊天能安安静静地看报纸的地方。毫不奇怪，人们认为这些社区主要是男性的地盘。虽然由于与男性成员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妻子和姐妹，许多妇女能使用一定的设施，但几乎没有妇女能参与这些活动。在19世纪末期，由于妇女获得了自信，并逐渐感到由于她们私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融入到男子的公众世界中，她们开始要求设法进入这类俱乐部和社团。然而，在19世纪末期，当中产阶级的男子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且因他们的宗教灵感产生自信，开始逐渐寻求以他们的想法来重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拉大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差异。

卡德伯里家族

同时中产阶级男子和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正在以增大两性劳动区别的方式在改变。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和专业人员能通过性别来强调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责任的思想来认识他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以18世纪末伯明翰的店主卡德伯里一家为例。出生在西部农村的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跟一个布商当徒弟。他来自公谊会家庭，而公谊会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紧密的宗教、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他的学徒生涯是在格沃斯特度过的，而作为一个熟练工的日子则是在伦敦；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在伯明翰当绸布商的机会，1794年他在那里安了家。除了为他的学徒生活付费和把他介绍给所到之处的公谊会社区之外，他父亲还为他的小买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在1800年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他迅速扩大的家庭一起搬到了他在布尔街购买的商店的楼上，那是伯明翰的主干道。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住在他们经营场所的楼上或者旁边是很普遍的。铁器制造商就住在市场的边上，律师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办事务所，而小店主就住在商店的楼上。只有非常富有的中上层阶级才会渴望一座独立于家庭企业之外的房子。

还是一个女孩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没有接受过她丈夫那样的训练。妇女不可能得到学徒生活，因为传统的假设是她们能从工作中学会所有必要的知识，会学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只有富人才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去家庭企业中工作。农场主的妻子要

负责奶牛，商人的妻子要在仓库或者账房里帮忙，而在丈夫去世后，制造商的寡妇要经营整个买卖。在需要额外的人手时，伊丽莎白就去店里帮忙，而在丈夫外出时，她就会照看买卖；她要负责组织整个大家庭，包括学徒和商店的女店员以及她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婚姻生活的前15年，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8个活了下来；而且她的老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总是有喂不完的孩子、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衬衣和挑不完的水。然而，在两个女仆帮她做一些家务的情况下，伊丽莎白还在家里的买卖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理查德去伦敦为店里找新织物的时候，他写信给妻子："在我到邦巴津斯以后，我发现很难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颜色。那些我所看到的织物都很漂亮，而明天我要去找黑色的（织物）。"他焦急地打听是否有他们所关心的来自爱尔兰的关于亚麻布的消息，还告诉她自己已经买到了"一些彩色和鲜红色的围巾"，还为他们的女儿萨拉订了一顶帽子。他信里的内容既有关于买卖也有关于家庭琐事的，主要部分则是买卖以及男人和妻子的社会生活。

公谊会家庭，卡德伯里家的第二代：1847年，约翰、坎迪亚和6个孩子在他们埃格巴斯通的房子前。

在1812年时，商店经营得很好。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在郊区，几乎算是农村的伊斯林顿路又租了第二座不大的房子。年幼的孩子们搬到那里去和保姆、宠物们一起住，那里有鸽子、兔子、一条狗和一只猫。他还额外租了一块地，在上面种水果和蔬菜。现在，卡德伯里夫人要管两个家，她和大女儿开始两头跑。1827年，她生病了，但随后很快理查德就高兴地向他们的一个女儿报告说她已经康复了，能够承受一天忙碌的工作，在商店里奔忙而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同时，儿子们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不同的城镇和不同的零售业当学徒。长子本杰明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准备接手家里的买卖。次子约翰则被训练成茶叶和咖啡商人。女儿们没有受到这种正式的培训。她们是母亲的徒弟，她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烘烤的技术和家政的管理，而且还有如何把这些技能和准备帮助商店相结合的艺术。她们会照料花园里的水果和蔬菜，或者在冬天帮母亲一起铺好地毯让房子暖和一点，或者出现在商店里去帮助父亲。生意是每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部分。当布尔街经营场所被转手，人们对他们表示担心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这全是为了生意。"

劳动力的分工以及家和工作场所的分离

但商业实践正在逐渐变化，令这种家庭的介入变得越来越困难。已婚妇女是无法定立合同的，她们不能起诉也不能应诉，而且也不能成为合伙人。她们的婚姻状况就意味着：在法律上她们的丈夫对她们负责；她们没有独立的合法身份。只有单身妇女和寡妇才能独立地经商，而且经常是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们的机会才会出现。18世纪，在像卡德伯里一家那样的家族企业中，丈夫和妻子就像非正式的合伙人那样互相协助，共同关心生意就如同关心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男子对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有尖锐的分工争议的，然而，许多与商业有关的任务只能由男人来干，比如说，总是理查德出去找货源。而且虽然已婚妇女有权以丈夫的名义来抵押贷款，但伊丽莎白却把付款支票留给了丈夫，非正式合伙人关系也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承认。

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改革最终导致新商业实践的发展，而后者正好威胁到前面那些传统的、非正式关系。在合伙制为商业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的时期内，限制已婚妇女和身负家庭期望的

在店里：男子和妇女站在柜台的两侧。专业的零售业还是男人的堡垒。

女儿们的法律条款，就意味着合伙制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是男人，而且通常是亲属之间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合伙做生意。学徒制度逐渐消亡了，但针对商业阶级需求的教育和培训还是不对妇女开放。比如说，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需要学习记账，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在19世纪有许多旨在向男子提供成为工业巨头所需的技能的教育尝试。而同时，女孩还是在家里接受教育。一旦青年男子进入商界，他们很容易就能发展起和其他男子的关系和联系，以保持信用、协商借贷和争取新客户。而妇女很难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曾经通过非正式谈判来进行的借贷逐渐需要通过银行来进行。曾经在市场上出售的玉米现在被放在玉米交易所交易。这是一个完全被男子掌握的机构。相似的情况存在于股票交易所，那里也没有妇女的位置。

布店是第一个展示了现代零售业特征的地方。与许多其他同时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人不同，布商对生产环节的控制是相对自由的，只有线是必须准备的。织物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棉织物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布料市场的扩大，到了19世纪20年代，城镇和城市中的布店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能够集中资金用于店铺改造的布店常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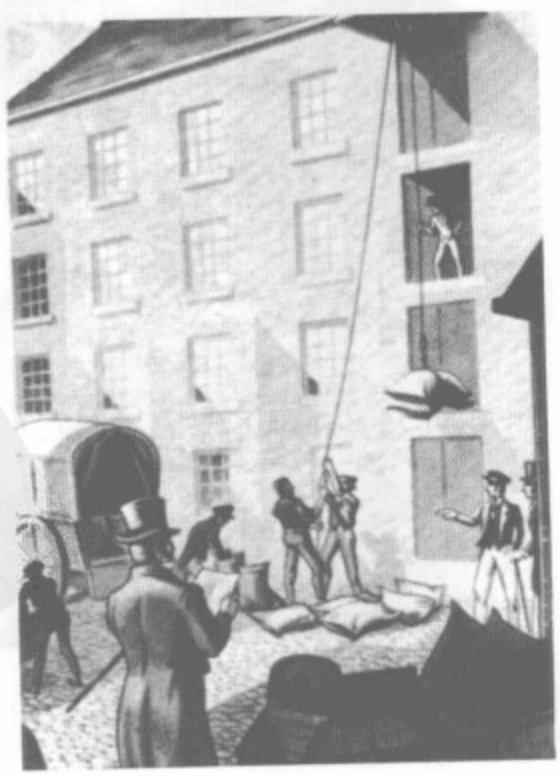
是最先使用平板玻璃窗户、橱窗展示和煤气灯的，它们还领导了价格标签和现金交易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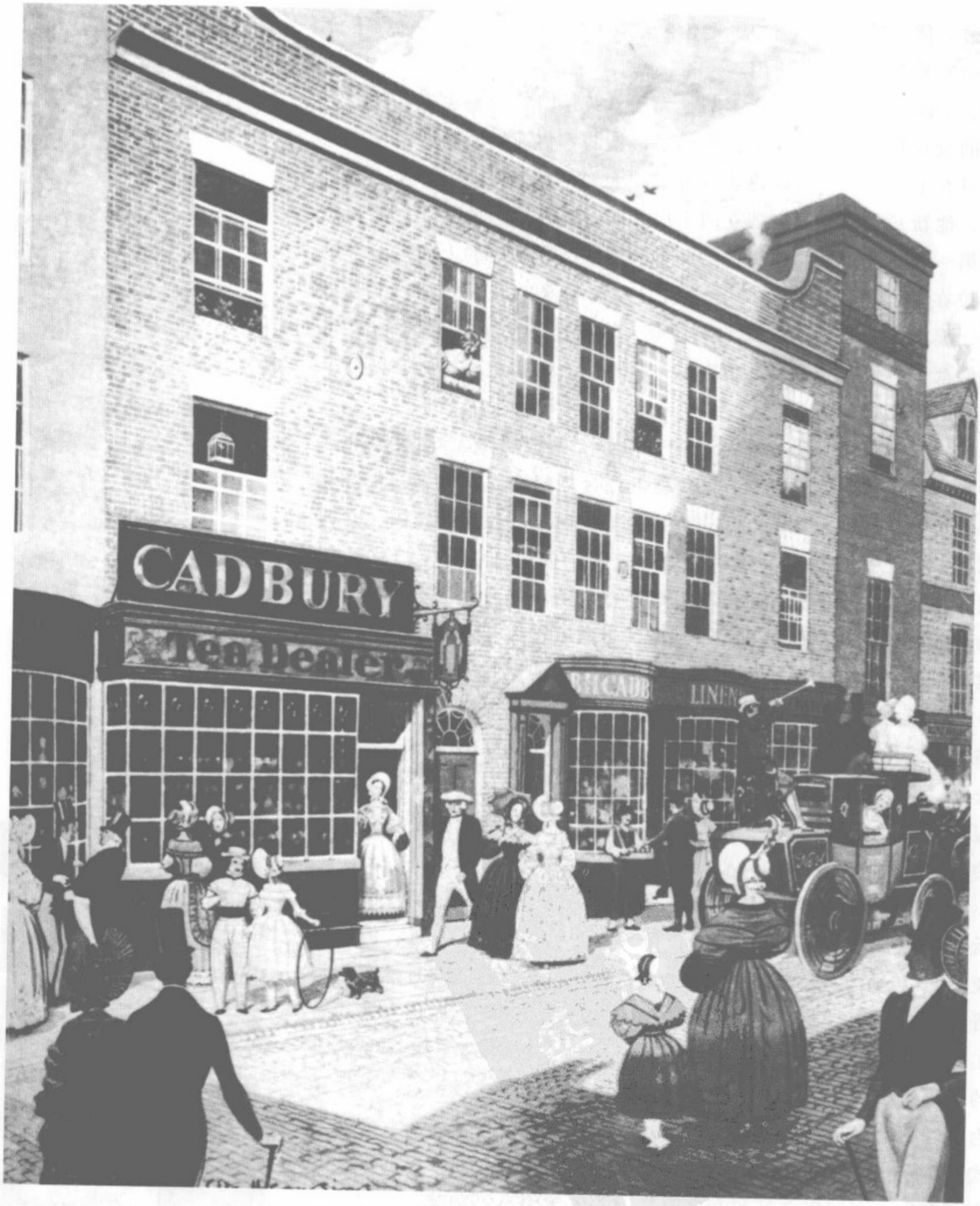
卡德伯里的布店生意不断扩大和繁荣。同时约翰在隔壁开了自己的茶叶和咖啡店，他不仅推动了最新的零售业的改进，而且决定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本就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可可生产上去。为了这样做，他新开了一家完全独立的工厂并同时经营两边的生意。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普里西拉像他的父母一样生活在商店的上面。但普里西拉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28年就去世了。1832年他再婚，娶的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坎迪亚。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都一直住在布尔街，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从城镇中心搬到了埃格巴斯通附近。

埃格巴斯通还处在郊区的发展阶段，距伯明翰大约1英里。这是福音派主教卡尔索普从1800年就开始计划建造的。卡尔索普选好了地址，把这里设计成能为中产阶级提供时髦的住宅和花园，并远离肮脏、忙碌和讨厌的邻居的地方。租借的土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店主不能把他们的家变成商业场所，制造商也不能在他们的花园里建车间。那里铺上了宽敞的道路，种上了许多树，还及时建起了教堂和公园。埃格巴斯通最令人自豪的是其吸引人的别墅和乡村景色，它为农村提供了城市的精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必然需要将工作和家分开，因为在埃格巴斯通是不能在家里经营家庭企业的。卡尔索普的创造以一个假设为基础，那就是中产阶级希望家与工作场所分开，家庭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甜蜜的亲吻和妻子的爱抚应该与对生意的关心和焦虑相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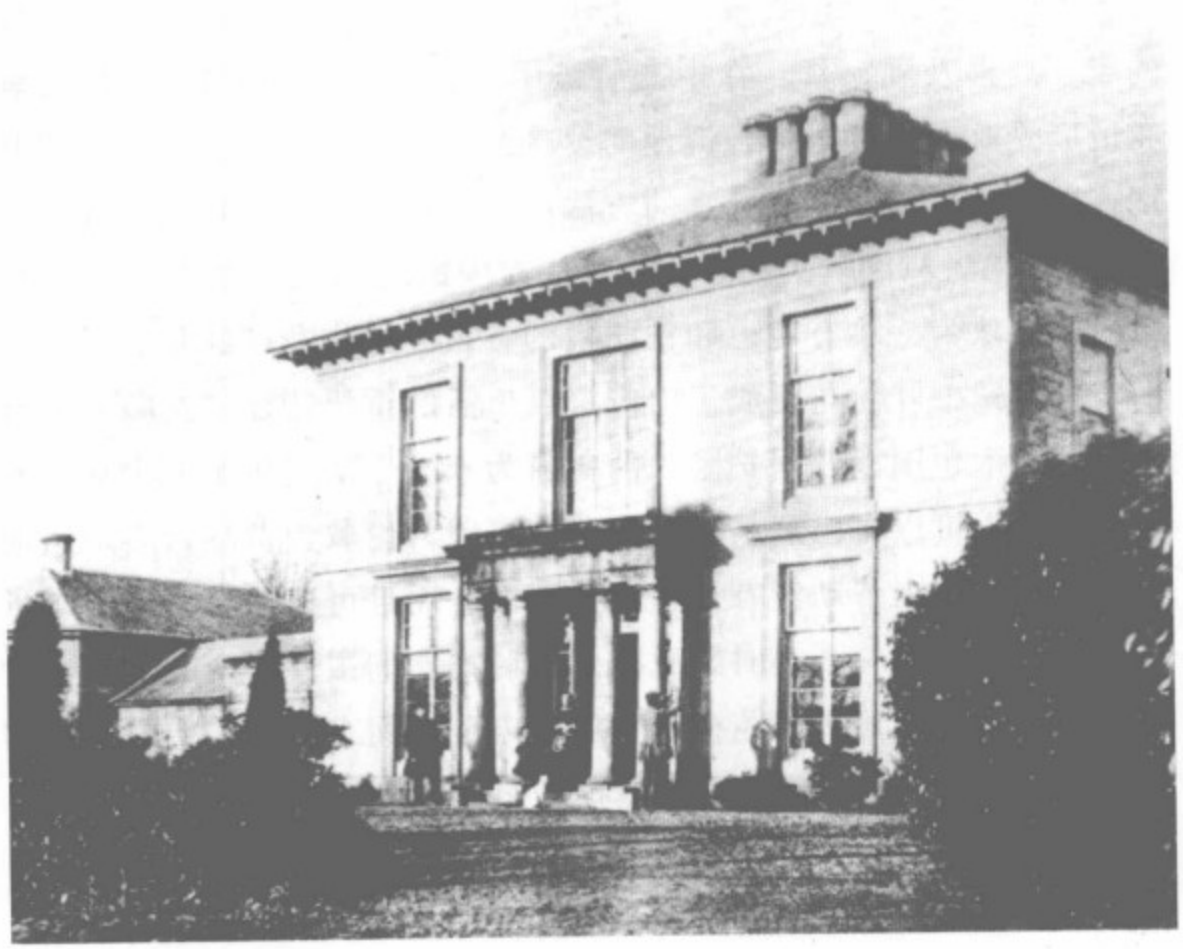
经济和商业变化促进了这种分离。当卡德伯里的企业规模增大后，妇女不能涉足越来越多的工作领域。工厂离房子很近，但坎迪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眺望它：她婆婆在照看商店，同时她却在照看孩子们。扩大业务范围就意味着更大的劳动分工，雇用更多的男工和精心制作的财政记录。当然这些对男子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约翰和他父亲都参与了新交易大厅的设计和建设，这个大厅是为更好的销售提供场所的设施，并且是当时更为先进的商业实践形式的特性化的部分。生意和商业成了男人的领域，而仅存的女性零售商都集中在销售食品和女性服装上。出于为自己和孩子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环境的需要，同时为了不受相关工作的干扰，卡德伯里

卡德伯里仓库的规模说明了他们商业机构的扩展。





E.华尔，1824年前后，伯明翰布尔街上的卡德伯里王国。右边是父亲理查德的家庭日用织品店；左边是儿子约翰的茶和咖啡馆。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中产阶级大房子。19世纪50年代末的贝里克郡。

兄弟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同领域的观念。

村舍和保育室

近40年来，约翰和坎迪亚的新房子一直是他们的家。当家庭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条件允许之后，他们逐渐改变并扩大了房子的规模。坎迪亚把时间都花在家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和照料花园，就像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在后来描述的那样，“房子的外表像是村舍，而且也太小了，但它周围田野般的环境让父亲决定买下它，然后再增添几个房间，并以他们自己的品位来修建花园……母亲非常喜欢园艺，而生意和城镇上的事务以及别的兴趣占用了父亲很多的时间，在工作日，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照看她的花园。”这座房子很快就有了一间娱乐室，后来又有了一间教室和一间在楼上的给小孩子的保育室。坎迪亚和她的孩子的生活主要是在家里和学校，而她丈夫则把埃格巴斯通的家当作一个幸福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可以活跃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里。

像这样有餐厅、画室、教室和保育室的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18世纪，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孩子们有独立的房间以及吃饭和做饭的地方分开的新观念是与男人要

有工作场所的观念相联系的。由于逐渐强调温暖和舒适，因此这样的家主要涉及到家具。在中产阶级中流行典雅美的时期，J.C.伦敦在他广受欢迎的手册中告诉他的读者们保育室是什么，如何布置画室，以及用丈夫和妻子分享的方法看花园能提供什么样的乐趣，因为如果家庭设计是全新的，那么其周围的花园也是如此。在18世纪，人们认为一块有走道和铁栅栏的方形土地作花园就足够了，但到了19世纪中叶，花园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特征。温顺的大自然，被树木包围以及保护隐私的树篱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男人可以自己照料树木和葡萄，因为伦敦曾费尽苦心地向他们保证这种手工劳动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而且可以在镇子里忙碌了一天以后，抽出一个小时来放松一下。妇女们主要负责的是花，女性天生的甜蜜、温柔和花朵的美丽和芬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母亲可以在他们的小花园里教孩子们如何照料植物和如何播种。

妇女和孩子们用以打发时间的园艺也可以成为联络家庭的感情并进行德育教育的方式。

约翰和坎迪亚在埃格巴斯通的家和花园是对家庭生活特殊观念的集中体现，比如说男子和妇女的特殊职责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汉纳·莫尔对于理想世界的观点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房屋。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宗教信仰会产生对精神体验的持续关心，而且要求宗教家庭能发现男女工作的逐渐分离和划分的物质形式。当男子面对扩大的生意和专业化部门中日益增多的机遇，以及他们的职业活动和公众活动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时，妇女正在从这个领域中撤退，并将母亲和家庭管理作为她们的职责。这种两性世界的划分具有宗教上的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男子只有通过与家庭这个精神世界的不断接触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家里，妇女作为真正价值的承载者会对市场的这种破坏趋势产生反作用。家是令人高兴的地方，是为家里创造物质财富的疲惫、焦虑的男人的避难所。他的男子气概是以他有抚养家人的能力为基础的，而他妻子和女儿的娇柔源于她们的依赖性。男人的高贵在于他的工作；而如果妇女有工作的话，她的温柔就会被毁掉。到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中男子挣钱养家、妇女和孩子在家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已经广为传播，以致于总登记员不仅能在人口普查中采用“家庭妇女”这个表述方式，而且能在1851年的调查报告中做这样的阐述：“每个英国人都强烈渴望能拥有一座完整的房子，因为这意味着他家庭周围的圈子以及这个圈子的中心有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可以悲伤、欢乐和沉思的场所。”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

许多英国人会对总登记员的论述表示吃惊，但是他对这件事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论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严肃的基督徒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群体，比如说功利主义者、宣讲福音者。他们的目标是按他们的想法来重建这个世界，他们希望把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都转变成和他们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并且试图鼓励他们以特殊的方式来举手投足。贵族和绅士应该放弃他们放荡和好逸恶劳的方式；而穷人应该变得勤劳起来。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稳定的家庭生活和舒适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各类传播福音者和功利主义者都同意最后一个观点。伟大的杰里米·本瑟姆就坚定地相信男女属于不同领域且能力各不相同，他

正如那些福音派会员一样，相信功利主者关于两性之间应保持恰当关系的臆断。然而对本瑟姆主义者来说，不同的领域是肯定的共识而不是道德的准则。人们接受这个观念的自然程度反映了在19世纪早期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这两个领域领导人的影响力。

穷人的道德教育

中产阶级变革者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组成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的制袜工人、手织机织布工、纺纱工、小业主和小型出版商对与福音派教义相关的新家庭价值观的接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全国开办了无数的学校、主日学校和各种慈善事业，但这些机构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观念。中产阶级妇女在向主日学校的学生、学校女生、年迈体弱的妇女推荐家庭价值观的时候，同时确定了她们自己的“相关领域”和她们对工人阶级妇女恰当位置的认知。这个位置或许是她们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女仆，也或许是工人阶级妇女自己家中受尊敬的谦逊的妻子和母亲。比如说，年老体弱妇女的协会代表那些已经尽完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被丈夫抛弃的妇女来筹钱。组织者非常注意去证实这些妇女是否真的是被抛弃的，她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很艰苦。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分开上课，通常是在不同的建筑里，并且强调的成绩也完全不同。自我改进社和辩论社只对男子开放。通常有很强的本瑟姆主义背景的新型机械学院是完全男性化的，并且它们希望不仅把男子培养得更加勤劳、理智和更有技术，而且能更好地成为丈夫、父亲和兄弟。就像其中一个学院的报告强调的那样，男人的整个家庭将得益于他的这种培养，他会变得更加冷静、机智和稳定；他的出现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欢乐；他要更好地组织家里的财政，这样他就有更多的钱用于孩子的教育；他的妻子将学会成为清洁工，并且更加关心家庭。总之，家庭将成为家里的乐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男女工人难以通过中产阶级学院神奇地转变成令人尊敬的冷静的男子和喜爱家庭的妇女。但就像许多历史学家证明的那样，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拒绝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就像罗伯特·格雷在他对19世纪末爱丁堡的贵族劳动力的研究所显示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正在相互妥协，这种妥协造成了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的高贵和受尊敬的不同概念的出现。同样地，大卫·文森特在研究“有用的知识”对工人

阶级自传作家的重要性时，曾阐述了来自中产阶级含义之外的独立以及其创造出的具有阶级特点的概念。

就男性和女性领域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不能全面接受中产阶级关于恰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宗教和世俗对于男子气概、女性的温柔和家务生活的说教确实会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产生一定影响，确实能解释一些经历，而且确实满足了一些需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禁酒运动。禁酒是中产阶级统治权成功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中产阶级体面人形成的过程中，工人成了志愿者，他们希望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来改进自己、教育自己和养活自己。整个禁酒运动源自具有阶级意识并与宪章运动有联系的男工，但个人改进的基本想法吸收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形式，反对喝酒的言论向家庭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因为酒精带来的主要恶果之一就是摧毁工人家庭的倾向。在最受欢迎的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著名雕版连环画《瓶子》中，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等工人家庭在他们简单而清洁舒适的家中享受晚餐。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快乐家庭，他们的衣服补得很仔细，孩子在地上玩耍，墙上是家族肖像，壁炉里有炉火，而且门

1875年，曼彻斯特机械学院为工人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基督教慈善团体的主日学校教穷人们阅读，并向他们灌输道德。

上有锁，以保证家是一个避难和安全的场所。然后，男人给了他妻子一杯酒，一幕接着一幕，克鲁克香克纪实性地描述了家和家庭的毁灭，最终是丈夫的疯狂。他用瓶子杀害了妻子，最年幼的孩子死了，而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恶棍，一个成了妓女。这是禁酒说教者的惯用手法，将酒鬼不幸福的家与禁酒工人轻松愉快的家庭做比较。一位转变了的酒鬼以诗歌般的语句来宣布：

我声明我不会再喝
因为我发现是它毁了我！
从今以后我会注意不让任何东西毁掉
我应该从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中
享受到舒适和宁静。

这种声明不单是对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接受。工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对男子气概和女性的温柔的看法。虽然这不免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伯明翰的禁酒运动支持者约翰·史密斯说："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知道给幸福的居所添彩的是妇女。不论是在童年、成年还是老年，大多数安逸的生活要依靠我们的女性亲友。"在这里他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实际上工人的安逸生活是依靠他们的女性亲友。但那些女性亲友需要向她们的中产阶级姐妹们学习各种技能。中产阶级的观念强调的是母亲在精神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因为妻子的职责就是提供精神鼓舞以及管理家务；工人阶级设想中的好妻子和好母亲被强调的是有做饭、清洁和带孩子等实践技能，妇女的地位和自我价值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对好主妇的赞扬：弗朗西斯·普莱斯

被一些工人接受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说法是由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威廉·科贝特阐述的。普莱斯生于1771年，他曾给布围裙商当过学徒，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裁缝。他的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在那里他参与了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运动，担任了伦敦通信协会的干事，还曾在19世纪20年代的工会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年，他成了忠实的边沁主义者，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他能从生意中退下来，从而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改革家。然而，在年轻时，普莱斯非常贫穷，18世纪末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工匠。他发展了妇女作用的假设，比如说他认为，只要需

乔治·克鲁克香克：《瓶子》，1847年。

这是8幅连环画中的3幅。

开始：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丈夫给了妻子一个充满诱惑的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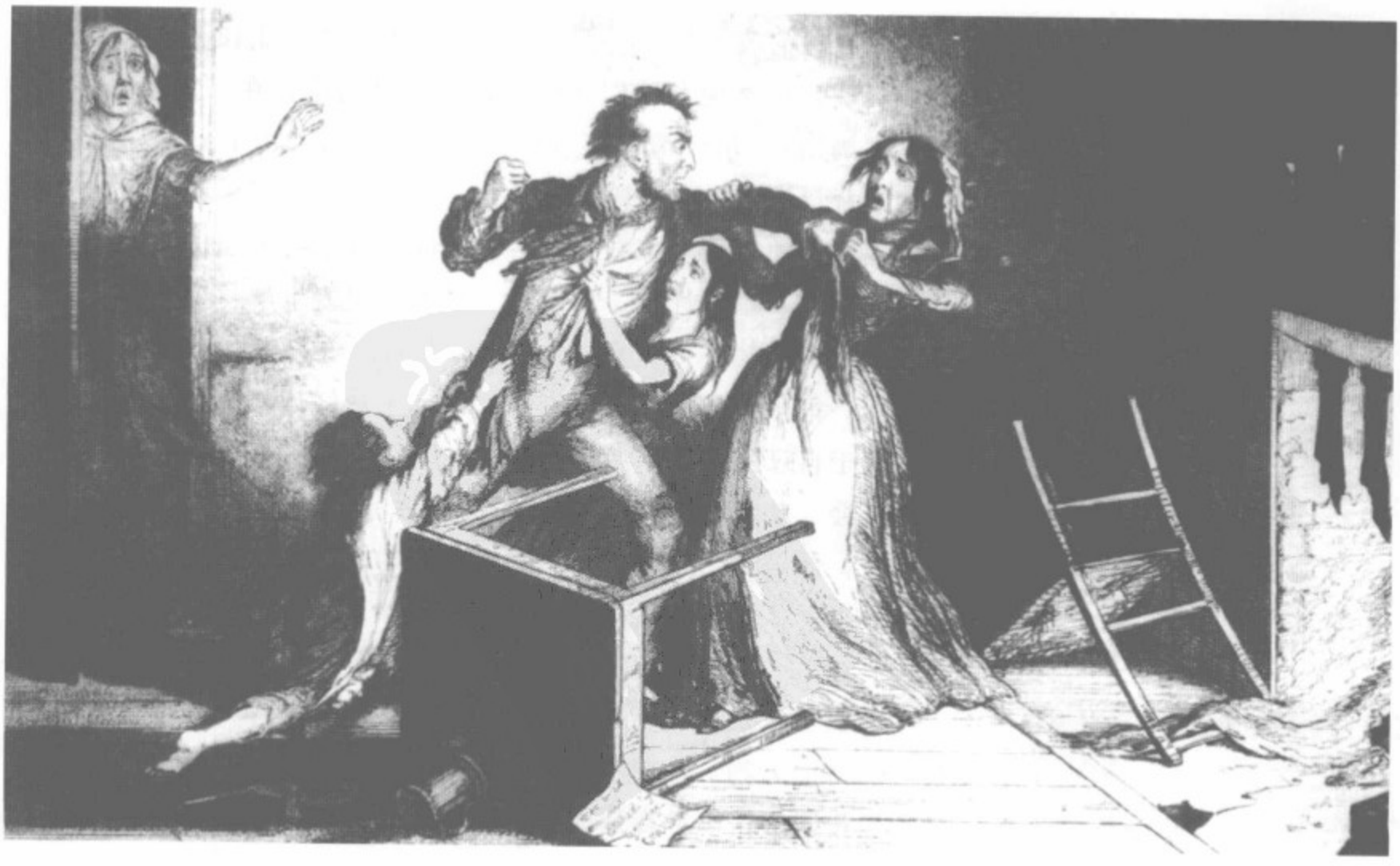
然后：失业的丈夫把家里的衣服当了换酒喝。

最后：争吵和暴力是必然的结果，有时还会使用瓶子。

要，他的妻子就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但他很坚定地去改进工人阶级的举止和道德，他在自传中喜欢详细描述贫穷的劳动阶级是怎样在文化方式和习惯上有所改进的。他喜欢描述已经消失了的年轻时代的街头游戏，公开展示那些乐趣，而且他还强烈反对工人的饮酒习惯和随之而来的对家庭的忽视。

早在总登记员写下评论之前，普莱斯就已经是渴望完整家庭的坚定拥护者。他相信，“只有妇女不得不在丈夫工作的房间、他们睡觉的房间里做家务时，才会使她和丈夫之间的地位下降如此之多，当然尤其是她自己的地位。”当他有一个带工作室的新住处时，他非常高兴，“这让我的妻子能更好地收拾房间，而且对精神也有益。我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也与以往不同。我再也看不见清扫房间、洗衣服、熨衣服和做饭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普莱斯就去当学徒；他的妻子给人当仆人，没有什么正规的技术。当他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挣得比妻子多得多了。她在照看他们的家和孩子的同时，还能帮他干些做裤子之类的工作。他对自我教育毕生的兴趣鼓励他去阅读，去思考，去



《村舍经济》所描述的情景。农村生活，自给自足和简朴的家庭主妇，这一切是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写作。当他的收入增加时，他就去购买书籍并且能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交往，虽然他和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始终存在。杰里米·本瑟姆和詹姆斯·米尔鼓励普莱斯写自传，以证明一个工人是如何从最不利的背景中来提高才智和财富的。

他妻子的自我进步方式则另有不同。她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裁缝和女帽设计者，能做到“只看一眼就了解一种款式，并马上按自己的想法加以变化”。按她丈夫的评价，她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妇女，很乐于成为一个好管家、好妻子和好母亲，而不是热衷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尽管普莱斯极力推崇的进步包括为男人们提供新机会、获得教育的希望、放弃放荡的陋习、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受人称赞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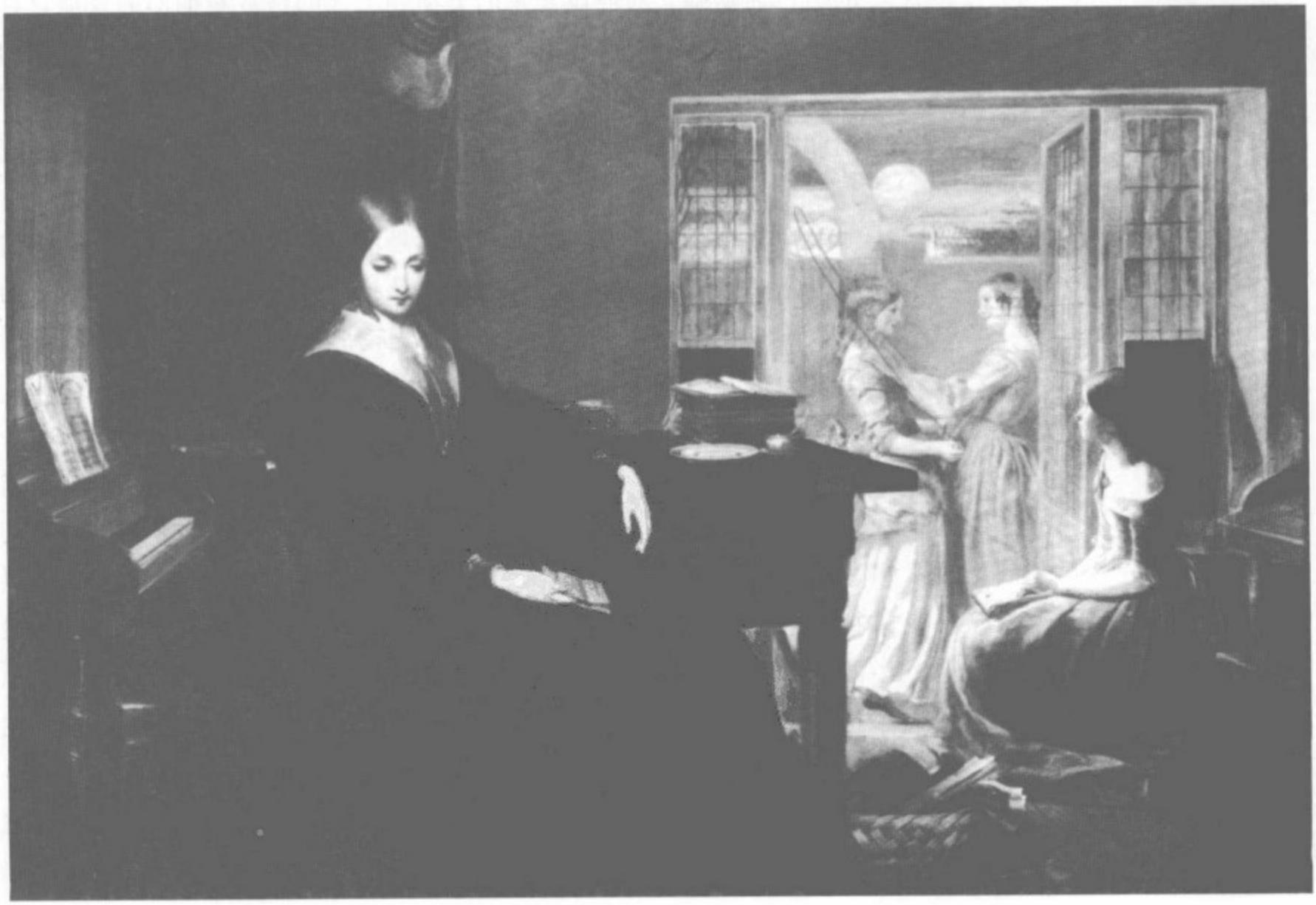
威廉·科贝特和“村舍经济”

作家和报纸撰稿人E.P.汤普森称科贝特是战后激进主义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男性和女性领域问题的看法与弗朗西斯·普莱斯是相同的。汤普森认为是科贝特创建了19世纪20年代的激进主

义文化，“这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最初的思想，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找到了能把织布工、小学教师以及船木工吸引过来的语言、风格和论点。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抱怨和兴趣，但他还是带来了激进主义的一致性。”

但科贝特激进主义的共同观点还是坚持把妇女固定在家庭范围内。他喜欢家庭生活中那些他认为是稳定的和效果良好的家庭样式。他说，幸福的家庭是良性社会的基础。在作品《村舍经济》中科贝特希望为家庭技能的复兴出一份力。他对过去采取理想化的看法，要求重新利用早已存在的旧观念，就像以前一样，采用旧的家长制关系。《村舍经济》给出了酿造啤酒的具体方案，这不仅因为在家酿造啤酒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在家酿啤酒能让男人把晚上更多的时间用来和家庭一起度过而不是去酒馆。按照科贝特的想法，“不会烤面包的妇女是得不到信任，同时也是没有自信的……她只是大家的负担”。他使父亲们相信让女儿们得到幸福婚姻的方法就

理查德·雷德格雷夫：《穷教师》，1843年。年轻可爱的家庭教师因贫困而穿着黑色的衣服。她象征着19世纪妇女的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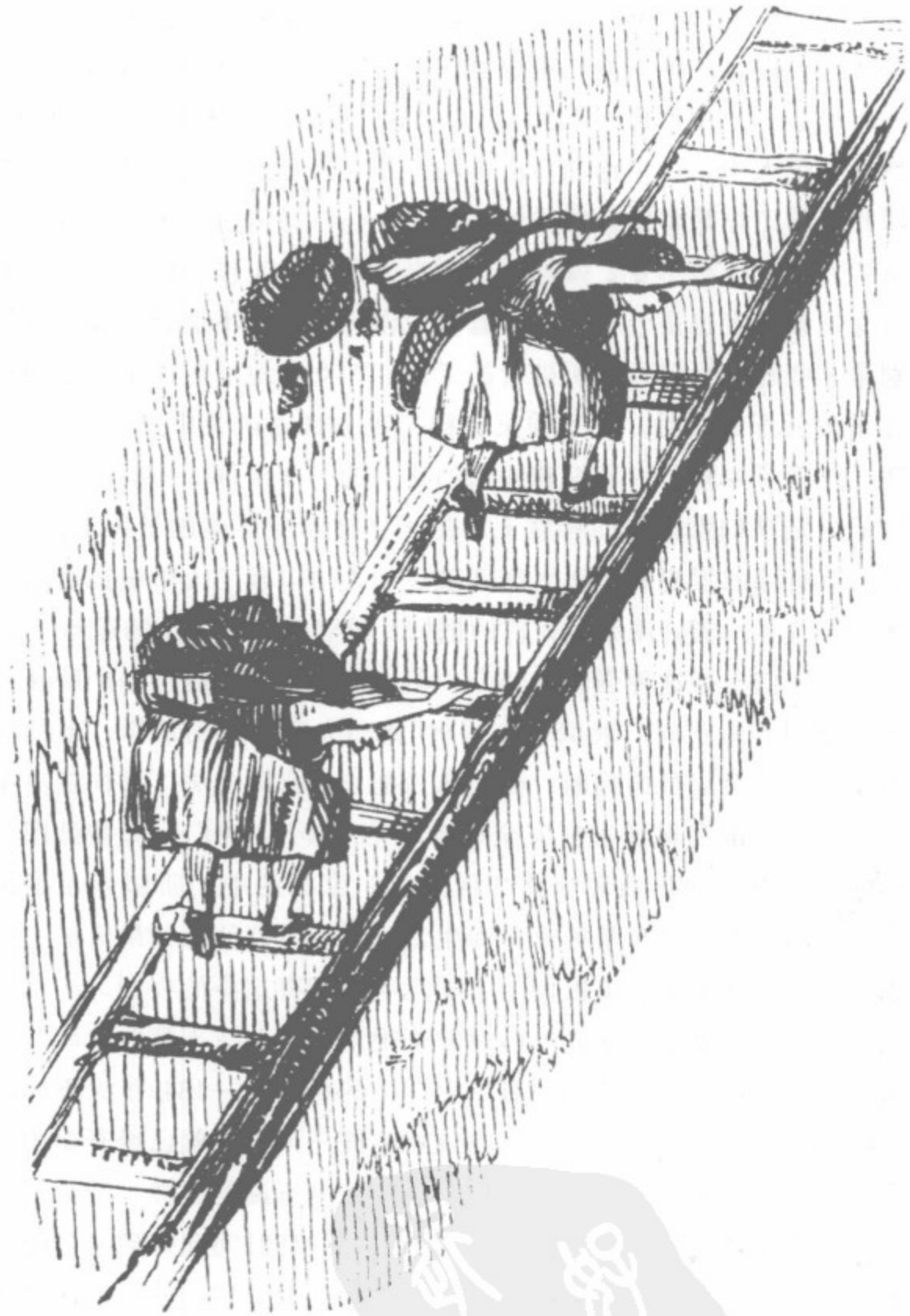
是“让她们具有家庭需要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并且能干和活跃”。“有酒窝和令人喜欢的脸蛋”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如何酿酒、烤面包、挤牛奶和搅黄油才能使妇女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在冬天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劳动者回到家中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这时风在烟囱里呼啸，雨打在屋顶上。”当这样一幅景象出现在上帝面前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令他更高兴呢？

科贝特从不把对女性温柔的新思想与中产阶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痛恨假斯文，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农场主的妻子把前厅改成起居室，买来钢琴，然后教女儿们在那里装腔作势。他希望农场主的妻子能回到养牛场，继续劳动者的生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因为他主张工人所有的新权利。他们应该拥有得到男人的工资来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权利。他们应该有独立思考、自由阅读他们选择的书籍和自由发展他们的观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投票权；他们的代表资格不应以拥有的财产为基础，而应以光荣的劳动和工人的财富是他们的技能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作为家庭的首脑，男人应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服从，而且他还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亲属们说话。妻子不能独立地行动，也不能投票，“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质会使她们在行使权利时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愉快。”

社会和谐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承认女性的被动和温顺，相信喜爱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两性之间的区别。激进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心对两性不同作用理论的接受，表明了这些假定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对两性差异的思考程度。

分离的半球

在19世纪40年代，从国家对女性劳动政策的发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阶级思想的会合。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认为是有政治责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则应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普莱斯和科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应该挣到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妻儿的家庭工资的思想。这种已经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确立的思想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在男性工会中讨价还价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资”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不是对中产阶级标准的直接接受，但是阶级特有的思想转化和重塑。



1842年，《第一矿工报告》中所描绘的景象。由于封面是蓝色而以“蓝皮书”闻名的议会报告向人们揭示了妇女和孩子们工作条件的实质。

上图：拉煤，这通常是小女孩的工作。

下图：年轻妇女正套着带子在拉满满一料斗的煤。

在19世纪40年代初，中产阶级对雇用妇女去干不合适的工作有所顾虑，而且这种担心和焦虑首先是对矿上的女性劳动者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了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味。然而在穷人中，这个标准有所不同。妇女去从事一项与她的女性本职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仆在做清洁、做饭或者照看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准备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样，做裁缝或者女帽设计者也是合适的。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特别是那些在男女混杂场所进行的工作。妇女在地下矿区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开的反对。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矿井中童工的条件，随后发现了令官员们震惊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对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妇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样赤身裸体的景象击碎了。对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对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阶级道德的必然性导致了以福音派教徒为首的把妇女排除于地下工作的运动。

矿工们支持这种强制的禁令，但他们支持的原因与中产阶级的活动家们有所不同。就像安杰拉·约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样，他们并不接受委员会成员的判断，他们认为把妇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习惯的标准和保证家庭安全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应该如何来组织家庭的中产阶级表示了愤怒。他们要求自己来掌握家庭和生活，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煤矿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里，那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矿工们强调，他们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时候都很正派，并攻击那些继续非法雇用妇女的煤矿主。他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机构——1842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矿工协会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下的妇女工作了。就像《矿工倡议》中所说的那样，工会坚决反对雇用女性。它所寻求的是控制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妇女工作会直接威胁到这个事业，因为这会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出于自身的原因，在煤矿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养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开说话的妇女则没有对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她们痛恨工作条件，但她们也同样需要钱，可是人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报纸称，国家、中产阶级慈善家以及男工们都宣扬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妇女天生是妻子和母亲。

贵族和“新的隐私”

在1820年，乔治四世认识到英国中产阶级重视家庭的神圣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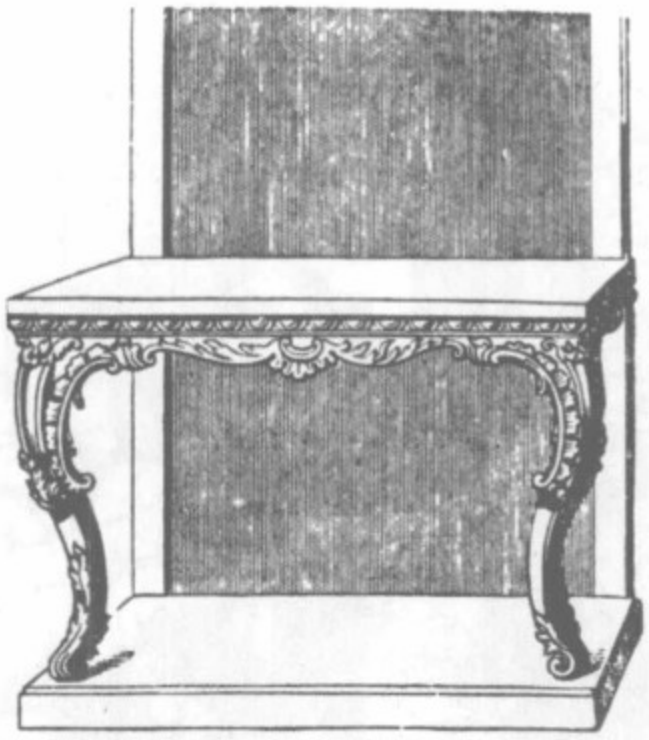
庭价值观。但贵族和绅士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对两性差异看法的支配地位？劳伦斯·斯通和鲁道夫·特朗巴克都认为在18世纪拥有土地的阶级中，存在着向新的家庭生活观念转变的趋势。斯通相信这种新观念是资产阶级商业和财政界的精英们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会被《目击者》这样的杂志所赞颂，这种上流社会与对两性的重新分类联系在一起。随后，这一说法被福音派教友继承，并加以重新利用和更详尽的阐述。19世纪初中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增长由于被贵族和绅士们接受而得以进一步反映出来。就像科奥诺·达维多夫所证明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被转嫁到绅士和贵族的准则之上以扩大‘上流社会’的概念。”

或者，就像马克·吉伦纳德所说的，到19世纪中叶，上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已经非常接近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了。“上层阶级调整了自身的形象以接受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他们变得更严肃、更虔诚，也更加热爱家庭和更有责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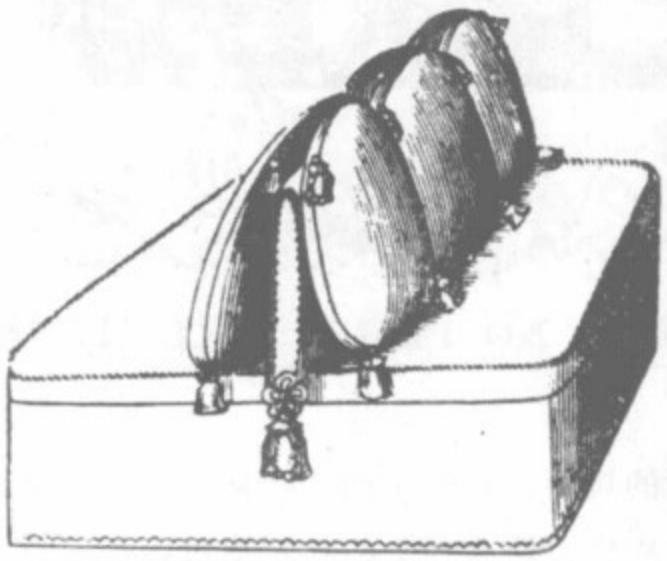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产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好逸恶劳、腐化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然后随着贵族和绅士们更加关心家庭价值而有所减少。他们建立了吉伦纳德所说的“精神家庭”。这种家庭的中心就是幸福和受庇护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家庭祈祷、守安息日和规律化的家务活动。被市场和公众世界排除在外的妇女通过道德规范体系来管理这个私人世界。她们是领导人，也是看门人；她们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管理的原则是个人知名度：不知名的不可能被接受。在富人家庭中，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排外和更加私人化。家庭和家族在控制社会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产阶级的私人住所在独立的社会领域有着不同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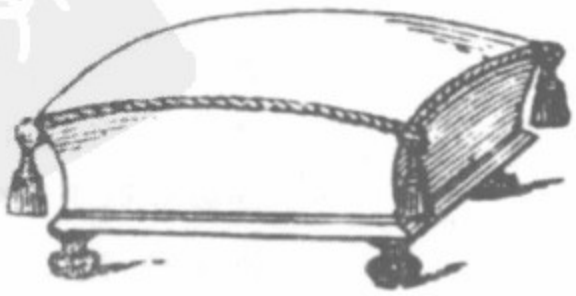
贵族和绅士对更多隐私和更加独立的兴趣是通过建筑物和对家的改造表现出来的。在中产阶级的别墅中，仆人们都住在楼上；在农村，可以用独立的楼梯让他们完全处于视线之外。仆人居住区更是精心设计，不同性别分开居住，而且每个房间只住一到两个人。孩子们被特别安排在靠近父母的地方；在伦敦每家都有保育室。许多房子有独立的厢房，那里是父母的卧室、保育室和会客室。单身汉的卧室通常不和女士们的卧室在同一条走廊上，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厢房里。吸烟室肯定是只为男子们准备的；而晨练室主要供女士们使用。整个房子被分成绅士和女士的不同区域，而大厅是他们会

一种主要家庭杂志的扉页。不同年龄的人们享受着家的温馨。



J.C. 荣登：《村舍、农场和别墅建筑及家具百科全书》。家的舒适需要各种家具，在这方面英国人走在了前面。这本1839年的百科全书包含了各类家具的不同款式：专为女士设计的工作桌、沙发和缝纫屋里的垫脚凳；还有给小孩坐的高脚椅。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理查德·多伊尔为1841年创办的著名讽刺周刊《猛击，伦敦的喧闹》所作。

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经常成为讽刺的目标。

面的场所；花园是两性会面的又一个理想场所。19世纪30年代能住上埃格巴斯通别墅的朴素抱负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拥有雄伟的哥特式建筑的梦想。

"甜密的家"：珠宝商的房子

在1820年，卡罗琳王后被认为是无辜的。就在同一年，伯明翰的珠宝商詹姆斯·勒克科克和他的妻子及一双儿女搬到了埃格巴斯通。在那里，他从卡尔索普手里买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盖了一座小房子。他按自己的梦想来建这个家，它"小而舒适"而且"规模和花费都被控制在中等的范围内"。他把土地分成两块，然后把另一座房子当作投资给租了出去。在他自己的住所，有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他亲自来设计房子和花园，那里风景如画，独立的设计，十分迷人；方向是朝南的斜坡；土层很厚，而且十分肥沃；整个农场很快就变得非常美丽和完美。在花园中，他种上了七叶树和花杆火。除了种蔬菜之外，他还挑选了黄花九轮草、毛地黄、雪花莲和百

合。这象征着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因为在这个时期，君竹和康乃馨等花是与手艺人联系在一起的，而大丽菊则过分俗艳且价格昂贵。勒克科克的花园里用刻有家庭和谐的文字的瓮来作装饰，花园深处的水渠被掩藏在树篱下，看上去像是一条小河。在科姆格洛夫，他认识了极端的幸福，他对退休和远离欺骗非常满意，“我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个天堂。”

在那里，勒克科克继续着他的时光。他做园艺、写书、会见朋友，为伯明翰一位论派组织修建一座主日学校的校舍，参加改革会议，并且继续发挥其作为活跃的公众人物的作用。他曾病得很重，并十分害怕死亡。作为一位充满热情的业余诗人，他很勇敢地以妻子的名义为自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以妻子为第一人称写的，诗中列举了她会怀念的好丈夫的一些品德。

几乎没有丈夫会以妻子的名义来歌颂自己。然而，勒克科克的生活和梦想得到了无数心灵的回应。19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家应该是个快乐的地方，但男子和妇女所体验的快乐是不同的。男子可以把关心、焦虑和对公众生活的满意与家特有的魅力混杂起来；而妇女很少会有这种两重性，家是她们的全部，是展现她们温柔的天然场所。

米歇尔·佩罗
林斯·亨特
卡特琳·阿尔

在一个地方小镇，夏日的一个星期天，这家人围坐在年长的祖父母身边，也许是为了庆祝某个成员的生日。这家人的地位并不太高，他们挤站在人行道这样一处半私人半公开的地方。然而背景中可以看见房子里垂挂着层叠窗帘，这又表示他们是户体面人家。

2
演　员

《红色城堡》，1900 年左右。这张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上的人是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安德蕾、玛德莱娜和特蕾莎。父亲是一个家具木工，母亲是酿酒商的女儿，很明显，她十分崇尚高贵和美。

前　言

19世纪私人生活的主要舞台是家庭，正是家庭成就了典型的私人领域的性格和角色、习俗和惯例、阴谋与冲突。对于公众社会的无形之手来说，家庭既是休息的港湾，又是核心所在。

在所有党派——从保守派到自由党，甚至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条和激昂论调中，家庭成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自由意志主义者还称赞家庭是有机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事实上，家庭却远比这一成功形象要混乱和易变得多。核心家庭才刚刚从更为广泛和依旧持久稳固的家族体系中出现，后者的特性随着场所和背景、社会级别和文化传统的变化而变化。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单位，家庭千方百计想要规范其成员的行为，而个体越来越反抗家庭的戒条。于是，在代与代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决心要掌控自己命运的个体之间，暗暗产生了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不时就爆发出来。与过去相比，许多家庭现在变得更愿意去法院解决纷争，而这一实践暗中却让他们容易受到外来的控制。

国家对家庭事务的干涉不断增强，这也威胁着家庭的自治，尤其是贫穷的家庭。当国家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能依靠家庭来执行其命令时，它将代替家庭来行使职责，尤其是在管教孩子这一社会资本的最宝贵财富方面。

自然，私人生活所包括的行为要比它在家庭领导之下所包括的广泛得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治原因，19世纪的家庭趋向于包含私人生活的所有活动，并为其定下规则和标准。监狱和寄宿学校，军营和女修道院，流浪汉和花花公子，修女和女同性恋，吉普赛人和硬汉，独身者和收容所，经常被强行拿来与家庭相比，或者起衬托作用。家庭是中心；它们是边缘地带。

多米尼克·英格雷斯：《斯塔马提一家》，1818年。19世纪上半叶，家庭肖像画非常流行，当时一些最著名的画家都从事这项工作。这幅斯塔马提一家的肖像画正是其中的经典作品。每个人摆出的姿势都不一样：父亲摆出他拿破仑式的姿态；母亲身着华服；苗条的少女端坐在钢琴旁；少年顶着一头叛逆的乱发；而地上的玩具正说明依偎在母亲怀里的是个小男孩。

成功的家庭

法国革命曾经尝试通过重新调整空间、时间和记忆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和重新塑造一种生活体制来打破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界限。但是，这项伟大的工程却因为一些个人的反对而夭折了。事实证明，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比法律还有威力的。

革命经历给当时的思想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本杰明·康斯坦特、乔治·桑德和埃德加·齐内特不断进行思考的原因。法国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他们以及公民的生活，而在哪些方面却是改变不了的呢？桑德描述了贝里的农民是怎样坚持使用他们熟悉的“tu”（法语中“你”的俗称），而拒绝城里“年轻先生们”的好心的，这些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因为曾经称呼桑德的祖母，一度高贵的都旁夫人为“你”而感到自豪。康斯坦特强调言行自制的重要性：“在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了最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我看到了最气势壮观的游行，我见证了最神圣的誓言。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了避免争论，国家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仪式，并参与其中。活动结束，每个人都回到了家，先前的想法和承诺也随之结束。”

康斯坦特的这段观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所有革命后政治理论关注的中心。如何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自由主义和“无形的手”继续保持经济思想中一些流行的想法，即对18世纪的成功心满意足时，政治思想家们却感受到了如何界定“私有利益”和应该怎样组织这些“私有利益”的必要性。当时最新的政治主张大概就是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发挥着一项本质的、规律的功能，它扮演了“隐藏着的上帝”的角色。

这个主张在欧洲得到了公认。《凯瑟琳的大厅》描述了在19世纪初的英国，福音派新教会者和功利主义者是怎样同时阐述他们关于家庭生活的观念的。在公众社会，本瑟姆的“图解”通过父亲威严的注视，说明不管是上帝指派或是依照理智，父亲就是家庭的主宰，是每个家庭成员的主人。

黑格尔：家庭，公众社会的基石

关于私有和公有之间有相似之处的观点，哲学家黑格尔或许阐述得最为全面。在《权力哲学的原则》（1821）中，他诠释了个人、公众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法律的基础是个人，因为所有的权力都授予了个人。事物本身决定了自身，为使其本身具体化，就要求拥有个人财产。人的自杀行为是人的自我权力的最终体现，就好像人的犯罪行为只是人的自身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是个人是从属于家庭的，这样一些家庭团体就组成了公众社会最基本的“圈子”。没有家庭，国家将会面临应付“畸形的团体”即暴乱的压力，不得不时刻提防出现暴政。

黑格尔认为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守护者。家庭是建立在得到双方同意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础上的。在家庭中，感情不是必需的，甚至危险也不存在。最好的婚姻是包办的婚姻。在这样的婚姻中，人的意愿是跟随着婚姻合约的，而不是超越它。家庭是构筑在理智和意愿上的，是由物质和精神载体（比如记忆）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世袭财产既指经济必需品，也指象征家族的传训。家庭，“对其每个成员都要虔诚”，这是一项道德标准，“对单个人而言，他的家人都是不确定的”。父亲是家庭的主宰，他的过世让其继承人得到了解脱，也标志着这个大家庭单元的结束。这些家庭的规律必须遵守，这样的大家庭其实比由它分开的小家庭的总和大得多。路易·都芒认为，19世纪的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角色则是按性别来分类的，也就是按不同性别的“自然特征”以及19世纪典型的对分法——被动和主动、内部和外部——来分类的。“男人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是从政、从事科学研究等等，以及在战斗中和工作中与外面的世界进行联系和与自我进行交流。”“女人真正的命运掌握在家庭的实际道德规范上，女人的虔诚体现了道德规范的发展趋势。”孩子们是家庭的成员，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作为未成年的个体，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并没有尽情享受这种快

皮埃尔-亚历山大·让迈特：《介绍》。是母亲还是老鸨？这位眼神茫然的年轻小姐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要被许给这个烟不离口的、粗鲁得甚至连帽子都懒得摘下的男人？这幅故意画得含义模糊的画正好说明了当时的情形有多暧昧。

乐，这就是孩子与成年人的区别。当他们成人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了接任他们角色的准备，“男孩们成为家庭的主人，女孩们成为主人的妻子”。事实上，直到他们的父亲过世，男孩们才能完全接任他们的位置。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是受家规的限制的。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严肃批判了罗马法律制度的专横。他反对长子继承权，反对女孩不能成为家庭的继承人。他认为，家庭作为现代社会的奠基石，远比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世袭门第显得重要。公众社会是由无数“大多数家庭”里的“客观存在的独立的人”组成的圈子形成的。这就是“各种类型的家庭的统一”。

康德的家庭观念

当黑格尔致力于研究大社会形态下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康德开始对家庭成员的研究感兴趣。他认为正直的家庭就是道德标准的胜利表现。家让人没有了逃避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归属，并接受了一种规范。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制于一种法律制度，这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法律制度，一种保守的法律制度，它能平息人们心中那仿佛来自原始森林的野兽般的呐喊”。家是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家庭生活的关键是绝对遵从父亲的意愿，只有父亲才

弗朗西斯科·格雷尼尔·德·圣·马丁：《介绍一位来自巴黎的未来新郎》，1830年。这位潜稽的打扮入时的求婚者受到了一个富裕的外省家庭中父母亲热情、友好的接待。貌似纯真的姑娘假装害羞地盯着手中的针线活。本应是礼貌的介绍却成了相亲的程序，这是当时讽刺画的常见主题。

天生具有管理家庭和训服妻子的能力。家庭战争的威胁经常出现，“妇女有可能不守妇道；小孩，由于受母亲不良品行的影响有可能变得脆弱或充满了仇恨；奴仆有可能呼吁他的自由。”母亲，作为家庭的核心，也会对家庭幸福造成威胁，“如果她逃出家庭，她就有可能马上变成一名叛逆者和革命者。”因此，就像康德理解的那样，妇女的法律地位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个人，她享有个人的权利，但是作为家庭成员，她必须遵守家规，其实就是君主专制。主张妇女应该有自己的意愿和认为妇女只是服务于家庭的思想持续对立了整个19世纪。

自由党的家庭

因为需要解决一些法国革命导致的政治、法律以及社会重建等尖锐问题，19世纪初的法国为家庭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法国人的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公有和私有（或公有和私有领域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公众社会的性质；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

自由党人在各个方面都热衷于努力在公有和私有之间建立一个分明的界限，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所理解的私有利益，比如凝聚国家的力量。“共和党将会赢得民众的喜爱，”史达尔夫人写道，“只要它尊重私有财产的独特性。”她呼吁国家“不要命令，不要压

迫”。本杰明·康斯坦特观察到了“当我们运用权力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我们的私有利益时，自由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了”。史达尔夫人和本杰明都将过去的社会与现代的社会进行过对比。在过去的社会里，国民为参加政治和战争而活着，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完全地被自由主义的态度鼓舞，忙于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为了专心致力于私人的活动，国民把公共事务信任地交给了他们选举的代表。公有和私有范围的划分要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政治活动的细化也要求有一个经验丰富和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执行者。

齐内特完全领会了这个需要。在回忆黑格尔的讲话中，他剖析了政府的多项功能。为了维护秩序和解放社会权力，公众社会的统治者不得不和能够决定社会活动一切方向的政权结盟。这以后的政权被信任地交给了一群有决策天才的人和一个精英团队：这是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毫无意义、乱七八糟的聚会。尽管社会权力大部分是属于国民的，但并不属于女性。父亲作为家庭的主人，是家庭的中心，尽管父亲的权力“表达了更高的美德，更适合进行公正的判断”，但这不是独裁。齐内特认为，家庭是一个可以不断进行谈判的地方；它是民主的最初形式。“不管在哪里，民主选举权是更真

保罗·加瓦尼：《一场理性的婚礼》，1839年。图中描绘的是七月王朝时期的一场中产阶级的简便婚礼（也许是一场被迫的婚礼）。亲友们沾沾自喜的满意神情和护送着他们“受困”的朋友的快乐“单身汉们”的嘲笑面容与这对年轻新人那垂头丧气的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加瓦尼对同时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男女关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实和广泛的。民主选举在家庭中变得普遍。”

鲁耶尔-科拉尔和托克维尔都关注公众社会的实质内容。鲁耶尔的观点认为，“法国革命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个人……从缩小的社会到显露弊端的集权管理。”他认为，比如像公社这样“自然的组织”和家庭是激进主义的解毒药。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都对私有生活的吸引力很敏感，但是他对极端个人主义——都旁男爵所推崇的“每个人都应该待在自己家里，都只要为自我服务”的个人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专制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可怕的，它认为人的孤立生活是生存的最好保证，一般地，专制主义会尽其所能地把人分开……它给那些在这方面严于律己的人授予好公民的称号。”托克维尔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思考怎样把私人的快乐和公共的行为协调一致。他提倡社团组织，高度评价美国家庭的好处，他相信这些好处可以打造一个社会团体。“民主政治把社会团体扩大了，但拉紧了自然的组织。当它分开民众时，却让亲属走在了一起。”自由党派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是“自然”的团体，是个人幸福和公共利益的关键。

传统主义者

家庭也是传统主义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代表人物有复辟时代的路易·勃纳德和后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弗雷德里克·勒·布雷和他的学派。传统主义者批判世风每况愈下，批判性别角色的颠倒混淆和男人女性化。不道德的家庭和逃避职责的妇女要成为战争失败和社会不安的替罪羊。复辟和道德秩序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即20世纪的傀儡政权。

在复辟时代，传统主义者从以下三个领域攻击新生事物。在宗教领域，家庭是传教士最喜欢的主题之一。“还有比家庭更好的地方吗？”这是1825年流行的一首赞美诗。在政治领域，传统主义者攻击离婚制度。1792年立法通过离婚制度，但是在1925年又被取缔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勃纳德是家庭的倡导者。贵族阶级大量研究和引用勃纳德的著述，以帮助他们提高道德标准，希望重新树立他们的形象。然而，贵族阶级令人目眩的奢侈和放荡糜乱生活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大众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当导游带领游人参观废弃的城堡时，在他们的解说词中还时常提及。事实上，不管怎样，这些景象只出现在早期阶段——贵族阶级的黄金时代。

西蒙·杜兰德：《一场在市政厅举行的婚礼》。这幅讽刺画既攻击了在市政厅举行的婚礼这件无足轻重的事，又讽刺了婚姻本身。新郎会来迎娶这个可怜的、而且明显已经不年轻的女人吗？

在勃纳德与致力于主张取缔离婚制度的议院议员的谈话中（1815年12月26日），我们可以找到他关于家庭的一种看法。他认为，离婚本质是荒谬的，它不仅给妇女和儿童带来不公正的伤害，还违背了伦理道德。对于情感的权利，勃纳德是默认的。他对婚姻中爱情的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要求爱的一般是妇女和威信较弱的父亲，“真正的家庭民主，是允许妻子，弱势性别，能站起来反对夫权的。”然而，妇女的伟大在于遵从她的丈夫，如果她是一位寡妇，则遵从她的长子——家庭继承人。家庭，其本身就是父权的君主政体，是君主制度国家的基础，是贵族社会稳定、长存、持续的保证。父亲是家庭与生俱来的主人，就好像君王是法国这个大家庭与生俱来的统治者。复辟君主制度就是复辟父权。“为了从人民手中努力得到国家，就必须从妇女和孩子手中努力得到家庭。”婚姻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合约，同时也是宗教和政治行为。“家庭需要传统习俗，国家需要法律。加强家庭权力，因为它是公共权力的天然成分，把妇女和孩子的所有依靠奉为神圣，这是人们坚决服从的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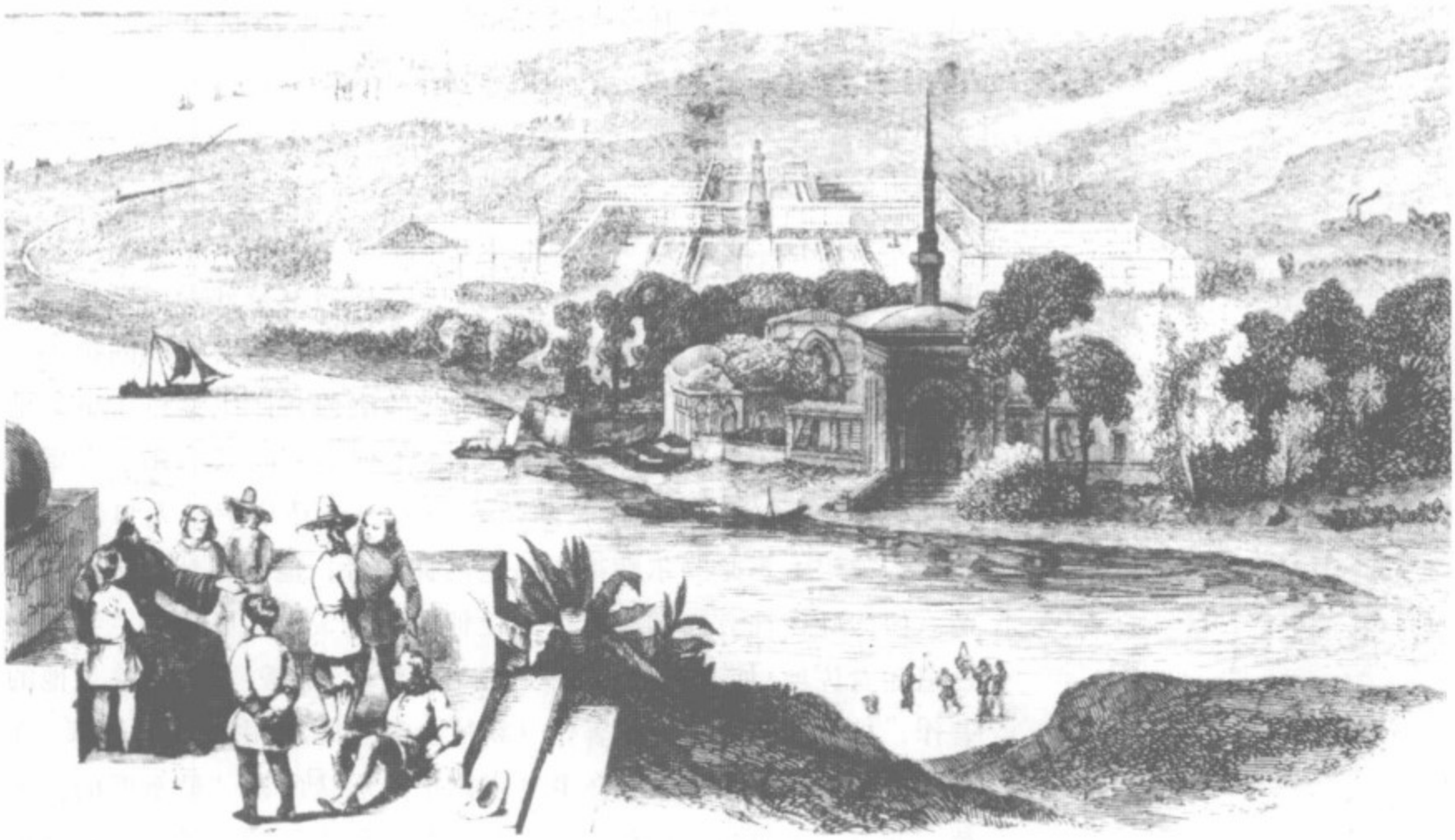
勒·布雷和“家庭，国家的原则”

弗雷德里克·勒·布雷的思想既不反对革命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他的原意是试图通过社会学上的观察来推进家庭事业。勒·布雷反

对国家扩张，希望通过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义成“美德加面包”来重现公众社会的光彩。在《欧洲工人》（1877）中，他写道：“私人生活的特征烙刻在了公众生活中。家庭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勒·布雷是站在自由党派的对立面的。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泛滥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十诫”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导致了可怕的灾难——无产阶级化。为做补救，他提出了所谓的主干家庭的复辟，主干家庭的财产只让父母选择的唯一继承人来继承（在比利牛斯山脉，这种没有分割的继承财产称作melouga；在热沃当，则是oustal）。勒·布雷对主干家庭和《民法典》所确立的将家庭财产平均分给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世袭家长手中的世袭家庭进行了对比。他坚持认为等级划分不仅仅是“自然的”，还取决于天分和功绩。

等级制度是平衡的一个条件。但是领导者也必须考虑和保护他们的属僚。“社会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是赞助人没有履行他们职责的结果。家长制度和赞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父亲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布雷和他的信徒埃米尔·彻松还认为家庭主妇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在勒·布雷的专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低层家庭里母亲的角色、责任和权力，以及有关家庭琐事的大

E.博杜安：《关于照相师》。柱子和帷帘是照相师惯用的道具，在这幅照片中亦是如此，一个鳏夫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一起，墙上的照片可能是他已故的妻子和孩子。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幻想建立的社会。注意这幅画中表现了不同宗教信仰的融合。(插图，1846年)

量信息资源。

勒·布雷的思想和“社会改革”大概是19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和运动，它让家庭成为了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加上共和党派及其支持者涂尔干社会学团体的胜利，这些先进的思想变得声名狼藉。家庭是这个时期的无辜牺牲者，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对家庭研究的兴趣。

社会主义者和家庭

在马克思主义否认私人生活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之前，社会主义者认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所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都批判家庭，但没有人主张取消家庭。同样也几乎没有人幻想推翻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这是因为性别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有傅立叶、阿方丁、女权主义者克莱尔·德玛尔和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西奥多·德扎米，他的《社团法规》就反对卡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严格的“家庭主义”。德扎米宣布“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专门养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义！不要婚姻统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

离婚自由！”而卡贝抨击自愿独身主义，认为“同居和通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美国的城市诺伍，卡贝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组织。卡贝发现他自己会与那些拒绝把她们的华丽衣服换成统一制服的妇女们争吵。

关于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和关系这两方面，傅立叶的激进主义是个例外，而且“绝对极端”。尽管他宣称妇女是“无产者的无产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妇女是进步的关键，“妇女特权的扩大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在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里，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内部转换、选择性伙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简易离婚。他在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中体现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他倡导计划生育和流产。傅立叶在性方面的激进主义让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兰特和女性追随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删除了他的著作，拒绝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会的爱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拒绝承认所谓“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侣，就像其他“伟人”的妻子一样，被推到了幕后。

跟随阿方丁的圣西蒙徒，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例如皮埃尔·勒鲁、龚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兰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赞成家庭形势现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内的男女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但在他们的眼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础。核心家庭是指由强大的感情联系结合在一起，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女权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些中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适应，能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实质性的机会。乔治·桑德，尽管其个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支持家庭，她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包括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莱蒙内斯和普鲁东的信徒。这群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根除的；妇女必须顺从，只有顺从才有自由；婚姻，作为秩序和道德的守护者，要实行家长制管理，是不可分拆的。特别是普鲁东一直宣称有活力的纪律、凌驾于声色之上的纯洁和高于享乐的工作是卓绝的、有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私人组织生活的元素，所以他们希望婚姻家庭能够吞噬公有社会，彻底消灭国家。

从傅立叶到普鲁东，很显然都没有向更大的自由发展的趋势。很显然，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应付两种要求：一种是周围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它批判无产者的“野蛮”，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家接受他们体面的、傲慢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他们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他们而言，家庭经济和家庭伦理是阶级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者自己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前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相信实际的、斩草除根的革命。道德高尚的团体——公社，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团体——将会建立一个小型的利他的企业模型以供其他人仿效。被卢梭称之为透明的东西所带来的殷望，升级了阿方丁与一些坚持认为私生活权利能保证妇女尊严的女性圣西蒙徒之间关于“道德的宣传”的争论。在《我的未来法律》一书中，克莱尔·德玛尔抨击一些婚姻仪式，还抨击了“可耻的法律案件的公开宣判，它使我们的法院和法庭到处充满像通奸、阳萎和强奸这样的字眼，还带来令人厌恶的调查和拘捕”。

布朗基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了抓住权力的问题。政治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它拉开了经济革命的序幕；国家的权力是紧紧地抓在统治者的手中的。在社会学分析中，生产方式取代了家庭，传统习俗被归入到上层建筑的构架中。恩格斯赞成巴霍芬，特别是摩根关于在原始的、快乐的、主张人人平等但未开化时代存在着母系制的结论。他认为母系制的废除是“女性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他认为，在恢复男女平等的条件还不成熟时，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和对生产方式控制权的争夺是必须的。妇女们被要求让她们的女权主义服从阶级斗争，性别之间的斗争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派生物。此后，女权主义又受到谴责，被认为其大部分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现在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把人类学排除在了“理想主义者”之外。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的《德国思想体系》中的明确论述和黑格尔的《权力哲学》以及马克思对国家与公众社会、个人与国民的二元论的否定中得出的。一份毫无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低估了财产、遗产和死亡的重要性。

古斯塔夫·库尔贝特：《皮埃乐·约瑟夫·普鲁东和他的孩子们》，（细部）1865年。如果没有他的女儿们，普鲁东就不是完整的普鲁东了。这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一个居家好男人说道：“父性填补了我内心巨大的空虚。”

迪斯德里：《家族》，1870年左右。这家人很技巧地排在一幢漂亮的中产阶级房子前的台阶下，布局完美无缺。家族中唯一的男子不显眼地坐在一旁，抱着最小的孩子，但是他的手枕在一本翻开的书上。

然而，不仅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忽略了家庭，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也忽略了家庭。涂尔干专门从事研究普遍的社会情况，他通过忽略空间性来“彻底摧毁人类学”。同时，实证主义者的编史工作专门集中在政治和国家的建立以及把私有领域从它们的观念中排除这些方面。

即使当家庭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消失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时，家庭在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例如格雷维、西蒙和费里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了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重要的位置。当正在思考家庭的消失时，家庭政治开始了。这是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所担负和指派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潜在价值。

家庭，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管理着私有利益，而这些私有利益的发展是国家权力和人类进步的根本。作为生产的关键，家庭保持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营着财产使之代代相传。作为可再生产的组织，家庭生育孩子并承担他们早期社会化教育的责任。作为种族的守护者，家庭有责任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和健康。作为国家意识的熔炉，家庭要反复灌输国家建立的有象征性的意义和记忆。家庭确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和礼仪。

特别是对共和主义者而言，“好家庭”就是国家的基础。对家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都属于同一种情感，这两种爱都是关于人类的爱。因此，国家对家庭的关注不断上升。开始，国家只是关注贫困的家庭以及家族间联系薄弱的家庭，后来，关注起了所有的家庭。不管怎样，在贯穿差不多整个19世纪的时间里，家庭的行为是独立的。在中央集权的外表下，有很多变化要归根于宗教和政治传统、社会阶级和地方差别。

家庭和财产

家庭不仅仅是个人和资产积累的一张大网，还是姓氏、血缘、物质和具有象征意义财产的继承和传递的载体。它首先是为法律所承认的一种所有值体系。

原则上，《民法典》已经废除了旧法律，不允许立遗嘱并取消长子继承权，还制定了一项男女平均分配财产的法律。通过观察，这诸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一场革命。皮埃尔·里维埃，诺曼底的“红眼睛杀亲者”,杀了他的母亲（并连带杀死了他的妹妹和弟弟），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母亲太喜欢全权掌握家庭财产而造成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与诺曼底的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事态吗？这位母亲，她不断制定合约又不断打破这些合约，在儿子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魔鬼，也是一种威胁。

《民法典》真的如安德烈·阿诺德认为的那样制定了“资产阶级和平的章程”吗？相反地，它一直在努力去发现继承权的传统价值究竟有多强的生命力，以及父亲在继承权的父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还保留着多少。丈夫“独自管理集体财产”（1421），他的权力只受婚姻合约的制约，但是婚姻合约，这个有特征性的法律条文，在19世纪的时间推移中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在还经常坚持“嫁妆制度”（妇女的嫁妆以契约的形式保存，以免成为公有财产）的奥西坦尼亚也是如此。在普罗旺斯和兰乌多克以及奥西坦尼亚内地，这种淡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同样的趋势在诺曼底也被提及过：在鲁昂，J.P.夏林发现，在1819~1820年间，有43%的婚姻是有合约的，在19世纪中叶这种婚姻占24%，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婚姻就仅占17%了。

为了保护妻子的财产同时也为了防止破产而保留最少部分家庭遗产的奁产制只有幸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留存下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资本家往往把奁产制用作预防性战术措施，他们的财富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

在法国，遗产中不动产的分割一般要分成几个比较小的部分，由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各自保留一份。这样就会减缓向城市的移民或者调整工业化的进程，这正好与英国所发生的事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主干家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内容非常多。比如在热沃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通过各种办法来废止那些法律以保护他们的财产。父母——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一生中会签署许多协议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财产不受损害，或者他们中没有得到财产的可以得到补偿（有的孩子可能会临时离开家一段时间，为的是当他们回来后可以由于自己放弃了部分家庭遗产而得到现金赔偿）。然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一直不结婚，在田里干活或者做家务。当个人主义逐渐普及后，要想仍然通过这一系统来保障他们的利益显得越来越难了。

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遗产。自始至终，整

阿尔伯特·奥古斯特·福里埃：《丫形港口上的婚礼晚宴》。Caux地区的这样一场乡村婚宴，是风俗画的一个经典主题。19世纪晚期，人们放弃了佛兰德斯画的尖刻，转为偏爱一种更加温和的风格。苹果树已经开花：人们的心情正与这自然环境相融洽，画家也注意到了一点。

个19世纪中大约有2/3的人在死后没有留下遗嘱。

因此财富实际上变得更加集中。在巴黎，1820年至1825年的5年间，1%的人口占有了所有财富的30%；到了1911年，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缩减到了总人口的0.4%；在波尔多和图卢兹的情况与巴黎完全一样。里尔的形势更加严峻，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8%的人口拥有1850年城市财富总量的90%，1911年竟然达到城市财富总量的92%。中产阶级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的上升对于整个城市的财富分配没有丝毫影响。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失速社会的概念：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家庭因财产分割问题而引起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

财产的组成形式

总的来说，财富的过分集中相对而言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获得财产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房屋的产权绝对不能放弃。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穷人只想得到一个栖身之所，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亨利·伯勒（司汤达）的父母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惦记着他

这是一间小型家庭公司的办公室吗？老板就在附近，因为他的平顶帽就挂在衣帽架上。一台打字机取代了平常放在这个年轻女秘书桌旁的缝纫机。

的“财产”。19世纪初期，在格勒诺布尔的小资产阶级中，钱“虽然是生活的必需品，像厕所一样必不可少，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到钱”，钱是他们避讳的东西。然而这一“世界性的财产”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受到尊敬的。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期，国家财政18%的收入来自于对城市固定财产的投资，41%来自农业产品，相比之下，股票和债券只占了5.9%。19世纪末，由于公司的兴起和新银行政策的出台，证券业迅速发展起来。新继承人财产投资的多样化，使新产品的价格产生了投机性浮动。债券取代了地租。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许多人开始普遍关注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变化。贝里小城里有一位有名望的女士，她是一位葡萄酒商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个木匠但已不在人世了。她订购了一份金融杂志，买了一些有价证券，包括俄罗斯政府和布达佩斯城发行的证券；为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雅克·卡普德维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攫取的欲望是如何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如何变成那些极端的投机分子的根基的。第三共和国实行的主要政策是平等权，即“公民平等地拥有财产所有权”。股票和证券的整体所有权是不连续的，可以以民主的原则分割成几个更小的单元。卡普德维勒注意到19世纪末期，人们在财产问题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意见，甚至连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财产分配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激进派革命家兼共和国的顶梁柱们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多，但对于他们的继承人而言已经足够了。1874年甘必大在欧塞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高度赞扬了“小额财产、小型资产，所有这些微小事项的集合体就是民主”。

资本主义思想慢慢成形。当它逐渐成为人们谈话和在信件中交流的内容时，家庭自身的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工作与家庭经济

一个家庭不管有没有祖传的遗产，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体。工业革命推动了各行各业以各不相同的速度向前发展，不仅摧毁家庭经济体系，而且还使这一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生产模式”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家庭形成了一个财富积累、实践技术和相对稳定的网络。

在乡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和土地是一个统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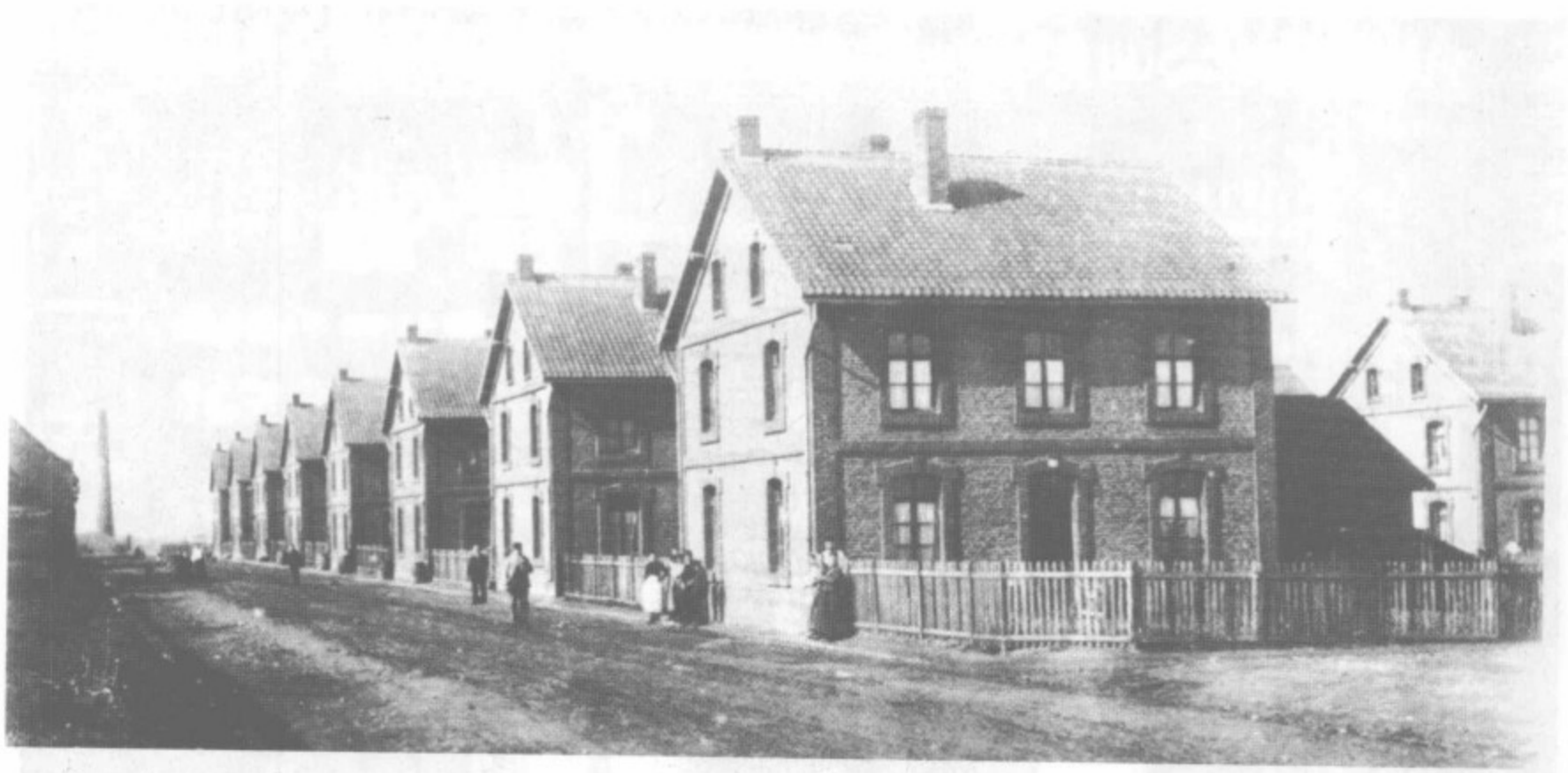
这个食品杂货铺在附近一带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着一切事件的见证人和知己。杂货铺老板的马甲上挂着表链，他在妻子和一个售货员的协助下打理着一家专为富裕人家厨子提供酒和精制美食的店铺。

有机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需要对于一个家庭成员来说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财产体系在热沃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那里继承系统不是十分严格，家庭就是一个交易场所，而他们的房间就是工作场地。不论是父母、孩子还是老人、年轻人，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分工都很详细，各负其责。虽然有些职务是表面性的，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对于避免冲突还是必不可少。而且，移民往往能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发生改变。

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家庭这个细胞单元，对工作场所和居住在一块的模式依赖性最强。纺织工人的具有同族婚配和劳动性别分工特点的家庭工业经济，就是最好的例证。原有的系统经实践证明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纺织工人的生活相当贫困，但还是有许多人对旧的生产模式念念不忘。

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沿着一条通向矿井入口处的街道，伫立着一排形状完全相同的房子，每幢都有两套公寓房间，注意房子的附属建筑和小花园，还有所有窗户里挂的窗帘。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司城镇，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为了吸引工人到厂矿工作而创建的一个系统。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性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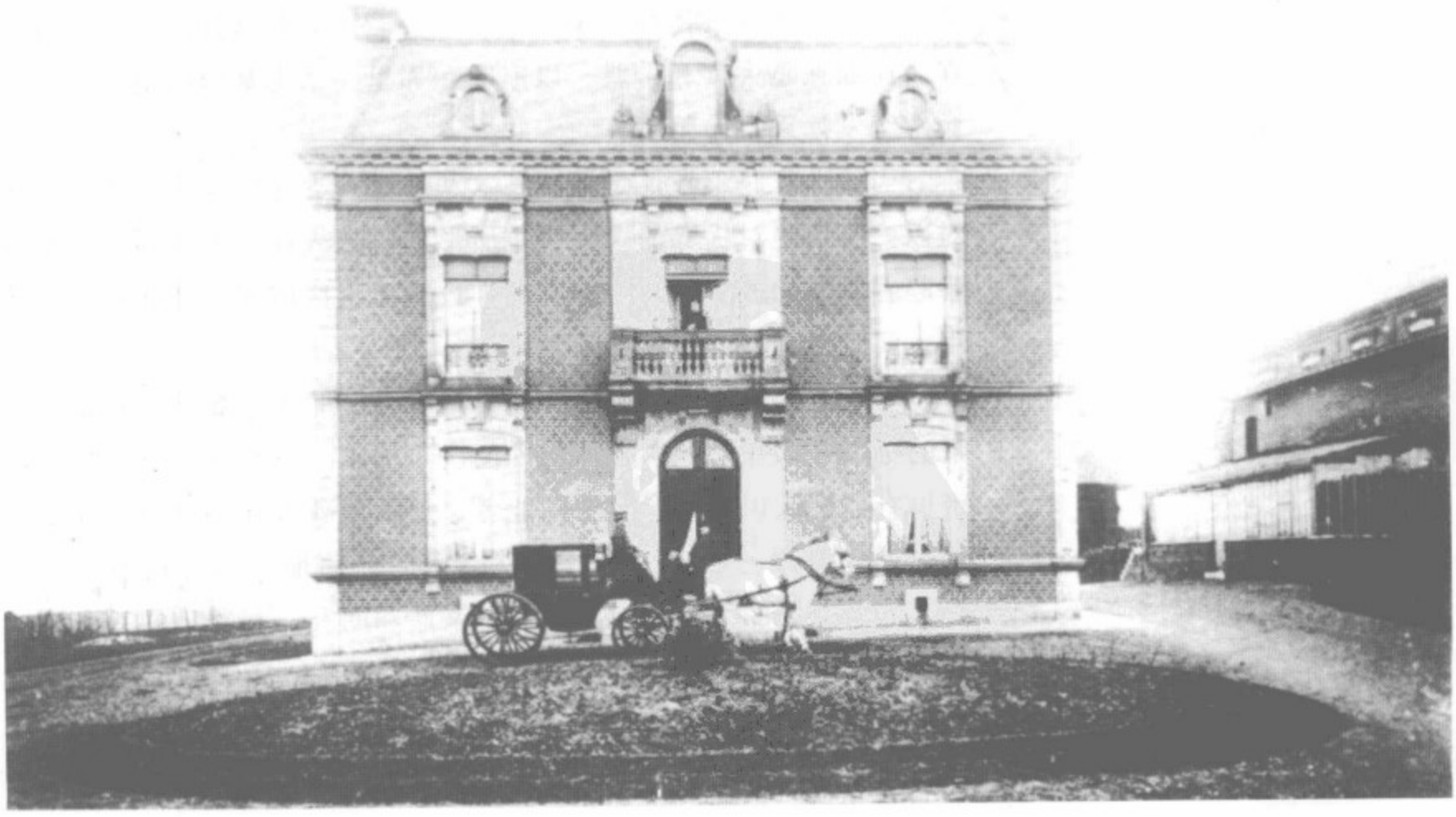
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家庭经济实力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性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

在矿产业中房子对于建立和维持社会等级制度至关重要。这幢工程师的房子规模壮观，有巨大的门、阳台和华丽的屋顶窗。其他与众不同的标志还有风景如画的草坪、马和马车。但是，周围的环境能提醒你这是一个厂区。《布鲁埃的矿厂》，1889年。



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性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性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性，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性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性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性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日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一样。这种交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日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

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而是像雅各托·朗西拉所说的，“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穷人获得解放的自然场所。”

原始积累和家庭资本主义

在19世纪，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最主要的焦点，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积累。商业历史主要就是家族历史——一种建立在婚姻与葬礼上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的历史。核心家庭要具有在工业起飞阶段中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潜能，“家庭精神和私人生活观念要与工业化早期一样，需要不声不响地、像蚂蚁一样埋头苦干。”

雇主依靠家庭体系来为工人提供支援和纪律约束。家庭秘密就是商业秘密。婚约达到了合并和多样化的效果。有能力的后代继承祖辈的家业后会把它发扬光大，甚至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旦落到了愚蠢放荡、不务正业的子孙手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有的家庭实业甚至由家庭成员的几个股份组成。有限股份反映了家庭结构在自筹资金企业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67年以后，家庭适应了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形式，这使得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资本，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股份，这样既能保护个人财产，又可以对商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这座伫立在 Verjux（地名）的雕像正描绘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她是玛格丽特·格兰，布斯科特寡妇，好市场百货公司的太后。

这一时期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控制公司家族的亲缘关系。北部省的纺织工业通过家族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在鲁贝，莫蒂斯家族与众多的工业家庭建立起了关系：波叙茨、拉加赫斯、布雷达、瓦丁内斯、德瓦林以及其他家族。波洛特家族拥有“棱堡”。在里尔，蒂埃尔兹和瓦尔埃特家族在当地的工业界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就像近代的维尔特家族一样。商业还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人格特性影响。在诺曼底，贵族的怀旧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的限制条件非常苛刻，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的排外性和趋势结果证明对工业发展极为有

利。从事钢铁业的施奈德和温德尔家族并没有纺织业企业家那样的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在当地深厚的根基使他们得以发展成一种贵族式家长制模式。拉克鲁索特公司城则以另一种半封建制的模式统治着该地区和当地人民。

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荣誉的最高地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涅克传奇，他的妻子路易丝·杰伊的透视画出现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机构的顶楼上。一个专门小组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审核账目，当邦·马尔什老板死后，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来继承他的企业，他的遗孀布西科夫人只好决定把经营管理权收回到家庭里来，由她本人来担负这一重任，她后来的继任者通过鼓励百货店经理和

在巴克大街和塞弗莱斯大街转角处的“好市场”百货公司取代了百货公司的先驱“小托马斯”。他们永恒的宗旨和主要想法就是什么能让“女士们快乐”。

大股东之间的联姻来保持对公司的绝对忠诚。还有一种与劳动有关的合法资产策略是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拔经理和主管人员，这样就组成了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而非生物关系上的家庭”。这一新的实践导致对主要执行人员私人生活的严格监督以及对公司“无情的驯服和教化”。

家庭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路易斯·贝尔热注意到，“大的私人企业、大众工业真正脱离家庭统治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业领导者中，家庭的亲带关系仍然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发展轨迹。”在对科塞—布里萨克、皮埃尔·布尔杜和莫尼克·德·对圣马丁这些家庭的研究中，专家们对私人关系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的分析告诉我们家庭的亲带关系是如何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国家已经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家庭事务有时就成了国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产，它是一种资产组合，包括名誉、家庭的境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操守和品德”。

总之，继承是最大的保护、最少的不平等性。在“包法利夫人”时期，福楼拜在给他的哥哥阿希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鲁昂的内政部，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对我有不道德的诋毁，那么同时将有许多人受到伤害。”（1857年1月3日）

家庭：性与血缘

家庭还担负着其他使命：传宗接代，生育出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生育力强的子孙后代，同时还能够满足性的需要，而且不带有任何虚伪、不道德或软弱无力。这些使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到19世纪后半叶，生育率急剧下滑，人们担心人口会退化。

婚姻被认为是获得健康的性的最保险、最谨慎的方法，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米歇尔·福科特已经表明，一种适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的支持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在19世纪，尽管没有任何新发明，但共和党人极力提出援用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关于此，有一本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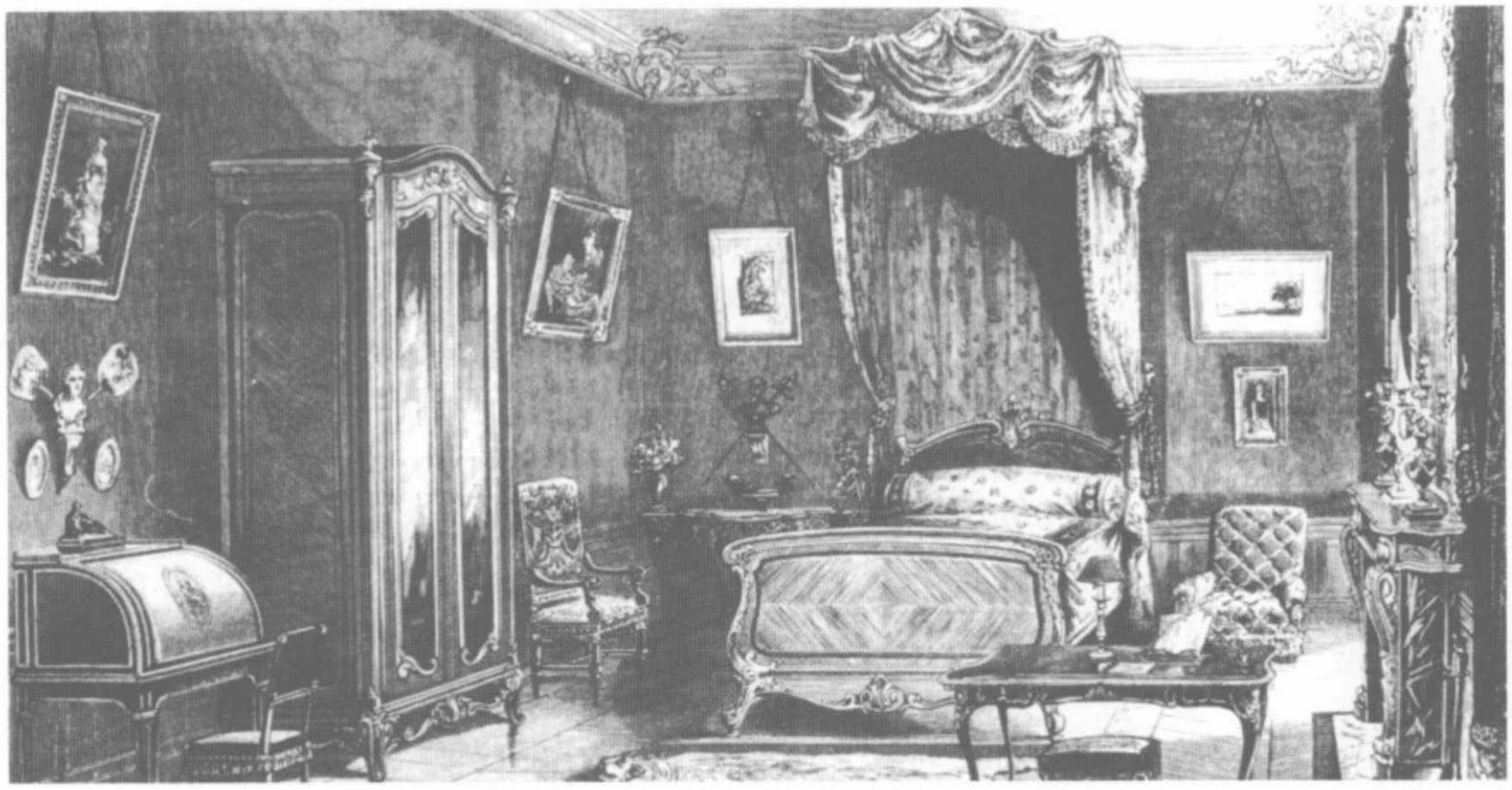
再翻版的书，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可怜的理查德·埃曼》。这本书鼓吹不浪费、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节制的教条。医生、现代牧师、神圣的婚姻都是我们精神活力的主要调节者，同时也是我们避免与妓女发生关系而对我们种族产生危险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出于对诸如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祸”的恐慌，以及对通过受到感染的血液传播疾病的恐惧，医师和小说家们将让·鲍里称之为“遗传的神话”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这些遗传弱点的存在，家族逐渐被视为一条脆弱的链环，应该对其保持持续的警惕，保护其免遭危险。保持童贞得到推崇，即便是对于年轻男子也是这样，他们的异常出轨行为曾被视为具有男子气的标志而加以容忍，而年轻的女性却被要求保持贞洁。

小家庭是正常性行为的殿堂，建立起了这方面的规范，并认为家庭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婚床是用来进行性仪式庆典的公认的圣坛，它的周围不会再用布帘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卧室墙壁和一扇带锁的门的保护，孩子们是几乎不被允许通过这扇门的，而父母则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以前教堂总会谨小慎微地建议神父们不要惹恼那些急事缠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妇女。神圣的婚床被安静地置于一边。用佛科的话说，家庭是“性的结晶”，也是血脉的守护者，是种族健康的保护神。要谨防链条中脆弱的链环。甚至是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屈从于优生学的呼吁，以及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教条中衍生出的种族净化的梦想，渴盼将妇女和穷人从毫无控制的繁殖负担中解放出来。

这样，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家庭建立时被赋予的角色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力量和权力，这驱使它对其惊人的秘密加以重重封锁。家庭越来越担心其私密受到干扰，同时它的焦虑也在加深。对于一个为抚养孩子而担忧的女人，弗洛伊德有过评论：“永远别在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随着日益意识到家庭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角色，迫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慈善家、医师和国家——将家庭置于关怀之中，洞悉它的神秘之处，并侵入它的堡垒。最初，干涉



这间具有传统风格的1882年的卧室是由奥古斯特·戈丁（1816~1883）和让塞尔姆工作室设计并制作的。它保留了一丝客厅的正式意味却仍是一处私密场所。床上仍然有顶篷，但作为家庭生活的圣坛，床依然占据了房间的中心位置，大衣橱上的镜子则便于穿衣打扮。

的矛头指向的是穷人家庭，富裕家庭受到的干预最少。干涉的内容主要在于那些角色表现上不称职的方面，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到20世纪开始时，法官、医生和警察都在援引有关“孩子的利益”的条文来证明那些对私人空间不断扩张的侵入是合法的、正确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本身却饱受猜疑的折磨，面临困难和内部的摩擦时，自愿寻求外部的干涉。社会控制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关注，不只是加强监控那么简单，而是在愿望和委屈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交互影响。在19世纪末的热沃当，来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迫害的个人要求司法介入的呼声日益高涨。

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民主政治核心内部的一个阴谋家；它坐落在公众与私人之间模糊的边界上。这条边界蜿蜒前行，穿过家庭的中心，其位置随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所有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种驱动家庭的能量的强度、将家庭撕裂开来的冲突以及在其内部涌动着的热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米什莱说：“那是家庭的一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好心的雅各

宾党人。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却不是某个家庭，而是众多家庭。尽管使用单数是错误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用到。文学的焦点被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上，巴黎人沉迷于作品当中，但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也应受到指责。法国民族特性得以建立的方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应该使用复数，因为家庭类型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是一条断层主线；其他的差别则来源于社会环境、宗教影响，甚至政治联系。做一个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犹太教徒，又是如何影响到私人活动的呢？一位加尔文教徒父亲和一位犹太教徒母亲之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自由思考真的改变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或是人们观看肉体的方式了吗？存在着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影响情感行为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曼德使自由恋爱成为个性解放的标准，他的报纸对同伴们在这方面关系中的经历进行了报道，然而，维克多·科埃塞克的历史却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抵抗力是多么地强大。从理论到实践的路还很长。

司汤达曾回忆起他母亲的死，并描述了她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方式，把“王妃的内心”和“巴黎人的内心”进行了对比，“王妃有自己的感觉方式，一种活生生的、固执己见的、喜好争辩的方式，这种方式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对于敏锐的双眼来说，纬度每变化3度，那里的音乐、舞台布景和小说看上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司汤达利用自己对地区差异非凡的洞察力对思潮所做的解释，勒·布莱斯和托德将其归因于法国家庭结构的极端多样性，极端到“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法国是本不该存在的”。他们批评那种更关注时间变换而不是地理多样性变化的综合性历史观点，强调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血族关系体制具有多样性。在这方面，“诺曼底与利穆赞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同”。他们将家庭类型确定为三种主要地域形式：第一种，核心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嫁年龄和独身比例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稳定——比如诺曼底、法国西部的内陆部分、香槟、洛林、奥兰内斯、博甘迪以及弗朗什-孔泰；第二种，复合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姻只受到松散的控制，包括法国的西南部、普罗旺斯和北部省；第三种，同样

是复合家庭结构地区，但那里的婚姻控制比较严格，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巴斯克乡村、南部山丘中心区、萨伏伊地区和阿尔萨斯。

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性，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

在世纪之交，摄影记录着乡村场景。这张照片中的每个人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并按照等级或不用分工排列着。主人们穿着考究，坐在前排，而佣人们则身着工作服；主人们脸上袒露笑容，而佣人们则神色拘谨。照片中央是一个受到主人喜爱的、可爱的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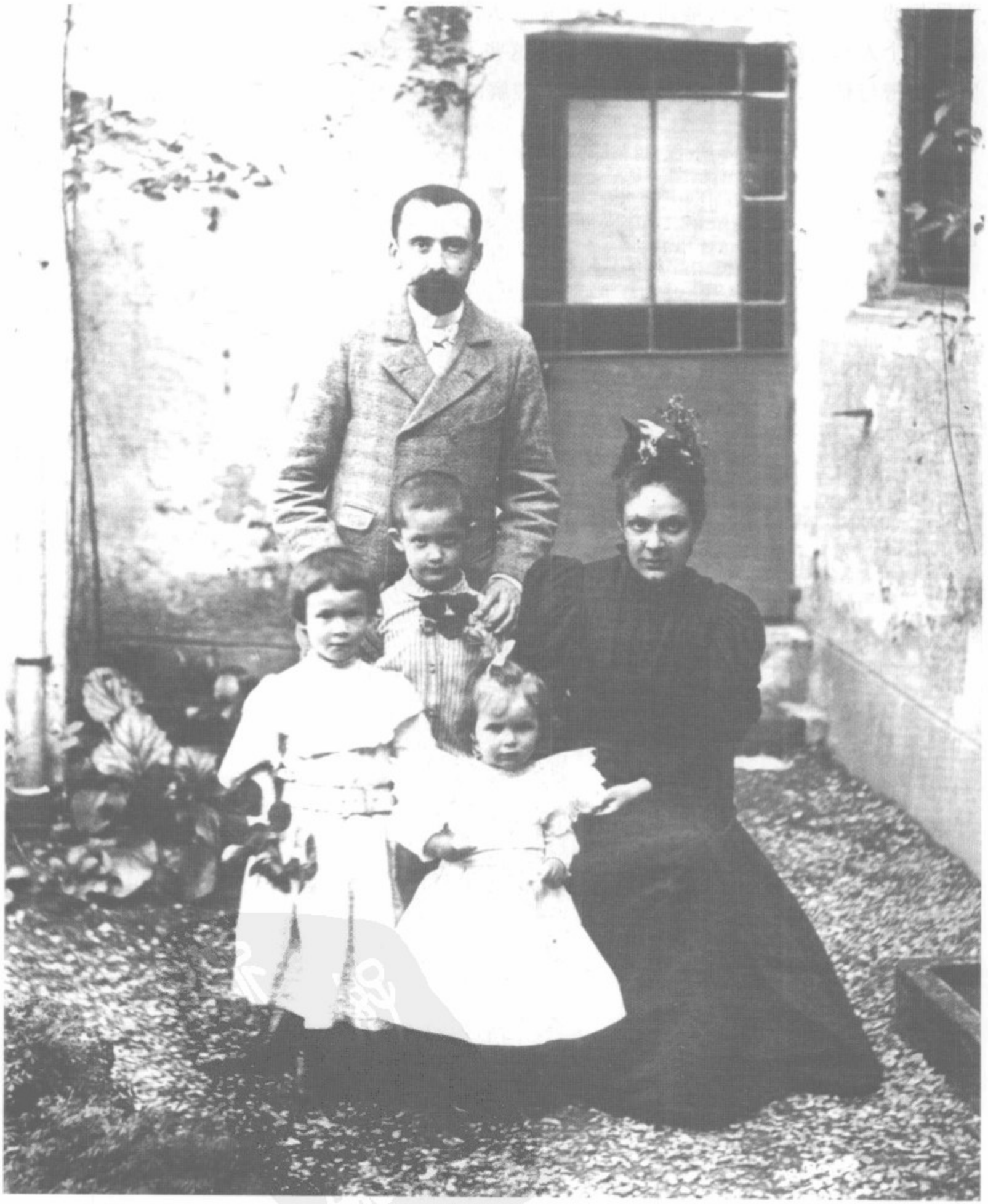
马塞尔·巴舍特，《弗朗西斯科·萨西》，世纪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午后喝茶时间，注意图中拿着帽子的仆人，身穿黑衣的男主人，以及笑迎来客的身着白裙的女主人。

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性。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

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这是一个严肃的商人家庭，就连给孩子们拍照也是这样认真，让他们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在19世纪晚期，男士们开始穿着浅色系的英格兰粗花呢服装，而女士们则转为青睐深色系。

家庭生活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信件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色和蓝色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性。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

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性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日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交流得越频繁，每次交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事件与记忆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乡村夏夜》，1989年。她在看书，他则抽着烟，品着咖啡，心不在焉。一个暧昧的夜晚才刚刚开始，这两个坐在一起的男女却各有各的心思。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日。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

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性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礼仪礼节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

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日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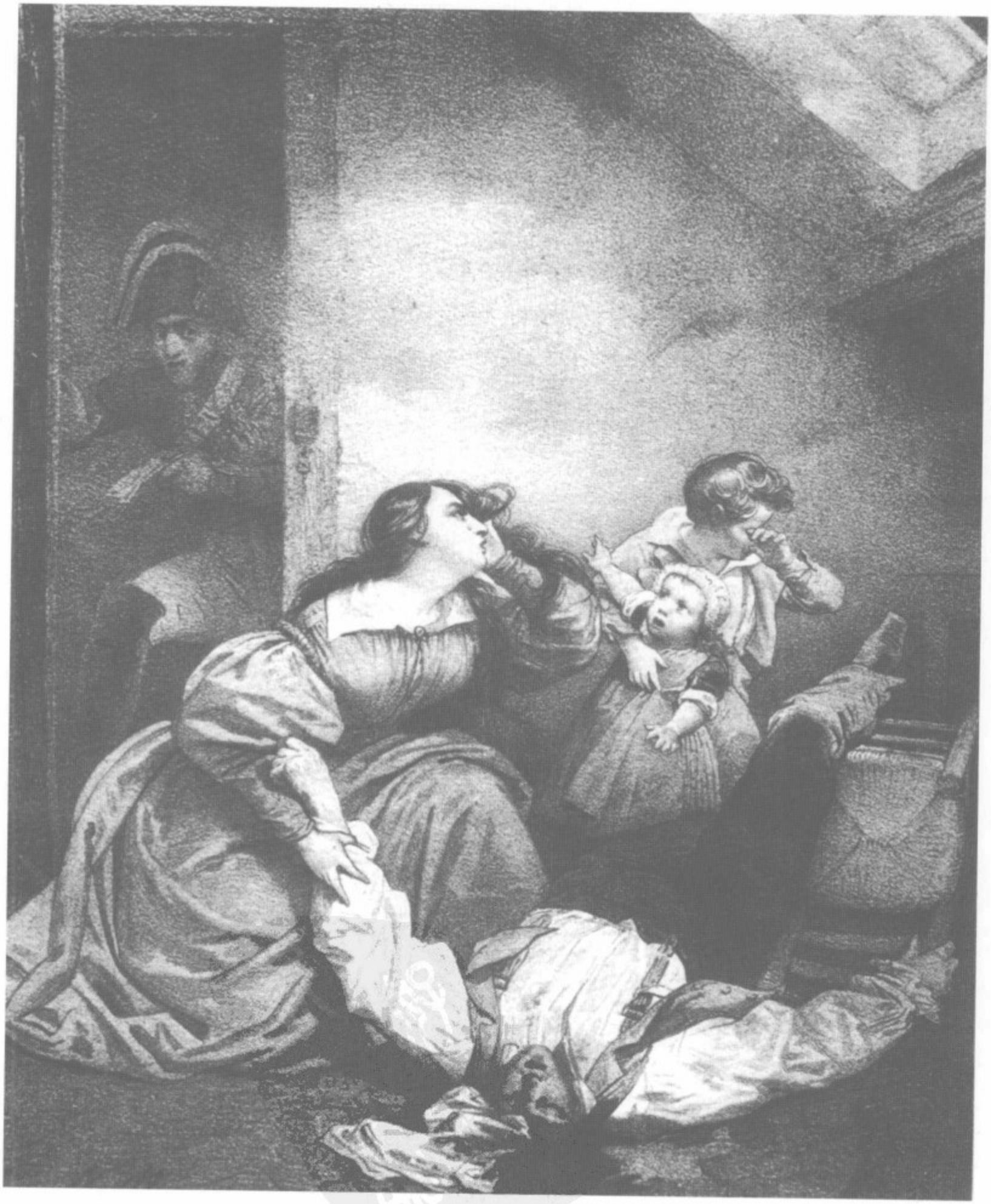
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38.7%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21.5%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骚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日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性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日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交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日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交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

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交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是怎样的不幸和耻辱导致这个年轻男子从顶楼公寓跳窗自杀？在浪漫的巴黎，自杀的趋势正逐渐上升，但是已成家的人通常能更加稳定心性。开枪自杀仍然是上层阶级的一项特权。

问题与冲突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交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干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

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性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金钱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马克思却谴责金钱是产生腐败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他们联姻的标准。没有事先约定，或者不信守诺言导致相互谴责、谩骂。当嫁妆变成高筑的债台，女婿就会找上门来跟丈母娘算账。在法国南部，许多法理学家建议把奁产制作为保护女权的一种方式，而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合法的财产分割套牢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这条法律的制约。想一想克莱梅西·德塞拉利的事例，她很草率地与一个退伍的军官结婚了。这位绅士强迫她立下一个又一个遗嘱，每一次的遗嘱都是对这位绅士有利的，当然就对德塞拉利没有任何好处。直到有一天，在他家庭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当众宣布德塞拉利患了精神病，并且把她锁在了地牢里。德塞拉利的财产理所当然归于这位退伍军官门下。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如此强大，克莱梅西家族对此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把克莱梅西从痛苦与困境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克莱梅西没有向法院提出法律第217条所规定的在他们“婚姻存系期间，她受到了侮辱虐待、暴力威胁或者丈夫有外遇”这些事实，并举出相应的证据，那么，她想要得到合法的财产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克莱梅西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还找到了有关金钱冲突进一步发展的例证。一个堂兄弟宣称他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了60000法郎的遗赠，他以此为依据要求从这个家庭中分得应得的这部分财产。还有一桩是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产分割。他们都有嫡亲的父子或者父女关系，但在一点小小的遗产分配上却斤斤计较、争论不休，最后走上了法庭。

最严重的冲突都是有关于遗产分配的，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不断。即使父母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比如平时给孩子们礼

物，在临死之前就把一些解决方案定下来，也难于避免儿女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不幸的是，对财产的评估不能像算算术那样精确。愿望、幻想、权力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里尔的冯特奈城堡，布莱梅兄弟为了争夺遗产，一个个都拼命了；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有时还诉诸武力。这件事让兄弟中的老大朱尔斯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代写了一张自己的财产明细表。

更为过分的是，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成员甚至连放在亚麻布衣柜里的床单和被褥都不放过。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小事件对于家庭节约是多么重要，诺伯特·伊利亚斯将其称为所谓的“文明的进程”。他们竟然吝啬到了连茶杯都不放过的地步，或者到了失去理性的程度——放在图书室里的书都要撕成两半，好像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父亲或者祖辈的去世反而成了子孙争夺自己遗产和名誉的开始，成了他们进行无休止争斗的开端，因此，某些人感到不公平是在所难免的。当家庭争论公开化以后，没有人会不受到伤害，即使是最亲密的姐妹或者感情深厚的堂亲。感情上受到的伤害会长久留在他们的心头，久而久之，家人之间的亲情也很难再得到恢复。争论成了家庭成员们之间谈论和书信的主题，最起码在争论金钱的事务上没有规定默许的禁令。

通常，这些家庭内部的分歧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唯一的见证人是公证人员，因为在家庭成员对财产分配出现重大分歧时，他们往往会请公证人作仲裁人。公证员在仲裁时面临的压力很大，尤其在乡村地区，因为财产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家庭生存的关键所在。在热沃当，许多小孩认为他们作为父亲主要继承人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捍卫自己这一特权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到了19世纪末，这些小孩已经学会走上法庭而不再采取那种愚昧粗暴的报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他们这种在公共场合大肆宣扬家庭秘密的行为，正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意义逐步走向衰败的标志。

家庭把企业倒闭视为悲剧，在企业和商人之中，破产可以使一个家庭名誉扫地，倾家荡产。然而，随着法律的完善，私人财产与集体财产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有限公司排挤掉合伙企业，因此，家庭对财产的分流不会再受到由于破产而导致的危害。不过，一些传统的家庭还是坚持旧式的组织管理模式。这样的家庭在第一

米尔斯·布鲁顿：《星期一》，1858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许多城市尤其是法国北部地区的工人，常常取消“神圣的星期一”，并且和朋友们一起快乐地饮酒庆祝，这也是工匠们当中的一个传统。而担心家庭预算超支的家庭主妇们有时会冲进酒馆，怒气冲冲地勒令她们的丈夫回家。

布雷顿画了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其中大部分是以乡村为背景的。这幅画被认为是1859年美术展览中最出色的作品。

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世界局势异常混乱，一些毫无能力的继承人很容易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挥霍掉整个家族积累了数代的财产。

金钱问题经常破坏我们的日常生活。两口子经常因为家庭经济预算弄得面红耳赤。妻子掌管着家庭财务，被称为家中的“财政大臣”。因为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丈夫，所以妻子有时不得不隐瞒家中真实的财政状况。因此金融事项常常引发争端。亨利·莱耶特这样描述了发薪日的各种情景：“在那一天，街坊邻居好像都表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态，既高兴又焦虑，既兴奋又充满了期待，好像几周来笼罩在头上的沉闷空气已经散去，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家庭主妇们爬在窗户上翘首期盼，或是站在门前耐心等待。有些等得不耐烦了，或者比较着急的干脆来到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在街上还能听到叫骂声；发自内心的愤怒、污言秽语，到处都可以见到听到，他们有的高高地举着手，老泪横流，孩子们在号啕大哭；然而在小酒馆里却是另一种欢乐祥和的景象，他们觥筹交错、举杯庆贺，还一边喝酒一边吟唱，完全陶醉于这种欢乐的气氛中。”

莱耶特还描述了有些孩子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父母怀疑他们不老实，逼迫他们如数上交他们的收入。还有的女孩，那些比

较轻浮的女子，往往被怀疑是做拉客卖淫的勾当。因此，金钱成了追求自由的青少年和他们处于工薪阶层父母之间的争论焦点。

荣誉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由金钱和财产构成的，还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无形资产，那就是一个家庭的荣誉。任何损害家庭名声的行为或者玷污名誉的行为都将对家庭荣誉造成破坏。如果这些破坏是来自外界的，那么家庭成员会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它的尊严；如果是内部成员造成的危害，就会使家庭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可以有几种应对的办法：共同担负责任、弥补损失；通过家庭法庭对肇事者进行惩罚；要不就把害群之马赶出家门，或者结成同盟，保持缄默。总之，只要谁为家庭带来了耻辱，谁就要遭殃！

丑行——本来它的词性是中性的，但是它的词义具有多种理解。特里库德诠释说："贵族对于极其微小的可能使自身名誉遭到羞辱的危险极度敏感，而对于高筑的债台却处之泰然，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19世纪的法国有许多代表荣誉的标志。深入探究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丑行的构成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般来说，荣誉更趋向于一种道德和生物的范畴，而非经济问题。性侵犯或者非法生育会被判刑，不仅仅是破产的问题，尽管破产的压力在今天的社会也变得难以承受。总之，玷污通过女性传递，并且这种羞辱的感觉会一直笼罩在她们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因为非法生育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或者判刑，因此，未婚（或通奸）母亲有时会采取堕胎或者弃婴、杀婴的行为；也有的会在穷乡僻壤的一个地下诊所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再交给别人抚养。为了防止杀死私生婴儿的现象，帝国于1811年创立了"孤儿堡"，这后来成了争议最大的一个项目。1838年拉马丹在法国下院发言，为"孤儿堡"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保护家庭荣誉最有效的方法。他赞成"社会的父权"，反对马尔萨斯学说代表的穷人人口的增加。"私生子应该被视为一个客人来收养。人类的家庭应该把他们包括在内，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人间温暖。"——人类家庭，并非这些孤儿真正的家庭，因此也就没有羞耻可言。弃婴的数量从1809年的6.7万增加到1835年的12.1万，然而，"孤儿堡"对此也无能为力，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860年，只留下25个这样的"孤儿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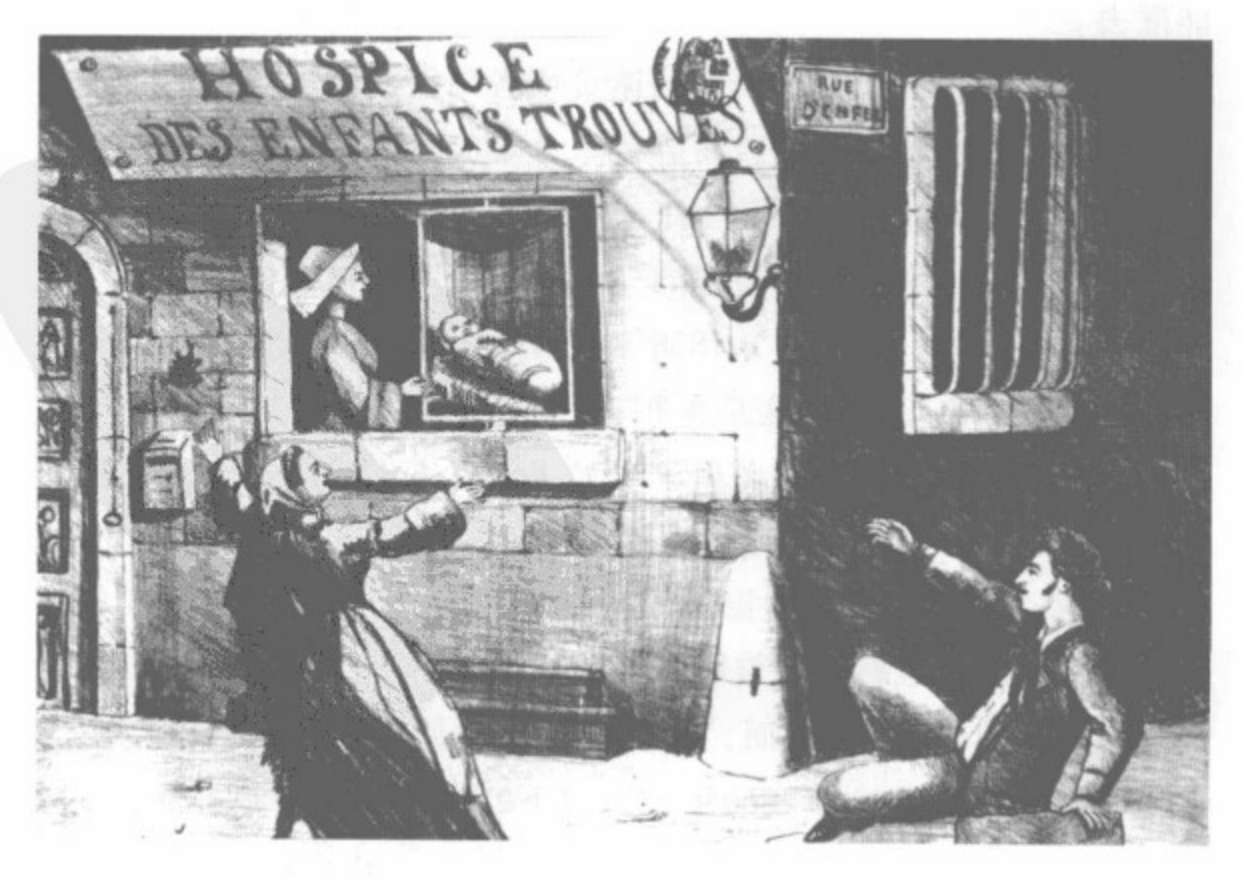
他的“孤儿堡”由政府命令关闭了。

从那天开始，不想要私生子的母亲可以在政府办公室里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而想要抚养自己后代的未婚母亲可以获得与在医院护理数额相同的补贴。对弃婴的抚养成了政府援助办公室的责任，至少在巴黎是这样的，因为巴黎面临的问题最严重，而该办公室一般是把资金分发给农户。孤儿院和训练学校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建立起来。

私生具有一定的耻辱性，因为它明显地违背了女性的贞操观，是对婚姻忠诚的背叛，因此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感到罪孽深重和那些有类似思想的人只能想办法来隐藏她们的罪行，消灭自己的“罪证”。而且做母亲的也经常怂恿她们的女儿采取杀婴或者弃婴的行为。邻居甚至家庭其他成员经常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有时一句持久不断的流言足以引起市长或者警察的注意。

有一些女性，不管是照章办事，还是感情用事，最后选择自己来抚养小孩。经常是由祖母来抚养一段时间，直到外面的流言散尽，别人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这个不幸的母亲又找了一位愿意接受这个私生子的丈夫。对于一些处于中等地位的女人来说，私生并非一种爆炸性的事件，她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于上流社会来说，这却需要进行认真的谈判、协商和解决。

未婚母亲再嫁人是件难事，有时她们会提出为对方提供经济补



巴黎恩菲大街收容所的修女们整天接受着弃儿，直到1860年她们的收容所被取缔。这些孩子并不仅是被单身女人给抛弃的，还有的被贫困夫妇所抛弃，正如此图所示，他们也许某天还会将孩子领回。

直到1882年，孤儿们仍由公共收容所的修女们照顾着，协助修女的奶妈也住在楼内，以免孩子们被送到乡下去。（《接受社会救济的孩子们：托儿所》）

偿来引起男人的注意。以马尔泰为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贵族，不小心怀上了一个仆人的孩子；她坚持要有一个男人来满足她的性需要，她的家庭就出去为她找了一个中意的丈夫。没想到他们找的这个男人却是一个畜生：他利用了她的“罪恶感”，他不仅欺骗她而且还对她性虐待。最后，她提出离婚，但是又一次遭到了她天主教亲戚的反对。那个被送给保姆抚养的小孩也在四五岁时夭折，没有一个人为他感到悲哀。事实上，死亡就是私生子最终的归宿，没有人想要他们，他们也得不到关怀、得不到爱。据调查，有50%的非婚生婴儿在一年内死亡。直到人们认识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出现的所谓出生率危机（出生率下降），国家才颁布法令来制止潜在的人口减少危机。国家为未婚母亲提供经济援助，标志着法国家庭政策的正式实施，尽管开始时这一政策对于接受经济援助的母亲的名誉恢复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许多已经遭到遗弃的婴儿本来也应该得到帮助，但却遭到社会救助机构的歧视。

私生子的出生是一个未婚母亲永远难以洗雪的耻辱，对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拭去的污点。私生子对谁都是一种耻辱。在热沃当的乡村，当地居民对私生子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尚皮斯”（流浪儿的方言）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被视为潜在失业者，因此人们也就按这样的看法来对待他们。从孤儿院到教养院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公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待这些弃儿就像对待他们

不道德的母亲一样残酷。

非法私生子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些自传体小说好像是专门为了保护作者罪恶的秘密而写的。许多非婚生、身份后来被合法化的子女在他们的后半生得知他们出生的秘密后，感到又委屈又气愤。知道自己的私生身份往往会导致他们长大后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疯狂猜测。

19世纪初，奥罗尔·萨克斯姆迪潘把他儿子莫里斯的私生子希波吕忒·夏蒂朗抚养成人，没遇到任何问题。希波吕忒一生中一直被作为乔治·桑德的同父异母兄弟来看待（除了在遗产分配时）。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私生现象遭到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毫无疑问，严厉的谴责致使婴儿的私生率下降，从而提升了婚后合法生育的比率。

污血

因为把家庭描绘成“遗传资本”的说法日渐广为流传，所以人们对于结婚和生子的焦虑也相应地增加了。但人们又为生出畸形儿而担心，因为畸形也被视为间接的罪过。例如，《大众科学》杂志几乎每页都刊登有“怪物”的照片；例如，《自然》杂志也对产生畸形的事件有大量的报道。这些奇异的形体让人更加恐惧，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难道这不正反映了存在某些潜在的病态吗？还有一些奇闻轶事，诸如斯皮兹纳博士的解剖学博物馆吸引了大量神经紧张而又入迷的人群。人们有时专门避开身体有缺陷的人，而有时又对这一种行为进行强烈谴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受害者的痛苦，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无形的犯罪。而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小孩往往被视为障碍，成了众矢之的。福楼拜的一个记者，尚特彼小姐在1858年7月17日写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有一个名叫阿加莎的小孩受到了她父母的虐待，因为她有残疾，“她的脸没有异常，只是她的身体有残疾，脖子上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她经常挨打，遭到羞辱，还经常赤着脚没有鞋穿，最后据说患上了神经病。

梅毒被认为是造成畸形儿的罪魁祸首。因此准备结婚的新郎新娘的健康状况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检查发现缺陷，那么羞耻或许愤怒就会随着产生。这样的不幸会在家庭内部传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神秘。卡罗琳·夏塔尔利奥勒就在布瓦洛的家庭通信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欧仁·布瓦洛的母亲埃梅·布朗

《不用看医生的维纳斯的药》。梅毒是一种“不光彩的病”，以至于人们甚至向他们的医生隐瞒病情；这也说明了多种不可靠的自我治疗方法的成功是情有可原的。

德，由于她的嫁妆不够而导致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她开始起来反抗不称职的丈夫。她控告她的丈夫得了一种“不体面的病”，而后就与他分床而居。有一天，当他准备进行下一次旅行，在家里作短暂停留的时候，她居然把他们的亚麻布床单晾在了屋前，家中最大的隐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来，埃梅绝望地离开了她丈夫的房间，还起诉要求得到三个儿子的监护权，当时这三个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弄到了比利时。她把自己关在了洛基弗德的房间里，后来死于精神失常。

这个家庭后来在谈到他们的这一祖先时，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词。她的悲剧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欧仁渴望在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中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

精神失常

生理缺陷这一导致家庭矛盾和使家庭蒙羞的新原因，也成为左拉写关于鲁朗—麦克夸特家族史诗传奇的中心内容，而且在其他小说中也比较常见。在19世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是精神病。这成了当时人们最大的担心。如果谁家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妹妹，那么，她姐姐的婚事肯定告吹。因为别人很容易就会想到与她流着相同血液的其他人肯定也会有精神病，所以这是整个家庭的耻辱。这方面有一个关于阿黛尔·雨果的很不寻常的事例，在这个事例中，整个家庭，除了阿黛尔的母亲，为了使伟大的维克多的名誉免受他挥霍无度的后代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删除阿黛尔一节的内容。整个家庭团结起来把那一节的内容从中删除了。

行为不良并非总会遭到谴责。判断人和物是否值得尊敬的标准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关于荣誉的标准又并不总能正好与法律相吻合。偷猎和非法侵入的事件在19世纪时常发生，法律也无能为力。小孩偷取木材，妇女从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下偷采石油，偷猎者甚至从人们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过。19世纪初，城市里贫困的母亲让自己的小孩去乞讨，甚至怂恿他们去偷窃。在下层社会，生存才是最主要的法则。只要能生存，道德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但是当一个家庭慢慢走向小资产阶级之后，遵守法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讲文明讲礼貌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浪荡公子、酒鬼、挥金如土的人、游手好闲者以及骗子、赌徒都成了他们不欢迎的人，会受到他们严厉的谴责。在商业上，一个人一定要定期还债才能得到尊敬。那些没有一点教养的后代一定会受到家庭的严厉惩处。波德莱尔，被他的亲戚绝望地评价为不称职，从而被严加管教起来。他在与他母亲奥皮克夫人的通信中充满了对资金窘困的抱怨以及他与代理人的冲突。中产阶级行为规范的准则根本无需给出什么特殊的理由，其实就是一种言行谨慎、中庸之道的理想状态。偏离中心，就成为一种耻辱。

由布艾斯·莱贝尔（1860-1870）印制出版的虔诚画像是为了纪念接收圣母玛利亚的孩子。1854年这一完美概念变成了教条，人们对圣母的崇拜在当时达到了顶峰。

虚伪与诈骗是可以容许的，尤其当他们的目标直接指向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时。相反，破产也被认为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正常的错误。巴尔扎克笔下的凯撒·比罗托就甘愿把自己当作别人的替罪羊，偿还他的债权人的债务变成了一种“补偿”。他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在19世纪，因破产而自杀的人一点都不罕见。菲利普·勒热纳已经告诉我们破产者为什么会写自传，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向他们的后代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需要这样做。北部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妇女，对于破产者一概不予接纳，因为怀疑他们从事非法勾当或者过着一种肆意挥霍的生活。随着公司的兴起，商业才慢慢与家庭脱钩，资本主义也得以与荣誉的观念脱离开来。

性羞愧

19世纪使性——家庭的性——具有了科学的概念。所有指导性行为的标准和规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牧师，更多的是医生，是性问题的专家，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然而当个人在性生活中出现问

题时，内科医生有时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们一般不会向别人寻求帮助，即使你是医生。

通常情况下，家庭对于性方面的内容也是守口如瓶，因此对此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傅立叶称乱伦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原因很难解释。性的忍受力与环境、动作、年龄和性别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最大不同也就在此。坚挺有力决定了男性阴茎的威力，它可以在女子尤其是年轻女子身上得以充分自由地体现。在热沃当，强奸女性几乎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连对少女的性侵犯也是被容许的，只要他们没有公开。19世纪后半叶，法庭对性侵犯案件进行严厉的惩处，比前半叶的处罚力度要大许多，这大概标志着社会对性侵犯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到19世纪末，还出现了检举者，如果发现有对强奸犯量刑过轻的案件可以检举揭发。

紧接着，对青少年和妇女的性侵犯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青春期是人体发生变化最大的时期，被称为骚动期，因此这一时期不论是对他们本身还是社会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期；每一个青春期少年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罪犯。女性的性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不幸会通过母性本身的特点降临到她们头上。一种持续不断的欲望在这一时期主宰了她们的理智（女性的性欲望主要通过教堂来加以控制）。崇拜处女，在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玫瑰经，在全体教徒的集会上向玛丽的孩子们做礼拜，这些方式都有助于青春期少女保护自己的贞洁。虔诚能够战胜世上和舞厅里的邪恶。卡罗琳·布拉梅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没有华尔兹舞。"即使在下层社会中，少女的贞洁也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当她们去舞厅跳舞时，父亲或者哥哥、弟弟一般都会陪着，因为那些男男女女之中不乏野蛮之徒。

女性不贞洁的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是对神圣的一种侵犯，然而，男性的通奸行为则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除非他公然包养情妇。只有行为过于露骨，才会受到强烈的谴责或者法律的制裁。在中产阶级中，女性很少知道她们丈夫的事情，所以她们也没办法。而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女性，如果她们听到了风言风语或者碰巧在街上看到了其丈夫的不轨行为，就会毫不留情地说出来，必要时还会反抗，尤其是当她们感到丈夫的风流行为损害到了家庭的经济利益，威胁到了她们给孩子提供各项费用的能力时。当

A.德夫利亚：《一名年轻的妇女接受其护卫天使的忠告》，1830年。这个护卫天使将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位年轻的夫人免受那个年轻的求婚者的阴暗的诱惑。浪漫主义颂扬鼓吹处女，这是激发激情之火的一种障碍。（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地的报纸也作出评论对这些不忠实的丈夫嗤之以鼻，诅咒他们被“妓女”缠上。世纪之交，少数人居然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用硫酸毁容。

冲突方式

大多数家庭矛盾都在家里秘密处理了。规矩，从家庭隐私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害怕外人的风言风语，对能否得到别人的尊敬看得很重——这都是导致家庭矛盾的原因。村民和中产阶级最基本的准则基本相似，都是家丑不外扬，不让外人知晓，自己的脏衣服在家洗干净。这些基本原则强化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他们感到来自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工人与富人的判断力大不相同；他们无需建立森严的壁垒来保护自己。一个目击证人在法庭上这样陈述：“我躺在床上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X房间的一切动静。”工人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暴露得更多，或许正在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愿意多谈自己。

为了防止出现矛盾，许多家庭设立了所谓的家庭法庭来处理家庭事务，或者驱逐那些破坏家庭规矩的成员。有时反对派或者充满敌意的宗族会组织起来，他们相互仇视，既不正眼相看也不说一句话。在处理这些家庭内部矛盾时，需要家庭中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成员采取外交策略，把矛盾各方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集体参加家庭某个成员的葬礼经常是一个缓和家庭矛盾的机会，家庭成员可以借此机会聚集在一起。家族中未婚的叔叔或者姑姑们经常发挥一种弥补家庭裂缝的作用。家庭矛盾经常会与神秘传说结合在一起，因而显得异常复杂。有时，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会持续好长时间才能被慢慢遗忘。虔诚乞求和谐的心灵会得以恢复，因为许多人都盼望能够对别人说自己有一个幸福团结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一样统一和谐，能为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幸福与安宁，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感到自豪——这些都会在全家福照片中得到充分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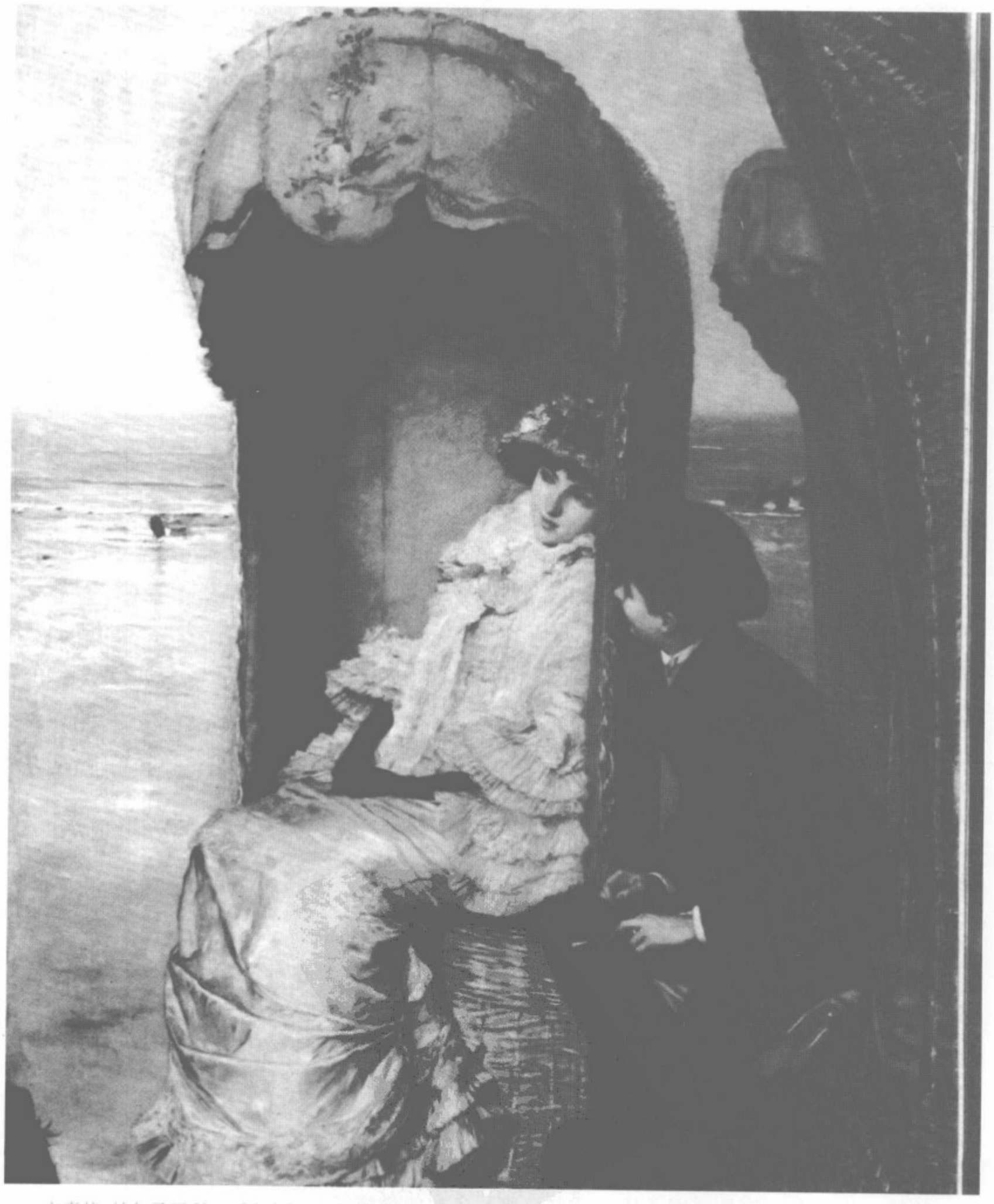
暴力

中产阶级家庭很少诉诸武力。他们并不喜欢乡野村夫动辄拳打脚踢的方式，他们用的是一种更巧妙，但是破坏性一点都不逊色的攻击方式。家庭的敌对派采取鼹鼠或者蜘蛛的策略，他们无声无息在暗地里干一些毁损家庭荣誉的勾当，甚至足以击败自己的仇敌，而且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随着砒霜和后来磷的发展，投毒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更加方便地得以运用。科尔内温博士在1840年写道："有一种潜伏的犯罪正在悄悄地向家庭渗透，这无疑将对社会形成极大的危害，这一事态的发展归咎于砒霜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和它神奇的效果。这是对科学仪器和科学分析的一大挑战。毫无疑问，法官的良心与道德也将受到它的威胁，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年年扩散：这种犯罪就是投毒！"传统的投毒犯罪往往与女性有关，因为她们的软弱与本性使她们更容易采取这种秘密的方式，而且她们在家庭中洗衣做饭的职责又给她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作案条件。玛丽·拉法耶尽管得到了律师的极力辩护，但还是在1838年被宣告有罪，因为她的丈夫被她投毒致死。后来许多年轻的少妇在自己亲爱的儿子死后怀疑是自己的婆婆所为，从而采取类似的方式以解心头之恨。玛丽·拉法耶就是她们的原型和榜样。档案记录显示，1825年至1885年间，共发生投毒案件2169宗，831人致死；1969人因涉嫌投毒被起诉，其中男性916名，女性1053名（占53%，而所有犯罪行为中女性犯罪只占到20%）。1840年到1860年间，投毒案件达到高峰，之后犯罪比率明显下降。然而即使在这种犯罪达到最高点，也没有满足他们心中的幻想。

农村的村民或工人发生矛盾时，身体对抗是最普遍的。争吵打骂对于兄弟或堂侄们来说是一种快速而又方便的解决办法。而打老婆简直就成了男人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事。遭到殴打或虐待是80%的女性提出离婚的原因。丈夫喝醉了酒或者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往往会通过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打老婆并不是因为她们不贞或者肆意挥霍，也不是因为她们不擅于持家，而纯粹是因为男人们需要发泄。"晚饭没有做好，他们的火气噌地一下就起来了"，这往往成了男人把老婆打死的一个原因。

的确，死亡有时就是婚姻矛盾这一"经典"名曲的最终结局。若埃拉·吉约赖斯莫里对19世纪发生在巴黎的100起"激情案件"进



文森特·帕尔马罗利：《告白》。一场挑动情欲的拙劣的告白：身穿白衣的年轻女子坐在一把形状奇特的沙滩椅中，倾听其打扮得像牧师的情人的告白。

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人几乎全部是男性，通常是年轻男性对女性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男性的尊严而采取报复行为。这些谋杀者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女人，你属于我。"吉约赖斯莫里所调查的案件既涉及到未婚男性也包含未婚女性。那些未婚女子不愿意和她不喜欢的男人上床，或者她另有情人，要不就是和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一块上街被看到了。这些女子会以极其惊人的勇气和最粗暴的语言来捍卫自己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她们还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公然谴责男人的通奸和野蛮行为，不管是性无能还是性虐待。其中有一个女子这样抱怨："这就是地狱。"她们宣称她们的身体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完全属于她们自己。但是她们却为这句狂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生命。

在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路易丝·普拉迪埃就被她的丈夫赶出了家门，"他们把她的孩子们抢走了，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了。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没有仆人，只能依靠所得的6000法郎为生"（福楼拜的信，1845年5月2日）。福楼拜还提到一个工人阶级少妇与鲁昂一个声名显赫的市民之间发生的一段风流韵事，结果这个女人被她的丈夫杀死了，她的尸体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扔到了河里；而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男人只判了4年徒刑。当地还有一种报道说这个女人的尸体被肢解了，这正是一些男人强烈反对女性渴望自主权的阵发性例证。

私下报复

暴力行为就是报复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中，这种方式在下层穷人中相当普遍。安妮玛丽·索恩为了找到女性的作用，查询了近50年来法院的档案，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个人报复行为都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路易·谢瓦利埃对19世纪前半叶发生在劳动阶层中的打架斗殴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男人在酒馆外面或者舞厅里打架，通常是因女人而引起的（据称意大利人对女人的诱惑力最大，所以经常挨揍）。年轻的流氓恶棍们经常在空旷的电影摄制场地或者巴黎郊外的荒地上砍砍杀杀。如果警察介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同伙列队与警察对抗。这样的打斗外人是无法调停的。

《城市谋杀事件》，《小巴黎》，1890年9月17日。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杀死其丈夫的事极为少见，而且不管怎样她都应该更可能去投毒而不是使用男人的武器——匕首。各大报纸配有插图的副刊用这些反常的细节来娱乐读者。犯罪故事使私人生活中的问题戏剧化了。

乡村中的家族间仇杀被掩饰得非常完美，在科西嘉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他们打斗的痕迹或者场景。然而从杀人者的统计数据和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却可以大致画出一个“报复区”。这一区域覆盖了几乎中央高原南部所有的地方，其中包括Velay, the Vivarais 和热沃当 。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族长式的家庭结构。他们还指出，家庭关系日益紧张与被剥夺了继承权而变成无产者的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矛盾的日趋紧张有时会遭致意想不到的灾祸，于是心头之火被点燃，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案例。

然而，与此同时克拉维尔和拉梅森还注意到他们开始越来越愿意求助于警察，用法律的方式来取代他们那种个人的报复行为了。把委屈整理成材料慢慢地取代了采取暴力行为的粗暴方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上法庭，因为凭他们的直觉，法律诉讼运用的是一套全新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每一个人——原告与被告都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经常在法庭外解决争端，双方达成和平的谅解。然而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最后会选择按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进行诉讼或者判决。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并不介意出席法庭，甚至被判入狱都无所谓；他们可以装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姿态，这样公开的侮辱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忍受不了的。现在，这又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有时仅仅让对方丢脸就足以满足人们的那种报复心理。对法庭的这种利用方式表明公平下正义的概念越来越趋于一种个性化。这一观念使法庭，老百姓曾经趋之若鹜的法庭，慢慢地进入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普通老百姓一切行为事务的中心。

个人报复的权利曾经得到陪审团的一致认可，尤其在因女性通奸行为而引发的“激情犯罪”中，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权利已不再被犯罪学家们所接受。这些刑事专家把个人报复行为视为一种宗教上的原始主义或者野蛮的标志；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布伦蒂埃在1910年著述的《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的评论》中写道：“拒绝法律是回归原始，是向动物的倒退。”

合法的报复

向权威部门申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伊薇斯和尼科尔·卡斯坦研究了郎格多克人在现代初期是如何走进法院的。阿尔勒·法格

《受苦的孩子》，1877 年。对孩子的体罚随着国家、教育系统和人们对待身体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和米歇尔·福考特已经弄清楚了法国家庭在遇到内部威胁的时候是如何使用密信和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9世纪，这些行为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人们开始求助于教养院（年轻人被他们的家庭送到这里接受教育），而根据1838年的法律，可以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监禁。

虽然被遣送至教养院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1869年颁布了1527条监禁令），1846年到1913年间大约只有74090名年轻人，但这些机构在塞纳地区（包括巴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颁布的监禁令占到了1840年至1868年间颁布的所有监禁令的75%，而在1896年至1913年，这个比率达到了62%。起初，教养院基本上是专门为上层社会富有家庭设置的，但是后来也向穷人开放了，尤其在1885年颁布了免除贫困家庭住宿费的法律以后。在1894至1895年间，提出把子女送至教养院的申请中有78%来自于农村手工业劳动者。而这些教养院里年轻女孩占的比例高得惊人，1846年到1913年间，女性的比率是40.8%，这个数字远远高于青少年罪犯中女性的比率（1840年到1862年，女性青少年罪犯的比率是16%~20%，1863年至1910年期间，这一比率是10%~14%）。父亲常常把他们的女儿关起来，怕她们怀孕或者做出品行不端的行为，同时这也是家长把女儿送到教养院的主要原因。贞洁被视为女孩最有价值的资产。

教养院变成了坚决拥护家长制的一派和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的另一派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后者以保护小孩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家庭环境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天主教法学家邦让，监狱社会管理主任、《监狱调查报告》的编辑、《叛逆的儿子和有罪的父亲》一书的作者。19世纪末，公众谴责的矛头不再指向青少年，而是指向了他们粗暴的父母对待他们的野蛮方式，而且还有人建议剥夺他们父母的监护权。虽然1889年制定了一条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法令，1898年制定了关于父母虐待儿童的法令，但是教养院依然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运行着，一直坚持到1935年。就在这一年，国家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宣布把儿童送到教养院关禁闭是非法的，但是允许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类型的矫正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条件更差。考虑到当权者的原则，尽管包括广大公众和法律专家在内的人都强烈地关注青少年罪犯问题的解决，但他们对这些机构的干预一直犹豫不决。然而，这

些变化确实预示着穷人隐私的减少。以儿童利益的名义——儿童的利益被视为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加大了对家庭投入的力度，结果不是更好就是更坏。

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1838年的法令限定了被家庭送到矫正机构的人员中不应包括具有危险性的、不受人欢迎的或者无教养的儿童，只能是精神病患者。从此，精神病院不再是巴士底狱的延续而是与它性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机构。它代表着禁闭的医学化。在这里医生的权威远远高于政府的权威。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不允许批准一个人住进精神病院，只有医生才有签署许可证的权力。

这种医学权威很可能会被滥用，一些比较怪异的行为很可能会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但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权威还是受到了需要医学证明的限制。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滥用这种权力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克莱梅斯，她的丈夫在他贪婪的家庭的怂恿下，找到一个内科医生为她编造了许多理由，包括“严重的癔症”，另一例是埃尔西里·罗伊，她的同父异母兄弟为了取得她的遗产，在佩尔坦的谋划帮助下让她签署了“自愿委托书”。这位医生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开具了“埃尔西里，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未婚（是一个自由女性，自愿过独身生活），患有‘偏执狂症’”这样一张医学证明；结果她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4年艰难的岁月。还有一个受到这种权力滥用危害的是迪布尔夫人，因为她拒绝和她的丈夫上床，就被她丈夫关了起来，直到最后被杀。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有阿黛尔·雨果和卡米耶·克罗黛尔，显然她们也是受到家族中为了保护自己荣誉的两个人的诬陷而成为牺牲品的典型范例。

女性精神病疾病分类学中蕴涵的正确概念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

女性精神病常常与医生的主观臆断、夸大其词有关，尤其女性在婚恋问题中的行为表现可能被视为一种不正常。一些绝对禁止的行为包括：爱上自己的父亲、女性同性恋、爱上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好多的年轻男人、女性性欲狂或者纯粹就是为了玩乐而一天换一个性伴侣。特拉特在他的小说《精神错乱者暂时的意识清楚中》中写道：“所有的女性都是感情型的，而感情几乎就是一种癔症。”她

卡米尔·克劳德尔，阿黛尔·雨果：两个有名的受害者，她们的故事最近才公诸于众，肯定需要相当多的目击证人。

们在男性主宰的性与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性是造成痴呆的原因。反之，只有家庭幸福和睦，她们才会心智健全，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精神病是一个名门望族的最大不幸。在那些患有精神病的女性中，许多是被抛弃的情人、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女性、受到丈夫欺骗的妻子或者痛失爱子的母亲。男性的精神错乱则更多地与盛衰变迁以及自己事业的成败有关。破产、挪用公款，还有赌博——这些都被女性痛斥为男性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收容在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尽管警察对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加大了管制力度，但是进入精神病院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个人悲剧，而对于家庭冲突悲剧，只有医生可以起到法官和仲裁者的作用。

分居与离婚

当婚姻出现矛盾时，很少有美好的结局。虽然1816年的离婚法被废止，直到1884年才重新立法，但是分居是允许的。伯纳尔·施那普对1837年（因为从这一年才开始有统计记录）至1914年间合法分居的特点与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分居案件并不多，即使在1880年前后的高峰期每年也只有大约4000宗，或者说每1000个婚姻家庭中只有13个分居。但是在1851年颁布了一项对提出离婚申请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法令后分居的比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以前经常被中产阶级使用的那些程序现在被下层社会所采用。1837年至1847年期间，所有的离婚申请中只有24%来自于“工人、仆人或者家庭主妇”，但是到了1869至1883年，这一数字飞速上升到了48.8%。而且分居好像成了女性的一种习惯，女性提出的申请占到了86%以上，最高时达到93%，而且大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结婚多年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母亲。通常她们并不是因为实在难以忍受丈夫的通奸行为而被迫走上这条路的，“这些申请分居的女性是因被虐待而心灵破碎，而并非被丈夫所欺骗。”分居现象在法国北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较常见；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分居的比率也相对要高。总之，与离婚一样，它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离婚率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分居是一样的。达洛兹的法律词典最后为分居的理由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判例

Numéro 249. PRIX DU NUMÉRO : 40 CENTIMES 4 Octobre 1884

A. ROBIDA
ÉDACTEUR EN CHEF

La Caricature

JOURNAL
HEBDOMADAIR

bonnements d'un an, Paris et départements : 20 francs. — Union postale : 24 francs. — Trois mois : 7 francs. — Bureaux : 7, rue du Croissan

FESTIN DE DIVORCE. — Texte et Dessins par A. ROBIDA

离婚，并不总是一场悲剧，有时也是双方的意愿。罗比达的乐观主义幽默反映了人们对离婚的态度的巨大转变和相信婚姻不可分割的旧思想的衰落。《讽刺画》，第三共和国早期最有名的讽刺报纸之一。《讽刺画》，1884 年 10 月 4 日。

法是改变道德观念最好的指示器。

离婚具有相似的特征：同样的分布区，同样是女性占绝对优势（80%的比率），同样的理由（在1900年因遭到体罚或者受到心灵上的压迫而提出离婚的占77%）。然而离婚在中产阶级中所占的比率比分居的要稍微高一些。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士提出离婚申请的人数比提出分居的要多。作为大革命的一个产物，离婚（1792年首次合法化）在城市女性中相当普遍。博纳尔和极端君主制主义者对此进行激烈抵制，并于1816年成功废止了这条法令。后来，激进分子，比如阿尔弗雷德又一次使离婚成为婚姻生活的一个主题。在激进分子与机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准许离婚的法令于1884年重新颁布。丈夫与妻子间的高度不平等性是肯定存在的。丈夫可以引用他们的妻子接到的和解信作为证据，而妻子却不能用她们的丈夫接到的同样的和解信作为证据。如果妻子骂丈夫“社会渣滓、下流坯子”，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丈夫侮辱妻子为“母兽或大母猪”却不可以成为女性提出离婚的证据。1904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承认离婚者和与其发生通奸行为的人结婚是合法行为；接着在1908年又出台了一条类似的法令：合法分居的夫妻双方均可以申请并准予离婚。离婚法因而变得更加自由化了，但对于以保罗·布尔热为首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打击。尽管受到天主教徒的阻挠和反对，离婚还是变成了人们生活中可以接受的一部分，虽然真正离婚的人还很罕见——1913年只有15000人被准许离婚。除此之外，离婚还被认为对人们认为婚姻不可分割的传统以及丈夫和妻子寻求爱情和追求幸福与相互谅解的权利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婚姻自由这一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尤其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婚姻就是一个自由合同。

1881 年 7 月 14 日，在巴士底狱，一个名为“女性的权利”的组织连同《公民》报（由休伯·奥克勒特创办并于 1881 年 2 月 13 日首次发行）组织了一场旨在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政治和公发权的示威集会。

在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之前，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显著的发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已经在与教堂脱离关系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女权主义者及其同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慢慢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克莱尔·德梅尔和乔治·桑德（她的处女小说《印地安娜和莱利亚》的主要观点是赞成离婚的）到玛丽亚·德莱梅和于伯丁·奥克拉特，这些女权主义者都强烈呼吁女性要把离婚进行到底。尤其在法兰西共和国初期许多机构的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时候，这些女权主义

者的呼吁显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873年，莱昂·里歇出版了《离婚》一书，而此时，旧的道德手册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威力，被那些不忠实的丈夫们爱不释手地翻阅。《离婚》一书的出版加速了重新修订《民法》的步伐。1880年，奥林匹·奥多尔德和玛丽亚·马丁成立了一个离异者朋友会，她们还办了一份报纸——《解放者》。从1880年至1884年，女权运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然而在世纪之交，为了防止由于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而使离婚成为男性强有力的武器，女权主义者显然对这一问题提高了警惕。玛格利特·迪朗在她的《福隆德运动》一书中曾有这样一句话："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对爱情失去兴趣。"她对夫妻中只有一方提出的离婚提出警告，指出其中的危险性，它很可能会成为其中一方为了抛弃因衰老而失去吸引力的配偶而利用的工具，从而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女性由于自身地位低下，自然而然会要求获得免遭抛弃的保证；要为她们提供保证就要对《民法》进行全面修订。1880年4月6日，巴黎第十五郡市政厅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于伯丁·奥克拉特突然闯了进来，她向新郎和新娘说了这么几句话："亲爱的同胞，你刚才已经在一个代表法律的男人面前发了誓，但是你说的诺言没有任何意义。与男人平等的女人，不欠他什么，不必去顺从他的意志。"在听她讲这些话之前，另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1887年，休伯蒂娜·奥克勒特(1848~1914)，法国"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女子"中最积极的人，写道："对于女性来说参政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关键所在。"一份警方的报告则指出，"休伯蒂娜确信患有疯狂和歇斯底里症，这是一种导致她将男人视为与其平等并且希望与他们接触的疾病。"

保罗·马太，无题。当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不在家时，家务杂活都已干完，孩子们也可以尽情地玩耍。

角色与人物

父亲的形象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首领，父亲主宰着19世纪的私人生活史。法律、哲学和政治三者共同作用，使父亲的权威得以建立与合法化。从黑格尔到普鲁东，从国家理论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之父，父亲的权力均获得众多支持。父亲将自己的名字给予孩子，用康德的话说，“只有合法出生的人才算有真正的出身”。在王朝结束、国王不复存在之后，传统主义者寻求恢复父亲的权威，革命派和共和派也同样热衷此道，共和派还将掌管城市的钥匙放在了父亲的手中。痛心于家长作风的没落，朱尔·西蒙曾经这样写道：“政治学中有条格言：家庭中的权威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国家中权威的必要性就会大为降低。当我们伟大的共和议会降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时，他们就会犯错误。”

共和派在玛丽安（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注视下审慎地探讨着，与此同时，风靡一时的雕塑艺术中，妇女的形象无处不在：不是在伟大男人的脚下，就是额头戴着装饰性花环。这种对象征主义的极度热情，对“缪斯和玛利亚”近乎疯狂的赞美，就是一种将公众场合与私人空间严格区分开来的方式。

男人的权利

波塔利斯曾在书中写道：“丈夫与妻子本质上的不同暗示着他们在权利与义务上存在着差别。”法国《民法典》以自然的名义赋予家庭中丈夫和家族中父亲以绝对的优越地位，而妻子和母亲则在法律上被剥夺了权利。已婚妇女不再是一个能够担负责任的个人，未婚妇女和寡妇则要担负比常人更大的责任。《民法典》的第213款

阿尔伯特·奥古斯特·傅立叶：《家庭》。先生、太太、婴儿和小姐姐：这个典型小家庭的成员坐在客厅角落的钢琴与窗帘之间，尽享天伦之乐。（插图，1892年）

几乎剥夺了已婚妇女的法律资格："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已婚妇女不能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不能进入家族委员会，而要优先考虑远房男性亲属充当这些角色。已婚妇女不能充当证人；妻子如果离开丈夫的家，政府可以将其送回，并迫使其"履行责任并享受完全自由的权利"。通奸妇女可以被处以死刑，因为她的罪行使家族最为神圣的东西——血统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法国简瓦丹地区，短暂的风流韵事可以容忍，但怀孕则要严加审查，生下私生子的妇女则不会得到原谅。通奸的男性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有他的男性"同谋们"保护。风俗习惯要求男人与他使其怀孕的女人结婚，而新的法国《民法典》却禁止提起有关生父确认的诉讼。

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将妻子的财产置于丈夫的支配范围之内，这一制度得到了广泛认同。妻子和未成年人（他们的法律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均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直到1907年法律才在这方面放松了限制。在19世纪末的法国奥德，对于在葡萄园工作的夫妻，工资都是支付给丈夫的。妇女的财产只有在陪嫁制或结婚契约中规定妻子与丈夫的财产完全分开时才受到保护。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会订立结婚契约，即使这样他们也很少这样做。法国《民法典》保护富裕阶层，它使贫穷的妇女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一些人还给予丈夫比法律赋予的权力更大的权力。亚历山大·小杜马认为，一个受到欺骗的丈夫完全有权进行报复。普鲁东列举了六种情况（包括无礼、醉酒、偷盗和挥霍），在这些情况下，"丈夫可以在家长式的严格制度下处死他的妻子（《色情还是现代》，1875年）。"

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直延伸到孩子身上。对孩子投入较多感情肯定不会减少家庭的权威或是父亲的权力。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仅仅进行了小幅度改革：废除对成年孩子的家长制，废除父亲原来享有的剥夺子女继承权的权利，并对父亲惩罚孩子的权利进行了限制。罗伯斯庇尔曾经建议，当孩子长至七八岁时，将他们集中进行抚养，以教导其尊重新的观念，但这个建议从未得到大家的重视。

尽管勒裴声称大革命废除了设立遗嘱的权利，"将父亲的权威毁灭殆尽"，但是《民法典》实际上延续了许多旧观念。即使是成年子女"在看到祖辈时也要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模样"，而如果"自

然与法律放松了家长权威的镣铐，那么理智则是拉紧了绳结”。直到1896年，没有一个25岁以下的人可以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结婚。

一位父亲可以要求逮捕并囚禁他的儿子，仅仅因为在旧制度下只要拥有“带有国王封印的信”他就可以这样做。因此，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国家对家长制是全力支持的，旨在帮助他们维护家庭秩序。政府这样做的条件是由法国《民法典》第1卷第9章第375至382款规定的：“在慎重考虑的前提下，对孩子行为不满的父亲允许向当地法院即区法院提起诉讼。”不满16岁的孩子可以最多囚禁1个月，16岁至成年最多可以囚禁6个月。正式手续非常简单，就像保证不说粗话一样，不需要书面材料，除了逮捕证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而逮捕证上也不必说明逮捕的原因。如果孩子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再次犯科”，那么可以再次下令拘捕。为了让贫穷家庭也能享受到这一“服务”，法国于1841年和1855年先后两次同意，如果某个家庭无力支付抚养囚犯的有关费用，国家可以出资。作为家长惩罚的牺牲品，孩子的待遇与少年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经过审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亲不愿将孩子领回，那么可以将其囚禁至成年。

精神病患者和低能儿没有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在1838年的法律规定下，可以应他们家庭的要求将这些孩子拘禁。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在此处也得到了肯定，从“西里里的克莱芒斯”这一故事中便可

摄影术进入家庭内部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人们必须在每天生活的环境中摆出姿势。照片中相对空白的背景反映了20世纪早期追求家的舒适感的观念。

以看出。克莱芒斯是爱米莉的姐姐，她们家费尽力气才将她从禁闭中解脱出来。19世纪禁闭“疯女人”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据雅尼克·里帕的统计，妇女精神错乱的案件从1845~1849年的9930起发展到1871年的2万起。在这些案件中，80%是应男人的要求执行的（1/3是她们的丈夫，剩下的是她们的父亲和雇主）。不错，妇女提起委托诉状的情况要比男人多一些，这些诉状大多是用来维护家庭秩序的工具。

权力

父亲的权力具有双重性。他完全控制着公共场所，独自享有政治权利。19世纪，政治是男人的专属堡垒，吉佐甚至建议，在女人的保护区即高级沙龙内不要谈论政治事件。19世纪末，共和党人在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伯爵夫人的沙龙聚会，冈贝塔曾要求她在一天之内不对妇女开放，以便讨论严肃的事情，伯爵夫人照做了。

父亲的权力主要在家庭之内、私人领域内，即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个领域也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由妇女独占。男人是主人，首先体现在支配金钱的权力上。在资产阶级家庭，他控制着开支，将妻子的零花钱限制在一定数目之内，通常仅仅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善良的卡罗利娜·奥尔维耶不会明白，为什么她丈夫在普法战争和国内分裂时期（1871年）会为一件衣服的花费大惊小怪，而这件衣服是她唯一的支出，因为她“希望能够体面一些”，这正是她所应尽的责任。即使是最慷慨的男士也会在开销的控制上行使权力，这在维克多·雨果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出来。出于对家族完整性的考虑，雨果拒绝给那些想逃跑的人路费，而且特别警惕他的妻子和完全依靠他的女儿阿黛尔。他抱怨说自己就是家里的出纳员。但如果情况反过来又会如何呢？在城市里父亲的财政权里要小一些，在这里工人和店主的妻子赢得了许多人垂涎的“家庭财政部长”之位。

主要决定是由父亲做出的。在经济领域，他的权力甚至还增加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北部，资产阶级妇女在管理家庭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簿记员、秘书甚至是像梅朗尼克·波雷一案中的工厂经理。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她们退回到家中，与工厂没有了任何关系。

涉及到教育尤其是儿子的教育及婚姻问题时，决定都是由父亲

做出的。马丁·纳多的母亲认为儿子不必上学，因为她想尽快让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父亲在这个稍微显示了一点开明的案例中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许多婚配是由父亲们做出的，而深受莫里哀喜剧影响的母亲们则站在了满眼泪水的女儿一边，比如雨果夫人在与雨果的奋战中便站在了阿黛尔一边。

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决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和推理做出的。与女人的种种特点——虔诚、不可思议、多愁善感、容易感情冲动、疯疯颠颠——相反，男人、父亲应该时刻保持理智。以此为由，康德、孔特和普鲁东将父亲置于家庭之首，因为家庭太重要了，不能交给软弱的女人来处置。

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有权监视妻子的交际、访客、旅行和信件。19世纪末，对于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争论，争论暴露出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发展程度及其局限性。实际上，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妇女的通信隐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员还反对试图行使这项权利的妇女。1887年3月，《时报》要求读者就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了收到的众多来信。亚历山大·小杜马是一位坚决支持丈夫对妻子行使权利的人，他声称，“一位丈夫如果对妻子表示怀疑却犹豫是否打开妻子的信件，那就是蠢猪。”一位牧师还引用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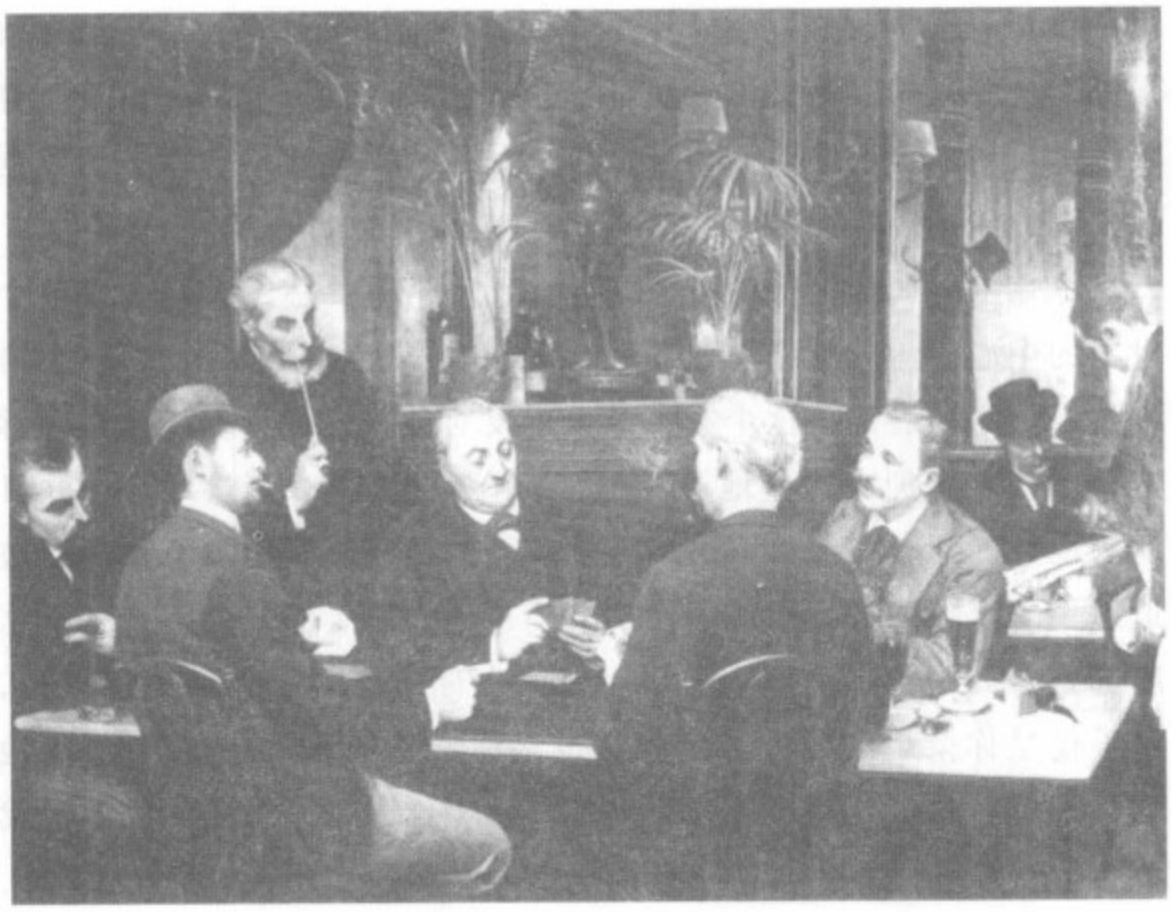
裤子是男人的专利。因为这个女人穿了裤子灾难降临到他们夫妇身上！这个可能被蒙蔽了的丈夫提醒他跪着的妻子：谁才是一家之主。此图是一个古老主题的世纪末变奏。

会学说："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普雷藏泽在法律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提出了了一种更为巧妙的观点。而朱利埃特·亚当和佩尔布吕娜夫人则明确站在自由这一边，但也有一些保留。亚当认为，日常生活与法国《民法典》是互相矛盾的，女人可以"为获得自由不顾法律约束"，可以"与母亲、姐妹、女儿和朋友通信"。佩尔布吕娜夫人强调，法理学家的逻辑"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限制妇女在婚姻中精神自由的法律得以确立"，因此，这项法律需要更改。1897年，图卢兹上诉法院代理检察官在法庭年会上重新审查了双方观点，结论却是：丈夫的权力是合法的，大多数妇女乐意服从配偶的意愿从而得到保护。在判例法中，这个问题也具有很大的争议，其中一个涉及私人信件的保密问题，因为私人信件是不允许给第三方看的。这种保密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私人信件的接受方死亡，那么发信方可以要求退回信件。法官面临的问题就是判定丈夫是否应被视为第三方。

父亲的家

虽然男人经常不在家，他仍然控制着家中的一切。他有自己的房间：吸烟室，台球室——那是他们吃完饭后说话的地方，图书馆——因为书籍和对书籍的爱好仍然是男人的事情，办公室——孩子进去时没有不胆颤心惊的。据龚古尔兄弟称，圣伯夫只有在二楼书房，远离一楼唠叨不停的女人时，才感觉是真正的自己。即使是职业妇女在家里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是公共场所在私人空间中的延伸。1897年，波利娜·海格吕-热尔高马尔成为了一家幼儿员的巡察员，当她丈夫朱尔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做着白日梦时，她却在餐厅桌子上整理文件，这让她的儿子疑惑不解。

在沙龙里，角色进行了划分，位置也做了标记。康德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定义。在维克多·雨果的沙龙里，男人站在房间中央，妇女则环绕坐在男人周围，这可以称为当时的典型样式。男人在选择房间内部装饰时会比一般人想象的花更多的心思。根据有关礼仪的规定，当一位有教养的男人准备结婚时，他会和未来的岳母一起为新家选择家具。朱尔·费里"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花了很大篇幅诉说他希望将来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结婚后的新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窗帘和地毯的颜色"。费里是个纯粹的恋偶像癖，他教妻子如何穿着、选购帽子以及利用她的天然美貌。男



19 世纪，男士们在俱乐部、咖啡馆和台球厅聚会休闲，这些地方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女士都不会涉足的。

左图：《马尼拉的咖啡馆》，1889 年。

下图：阿米德·于连·马塞尔-克莱门特：《台球厅》，1900 年。

人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家庭中对女人显示出了优势。富裕男人就是伟大的收藏家，他们的家里放满了各种收藏品，充满了富于创意的想象。对于他们来说，内部装饰不是用来加固巢穴，而是用于创造一种形象的。

维克多·雨果梦想的家就是他那个世界的中心，因此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流放到格恩西岛后，他购置了奥特维尔庄园，并亲自购买、洗刷和装饰了这个家。他妻子反对他这样做，对她姐姐倾诉道："我不想拥有这些地产。"阿黛尔喜欢旅游，喜欢城市，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束缚以及她的孩子将会因没有玩伴而被迫忍受的孤独。"我承认，你的名望、使命感、品格使你选择了这座你置身其中备感荣耀的房子，我明白你的家庭因你而光宗耀祖，它不仅是你荣耀的牺牲品，而且也是你形象的牺牲品，"1851年她在给维克多的信中写道，"我爱你，属于你，也愿意服从你，但我不能做一个可怜的奴隶。有些情况下人是需要自由的。"作为家长，父亲像一尊神龛里的上帝塑像一样坐在那里。

雨果被儿子称为一个"温和的暴君"，但也可能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父亲之一。可以说他具有父亲所有的物质与精神印迹：慷慨而专制、虔诚而强大。此外，他也表现出了所有资产阶级男性所具有的愚蠢、渺小和人们所说的恐惧，同时还显示出了自私和残酷，他宁可将自己精神错乱的女儿送进私人疗养院，也不愿忍受她待在家中给家庭带来的耻辱。说到他女儿，他这样写道："不幸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亨利·吉耶曼则称，他似乎希望不幸能够降临一次，如果父亲的名誉受到损害，他的权力就可以达到杀人的地步，而在这种情况下，"杀害父亲"不再仅仅是一种书面符号，而成为生存的一种必要手段。

19世纪出现了许多高高在上、专横的父亲形象，许多具有创造力的男性将他们的家庭变成了工作室，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则成了秘书，这样的例子包括普鲁东、埃利塞·勒格吕以及马克思。从马克思与他的女儿以及他女儿们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家庭生活的情况。她们崇拜他，他是一个体贴的父亲，但当涉及到她们的婚姻和职业时，他便会露出专制和爱管闲事的一面来。埃利诺尔事实上是被迫放弃舞台生涯，并宣布断绝与利萨加雷的关系，转而与阿韦林定婚的。她父亲比较欣赏阿韦林的社会主义倾

向，但阿韦林最终背叛了她。埃利诺尔与疾病缠身、不理解她的马克思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后，加入了为自己父亲的名誉与欲望而献身的一群年轻女子的队伍当中。然而，通常就是这样的父亲为年轻女子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因为他的权力是男性权力中的最高形式，这种权力行使的对象包括任何人，但主要是那些弱小、受支配和受保护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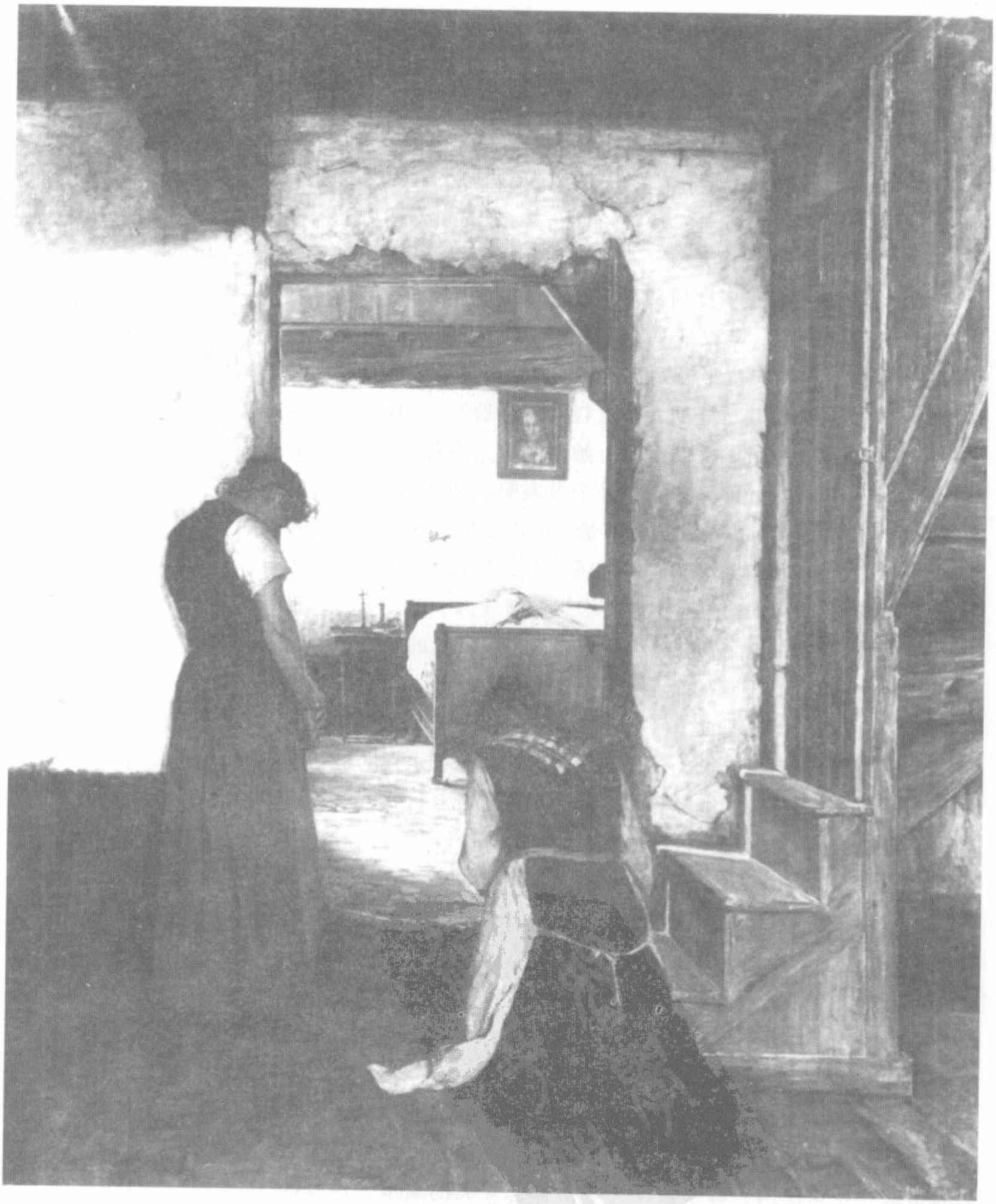
父亲形象是新教、犹太教、无神论者以及天主教文化的一部分。强大的父亲不仅是资产阶级独有的现象，也是整个社会的现象。对于普鲁东来说，父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他将父亲身份解释为一种荣耀。作为一位年轻男人，他认为获得一个孩子的方式就是“向一个本来会将其诱奸的女子支付金钱补偿”。在41岁时，他与一个27岁的工人阶级妇女结了婚，她“简单、高雅、天真”，全身心地工作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是个最温顺的动物”，他在街上看到她并给她写了封可以称之为标准情书的求爱信。他选择了他的妻子，用以代替他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会结婚”，然而，“我没有爱，只是幻想有个家，幻想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我的妻子给我的礼物是三个女儿，金色的头发、粉红色的脸蛋，由她们的母亲照顾，我心里想的全是她们。”他继续写道，“父权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了满足，”这就“像是我存在的放大，像是不朽”。

对于无产阶级男性来说，父权是使其财产和名誉永存的最基本方式。用父权和男子气来解释男性荣耀的那种传统乡村式方法被工人阶级沿袭，这种传统解释帮助塑造了他们的身份。

父亲去世

在私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中，父亲去世是最为重大和意味深长的，也是小说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一幕。临终之时已经不再是男人表达最后遗愿的时刻，而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一幕也是最后告别、权力移交、大型聚会和宽恕调解的时刻，同样也是新的仇恨的源泉。

母亲则要小心谨慎地死去。丈夫已经去世，她独自一人，年老体迈，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一般来说，她无权掌管房产或储藏室的钥匙。在热沃当，母亲被视为是由自己丈夫的继承人供养的人，而这位继承人在给她和她的其他孩子提供食宿时可能会显得非常吝啬。



朱尔斯·博奎特：《哀悼》。19世纪日渐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得死亡成为一件比以往更加重要、悲痛和私人的事。许多男人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留下妻子独自守护他们的回忆。

当一位父亲即将死去时，他“将孩子召至床前”，就像是神话一样。在里尔，卡罗利娜·布拉姆亲眼见到了被人称为“好父亲”、一个王朝的建立者老路易斯·布拉姆之死。长期不和的兄弟们聚在布拉姆床前。卡罗利娜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幕：“‘好父亲’亲吻了我们，然后将我父亲和叔父叫到身边，给了他们几本书，吩咐了一些公务上的事，推荐了他的一些奴仆。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之感。”普鲁东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木桶匠，死时却选择了一种高贵的方式。他邀请亲戚和朋友来吃饭，饭后向他们道别：“我想在死去之时有你们陪伴在我左右。现在请给各位上咖啡。”

刻有“致我们的父亲”的纪念章。

对于所有家庭来说，父亲去世都是经济和感情上的一次打击。正是这件事使这个家庭瓦解，使其他家庭得以形成，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此在一些家庭中，有些成员是渴望父亲死去的，因此法律对弑父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是一种该受天谴的行为，宣判无罪几乎不可能，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从而给家族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然而，除了谋杀，还有许多种杀死父亲的方式，包括孩子自己神经病发作。萨特就将福楼拜的病看作是“谋害父亲”，因为阿希尔-克莱奥法斯想让年轻的居斯塔夫从事律师业。“居斯塔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因为根据预言即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的意愿，他已经是一个公证人了。”萨特继续说道，“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就是父亲本身，就是内心的超我，这使他变得软弱和消极。”他父亲的死使他摆脱了无法承受的重负。就在他父亲埋葬后，他宣布自己的病已经痊愈，“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像是将疣消除掉一样……终于解脱了！终于解脱了！我要去工作了！”

父亲去世是19世纪早期连载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家庭结构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父亲去世也是儿子成熟和娶妻的唯一途径。

废除设立遗嘱的权利被勒裴称为对父亲的谋害，但这项新制度允许并鼓励分割财产，从而使父权制土崩瓦解。在那些家族势力庞大的地区，这项新制度被视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而遭到抵制；而在其他地区，如法国中部，则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称之为一大进步。1907年，埃米尔·吉约曼公开指责旧式家族是“父亲对孩子的一种剥削”，并希望能够永久禁止这种虐待。即使在奥克文化仍然

存在的地区，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在整个19世纪也曾一度加剧。

随着19世纪的推移，父亲在法律上的特权也在非常缓慢地消失，这种消失一部分是因为妇女和儿童的呼声不断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渐渐加大了介入的程度，尤其是介入贫穷家庭的生活，理由是父亲无法提供某种关键性的需要。1889年针对无能力父亲的法律以及1898年针对虐待孩子的法律使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目的在于保护孩子的利益。1912年制定的法律是自1878年多次立法以来的极致，它赋予妇女出庭证明亲子关系的权利，其范围不仅包括诱拐或强奸，还包括“欺骗性诱奸”(这种情况还可以提交书面证明)。该项法律的拥护者——慈善家、立法者和神职人员——表示对未婚母亲和被遗弃的孩子坚决支持。

法律对妻子不断增加的支持表明丈夫的权力正在减少，同时妇女还具有离婚和分居的权利（1884年赋予），而大部分离婚都是应妇女的要求而出现的。对案例法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例如，夫妻分居后，如果孩子由父亲监管，外祖母探视孩子的权利就是一个问题。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父亲一直不允许外祖父母探视孩子。1867年，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满足了外祖母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孩子的利益”。

但是这项法律只是同意施加一些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最终导致家庭发生转化。托克维尔19世纪早期在美国看到的那种以自由婚约为基础的民主家庭并非是现代社会自然的和革命的结果，而是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又刺激产生了新的欲望。

婚姻与家庭

作为家庭的熔炉，婚姻是人类学和人口学研究的焦点，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研究结果。安娜·马丁-菲吉埃将在下一章介绍婚礼，之后阿元兰·科尔班将讨论感情在家庭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以及对情感和性满足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19世纪婚姻的几个重要特点上。异性之间互相爱恋的夫妻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准则，这条准则排斥同性恋和独身生活。19世纪的特点是以婚姻为焦点，婚姻具有数不清的功能，它既是一项战略联盟，又是满足性需要的工具。用米歇尔·

福柯的话说，“家庭是性欲与婚姻的交换媒介，它将法律变成了满足性欲的工具，使快乐与炽热的情感被婚姻的重重规定所束缚。”交换费率视情况而定，但资产阶级是幕后主导这项交易的人：肉欲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婚姻与欲望并非总是一致，其实是相去甚远，二者之间的冲突通常是导致一幕幕家庭戏剧与婚姻悲剧的根源。婚姻悲剧越严重，就越需要疏导或抑制欲望。当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时，人们开始反叛既定婚姻，因为它是许多浪漫戏剧与无数激情罪恶的根源。

19世纪婚姻的这些特点在人口统计数据中得到了反映。一般来说结婚率是比较高而且稳定的（大约千分之十六），只有两个时期例外，一个是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个是在1875至1900年之间。后一种情况使人口统计学家非常担心，他们认为是由出生率下降所致，于是发起了一场反对单身的运动，但实际上当时的独身比例非常低，50岁以上的人中，男性中只有10%，女性只有12%未婚。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人口统计特点就是结婚年龄下降。在传统社会中，晚婚是避孕的主要手段。普鲁东声称，他的祖上就是“尽可能晚地结婚”。他虽然意识到了这对于性的影响，但仍然支持晚婚。

老套的结婚照保留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忆。（照相馆背景）

梅尔上尉于1908年创建了大家庭父母联盟，以促进生育，因为国家的出生率降得太低了。至少有4个孩子的父母才符合该联盟的会员资格。该联盟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立法来保护和帮助那些代表国家未来的人”。这张照片中的梅尔上尉显然已将其鼓吹的想法付诸实践。

在19世纪，早婚成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对于避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尽管避孕方法仍然没有什么进步）；第二，财产不多但足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这种观念已经为人们所接受，于是考虑早婚的人便多了起来。

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甚至资产阶级也想尽可能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在文明世界，”泰纳写道，人们的主要需求就是“一份工作和一个家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也是逃离父权、独立生活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女人，她们也开始寻找年轻、称自己心意的丈夫，而不愿与一个白胡子老头结婚。对于祖父杜邦·德·弗朗居西尔与祖母相差几乎40岁，乔治·桑德感到惊愕万分，而她祖母却有一句精彩的回答：“是大革命将老年人带入了这个世界。”温和的卡罗利娜·布拉姆对这些习俗表示了不满，在参加一个“新郎与新娘年龄相差一倍”的婚礼时，她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婚姻。”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年龄与她相仿、年仅19岁的小伙子，对此她的家庭并不赞成。

事实上，平均比例与价值取向在以家庭结构为主要因素的领域

内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所描绘的情形很有说服力："早婚比例是社会对年轻人实施控制的指示器……晚婚暗示着专制的家庭结构，这种结构产生出大量单身汉，他们一生的身份都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在他们已婚兄弟姐妹的家中则是永远的叔叔。"1830年，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巴斯克地区、萨瓦和阿尔萨斯，妇女的结婚年龄都比较大，到1901年则有所下降。马尔萨斯学说在天主教地区盛行，因为教会在控制生育方面更倾向于晚婚。

正确选择配偶是家庭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族通婚甚至近亲结婚在各地和社会各阶层都非常盛行，其中部分原因可以用社交类型来解释：人们与同族结婚是因为将其视为正常的生活程序，人类繁殖（即皮埃尔·布尔迪所指的那个意义）就是这些程序的自然结果，这些程序虽然在操作中是确定的，但不应该妨碍个人以各种方式服从或反叛的自由。

由于移民，古代乡村地区曾经一度盛行的近亲结婚在19世纪减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约束。19世纪早期，阿韦尔格纳和利穆赞在巴黎与乡村之间定期来回往返，他们在城市里同居，却在乡下结婚。马丁·纳多也是这样，他在乡下结婚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吸引力（一个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着迷），一部分是因为他必须小心谨慎地服从父亲的意愿。

因为比女人有更大的灵活性，男人可能是放松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假设被马丹·塞加朗对厄尔省弗雷维地区的研究所证明（参见下表）。

弗雷维地区本地居民之间的结婚情况（%）

时间	男人	女人
1753~1802年	63.0	86.0
1853~1902年	41.9	89.2

早在19世纪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动便逐渐增多，无数人口统计学研究（如甘冈、波尔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区）显示，与其他城市的人结婚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区变成了一座乡村。在19世纪的贝尔维尔，"男人和女人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内相遇并结婚"，不拘礼节的亲密代替了社交生活，传送眼神、互相交谈和打情骂俏打破了旧式礼仪。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团体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规则便是同族婚配，如鲁昂从事棉花贸易的新教实业家族合在一起，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团。在简瓦丹，婚姻要遵循严格的规则，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财产、嫁妆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实行。将来要继承遗产的儿子与年纪较小的女儿结婚，而带有嫁妆的姐姐则与小儿子结婚。

工人也要遵循这种交换原则。在里昂地区，玻璃厂、绸带厂和金属制造厂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内寻找结婚对象，结婚时邀请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与私人生活互相影响，与职业、家庭及地区紧密相连。这种“同族婚配”制在圣夏蒙的绸带工、吉沃尔的玻璃工以及巴黎圣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技术和激进的政治传统都是代代相传的。

在社会流动性不大的团体中，人们对等级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玛丽是一个19岁的手套工，来自上维埃特省的圣朱尼昂，她的住所对面住着表哥，一个割羊皮的皮革工，这在手套制造业中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据一个研究玛丽家庭的学者称，在这两位年轻人当中“根本没有浪漫”可言，“因为在工人的等级中，玛丽要比她表哥低上许多，根本不可能考虑婚姻”。

这些人对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妆非常敏感。勤劳的仆人和工人对于能够当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来自里昂的诺贝尔·特律甘这样的年轻工人，则省下钱来支付账务或者用来做生意。女人在下层阶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储蓄机构。

不可能的婚姻

1828年，《争论报》报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发的犯罪。一个年仅19岁、来自裁缝家庭的女工被一个20岁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着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她父母开了个会，认为这个年轻人既不真诚，也不能干，因而不能娶他们的女儿。她父亲不喜欢年轻人的长相，“他长得不像一个裁缝。”女孩后来作证说，“从外表来看，我认为我挺喜欢他的，但既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我就拒绝了他。”遭到拒绝后，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的愿望被这个家庭钢铁一般的意志阻挡了。许多19世纪的犯罪案例都是因为不可能的爱情而引发的。

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来说，合适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战略谋划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当中不太明显，他们都寻求与他们地位之上的人结婚。例如，邮差不愿与同事结婚，因为他们在梦想找一个不必工作的妻子。许多女邮差终身未婚，因为她们反过来也不愿与体力工人结婚。对于妇女来说，独立的代价通常就是孤独；而对于一个正在向上爬的男人来说，金钱并不比女人的阶级、声望、家庭主妇的资质甚至美貌更重要。夏尔·波瓦利被爱玛所吸引，因为她打着一把阳伞、皮肤白皙，而且像一个“城市小姐”，受过“良好教育”。他很有钱，能够给漂亮妻子雇一个女佣，以免除她的家务之苦。

婚姻是由亲戚（比如做媒的姑妈）、朋友、牧师和其他人进行的一场谈判，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大约1809年，一个来自洛泽尔省、身无分文的贵族让他姑妈帮助寻找妻子，他在给她的信中列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拥有一份遗产，数额要足以使他保住门德的房产和乡间豪华别墅。如果对方地位与他相同，需要10万法郎，但“如果地位低于我，那她的财产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补偿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随着年代的推移，婚姻战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财富表现出多种形式：现金、财产、生意和“前程”。同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名誉、职业（自由职业非常受重视）、阶级和美貌。一个富有的老人会寻求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结婚，女人为了吸引男人则通过她们的容貌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需要现金的男人可能会接受一位拥有财产的未婚母亲，比如像马尔泰的女主人公。

爱情与婚姻

黑格尔所担心的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所反对的情感这时也进入到了婚姻当中。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战略婚姻与爱情及幸福统一起来，这也是爱玛·波瓦利的梦想，“如果她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伟大而坚定的意志之上，那美德、爱情、性感和责任感就会集于一身。”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生活唯一的希望，这些影响尤其深远。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权力》的作者，1833年）就呼吁年轻女孩的教育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她们“一无所知，甚至连男人长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批评婚姻是“合法

卖淫”，宣扬自由选择伴侣、“进行肉体对肉体的试验”的需要以及拥有通奸的权利。由于过于超前，德马尔最后自杀了，她的支持者、圣西门的信徒将其学说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本宣扬母性的小册子。

奥罗尔·迪潘没有这么激进，此时她还是迪德旺夫人，她在1825年11月15日给卡齐米尔的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对于他们彼此间的误解和兴趣的不同看法：“我知道你不喜欢音乐，于是我便不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一听到钢琴声你便会抽身离去。为了显得亲切谦和，你给别人念文章，但念不了几句你便觉得没有意思，打起了瞌睡……我开始觉得我们之间的兴趣从未有过一丁点的相同，对此我伤心不已。”

波德莱尔同样梦想夫妻能够具有共同爱好，但他没有结婚。在与让娜同居14年之后，他们分手了，在分手那天他感叹道：“当我看到一些美好的事物、美丽的风景或者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在想，‘她现在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呢？她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欣赏这儿的美景或和我一起买这件东西呢？’”（1856年9月11日给奥皮克夫人的信）

男人想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同意，即使不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妻子，至少也要是一个可人儿。某些男人甚至想找一个能与他们不相上下的妻子。米什莱就劝告男人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妻子”，朱尔·费里则强烈支持男人和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空间，但他对于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的婚姻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共和党人，有哲学思想。她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我有同样的观点，而我也为能与她有同样的观点而感到自豪。”（1875年9月7日给朱尔·西蒙的信）

欧仁妮·布瓦勒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完美地表达了这对共和党夫妻的新理念，即思想自由、从里到外渗透着罗马斯多葛学派的观点，以及虔诚地信奉婚姻和谐：“当我听到人们说‘婚姻……就是奴役！’时，我大喊：‘不，婚姻是宁静，是幸福，是自由。通过婚姻，一个人（我是说男人和女人），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便可以达到真正的独立，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具有独特的人格。’”（1873年3月24日给玛丽的信）他的雄心是要达到完全一体化，从而在婚姻中实现自给自足，“不要让任何其他人进入我们的私人生

活，进入我们的思想。”丈夫变成了妻子的知己，“我强烈希望你不再寻找其他知己，除了你丈夫外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因为你丈夫就是你的知己，我敢说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家庭生活：女人的复仇？

一般来说，女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但她们也得到了某些补偿，以便使其顺从目前的处境。她们相对来说是受保护的，法律上处罚的女人要比男人少得多。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就是保持容貌美丽，因而雍容华贵，具有迷人魅力。此外，女人的寿命也比男人长。她们可以采用多种做事方法，尤其是个人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康德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个人权利——作为一个人的女人——与婚姻中的主人本质上所享有的帝王式的权利之间的矛盾。他的回答是“拥有真正形态的个人权利”。女权主义者以法律为掩护攻击这个漏洞，教会和国家则用“社会母性”作挡箭牌发起攻击，但是日常生活又暗示着什么呢？

乡村社会

马蒂娜·塞加朗、伊冯娜·韦尔迪耶、阿涅斯·菲娜以及其他人在阐明法国乡村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塞加朗就不同意19世纪旅行家阿贝尔·雨果悲观而粗略的描述，而是强调，在公众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家务活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她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两性之间的和谐与平静。

伊冯娜·韦尔迪耶则描述了来自勃艮第的米诺的性格及其文化角色，她认为这些是根植于其“生物学命运”当中的，“从一个女人的生物学命运来看，这仅仅是她社会命运中的一个短暂停留。”女仆（通常在洗衣店工作）、裁缝和厨师在乡村生活中掌握着知识与权力，她们根本不可能被关在家中。

阿涅斯·菲娜则分析了母女和男女关系对一位新娘的嫁妆有什么影响，以此为基础又继续研究生物学现象是如何通过象征手法来适应社会现实的。

这些描述具有永久的价值。这种文化中的平和极易掩盖紧张与冲突，伊丽莎白·克拉弗里和皮埃尔·拉梅宗便认为这些紧张与冲突

克劳德·莫奈：《午餐》，1868 年。注意画家要表达的宁静与从容。

玛丽·路易丝·麦克莫尼丝：《花园游》。中产阶级妇女带着孩子和仆人在花园游玩，注意麦克莫尼丝描绘的梦幻般的气氛。

集中在工作上。在旧式习俗中，女人的交换是严格按照财产交换原则进行的，妻子经常遭受毒打，而且不允许拥有食品室的钥匙，有些妇女为了活下去被迫去偷窃。女人的尊贵通常都会被婚姻和对男人的恐惧破坏殆尽。非法怀孕将会受到严惩，未婚妇女的命运尤其艰难。寡妇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因为她们肯定是性欲旺盛的人，因此有时会被赶出家门，带着仅有的一点用具和救济品被迫住在茅草房内。年轻女人经常是老板的猎取目标，经常被自认为是在表现男性魅力的男人所强奸。“强奸成了男人对待女人的正常方式中的一种派生形式……惩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两性标准导致了一系列后果：暴力、失落和死亡。”那么这种对女性的残酷迫害，是否来源于一种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继承财产复杂亲缘关系体系呢？此外，中央高原东南部地区此时还经常发生宗族间的仇杀事件，血案也是屡见不鲜。乡村生活平静与暴力这两种状态的鲜明反差可能是资料来源不同所致：有的是习俗与尽人皆知的事情，有的则是与冲突有关的法庭文书。

中产阶级家庭主妇

城市家庭似乎比乡村简单得多，但也因社会等级和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一些变化。从家到工作场所的距离是判断家庭生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博尼·史密斯对法国北部中产阶级妇女的描述中清楚地看出来。19世纪上半叶，这些妇女参与家庭事务，拥有书籍，而且还投资实业，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种传统却销声匿迹了，只在一些年老的寡妇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痕迹。19世纪50和60年代，大部分妇女都从生意场退了出来，返回到家庭当中。这些家庭由于劳资关系发生变化而有了不同。种植园主不再住在工厂围墙内或种植园大门附近。当这些人变得富有时，他们便离开臭气熏天、烟雾缭绕的贫民窟，转而搬到城市的新区，例如鲁贝的巴黎大街建有一些华丽别墅——真正的“城堡”，工人在罢工期间便来到这里嘲笑起哄。妇女现在掌管着家庭事务和一大群佣人。

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家庭道德，其主要原则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信仰高于理智、慈善高于资本、繁殖有理。繁殖为孩子众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赋予了价值：在1840至1900年间，每个家庭孩子的平均数量从5个增加到了7个。所有事情都显得非常重要：从清洁到内部装饰、按时祈祷（参见德韦里亚绘制的《一日生活》）；从女人最细小的事情到管理家庭账务，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必须用丈夫授予她的权力管理好，同时还得向她丈夫汇报每一项具体开支的情况。每一项细节都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比经济本质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一个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种语言，一种仪式，要遵循严格的规则。这些北方的中产阶级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既不悲观失望，也不听天由命，相反，他们试图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转变成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通常都是非常武断的。这种看法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的女权主义”（这能算是女权主义吗？如果女权主义是指要求平等，那就不能算，因为这里所说的与女权主义是两回事），这样声称的人是一些小说家，如《现实生活》的作者马蒂尔德·布尔东，以及朱利亚·贝库尔、若斯菲娜·戴高乐，她们写了本家庭史诗，诗中展现善与恶、女人与男人间的互相斗争。男人对权力与金钱无休止的欲望带来了混乱与死亡，家庭中的天使、金发碧眼的善良女主人公使家庭重新恢复平静与安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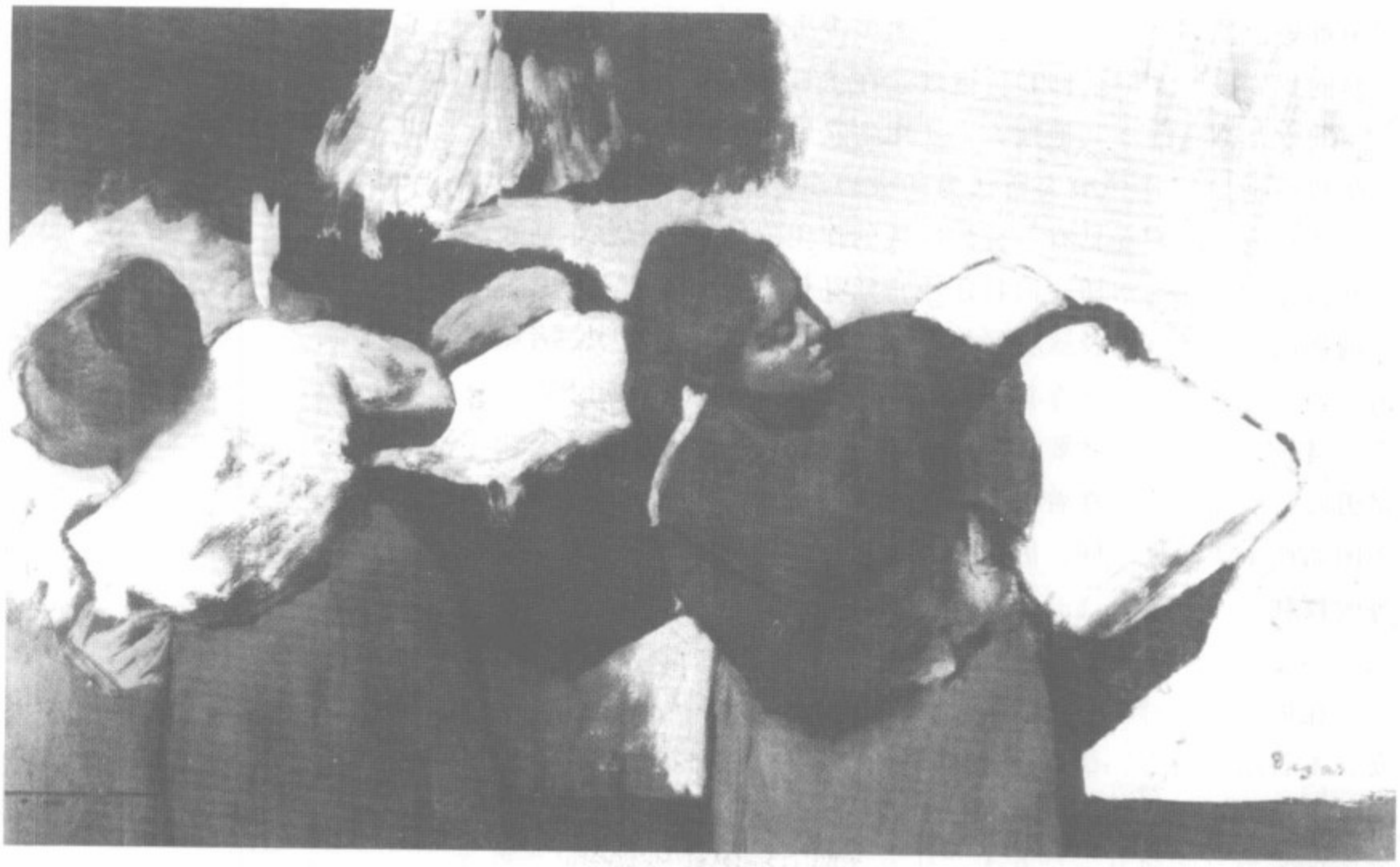
这种完美的家庭生活——带有一丝圣洁的气息，但并不是维多利亚式的，而是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风格——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阶

层中都可以找到。显然，家庭财产的多少决定着佣人的数量、名声显赫的程度以及家庭信仰和价值观。在圣日耳曼郊区，贵族的怀旧情结非常强烈，而在其他地方，实用主义则更受重视，这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得多。一些学者强调一个事实，即有闲阶级妇女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作用：她们的奢侈生活表明了她们丈夫存在的本质，而且还使宫廷礼仪永久保存下来。其他学者则强调家庭经济以及这种经济中主妇的重要性。还有些学者则指出，妇女的权力是建立在孩子以及健康和教育需要的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时使用了母性这个概念。法国人坚决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无疑使法国的女权主义与英国及美国的产生了很大不同，因为英美人只关心女性是否具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操持家务的妇女

在城市平民中，操持家务的妇女是一个重要人物。大多数妇女，不管结婚与否，都在操持家务，而大多数操持家务的妇女实际上都是家庭主妇，即已婚主妇，尤其是指有孩子的妇女。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是需要有一个女人“在家”的。“在家”不一定非得待在家里，因为住宅条件通常都比较差，与其说是住所，不如说更像一个集会场所。操持家务的主妇要履行多种职能。她生养孩子——在工人阶级家庭，尽管也实行生育控制，孩子还是一大堆。工匠和店主的妻子将孩子送给奶妈喂养，但最穷的妇女则自己喂养，喂养时露出乳房，就像多米埃画中的那个女性旅行者一样。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当他们学会走路时，他们便成了她的同伴，孩子与母亲一起外出是一些著名绘画和城市早期照片中熟悉的情景。一些很小的孩子也独自外出，勇敢的“顽童”会在街上和院子里玩耍。然而，慢慢地，母亲便会担心街上的危险，包括意外事故和坏人。于是，主妇的日常生活便会被孩子，尤其是学校的作息时间所支配。

主妇的第二个职能便是照顾家庭，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她要买最便宜的食品，方式有购买、交换甚至是收集，因为即使是在大城市也有许多地方可以捡到吃的东西。她要准备饭菜，如果丈夫在外工作还要单独为他准备午餐。她要打水、搬煤、修房子、做针线活，包括洗衣、缝制和修补。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许多时



埃德加·德加斯：《洗衣女工》。

清洁技术的进步使得清洗亚麻布制品成为妇女的一项主要工作，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洗衣挣钱；同时也把洗衣房变成了一处重要的聚会点。在19世纪的巴黎，洗衣女工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乡下的洗衣妇也是如此。

间。勒裴的家庭预算曾试图计算洗衣的时间，因为这是第一件政府试图减轻主妇负担的家务活，其方式是以第二帝国时期的英国为模板修建机械化洗衣房。

最后，主妇还要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方式是为他人打扫房间、洗衣、办差、送货（如面包，当时送面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摆摊卖货。

逐渐地，尤其是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合乎经济原则的制衣业开始利用这些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缝纫机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东西，许多家庭主妇都梦想能够拥有自己的辛格牌缝纫机，但这种机器将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逛街。由于血汗制度泛滥，制造工厂最终战胜了独立的血汗工厂，因为制造工厂的工人数量较多，管理较好，更容易接受公众监督。

作为家庭的财政部长，主妇拥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权力。大约在19世纪中叶，许多法国工人开始将自己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有时在居民区内可以听到这种与每周发生的交接有关的争吵，但一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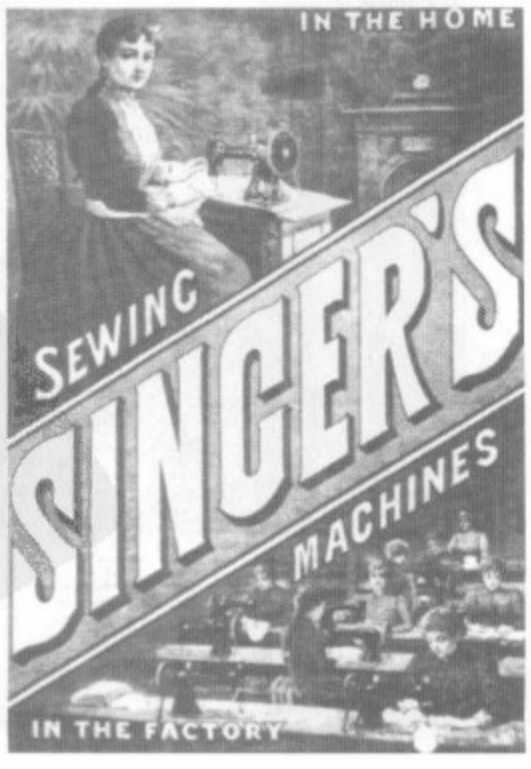
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妇女的一大胜利，她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丈夫的施舍。然而，通过控制家庭的财政收入，妇女担负起了开支的责任。虽然她们有权决定买些什么——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光临，早期的漂亮广告也希望能吸引她们的眼球，但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解决贫困问题，如有必要还要牺牲自己的需要以渡过难关。她们将肉和酒这样的男性食物留给一家之长，糖则留给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说的“缝衣女工排骨”其实只是一块布里干酪。

然而，这种对于家庭财政小规模的控制赋予了妇女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妇也会非常看重。女人还有其他责任，包括呵护身体和心灵。对于工人家庭来说医生是请不起的，除非特殊情况，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现的卫生科学。“穷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议使用樟脑，他注意到女人在卫生中的传统角色，于是常常向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迅速提高，许多母亲都教孩子识字。女人是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即使一些大型报纸想压制人们的想象，女人也不会让幻想消失。教会也迎合妇女的需要，许多人都在享受宗教节日的喜悦和教区温暖的社会生活，过着一种积极的宗教生活，而这当然会与持唯物论的丈夫发生一些冲突。

家庭主妇说话直截了当，通常是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许多人为灵魂自由付出了昂贵代价，成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又越来越程式化。现在还不清楚现代化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力量，因为外部力量正从各个方面蚕食着私人空间，而为工人树立的榜样大多也是男性形象，于是妇女在各种互相冲突的角色中间饱受折磨，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劝告她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法国总工会便有一张海报，宣传英国式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些妇女对于根本不注意她们的工会和政治失去了兴趣。

“在家中……在工厂。”正如加斯通·博纳尔认为的那样，缝纫机是“女性巨大的光荣”吗？缝纫机被广泛用于纺织工厂，为女工们所渴望拥有，也为资产阶级所贪求，但它同时也是女工们背负的十字架。



父母与孩子

19世纪，孩子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

右图：《午夜钟声》。在阁楼里埋头苦干的缝纫女工们焦急地看着墙上的钟。注意图中空荡荡的环境和华丽的布料之间的强烈反差。

下图：玛丽·珀蒂埃特：《烫衣工》。在质地精美的亚麻制品的包围中，年轻的烫衣女工们闲话家常，互相逗乐。

重视。家庭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经济、教育和生活上为孩子进行投资。作为继承人，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家庭本身形象的映射、家庭的梦想及其与时间和死亡做斗争的方式。

这种投资——其中之一便是不断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给予单个孩子的。司汤达就说他父亲“并不是将我看作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喜欢的，而是作为一个必须继承家庭名誉的儿子来照顾的（亨利·布律拉尔）。”在法国，群体要优先于个体，“孩子利益”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即使到那时通常也只是将其用于更高层次的集体利益，将孩子视为是社会存在物。

实际上，孩子不单是家庭的财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明天的生产者、开创者、市民和士兵。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尤其是无力照顾自己孩子的贫穷家庭，一大群第三者介入进来：慈善家、医师和政治家，他们决意要保护、教育和管束这些孩子。法国通过的第一条社会立法就以保护孩子为目的：1841年的法律规定了在工厂工作的时间。虽然这条立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其象征性的和法律上的意义却非常大，因为它标志着从自由正义向社会正义的转变。

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相遇，有时还会发生冲突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还是知识的目标。这些知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由医师、心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发现的，而结果却自相矛盾：它们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却使童年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点。

生殖的秘密

18世纪末，莫厄曾把法国描述成一个很早就发现生育控制“令人苦恼的秘密”的国家，因为法国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实行“计划”生育，但可以进行限制：出生率从1800年的32.9%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统计学家对此困扰不已，于是将生育这种个人行为变成了“出生率”这样一个公众性问题。生育孩子是一种自主行为，但自由程度随地区和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据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称，这种差别是由家庭结构导致的家长意愿造成的。通常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则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响。1861年，有三个出生率奇低的地区：诺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个地区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却各不

詹姆斯·雅克·蒂索：《藏猫猫》，大约 1877 年。在这幢塞满了室内装饰物和舶来品的舒适的英式房屋里，孩子并未受到保姆的约束，反而玩得很开心。

相同。在阿坤廷，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诺曼底，极端行为非常普遍，有许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许多夫妻因结婚25年生了9个以上的孩子而获科涅克奖。勒布拉和托德甚至还谈到了“神经质行为”。

私生子数量的增加使情况显得更加混乱，爱德华·肖特将其称为性解放的标志。而这种情况似乎有多种解释。勒布拉和托德将北部和东部地区与地中海南部进行了对比，在前一地区，许多私生子通过婚姻得到了认同，而在后一地区，男人只承认孩子而不与其母亲结婚。前者体现出两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后者则体现出大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威。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从历史人口统计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了，而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建议性的解释。勒布拉所说的“繁殖秘史”其实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充斥着社会学、生物学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甚至将孩子的出生最终解释成是“父母决定”的结果。另外，在意识形态因素中，个人主义“灾难”也被多次提及，女权主义则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一种极为粗糙的形式。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决定使两性及爱情中最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我们面前。毫不奇怪，事实是难以捉摸的，当婚床的秘密被时间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盖时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无疑，不要孩子的决定来自于一种抚养孩子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人们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顾、娇惯和爱护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减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们无从知晓。有些夫妻除了节制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为了避免怀孕，妇女经常“失足摔倒”。性交中断将决定权交给了男人，他负有“额外小心”的责任。在富裕的家庭，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些从英国或妓院引入的技术，其中之一便是冲洗，这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还产生了妇女洁净器——据说曾因不雅而推迟生产。1906年，自由派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想把生育控制技术教给无产阶级妇女，于是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女同胞们，要学会想做母亲时再做！”并散发避孕套和吸水海绵。他们的宣传经常激怒妇女，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们对这种干预

私人事务的做法极为震惊。一旦发生意外，许多妇女宁可选择流产。流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经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到20世纪之交，流产似乎被作为避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安格斯·麦克拉仁将流产视为社会底层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或者至少也是不愿生产或杀婴的妇女意愿的体现，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国时期则被严厉打击（每年有上千起检举流产的事件发生），于是逐渐消亡了。然而，个别杀婴事件仍然不时出现，主要是一些乡村女佣，她们担心抚养私生子会受到歧视。

尽管生育控制技术在19世纪有所发展，避孕方式的缺点还是使“意外”经常发生。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了，其未来便会面临极大危险，是被惨遭遗弃，还是被接收为家庭成员，只能由命运来决定了。

但是人们还是非常渴望拥有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是他们的角色需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为人父母。对于女人来说，做母亲是生存的原因之一，但男人也有想要孩子的欲望。

新生儿是这个郊区家庭关注的焦点，但他似乎忍受不了初春的寒意。

“没有孩子的女人就是个怪物，”路易丝·巴尔扎克，《两个新娘的回忆》中的女主角这样说道。“我们唯一的天职就是做母亲，”结婚10个月后，卡罗利娜·布拉姆-奥尔维耶在日记中倾诉道：“我伤心的是还没有一个孩子，如果有的话我将会全身心地去爱他，他会使我接受现在的生活。”（1868年1月1日）为了有一个孩子，她不遗余力，包括去医院进行治疗、洗温泉和拜访教皇，教皇的祝福14年后为她带来一个女儿，她为其起名叫玛丽-皮（玛丽·派厄斯），以表示对教皇的敬意（派厄斯是一个意大利教皇的名字——译者注）。居斯塔夫·德·博蒙曾经与托克维尔讨论过妻子的怀孕问题。博蒙非常关心妻子，撰写书籍的事情也放了下来，一方面渴望做父亲，一方面对妻子的痛苦伤心不已：“看到可怜的妻子，有时候我真想把孩子送给魔鬼……然而我却将这件事视为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的全部话题和希望。”（1838年6月10日）与母性情感同时，或许相应地，父亲对于“婴儿”的感情也出现了，即使它还是个胎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渴望拥有孩子的想法并没有使父母去领养别人的孩子，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第二帝国使领养制度化，但这个领域的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家族名字的传承时，还是极为缓慢的。

在家中生产

生产完全是个人——女性——的事情，甚至讨论和回忆这件事的方式也是如此（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手术室就设在家里的床上，或是父母的床上，男人则被排除在外，除了医生。所幸生产已经按照医学程序来进行了，比较富裕的家庭中，越来越多的医生出现在了床边。由于雇用接生婆的费用较低，加上传统习惯，接生婆仍然是主要角色，但其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在医院生产是贫穷，甚至是耻辱和孤独的象征，因为乡村未婚女孩到城市生产之后便将孩子遗弃。勒·布雷和托德告诉我们，在法国西部、西南部和中部，“人们对私生子的排斥把母亲们赶到了医院”。直到一战后，人们才普遍转到医院进行生产，即使在那时，转变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巴黎的一些进步人士，因为妇女们希望能够提高孩子的“成活率”，而当时法国的婴儿死亡率在欧洲国家是最高的。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生产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在市政厅宣布孩子的降生——即为孩子起名，也即康德所说的

真正的降生——是父亲的事情，这个来到世界上的孩子由此进入了家庭和社会。

婴儿

童年在以前被视为一段没有什么区别的时期，男孩与女孩都一样，现在则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童年早期（8岁以前）、严格意义上的童年和青少年。青少年是青春期和性认同的关键时期，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时期，此时加强监护非常重要。8岁时，孩子被视为具有了理智，于是引起了立法者、医师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婴儿（法国直到1880年一直使用英语词baby，之后变成了bébé）直到很久以后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母乳喂养在18世纪的上流社会一度非常流行，而荒谬的是，到了19世纪反而有更多的孩子被送给奶妈喂养，遗弃婴儿的事件也创下了新纪录。到19世纪末，一种新的育婴科学（育儿法）出现了。

尽管幼年时的意识要慢慢地形成，但这种意识到来的迹象却是明白无误、不会让人搞错的。体贴的母亲拒绝用襁褓来包裹婴儿，并会雇用一位英国护士。到19世纪末，每一位好妈妈都在照顾自己婴孩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现在，婴孩已被视为具有完全资格的个体，母亲们总是充满爱意地用昵称提及他们。珍妮和劳拉·马克思都是多产的母亲，由于她们的勤劳生产，子孙多多，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为其中某些先于自己而去的子女哀悼、服丧；她们还会随时向父亲卡尔汇报她们的孩子取得的种种成绩。中产阶级的书信往来中通常会有托儿所韵律诗的风味。母亲们逐渐变得关怀备至，而即使是再体贴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们除了偶尔的一瞥之外绝不会再多看上一眼。加斯蒂夫·博蒙特在他的儿子开始学会走路时对他发生了兴趣，“现在，他已经可以拿着一把木头来复枪跟着我一起去打猎了”——这是学习拳击的开始。

童年早期的性世界

在社会的所有阶层中，照看非常幼小的孩子都是女人的工作。早期童年是女性化了的：直到三四岁，通常会到更大一点时，男孩子和女孩子们都是穿着女童装、留长头发的，他们就这样在母亲或是女仆人的裙子下自由地玩耍。在法国，孩子的卧室是一项迟来的“发明”。1873年，瓦尔雷特-勒-督克为他正在建造的一所房子设计了一间孩子的卧室，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必须为每件事情都做好计

维克多·勒孔特：《生产》。注意男人——丈夫和医生——在生产的圣堂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人在医院里生孩子才成为平常事。在1880年，只有穷人家的孩子和私生子才会在医院里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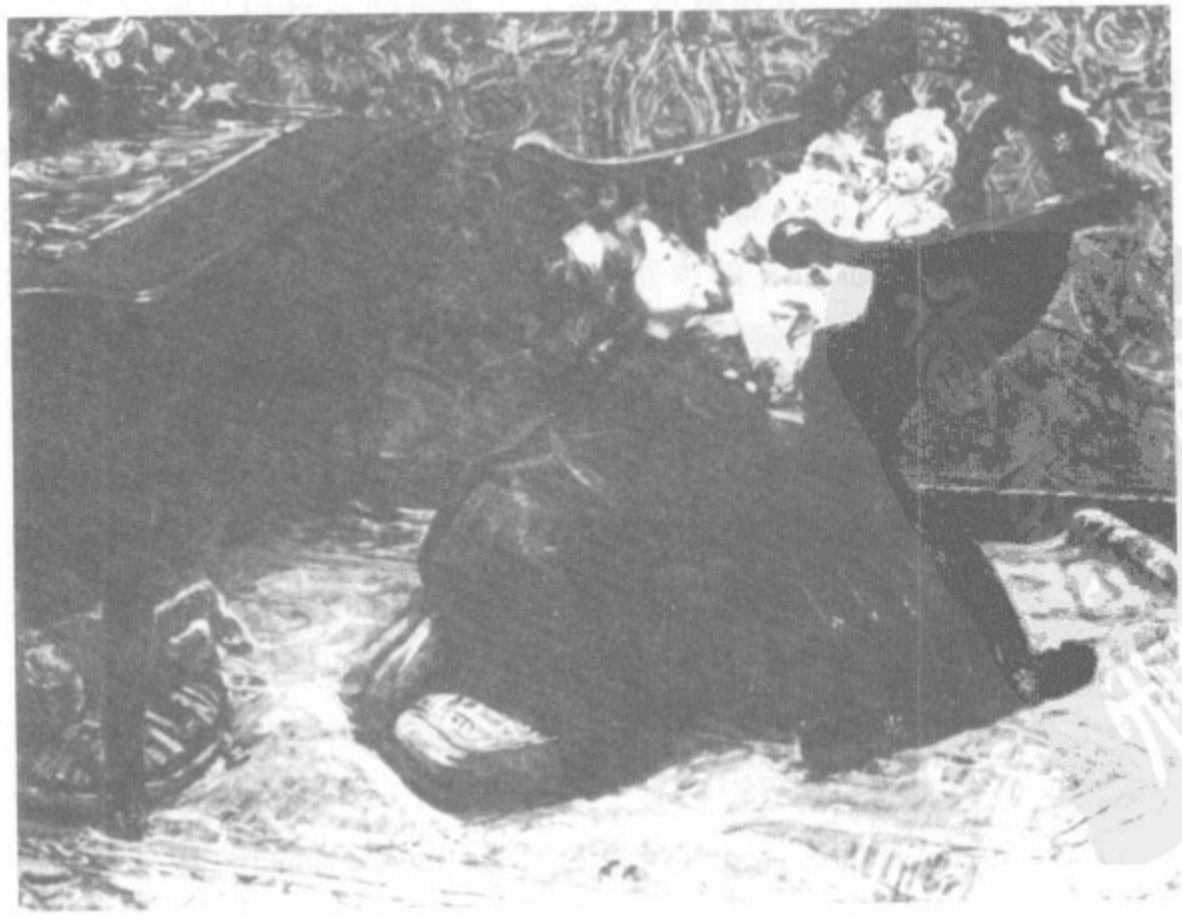
玛丽·路易丝·麦克莫尼丝：《玫瑰与百合》。德尔芬·德·吉拉丹于1840年写道："母性是时代的激情。"在此图中，一位母亲、她的小女儿和一个洋娃娃：在玫瑰和百合散发的香甜气息中三名女性构成了和谐的整体。这一主题，为法国，甚至更多地为英国画家所普遍运用，它是女画家们的最爱。

划"。孩子们的玩具到处都是，厨房里尤其如此（就如这一时期许多油画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城市里，玩具成为了一个消费项目得以大规模地生产，并在百货商店中销售。在乡村的家庭中，工厂制造的玩具还不为人所知；在更为贫穷的家庭中，由父亲们来制作玩具。长久以来，文特拉斯-瓦莱斯始终记得父亲从一块杉木上为自己雕刻出来的一辆四轮马车。在制作这件玩具时，父亲伤到了自己，年幼的瓦莱斯为此被母亲打了屁股，因为她感到需要惩罚一下"被宠坏了的"孩子和纵容的父亲。玩偶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占有重要位置。在19世纪早期，这些玩偶是没有性别类型的，而只是一些木偶，但就在这些木偶身上，孩子们在成为父母亲倾注慈爱的对象之前就已对其慷慨施爱了。关于对木偶的记忆，乔治·桑德在一些书页中进行了令人惊异的描写。

因为面向那些非常年幼的孩子的学校少之又少，早期教育就成

了母亲们的工作。她们教孩子阅读。当孩子们变得更加具有潜在发展价值时，女人们就会更加勤劳地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之中，这使她们在心中升腾起一种欲望：要使自己的教育更加完善。奥罗雷·杜德望正是通过母爱走向了女权运动，“我一直告诫自己，渊博的知识对于我们这个性别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应该追寻美德，而不是字母堆砌的知识，当我们对于‘美好’的研究使我们变得美好而感性时，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反过来，当我们未能走出科学时，我们就会变得迂腐、荒谬，并最终失去所有那些我们因其而被爱的品质。我仍然认为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恐怕我过于在意它的字面意思了。今天，我意识到，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必须得为他准备好更为全面详尽的课程，让他在童年结束之时去接受它们。我需要做好准备，对他进行早期教育，并且我想让自己准备就绪。”（1825年12月21日写给佐伊·勒罗伊的信）

随着孩子的成长，教育的性质就要依他们的性别和社会背景而定了。父亲开始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至少对于儿子们的教育来说是这样的。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有时要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工人阶级的父亲则像是训练学徒或是领导一群工人。一个父亲很少会对教育他们的女儿感兴趣，除非是在某些特定的知识分子当中，而且主要是在新教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在莱克鲁斯家族



布兰奇·德曼彻：《宝贝》。对于一个孤独的小女孩来说，一个洋娃娃就好比另一个人的化身——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1914年美术展）

保罗·托马斯：《良好的教育》，1896年。一位好母亲在做针线活的空隙停下来听她的孩子背诵课文。

中，女儿们和儿子们一样前往德国完成她们的学业，之后，她们可以获得英国或德国家庭的教师或保姆职位。希望出外旅行的女孩们几乎不会遭到反对。基佐督导了他女儿教育的全过程，他写了不少充满关爱的信件，在信中他指出了女儿的拼写错误。父亲的感觉在女儿身上要比在儿子身上更为自由地发展，因为一个父亲在女儿那里是感受不到任何竞争的，而这种竞争他却可以从雄性的对手那里感觉到。关于在父女之间存在的挚爱友情，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当现代的实例，特别是在父亲得到解放而女儿天资聪颖的情况下，或者当母亲比她的孩子思想更为传统时，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珍妮维·勃雷东与她称之为“女王母亲”的那个女人素来不和，但却与父亲关系莫逆，“我们彼此极为相爱。我们始终互相理解，即使是在我们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因为我们俩都是安静的人。”不过，她的父亲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强迫珍妮维把她所有的香水都扔掉，因为他“无法容忍一个年轻的女士乐于闻这些味道”。某些渴望解放的年轻女性反对她们的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而在心中另树起男子气十足的形象。杰梅茵对于其父亲有这样的表述：“当我看到他时，我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是

他和我母亲结合所生。我的答案是‘不’：我父亲一个人就足以独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母子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表现形式。乔治·桑德和她的儿子是母子间建立起挚爱情谊的典型，即使是在青春期期间，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文特拉斯-瓦莱斯憎恶他的母亲要将其塑造成一个绅士的决定。加斯蒂夫·弗劳博特对于其寡居的母亲的感觉则是遗憾，他从未从她那里获得自由。然而，在理论上说来，一个母亲施加于儿子的权力是受法律限制的，例如，母亲不能成为监护人。寡妇是个例外，在这种情形下，她们的权力相对地受到较好的保护，其结果是，儿子们通常要与其寡居的母亲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关于母亲以及她们的家庭权力的想象在反女权主义主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勃雷东写道：“母亲啊！我们重温了浮士德的惊骇。我们被对这些音节纯粹发音的触电般的情感所钳制，这些音节中潜伏着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强有力的女神。”

母亲们对于培养自己的女儿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因为国家通过延迟女性的公共教育而抛弃了她们，或是将她们委托给教会照料，这是一个具有制度性影响的决定，从青春期开始，肉体和心灵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分离。母亲将她们的女儿带入这个世界，神父则引领她们通往道德和上帝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延续女性保守的、可纪念的角色。母亲们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把女儿嫁出去。根据当时的信件，波特-布吉对她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狂热努力，勾画出了一个神经兮兮但却并不夸张的形象，舞会、宴会、钢琴课以及刺绣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在乡村家庭中，嫁妆是婚姻债券的物质具体化和象征符号。艾格尼丝·菲恩对法国西南部进行了研究，突出显示了“母女关系这一漫长历史”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由于与儿子相比，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要更为亲近，也更为依赖母亲，因此对于母亲的缺失或逝去，她们承受的苦楚也会更多。这种苦楚对于家中的大女儿来说尤为严酷，她通常会是代替母亲位置的人选。私人日记有时可以作为母亲不在的一种补偿，就如同我们在卡罗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亲密举止

从城镇到乡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关系有着巨大的区别。农村地区并不鼓励人们去展示慈爱的一面。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权威和自我显示的不同理念影响到了个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选择。在家族内部，我们发现了相互对立的趋势。身体的姿态和感情的表达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只有妇女和穷人才被允许在疼痛和孤独时掉泪。孩子们的语言错误和不良姿态都要受到纠正；他们被告知，要笔直而坐、规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这样的。在许多场合，抚爱被视作是合时宜并对幼小身体的成长发育有好处的。卡罗琳·布拉姆在父亲去世后，尽管很有节制、不失端庄，但仍叹息再也得不到他抚爱的温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后在希腊旅行时，对于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对于法国人的温情所表现出的冷酷作出过评论。

另一个亲密的迹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称呼，这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已变得非常普遍。勒古韦赞许地评论道：“在过去，人们只在与他们的佣人交谈时使用主语的‘你’，而不会与孩子们使用主语的‘你’。而今天，情况恰好调过来了。”在《19世纪的父亲与孩子》中，我们读到：“主语的‘你’应该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有规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时地在孩子身上使用宾语的‘你’，作为不满的一种表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桑德会对其祖母以宾语的“你”称呼她如此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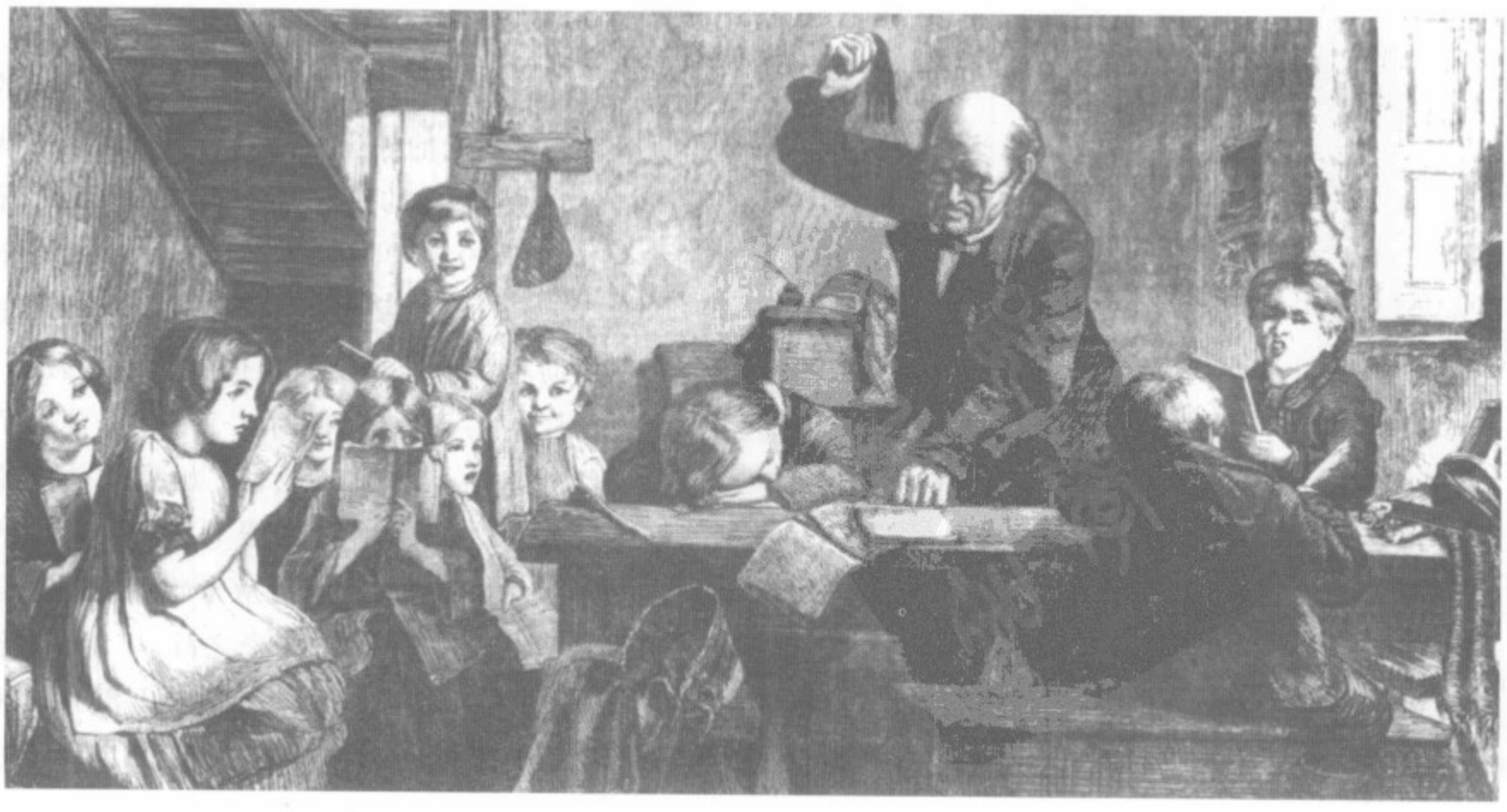
体罚

不仅是乔治·桑德，还有一些像勒古韦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都坚决地反对肉体惩罚。桑德写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样打他们的话，我会（比孩子们）哭得更大声。”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体现出的社会差异也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记住，在一个已然了解并废弃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里，肉体惩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丑行的终极标志。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贵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挨打。尽管仍然可以到处看到手执棍棒严厉的人，但是有越来越多不赞同的声音传递了出来。在宣称强制执行军事纪律的初中和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学校，棍棒是少不了的。乔治·桑德面对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代理人时，因恐惧而战栗发抖，“一个绝

对权威的凶猛拥护者……他会授权一个睿智的父亲去命令他的黑人仆从在整个班级面前抽打他的儿子，班级里的人会按照级别排成队见证这一景观，而他们都被这因为最轻微的不从而受到的严厉惩罚吓坏了。”然而，逐渐地，青少年们开始反抗此类的体罚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莱尔和他在里昂的伙伴们做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则进行了抗议。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寄宿学校在他们的宣传册中发布广告说他们不使用肉体惩罚。国家也进行了干预，再三发布公告提醒教师和其他人“绝对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类似的公告进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则颁布了其他两份与小学有关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规甚至更加严厉。签署日期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规章宣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体罚曾被视为训练和约束身体的方法，一项对肉体惩罚发展进程的研究，显示了其他一些旨在获得规则的内在化纪律形式是如何取代这些更为身体化的方法的。正如贝卡莱曾期望惩罚体制所能做到的那样，目标已然发展到“触及心灵而不仅是身体”。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后者在诸如卫生和惩罚这些事务上仍执著于更为古老的教育观念。不可胜数的自传都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使用严酷的纪律时，教会的修士、修女们总会为此进行庇护，至少

《从熟睡中惊醒》，1866年。这间小型的男女同校的小学里发生了一股欢乐的骚乱。老师挥舞着九尾鞭抽向正在睡觉的学生，其他一些同学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看起来学校仍需进行理性的教育改革。



在那些教更低年级孩子的学校中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教育方法的历史沿革，而是影响到教育体制限制其自身独裁趋势的家庭需求的方式。在父母对骇人的学校世界进行的首次介入中，私人引导了公众；私人道德观念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在农村以及城市中贫穷和小资产阶级的人口中，殴打现象仍大量存在。打屁股通常是广为接受的方式，因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制。打屁股一般是用手掌；棍子和鞭子只留给学徒的雇主们和机构中的守卫们，是一个对外的武力象征。挨打是每个19世纪工人的童年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坊里的情况甚至比工厂更糟，放肆的或笨拙的学徒很容易遭到指派教授其手艺的年长工人痛殴。

人们认为孩子身上的反抗意志必须加以驯服，并且孩子应该了解生活的艰难。“儿子，这会使你成为真正的男人。”身体暴力是男子汉思想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一些人已然将这一模式内化，实际上他们甚至会为自己曾遭受到的殴打感到自豪，并且可能美化这一事实。但是，众多成长中的孩子以及上面所说的青少年们开始反抗。好战的工人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已然将他们憎恨的权威从破碎的殴打经历中驱逐出去了。自觉，在一个人所有的身体知觉中是第一位的。

对孩子的投资

在19世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两种方式发展着。作为家庭的未来的孩子，父母逐渐加大了对他们的投资，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经常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亨利·贝尔的家庭通过他来追寻贵族显赫的梦想；他度过的是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般的童年。小小的杰奎斯·文特拉斯-瓦莱斯不得不承担起他的家族期望提高社会地位的重担。他的父亲是初中的一位助教；他的母亲想让他成为一位教师，农民的粗暴和对受到尊敬的渴求相融合，使她对这个年轻人施加了严酷的纪律约束。开始时，她细心监视他的外表；她期望他能整洁、挺拔，并且衣着得体（“我经常穿黑色的衣服”）；这些良好的习惯可以鼓励他将井然有序的价值加以内化。他从未感受过来自母亲的拥抱，也没有听到过她哪怕只言片语的关爱之辞。“我母亲说，孩子决不能娇惯，她每天早晨都会鞭打我。当她早上没有时间时，鞭打就会延迟到中午，很少晚于四点钟。”更有甚者，“我的母

亲将这看作是我在接受的一种教育。她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农村妇女。我的母亲想让她的杰奎斯成为一位绅士。”

成为一个继承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觉得孩子在被期望的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或是未能符合家庭的期望，结果将是悲剧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觉自己罪责难脱，父母则会因其有负盛望而耿耿于怀。由此想到了波德莱尔，他始终未能克服内心深处对母亲奥皮斯的愧疚感。还有范·戈夫，他写给哥哥泰乌的信中充满了对“坏儿子”称谓的无助反抗。作为存在主义渴望的根源，19世纪的家庭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神经质特性。

但同时，孩子也是一个爱的对象。1850年以后，如果一个孩子死去了，他的亲属们都会服丧，就如同他们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那样。私下里，他们可能会对着他的一缕头发哭泣。难道这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吗？绝不是这样的。在洛林这个钢铁工业的中心区，母亲们，工人的妻子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之中。无论何时相见，（她们）都会用方格子手绢擦抹去伤心的泪水。”在教育方面，勒古韦对“温情原则的优越性”大加颂扬，并倡导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抚养孩子应该是为他们着想，而不应是为了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兴趣可能会与集体的兴趣不一致。孩子自己为命运负责，因此，根据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理论，重要的是发展创

《在野外讲故事》。乡下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个小说书人到底在讲什么，以至于这么吸引他的听众？

造性，即使是付出某种不确定的代价；按照这种方法，学生们在以后可以自由地做出个性化的选择。

根据许多以孩子为对象进行的观察，包括学校记录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观察，我们对于孩子们是如何相互看待、如何彼此交谈的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孩子的语言、体态、性行为和游戏的多样化具体符号之中，以前的陈规旧框消失不见了。到这时为止，童年已然被视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时刻。每一本自传都以童年开始，并会对这段时光详尽描述，而教育小说则会追寻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轨迹。与生命中的其他时期相对，童年成为了成年的基础，而孩子则成为了一个人。

青春期—“关键的年龄”

在传统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现在清晰地进入了人们聚焦的视野范围。布丰，甚至是卢梭，都曾呼吁对生命中那一时期的危险性以及对今后人生的影响多予关注，这一段时期从第一次领受圣餐一直到男孩子的毕业典礼或征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卢梭的《埃米尔》第四册全部都献给了“这一关键时期”，这是性特征形成的时期。“我们有出生了两次的感觉，一次是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为了圣餐而生，另一次是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远在暴风雨之前就已然开始，新生的激情同样也预言着这种风暴般的发育。朦胧的青春骚动警示着这种迫近的危险。”

将青春期视为关键时期的观念，在19世纪反复兴起；最热衷此观念的是那些医师们，他们在1780年至1840年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药物疗法。青春期不仅对个人是危险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寻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与身体形象的狂热分子。镜子使他着迷。对马科斯·斯特那来说，他就曾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并因此产生要解除社会枷锁的倾向。涂尔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具自杀倾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此外，青春期少年的性欲使他们更倾向于暴力、野蛮和虐待狂（比如对待动物）。他们有强奸和嗜血的癖好。

从这种对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质的描述来看，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个步骤，虽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关当时青春

玛丽·巴什科彻夫：《集会》，1883年。城市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几个年纪稍小的孩子聚集在一个几乎是青少年的大孩子周围。在这个小规模的“淘气鬼兄弟会”中混杂着好奇与羡慕的神情。注意图中青少年的校服和熟悉的黑色书包。

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对青春期犯罪者进行了分析。迪普拉认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汉”，迷恋于旅行和走动，骨子里就不安稳，整天忙碌于“近乎歇斯底里和癫痫状态的东奔西走，他无法抗拒旅行的冲动”。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义为“一种蔑视任何障碍与危险的行为需要”这样的苦恼。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会驱使他们谋杀，或是成为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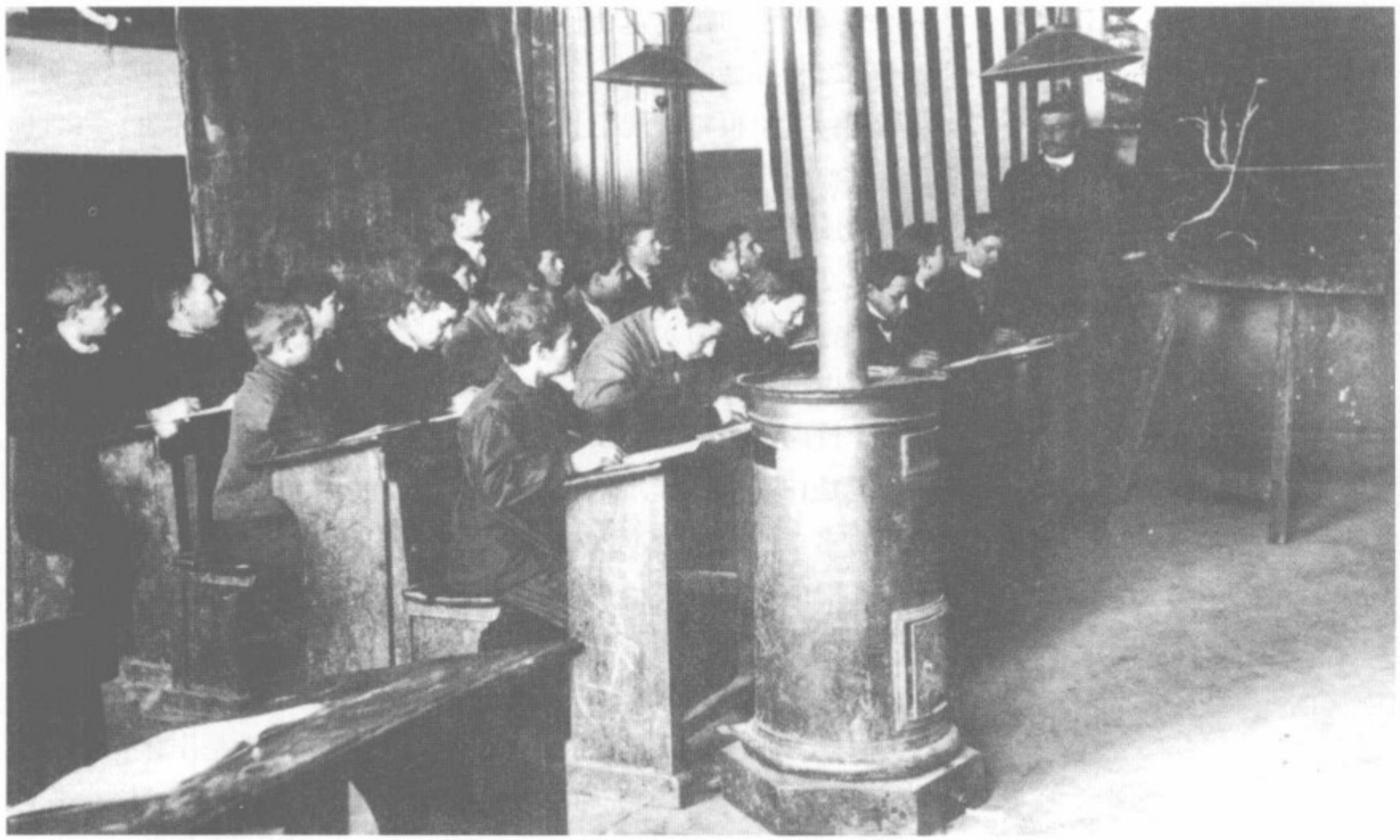
青春期少年最麻烦的事情是他正在经历的性转变以及他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想法。医师们是身体的主要观察者，他们鼓动人们关心寄宿学校内诸如手淫、同性恋一类的问题，以及童年朋友之间的不正当行为。固然，只要公共礼仪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恋就不会被视为犯罪，但同性恋这种“倒错”却成了一种受到详细审查的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疾病一样。关注的中心是那些有着“坏习惯”的青春期少年。如何处理青春期少年过度的性欲是教育家们

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问题。这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得充分呢？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

青少年们分享片刻的安静凝视。



一所共和国公立中学的有代表性的班级在老师的严厉看管下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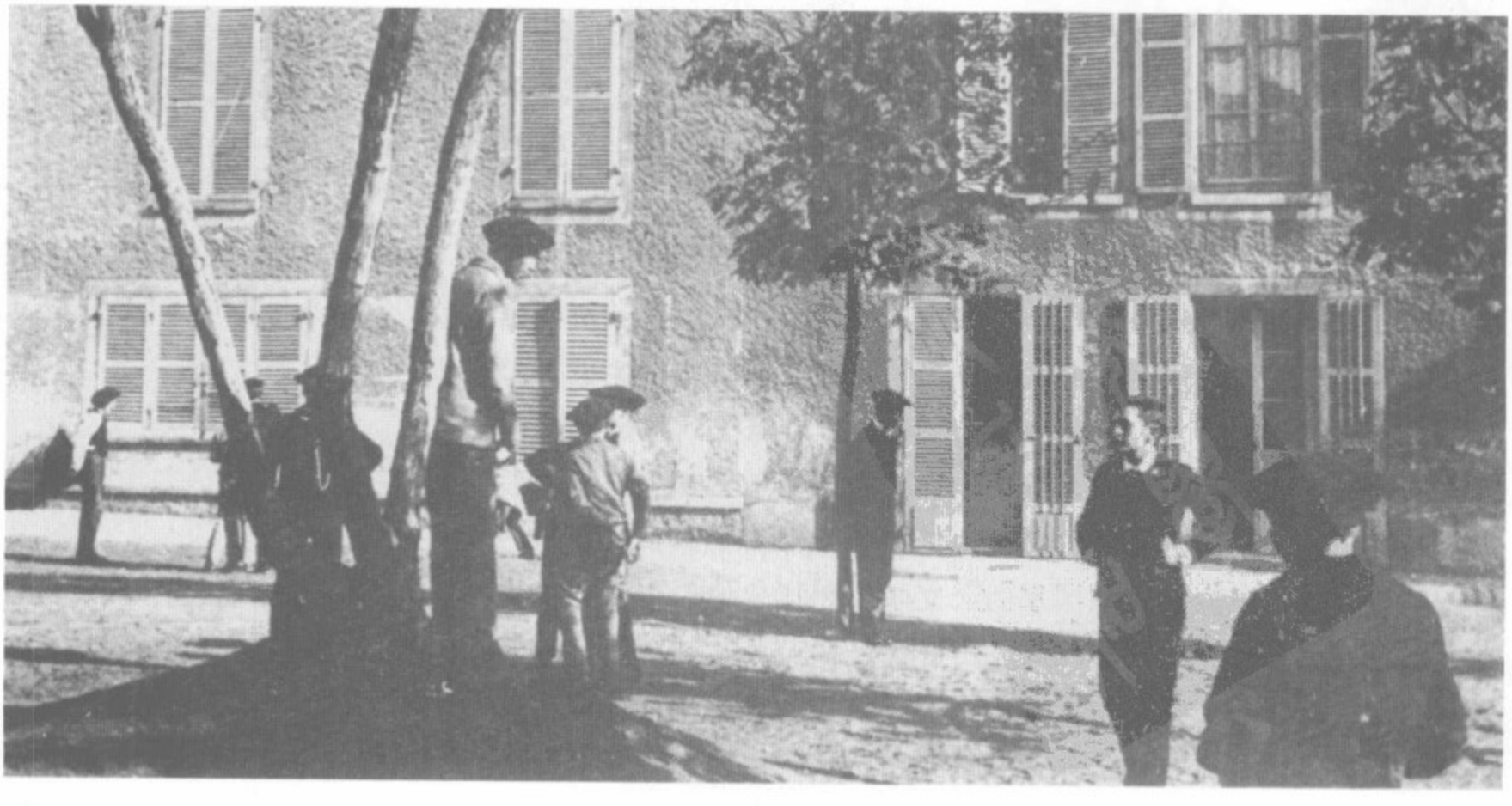
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手淫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公立学校相比，他们将教育视为私人事务，也因此为私立学校的成功贡献颇多。

不管怎样，这种包裹着孩子的温情还是受到了污染，青春期少年总是会被谨慎地监视，会被怀疑有扰乱治安的倾向。青春期少年

受到的这种密切监视迫使他们采取保密和掩饰行为。他们会发明创造出一百种方法、计谋，却只为赢得一点点私密。他们在学习期间或是晚钟（中世纪时规定人们熄灯睡觉的时间——译者注）之后读小说；他们写诗歌；他们记日记；还有，他们也会梦想。所有这些举动构成了一种更内部的生活。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女孩们在寄宿学校结交的友情通常会因婚姻而缩短。男孩们则形成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得到巩固加强。有时，这些团体在此后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成为商业和政府领域内的派系。大多数19世纪寄宿学校内的生活都会频繁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反抗的干扰，甚至中断。但是1880年以后，此类的干扰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似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使之变得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允许年轻人在节日庆典和性规则中扮演其曾经在传统社会中扮演过的角色，共和国似乎并不比19世纪的郡主政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年轻人不再被视为一个群体，而被看作诸多的个体，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听从命令，保持安静。因此，当年轻人反抗时，他们的这种背叛通常是个体化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家庭，而不是国家。

这个特性既适用于穷人家庭的孩子，也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从第一次领受圣餐（或是接受毕业证书）一直到他被征召入伍，这些年轻的工人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并把他挣的钱带回家（成

莫克斯一所中学的课间休息：受到监视的青少年们。



女孩子们在一所女子私立学校相当不正规的教室里学习。在 Ferry 法规通过之前（和之后），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所。

年工人的工资单已经被取消了，但仍然会向年轻的工人出具）。在家庭结构保持完整的就业群体中，比如在矿工中，在对家庭有所贡献之前就结婚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然而，根据不同的调查，比如在1872年进行的一次“法国工作状况”调查，表明年轻人正逐渐表现出不耐烦的倾向。在阿尔代什的工厂里，“许多（年轻的工人）在他们刚开始挣钱时就离开了家，然后去寄宿公寓居住，就像那些未结婚的外国工人一样”。在皮卡第大区的纺织工业区，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甚至是年轻女子们，都采取寄宿的方式，而不再是把他们挣的钱交给家里。因此，某些家庭达成了以下协议：在18岁之后，孩子将与家庭分享他的工资，自己只能得到一部分，否则，就要为房间和食宿支付“议定的”价格。

兄弟姐妹

除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水平关系。但是，即使是在同辈人当中，也存在不平等和时有发生的竞争，起因就是性别、等级、年龄、天分的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偏爱等。在长子受到特殊对待的地方，竞争最为激烈。比如在

一家女修道院里正在进行一场槌球的游戏，或者这是一种不用花精力教育年轻姑娘的方式。

奥古斯特·弗兰德林：《儿时的保罗和希波利特》。来自里昂的一个画家家庭。最大的孩子，奥古斯特（1804~1843 年）画了他的两个弟弟，让·保罗（1811~1902 年）和希波利特（1809~1864 年），其中希波利特是三兄弟中最成功的一个画家。

热沃当，19世纪时年长的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到了谋杀的程度；无论是诉讼还是移民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辈中更年轻一些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发现他们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几乎被降低到了佣人的角色，有许多人甚至被要求保持独身。

当青春期少年面临主要的生活抉择时会有竞争产生，在分割遗产时也会有敌意出现，这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是有区别的。当就某种意愿产生争论，或是众人争夺某份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所有权时，家族内的战争就会爆发。出于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因，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高估那些他们被剥夺了的财物的价值。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重要时刻到来之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性。孩子们总是联合起来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从中获得乐趣。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受到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导。年长的哥哥在职业选择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见解的形成

上，可能会对年幼的同辈们施加重要的影响。年长的姐姐通常会扮演妹妹的老师的角色。维克多·雨果对莱奥波丁充满了温暖的回忆：一本打开的《圣经》放在她的膝盖上，给阿黛尔上拼写课。姐姐还会教妹妹怎样做家务杂事，如何打扮自己，让自己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长女的责任尤其繁重。在母亲已去世的家庭中，她要像母亲和持家人一样去伺候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愿望。在更穷困一些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长女经常被送到外面去做工，以帮助父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会期望最年幼的女儿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是很普遍的：一个年老的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儿。由此，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地是由他或她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第二帝国期间两姐妹的照片。这样的照片在上层阶级中很常见，但在工人阶级中很少见。同一时期，泽维尔·埃杜尔德·勒琼是一名布料商助理，当他试图劝说他的乡下祖母在来巴黎观光的几天里照几张相片时，她竟然被吓坏了，中途就逃回家去了。

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文学著作中揭示的那么紧张，但这种紧张情绪的确是存在着的，阿兰·科尔宾将其视为情感交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性别的差异使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这种关系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与异性关系的一个开始。宗教和社会的禁忌是严厉禁止乱伦的，因此这些关系很少会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很可能会与爱情有关。巴枯宁承认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有乱伦迹象的爱，这种供认对于反对他的运动无疑是火上浇油。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审查非常严密，面纱只是偶尔才被揭开。皮埃尔·穆瓦根是个工人，有一段时间还是个罪犯，他写出了他对妹妹的爱，对于这份无望的感情还记有日记。

小妹妹

在兄妹或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中，年龄加深了父爱或母爱的感觉。左拉1901年写的《工作》中的小妹妹毫不隐讳地对她的哥哥曲意逢迎。她显然乐于扮演二流角色，并为哥哥成功的消息而高兴得大哭——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

这些可能是穿着丧服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们那成为神学院学生的兄弟的来访使他们感到光荣。他们看起来像是莫里亚克笔下的人物。

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祖父母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

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盖农抚养大的。奥罗尔·迪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母进行教育的。埃利谢·莱克鲁斯直到8岁时还是由像父亲一般的祖父母照看，他们对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许多自传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作者对自己祖父母的描写开始；关于家庭的回忆很少会回溯到比他这一代更早的时候。对于孙辈来说，祖父母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通过他们，孩子们不仅初步确立起家族谱系意识，也第一次熟知了什么是死亡。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祖母的死就是个相关的事例。祖父母在常识和传统的传播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长辈们会讲起这个纷纭世纪中的历史事件，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通常，女人的双眼会更多地

家庭聚会让夫妇和好几代人聚在一起。左图：这是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家庭，从人行道、蜡纸桌布和玻璃酒杯就可以看出来。

下图：一个外省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出忙碌的样子，而不是为了照相而摆姿势，于是他们展示了一种显得更“自然”的“现代”感。

见证这些私人的记忆，这不仅因为女人们比男人活得更长，还因为她们结婚更早，因此，在孙辈的生活中，祖母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成分要比祖父更多。

表姑婶和堂兄妹

叔舅姑婶和堂兄妹同样也是被包括在大家庭范畴之内的。界限通常划在第一代堂兄妹的儿女那里。在更底层的阶级中，这种大家庭成为年轻工人移民的大背景。在中产阶级中，大家庭成员一起应邀出席招待会，一同外出度假；在此类特别的时间内，他们开始体验包括性在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乱伦并不鲜见。青春期少年追寻漂亮的表姐堂妹，禁不住性欲的冲动，而那些女孩子也从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成长为女人；女孩子们为英俊的表兄堂弟而怦然心动，他们已影响到了思想解放的学生们的行为方式。在情感训导方面，家庭总是满足各种需要，但如果事情变得太离谱，如果家族声誉或继承人受到了威胁，家庭也可能会坚决制止。

叔舅姑婶们是被允许充当监护人的。由于寡居的母亲不具备这一资格，叔舅姑婶们在家庭会议中的角色就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在探讨诸如寡妇再婚、孤儿的财产管理或是依据1838年法律要求家庭成员制度化等等事宜上更是如此。

未婚的姑姑阿姨们自由徜徉于家庭之中，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居有一席之地；侄子外甥们的记忆里经常满是她们的身影。亨利·贝尔受制于严厉的塞拉菲姑姑的钢铁纪律，“那个女魔……我整个童年的邪恶的守护神”，她的影响在温柔的伊丽莎白姑姑那里得到了补偿。杰奎斯·文特拉斯对她那些像父亲一样的姑姑婶婶们的举动进行了描述，她们无一不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和失去双亲的女孩在一起，姑婶们有必要扮演一个更加父亲化的角色。卡罗琳·布拉姆是由她的泰尔诺姑姑伴护长大的，她毫无疑问地不仅要为卡罗琳的婚姻负责，还要为家族中其他女孩的婚姻负责。拉法格是受到姑姑的引领才了解婚姻的秘密的，“在一次时间相当长、非常活跃的早餐之后，我的姑姑们把我带进了小客厅，关上门，然后开始引领我进入我新职责的可怕的神秘之中。”

叔叔舅舅们将新鲜的空气引入了家中。叔叔可以行使一位父亲的特权，却无须担负他的过错。阿尔伯特·西蒙尼十分崇敬他的叔叔们：皮埃尔是位发明家，早在1914年之前就拥有了一辆汽车；而

两姐妹和她们体面的父母和姑母。最年轻的姑娘穿的纯洁的白裙子象征着她的单身，正如罗杰·马丁·加德于1908年在《变化》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没有人能比一个年轻姑娘更孤单的了。"

弗雷德里克是个钟表匠，市郊的房子就是他自己造的。保罗·莱克鲁斯真心地崇拜他的叔叔埃利谢·莱克鲁斯，他是位地理学者，在他死后，保罗出版了叔叔的著作。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叔叔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人们尤其喜欢编写关于沉默寡言的叔叔取得惊人成功的故事：在美国，叔叔是一个标准的家庭神话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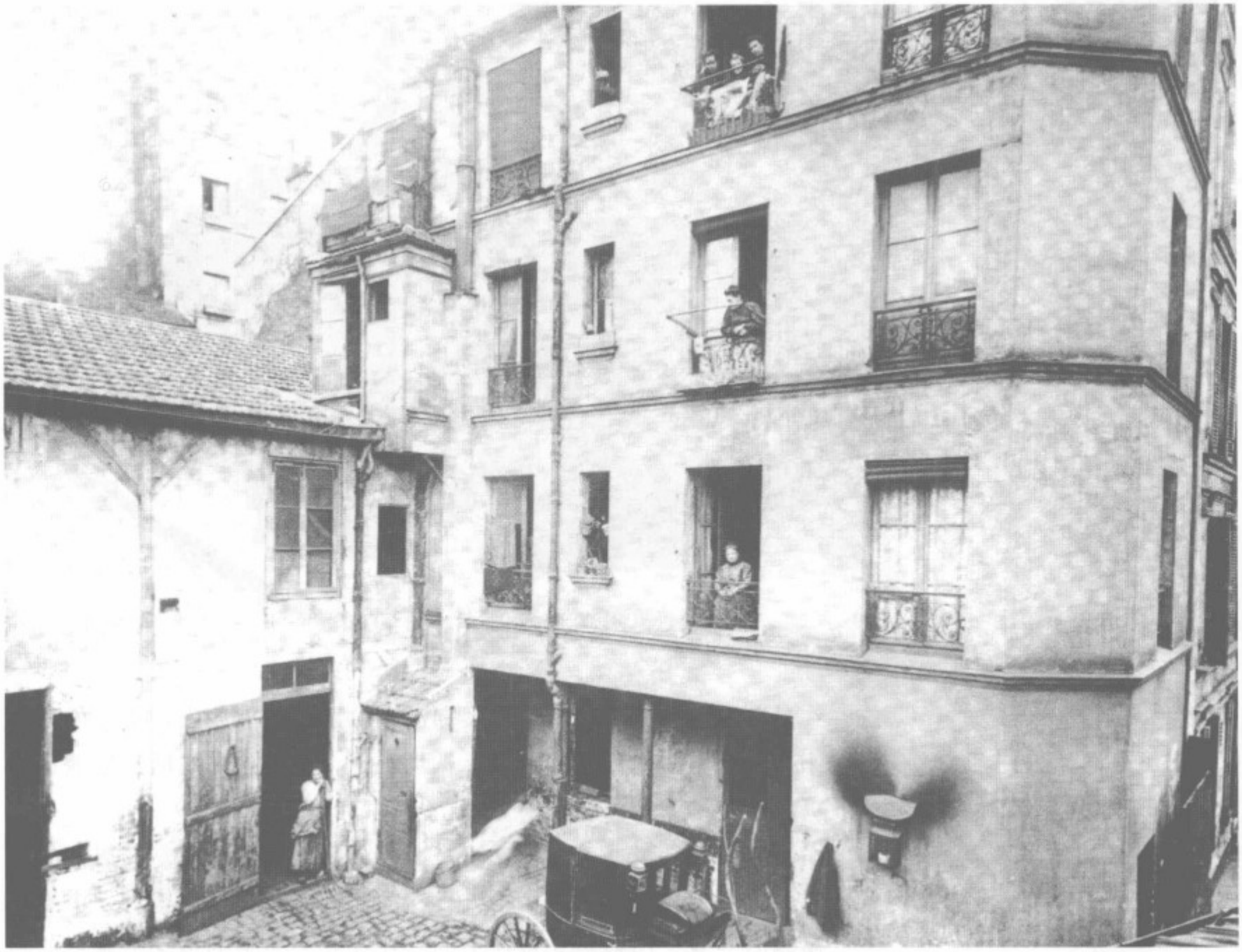
邻居和佣人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除了家庭的核心成员以及他的亲属外，还有一个由富裕人家的佣人和众多邻居构成的圈子。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存在一个意识底线，甚至存在着危险。佣人和邻居对一个家庭来说当然是有益的，但他们的存在却对个人隐私造成了威胁，而且他们的近距离窥视可能会成为一种尴尬。人们不得不依赖这些帮助者，但同时也不得不对他们心存戒心。

邻居们既可能成为有益的帮助者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在村庄里，人们是很难逃避邻居们的细致监察的。在日瓦丹，"在整个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每个人都在参与窥探他人私生活同时保护自己隐私的游戏"。行为和表象的全部特征一下子显

现了出来。有一些地方可以让有此癖好的人们更好地窥视他人。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它是村子里的一个显微镜，人们知道谁参加了弥撒，他们多久参加一次礼拜（对于那些不参加的人来说将是事关赦免罪恶的事情），和年轻女孩会在忏悔室里待多久。女人作为耻辱之源特别受到细致关注，特别是她们的一些敏感部位——腹部。当女人肥胖的脸和粗大的腰意外“缩水”时，就会成为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资。寡妇一般总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根据法国著名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说法，“在一些地方，人们总喜欢把眼睛盯在那些寡妇身上，他们会观察一个寡妇面纱戴多久。他们会根据她所戴绉绸的长度猜测她的悲伤程度。如果一位正处于悲痛之中的寡妇在一个燥热的夏日掀开她的面纱透口气的话，那些看到的人就会说：‘她一定另有了一个心上人，让她已经把悲伤忘却（《大教区》，1926年）。’”人们透过半关的百叶窗窥视他人。俏皮话和讥讽语言被悄悄传到闲话和责难中心——泉水旁和洗衣房，并在这些地方发展成永久的流言。由于像村庄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在没有外来 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内部的责难具有特殊的约束力 。街区就成了判断个人名誉的场所。

街区　城市里的低层群体间是否会有更多的自由呢？是的，因为当前的市内社区只是暂时的，彼此间的利益相对松散，圈子相对较大，而且彼此间有一种相对强烈的排斥外来者的凝聚感，特别是对警察。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人们之间的居所彼此邻近（吱吱作响的床板会让人们知道墙的另一边正在发生什么），夏日傍晚敞开的窗户把院子变成一个公共大房间，使得邻居间的争吵和矛盾更突出，而且人们彼此经常在楼道、公共水龙头和公厕相遇，而这些地方就成了冲突不断产生的源泉。每座公寓都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管理员，她几乎一成不变是一位妇女，早期的瑞士门卫和搬运工已经渐渐消失了。她为自己的中间地位而感到害怕，因为她夹在公众与个体、房客与房东之间，同时还与警察合谋，无论什么时候发生状况时，警察都会向她求助而且想把她作为自己的眼线。她在幕后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她可以选择房客，而且如果没有她的允许，任何来访者和街头歌手都不能走进院子。那些居住在能直通街道的楼房里的人，对自己的私密生活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这是一幢公寓大楼，因为楼内有一匹马，所以产生了某种恶臭。不过，这座楼装配有现代便利设施，如下管道和浴室。看门人就在院子里，这样家庭主妇们可以从窗户里看见她。

皮埃尔·桑索特评论道："大多数居民将自己的存在囿限在低调而狭小的空间范围里。"商店是重要的会聚场所，有着自己的礼节编码和交往礼仪。一些常客担当着监守者、知己和旁观者的角色：面包师的妻子，尤其是杂货商，经常成为"邻里或街道甚或忏悔室里的耳朵"。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多种多样私人行为模式开放着的邻里，形成了一个比家庭远为复杂的社会。

人相对来说要比空间重要，一个人很少能够自由选择邻里或确定他需要赢得谁的影响，即使他并不接受他们。邻里之间会在家里和外面建立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种人人必须认可的规范，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与他们在民族、种族和出生地上不同的人，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正如路易丝·谢瓦利埃表明的，是一个村庄的聚合体。

鞋子宫殿建于奥斯曼当政时期。鞋子仍然是奢侈品，虽然工人阶级很渴望拥有。摄影师是站在街道中拍照的，而人们都站着不动并看向他，很高兴被拍照。

在拉普街，有一个住着许多奥弗涅人的区域，有些大楼里住的都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相似地，19世纪末，在普拉兹尔低洼地地区挤满了来自中部欧洲的犹太移民。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邻居们的反对、容忍或纵容将决定一个人生存的法则。但邻居们也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门槛是非常神圣的，在没有人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越过的，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噪声或是闻到可疑的臭气或有毒的气味。父母可能会打他们的孩子，丈夫可能会打他们的妻子；这些都是他们自家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报警。有时它会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形式来放松人们的舌头（指报警——译者注）从而导致外来的干涉。有些个人向警察和法院求助是人们的容忍度和公共干涉形式方面非常有趣的一种表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邻里间的问题都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而且大多数都被认为在事关神圣的家庭隐私方面，只限定发生在家里。

国产动物

这里将不会过多地谈论有关家庭宠物的事，部分关于这个亲密世界的问题，阿兰·科班将会在这一主题的后面进行描述。狗、鸟类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猫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福利的关注。动物

们是家庭中的一员，而当人们谈起它们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老朋友。人们分享有关宠物的新闻，而乔治·桑德的信件中包括了许多这类令人羡慕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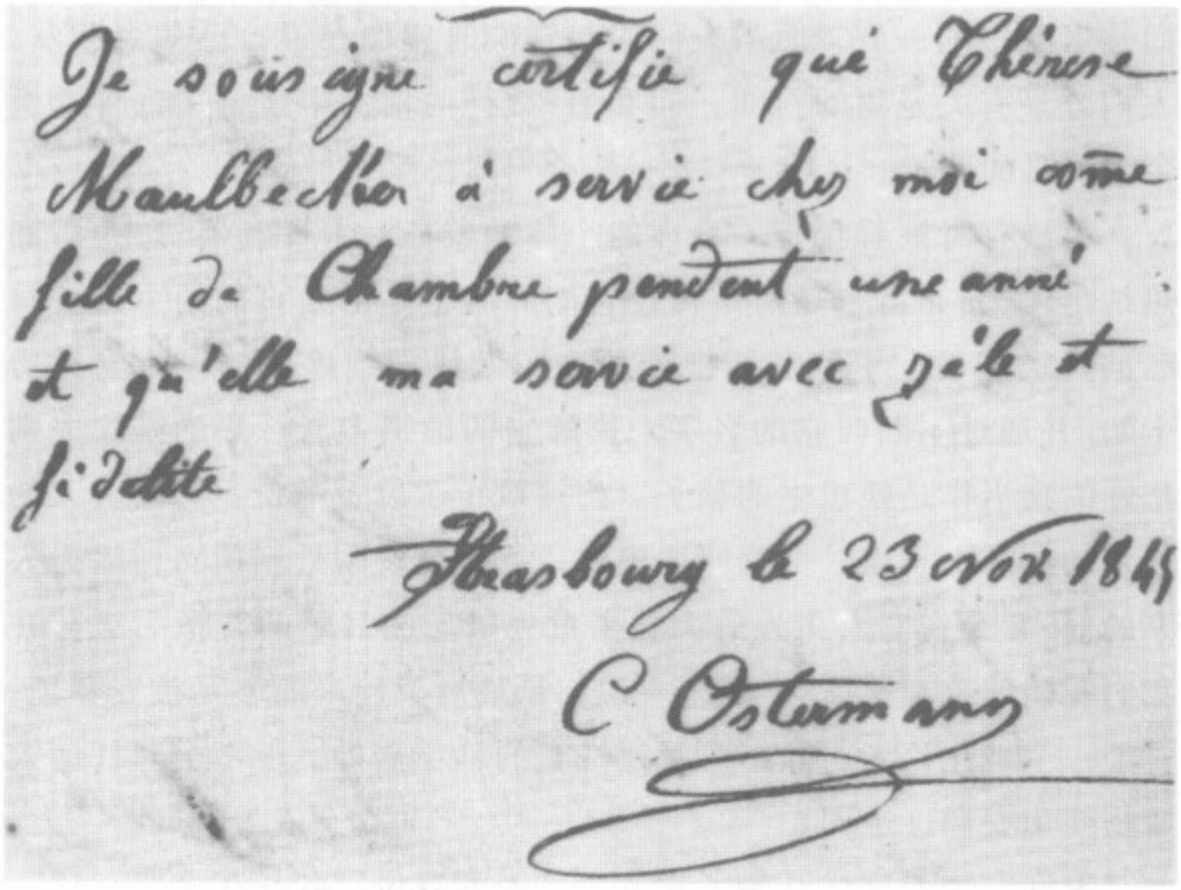
动物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虚幻个体的象征。卡罗利娜·布拉姆和热纳维埃夫·布雷东是两条狗，它们的名字是由爱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姓氏起的。卡罗利娜把她的狗叫做热纳维埃夫（一位女性勇士），并通过不断叫它的名字来提醒它的虚拟主人。热纳维埃夫则把她的狗当作是她想生的孩子。狗被赋予了以下身份：迪潘夫人的狗带的项圈上写道："我叫尼黑纳，我是夏埃附近诺衡区迪潘夫人家的。"它是在它女主人的大腿上过完最后的日子的，"最后被葬在我们花园的玫瑰丛下"。老园主说狗是被放了起来而不是被安葬了，对于一个纯化论者，除了对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外，他不会对任何人或物使用安葬这个词。

家庭宠物就这样开始了它升为"人类身份"的长久之路。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结果是有时事情会让法律尴尬。例如，一

仆人们通过老主顾、关系和就业介绍所寻找工作机会。在19世纪晚期，仆人供不应求的状况吸引了许多乡下人和外地人来城市工作。（1891年）

这份证明书证实了仆人必须服从于其雇主和市政当局的双重控制。上面写道："我，下面的签名者，证明特蕾莎·莫尔贝克逊（?）在我家做一年女仆，并且热心、忠诚地服务于我。

斯特拉斯堡，1849年11月23日。［签名］C.奥斯特曼。"在市政当局的监督被废止很久以后，雇主的监督仍将继续。


Je soussigné certifie que Thérèse Maulbecker a servi chez moi comme fille de Chambre pendant une année et qu'elle m'a servie avec zèle et fidélité

Strasbourg le 23 novr 1849

C Ostermann

个人是否可以把他或她的财产遗赠给自己的狗？1983年法院认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动物的权利仅相当于儿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对于影响动物权利的问题相当敏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物保护协会的积极分子。

佣人

佣人的多少和组成要看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雇用一名女佣标志着一个家庭正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家庭有仆人伺候，家中的女主人充满闲情逸致，仆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家庭服务遵循贵族的方式，佣人是雇用的帮手，但并不是独立的工人，因为他们会因为雇主众多个人需求的约束而不得不依赖自己的主人。佣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身体甚至整个人奉献给主人。由于其本身古老的特性，佣人在家政社会的地位问题开始不断给人们带来麻烦，在20世纪初，许多迹象表明家政服务正逐渐衰退——中产阶层的妇人们包括那些女权主义者抱怨说，她们很难找到帮手。

佣人世界是存在等级的。处在顶层的是那些家庭教师和奶妈，只有那些希望在家教育子女的富裕家庭才能付得起这方面的支出。这些佣人一般被视为准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也的确是。由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家庭教师的数量比奶妈减少得更多。福楼拜在《俗语词

典》中写道：他们总是那些来自遭受不幸的优越家庭；丈夫腐败，家庭生活危险。1847年，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这次表现了一位贵族成员如何堕落成殉情罪犯的典型事件震动了整个君主体制。19世纪初的奶妈们一般都是法国人，后来人们更喜欢英国和德国女孩。她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人的欲望目标。“小姐们”不得不戴着眼镜和扎着适当的圆髻，并假装一脸严肃来应对诱惑。

所有角色中最为难的恐怕是贴身男仆和寝室女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只要他们的人性角色被否认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了。他们与主人们的亲密接触没有困难，因为佣人只是没有性的生物。18世纪时，夏蒂丝女爵夫人可以很平静地叫她的贴身男仆隆尚帕帮她沐浴，不过隆尚帕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他已充分感受到这种要求给他带来的生理上的困扰。但一个半世纪以来，浴室已经变成了一个隐私场所，主人不愿把自己暴露给佣人们，而把自己藏在紧闭的门后。在《寝室女仆的日记》中，塞勒丝蒂娜·米尔博注意到，“夫人总是一个人穿衣和梳头。她把自己锁在化妆室里，一般是不允许我进去的。”从中可以看出，好像她对于被剥夺掉这样的特权感到遗憾。乔治·维格里奥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剥夺其实是严格按照个人的外在形象标准进行的。

人们对更大隐私的需求不但影响了浴室，同样也影响了家庭里的其他部分，包括卧室。一位端庄的女主人会自己铺床，仆人们一般只会站在一旁而并不真正进屋。女主人可以看到他们，或至少在需要帮助时可以叫到她们。热雷米·贝塔姆的兄弟萨米埃尔为英国家庭设计了一个系统，让佣人们可以在远处听到主人的召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召集佣人的铃声在法国变得很普及。诺德雷伯爵抱怨说这种改变导致了和佣人间的隔膜。维洛特公爵的《家庭史》(1873) 被当成一个范例，他把大部分注意集中在门厅、走廊和楼道上，这里是人们相遇、交流和疏散的主要通道。米什莱不能容忍生活在佣人们的监视之下，“那些富人们生活在对他们有敌意的佣人面前。他们在充满恨意和嘲弄的目光下吃饭、睡觉和做爱。他们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也没有家。”因此“家庭保持和平的重要原则就是只有两个人而不应有第三个人”。这种把佣人当作入侵者而对其拒绝的观念或许暗示着一种新意识的出现，同时也是佣人们被视

贝卡西娜是1906年出版的《Suzeete的一周》中创造的人物。她代表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女仆形象，天真但忠心耿耿，她的失态和拙劣的语法让中产阶级读者忍俊不禁。尽管贝卡西娜很饶舌，但是对于涉及她主人家所发生的一切，她可是很会装聋作哑的。

为个体时代到来的迹象，这种发展最终将带来家政服务的终结。

在19世纪时，人们通过否认佣人的个性化来克服这种窘境，也就是忽视他或她的身体。安妮·马丁已经说明了佣人的个性被否认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真实姓名被抛弃，而当他们工作时被给予新的名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是玛丽。”总的来说，佣人是没有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性生活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或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佣人们睡觉的第七层一般都破旧而杂乱，这样的空间里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享乐之外，几乎与世隔绝。那些主妇经常对楼上发生的事怀有一种性幻想。

女仆们一般都不会结婚，通常也不会有情人、丈夫或孩子。如果灾难落在一位女佣人身上，她必须自己处理一切。据统计，很多妇女因杀婴罪而受到起诉。妇产科医院和未婚母亲避难所经常挤满了这些女佣人，而且她们通常被迫放弃孩子。当人们开始担心婴儿的出生率时，人们也渐渐开始容忍未婚妈妈的存在。为此许多佣人

上图：奥克塔夫·乌赞纳：《巴黎女人》。就像起源于英国的大多数先进卫生技术一样，浴缸于19世纪80年代成为法国的普通生活用品。但是不久，出于传统道德考虑，即使是像图中这样一名体面的清扫卧室的女仆也不能服侍女主人洗澡。

右图：《家庭间谍》。被米什莱·米尔斯称为“我们的敌人”的仆人，总是渴望发现其主人的秘密。此图中的两个仆人正透过锁眼暗中监视其女主人。

《家庭间谍》。一个清扫卧室的女仆正津津有味地看她女主人的信，转身就被女主人逮了个正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美术展览上多半都是类似主题的画作。法兰德斯画家雷米·戈格的这两幅作品正是其擅长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讽刺意义。

多梅尼科·英杜诺：《信》。他在哪儿？那个引诱了这个年轻女仆并承诺和已有孕在身的她结婚的男人会回来负起责任吗？信，这样一种老套道具的运用表明那个男人不在她身边。在此图中也带有被抛弃的悲哀。

可以抚养自己的孩子，但这种抚养孩子的需求也使她们更加依赖这份工作。

如果女佣的孩子的父亲碰巧是男主人的话，她要么被迫离开，要么保持沉默。海伦·德穆斯和卡尔·马克思生了孩子，对此她一生都没有开口提及过。当海伦和卡尔逝世很久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莉诺才发现了真相。她后来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件私情而是因为掩盖真相的谎言。海伦·德穆斯在马克思家里的地位——她对于否定自己表示认同——成为那些被贬低的热心女佣人们的荒谬例子，这些妇女就像出现在一张家庭照片的一角的人，名字已经被人们忘却了。有些妇女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主人，没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一辈子当别人的奶妈，照看她主人的孩子。贝尔特·萨拉赞不但照顾生病的图卢兹·洛特雷克，还把主人的病情通知他的亲友们。避免苦恼和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无意识方式就是分享家庭的精神。普鲁斯特·弗朗索瓦兹的模特塞勒斯特·阿尔巴赫特和巴尔内的女佣贝尔特和纳塔利·克里福特都是她们主人们高尚品质的警觉和热情观察者。

如果主人们不再希望被他们的佣人注视，佣人们也不愿忍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被忽视的话，这种封建时代的遗俗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不再适应社会了。尽管佣人中很少有人公开反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另选雇主，拒绝命令，不接受建议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女佣会把自己的贞洁留给丈夫并希望找到相配的人。19世纪末越来越少的外省人到城里寻求佣人的工作，部分是因为她们担心被感染上“巴黎”病——梅毒。“佣人危机”反映在报纸业为人们提供的许多职位，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和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最根本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这标志着私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

家庭的边缘

在19世纪，家庭模式的标准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制度本身和个人。人们在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像那些嫌疑犯。在这些时候私生活的原则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拥有个人隐私的权利也会受到质疑。那些单身和独居的人们，可能是自愿或被迫选择暂时或永久不能拥有家庭生活，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让-利昂·杰罗姆：《房屋门口，画家的父亲和儿子》。少也孤单，老也寂寞。

对家庭生活的模仿支配着一些人的生活。如那些在剧院跳舞的芭蕾舞女们的“剧院妈妈”，就试图为她们找一个父亲在剧院的“家”里保护她们。在法国图尔附近麦特雷的一个监狱里，囚犯们会组成一个男人家庭，其中两个被尊为“大哥”。为了表示对家庭生活的厌恶，一些单身汉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独特理念，“家庭会让人丧失勇气，鼓励各种各样的懦弱，会剥夺掉所有妥协并把你淹没在牛奶和眼泪中。”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花花公子曾于1855年10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路易丝·布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福楼拜比安德烈·吉德更早说出了那句话：“我憎恨家庭。”

如果把家庭和它的内部舞台从私生活中除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两端：个体和社会。一个个体，像司汤达观察到的那样，会因个人的好奇心而膨胀，而如果他想探求正在出现的公共社会的复杂性的话，这种好奇心是必要的；有些人渴望那种中世纪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属于过时和准家庭社会的；还有一些人追求前卫的生活。

独身者的机构

性别隔离是像学校、监狱以及公共福利机构这样一些单位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些未婚和独居的单身汉们。女修道院、神学院或一定程度上的军队都招收那些自愿者们。其他机构虽不这样，但都会利用长久以来被军队和教会使用的有效方式。那些与外面世界隔离的人要处在全面监视之下，这样才能阻止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被认为是对抗制度的情绪和可能反叛的来源，同时也是对他们交流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和对他们生理和性需求的怀疑。晚上，亲热的欲望最强的时候也是他们特别担心的时刻。

如果可能，当局更愿把每个罪犯单独关在一间屋里或者“小格子”里，就像英国的寄宿学校一样，但毕竟资源有限。监狱虽是极端情况，但却说明了总的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要求建立独立狱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1875年通过了一项单独关押犯人的法案，但这项法律却从未强制实施过。卫士们利用牢房的窥视孔密切注视着里面，以控制混乱的发生。19世纪以至后来，隔离方法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疑心的天才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司汤达写道。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类似的疑虑。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间的相似点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某个机构是由于职业需求还是其他原因，有天壤之别。总的来说，那些自由回应召唤的人会接受他们制定的规矩并能把组织的规则内在化。19世纪时，神学院里出现了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灵魂被认为是邪恶的源泉，应该保持沉默，从记忆中消除或接受惩罚。肉体和道德上的修行则可以帮助一个人取得纯精神的目标。在冥想的秩序中，修行有时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这包括要杀死阻碍你与上帝结合的另一个“它”。许多虔诚的少女有时在她们受压抑的母亲的鼓励下幻想早亡。如泰雷丝的早亡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然而虔诚并不能排除诱惑。心和肉体的激情被秘密地隐藏在黑暗而巨大的灵魂堡垒里。在修道院里，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有了新的界限。每个细节、每句话和声音都非常明确。司汤达曾不无嘲讽地写道：“在神学院里，吃个煮鸡蛋的方式就能揭示出他们虔诚生活的过程。”以朱利安·索雷尔为参考,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决定为自己塑造全新性格的人，“他那个时刻的目光让他深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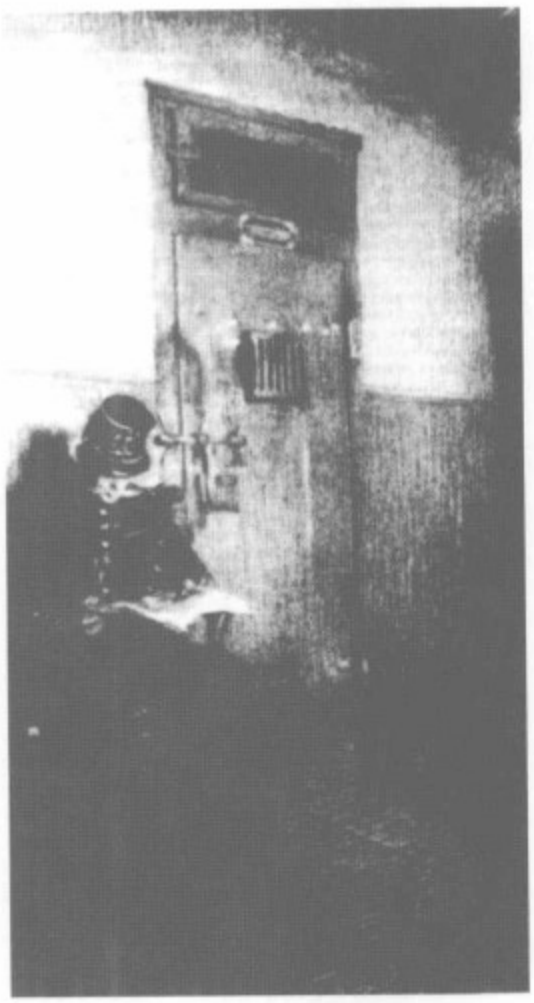
对那些被迫禁闭的人来说，维护隐私权是一种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个人的时和空间不受当局的监控和免受集体的专制暴力。瓦雷在《暴动》中温和地写道：“在宿舍尽头的小房子时，教师们可以在空闲时到里面工作或遐想。”有时人们也会通过建立私人关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隐私，这样可以减轻孤独感和对抗当局的保护层。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来应对那些规章制度。自由的时间被紧密地安排好了。混乱的时刻是有利于人们交流信息的。一群朋友结伙去一些中立地域，去黑暗的角落或浴室，这些地方在任何机构都属于自由的天堂，也因此成为受怀疑的焦点。

有人曾调查过制度上亚文化群发展的意义：传递纸条，涂鸦，玩笑，以及标记。包括“特殊的”友谊在内，同谋关系和友谊在这些封闭环境中遭到特殊强度的调查。这种环境导致产生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感情，同时另一种性爱——遭到禁止的性爱——被更加热切地色情化，或者有升华的必要性。极度的压抑与极度的渴望并存。因为阅读、吃喝和做爱的愉悦是私底下的，所以人们更加乐于享受。这种感觉如此剧烈，以至于无法抵抗。然而有时候长时间的强制性

自我抑制会导致十分强烈的压抑作用，以至于昏厥。西蒙·布福德是许多曾经描写“监狱寒冷”如何消灭囚犯所有欲望和才能的作家之一。欧文·葛夫曼分析过发生于精神病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中那些病患的“自主丧失”，他们变得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使得自己很难重新适应外面的世界。

至此，恰恰因为这些受限人员藏身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故意躲开公众以及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而且我们未必能够找出所需的微妙差别。虽然波德莱尔、弗莱士和其他加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常常将这些设施与监狱相比，然而只有在某些方面这些比较才是成立的。不同公共设施中私人交往的技术和形式看起来可能相似，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设施的差异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验。哪个是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比如在学校，学生家长对是否使用体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界态度如何影响内部事务，比如军营和监狱中的邮件审查制度、休假、假释政策、就寝安排及个人卫生？抵制纪律和渴望改变对最严格和乏味的机构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1860年，法国有5万囚犯，10万修士修女，16.3万寄宿学生，32万住院精神病人，以及将近50万士兵。每一部落都有其自身的私人生活形式；他们不应被忽视。



牢门上的监视孔或窥探窗能让守卫看到犯人而不被其发现。1875年宣布的法律提出了单身牢房条款，随之产生了个别监控。孤独既是让犯人忏悔又是促其改过的好方法。

未婚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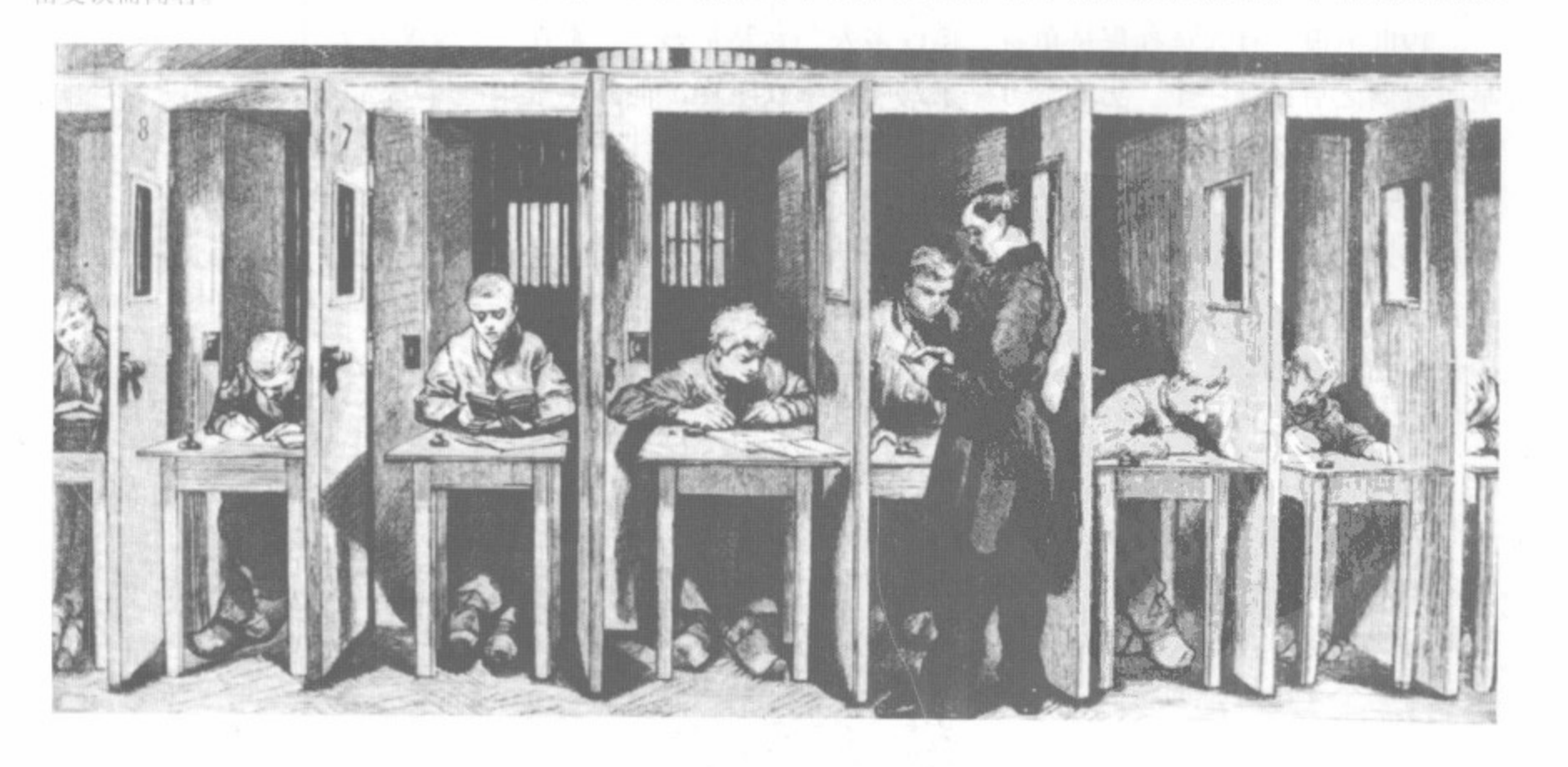
19世纪很少有人选择保持单身，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常在早年丧偶之后孤独一生。男女双方结婚的年龄都在下降，但并不平均。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51%以上的男人单身，相比之下只有35%的女性处于同样的状况。然而到35岁时，只有18%的男性仍然单身，却有20%的女性未婚。65岁时，只有7%的男性单身，反之各个年龄段女性独身的比例均高出10%。简而言之，男性结婚率要高出女性，即使男性结婚更晚；婚姻生活给男性带来了方便和尊敬。花花公子波德莱尔1854年12月4日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道，他需要“不计任何代价的家庭。这是唯一可以做的少花钱的方式”。卡斯蒂夫跟他的朋友唐克维勒一样，为美国婚姻生活的景象深深打动。他在1831年9月25日写给他兄弟阿克勒的一封信中预料美国家庭将很快成为典范：“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个情势，那就是单身汉会面对一个无法维持的状态，只有家庭男士才会享受所有安全感。”

60年后，佩格向那些同样的“家庭男士”欢呼，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英雄”。

独身生活遭到很大的质疑。但教会和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布雷赞成单身生活，认为放弃家庭是被允许的。社会上把未婚人士视为“干果”。福楼拜在书中列出了同时代的格言：“单身汉：所有自私和放荡的人。他们应该被课以重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段悲哀的老年时光。”单身汉这个名词只适用于男性；描述女性时用了另一个形容词：单身女子或老处女。拉诺斯在一本书中评述道：“一个英国人，对我们语言中的同义词不太熟悉，他把旅馆里的侍者称为独身主义者（侍者，也可称作‘单身汉’）。”独身主义者经常是男性；未婚女性叫做未婚女孩，就是说“还是个姑娘”。这倒没什么，可如果她成了一个老姑娘，一个疯子或像黛丝女爵一样没有地位的人，那就糟糕了。

独身生活，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女性渴望婚姻生活；年轻未婚女子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相比之下，年轻单身汉过着充实、自由和愉悦的生活，好似一种学徒期。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静，表示一个终结。单身汉生活是一段幸福时光，至少在记忆中是这样修饰的，一段享受恋爱、旅行、友情，与其他男性无拘无束的关系；这也是段“感情教育”和性体验的年纪，这时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年轻男子到处

由建筑师吉尔伯特和勒孔泰设计的马萨斯监狱于1850年在巴黎狄德罗林荫大道投入使用。牢房门在课堂练习和宗教活动中被用来隔开犯人。这些监狱管理严酷，因此自杀率很高，然而它以犯人间可以自由交谈而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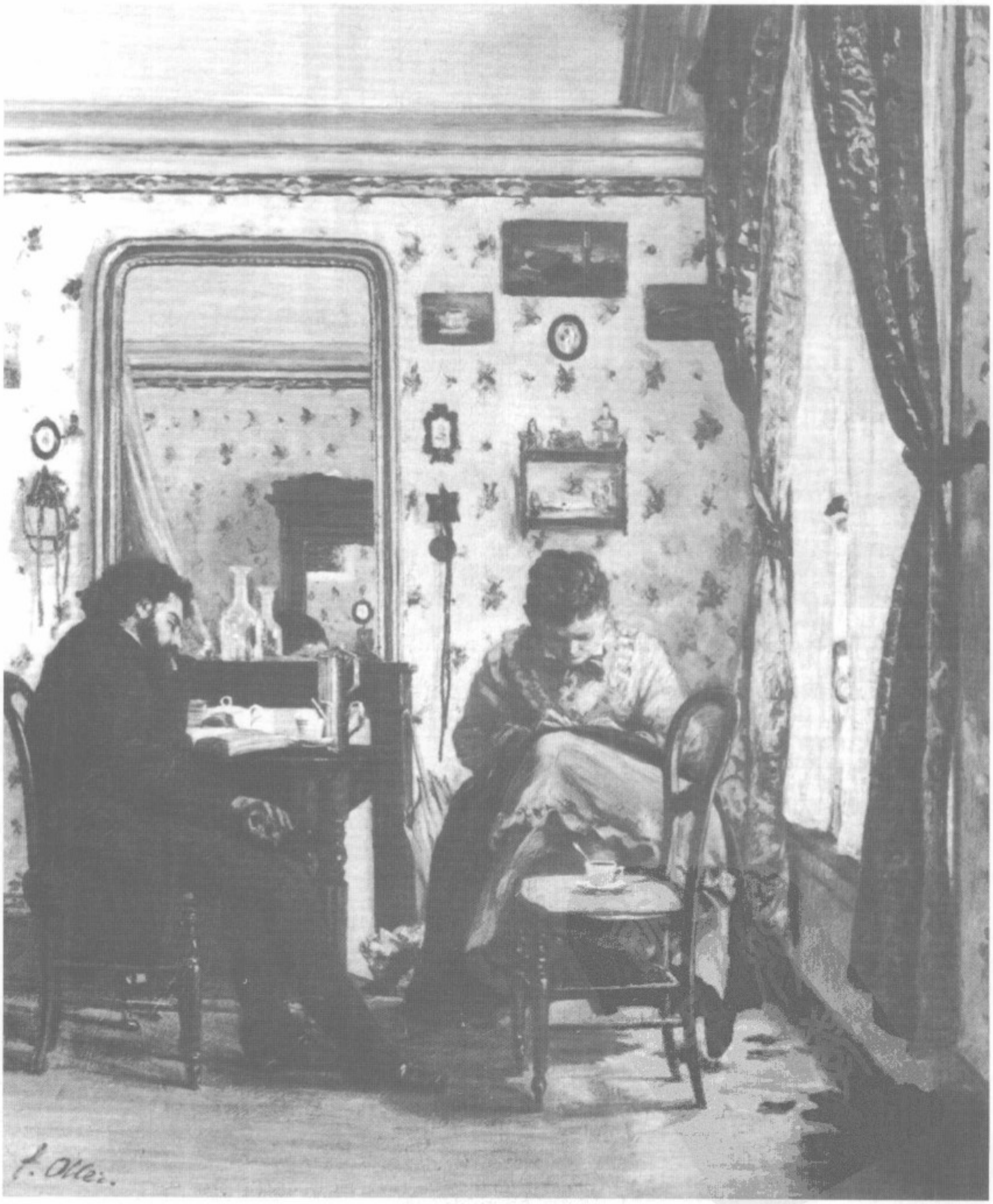
保罗·加瓦尼：《年轻小伙子和生活》。学生们真的是无忧无虑，愤世疾俗并且经常去旅行吗？这就是接近真实的一张底片。

“播撒他们的野燕麦”，“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一切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当时对梅毒的恐惧使一些男人有所收敛。甚至在贫穷阶级，有一段时间里流浪癖在熟练工人中被制度化了，年轻工人在城镇之间穿梭学习做生意和享受有关安定前的生活。

巴黎的学生经常长年徘徊于法律和毒品边缘，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关于那个部落产生了那样令人坚信不疑的神话，以至于很难对其现实加以批判。其中一个神话是关于拉丁区的，那里永远因政治骚动而不稳定，并且至少直到1815年仍一直处于当局监视之下。另一个是莫格使之名垂千古的波希米亚神话，莫格曾经试图查明波西米亚的界限，识别公民，追踪政治信仰和文学鉴赏力的变化，跟随居民从波米克旅行到马特山，再到腊帕纳塞斯山。

放纵的生活

波希米亚包含几种类型的公民。一种是“业余艺术家”，都是离家出走追求冒险生活的年轻人，但这只是在最终安定前的一段时间。另一种是“艺术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不为人知的波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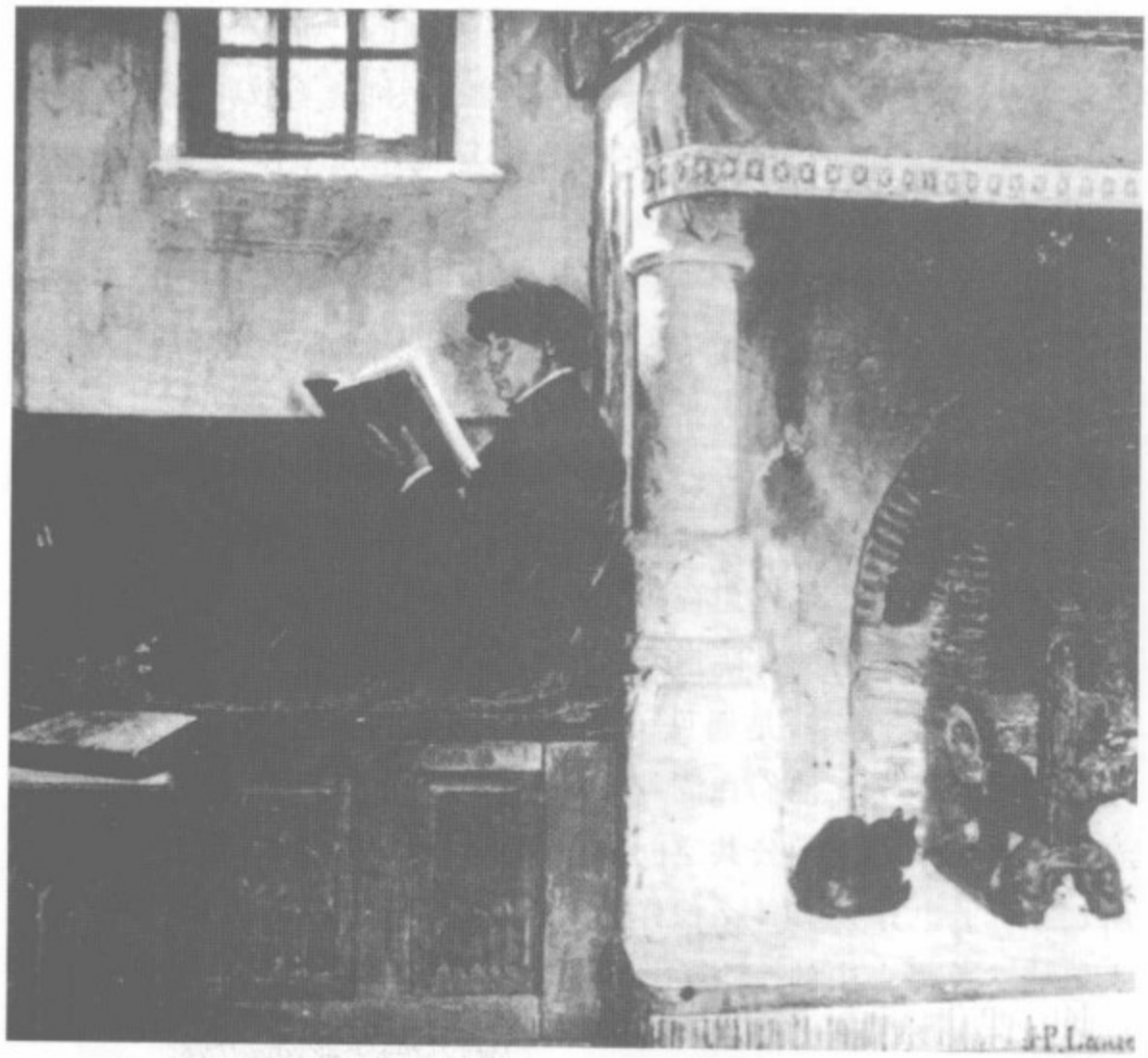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科·奥勒：《学生》。他在漫不经心地看书，而她在安静地缝纫。他们在舒适的小公寓里喝着咖啡，但是他们的关系注定不会长久。

米亚”——生活在默默无闻的贫穷、坚忍克己、消极被动之中，从不沾染恶名。“他们大多死于一种疾病——科学不敢叫它真实的名字——穷困”，他们是肺结核的受害者。他们吐唾沫、咳嗽，使邻居很头疼，所以他们前往慈善机构。只有一小部分人康复并得到社会重新承认，“他们的名字被海报张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画家、雕刻家、作家，但也有与小报有联系的新闻记者，购买漫画、诗歌和幽默故事的小报从业者。

波希米亚人建立了一种与中产阶级模式完全对立的私人生活模式。首先，波希米亚人的时间空间关系与中产阶级的相反。波希米亚人没有手表，生活在黑夜里，而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泡在沙龙、咖啡馆，漫步在城市的林阴道上。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会“在林阴道上走超过十步，除非是遇见一个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和主要的时间花在交谈上，他们在酒吧、图书馆、阅览室里生活、写作。波希米亚人在个人使用公共空间时类似于城里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永远被债权人和州长的代理人追捕。莫格书中的一个英雄，萧诺德，用凹陷的口袋装着他所有

《单身汉的聚会》。一群青年在租来的房间里和雇来的同伴庆祝狂欢。



让-保罗·劳伦斯：《学生》。一个描述历史事件的画家想象中的中世纪的学生。

的财产。经常几个波希米亚人共享一处临时的住房，或者临时搭起帐篷，这样他们很容易就用一些古董艺术品、室内悬挂物或其他装饰品将之改装为一处夜里狂欢的场所。

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将节俭视为有权有势者才有的德行，遇上节日庆典或赌博，一晚上他们就能很轻易地把积蓄、借款或公款花光。他们鄙视私有财产，共享一切，包括女人也可随意转用，通奸可以成为原则。萧诺德收集女人的一绺头发，最后收集了60个女人的。比较随便的年轻女子常常在这种事情上付钱，因为在波希米亚人中，即使两性间的关系不像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等级分明，却还是不平等的。在波希米亚人中也一样，就算有些精明的女人取得成功，或至少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用辛苦工作，男人还是主宰着整个社会。有些女人成功享受着舍巴斯泰因·莫希娅所说的一种“男性的自由”。对蕾丝提格纳克丝小姐来说波希米亚只是块垫脚石，她的年轻美貌征服了整个巴黎。“我一直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尤金·苏的不可能的危险分子里格里特说道。

在公共生活中，爱情是种要求最低的隐私行为。当两人屈从于欲望的剧痛时，他们会远离众人。对性爱来说，一个私人房间、一扇关闭的门、拉上的窗帘都是不可缺少的。性亲密是不能共享的，这点类似于婚姻。

莫格对波希米亚的描述更像一种梦幻而不是现实，但是它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那个地域的年轻人。前往巴黎去做一个作家、诗人或记者，逃离无趣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后来“书的受害者”们普遍拥有的理想。在书中茹尔·瓦利斯对波希米亚有更为悲观厌世的描述。症状之一有点像那些抗拒的准无产阶级（不想成为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的社会最底层者在私立学校和小报馆周围的生活，他们从未发现寂寞比“受难者的第七日——星期天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在星期天里，寂寞是如此不可抗拒”。各个家庭充斥于所有的公共场所，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不管去哪儿，都是遭遗弃的人。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在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时比波希米亚人更为故意和做作，例如传统英国人和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们就将身份差别作为其特别原则。在布朗梅尔，巴比·奥利维利、波德莱尔和佛罗门丁

《波西米亚人生活的场景》（1851 年）：莫马斯咖啡馆，是莫格笔下四位英雄与其女友相会的地方。

等人将纨绔子弟的作风法律化后，花花公子们强调在趋于大同的社会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亚人左倾，花花公子则右倾，他们希望重建一种基于气质和风度而不是金钱和血统的贵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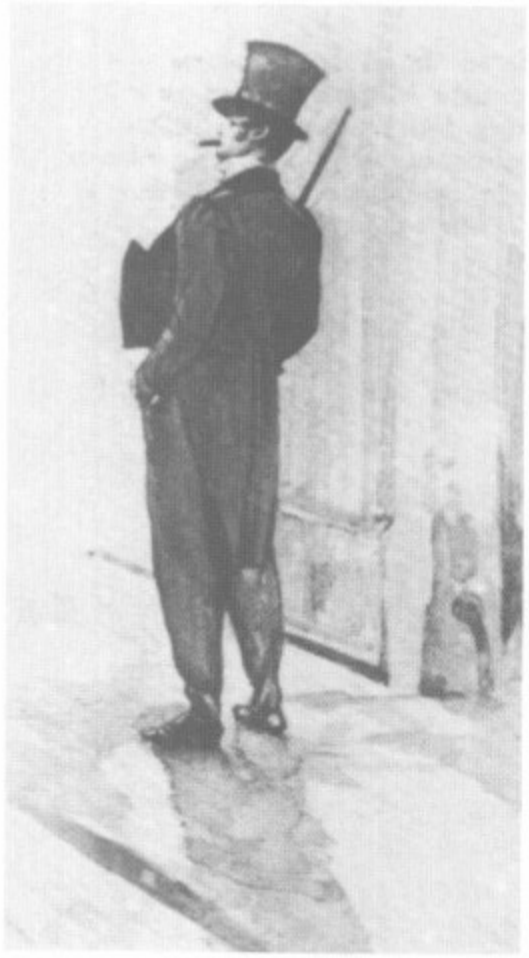
有位公众人物——花花公子——是个市区舞台演员，他将个性隐藏于外表的保护面具后面，并努力使之难以辨认。他喜好幻想和伪装，对细节和装饰品如手套、领带、手杖、丝巾和帽子等异常敏感。龚古尔兄弟这样嘲弄巴比·奥里维利的外表："长年在人格街道上游行的狂欢节"。卡莱尔将花花公子称作"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他为穿着而活"。装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波德莱尔声称自己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小时。然而与旧时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将身体和亚麻布衣服的清洁看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对身体全新态度的标志。巴比每天沐浴，当多病的莫里斯·盖兰不得不返回凯拉时，他姐姐最关心的是缺水和没有更

《年轻貌美的妓女》。马塞特坚决认为她们是"贞洁的、正派的、体面的、体贴的、真心实意的和热情洋溢的。"图中这个妓女在匆忙赶路中轻蔑地拒绝了一位绅士的挑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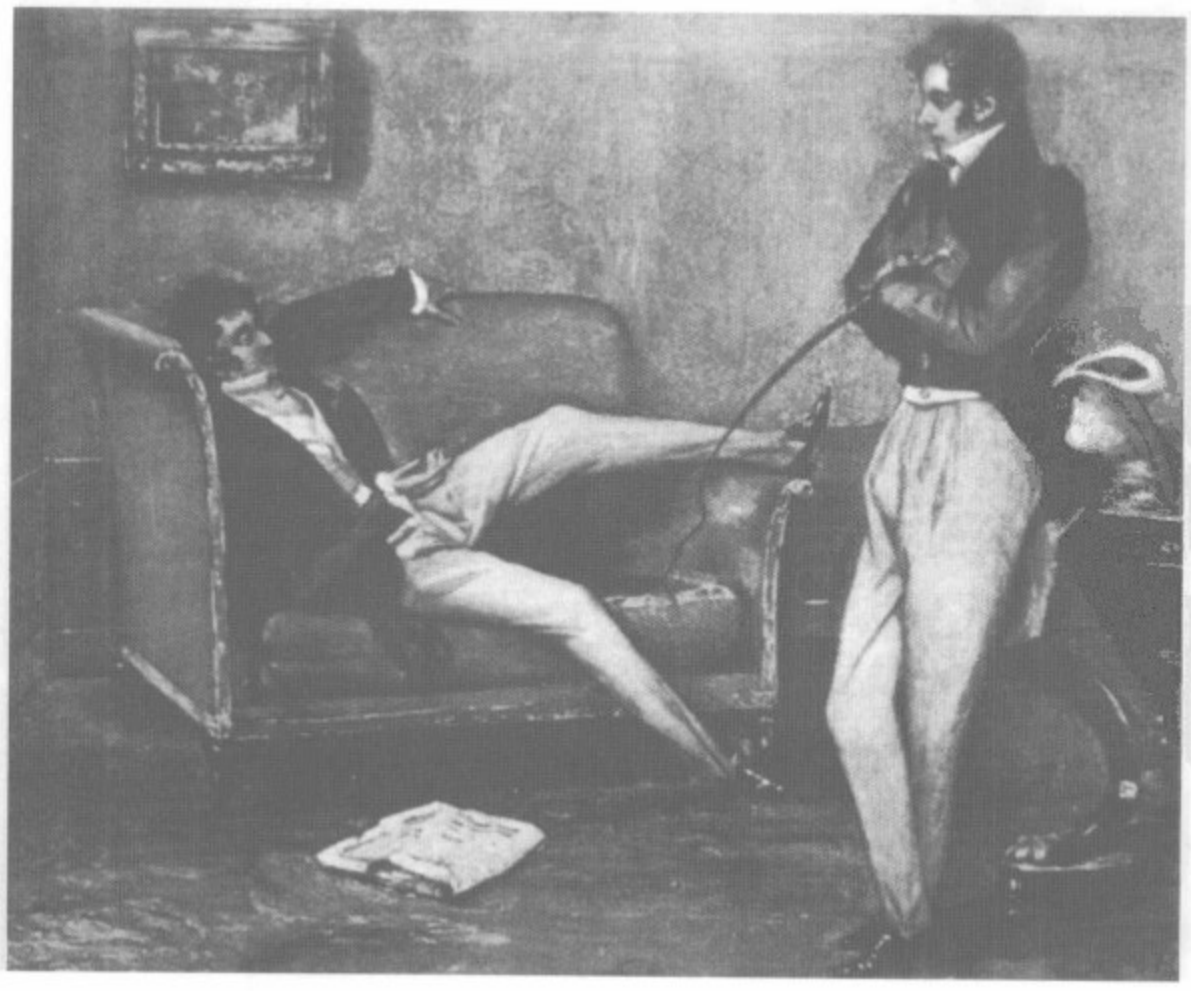
衣室。

如此的习惯需要空闲时间，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虽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亚人的境况好些，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视、对奢侈豪华和赌博的喜好，愿意冒可能不得不过更为清苦生活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资产阶级、反中产阶级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发户（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金钱操纵者的象征）、生意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缚的锁链。性欲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



亨利·杰维克斯，巴尔扎克的《女孩的黄金眼》中的图，1898年。巴尔这位真正的贵族说过：“一个变得富有的人，他生来就是优雅的。”



亨利·杰维克斯：《女孩的黄金眼》中的图。花花公子们既时髦又文雅：在轻快的骑马活动后躺在沙发上放松一下，这是男士之间的友情带来的快乐。

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阿拉伯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女性的孤寂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

亨利-乔治斯·布雷尔德：《读报》。三个老太太中相对而言受过教育的人大声朗读着报纸内容，以缓解朋友们的孤寂感。（1914年美术展览作品）

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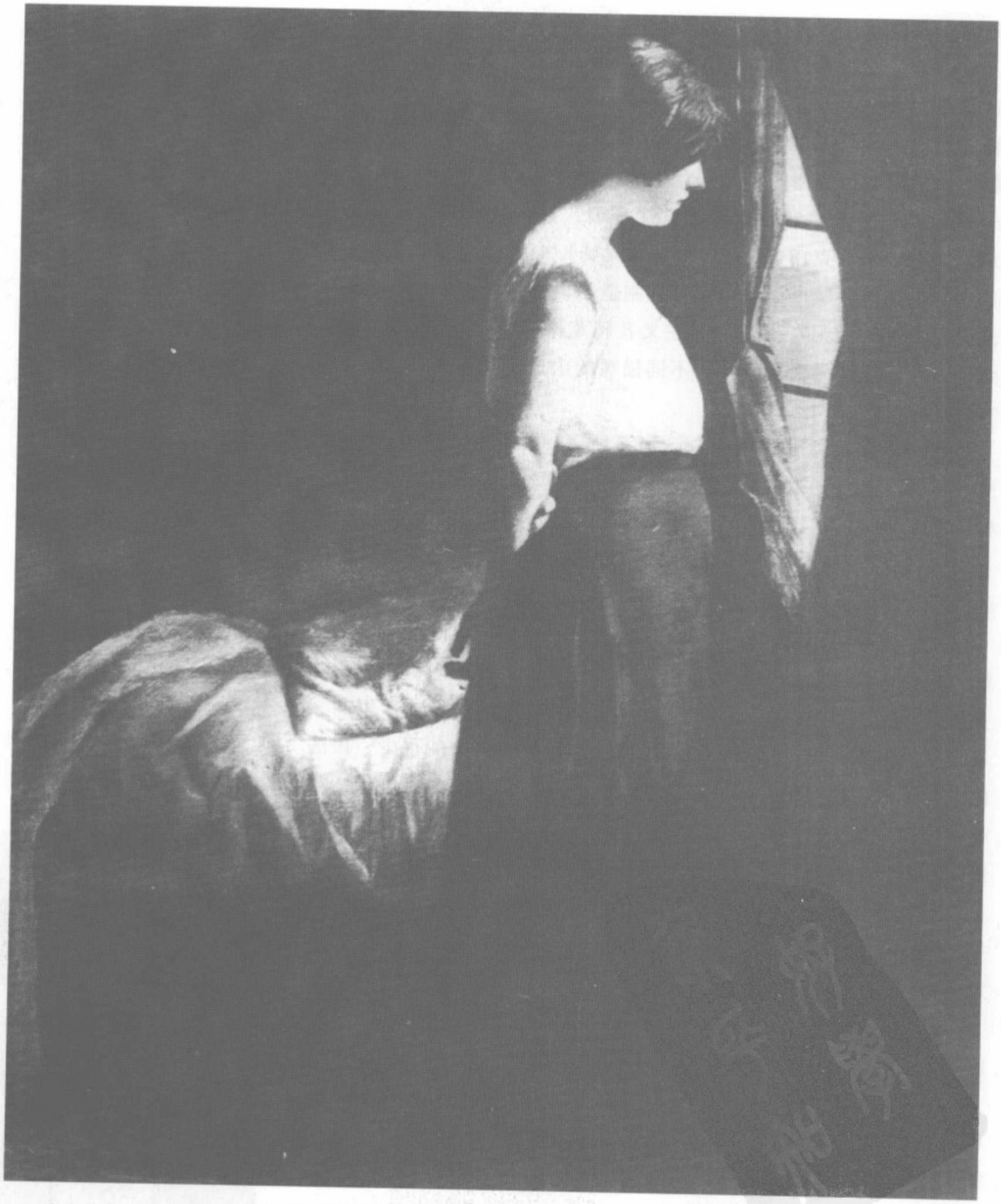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处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处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

里查德·米勒：《老处女》。两个老处女在舒适的客厅里喝茶。（1904年美术展览作品）



寂寞的女性形象。埃德蒙德·德·格里姆伯格：《忧思》。一个年轻女人在寂寞的深夜独自忧思。（1895 年美术展览作品）

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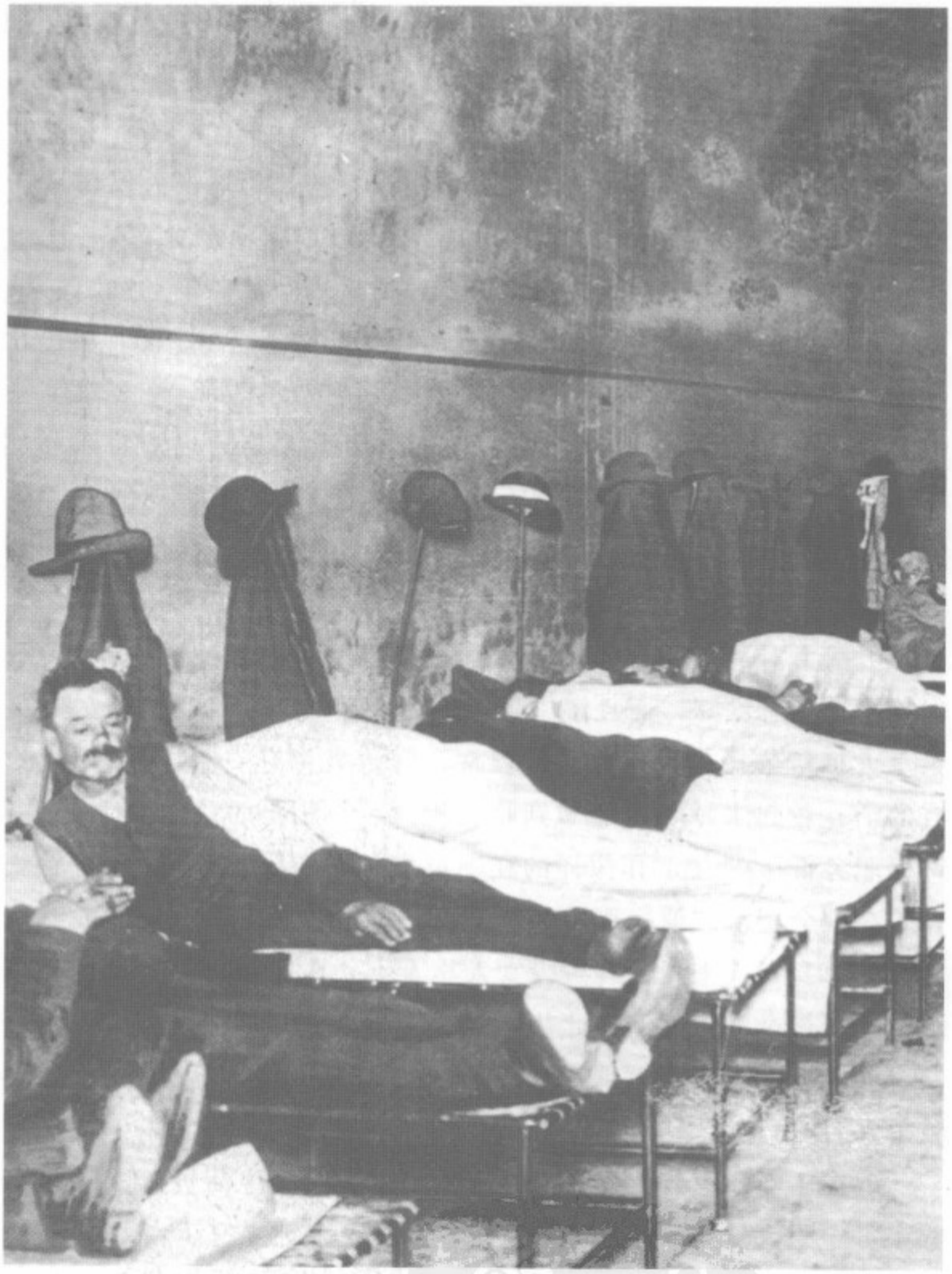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寂莫的女性形象。查尔斯·瓦斯尼尔：《期待》。一个女人在等待——也许是一个男人的到来。她透过家中的窗户凝视着外面的世界。（1910年美术展作品）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妓女试图视

20世纪早期的一家为流浪者提供食宿的寄宿舍。尽管这些房子肯定比大街更舒服，但是这其实是当局为了控制一部分令人担忧的人群所采取的措施。



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

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米尔斯·亚历克西斯·米尔尼尔：《移民》。19 世纪的法国太过浪漫，其国内移民更加安排有序而极少是偶然现象，这幅画中的一对移民夫妇只是象征性地有钱。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无家可归的人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弗雷德里克·巴齐耶：《合家团聚》，1867年。一家人在自然的布景中摆好姿势，围聚在一棵象征着生命延续不息的大树下。

中产阶级的礼仪

对于回忆的渴望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她们往来穿梭，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路小跑地通过走廊，她们雀跃着，欢笑着，喊叫着，彼此推搡着。”万事俱备，只等小伙子们的到来——她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庄园里给小伙子们准备的休息室也在恭候着他们的来临。花束布置停当后，准备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尔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说《假日》也就此开始了。

此次拜访的时间恰逢暑假。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等候着小伙子们。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她们事必躬亲，包括花束的摆放这样的细节，以确保她们的表兄弟们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欢迎。她们流露出的情感标志着此事的重要，她们竭力履行着身为女人的义务，因为总的说来，对私人场合的布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职责。

假日的欢乐不仅表现在空间场所上，而且也体现在时间跨度的构建之中。当孩子们团聚在一处时，总是通过回忆过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发生的事情来彼此问候：

“我们肯定还会做许多蠢事的，就像两年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捉的那些蝴蝶吗？”

“还有那些我们没捉到的？”

“还有那个可怜的癞蛤蟆。”

“还有那只小鸟。”

费迪南德·海尔比斯：《便餐》

“啊！我们将会度过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光呀！”他们大声呼喊着，彼此进行第20次的拥抱。以过去时态（未完成时）叙说的回忆立刻就为未来搭建起了舞台。这是一份允诺，也是一份保证。

当过去未完成的东西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而永不再来时，对过去的哀叹也就变成了浪漫的过去未完成时。

但是幸福可以在记忆中永葆鲜活，而未达成的东西则积聚成可以阐释现在的令人欢愉的纪念品。现在的一切不仅可能得以承受，而且有了记忆的滋养，还可以在将来探询今时得到的极致；飞逝的幸福时光，在时间的涓流中汇聚在一起，转化成持久不息的丰盈果实。

据此观点，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确保他们的幸福，以使他们能够拥有资本积累，留下足够令人欢愉的纪念。同时，成人们也在他们的孩子尚小之时积聚一笔不可替代的记忆的财富。

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本质上是平淡无奇的，但如果将构成它的琐细时刻转化成附着感伤意义的仪式，它的实际价值就会呈现出来。一个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的家庭主妇，有资格被任命为幸福的掌管者。她设定了私人生活的韵律节奏，建立起一种规律性，并指挥了整个演出。

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中，重复并不意味着例行公事的乏味。它被仪式化了，并且这种仪式将会持续到以后。事前，是等候和做准备；事后，是做评述和重温整个经过。欢乐存在于对一天中那些犹如标点符号的各个时刻的期望。仪式化将有价值的幸福和事件结合在了一起，而事件本身也注定要成为一件纪念品。

记录下时光的章节

记忆如同资金一样被储存起来，再像在银行存折上一般被一一记录下来。阿方斯·都德（法国小说家，译注）女士使用了“女性的年表”这样一个短语来描述那些作为纪念物而被女性们加以组合、收藏的日常用品。一个女人可能会把她用破了的手套还有旧衣服收藏起来；而小姐和年轻的姑娘们会用散文、诗歌还有画作等其他的纪念物形式来装饰她们的“纪念册”。

1836年摄影术的发明为一种新式纪念册奠定了发展基础。1850年后，摄影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照片”这种简洁的方式直到1876年才出现。油画人物肖像可以超越时间范畴，在艺术的不朽中来描画所要表达的主题；而照片则保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照片不仅是可以刺激起回忆的纪念品，汇集在相册之中，而且照片上的景象还透射着时光的章节，让孩子们的成长和历经了婚姻、生育、洗礼的家庭成为永恒。

在对布瓦洛家族的研究中，卡罗利娜·考塔尔德-洛伊莱特发现了3本相册，其中包括1860年到1890年间拍摄的约40帧照片。这些照片是记者们送给布瓦洛家族的人的。玛丽·布瓦洛从她的表兄妹们那里收到了几封信，信中答应寄给她一些近来拍摄的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这些相片，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生命个体从7岁时的洗礼到青春期，然后经过婚姻到成人，再成为父母，直至最终到老年的整个轨迹。这项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家族网络规模的具体证据”。当玛丽的女儿们在1901年结婚时，她把她们的照片送给了其他的家族成员。1910年以后，摄影已成为了很普通的事情。在1912年到1914年间，玛丽的丈夫欧仁拍摄的照片装满了16本相册。

私人日记也起着记忆存储仓库的作用。加布里埃尔·拉奎因是一位来自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译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在1890年7月，当她16岁半的时候开始记日记，“从现在开始，过了许多年后，我或许会很高兴地重读这些开始于年少而又

卡罗莱斯-杜兰：《欢笑的女人们》，1838年。一个女孩在女人们中间。仆人是中产阶级家庭统一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欢快的时段的描述（7月12日）。”10月30日，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以后，等我很老时，重读这些日记将会让我感到很愉快，在时光的镜子中看看过去的我是个什么样儿。”

不久以后，她的日记成为了一本参考书。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她也在创造她自己的历史。通过记录下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她构建着自己的生活。“现在”在这些书页中明显是最少的，它已被即刻转化成了过去，转化成了一个参照物。

加布里埃尔的未来是由诸多的梦想构成的，这些梦想都与她和她28岁的表兄路易斯·贝洛尔的婚姻有关。1891年10月3日，那些梦想终于成真，但她仍继续怀着敬意将自己置身于过去（“噢！我是多么幸福！我终生的梦想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实现了。”）和未来（“是的，我当然还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1892年会是我体验成为母亲的欢乐的一年吗？”）之间。她的日记在此处戛然而止，这正是这位年轻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她的日记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对她的个人情感进行秘密观察的处所。甚至

更为重要的是，日记使她记录下了时光的章节，通过将她的现在和时间的溪流相链接，她书写出了自己生命的历史。

20年后，加布里埃尔的大女儿勒内·贝洛尔，在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开始了她的日记。日记中现存的最早的开始日期是1905年，那时勒内13岁，但是从她在1910年3月9日所写的日记内容判断，她开始做记录的时间要远比这个时间早，在她日记的第500页写道："500！它们还在增长！没错，从我开始时算起马上就要满8年了。"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本书，"我们都在比索埃过基督教的诸圣日（11月1日，译注），聚在饭厅的炉火旁……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就在书架上随手翻看，在那里我发现了拉马丁的《我母亲的手稿》。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记我自己的日记。"

私人日记可以提供有关日记作者本人生活的无法估量价值的细节。它们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其中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标记时光片断的渴望。家庭成员间经常往来的信件也激发起同样的渴望。玛丽和欧仁·布瓦洛在1873年到1920年间收到了11000封信件，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族成员寄来的。信件中传达的信息包括孩子、家庭事务、参观游览，最重要的就是亲属们的健康，但在深层次的私人感情方面却几乎是空白。通信起到了礼仪性的功能：它是家族成员之间情感相连的确实证据。信件的价值并不像其往来的规律性所表现出的那么大。

人们可以从所谓的"生日书籍"中看到这种标记时光章节渴望的最纯粹形式。它最初出现在英国，后来是法国。1892年，出版商保罗·奥伦多尔夫出版了一本被他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文选》的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评论道，英国的生日书籍通常都是拜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选集，而他选择了雨果，以表达他对法国民族诗人的敬意。书中每一页正面（即右边）的书页都是空白的，只指示出了月日，而反面（即左边）的书页则印有雨果作品的摘引。

生日书籍有三种不同的用途。首先，可以通过诗人与之相应的思想来评说生日。第二，人们可以对诗人的诗句加以评论（或是让一个朋友来评论）。第三，这种书可以当作日记本使用；对女性而言这是它最主要的用途。

我手头就有一本生日书籍，是一本《维克多·雨果文选》，它曾经的主人是沙托堡的克莱尔。在她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克莱尔以不

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本书。有时，她记录下重要的日期和生日；有时，一般是生活中有了重要的事件时，比如在订婚或是她去俄罗斯旅行时，她会详细记录下某些日子中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记日记一样。她这本小书中的手写文字非常之小，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在一位古董商的手中经过加工才得以重放光彩。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研究这位女性的生活，她希望自己能够幸免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克莱尔的生日是9月1日，年份约是1870年。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1880年。她有时住在巴黎的瓦格莱姆大街，有时住在瑞士蒙特勒的日内瓦湖沿岸，她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座庄园，这座庄园在1896年5月30日被卖掉了，此后，克莱尔和她的父母搬到了一幢租来的别墅中。作为一位小姐，克莱尔的生活中充斥着社交舞会和悠闲的漫步，但对她来说，比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她生命中的高潮出现在1899年去俄罗斯旅行时；她的父亲在1900年8月17日病倒，随后去世；她在1902年2月订婚，同年4月份嫁给埃德蒙；而她的儿子阿尔贝在1903年1月11日诞生。

这本生日书籍的几处评论显示出了克莱尔和她丈夫之间那种挚爱的关系。在1902年4月6日，也就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天，她写道："美好的日子。埃德蒙和我乘四轮马车前往磨粉厂，然后经过当皮埃尔和卢瓦尔码头安全返回。真有趣……我很开心。山楂树开花了。"同年5月15日她的记述是这样的："医生告诉我，我可以期待小宝宝的问世了。当然，我有了所有怀孕的症状！我非常高兴，埃德蒙也是！他说他更爱我了！而我也感觉到他的爱在与日俱增！"8月6日，"我所期盼的可爱的小宝贝，正把我们俩越来越紧密地牵引到一处。"然后，她和她的弟媳一起动身前往保陵根；从8月10日到8月17日，埃德蒙在那里与这两个女人会合。

阿尔贝出生于1903年的1月11日，是个星期天，然后在2月15日进行了洗礼。此后，书中的记录就不那么频繁了。9月23日，我们读到："我和巴贝尔（即阿尔贝）还有努努一起离开卢湾涅前往巴黎和索米尔，我们期待在那里遇到埃德蒙。"11月26日，阿尔贝冒出了第一颗牙，第二颗牙是在12月11日长出的。1904年2月22日，这个13个半月大的孩子在索米尔照了一张相片。6月19日，"巴贝尔走得越来越好了。带着他和埃德蒙一起去了倍雷池塘。美妙的一天。"1905年5月6日，"巴贝尔、路希和我返回了索米尔。埃德蒙很好，

他很高兴分别一个星期后再见到我。奶奶和兄弟姐妹们见到巴贝尔都很高兴，他状况很好，他才两岁零三个月，能走得这么好真是太棒了。真有趣！他爸爸简直都为他而疯狂了！”日记从这里跳跃到了1910年，克莱尔在12月8日把她的儿子带到了蒙特勒。12月25日，“非常漂亮的圣诞树。”12月31日，“所有人都乘平底雪橇进行了滑行。完美的一天。拍了照片。阿尔贝和菲尔蒂一起滑了雪橇。”

最后部分的记录标注的日期已是战后了。我们在1918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发现：“一切都好——与母亲、玛丽和阿尔贝一起度过了冬天。”在随后一年的8月29日，“1919年，巴黎。在巴黎过冬。”

克莱尔的生日书籍是探询私人生活时间问题的一个理想源头。躺在床上，阅读着她的一生，这本书清晰地标识出了一个人从诞生到进入社会这一生命历程中的主要转折点：第一次圣餐仪式；由舞会、远足和娱乐构筑起的青春期；订婚；结婚；然后是分娩和孩子的洗礼，生命的脚步也随之踏上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路途。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一年中不同时间段的重要性，通常以宗教节日来作标记，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

早、中、晚

19世纪时到处都是教你如何拥有正确行为举止的手册，一天的流程在这些手册中被清清楚楚地一一列出。这些手册不断以新的版本或改编形式反复印刷。只举两个例子，帕里塞女士1821年的《家庭主妇手册》被塞那尔女士修改并于1913年以新的名称重新印刷出版；而加康-迪富尔女士著的《家庭主妇完全手册》或称《完美主妇》在1826年首次出现后，又连续多次再版。

这些指南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在19世纪的上半叶，为家庭主妇提供的指南有两种，一种是专为巴黎的都市女性准备的，另一种是面向乡村的。一点一点地，这些书籍逐渐将目标锁定在城市女性身上，对于居住在农村的那些妇女来说，为她们准备的内容仅仅是书后的一个附录而已。就连那些附录也逐渐缩水，直至完全消失，只留下城市生活作为唯一的模式，乡村只不过被视作一个度假的所在。

这些家庭主妇手册继承了前一个世纪家务书籍的传统，它们强调女性作为家务管理者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类书籍的流行也预示

着一种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完全私人化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以家庭派系为中心的欢乐形式。为了享受这种快乐，家庭主妇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来分配时间和理财，而这些新出版的手册正可以教会她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以将她的生活组织得井井有条。书中也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礼仪以及家庭中不同成员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家庭主妇，她不仅要负责组织安排全家用餐这一类的仪式，还要负责拜访、接待和其他构成家庭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社交场合的一切事务。她的义务就是管理好各项家务杂事，方式还要恰当，比如要使整个家庭的康乐安宁得以最大化，而其丈夫又是重中之重。

对于男人们来说，时间只是指公众生活中的时间。一个男人的

埃德加·德加：《贝勒里家族》，约1860年。女性出现在一家之主面前。贝勒里夫人的表情威严而冷峻。这幅画作精确刻画出了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母亲角色：她是居所中的女王，但却是一位受“他”统治的女王。

时间表是以他的公务活动为准来进行安排的。在社会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很少会有男人游手好闲，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他们喜欢的那种方式来安排时日。尽管在1828年出版了一本教导时尚的城镇男人们如何利用闲散时间的书籍，但那个世纪日益发展的针对男性的出版物更主要的部分却是职业指南。单单依靠私人收入来过活的人越来越少。

对于那些在外劳累不堪的男人来说，家就是他们休息的天堂，可能做的事都做到了，就为了使这个天堂成为一处温馨的所在。房屋就是个巢穴，一个时间凝固了的地方。不止是小小的巢穴被理想化了，连身为它的女主人的女性也被理想化了。宛若仙女一般，人们期望她能不费吹灰之力即将一切做得尽善尽美。“就如同歌剧舞台上的机械师，她控制着每一件发生的事，但却没有人看见她的辛勤劳作。”

时间表

作为家庭事务的主管，时间表是女主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她要求她的仆人们遵守它，而她自己也必须小心翼翼地恪守时间表的要求。规律性是分配时间的基本法则，它随着礼仪的兴起而开始。从理论上讲，女主人应该是早上第一个起床、晚上最后一个上床的人。广受推崇的观点是，夏季时她应该在6点半或7点钟起床，冬天则是7点半或8点钟。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女主人就必须擦亮双眼时刻洞悉一切问题。即便是女仆为孩子们洗衣服或穿衣服以及为他们准备早餐，也必须确保孩子们在去上学之前始终在他们母亲的视线之内。

对待仆人要贤明，但也要始终进行监督。中层社会的家庭通常雇用三个仆人：一个贴身男仆、一个厨子和一个女仆。家庭主妇每天都要复习关于家务的书籍，然后定下当天的事务安排（包括家务杂事和当天的菜谱）。她要询问食物、木材和煤的供给情况；在洗衣女工取走脏衣服前和下个星期干净的衣物送回来时进行仔细的检查。

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女仆，那么女主人就不得不弄脏双手帮忙做些家务杂事了。但如果有足够的佣人来做这些活计，那这位夫人就可以自由安排早间的闲暇时光了，比如阅读邮件，弹弹钢琴，做些缝纫或是编织。有教养的女人在早上是不外出的。如果一个人在不

恰当的时候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位知名的女士，不要向她问候，这是礼节的需要，就假定她是在进行某些她不愿多说的慈善或是宗教活动。

用餐

家庭主妇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用餐成为一个特别的时刻，因为此时全家人都围坐在餐厅的桌旁。在19世纪法国语法学家及辞书编纂家拉鲁斯编辑出版的综合百科全书《19世纪通用大词典》中，“正餐”这一词条描述出了典型的家庭用餐：“每个人都在：祖父，孩子，而所有人当中最小的婴儿被固定在一张高背椅上。光洁的白色桌布上是干净的玻璃瓶，葡萄酒静止其中。女仆把餐巾围在孩子们的脖颈上，然后端出菜汤和羊腿。妈妈斥责勒内不要吸吮手指，而欧内斯特则在戏弄着他的小妹妹。婴儿在他的椅子上烦躁不安，爸爸给他割了一小块儿肉，放在他的盘子里，或是拿着一串葡萄在他脸前晃来晃去，然后才给他。”

上面描述的场景在其他地方被称作是午时的一次正餐。而在巴黎，在每天的那个时候人们则在吃午餐。

拥挤的餐桌，轻松的晚餐，没有仆人的打扰，快活的叔叔讲着他的笑话。餐桌旁洋溢的随意气氛烘托出一份亲昵。

法国的面食糕饼店是吃快餐的地方。女人和甜腻的面食糕饼使小店充满了世俗感。

用餐的术语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在其他地方，一个人在正午“进餐”，而在晚上“进晚餐”。在巴黎，晚餐是指在凌晨一点或两点在舞会或是盛大的社交宴会后吃的一顿冷餐。巴黎人的用语最终成为了标准，但在其他地方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人有时使用“晚餐”来表示“吃晚饭”，而用“夜宵”来表示巴黎人的“晚餐”。

用餐时间在19世纪的历程中完全被改变了。早餐是在醒来后随即吃的那一顿，包括一杯牛奶、咖啡、茶或是巧克力加一小条面包或烤面包圈。“第二顿早餐”是在上午10点钟到中午之间吃的，包括主菜前的小吃、冷盘和其他小吃。烤肉和沙拉只是在时间有些提前时才吃。泰纳（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译注）作品中的英雄弗雷德里克-托马斯·格林道奇，在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是在11点时吃早餐的，包括冷冻的鸡肉或鹌鹑，再加一瓶波尔多葡萄酒。

正餐时间的变动幅度比其他进餐时间都要大。它通常会被推迟到一天的晚些时候才开始。司汤达曾在作品中描述，在1805年，晚

餐的客人被邀请在5点钟到来。他自己偶尔会吃得早一些，比如在1808年5月3日："差一刻4点时，我吃了烤羊肉、炸薯片和沙拉。"帕里塞女士在1821年写道，18世纪的巴黎人在不迟于下午4点时吃晚餐，而现在则不会早于5点甚或6点。以她的观点，晚餐时间向后推迟的原因在于，在一天中此前的时间里男人们都是公务缠身的。

而到了18世纪末，晚餐的客人被邀请在7点半左右来。今天的礼仪通常是希望人们能提前5到15分钟的时间到达，而那时的礼节恰恰相反，客人们可以有15分钟晚来的时间宽限，此后一干人等才会围桌坐定。有些人对新的晚餐时间很不适应。有的老人就会告诫客人们在5点钟来吃晚饭，因为他们"六七十岁的胃"可适应不了时尚所需的新时间。随着晚餐时间的后延，人们开始采纳英国人"五点钟茶"的习惯做法，经常是吃一些小吃。

一顿饭并不只是食物的消耗，还是家人团聚的时刻。家庭主妇手册中就十分强调女主人营造和谐的用餐氛围的重要性。塞尔纳女士在她1833年的《夫人手册》中就强调说："对餐桌氛围的呵护不应仅在有客人时才予以注意，出于对丈夫的考虑亦应如此，以使家庭生活更加文明。我是经过考虑才使用'文明'这个词的，因为'文明'的标记将可以使我们获得对快乐和高贵的双重满足。这一点务必要做到，因为由于社会生活的侵占，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除去吃饭的时间几乎就没有其他时间能享受家庭生活，并且出于日常经验和延长寿命的考虑，将用餐时刻营造成欢欣的时刻有利于消化和彼此关系的融洽。用文雅的交谈使你的餐桌变得活泼生动，这里有足够多的理由。"

家庭中的午餐很少会邀请外人来吃，因此也就不必铺设桌布。而午餐时家人聚集在一起的传统也逐渐消失了。男人们太忙或是工作地点离家太远而无法回来吃午饭，如果工作地点与家不在一处，通常就不会仅仅因为吃一顿午餐而打断工作了。1908年，在一本名为《世界的方式》的书中就建议避免聚在一起吃午餐，因为停下来吃饭会打乱全天的节奏。

一般说来，星期日午餐或晚餐包含了家庭礼仪的全部内容。像节日一样，星期天的就餐提供了全家定期团聚的机会。40年后，乔治·桑还温馨地回忆起19世纪的前10年即她童年时在博蒙叔祖家参加星期日晚餐时的情景："每周晚餐是一项古老的也是最受赞同的

习惯，来的总是那些相同的客人……5点时我和母亲准时到达，准会发现我的祖母已坐在炉火旁那张宽大的手扶椅上，而我叔祖那张巨大的手扶椅就在她的对面。”1895年，莫里斯·热那瓦也满含相思似的怀旧情结回忆起了遥远过去的星期日礼仪：“我们习惯于在一起吃晚饭，我们有10个人，围坐在我祖父母餐厅中的餐桌旁……为什么当我追忆起那些周日晚餐时总是会想到冬天？也许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们已灌输给我太深的温馨和谐的感觉。”屋外是寒冷的冬夜，而屋内温暖无处不在——这正是思想家们幸福的理想，从卢梭到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译注）莫不如此。

白天

下午的时间要用于社会事务，有些可以在家中完成，其他的必须外出去办理。从1830年开始直到1914年，正常情况下女人们都会留出特定的一天时间来接待客人。社交季节开始后她们会发出卡片，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某天某时到家中。”在19世纪下半叶，女人们接待客人的时间在其他地方是2点到6点之间，在巴黎则是3点到7点之间。

传统上，家庭主妇一般坐在壁炉的右侧。1880年前后，时尚发生了变化，女主人占据的是置放在客厅中间的一把椅子。她要起身欢迎女人、年长的男人和牧师，但对男人只是坐在那里问候。即便女人再多，也总会有男人来，但大多是有着私人收入或靠写作为生的男人，当然也有对政治和商业贸易颇为关注的人来，他们无论如何总要挤出点时间陪夫人拜会一下朋友。到了19世纪末，对于这些男人来说，下午抽出时间来参加类似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许多女性选择在晚上接待客人，从8点开始。

客厅中有桌子，上面摆放着蛋糕、花色小甜饼和夹心面包，由女儿们为客人们上茶。女客人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她们一下午通常有好几个这样的招待场合要出席。15分钟到半个小时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停留时间。

到达客厅尤其是离开客厅时，人们一般什么都不讲，以免打断别人的交谈，简单地握一下手比较好。最好选择在一个交谈停顿的间隙离开，然后毫不犹豫地起身。当人数众多时，应以“英国人的方式”离开，也就是不向这家的女主人告别。在某些沙龙中，在接待日那一天会有许多客人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曾有人说他的母

玛丽·卡萨特，《五点钟茶》。女人们在享受幕间休息。

亲在每个星期五要接待多达200位的客人。

在19世纪上半叶，一个待客的女主人的双手是不应该闲着的，比如在交谈时做些刺绣或钩织的活计。这有助于一个女人成为一个亲切的主妇，并有机会展现出她的优雅和品位。

在其后的50年，时尚又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认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待客时做活是一种粗俗的表现，以前的刺绣和编织不再被认可。个人爱好和社交接待变成了一对矛盾。

人们逐渐厌倦了“白天”的礼仪。那些不希望每个星期都有一整下午要被束缚在家中的女性们，仍然保持着接待日，但只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或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二才接待客人。随着战争的爆发，“白天”已不再流行。

拜访

下午时，如果一个女人不在自己的家中接待客人的话，她会觉得有必要出现在其他人家的客厅当中。她也有责任与其他为数众多的家庭保持联络。在瓦涅尔的母亲的拜访名单上就有48个名字。

进行拜访的机会很多，“不管一个人是否参加了晚宴或舞会，都可能被邀请来一次‘面包加黄油’式的拜访；如果你希望与某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按礼仪一年之中要拜访四到五次，但不能再

多；婚礼后表示祝贺的拜访十分重要；吊唁；每年对长辈礼仪性的拜访，其间要带上妻子；还有在旅行前后拜访那些可能在你外出期间找你的人。”

如果你拜访的人不在家，通常的礼仪是给仆人或看门人留一张拜访卡片，将卡片的角儿或一条边折起来，这要依当时的时尚而定。一张折叠的或是“狗耳朵”卡片表示某人亲自造访过；而未经折叠的卡片则表示是由仆人或代理人留下的。也可以通过广告雇人留卡。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卡片式拜访”被认为非常粗俗，但在随后还是变得非常流行。

必须进行的一些拜访占去了一个女人的大部分时间。无视礼仪很容易使一个人得到“有怪癖”的名声。

组织协调好社会关系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家庭主妇的职责所在，她必须保持与其他家庭主妇进行沟通的渠道畅通无阻。中产阶级的妇女对这种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通过在特殊的日子举办沙龙或接待和拜访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声望。礼仪上的彼此效法使社会交织为一体。

晚间活动

剧场或歌剧院的包厢是沙龙的延伸，有一个事实也许看起来有些荒谬，因为剧院本是公共场所，却被如私人的一般对待。根据19世纪广为认可的合适的行为准则，一个女人可以独自去剧场，只要她是坐在包厢里。如果她坐在乐队演奏的地方或是楼厅之中，就必须要有男人陪伴：丈夫、兄弟或是亲戚，因为那是开放的空间，一个女人需要护花使者，除非她愿意被当作是妓女。

不管怎么说，包厢是一个独立的、受到保护的空间，是移植到剧院中的家。社会繁荣稳定时交一笔年度包厢定金已是当时的习惯。1850年在鲁昂的艺术剧院，包厢中每个座位的价格是男士250法郎，女士187法郎。最舒适的方式是租下一个包厢，再像布置沙龙一样添置好各项设备。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这样一个有着六个座位的包厢要花费1800法郎。

一个女人在包厢中的举止就如同在她家中的客厅里一样。她不能离开包厢在剧场中走动，但可以像在家中一样以同样的礼仪接待朋友，她可以允许他们引见亲属。

晚间活动的性质要依人而定，只有家庭内部成员在场还是有外

沙龙是举行社交聚会的地方。上图：19世纪晚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举办沙龙的客厅。下图：用茶时支起一张折叠桌，这是由女人和主妇们主宰的时刻。

来的客人；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家境是富裕还是相当窘迫。要记住，在电被发明之前夜晚是被吞噬在黑暗之中的。1909年出生在巴黎的伯纳德·卡佐，是在煤气灯照明的公寓中度过童年的。至今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拜访朋友见到电灯时的惊异。电将黑暗的角落和阴影一扫而光。

这项小小的发明直到1890年才在巴黎的公寓中开始应用。在19世纪初期，家境好的人点的是蜡烛而不是便宜的牛脂，有些人使用的是卡索灯（法国人卡索在1800年发明的可自动调节的油灯）。1825年之后煤气灯在私人家庭中开始普及。1828年，巴黎共计有1500个煤气用户，到18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将近9.5万户，19世纪末时则到了22万户。1855年，几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型的煤气供应公司，使煤气价格从每立方米0.49法郎下降到0.30法郎，人们更易于支付这笔费用了。

在天主教徒的家中，夜晚有时是伴随着例行的祷告开始的，拉马丁夫人在1802年9月5日将这称为“一个最感人也最有益的习惯”——对仆人们有益，他们可以与主人们共享一天中的神圣时刻；对主人们有益，可以使祷告者们想起基督教平等的思想。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纷纷仿效这种贵族化的家庭祷告的传统。

家庭聚会时经常会玩些纸牌游戏和掷骰子游戏。拉马丁夫人在1806年9月份时与她的丈夫下国际象棋，而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或读拉封丹的神话寓言。大声朗读是父母与孩子们共享欢乐的一项活动。

最重要的是，夜晚是家庭成员在壁炉边无拘无束进行亲密交谈的时机。奥拉斯·雷生在1828年完成了一本关于礼节的书，书中说：“置身于粗糙的礼仪规则带来的不快和沙龙讲究礼节的快乐之中，如果我同样不提及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炉火边平淡的快乐，我会觉得自己玩忽职守了。”为了详细阐述这种19世纪颇为典型的平淡快乐，他间接地提到了早些年代的法国人，那些法国人住在哥特式的城堡里，对壁炉的价值赞赏有加；他也因此展示了那些法国人对家庭艺术的掌控。

对炉火边融融家庭的重视可以与将家比作巢穴的思想相提并论，这种思想经过一个世纪的积蓄，最终变得令人痴迷。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当炉火逐渐从家庭中消失时，炉边那温馨的景象依旧在

保罗·加瓦涅：《包厢》。包厢是介于公开和隐私之间的沙龙，有时其间的阴谋诡计足以与对面舞台上的相提并论。

人们的脑海中浮现。19世纪的下半叶建造的堂皇的建筑装备了热气炉，取代了在壁炉中烧木头和煤的炉子。而同时，公立学校中的读物已使小型中产阶级家庭围聚在灯下炉边的印象深入人心。

如果邀请了外来的客人，晚间的重要性就会发生改变。客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主人的熟悉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变数。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表达对18世纪社交形式的怀念与向往。龚古尔兄弟这样的中产阶级将那个时代的晚间理想化了，在他们眼中，那时的夜晚融合了最优雅的奢华和最完美的交谈。

那些在法国大革命前频繁出入波旁王朝和拿破仑一世宫廷的高贵的女士们，帮助创立了一个神话并使之不朽，这就是一种社交理想化的社会政治制度。1836年，阿尔朗泰斯公爵夫人在《沙龙故事》中描述了不久以前的晚间岁月，在那些日子里，社交圈子由大约80个彼此经常见面的人和其他200个每星期奔波辗转于各个沙龙间的人组成。男人们打台球，女人们刺绣或画素描。凌晨2点时的晚餐是夜晚的高潮，那时的交谈变得私密“甚至有一点下流”。

这是有电之前为人熟知的一个物件。

拿破仑一世的倒台标志着这种压缩了的社交圈的终结和盛大交

际晚会的开始，各色人等没有区别和不受歧视均可参加。特洛普夫人在1835年参观巴黎时，对“晚餐”的没落感到遗憾，以她的看法，晚餐包含着法国生活方式的巨大魅力，在其间可以遇到优雅的人，但现在却已被那些社交晚会取代了。

晚间是业余爱好者举办音乐会和演出戏剧的理想时间。尤其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受到限制，人们只能和朋友们自娱自乐，成立音乐家和歌唱家团体，定期在某个成员的家中聚会。

乔治·桑曾叙述说，那时有许多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们聚到一起，成立乐团，演奏室内乐，业余的音乐创作非常兴旺。巴黎以外的地方的普通人也同时是艺术家，再小再破的地方也足以完成一次很好的四重奏，每个星期人们都会聚在这个或那个音乐爱好者的家中共同演奏和欣赏音乐。但这种高雅的放松方式随着老鉴赏家们一起逐渐消逝了。乔治·桑在写她的论文集时说，人们已丧失了创作音乐的习惯。

B.夫人出生于1894年，在卡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作为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她和她的兄弟还有朋友们组建了一个管弦乐队。他们在日常进行排练，然后每隔一个星期日为亲朋好友们演奏

让·贝拉：《舞会》，1878年。讲究礼仪的中产阶级在重大的行为方式上已经社会化了。他们在家中举办音乐会，进行游戏、跳舞，被邀请的人数日众多但又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特定人群。

在19世纪，盛大的社交晚会或者说是英国风格的社交晚会取代了私人晚会。

一次。在单数的星期日里他们则打桥牌，这在当地很流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中产阶级的费利克斯家族因他们歌唱的声音赢得了广泛称誉，其表演经常会吸引大批听众。

业余剧场是另一项得到广泛实践的活动。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人们聚在一起，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一半人用手势作表演，另一半人观看然后努力猜出是什么字，如果他们胜了，双方就互换角色继续进行。

其他的游戏也在与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争宠。在19世纪30年代，活画（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成为了时尚，“一个覆盖着帆布的沉重画架被带入沙龙，后面是装扮停当的人，他们仔细摆好姿势来表现某些特定的英雄人物”。但是活画有个很大的缺陷：要想把形象表现得准确贴切，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那会打断夜晚的流畅性，使大家产生压抑感。

除了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人们还通过排演喜剧来自娱自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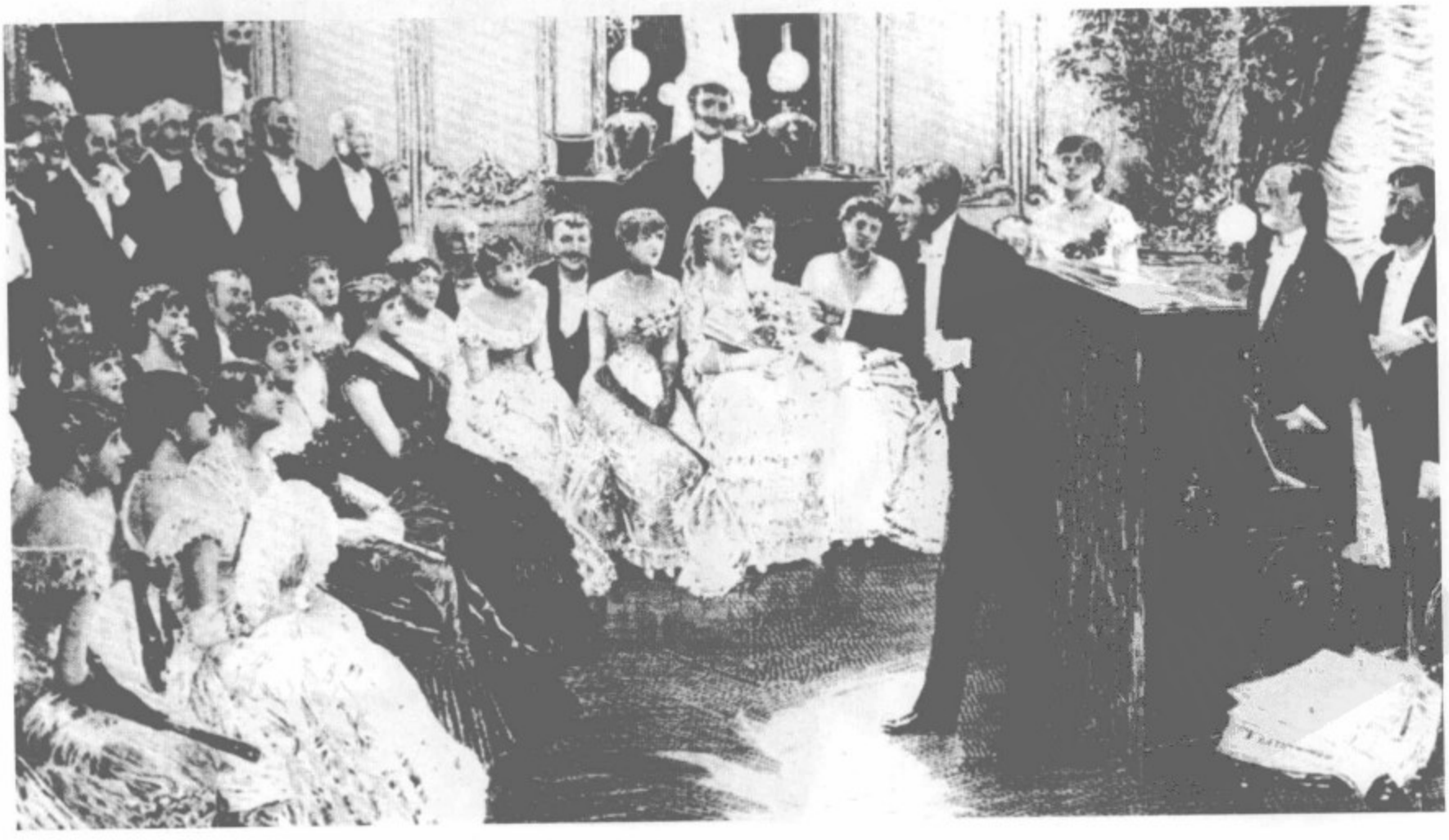
其范围从设备简略的为家人朋友演出的小型表演，一直到正式盛大的舞台喜剧。闲暇无事的社会名流们会专门学习喜剧，然后再为多达400人的观众进行演出。

孩子们也会摹仿他们的父母进行业余的戏剧表演。比如在每年年初，勒内·贝拉尔和她的妹妹就会邀请一些朋友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她们表演一些短剧。

人们也会举办舞会，在舞会上大家轮流弹奏钢琴，其他人跳贴面舞和波尔卡舞。贴面舞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期间非常流行，其后发展为四对方舞。波尔卡在1844年通过布拉格来到法兰西。华尔兹舞的名声却不好，它在18世纪末期被引入法国，1820年时宫廷中仍然禁跳这种舞。1857年，福楼拜因为在描写华尔兹舞时没有注意隐去性描写成分而遭到起诉。19世纪末期，探戈舞也遭遇了相似的境况。

业余的表演有其自身的限制。举行真正的盛大晚会时会雇用管弦乐队来演奏舞曲。雇用歌剧的女主角来进行私人的独唱会也很流行。这样，晚间的娱乐也就有了一种私密的性质，尤其是当主人的女儿们演奏钢琴时，更成了一种卖弄炫耀的方式。不管怎样，享乐

喜剧演员、歌手、魔术师和催眠士使客人们开心。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戏剧明显偏爱。请注意，穿着黑衣服的男人们与穿着白衣服的女人们是严格隔开的。



总是私人事务。

每年的假日

暑假和宗教节日标记着岁月前进的脚步。贵族们的暑假演变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夏日度假。这一时期见证了安逸享乐意识形态的诞生。学校的假期最终被延长了。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不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都得依靠基督历法过日子。从圣诞节到诸圣日，从耶稣基督诞辰到其死亡的节日，岁月的年轮就这样转动着。在某种意义上，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家庭假日。形式依旧，内容已改。举个例子，圣诞节已逐渐失去了与耶稣在伯利恒诞生这一事情的联系，现在已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家庭只是把基督教节日当作一种自我庆祝的方式来加以尊崇。

圣诞树

圣诞树可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7世纪上半叶，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把它们带到了德国，但是这种风俗直到19世

吟唱歌谣也是一种教育的形式。

詹姆斯·蒂索：《嘘！》。是艺术家还是女儿？女儿们通常以钢琴来展现自己，因为钢琴是“女人的麻醉剂”。

纪初才风行开来。后来，歌德在1765年到莱比锡拜访一位朋友时，在其屋中惊异地发现了圣诞树（但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风俗却坚持认为，圣诞树是1605年在他们那里的住宅中被发现的）。

1840年，这项德国人的风俗被同时引入了英国和法国。该风俗在第二帝国期间受到欧仁妮皇后的推崇，圣诞树的传统由此被确立起来。1870年的溃败后，离开阿尔萨斯和德国的难民们将其广为传播。但对于词典编纂者利特雷和拉鲁斯来说，圣诞“树”不过是冷杉的一个“大枝杈”或冬青树的小枝，再装饰上给孩子们的糖果和礼物，仅此而已。

19世纪末期，这个风俗似乎已经被法国“国家化”了。每年都会有完全装饰好的圣诞树送给在格陵兰和非洲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法国家庭中的圣诞树几乎与今天各家各户的圣诞树一模一样。

基督诞生塑像

利特雷在1863年时并未提到教堂和家庭中的基督诞生塑像。几年后，拉鲁斯提到了基督诞生塑像，但仅是在教堂里，那里有专门

的人对它进行悉心照看，他对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教堂中的饲料槽发表了长篇谩骂，因为他发现他们亵渎了神灵、在教徒中引发笑声，他认为他们该受到天谴，但他也提到了一个进步的迹象：天使在试着讲法语而不是方言。他说，告别旧传统的时机已然到来。

在天主教教堂中，一定有许多这样的基督降生的塑像。根据夏博阁下的记载，在1906年有三万多个价格从20法郎到3000法郎不等的这种塑像被售出，大部分都由七或八个基本图形构成。马赛出产的基督诞生塑像用意大利的黏土制成各个人物，特点鲜明，尤其受欢迎。

德国人的范例

在圣诞树被进口到法国之前，许多法国的观察家们都表达了对德国风俗的看法。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的口吻充满了感伤的怀旧色彩，其实圣诞树正是已经不再时尚的古老的法国风俗。1830年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当时的那一代人已很少关注这样的古老风俗；而德国人正相反，他们是尊崇国内民俗的模范。

连部分法国人都承认他们自己不太懂得如何营造好节日的气氛。在德国，礼物“从天而降”，被基督的孩子们取走。照着德国人的样子，法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且使岁末的节日成为几代人在炉火边相聚的大好时机，对于祖父母们来说尤为如此。

在1830年和1849年，人们的论调是一样的，都赞成将岁末节日私人的一面发扬光大。感受到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在1830年，另一次是在1848年）的结果，作家们在社会公众生活的不稳定性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之间做了一个对比，记者们在1849年总结道：“家庭的欢乐是唯一的幸福，革命永远也无法把它从我们身旁夺走。”

欢乐的假日

1866年，居斯塔夫·德茨对一个家庭的新年庆典做了详细描述。新年那一天的早上7点，小宝贝挠抓着父母的房门祝他们新年快乐。他的爸爸把他放到大床上，仆人引燃了炉火，一切都温馨惬意，大家交换着礼物。对于德茨而言，家庭中的幸福时刻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所有类似的欢乐都以独特的热烈方式浓缩在新年这一天当中。到1866年时，已没有必要再引用德国人的范例了。德茨对那一天活动的描述，就好像他们是在遵循一个久已有之的风俗习惯。家，是

圣诞树在1840年前后被引入法国，到1900年时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圣诞树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转道德国来到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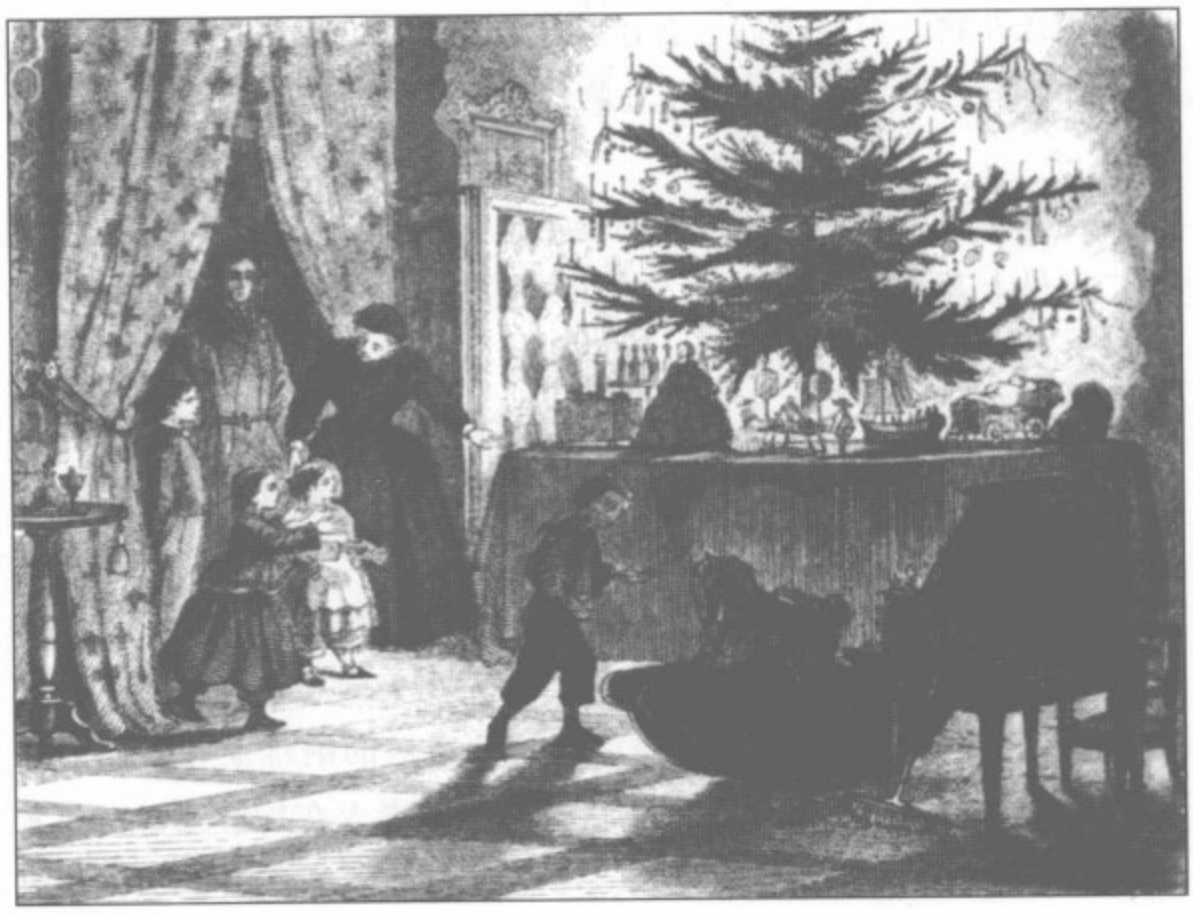
不可替代的弥足珍贵的幸福源泉，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越来越肯定。在节日的礼仪中，孩子们成了主角。

年夜饭和节日礼物

利特雷在1869年将“年夜饭”定义为“在午夜尤其是圣诞节的晚上吃的一顿特别的饭”。他没有提到动词“吃年夜饭”，对新年的夜晚也没说什么。我找不到任何关于12月31日晚上的家庭庆典或晚餐的信息。福楼拜曾回忆起等候午夜来临时的情景，有时抽烟，偶尔还会想到中国。

天主教家庭集体进行午夜静候，然后吃晚餐。由于在圣诞节前夜给仆人放假已成习惯，因此这顿饭非常简单，包括两个传统的菜肴：一种是和华夫饼干一起吃的香草麦片粥，再有就是烤香肠。也有火鸡这样的冷盘，饭后甜点是冷冻的糕饼和冰冻果子露。

为圣诞节而准备的糕饼各式各样——华夫饼干、玉米粉薄饼和卷边果酱馅饼。地方的风俗很多，各有不同，但却没有今天在法国最为流行的圣诞糕饼——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19世纪，每家唯一的一只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圣诞前夜被置放在炉火上，并且整夜烘烤着——这是一项古老的乡村传统，人们整夜不睡，然后在圣诞节的早晨迎来破晓。



欧仁·德维拉：《新年礼物》，1846年。书籍是给父亲们的，珠宝盒是给女士们的，摇动木马是给小男孩的，相册是给小女孩的，送给所有人的是友爱亲情。送礼物是一项值得尊重的礼仪。

送节日礼物最初是天主教的风俗，在19世纪下半叶时，演变成为一项宗教庆祝仪式。到20世纪初，几乎人人都加入到互送节日礼物的行列中来。节日为家人和朋友找到了一个团聚的理由。火鸡和烤香肠依旧在礼物的清单上，但热乎乎的肉煮清汤代替了香草麦片粥，而法国人采用了英国布丁（一种以面粉、牛奶、鸡蛋等为基料的糊状甜食）作为圣诞的象征。所有的杂志上都会刊登制作英国布丁的处方。传播到法国的另一项英国风俗是在槲寄生小枝下接吻（槲寄生是桑寄生科的美洲寄生子属植物，其小枝常用作圣诞节悬挂饰物，按西方风俗，只要是站在此小枝下的女子，男子都可与之接吻，译注）。

新年礼物是在1月1日互送礼物的一项古老传统。这项风俗后来演变成主人有义务在新年时发送红包给仆人、看门人、邮差和其他人等，这项义务使每年的第一天成了耗费昂贵的痛苦体验。报纸强烈讽刺这一风俗，认为人们的友谊已维系于小小的礼物之上。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年礼物是人们指在岁末的长假期中互相交换的各种礼品。一些作家，比如格兰德梅森，就试图在1892年开出处方，确定送每种礼物的恰当时间：圣诞节送小礼物给孩子们，新年那一天送新年礼物给成年人。但事实上，大人们在圣诞节

时也互送礼物，而孩子们也会在新年时送礼物。最终，所有的礼物都不加区分地被看作是“新年礼物”。

圣诞拖鞋

在圣诞前夜，法国的孩子们会把他们的拖鞋放在壁炉前，希望第二天早上其中能塞满礼物。被谁塞满呢？是不会说话的耶稣还是圣诞老人？信谁的都有，但一点点地，圣诞老人占了上风。

罗伯特关于正确命名的词典告诉我们，圣诞老人最初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欧洲，美国人将其引入，这是一项商业创造。毫无疑问，商业上的考虑为圣诞老人的成功推力不小，但圣诞老人并不是传播者发明的，其原型也许是圣尼古拉（小亚细亚米拉教主，是儿童、海员及一些国家和城市的主保圣人，在美国和英国是圣诞节的主保圣人，译注）。圣诞老人很可能是被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移民引入美国的，并在那里变得商业化了。圣诞老人在19世纪初在巴黎确立了其地位，并随着时间推移一步步扩大了其影响。1804年出生的乔治·桑曾叙述过她童年时的圣诞节：“我无法忘记的是我对那个小小的圣诞老人深信不疑，他是个长着白胡子的、和蔼慈祥的老头儿，我确信他会在半夜时顺着烟囱下来，在我的拖鞋里留下一份礼物，我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它。午夜！孩子们一无所知的幻想时刻，他们被告知时间太晚了不能再醒着不睡了。为了在那个小老头儿出现前不至于睡去，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我非常渴望见到他，也有些害怕。但我却总是熬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于是第二天一睁开眼就马上去看壁炉边的拖鞋。我迫不及待地光着脚跑过去占有属于我的财富。那永远不会是什么华贵的礼物，因为我们并不富裕，而仅仅是一个小甜饼或是一个橙子或是一个漂亮的红苹果。但对我来说它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吃掉它。”

圣诞老人与基督的诞生没有任何关系，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他所扮演的圣诞角色。天主教徒假想着在圣诞前夜带给孩子们礼物的是耶稣。但耶稣代替不了圣诞老人，教会无力阻止红衣、白须、挎着一大篮礼物的圣诞老人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只好把他说成是耶稣忠实的信使、对善良行为进行褒奖的朴素道德的师长。

在12月份，按照传统，报纸通常会设专栏向读者们提出礼物方面的建议。这些主意中有许多是与送给女性的礼物有关的：双人座椅，缝纫台，闺房中用的小装饰品，彩色的、有香味的、平滑的信

纸，以及样式奇特的拜访卡。“为女人准备一份好礼物”，也许会有人这么说，但绝不会有人对男人的礼物说出同样的话；在19世纪，尚不存在专门的男性礼物，顶多这个礼物是“男女皆适”的。这种专门类别礼物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男人收不到礼物，只是说人们不会专门谈论这个话题。

在1863年，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是一个小型的舞台玩具，上面“不用明显地附加装置，就利用小纸片做的人物造型来模仿一种亚洲人的舞蹈”。其他的玩具则模仿现实：运转的水磨，会唱歌的鸟，穿着裤子并且“准备结婚”的洋娃娃。玩偶始终很风光。填充熊在20世纪初问世：泰迪，美国的玩具熊，1903年；马丁，法国的玩具熊，1906年。

尽管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会很自然地追随时尚，但近来人们已经开始赋予礼物文化价值，有评论说：“很好，在1月1日的庆典上，美观的书籍正慢慢取代浪费而又无聊的东西。”报刊杂志已列出了不少适合做赠品的书籍清单。

小姑娘们会在她们的日记中记录下她们自己和伙伴们所收到的

孩子们把衣服穿整齐，鼻涕擦干净，对爷爷奶奶嘟嘟囔囔地说出他们的祝愿，同时也没忘瞥上一眼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礼物。

礼物。节日礼物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那份记忆将是孩子们终生的财富。大人们对自身童年的向往也将这种怀旧的情感传递给了他们的孩子。

新年的问候和拜访

孩子们对父母的新年问候就好像是作为收到礼物的一种交换。在1877年12月29日，伊丽莎白·阿里吉写道："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新年礼物。皮埃尔、阿梅利和我将为他表演木偶剧。"

在新年第一天，人们会拜访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送上新年的问候：父亲和母亲、伯父和伯母、兄弟和姐妹们，大家都会互相拜访。晚间的时间则是专门为祖父母和长辈们预留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拜访表兄弟姐妹和其他的亲戚，第二个星期是拜访亲近的朋友，1月份其他的，则是拜访熟人。简而言之，有许多的拜访要进行，有许多的贺卡要写。

为了尽量避免拜访不成，很多人乐于派一个仆人或是雇一个代理人送一张拜访卡到他们希望表示问候的人的家中。这种巴黎的风俗有些荒谬：收到大量这种卡片的人对于卡片上形式化的问候不屑一顾，而一旦熟人没有给他送卡片，他又会说"某某人没有教养，新年连张卡片都不送"。

"潘趣和朱迪"滑稽戏，是英国传统的滑稽木偶剧。

当然，大量的卡片还是邮寄出的。在19世纪末，巴黎的邮局仅在1月1日一天中就经手了超过100万张的卡片。旁奇伯爵夫人说她共发送和收到了将近1500张贺卡。

复活节和诸圣日

从好几个方面来说，复活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个天主教徒都要进行忏悔，并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领受圣餐。一年领受一次圣餐是教会的最低要求，如果只领受一次，就要在复活节。为期两周的复活节在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开始。

复活节也是鸡蛋节日。人们把彩色的复活节鸡蛋和鸡蛋形状的糖果藏在房间和庭院中，然后让孩子们去找，还有各种各样的复活节礼物被放在鸡蛋形状的包裹中分发（送复活节礼物的风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兴盛起来）。

复活节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苏，也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不管天气如何，即使气温还很低，全家人也要穿上新衣服集体出动，以标示着春的来临。年轻的女性会穿上亮丽的浅色服装，戴上漂亮的意大利稻草帽。

在家中，季节更替的时候要进行春季清扫。要将壁炉的铲子和钳子清理干净，然后涂上油脂储放起来，直到秋天再拿出来使用。窗帘、门帘和幔帐都要取下来掸掉灰尘，地毯也是如此。

在19世纪，过圣诞节时学校不再像以前放长时间的假期，只在12月25日到1月1日期间放假。但复活节假期变得普遍了。在1859年11月，复活节假期得以凡俗化：出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考虑，中学生们有了一个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小学生们被给予了和中学生们一样的复活节假期。1886年3月9日，经过范围广泛的讨论，议会通过了政府的一项提案，将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定为法定节日。1892年8月1日，复活节假期被加长了，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三中午就开始放假；1925年2月18日，法国学校开始施行为期两星期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在19世纪逐渐演变成类似于学期之间的假期。圣诞节假期迅即与之呼应。1892年8月的法案也提出，校长可以根据校委会的建议在学年开始时计划安排8天的特别假期。如果这些特别

这些孩子们都穿戴整齐，擦干了鼻涕，咕哝着问候他们的祖父母。同时他们会瞟一眼那些在等着他们的玩具。

假期被安排在12月25日到1月1日间，学生们就可以享受一段简短的假期了。1925年2月的法案将这种非正式的实践官方化：特别假期的天数减少到两天，但圣诞节假期从12月23日放学时开始直到1月3日。这样，从1925年开始法国的学年就被分成了三个学期。

如果说复活节标志着春天的开始，那么诸圣日则标志着冬天的到来。在19世纪下半叶，在诸圣日那一天祭扫家庭成员的墓穴成为一种习惯。18世纪末，巴黎的公墓被关闭了；1785年，英诺森公墓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之中毁掉了。到1850年前后，公众的舆论已然改变。

有三个因素使人们对亡者建立起了新的兴趣，并使即使像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公墓的幸存成为可能。首先，实证主义者们赞同对地下的亡者给予尊重，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精神，皮埃尔·拉菲特在1847年这样写道："坟墓孕育着家族的延续感，而公墓则孕育着城市和人类的延续感。"其次，天主教徒赞成对死者的祭仪，就好像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他们的论调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一个世纪前他们对公墓的日益衰微负有部分责任。他们那时的

论点是，一个人的躯壳是否存留在土壤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永恒。第三，科学对此点了头。科学家们证实，对于墓地的亲近不会对活着的人构成任何危险，上个世纪抨击其有毒害其实不过是迷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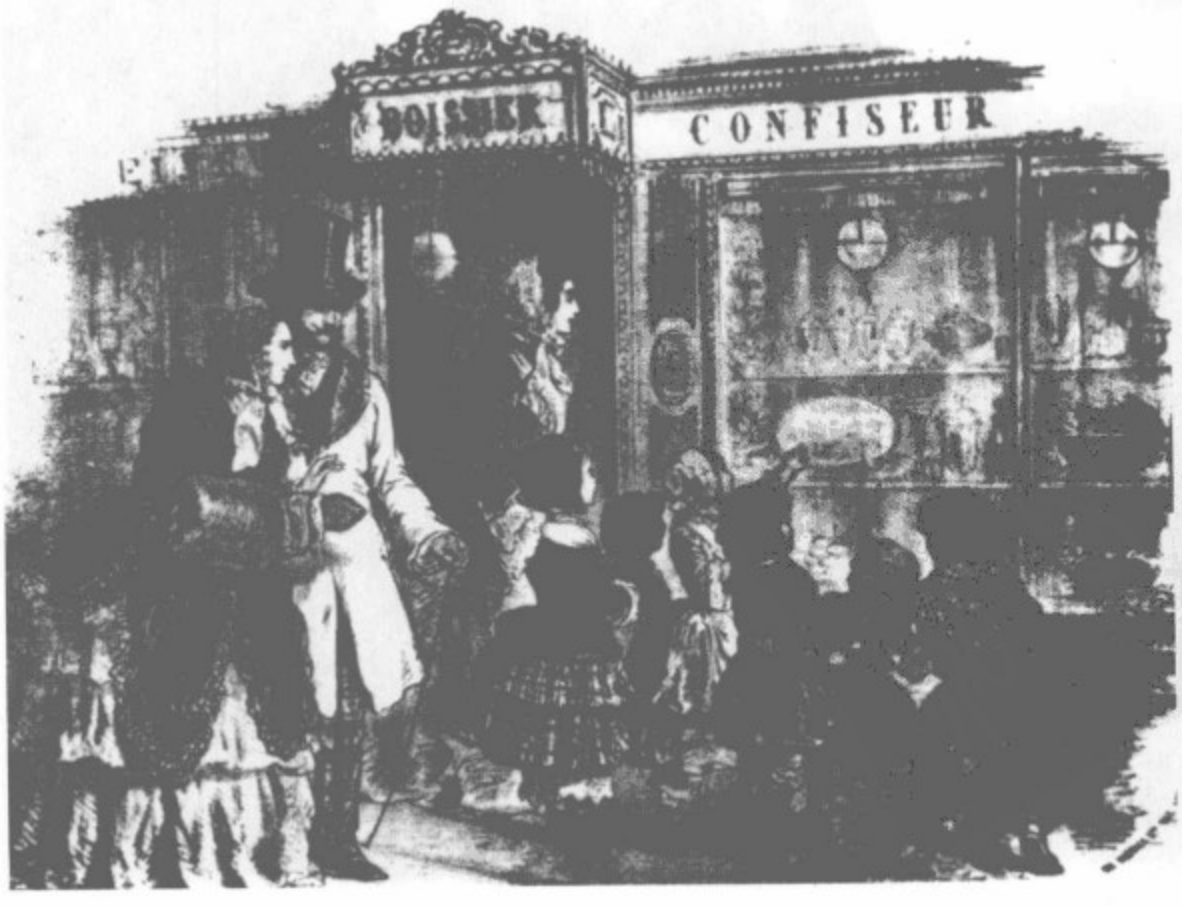
1850年之后，公墓成了“造访之所，沉思之所”。在鲁昂，1860年到1880年期间家庭建造起奢华墓碑数量增长惊人。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更激起了人们对死者的崇拜和追思。1902年，在诸圣日这一天，有35万人造访了巴黎公墓，占人口总数的将近1/10。

在复活节，妇女和姑娘们穿的是亮丽的彩服，但在诸圣日她们则是黑衣、毡帽、手套和短靴，她们已“准备过冬”。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比较体面的人家开始买糖果，这一度成为富有的象征。

夏季：从乡村住宅到夏日度假

19世纪初期，法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才会在乡下的房子中度过夏天。在19世纪80年代，“度假之地”一词在词典中被定义为“乡村中休养暂居之所”，是个新创的词。贵族和其他的私营业主们不必因为工作而必须待在巴黎或其他的主要大城市中，他们一般会在自己的庄园中或是乡村的住宅里度夏，直到10月甚至11月狩猎季



节后才返回城镇。对于他们来说，一年因此而分为两个部分：社交季节——冬季和春季；乡村中的避暑期——夏天和部分秋天。

渐渐地，中产阶级开始模仿这种贵族的模式。有些记者对他们进行嘲讽，但不管怎么说，当夏季来临之时，中产阶级家庭还是会离开城市来到乡下的田园中。鲁昂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拥有房屋；他们会邀请亲戚朋友在乡下过上几个月，并利用这个机会检视他们在附近地区拥有的农场。

G.夫人出生在1888年，是一位富有的波尔多商人的女儿，据她回忆，从复活节到诸圣日，她与父母、兄弟姐妹和6位仆人一起前往波尔多郊外约5里远的一处漂亮的房子居住。安托尼·阿里吉是拿破仑三世时宫廷中的一位律师，每年春天，他们一家人都会离开巴

埃米尔·弗里昂：《诸圣日》，1888年。19世纪下半叶，家人在诸圣日祭扫公墓日益普遍。妇女们身着丧服进行施舍，以示对亡者的敬意。

弗里茨·保尔森，1868年。小伙子们的穿着几乎都很随意，而小姐们则戴着鲜艳的帽子，身穿款式大胆的短裙；她们的年长女伴却仍是一身黑帽黑衣。这次夏日出游与其说遵守着一定的规则，不如说是对那些规矩的解放。

黎的居所去奥图尔，阿里吉夫人和她的妹妹在那里租了一处带花园的房子。1878年，他们在5月11日离开巴黎，10月26日返回。

如同前面所阐述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外省的中产阶级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外省，人们依靠他们自己拥有的财产生活。而巴黎人通常在乡村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并且他们是不会去视察农场的运作的，因此，他们租赁乡下的房屋或是住在旅馆里度假。租赁使得在不同的地方度假成为可能。D.夫人出生在1876年，她说她父亲是一所高等师范学校的官员，喜欢变化，从不会带家人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两次夏日假期。度假季节，他以500法郎的租金租下一处很大的不动产。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他们全家在莫尔比昂（法国的一个省）租了一幢拥有17个房间的别墅。

即使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每年可以在城外度过6个月的城市居民，也养成了在乡下过周日的习惯。1831年，一本名叫《乡下的房子》的畅销书中写道："星期六晚上动身，星期天散步（如果不下雨的话），然后在星期一早上返回城里——这就是许多巴黎人所说的去乡下。带上一个马车夫，一个园丁，一个厨子，这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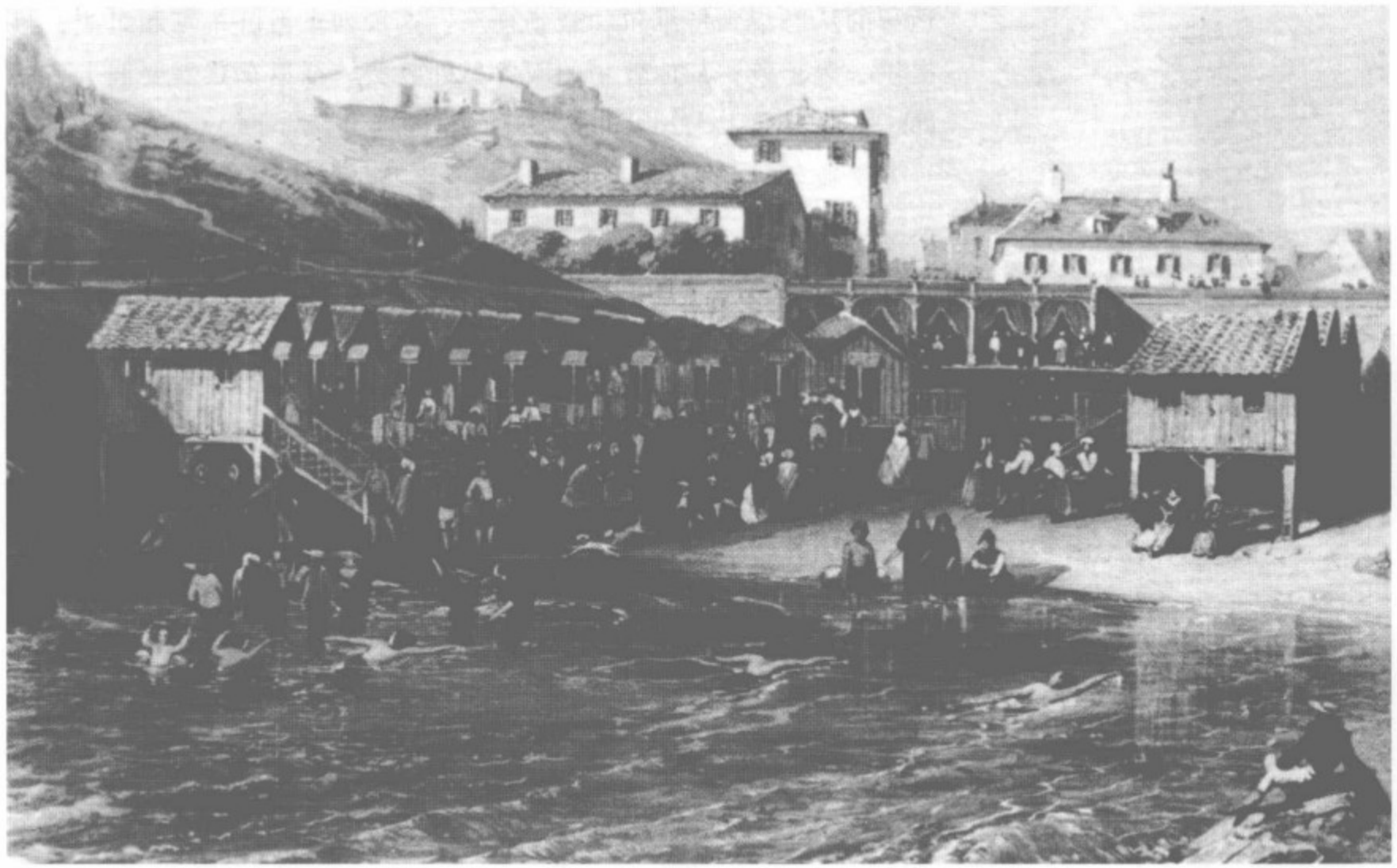
市居民就有了进行短期旅行所需的一切。”

夏季移民

夏天的火车站人满为患，丈夫带着妻儿，似乎每一样活着的东西都在站台上寻找可以休憩一下的地方，他们都是去乡下或海边的。只有看门人和邮差留在了巴黎城内。这也许有些滑稽或夸张，但事实的确令人吃惊。记者们说，离开城市去度暑假的巴黎人有三万人。能支付得起旅行费用的城市居民变成了“旅游者”。这个词与“旅行者”同义，在1816年首次使用，词典中将旅游者描述为“出于好奇和闲散无事而出外旅行的人”。旅行者并不一定行走个不停，有些人干脆住在海边别墅里，根本不动弹（“夏季居民”这个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20年）。海滨胜地是重要的，夏季移民是重要的，“海水之于夏天就如沙龙之于冬天”。

开采矿泉水用来洗浴最早要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帝国时：1809年，有1200人在埃克斯温泉浴场接受了治疗。1822年，迭皮的地方次级长官开办了第一处海水浴设施，并说服贝里伯爵夫人前来参观。从那时起直到1830年，每年7月宫廷都要暂时迁移到迭皮来。

矿泉水在19世纪早期风行一时。



阿尔邦：《比利茨的旧海港》，1858年。比利茨海滩在1835年开始接待来访者，成为欧仁妮皇后最喜爱的度假胜地。

1830年以后，近郊的贵族们也渐渐养成了这一习惯。尽管在1835年时人们已开始谈论比利茨的小海滩（在第二帝国期间成为欧仁妮皇后最喜爱的度假胜地），但迭皮是当时唯一一个得到充分开发的海滨胜地。

火车把从巴黎到海滩的旅行时间缩短了2/3。在1840年，乘马车从巴黎到迭皮需要花费12个小时；在第二帝国期间通过铁路只需要4个小时。1848年8月，第一列从巴黎到迭皮的“快乐列车”开始运行。这些专门的周末列车使得去诺曼底海岸旅行更为方便快捷，在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受欢迎，以至于1850年时铁路公司开始提供折价车票（三等车厢5法郎，二等车厢8法郎）。富有的旅游者们乘坐的是“黄色列车”或“丈夫列车”。1871年时，这种列车在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离开巴黎，星期一中午前返回，这样就使忙碌的生意人能有足够的时间与妻子和孩子们共度周日。最富有的旅游者也可以乘坐每日都有的豪华列车，比如1904年7月15日到9月30日期间

运行的从巴黎到特维尔的豪华列车。这种列车由卧车车厢组成，只提供一等车票，其他奢华的服务另外收费。往返车票需要五十多法郎——是普通工人20天的薪水。

受益于铁路之快捷的巴黎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倾向于离开家。举个例子，在诺曼底海边度假的巴黎人要比鲁昂人多，尽管后者离海滨更近，但他们在1914年前对海边度假根本不感兴趣（但鲁昂人却通过自1843年就已存在的铁路频繁地前往巴黎）。

除了在山区和温泉疗养地的夏季旅游业之外，冬季的旅游业也发展了起来，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在1860年尼斯附属于法国之后，这座城市成为了颇受欢迎的冬季旅游胜地。在1861年至1862年的冬天，有1850个家庭在那里度假；到了1874年至1875年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5000,而到了1887年时则是2.2万。人们自然是为宜人的气候所吸引，但也有些人是被他们的医生勒令去的。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气候的变换来治疗肺结核是一种很流行的疗法；医生们建议在山区、在冬天、在大自然的天空下进行调养。在大西洋海岸，“冬季之城”阿凯岑是将医疗与旅游业结合起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个城市作为肺结核的治疗中心从一片平地中拔地而起，而娱乐赌博业也成为它值得夸耀的资本。

必要的闲暇

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进行一种必要改变来与度假相适。宁静有益的大自然可以弥补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品味自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正如亨利·伯劳在进行度假方面的研究时所评论的那样，真正的新东西“是对人类行为的时间构成给予的深入关注，是其中所蕴涵的东西”。

人们逐渐觉得，工作时间是可以转化为度假时间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时间用在大自然、旅行或是消遣娱乐上面。在乡村，劳工阶层的闲暇时间自然地存在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之中；而在城市，工业社会阶层每个人的闲暇是在特定的时间，尤其是在夏天。而卢梭已把投身自然作为一种摒弃时间束缚的方式，当这种观念传播到新的社会阶层，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品味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捷地重新构建了时间的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听从假期的召唤，“年”也就以新的方式得到了重组。1912年7月6日，一篇名为《休

罗西：《海滩》，1904年。尽管帽子上缎带颇多，但海滩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们放松下来，鼓舞他们穿上更轻便的服装，陶醉于自发的游戏方式中。在受到新的纪律约束前，运动使人们的肌体得到解放。

假问题》的文章言称："50年前度假的人迥然另类，而今天迥然另类的是不休假的人。"人们感受到了度假的需要，并坚持他们有权这样做。19世纪末在多方组织下，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度假活动。

回顾学校假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社会的演变历程。度假终于从最初贵族们在乡下的逗留转化为休假的权利观念，并最终有了带薪休假（法国工人在1936年赢得的权利）。在19世纪前，有两个原因可以中断课程：分散于全年之中的

这些年轻妇女与父母亲朋送别，动身去过一种新生活。火车上家规不复，探险之路洞开。

宗教节日和农忙，后者因导致大量学生缺课而迫使小学校停课。在19世纪期间，学校假期逐渐从宗教假日和农忙的考虑中剥离出来，专门给老师和学生放假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学校假期的持续时间也得到了延长，尤其是在法兰西第三帝国期间。

在19世纪，课程在8月15日前后结束，10月初复课，暑假最多可以持续6个星期。1894年1月4日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学校中安排了假期课程的人额外多休两个星期的假。这种假期最初是作为一种奖励给予那些“为常规的成人和青年教育课程做出贡献的人”的，后来则作为对那些在课余项目安排上取得成功的教师们的奖励。这项命令每年发布一次，直到1900年将暑假的延续期间正式确定为8个星期，从8月1日到10月1日。1912年7月20日，一项新的法令将中学的暑假时间扩大为10个星期，从7月14日到10月1日，到了1935年时小学也开始适用这一规定。

但人们也逐渐开始抱怨学校没有安排好学生们的假期生活，他们认识到假期的放松对健康有益，但假期中的教育同样不可缺少。这种新认识导致了为孩子们开办的夏令营迅速发展。此外，童子军活动在1911年第一次被引入了法国。

度假和家庭

当R.女士的母亲在7月1日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去度假时，她对孩子们说：“你们可以在返回学校后再领奖。”她的孩子们都是中学生，她们想推迟一下出发的时间以便能参加上年度颁奖典礼。R.女士1897年出生于巴黎，她整个童年时代的暑假都是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度过的。复活节时她的父母就会给海边别墅的主人写信预定租约，花费是400法郎。他们也会租一架钢琴和一个带凉台的小屋，还有一个女仆，暑假期间每个月付给她15法郎。R.女士的父亲是一位政府公共事务部门雇用的工程师，在7月15日和9月1日前后可以与家人共度数天时光，整个8月份则都可以与家人在一起。全家人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出游。

青春期时的R.女士和她的兄弟们频频光顾“家庭海滩”的娱乐场所。每个人都彼此认识，父母们也很放心让孩子们单独活动，彼此教一教怎样跳舞。不同的家庭构成了一个圈子，年轻人可以很安全地置身其中，远比在巴黎时自由得多。

生命中的大事

婚姻是核心性的事件,将生命分为了两个部分。家族和社会的延续都需要依靠婚姻。在私人生活中,时间也因此被分为“此前”和“此后”两部分,而重要的事件总会落入两个时间段中的某一个。

在婚前，一个人的生活会经历几个明显的阶段：青春期的开始，在大多数家庭中以第一次领受圣餐为标志；中学时期的结束，在男孩的生命中以获得法国业士学位为标志（女孩一般不会得到正统的拉丁文教育，也因此无法参加业士学位考试；如果她们坚持要求获得学历证书，那么得到的通常是小学毕业文凭）；还有就是成人生活的开始，求偶，订婚；最终是结婚生子。此后，私人生活的时间或多或少地以均一的形式流逝，直至死亡，时间中满含着抚育孩子的责任，其标志就是不可计数的家庭场合。

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要经过7年的中学教育后才能通过他的业士学位考试。虽然国家会提供奖学金，但中学学习始终是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产物。在1842年，一流中学的学费是每人每年100法郎，如果是寄膳宿的学生则要700法郎。1873年在巴黎公立中学，一个学习修辞学的学生每年要支付300法郎；到世纪末时这一费用上涨到了450法郎，如果是一家很好的私人机构则要耗费掉720法郎。在巴黎的耶稣会士学校，寄宿生的学费总计1400法郎，是被聘为邮局技师的一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半年薪水。作为比照，1880年巴黎的一名女仆全年可以挣到500法郎。1854年，在10.7万名中学生中，有4600名获得了业士学位证书；1873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每年6000名或7000名。

根据1873年的法律，年轻的中产阶级们在理论上被强制要求服军役，由抽签来决定谁需要服5年谁只需要服1年（事实上只有6个月）兵役，但获得业士学位和被征召前志愿服役的年轻人则可以只服1年兵役，前提条件是要交付一笔1500法郎的装备费用。此外，能够进入所谓的最负声望的高等学问机构（如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学生比较容易免除兵役。

获得业士学位后，一个年轻人可以通过进入法律学校或医校来继续接受教育（大学的入学费用很高：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只是报名和参加入学考试就要花掉1000法郎，学医的学生则要3000法郎）。有些人选择跳过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家族的业务。不管是哪种情况，

等到一个人准备结婚时他已不再年轻了。

另一方面，对于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如果她的目标是婚姻的话，那么是否受到高等教育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只要她拥有足以找到一个丈夫的资本就够了。对于女性来说，不管是寄宿学校还是1880年后出现的公立学校，从来就没打算要让她们获得业士学位证书，而没有证书就无望进入大学。完成学习后，女孩子们就有资格参加获得小学毕业证书的考试了，但实际上她们根本不需要这个文凭。“把烦恼留给那些需要谋生的人吧”，这就是1910年时路易斯·韦斯在莫里埃公立中学的文学老师对她的劝告。为获得业士学位而开设的私人预备课程在1905年时出现。公立中学直到战后才提供预备课程，此前这种行为是受到官方禁止的。

对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青春期女孩进行教育的目的，是让她们为以后家庭主妇的角色做准备。她要学习如何持家、督导仆人、与丈夫交谈和抚育孩子。这些职责既不需要拉丁文也不需要科学，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虚饰、一种综合的文化、普及性的音乐和绘画技巧和在烹饪、卫生及幼儿看护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训练。而在婚前，女士们不仅需要学会婚后日常生活中的技巧和行为方式，也需要参加学校的主妇课程来完成自身的教育。

求偶

家庭和朋友对于找到一个配偶当然很有用处。最要好的朋友的兄弟姐妹就是自然的候选人，前来参加家庭成员的婚礼、洗礼和第一次圣餐的远房表兄弟姐妹们也同样是候选人。

年轻人有足够的机会相遇，比如慈善义卖、运动场合（像网球或滑冰），还有跳舞。所谓的“白色舞会”是专为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开设的，只有有资格的青年男女才会被邀请。

之所以叫做“白色舞会”，是因为初次涉足社交场合的姑娘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这是她们纯洁无瑕和处女身份的标志。她们的母亲也参加，对条件合适的小伙子们进行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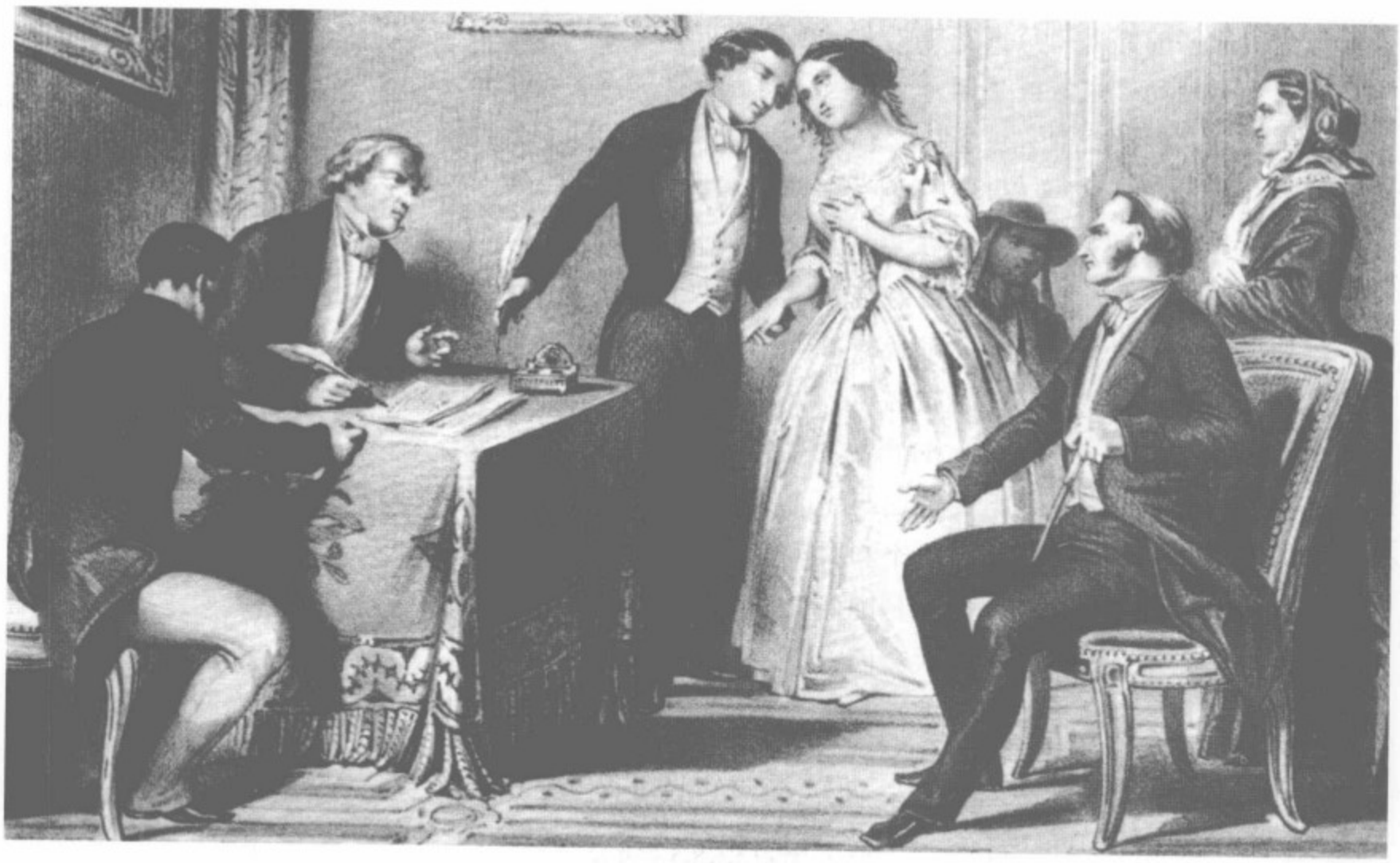
在法国，年轻的姑娘们在初次抛头露面的当年结婚已成惯例。如果她还非常小，她可以再连续等两个冬季，但如果当第三个季节到来时仍然没有人肯娶她，她的前景就堪忧了，因为人们会开始怀疑她的贞操，更糟糕的是，可能会怀疑她没有足够的嫁妆。

在中产阶级生活圈中，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介绍婚姻，由专门擅

长发现合适配偶的媒人来负责安排。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媒人都由年长的妇女、表兄弟姐妹或是朋友来担当，他们的良好声誉保证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在看似有可能彼此融洽相处的年轻人中间安排约会。西蒙·博瓦尔的父母亲就是以这种方式相知相遇的。

虽然是介绍婚姻，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就不重要了。由家人和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夫妇有时会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如果两个年轻人陷入爱河，他们的父母就绝不会让可能的婚姻从手边溜走，他们会收集对方的信息，包括名声、收入和观念。政治和宗教上的从属关系是要考虑的重点：自由思想者欧仁和玛丽·布瓦洛共有5个女儿要出嫁，他们绝不会考虑与一个天主教家庭缔结姻亲。其中的一个女儿马德莱娜看上了一个和善英俊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工厂老板以及新教徒的儿子，因此是配偶的可能人选。马德莱娜的大姐已婚，她安排了妹妹的第一次会面，随后出资并倾全力来确保他们婚姻的实现。两个月后，马德莱娜正式订婚，又一个月后，她结婚了。

尼古拉斯-厄斯塔什·莫林：《兄弟般的爱》，约1835年。一个天使般的白肤金发碧眼女子祝福她的姐妹的订婚。在浪漫主义时期，绅士们更青睐黑头发浅黑皮肤的女子一些。



在中产阶级的婚姻中，订立婚约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巴黎。

订婚

一个想求婚的年轻人可以让一个朋友来向女方的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如果提议被接受了，他的父母就会正式向女方的父母提议订立婚约，那时，求婚者就正式成为了未婚夫。在他进行第一次拜访时双方会选定一个日期举办订婚宴会。

双方的家人都会被邀请来参加订婚宴会，宴会在未来的新娘的家中举行。晚宴上，小伙子要送一枚订婚戒指给他的未婚妻。也同样允许女方送礼物给男方——一个男士戒指，或是一个装有她肖像的礼盒或是她的一束头发，但她把礼物送给心上人的时间是在一个星期后，在他的父母举办的另一次晚宴之前。

在第一次拜访前，求婚者要送一束白色的花给他的未婚妻。如果他很富有，他将在婚礼之前的每一天都送花给她。他甚至可以送花给未来的岳母大人。到世纪末时，礼仪上已允许送彩色的花了，而不仅仅是限于白色。有些男士会遵循东方的习俗，选择那种逐渐变得越来越红直到婚礼前夜变成紫色的花束，以象征其炽烈的爱情。礼仪手册中将这种新时尚归入了品位最差的一类。

年轻的求婚者每天都会去追求他的未婚妻，而姑娘则始终由她

的母亲或另一位家庭成员陪护着。按礼仪，年轻的女士要矜持一些。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既不能写信也不能收信。她绝不可过于热烈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以免对方疑虑自己的品行。从理论上说，未来的新郎新娘要利用订婚期来加深彼此的了解。订婚期的持续时间在三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两个月是通用的标准。

婚约

在订婚期期间，两个家庭会开列出各项条件以及嫁妆的数额，并定下一个日子签署婚姻契约。在那一天，将结连理的双方在亲近的亲属和朋友的陪同下出现在公证人面前，或是在某种情况下公证人去未婚新娘的家中。不管是哪种情况，仪式都是一样的。当公证人宣读婚姻契约时，未婚夫妻双方假装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对金钱的数目表现出过分的关心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毕竟，完全吸纳对方的爱意才是最重要的。宣读完毕后，男方起身签字，然后将笔交给他未来的妻子，随后，双方的父母和受邀的嘉宾在婚约上签字。如果家族需要，也可邀请名流要人来签署婚约为证。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在签署婚约的当晚举办招待舞会已成惯例，而不是在婚礼的当晚；但1900年时，婚礼当天已不再举办任何舞会。未婚新娘先与未婚夫跳舞，然后与证婚人跳舞，随后是其他人。

婚姻契约是中产阶级的习俗。丈夫是双方共有财产的唯一管理

婚姻有时意味着爱情，而始终意味着的是两个家庭的联盟，两家所拥有的显赫头衔及财产都显著地出现在婚礼公告之中。

亚麻布织品是流行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寄宿学校和结婚之间，年轻姑娘们会花许多时间为她们的嫁妆绣帽子、衣领和袖口。时尚杂志为她们提供了样板和指导。

者。中产阶级的婚姻契约或提供财产的契约性分割依据（共有财产的法律只适用于双方共同获得的财产，而双方的债务是分开的），或提供财产的法律分割依据，即允许妻子管理自己嫁妆的一半，而另一半要移交给她的丈夫。

嫁妆陈列在新娘的卧室中，篮子在起居室中。在最豪华的婚礼中，新娘的礼物要占据极大的空间。1904年，格雷夫伯爵和伯爵夫人把他们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吉什公爵。婚礼庆典后，宾客们去了新娘祖母的住处，新娘收到的1250件礼物被陈列在“篮子”的周围。

各种典型的“篮子”均出自不同的巴黎家具制造商，“篮子”中的内容从手套到女士睡衣和披肩应有尽有。有时“礼物花篮”中的各式珠宝奢华之极，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婚礼庆典

民间的和宗教的婚礼庆祝仪式可以在同一天举行，但通常民间的庆祝仪式会在宗教仪式举行前的一两天进行，尤其是在巴黎，宗教庆典更可能延后举行。只有四位证人和男女双方最亲近的亲属才会被邀请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民间庆典仪式。新郎要派一驾马车把自己的两位证人接来，再派另一驾马车去接新娘的两位证人；新郎本人则与自己的父母去新娘的家中把她接往市政厅。市长或他的助手宣读根据《民法典》第六章制定的婚姻证书，证书中详细说明了夫妇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他会问新郎和新娘是否愿意与对方结为夫妇。然后新娘在婚姻证书上签字，随后她要把笔递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会说这样的话来对她表示感谢：“谢谢，夫人。”

在市政厅举行民间的婚礼不需付费，但传统上会向这位市长所辖的区或镇的穷人提供一些资助。随后婚宴开始，当晚在新娘父母家度过。在世纪末时，以一种非常文雅的方式来举行民间的婚礼成为时尚；市政厅以鲜花和绿色植物加以装点，还雇来管弦乐队和流行歌手。这种时尚最初只是在纯粹的民间婚礼上流行，尤其是离婚后的再婚和在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之间举行的婚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举行盛大的教堂婚礼是根本不可能的。

宗教婚礼仪式服务的类型有所区分，在价格上，对天主教徒是从10到2000法郎不等，对犹太教徒则是从15到2000法郎不等，如果花费4000法郎则会有一个“格外特别”的服务。对新教徒来说，婚礼服务一直是免费的，并有权使用主圣坛或是一个小礼拜堂，以及

奢华程度不等的鲜花、照明和音乐服务。如果价格合适，还可以雇到歌剧中和音乐学校里的歌手和音乐家。社会名流的婚礼涉及的范围更是广泛，以至于邀请函中还要包含教堂的入场门票，以免涌入大量的人群毁坏教堂中的设施。从理论上讲，进行教堂婚礼的花费由新郎承担，而午宴、晚宴和接待的费用由新娘的父母支付，但在实际操作中，费用经常是由两家分担的。斯塔克尔家族的私人档案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们是鲁昂的一家棉花制造商，花费的数目惊人：1899年一个斯塔克尔家族成员的婚礼耗费了5641法郎——邀请了3200人。

牧师会连续三个周日在教堂中宣读结婚预告，除非付费并获得了教会的特许。为了能在基督降临节、四旬节和其他的特别时段内结婚，必须获得教会特许；正常情况下在星期五是不举行婚礼的。为获得教会特许而支付的钱会分发给教区内的穷人。

婚礼可能是私人典礼中最公开化的。其间的各个细节都是程序化了的：队伍的构成与次序、为新娘进行服务的人员的数量和挑选、新郎新娘的装束（分别是黑色和白色）、应允时的姿态。新娘由其父陪伴走向圣坛，并将新娘交给她的丈夫。但在说出神圣的“我愿意”之前，新娘必须要转过头去看一下她的母亲，好像是在征询她的同意一样。直到19世纪末，只有新娘才戴婚戒，至于新郎的戒指，是从国外传入法国的习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变得流行，但并非是不可或缺的。

在外省，婚礼通常是一个冗长的庆祝过程。1832年8月29日，乔治·桑在给埃米尔·勒奥尼的信中写到了她们的朋友迪韦尔尼的婚礼情况：“我离开了教堂以逃避这个婚礼，因为婚礼已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还有另外一个风俗，即便在巴黎失宠后仍然存留于其他地方，那就是婚礼中的单身汉要想办法带着新娘的吊袜带逃走。

当一个诗人嫁给一位东方学者，其婚典很可能是非同寻常、不拘礼仪的。1900年6月5日，吕西·德劳-马德拉斯与《一千零一夜》的翻译作家在圣罗克教堂结婚。新娘穿着一身日常穿的旧衣服，戴着硬草帽。为了接送见证人和家庭成员来参加庆典，夫妇俩租用了全巴黎仅有的四辆出租汽车。人们聚集在大街上观看。新娘、新郎和宾客们拥进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午餐；两人没有度蜜月。

如此的反传统实属罕见。人们通常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比教堂婚礼更庄严了。但在1879年到1885年这一段时期内，反教权主义者们使民间婚礼的数字大为上升，许多妇女拒绝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大大惹恼了西蒙，“我们男人无法理解。教堂就是为女人而准备的。进入她的教堂，白纱遮面，在她心爱的人的臂弯中，听着风琴奏响的音乐，置身于薰香和她的所有亲朋中，面含微笑心潮澎湃，这正是她童年梦想的实现，是她今生此后永远珍存的记忆。她什么都没有失去，鲜花或是蜡烛，或是唱诗班男孩们甜美的歌声，或是牧师富于韵律的诵读，或是戴在她颤抖的手指上的戒指或是披于头上的圣衣，或是神圣的祝福或是在圣器收藏室门后母亲那温暖的拥抱。当一个小姑娘把她的玩偶放在一边，她此后最大的快乐就是帮助大姐摆放嫁妆，同时等候着属于自己的这一时刻的到来。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把这一切从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全部赶走。”这到底是一个女人的梦想还是一个男人的幻想？

蜜月

在19世纪30年代，蜜月变得流行起来。在1829年，《夫妇宝典》中表述了新婚后的第一天一对新人如何在家中度过。新娘的母亲是第一个登门造访的人，随后是亲戚朋友。夫妇二人与他们的父母共进晚餐。很显然，他们没有外出去度蜜月。不过这本书中提到：“英国人有个很好的风俗，那就是在遥远的乡村享受婚后蜜月的幸福。近些年这一做法已传入法国。”

在乡村度蜜月是新婚夫妇确保独处不被打扰的一种方式，在家中时总是有家庭和社交的活动危及到蜜月期的宁静。1886年的《婚姻手册》中认为，度蜜月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夫妇的私密生活；新婚夫妇应该带上箱子，装上所有必备之物，出外旅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迷人的环境”。到达旅馆后一小时，拆卸下所有东西，夫妇二人就置身于他们温暖的小巢中了。

何时才是动身开始蜜月旅程的最佳时间呢？对此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英国人的做法很正确，那就是在婚礼庆典后直接动身；另一派认为他们应该等候一段时间。在第二帝国末期，巴松维耶伯爵夫人评述说，庆典后立即离开并非时尚。1894年6月，拉格兰女爵记载道：“一个人不再在庆典后立即离开。这种行为已经变得平庸了。现在，新郎会把妻子带到他们的住处去，这是通过研

新婚之夜。19世纪晚期的新郎通常显现得审慎而机智。

究她的品位而为她精心准备的爱巢。父母也会离开几天，让一对新人独处。”6到8个星期之后，夫妇二人才动身出发，开始蜜月之旅。

在20世纪初期，人们最终的别致选择是彻底忘记蜜月旅程，在巴黎的一家豪华旅馆中以假名定下一个房间。去意大利旅行已太过传统，那些希望远离众人的人已选择去其他地方——比如说瑞典和挪威。

尽管去意大利度蜜月被有些人认为是例行公事，但却是当时受到尊崇的一项礼仪。旅行机构提供了两条路线：经斯特拉斯堡到瑞士或经里昂到地中海海岸。意大利和地中海是大多数新婚夫妇所选择的目的地。意大利被视为爱情胜地。温和的气候、美丽的风景、丰厚的艺术遗产，以及天主教的存在，这一切共同创造出了弥漫着感性的氛围。美学的和宗教的因素刺激着感官和情感，维罗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仍然弥漫着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回忆。

在地中海，“柑橘已开花的地方”，更易发现色欲的存在。高温和乡村的狂野之美征服了肉体和心灵，搭建起享受极乐的舞台。蜜月中的色欲并不一定和即将到来的夫妻性事有什么联系。

卡米耶·玛博1901年在圣日尔曼教堂结婚，她与丈夫去意大利度过了为期6个星期的蜜月。她称蜜月旅行的风俗是“野蛮残暴的”，“一种由参观纪念碑和博物馆而引起的所有身体疲劳和大脑迷惑的混合物。”她的丈夫什么东西都要看，她发现自己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不久她就怀孕了，她从疲惫的旅程中返回，但流产使她一无所获。由于这样的一些经历，医生们警告最好不要一次进行太多不同的活动。新婚夫妇最好在乡村度过婚后第一个星期的婚姻生活，那里的气氛更平和宁静，然后再出发度蜜月，去一个更远一点的地方享受快乐。

这种推理的逻辑看似合理，但却无法解决蜜月的象征性角色问题。之所以有人为传统的蜜月辩护，是因为对于两个计划好要在一起过日子的人来说，提升他们的期望与热情是如此的必要。而新婚之夜是成功的还是令人失望的，重要的依据就是蜜月留下的标志是否是婚姻中这一重要时刻的快乐回忆。旅行的目的就是通过在脑海中建立起特定的景象来塑造这种记忆。

总的说来，婚礼仪式的重点在于新娘，而不是新郎或双方。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结婚这一天无疑是所有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

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森：《家庭一景》。先生、太太和宝贝，这是法国节制生育后的经典的三人家庭。丈夫在桌边工作，而母亲则充满慈爱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女人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但她在私人空间中有角色要扮演，婚礼仪式巩固了她的这种角色。

从婚姻到家庭

婚礼是一劳永逸的。离婚的总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根据1901年的人口普查，每1万个在18岁到50岁之间结婚的法国人中有53人离婚；而在15岁到45岁间结婚的每1万个法国人中离婚的有70个。

人们对夫妻间的亲昵行为给予了高度重视。夫妻二人在双人床上同床共枕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已不再讨论独立卧室是否是明智的行为。帕里塞女士在1821年时热诚推荐夫妇分床而居这种行为方式，但这一建议在1913年她的书重印时消失了。

婚后大部分的私人时间都被孩子占据了。新婚夫妇会立刻开始期待一个孩子的降生。一旦孩子出生，还要对孩子进行洗礼、家庭教育直到送其上学。家庭的时间表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改变。现在，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比过去少多了；1881年出生的女人中生育两个及以下孩子的超过了半数，但她们却在孩子身上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通常，家庭关系越亲近，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就越大。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变得日益日常化。龚古尔兄弟在他们1860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孩子和她的母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关在女人的房间中。孩子还在婴幼儿时就会被公示于众，父母会骄傲地让保姆也出席，就好像是他们在舞台上进行一次他们产品的伟大展示。"

欧仁·德维拉：《洗礼》。

从私人角度讲，男人们是愿意与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表达关爱的。每天早晨，欧仁和玛丽·布瓦洛的孩子们会穿着长睡衣走进他们的卧室中，父母会把他们放到床上。1883年欧仁离家外出时，玛丽在给他的信中写出了这些早安问候的亲情味："只有你能知道每天早晨我床上一片乱糟糟的样子。他们弄得我懒洋洋的，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母爱始终受到人们的赞誉，母性是女人唯一真正满足的角色。

随着孩子的成长，接受洗礼和领受圣餐标志着他们进入了基督教团体，在19世纪，这些宗教仪式已成为了普遍的家庭场景，宗教庆典有助于加强和活跃家庭关系。

法国大革命将教堂记录诞生、婚姻和死亡的责任剥离了出去，把这项功能交给了国家。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父亲必须要在三

作响的铃声，分发给穷人的硬币，标志着一个新基督徒在教父教母的护佑下快乐地降生。

天内到孩子出生地所在市的市政厅宣布孩子的诞生。他还要带上两个同样居住在本市的见证人。在做出声明后的24小时内，一个官方的医生会进行一次拜访，确认这次出生确实发生了并确定孩子的性别。

洗礼

原则上讲，洗礼也要在孩子出生后三天内进行。若要推迟，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但家庭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这种宗教义务的减轻。仪式经常会被延迟，时间从六个星期甚至到两三个月，以便让孩子的母亲也能够参加。如果婴儿的生命堪虞，那么，就要尽快举行紧急的洗礼仪式。

一个孩子通常有三个名字：一个是生身父母起的，一个是教父起的，一个是教母起的。在教堂仪式期间，教父站在抱着孩子的妇女的右侧，教母站在左侧，两人都以一种象征性的姿势，把一只手放在婴儿的身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法衣上。当牧师问道："你们想要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请求为这个孩子进行洗礼。"教父

随后还要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孩子的教父教母也要一一作答。最终，孩子的父亲要邀请所有参加仪式的见证人共享一餐，然后孩子的教父教母会在洗礼证明上签名。

传统上，教父和教母两个人都要赠送礼物，但前者的礼物要比后者的礼物更具实质性。教父教母的官方责任是在孩子双亲去世的情况下监督孩子的基督教教育，但他们最重要的角色是向孩子提供特定的宗教仪式礼物。他们带来婴儿的摇篮对新生命表示欢迎，并在孩子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内通过礼物继续与他定期往来。

教父教母也会参加家庭庆典。传统上，第一个孩子的教父是父亲的祖父，教母是母亲的祖母；而第二个孩子，通常选择的是母亲的祖父和父亲的祖母，如果祖父母们都去世了，会转而选择亲近的亲属，更适合一些的是早一代的亲戚。祖父母二人作教父教母这一事实正是家族专制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次领受圣餐

第一次领受圣餐和婚礼一同被视作“一个人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这是福楼拜对领受圣餐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婚姻的一种预演；圣礼所需的庄严许诺要在整个团体面前做出。这一切都被协调得如此美妙，不仅激发起参与者的情感，旁观者也受到强烈感染。

《幸福的祖母：领受圣餐归来》。亲吻祖母的女孩也在吻别着她的童年。一个女孩的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她向青春期过渡的典礼仪式，她一生中“最美妙的日子”中的第一个，也是婚姻的前奏。

这种情感部分来自于对伟大日子的预期，为这个日子进行的准备工作已是旷日持久；部分还来自于这一场合的庄严。1879年5月15日星期四，伊丽莎白·阿里吉在她12岁时在圣日尔曼教堂进行了她的第一次领受圣餐典礼仪式。就在1879年即将开始前的几天，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一年。”她还特别提到了问答课，在这门课上她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好到足以获得荣誉奖章和牧师的祝贺。在5月8日星期四，她收到了一些礼物：一本白色的弥撒用书，一个象牙盒子，一个象牙十字架，还有各种宗教书籍。5月10日星期六，她在日记中倾诉说，她希望她的父亲能在自己第一次领受圣餐的那一天与自己一起接受圣餐。5月11、12、13日这三天是静修。传教士讲到了死亡、地狱和天堂。5月14日她参加了一个普通的忏悔仪式。伊丽莎白是最细心的：她责怪自己不该戏弄小妹妹，并请求上帝原谅自己。5月18日星期天，她详细叙述了星期三的仪式，赞美诗、风琴乐曲、人群，身着白衣的小姑娘们的行列，

朱尔·奥克塔夫·特里奎：《庄严的圣餐仪式》。

以及祷告者们的虔诚一同创造出了一种兴奋感，“我会终生记得在那一刻的感受。”她处于一种福佑之态，“我听到上帝对我的心灵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我是你的，你拥有我。’”

在19世纪，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仪式通常是在孩子12岁时举行。在13世纪，罗马拉特兰公会决定，应该在孩子具有理智或“有判断力”的年龄给他（她）举行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也就是说，要在他或她能明辨善恶、分清什么是圣餐面包什么是普通面包时进行。16世纪时再次确定这个年龄应该在9岁到13或14岁之间。

在19世纪期间，对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在教会内部也进行过讨论。有意见认为应该尽早给孩子进行这一仪式，“在一个孩子已能够辨明上帝而内心又依旧纯洁无染的时候”举行。

庄严的圣餐还是私人的圣餐？

对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的争论在1910年8月8日罗马教皇颁

在教堂前和在照相室中，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孩子们华服盛装，所穿的服装都是为这一盛典而专门制作的。

布的一项法令中达到了顶峰。庇护十世下令，孩子一旦具备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领受圣餐，标准的年龄在7岁左右。

教皇的命令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詹森主义（17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注），延迟领受圣餐的理论基础。詹森主义者们将圣餐视作一种奖赏，而教皇坚持认为应该将其视为“对人类脆弱意志的一种补救”。如果一个孩子经过了两年问答课的教育，获取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为他们举行领受圣餐仪式，这是他们抵御诱惑和罪恶的最有效途径。

教皇法令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与第一次领受圣餐有关的各种表面文章。教皇法令的反对者们担心，这样做会“丧失严肃性，正是这种庄严使得第一次领受圣餐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四天”。众人按照特定的仪式一起领受圣餐这种方式是在18世纪中期被引入法国的，最初是在专门的宗教组织中，尤其是由耶稣会士把持的宗教组织中，其后很快就扩展到教区内。这种做法在1789年时还不十分普遍，直到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签订宗教协定之后才被广泛采纳。

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庄重特性使其演变成一种社交场合，像婚姻一样，其进行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男孩们穿着庄重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的丝绸臂章，而女孩们则像小新娘一样披着白色的薄纱和面纱。让斯伯爵夫人在1920年写道：“一个女孩的整个生命在两个面纱之间绽放——领受圣餐时的面纱和新娘的面纱。”在领受圣餐时，女孩们会收到价值可与婚礼时的“篮子”相媲美的礼物。只有那些并非家族成员的朋友才会送一些宗教性的礼物，像弥撒用书和玫瑰花束。亲近的朋友会送一些非宗教性的礼物，像珠宝、手表或是一流的艺术品。在19世纪末，当时的风俗是把礼物摆放出来，旁边放上赠送人的卡片，就像送结婚礼物一样。

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意味着这一场合不再那么像是婚姻的预演了。人们送给一个7岁女孩的礼物和送给一个12岁的青春期女孩的礼物是绝对不同的——送同样的礼物是荒谬可笑的。这样一来，年幼的孩子们不再那么专注于礼物和自身的外表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是宗教权威们并未意识到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中所蕴藏

的巨大商业价值。在那一天，全家人穿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新的。父母也要穿新衣服。尤其对于母亲而言，领受圣餐正是从丈夫那里获得一件新衣服的绝好时机。裁缝那里早已有很多预定单了。对于家境贫寒的女孩子们来说，要有价值3.75法郎的服装，紧身胸衣和面纱要另加0.85法郎。对于富有的人来说，要有价值130法郎的外套，并有价值15法郎的童帽与之相配。缎带的样式很多，价格从1.45法郎到40法郎不等。

毫无疑问，教皇希望通过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来减少与领受圣餐有关但却与宗教无关的表面财富展示。但他并不想有损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庆典的庄严可以激发起教区内教众的热情，唤起参与者亲朋之间的真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都是在复活节举行的。这种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开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庆典，许多人都不愿放弃它。数年之后人们会回忆起这个仪式，重温当时的快乐和神圣。

其他家庭场合

除了所有人都会进行庆祝的年度性节日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人典礼。这些家庭庆典好处多多，尤其对于融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这些家庭内部的仪式比如命名日和生日这样的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日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年老、死亡和服丧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性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

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吕西安-埃克托尔·若纳斯：《金婚纪念日》。这是彼此忠实的胜利，也是生命的胜利。孩子们围在一对幸福的老人周围，市长发表讲话。在19世纪晚期，老年人享受不到其他种类的荣誉。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日。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腐败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日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4125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

一幅19世纪停尸间的图景。

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性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性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性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当19世纪的人们谈论起服丧期的长度时，是为了对服丧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一事实表示悲痛。服丧期的长度被看作是一个正直社会的标志，而事实却恰恰相反。18世纪的一项皇家法令将宫廷的服丧期削减了一半：如果是丈夫死了服丧1年，妻子、父母或祖父母的服丧期为6个月，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1个月。

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6个月，外省则是两年。

男人们为妻子服丧的时间却只有她们的一半：在巴黎是6个月，在其他地方是1年。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唯一描述了相等服丧期的来源，寡妇和鳏夫都是两年。其中独树一帜的建议还包括：为父母服丧两年；所有其他人则限制到1年甚至按1828年《民法典》中的例子是6个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19世纪的推移，服丧期确实是延长了而没有减少。为祖父母服丧的时间从四个半星期上升到6个星期，为兄弟姐妹服丧的时间从两个月上升到6个月，为叔伯婶姨服丧的时间从3个星期上升为3个月。为直系表兄弟姐妹的服丧时间基本未变：1828年时是15天，后来从15天到了1个月。在第二帝

国期间，父母开始为夭折的孩子穿戴丧服。

服丧包括三个阶段。依据寡妇的情形来看，她的主服丧期在巴黎要持续四个半月，在其他地方是6个月。在这期间，她穿黑色的绒线服装，一方黑色绉纱做的头巾和面纱，黑色的亚麻手套，不能佩戴珠宝，也不能烫发或喷香水。随后是3个月的部分服丧期，其间她可以将白色、灰色或淡紫色的服装与黑色的衣服混穿，可以佩戴玉制的珠宝首饰。服丧的礼节非常之繁琐，曾专门有一家报纸提供了关于每件事该如何做的细节，比如在哪一天可以用钻石代替黑

皮埃尔·马赛尔-贝龙涅：《痛苦的职责》，1900年。父亲的死亡是一个家族历史上的大事件，眼泪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带着手绢，披着服丧面纱的妇女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男人们会在墓地分享她们的泪水，由于女人太过脆弱而不允许她们涉足墓地。

维克多·雨果和乔治、让娜在一起。

玉或是用银质带扣代替铜质带扣。

在主服丧期，整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和仆人，都要着黑服，而叔伯姨姑表兄弟姐妹们除外。马车要装上黑色窗帘。服丧的人不能出现在剧院或舞会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也不能参加公众集会。在最初的6个星期她们根本就不能外出，只能邀请一些亲近的朋友到家中来。女人在这期间不允许做刺绣，即使是在亲戚和朋友之中也不允许。

除了服装之外，其他一些私人性的东西也表明了服丧的重要性。这期间会使用黑边的手帕，哀悼者使用的书写纸也镶有黑边，顶部半英寸宽，底部1/8英寸宽。一旦服丧期结束，人们会恢复使用白色的信纸，但寡妇除外，除非她再婚，否则此后的余生中她将一直使用镶有黑边的书写纸。

19世纪关于服丧的一些做法令人好奇。尽管除了贵族和富有的家庭之外，这些礼仪并不会被严格地遵守，但这些程序化的礼节却建立起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仪。同上层社会的礼仪一样，这一切与18世纪的帝王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论

维克多·雨果在1871年2月22日写道："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总会带上小乔治和小让娜去散步。你们可以将我描述成'维克多·雨果，人民和孩子们的女仆的典型代表'。"公众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行线正在发生碰撞。雨果，没有把公众生活置于更高一等的位置，而是把他政治家的角色和祖父的角色看得同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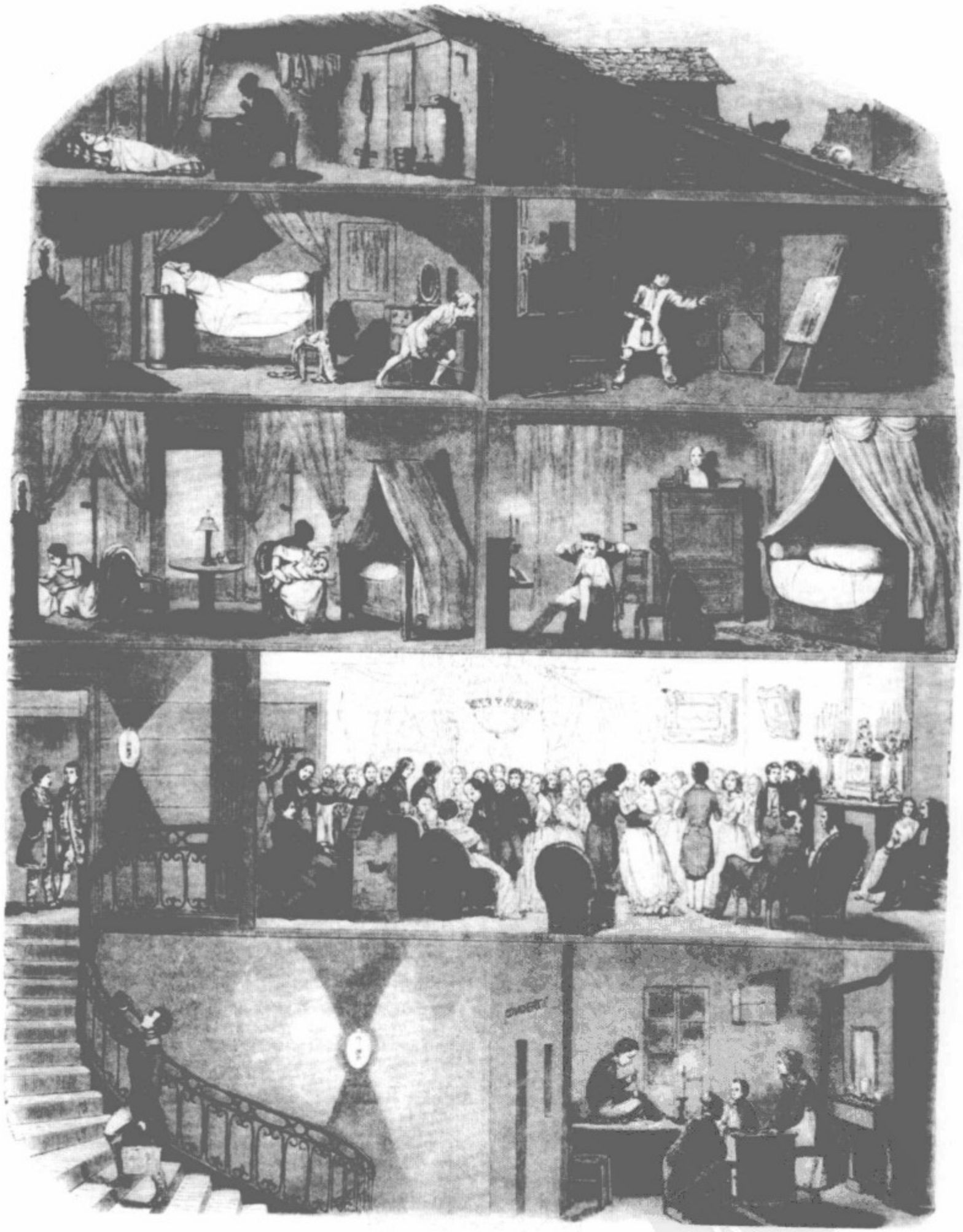
孩子们确保了时间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儿子的儿子令我们陶醉"，那是因为当生命的循环一遍遍地自我重复时，时光的丝线通过他们交织在了一起，"看看我的让娜的让娜吧——那一定是我的梦想所在！"维克多·雨果对家庭的信仰进行了诗歌化的生动描述，这种信仰就是资产阶级通常会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进行的家庭内部庆祝仪式。庆典有时与信仰密切相关，有时则不是这样。这些场合是多愁善感、亲切温和、欢乐喜悦的，家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欢欣于自我的存在。同时这也确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独立于历史变迁和公众竞争之外的。

家庭仪式意味着私人时刻永恒不灭的本质。婚姻是这些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孩子和度假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就在其自身的典礼仪式中，满怀喜悦地凝视着它永恒的化身。

米歇尔·佩罗
安娜·马丁-福吉尔

清晨时分，一条毗邻歌剧院的街道，豪华的商店就要开张。这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

3
舞　台



从门房内的一个裁缝，到狭促的顶楼中边缝补衣衫边照看孩子的妇女，这幅关于夜晚的房屋的代表作展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家中

私人生活是应该存在于墙壁后面的。利特雷在他的《词典》(1863~1872年）中写道："不允许任何人窥视他人的房屋或暴露其间发生的事情。"

私人生活被墙所隔体现在几个方面。在公共场所中，一小部分人把半私用的领域（如医院病房）变成了他们独享的空间。城市中到处都是俱乐部、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会所、赌场，私人的房屋在夜晚时就变成了喝咖啡、看歌舞表演、喝酒的众人聚集之所，各种情感泛滥其间，于是，私人的房屋又成了"公众的房屋"。

这些半私用的聚会场所几乎就是男人们专用的领域。女人如果与"公共"活动有任何瓜葛都会招致名誉受损，这里没有她们的立足之地。相对应地，她们聚集在缝纫房、教堂和洗衣房中。尽管机警的立法者们满怀希望，但民间社会并不是虚无的；它是充满着一个个快乐蜂巢的蜂房，每一间巢室都有其自己的隐私。

统治阶层对大众的无知和污秽充满了畏惧，他们确信安全的避风港应该可以存在于公共空间之中：剧院包厢是私人沙龙的延伸；轮船和公共浴室内都有私人包间；一等车厢避免了人群的鱼龙混杂、污浊不堪，从而使他们保持了地位的显赫。福楼拜写道："自从发明了公共马车，资产阶级就死亡了。"——此前满城跑的挂着遮人眼目的厚重帘子的出租马车正是通奸行为的确切标志。

家务秩序

不管怎么说，私密的精粹是家，家是家庭的场所和社会秩序的支柱。康德把家上升到了纯哲学意义上的伟大："住宅，居所，是唯一抵御虚无、黑暗和过去阴影的壁垒。它的墙壁中包含着人类数

百个世纪耐心积聚的一切。通过树立起一种内部秩序，一种端庄，一种自我的激情，它与逃避、流失做着抗争。在家中是为了体验生活中的慢板和冥思的快乐……人类的特性就这样与住宅相连……没有家的人是潜在的罪犯。”

有了家，就有了根。因此，对于想为自己建立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队伍的雇主来说，向工人们提供住房在其策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家庭和法律秩序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也莫不如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对底层社会的住房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得来的资料是考察当时社会普遍行为的重要依据。相面术曾依据脸是心灵的镜子这一理论试图描绘出每个人的脸庞；现在，社会科学则依据房屋反映着居住者的生活这一理论来描绘各个房间的构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一个乡村校长的房屋会很奢华，而一个教师的房屋却精巧、整洁、有品位，不会像单身汉的屋子那样邋遢。

住宅既是政治实体，也是道德实体。每个选举人都得有住处，而每个声望卓著的公民则需要在城镇中有一个同样显著的住处，甚至乡村的一处庄园。住宅代表着纪律和改造，是抵御革命风险的盾牌。18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时，全球博览会“社会经济展区”的主题是“各个年代的家”。

在19世纪，住宅意味着家庭事务。房屋是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是存在的中心，是夫妇志向的形体化，是成功的标志。开始一个家庭就意味着搬进一个家中。年轻的夫妇越来越不愿意与父母同住一处房子。当已婚的孩子与他们的祖辈住在一处时，原来再温暖的大家庭也会变得黯然失色。

“家”是个英语词，19世纪30年代时在法国的资产阶级中开始使用；贫穷的家庭用它来指称他们的住处。不管是哪种情况，一个人的住宅都是个人独立的标志。因为与父母政见不一，博蒙和他年轻的妻子找了“一个洞穴居住”。博蒙在1839年写道：“克莱芒蒂娜和我极其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对我们来说，最小的村舍也犹如地球上的天堂，只要我们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一个大家庭中，没有什么比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中更让人惬意的了。“家”这个词现在已主要是指家务的中心，而不再是人的中心了。一个人可以在那里体验幸福；同样地，富有的人现在已习惯于“舒适”了。中层阶级的读者应该将这个词放入他们的字典，努力

拥有其间所蕴含的东西。

一所房子也是一笔资产，一项投资；在农村，大部分资本仍然被投注在不动产上，并且在那里，这种投资的收益率相当可观。许多遗产主要是由不动产构成的，而不动产不仅是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也是抵御死亡的堡垒。这样的财产多么生死攸关？继承人有时会为了一所房子而苦苦争斗，并将房子中的各种财产一一清点入册；他们不休的争吵将安逸的巢穴变成了蛇蝎的毒窝。

一座房屋就像是一个私人的王国，它的主人试图通过开垦花园、建起花房来消除季节的差异，将自然据为己有；通过积聚藏品和举办私人音乐会来将艺术据为己有；通过收集家族的纪念品和旅行的大事记来将时间据为己有；通过收集各种描写世界各地的书籍和图片杂志来将空间据为己有。阅读，是在手扶椅上进行探索的一种形式，使整个世界变得清晰、易读，也使世界文明起来；而照片则使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家庭藏书室是开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它将世界包含于家的疆界之中。

在19世纪的转型期，人们体会到了一种迫切的渴望：足不出户地了解并支配这个世界。诸如电和电话这样的科技进步建立起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络，并使人们有可能去设想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在家中工作。许多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家族产业，所有家庭成员都身处其中并在父亲注视的目光中工作。从左拉（法国作家）到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许多人都把家族产业视作可以释放巨大潜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在家中，社会身份不确定的男性可以作为家族的领袖重获尊严。

而艺术家则在想象一种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以全新形式出现的“完美的家”，那应是社会精英分子生活和创作的中心。埃德蒙·龚古尔警告说“生活有变得公众化的危险”，为消除这种危险他建议把家作为终极避难所。生活也有变得女性化的危险，男人应从女人手中重新获得对房屋的控制。当20世纪临近时，于斯曼（法国小说家）和其他一些人对新的“解脱了束缚”的妇女产生了和龚古尔一样的担忧。

作为庇护私密的堡垒，家被墙壁、仆人和黑暗保护着。但家也是一个充满了内部冲突的沸腾场所，是一个微观世界，其间到处都是公众与私人、男性与女性、主人与仆人、父母与孩子、家庭与个

右页图:克劳德·莫奈:《艺术家在维休尔的花园》,1880年。封闭的花园,郁郁葱葱,一片宁静。这幅印象派画家的画作是快乐的对等物。

人之间错综的关系界限。根据各种用途对房间进行分配,楼梯和走廊的位置,用于私人思考的空间的可获得性,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由自我私欲带来的各种或迎击或避让的为人之道所支配。喊叫与私语,窃笑与啜泣,喃喃的低语与轻轻的足音,吱吱呀呀的门声与滴滴答答的钟表声,这一切的交响正是家务的乐章。所有私密的中心就是性。

中产阶级内部

住宅的典范,典范的住宅,理所当然是中产阶级的模式。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伦敦到19世纪末的维也纳,向东远至柏林和圣彼得堡,中产阶级的家的样式数不胜数。但也许曾存在过一种全欧洲的样板,那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建筑学思想的自由流通,其显著的特点是合理地将各种功能巧妙融合,相当舒适,含有对贵族时代的一种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在那些仍部分保留着宫廷生活方式的国家中尤其影响强大。甚至是在那些民主政体的国家中,资产阶级仍执著于从18世纪的沙龙和庄园借鉴来的高雅理念,而不急于评判他们自己的品位。不管这种中产阶级风格样板的假设多么具有合理性,在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性角色方面许多不和谐的东西仍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些不一致是从国家、宗教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滋生出来的,并转而导致了家庭建筑和使用上的差异。

田园中的家:劳动空间

城乡之间的差异如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重要。在19世纪转型之时,大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乡村。在法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在1872年时是69%,1911年时是55.8%。在乡下的房屋中并非没有私密,只是在开放式的村舍中不能将其视为想当然。唯一的墙壁就是沉默的墙壁,只有自己的招供才可能使其产生裂口。

农民的同一性根源深远。在佩卡迪或杰瓦丹,家更主要的是指一个地点,而不是一个建筑。一个人要"从这里"才可能辨清基本的地形,读懂天空和气候的征兆、识别出财产的界限并讲述这些东西的历史渊源。"土地",是以最强烈的情感表达乡下的地点这一概念的词条,在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与他人共享并永恒不朽的根。家族的故事一代代地传播,同时也为后人建立起众多进行纪念的场所。界限感是如此分明,外人一定要小心不可"过界",陌生

人更要加倍提防。

人员拥挤，建筑粗糙，村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像是一个家，倒更像是一个劳动的空间。前来造访的民族志学者和城里的学校教师除了动物般的男女乱交外什么都看不到，尤其是当动物和人睡在同一个屋顶下的时候。谷仓，柴房，与乡下的牧草地接壤的沟渠，还有小姑娘们牧羊的遮荫的林地——所有这些地方都比普通的卧室更适于做爱，整个家庭都共享着这一切。但其实每个人都持续处在其他任何人的详细审查之下，要想出格是很难的，这需要群体的默许。怀了孕，还要隐瞒的话，对于任何女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我。我的父亲盘旋在我的周围，鉴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可能宁愿我永远也不要换掉床垫中的稻草。”这些话来自伊丽莎白·克莱维耶和皮埃尔·拉梅森的报告，这是一个42岁的男人所讲的话吗？类似的法庭记录中反映出来的是对近距离监视日益增长的烦躁，尤其是当个人主义态度有所发展时，父母的干涉就更加变得令人无法忍受。随着交通手段（范围大到铁路小到自行车）的改善，人们的机动性越来越强，活动的领域越来越宽，这也是个人主义思想风行的部分原因。年轻人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村庄里跳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农村妇女拒绝与她们的婆婆同住一所房子。一些人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还有一些人需要某种快乐的事物，哪怕冒着被称作“轻浮”的危险。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女人们开始离开村庄涌入城市；她们的大批离去导致了农村未婚男性人口比例的上升。

穷人的家

拥挤于污秽杂乱的陋室之中，农村的穷人们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私人生活风格。他们似乎容忍了这种无法加以选择的杂合，甚至在娱乐休息时也如此。左拉把劳工们的舞蹈称作是一种交配仪式。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工人们在性上的这种不加选择是原始、不文明的象征。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分子们渴望获得更有尊严的形象，他们对这种粗暴的行为方式越来越不能容忍，不能再被别人视为动物了。到19世纪末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在住房上的“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标准中确定了每个居住者所需空间的立方英尺数。尽管长期以来工人运动都对“住房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在

该世纪的转型期之后，工人运动也开始呼唤“纯净的空间”和“健康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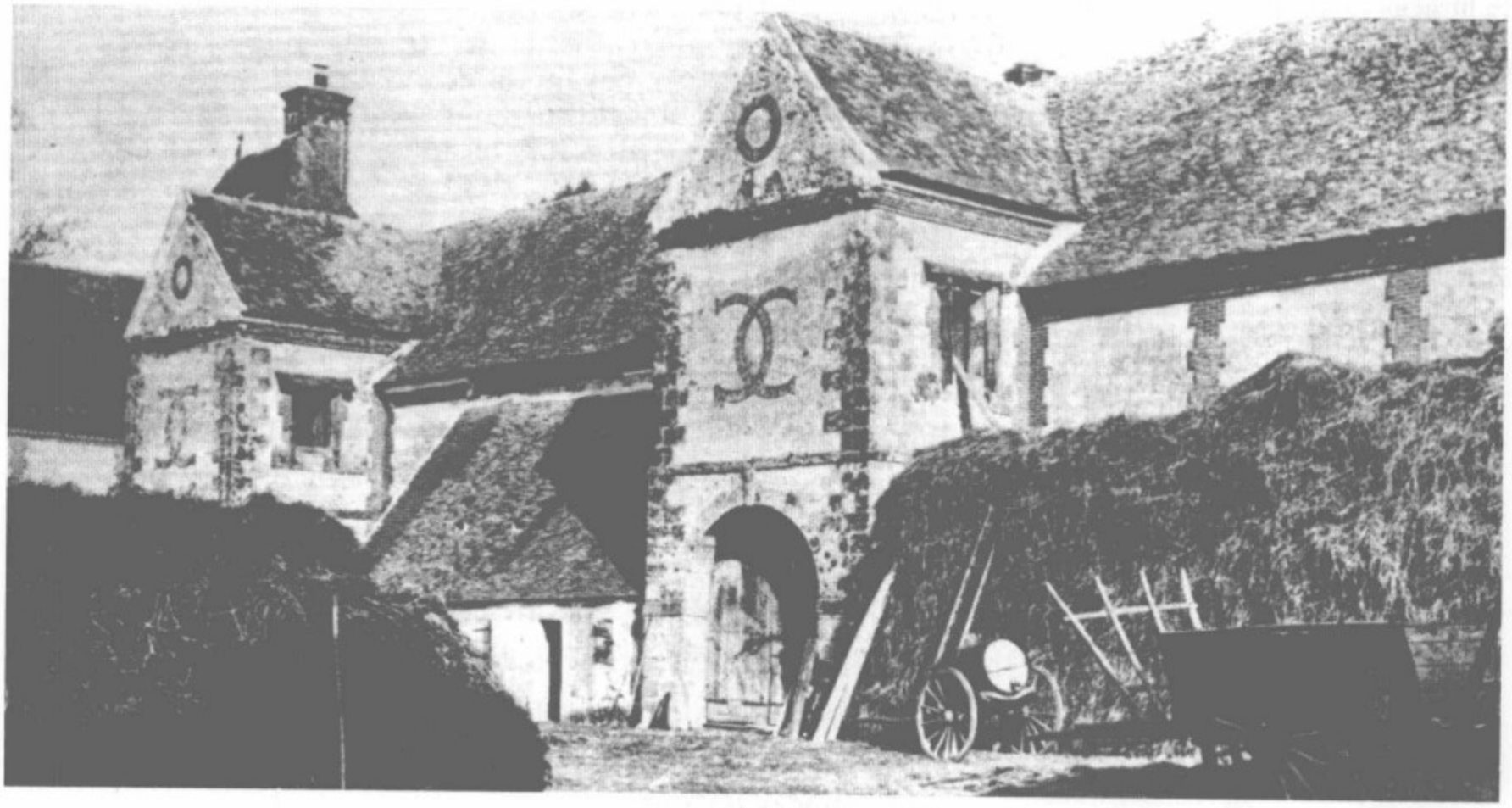
尽管在1914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这种博爱式的努力在住宅方面取得了即便有限但也不容否认的改善，但由于始终未真正理解工人阶层的习惯，这种值得称颂的努力被迫中断了。工人们被迫“住在街上”，利用公共建筑物和邻近地带开放的类私人空间。人们彼此帮助并教新来的人如何融入城市文明之中。19世纪的工人，并不把自己的钱财花费在住宅上，因为那是杯水车薪、遥不可及的；他们更多地把钱花在衣着上，那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更是为了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的困窘，以便为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工人们的渴望首要地集中在城市上。工人们频繁移动，不仅为了躲避房东和收租者，而且也是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标志。在都灵，工人们最先迁往的地方就是城市的中心，然后是外围，然后再返回市中心。这种持续的流动中包含着有计划的社会战略的所有记号。

对于工人们来说，城市就是一个有人起有人落、有人走运有人倒霉的巨大舞台。劳动的人们希望的是开放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可以像他们在农村的祖先自由地拥有村庄中公共的土地一样自由地获得城市中的所有资源。他们不喜欢有围栏的操场和公园，因为那里排斥穷人，是专为富有的人设计的用来漫步的体面场所；劳工男女们更喜欢未被开发的野地。与公众健康所鼓吹的绿色空间不同，他们更喜欢巴黎的“黑色地带”，那是许多人进行周末远足的目的地，也是年轻人进行约会的场所。

城市中的穷人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与社会其他层面的人群有着不同:他们的家庭网络不是以地点的限定或家中的墙壁来定义的。在19世纪下半叶，穷人们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对空间和私密的强烈渴求。

自由首先意味着选择居所地点的自由。工人们抗议被迫群居在工人住宅内，即使是像“拿破仑城”这样著名的工人群居地最终也以惨败告终。奥迪加内在1860年表示:“住宅工程在巴黎从未流行起来”，因为那意味着工厂纪律向家庭中延伸，“一回到住处，我们就会发现贴在门上的新的规章制度，这几乎影响到了我们所有的私人活动。在自己的房子中我们却并不是主人。”工人们宁愿选择建



农村的房屋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产而设计的，对于家庭生活和亲昵的需求只能提供有限的空间。由于主人的财富差异、地区的不同，房屋的风格也相差很大。上图是一幢豪华的村舍，二层是卧室。而右页图则是简陋的农舍，以狭小的空间来适应众多的人口。

在城市中的“砖头水泥”建筑也不愿选择在别人提供的舒适住宅中接受规章的束缚。

对于自由的渴望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渴望部分滋生于农民与土地的牢固依附关系，也是制约工业化的一个强有力的闸。这种对土地的依附事实上被原始工业化时对家庭经济的需求巩固加强了，家是所有工作场所中的第一个。以北欧地区为例，在家中工作的织工们极力反对市政府出于健康原因将他们从家中迁出来的努力。从潮湿的地窖中迁到干燥但却不方便的阁楼中，织工们对于纺织品贸易的需求表现出了全然的不屑。在里尔，被迫从地窖中迁出的织工们又重新在市中心的小巷中集合起来，并在街面上开起了店铺。

如果收入微薄，用于工作的房间就谈不上什么家具和其他物品的摆设。床垫，厨房器具，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偶尔一个家用的箱子，这就是富于同情心的社会学家视作稳定家庭之根本的标志物品。

渴望亲昵

当工人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小，而住宅条件却变得更糟的时候，委屈和渴望就会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在1884年进行的一项对

住房的议会质询中，首次被召来做证言的工人们满含悲苦，对他们被迫居住的肮脏不堪的公寓、“蟑螂遍地的旅馆”和将就凑合的建筑痛施攻击。在得到肯定后，他们也表达了再多获得一点点空间的愿望，至少应该有两个房间，可以养育孩子，“对于一个自尊的父亲，三或四个房间也不算太多”。对于一个布置合理、体面像样的睡觉的地方的需求超过了个人的要求。一旦支付得起费用，工人们都会即刻安排孩子们与父母分屋而住。1880年，一个女工试图杀死她的伴侣，因为他花掉了她积攒用来买床的钱，那是确保他们成为夫妇一同生活的一种保证。当建筑商马雷夏尔计划安排工人的住宅时，他无论如何不敢安排私人洗浴的房间，“（普通）人在他们的住宅中并不需要浴室”。工人们真正想要的是外观多样化、面积适中的建筑物来做住宅，“这样就没人会说他们是住在工人的住宅工程里了”。这番言语揭示出了一种对于被迫群居在一处的恐惧和对

COCHER
SPECIALITE
BOUTETTE
10

读书的少女，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沙龙装饰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花束和小摆设。几何图形的壁纸和浅色的窗帘突出了光的重要，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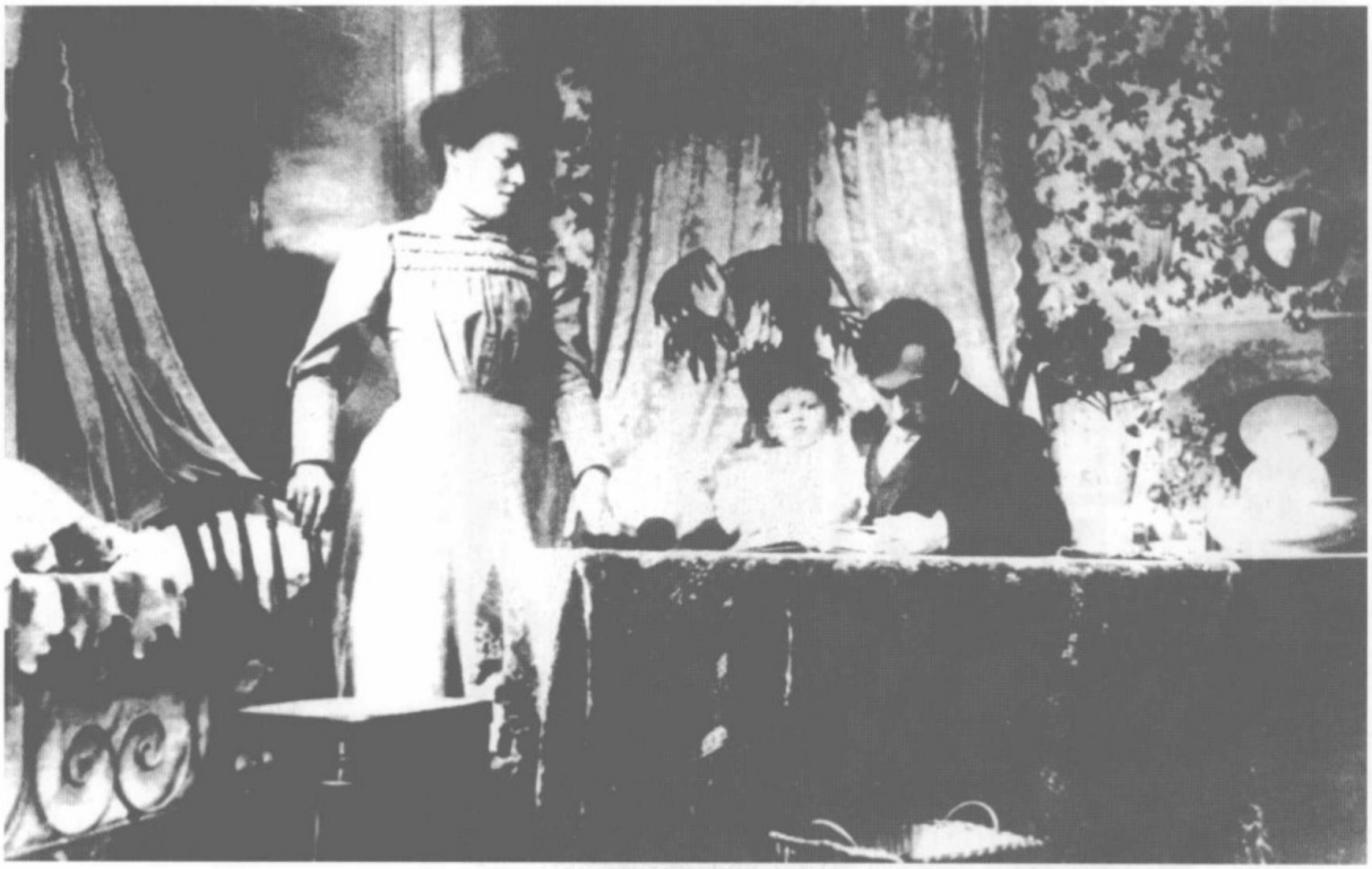
个性化住宅的渴望。

人们需要温暖、清洁，还有纯净的空气。他们也盼望能有家庭的隐私，并极其渴望独立自主。他们喜欢可以在其中进行创造和修补的空间。出于这些原因，他们梦想着拥有单一的家庭住宅，这种思想并不仅是资产阶级强加在工人们身上的，而且也确实是无政府主义者们最热切的愿望。

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渴望能在家庭中、夫妻间和朋友间拥有更大的私密空间。这些渴望在行将进入20世纪时变得尤其强烈。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不加区分地与邻里混居在一起，并接受他们对于私人行为的种种限制。他们强烈反对那些在监狱、医院、兵营和寄宿学校中实行的监视。

福音传道者戴维·盖茨在第二帝国期间被投进监狱之中，他最

左页图：商店和公寓挤作一团，切断了正常的路线。无处不在的标记符号将城市变成了一本书。一如以往，视野中空无一人。



在这间普通会计的公寓中，空间十分有限。公共休息室既是办公室又是孩子的卧室。但厚重的窗帘，花瓶中的植物，镶了框的照片和镜子，还有花色斑驳的壁纸，无不表现出主人对家庭温馨舒适的关注。

不愉快的回忆就是公用宿舍以及“所有那些男人的呼吸，他们的鼾声在你耳边震响”。与他的妻子进行私人会面根本不可能，“没有感情的流露，没有温柔的爱意，没有一句陌生人会听到的甜言蜜语，没有一个人们在这种情形下希望彼此倾诉的小秘密”，监狱看守四处巡游，“就好像他们此前从未看到过彼此相爱的人一样”。

在巴黎，医院的雇员们起来反抗，抗议被迫居住在兵营一样的环境中，“集体居住，这曾经是医院的一条基本规章，对于我们的大多数员工来说已经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在饭厅中吃饭，在宿舍中睡觉，他们已饱受其苦。在医院中，他们没有感觉到是‘在家’，他们渴望能独处而不受干扰，渴望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和相对舒服的属于自己的房间。而最后，他们希望工作之余的私人生活时间能免受行政管理纪律的束缚。”这是一位名叫梅瑟尔的市政议员在1910年时写下的，尽管富有同情心，但他认为医院中未婚的女员工最好能不受强迫地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中，因为在那里她们会比较安全，道德气候也更健康。但一个人被迫在他工作的地方居住被

视作是奴役的标志，因此工人们不愿接受这样一种状况。

人们需要空间不仅是为了做爱和与家人在一起，他们只是为了居住。来自里昂的劳工诺贝尔·特奎因就曾被迫居住在一处类似兵营的所在，他回忆说："最让我烦恼的是那种另一个人在我身边存在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分享一张床。"

一个人对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的渴望，反映出一种提升了的身体独立感，一种个性意识的苏醒，一些作家已将这一点表现到了极致。福楼拜写道："你不得不关上门窗，像条看门狗一样地蜷缩起来，引燃壁炉中的火焰，因为很冷，然后从心中生发出一些伟大的思想。"更进一步地，"既然无法企及太阳，我们就必须封好窗户，点亮我们房间中用以装饰的灯。"

私人空间与诸多大事利害攸关。在这里，权力的野心以原始的形式得以实现，个人关系确立形成，人们发现了自我。因此，也就不必惊异于发现房屋竟在艺术和文学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阳光明媚的花园，宽敞的窗户，属于自己的家总是如此美妙。

家：纪念之所

家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如此微妙细腻而又普遍深入。家，是私人生活的舞台，是学习人生经验的最个性化的场景，是童年回忆的焦点。家，是永远珍存纪念的所在，我们的想象和回忆在那里永恒。

TÉLÉPHONE
A LA HALTE DES BUTTES

私人空间

左页图：这是巴黎的一所公寓建筑，专为资产阶级女性设计。装饰华丽，风格时尚，外围是金属锻造的护栏，墙壁上附有雕刻的图案。受20世纪早期社会运动的影响，建筑师已不再把顶层设计为仆人的住处。

统治阶层对无产者的轻蔑和不敬贯穿于19世纪。无产者被称作“野蛮人”。德克希尔博士是一位生活在路易斯·菲力普统治时期的医师，他绝望地描写道：“数目巨大的工人阶级，第三层的也是最底层的阶层，除去个别的例子外，他们全都毫无希望，无知、迷信、习惯低劣，道德颓废的孩子们比比皆是。粗俗无礼、目光短浅、挥霍浪费、寻欢作乐、放荡不羁，这一切对他们是如此有害，简直无法描述——我这么说并非带有歧视；他们的形象太过丑恶了。”

选摘相似的文章编成一本文选绝不困难。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无产者是最危险的野蛮人种，是低劣种族的一员。艾德琳·杜马告诉我们：“尽管有些富有的巴黎人对下等阶层抱有兴趣，但他们仍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在中产阶级和人民之间树立起一道屏障。”

在新的社会中，财产占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业主们和工人们分离开来。举个例子，在里尔，1891年一个工厂主的平均财产净值是1396823法郎，一个工人则只有68法郎，或者说两者之比是20541:1。到1908年，工人和工厂主的财产净值都上升了，但其比例仍然高达9075:1。差距如此之大的两个社会种群怎么可能生活在一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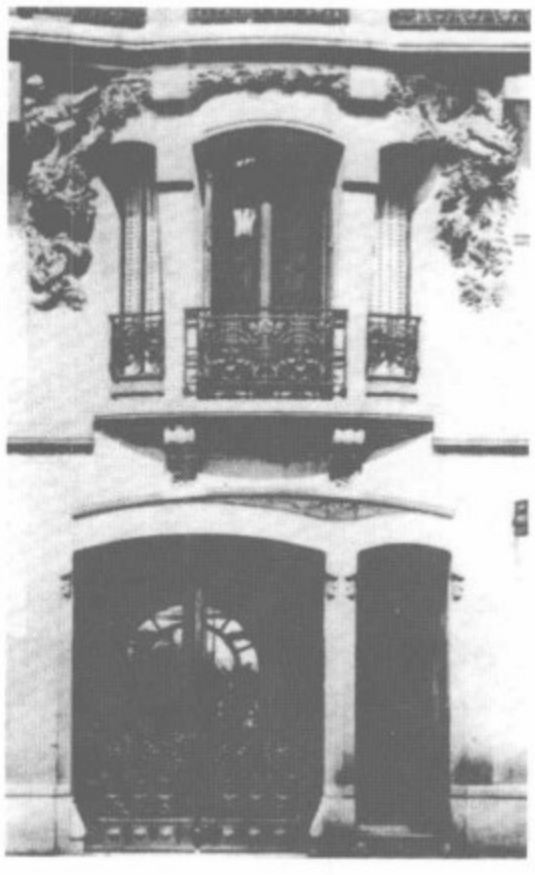
因而，那些让富人和穷人居住在同一幢建筑不同楼层的楼房逐渐消失了，这种居住模式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一度非常普遍。我们可以在公寓住宅建筑的各种剖面图中追寻到这种变化的踪迹。这种素描画法为19世纪的许多画家采用。更古老一些的雕版图显示，高层的住宅没有低层的住宅那么奢华、舒适，在所有楼层中顶楼的舒适

程度是最差的。即使在19世纪早期，居住在不同楼层的房客也是互不认识的。二层楼或者说贵族楼层的住客通常很快就会搬到城里更高级的地方去。奥斯曼时期，一幢公寓大楼的一个横断面中的房客在社会阶层上基本是一致的。在任何规模的一个城市中，繁华的地段都逐渐成为富人居住区，而无产者则被转移到犹太人区，上层社会的人根本不会在那里落足。

体面的住宅

在第二共和国期间（1848~1851年），政府扩充了建筑规范——旧规范可以回溯到1789年大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时期，并建立了一套新的关于建筑物高度的规定，以发挥街道宽度的功用。（在宽度不足7.8米的街道上，建筑不能高于11.7米；街道宽度在7.8米到9.75米之间的，建筑不能高于14.62米；街道宽于9.75米的，建筑不能高于17.55米。）拿破仑三世后来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奥斯曼时期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在宽度超过20米的林荫大道上，只要楼房不超过5层楼（包括一、二层之间的中层楼），房屋檐口的高度就可以提高到20米。任何建筑中的一层楼均不得超过2.6米。

泰奥·珀蒂是20世纪早期使新艺术主义得以风行的功绩最大的一位建筑师。他在巴黎建了几幢非常漂亮的对称结构的建筑。



尽管楼房上伸向街道的突出部分一度被禁止，但建筑商们却始终为恢复他们所珍爱的突出的装饰部分而斗争着。他们的欲望最终被一项新法令所缓解，新法令规定，在宽度为7.8米至9.75米的街道上，阳台可以在人行道上方5.75米或更高的高度上延伸出50厘米远；在宽度超过9.75米的街道上，高度超过4米的阳台可以伸出50厘米；如果高度超过5.75米，阳台可以向外伸出80厘米。在20世纪初，包括一、二层间的中层楼在内，建筑物仍然不得超过7层楼20米高，但在宽度超过10米的街道上，建筑物的突出部分已上升到了1.2米远。这种让步已足以使凸窗得到发展，凸窗在1890年前后出现，目的是增加卧室的采光度。

建筑规章在宽度上相对的慷慨大方，使建筑师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各种方法来装饰建筑的正面。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的华丽是最为强调的重点，实用并不是最重要的。19世纪末期是一段新古典主义与新哥特风格苦苦争斗的时期。但许多唯利是图的人通过掠夺文艺复兴的战利品来为自己命名，这一时期某些建筑的外观设计竟然与贯穿16世纪的风格的图解惊人地一致，宛若从教科书上描摹下来的一般。在19世纪发生转型前后，新艺术主义

的叶状附赘物为这种既是远古又是中世纪的建筑布景引入了新的注释，但在除了南锡之外的大多数法国城市中，新艺术主义建筑只是众多建筑艺术种类中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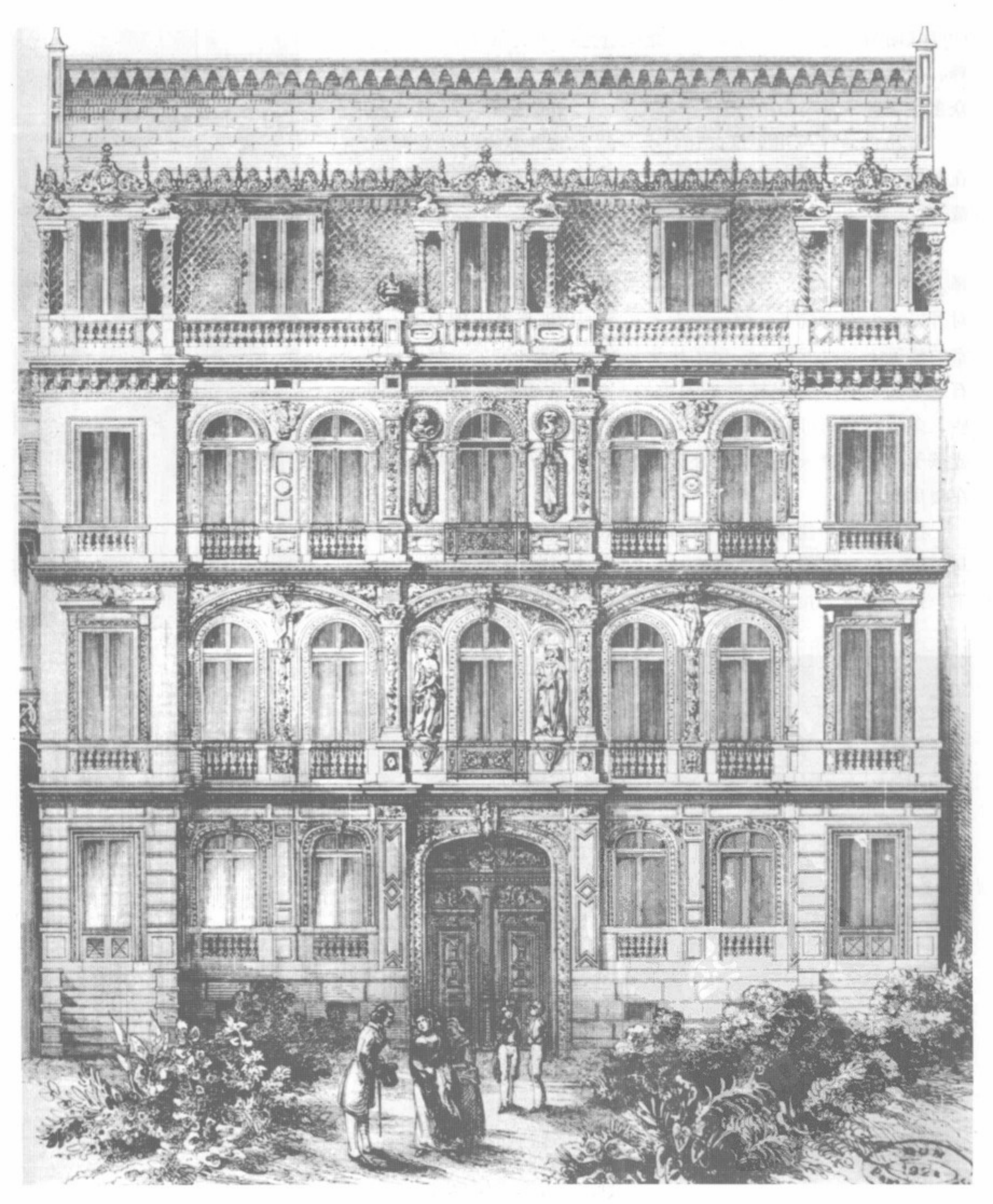
最昂贵的建筑租金足以让社会地位不够坚实的房客垂头丧气。在奥斯曼时期，奢华的中产阶级住宅获得了经典的形式。赛扎尔·戴利详细探索了已获得完美统一的一种流派内部的细碎差别。

根据戴利所说，他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有三种租房模式可以选择。尖顶的公寓是为那些有一定财富的家庭准备的。这种住宅两面对外，一面对着院子，另一面对着街道。用石头打下的地基，地下室的建筑不超过五层，三层的比例最高。公寓住宅的二到四层都以石头梯阶相连，如果楼梯是木质的，则标志着社会地位要稍低一些，多为家境尚可但并不非常富有的家庭采用，或是在家人的亲朋或孩子的住房中采用。也有仆人用的楼梯，或安置在主楼梯旁边或在楼房的后部。

这种类型的建筑通过炉子来加热取暖，炉子安置在地下室里，与各楼层的导热管相连，但在三层以上，导热管的效率就比较低下了。每个家庭，并未将温暖当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医师们建议卧室

整个19世纪，艺术学校总是对古典的和文艺复兴模式青睐有加。每幢建筑的正面都会有华丽漂亮的雕塑。上面这幅图片就是这种流派的一个奢华的例子，这需要雕刻家的参与才能完成。

多米埃是一位敏锐的社会形态观察家，他将这个看门人收进了他藏品丰富的肖像画库中。他的一些平版画中涵括了房客和房东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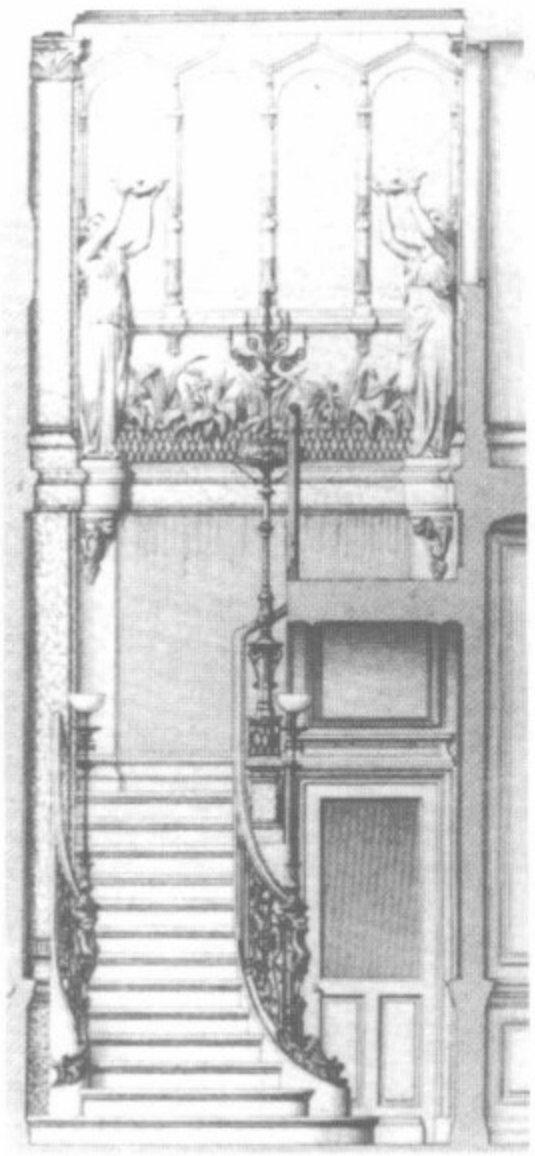


内应该保持凉爽和良好的通风。

财富少一些的家庭就只能居住在二流的建筑中了。这些房子也是建造在石头地基和地下室之上，但是多了一层，总共有六层。第一层和第二层住的通常是做买卖的商人。主楼梯从上至下全部是木质的，每一层有两个单元。但即使是这种相对普通的建筑类型也建有仆人用的楼梯。

统治阶级中也有下层人士，他们就居住在三流的公寓中，六层的建筑只有唯一一部木质楼梯。这些建筑没有庭院，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井。

所有三种类型的公寓住宅中，其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看门人的存在,看门人曾一度只有在贵族们居住的旅馆中才能发现。既然房东不住在自己的楼中，那么看门人就成了主人的代表。他收取租金，出租空房，清洁走廊和其他的公共区域，并维持秩序。站在公与私之间的分界线上，他还调节着街道和公寓之间的交通，确保畅通。但有些人谴责他们是为警察服务的告密者。一些观察家评论说，看门人的住处总的说来不太舒服，当然肯定也有例外。一部第二帝国期间的小说中的看门人就住着和年轻的中层家庭同样奢华的单元房。



合理的空间

在高级公寓住宅中，楼梯总是最先给人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楼梯不仅是功能空间，还是进行展示的焦点区域。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楼梯上会有精心制作的扶栏、灯具，和各种各样金属制的雕像。

左页图：玉勒诺是一位建筑师，他使文艺复兴风格得以复活。这幢建筑的装饰对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发出了挑战，其对称的正面无可挑剔。

公寓内部是根据一个多年来得到广泛认可的方案来布置的。每套公寓中都有用来摆放陈列品的公用区域，用来进行亲密的家庭聚会的私人区域和纯粹的功能空间。一进大门就是大厅，除非受到邀请，客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大厅以外的地方的。在大厅中，到访的客人被分门别类地引导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上。在19世纪早期的一些建筑中，这部分空间足有两个餐厅那么大。

餐厅按预计的功能进行使用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家庭向客人们进行自我展示的窗口。银器都展示在这里，从受欢迎的金匠那里定做的中心装饰品（餐桌中央的摆设）也在这里绽放光彩。同时这里也是社交密集区，“许多事情是在餐桌上敲定的，许下承诺和誓言，也包括婚姻。”有些主人甚至会在真正邀请客人来之前，私下里进行正式晚餐的程序演练。

餐厅既是社交场所，也是家人每日聚集在一处的场所。但在19世纪的历程中，餐厅明显地失去了一些较为私密的特性，这种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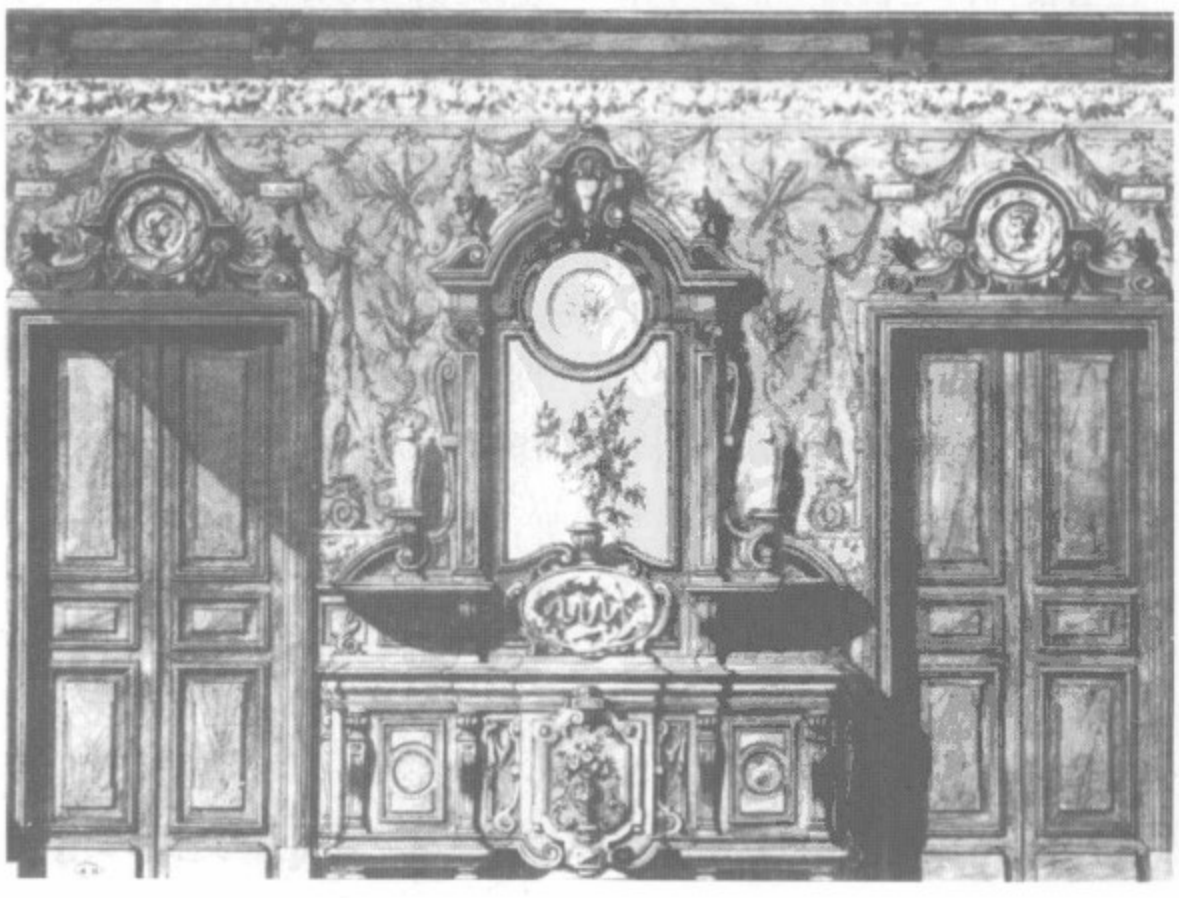
右页图：这是两幢奥斯曼式的住宅楼，在巴黎和外省的住宅区内，这种式样的住宅数不胜数。唯一的创意就是金属凸窗，那是中产阶级的冬季花园。它还调节着街道和公寓之间的交通，确保畅通。

至少吸引了一位作者的眼睛，“当晚餐结束，桌布撤去，点亮油灯，妻子开始进行刺绣，丈夫读书或看报，孩子们拿出玩具玩耍，大家随意地交谈着。”许多主妇在餐厅中度过她的大部分时间，因为那里的光线要比房子中任何其他部分都好。但也有不同情况，在1860年到1880年间建造的大部分房屋中，尤其是在巴黎，餐厅的光线主要来自狭窄阴暗的内部庭院，因此除了用餐之外很少另作他用，因为事实证明小客厅更适合进行阅读和编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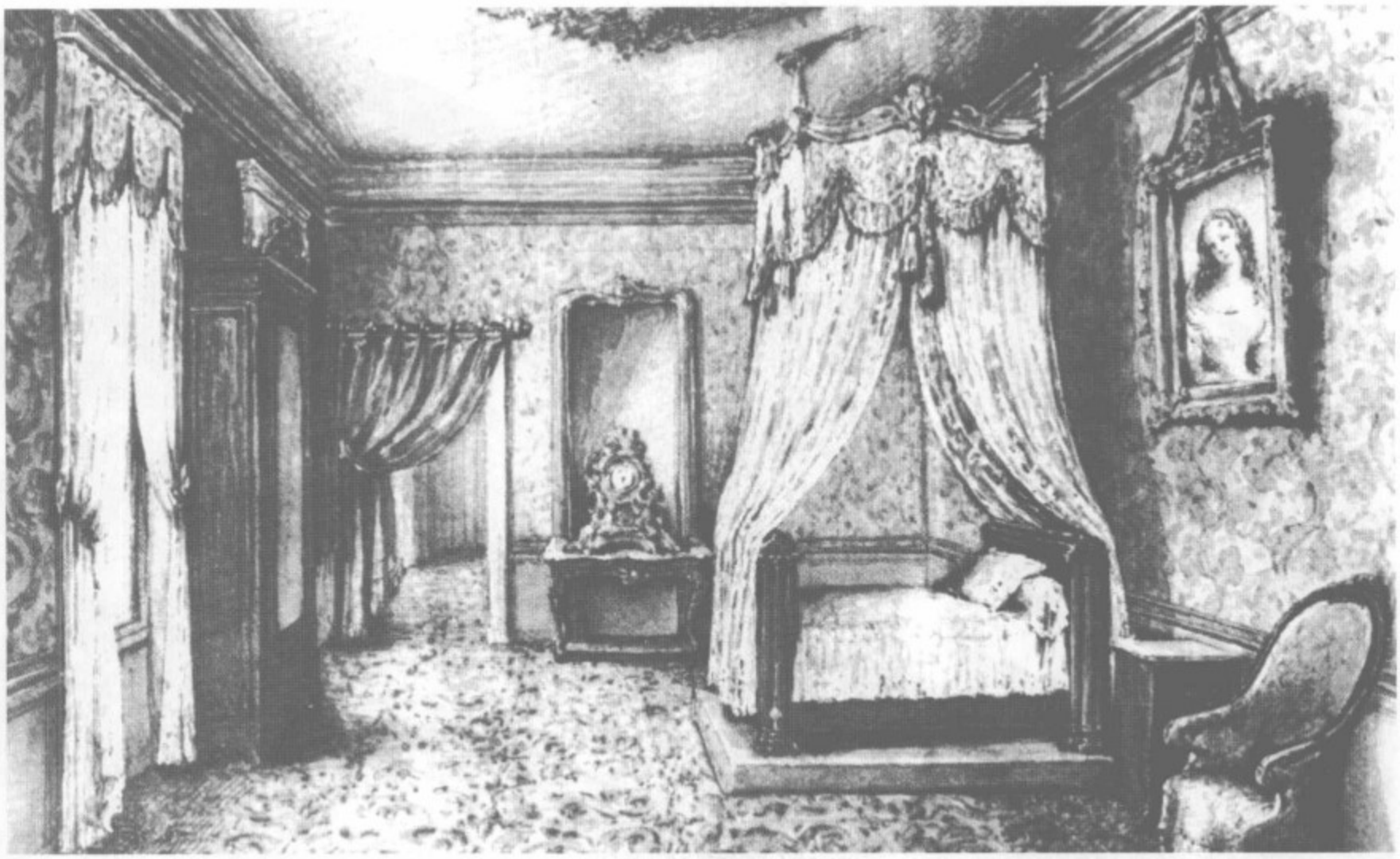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有小客厅，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会为能有个小客厅而做出很大牺牲。豪华的公寓中如果没有这种舞台化的空间，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里是举行家庭仪式的地方，新旧社会在这里连接到了一起。19世纪的画家们不厌其烦地就这些场景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最卑微的小资产阶级当中，那些社交圈子有限、家庭成员少的家庭，其客厅中的家具始终蒙着厚厚的盖布，实际上根本就未曾使用过，直到某些内部的油漆工最终来宣布这个房间已不能再用了，但这些人绝对是看轻了它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它表示着一个阶级的成员身份。客厅的主要特征就是文雅性和交际性，这正是资产阶级的两个特性。

19世纪，性的沉重面纱被揭去了。结果，主卧室成了神圣的所



费利克斯·勒努瓦的餐厅设计，1874年。在路易斯·菲力浦时期出版的各种设计图案激发了家具制造商们的灵感。这个餐厅中令人惊讶的餐具柜上有了一个瓷盘、两个中国瓷瓶和一对骨灰坛。



莱热的卧室装饰，1844年。有罩盖的床继续着它古老的职责，而有镜子的新式大衣橱则将可旋转的穿衣镜和老式的双门大衣橱融合起来，因此很快就风靡起来。

在，不仅是奢侈享乐而且是繁衍后代的神圣殿堂。曾经有一段时间，允许在有床的房间接待客人，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卧室有了忌讳，没有必要冒某些可怕的风险。

19世纪和更早些的建筑学著述中，都没有提及家中专门留给孩子的空间。考察那一时期的玩具屋，结论亦然。在中产阶级中，孩子被送出去交由保姆照料，早在一年级时就会被安排进住宿学校。

拥挤的和舒适的

随着19世纪一年年的过去，中产阶级的住宅变得越来越像是古董店。堆砌，似乎已经成为家庭内部装饰的唯一指导原则。最富变化的时期和最富变化的文明肩并肩并存着；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样式的餐厅可能紧挨着一间路易十六时期风格的卧室，而一间摩尔式的台球室可能就在一个日本装饰风格的阳台上开张。织物、幔帐、丝绸、地毯，它们覆盖了一切。这是一个挂毯和帷幔的年代，甚至连钢琴支架也有织物盖着。这也是装饰的高潮期，缨穗的时光已然到来，法国的油漆匠们又将花上好多年时间来躲避其魔力。

对于这些品位上引人注目的变化，艾德琳给出了一个解释。整个19世纪，中产阶级（尤其在巴黎，全国的基调都以此处马首是瞻）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恐惧之中，要设计出甜美的家来减缓这种恐惧，“空间被象征性地分开了：内部意味着家庭和安全，外部意味着陌生人和危险。”人们迷恋于将墙壁和地板全部覆盖上东西；裸露的地板变成了贫穷的标志。

客厅中装饰着门帘、窗帘、挂毯、地毯、幔帐、丝垫，人们在拥挤中感受着内心的舒适。

腐臭的气味

公寓不仅仅是招待客人和享受家庭生活的地方。食物要烹煮，自然本性的呼唤人们必须应答。谁都希望这种必需的功能区域能够高度合理化，但希望总是与实际相矛盾。这些所必需的功能都与人的身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联系到这上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肮脏”，新的统治阶级已极大地提升了它的标准。19世纪的建筑师们，曾一度是这个阶级的代表，并赖以在这个阶级中成形发展，现在对厨房也有些置之不理了。这个不可缺少的房间被转移到了公寓的深处，转移到了充满浓烟和恶臭的后部，炉子的高温使那里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任何体面人绝对不会迈进那里半步。直到19世纪末，受巴斯德的影响，卫生学者们才开始发言，他们攻击厨房是苍蝇的滋生地，是各种细菌快乐繁衍的垃圾箱。

类似于此，人们很少关注带有瓷水池的卫生间。在巴黎，直到1865年，右岸地区的建筑中的高层才有流水可用，左岸地区更是到了10年后才有。至于浴室，如果有一个的话，哪怕离卧室很远也没什么要紧，因为人们并不每天都洗澡。直到巴斯德发现了细菌后，水的价值才得到了重视，洗手转变成了一种社会性义务。

让中产阶级认识到重新布置厨房的合理性颇费了些时日，因为厨房的主人根本就不会涉足其中。

中产阶级对身体检查必要性的蔑视，在盥洗室上就可以得到最明显的体现。水冲式的卫生间在18世纪就有了，但这些设备在随后19世纪的整个上半叶也没有流行起来。人们仍然坚守粪便作为肥料的价值，运人粪尿的人仍然每天来自于巴黎和蒙福根。从这些马车中散发出的肥料气味污染了都市的空气。尽管法国人意识到了1855年时生效的英国人的立法的必要性——此法要求所有排泄物必须经

下水道泻出，但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个可怕的浪费，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水，还使农民丧失了有价值的肥料。

在巴黎，1809年颁布的皇家法令要求人们使用污水坑，这一法令受到了广泛尊重，但中世纪的习惯仍在外省延续着。在里昂，污水注入隆河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在马赛，在1886年人口普查时登记在册的3.26万幢建筑中有1.4万幢没有人粪便处理系统。粪便只是先存积在每层楼的便壶中，然后再倒在排水沟里。在波尔多，1.2万个简陋的污水坑使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

而同一时期，英国却在经历一次使用抽水马桶的巨大热潮。室内铅管品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全欧洲都在研究英国人的方法。法国的建筑理论家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城市居民必须得到细致的呵护，从他们的粪便刚刚产生那一刻开始。粪便的出路应该是使用强力的水流迅即将其驱逐出住宅。”

放弃使用人粪便作为肥料，这种态度上的突然转变是农艺学进步的一个结果。秘鲁人的海鸟粪（在1850年到1880年间广泛使用），来自智利的硝酸盐，最终是19世纪末期开发出的化肥征服了农民们。其间，巴斯德的发现已经引发了对于微生物的恐慌，“他的实验指引人们开始抵制污水坑，那里充满了对人类最致命的细菌。”这些话是一个名叫阿道夫·瓦宗的工程师说的，他语气平和地谴责污水坑，赞扬使用下水道来排泄废物。在巴黎使用的这种特别的下水管道系统使得这一新技术的维护成为了可能，地下管道的长度从1852年的87英里，扩展到了1869年的350英里。

向新系统的过渡并非没有反对声。1894年关于改善卫生条件的法案在巴黎和一些大公寓中遭到了房东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抗议这是对他们权利的粗暴侵害。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筑师们都在随意地安置着盥洗室，只要他们喜欢，有时甚至是紧挨着厨房，因为在那时过于关心“这类东西”会被认为不体面。

顶楼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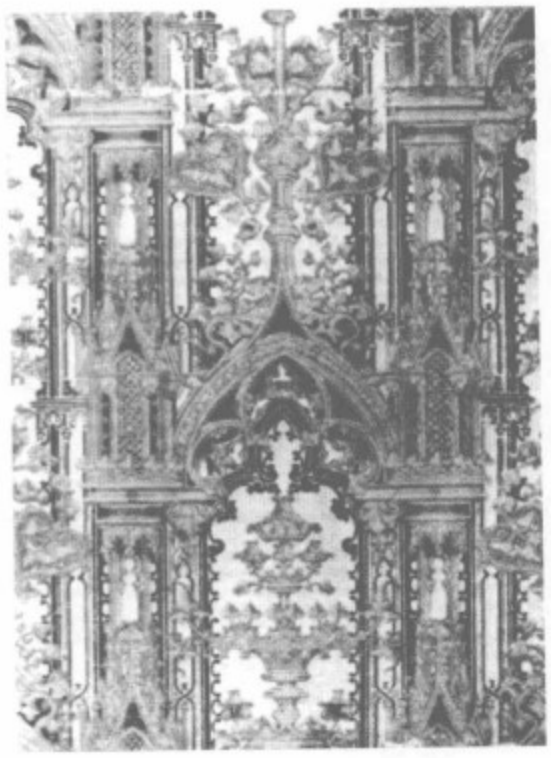
中产阶级的公寓建筑还有额外的一层：阁楼，那是仆人睡觉的地方。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在大革命之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并不存在；在大革命之前仆人们已经成为了家庭中的一部分。随着19世纪早期新的等级制度社会体制的建立，仆人们如果仍与他们的主人居住在房子中的同一部分已被视作不合时宜，至少有“杂交”的危

险。身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他们不再需要欢乐，只需要不断恢复体力来完成永远做不完的活计。

佣人们因此只能住在一流公寓建筑的第六或第七层的小房间中。于是，在这样一种建筑顶层的走廊中、在1828年巴黎圣丹尼斯林荫大道上方，依次排列的是一些在阳光中灿烂辉煌的女仆的房间。每个房间的空间大约有40平方英尺，确切地说更像是个蜂房；没有取暖，家具都是旧的；唯一的设备是一个孤零零的水龙头和地上的一个土耳其式马桶。

早已有很多显赫的权威准备好了要抨击这些恶劣的生活条件。医学院的布鲁德尔教授提出，肺结核的幽灵从第七层向下是递减的。负责为巴黎住宅中的健康情况建立记录的保罗·朱莱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女仆房间中的状况，以引起对健康的关注。在1906年的肺结核展示会上，并排展示了两幅图像:一幅是法国第八行政区内一幢建筑中一个女仆房间的完全复制，那里从路易斯·菲力浦时期以来一直是最富裕的地区；另一幅是法国监狱的一间牢房。牢房是适于居住并健康的；女仆的房间却不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改观。仆人们的主人爬遍世界的每一个山头，却永远不会顺着梯子爬上他们自己房子的顶层。

中产阶级的公寓就这样身处在拥挤的街道和肮脏的庭院夹缝之间，饱受厨房和浴室散发出来的恶臭气息，尽管其居住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尺（新建的公寓要更小一些），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个体面的表面而已，其设计只是为了愚弄社会。



19世纪上半叶是壁纸的黄金时代，摹仿画在这一领域也成绩斐然。壁纸反映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学主旨，引发了新哥特式家具的诞生。

庄园日历

在大革命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社会上对宅邸的需求达到了顶点。许多贵族住在公寓里，但在法国起领导作用的一些家庭都委托最负盛名的建筑师来为他们设计私人宅邸，而平民一旦有钱就会追随他们的领导。从中世纪向前，建筑学的遗产就这样延续下来，每个世纪最具代表性风格的建筑反映的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和精神意志。

情况在19世纪发生了改变。因为许多财产所有人仅仅是在近期才赚到了钱，他们并不是经常沉浸在艺术传统里的那类人。但不管怎样，他们的确是感受到了一种展现他们财富的迫切愿望。他们极

尽铺张奢侈之能事，但却无法把他们的观念强加给建筑师们，而建筑师自己则是巴黎美术学校向它的学生灌输所谓时尚的牺牲品，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掌权阶层的子弟。

一些在大革命期间移民的贵族们回来后重新宣称他们对宅邸的所有权，而资产阶级则加紧将宅邸划归自己的名下。一种新型的宅邸随之出现，建筑中用于居住的部分被安置在庭院的后面，而另一部分则临街，涵盖了办公室和商店。实践证明，允许商业空间的存在是一种明智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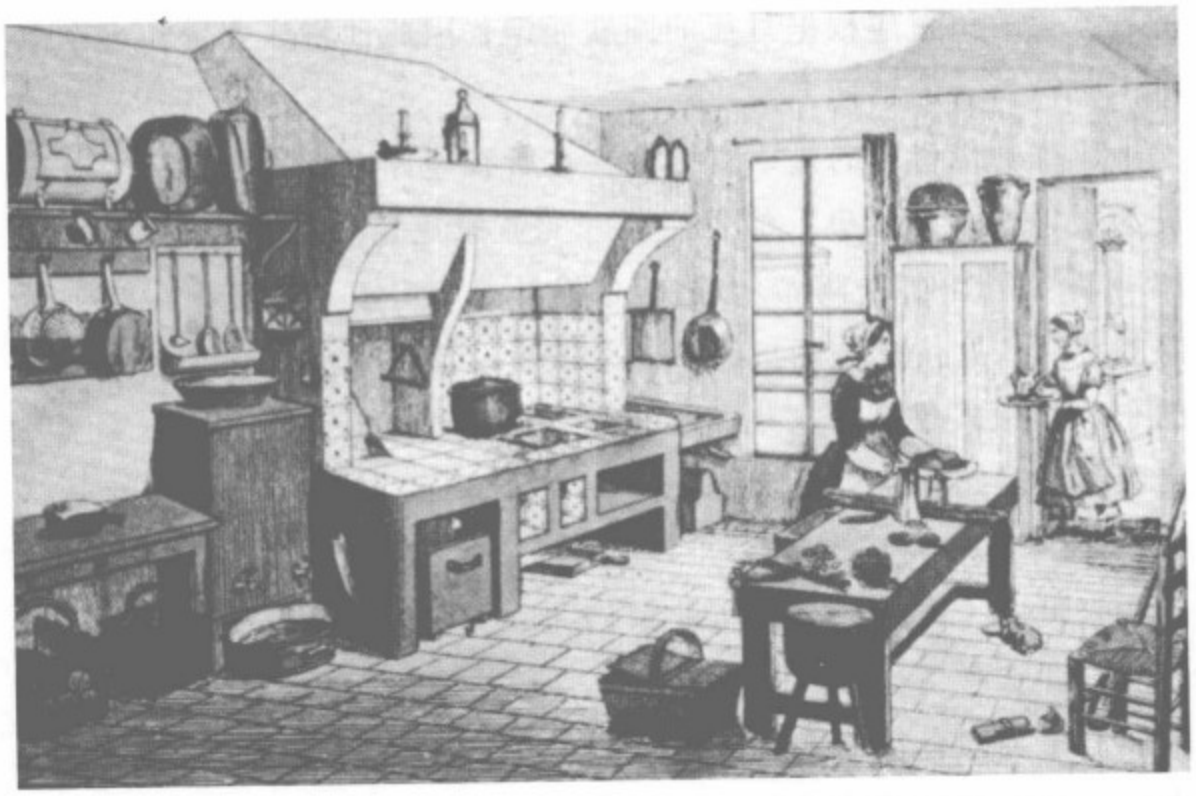
疯狂的中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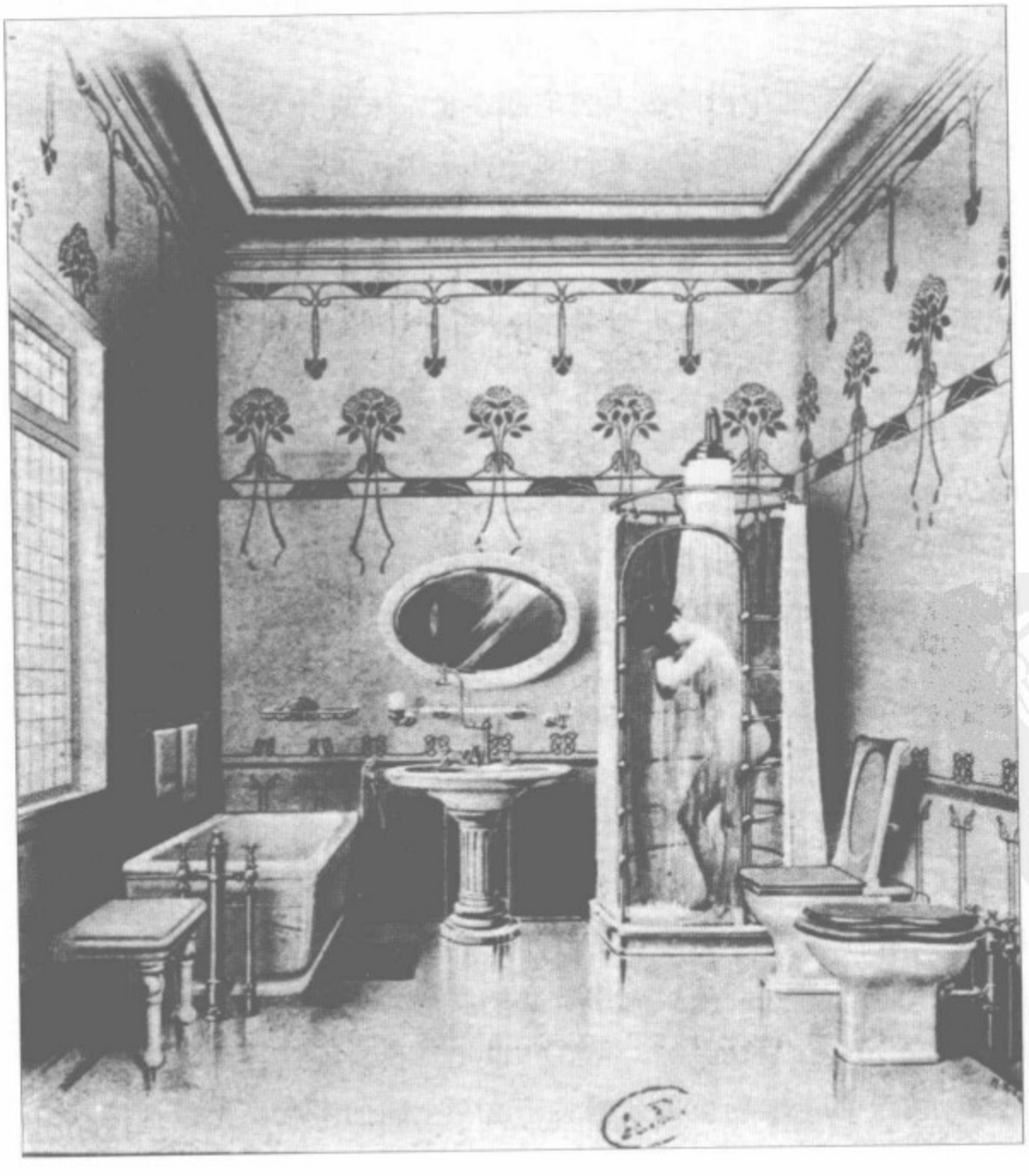
各种疯狂的闹剧纷纷上演。在路易十八统治的时期，位于莫雷的一所建于弗朗西斯一世时期的房子，被拆掉后又换了个地方一砖一瓦地按原样建了起来。皇室成员们也热衷于重建别墅，建筑师们则只能尽量在古典的完美和现代的舒适之间寻找平衡，迎合巴黎人的风尚。

大批富丽堂皇的新宅邸在巴黎纨绔子弟聚居区内拔地而起，里面住的都是新生代的社会名流，他们以奢华的风格在家中接待客人。曾有一幢华丽的宅邸，是为银行家埃米尔·杰拉德建的，是砖石结构的路易十二时期风格的典范之作。还有一幢新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宅邸就在蒙克公园的对面，主人是巧克力制造商曼涅。皮埃尔兄弟已经得到了在1848年被没收充公的19公顷土地中的10公顷，并将其改造成公园，在其中建造了豪华的建筑物。建筑师们根据客户的意愿，设计出各种独具特色的住宅。宫殿般的华丽令人眩目。

阿盖：《一个商人家的厨房》。如果有个房间能配得上一应俱全这个称呼，那么就是这间厨房了。

与首都相比，外省也毫不逊色。里尔的宅邸比巴黎的还要大。一些建筑的正面有80英尺长50英尺高，四层的建筑其空间竟有3200平方英尺之多：带有厨房和便利设施的地下室；带有两个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的夹层楼面；专门作卧室的一层楼；还有一个阁楼。外部建筑包括一个台球室，一个藏书室、马厩和仆人住的地方。里尔的制造商们把自己看作是封建领主一般，对于自己的野心毫不避讳。就在战前，里尔的德瓦利兄弟决定自己来做建筑设计师，因为职业建筑师们未能遵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创作使用了大理石柱，受到文艺复兴气息的影响，但其卓著之处却在于巨大的怪兽状滴水嘴。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风格，包括不可避免的摩尔人风格。就像一位受到宫廷占星家影响的王子一样，兄弟中的一人坚





上图：这个庄园中的厨房设备齐全，甚至有贮水箱，而在此前铸铁煤炉已得到应用。

下图：这是一则产品广告。模版花卉装饰反映出了新艺术主义的影响，但在20世纪早期的浴室中很难发现如此集中的展示。注意浴盆，那时还只是个附属的零件，远未被当作必需之物。

在里尔，人粪尿的转运长期由一群人垄断着，他们赶着装有木桶的马车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家庭主妇和作人那里收购人粪尿，然后再转手倒卖给农民作肥料。这种中世纪的习惯直到1889年时仍然存在。

持其睡觉的位置应根据月亮的圆缺而定，因此他将床安置在一个由瑞士时钟带动的轴杆上。

建筑中最奇异的是不对称性，在所有地方中以法国北部城市鲁贝为最，“刚果肥皂”的发明者、实业家瓦赛尔是其中的佼佼者。1890年，他让保罗·阿希尔·迪普尔设计一座房子，要静止在四头大象的背部，这位建筑师拒绝了，并转而设计了一个带有玻璃圆屋顶的东方宫殿式建筑，“它是印度王侯的一个梦想。它是怪想、幻想，是色彩和发光度的交错迷乱。”

在“建筑学上的瓦格纳主义”里，很难找到比这走得更远的了。来自同一省份的其他实业家们关心的是对历史传统保持忠诚，他们更喜欢弗兰德风格的新哥特式宅邸，其显著特点是建筑的正面多样化，装饰有各种尖顶和山形墙，这是北部建筑的特征。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布列塔尼半岛和雷恩，在那里，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遍布整个地区。

一种新型的中产阶级大公宅邸在世纪末时开始出现。由于其独特的风格是从海岸胜地正流行的一种建筑中借鉴来的，此类建筑又被称作别墅宅邸。远离市中心的地区仍然有大片空地可以购买，这类新型结构的建筑大多是矗立在英式风格的花园正中。要想确切地描述这类建筑远比描述古典宅邸困难，因为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是过度的装饰，全靠使用彩砖和变质的木材才可能达到目的。这样的例子在鲁昂和里尔都可以找到。这些房子上到处都是突出的节、膨胀的凸窗、异样的屋顶、伸出来的房梁和木制的阳台。在曲线的处理和不同种类原料包括金属的混合使用上，这种对新古典主义规则的粗暴背离有时就显露出了新艺术主义的痕迹。这种建筑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称结构，门窗似乎是随意置放的，后来在主要城市的市郊大量建造的更廉价的房屋中也可找到这种风格的影子。

从台球室到温室

在19世纪，宅邸和公寓住宅一样经历了合理化改进，公共区域和私人空间被明显地区分开了。其他一些让日常接待更加便利的设施，当然也都是些令人愉悦的奢华之物，没有坚实的财富基础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附属设施中首要的就是台球室。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才开始玩台球，但在19世纪，投身于这种象牙球的人数迅猛增加。杜米埃创作过几幅关于这一主题的平版画，包括标题为

《雨天》的一幅，说明文字是："客人们必须要打6个小时的台球"。任何规模的宅邸和庄园都会炫耀这种必不可缺的装备。

望族之家的真正标志是温室或玻璃花房。左拉肯定地说，投机商萨卡尔的宅邸中就有一个，紧挨着客厅外的房屋旁边，是一流的设置。温室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在第二帝国期间迅速扩散。最广为效法的典范是玛蒂尔德公主的玻璃花房，她是拿破仑一世的孙女，她的花房成为众多画作的主题。花园建在一个巨大的温室中，其设计使光线可以从头顶直射下来；屋顶安置在艾奥尼亚式柱子上面，屋顶下生长着长春藤、棕榈和装饰性植物，它们把自然带入了巴黎的心脏。

新哥特式庄园

在大中产阶级更喜欢住在城里的时候——所有重大的生意都可在那里办理，贵族们则试图重新夺回乡下——他们在大革命前抛弃了它。在路易斯·菲力浦就任前，他们就已开始返回那片土地——他最终将他们从政治权利的中心驱逐了出去。这些贵族在这个世纪为自己定下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重新成为封建制度的象征，哥特式建筑因此在正统王朝派人士的生活圈子中成为时尚，而资产阶级更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那是在更大程度上由众多杰出的个人形成的一个新纪元，更符合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哲学。

遍布法国的数以千计的哥特式庄园并非一人之功，第二帝国时期前后众多建筑设计师为此做出了贡献，就连委托人也放弃了18世纪轻佻艺术的哲学思想。土地所有者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来改善他们的房产，他们经常利用到科学知识，期望以此来赢得乡村的民众。

奥德为这些贵族客户们设计了梦幻般的城堡、庄园，对称的正面与骑士制度时期封建君主住宅的所有醒目特征融为一体：塔顶、垛口、峭立的板岩屋顶、直棂的窗户和有着尖状天篷的天窗。内部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当时的品位，不同的空间区域有着不同的功能。厨房设在地下室。第一层是房屋的主要中心点。与楼梯相连的门厅周围是主大厅、餐厅、客厅和卧室。在二层有一条通向主卧室的长长的走廊。在三楼，一条走廊通向客人的房间和高等仆人的居住区域，这些仆人负责管理孩子和主人的文秘工作。这一层与第二层间由一副隐蔽的梯子相连。19世纪的庄园与大革命前政治经济体制时期的庄园不同，那时的人们在庄园中是孤立的，因为外部建筑

这是一个很好的坐便器，安装在用瓦管排水的浴室中，即便在1900年之后的豪华公寓建筑中也并不常见。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负责卫生和建筑的主管人才对抽水马桶的功效深信不疑，英国人把这项发明带向了完美的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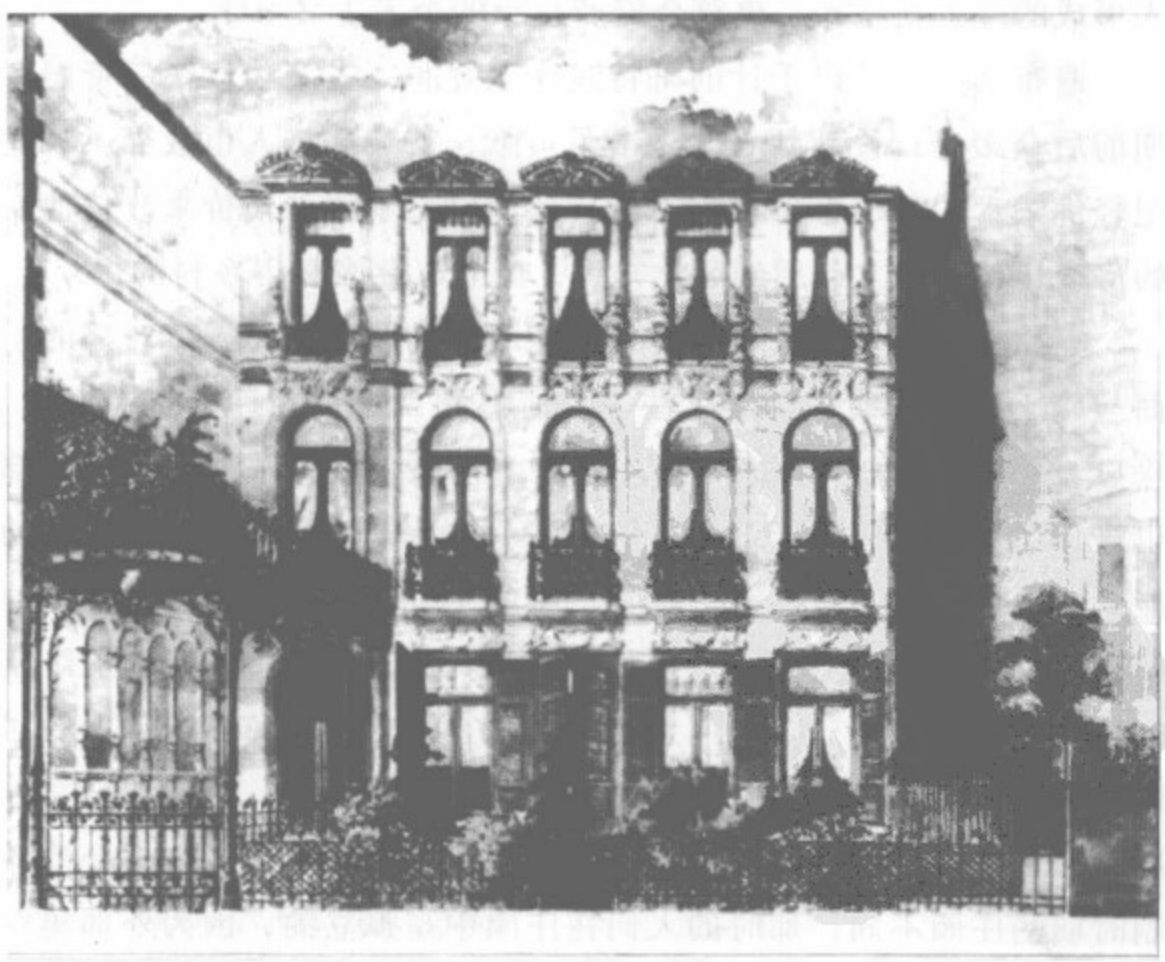
罗特希尔德家族的玻璃宫殿

和佃农的村舍与主建筑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以示敬意。

哥特式风格的理念直接与感伤的、基督教的君主制趋向作对，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建筑的功能性问题。其倡导者坚决反对古物狂热，认为中世纪并不是骑士制度的时代，而是最先创建了民主制度的公社年代。建筑师们在法国各地建造了许多新哥特式庄园，其漂亮的装饰和俊朗的建筑风格深受人们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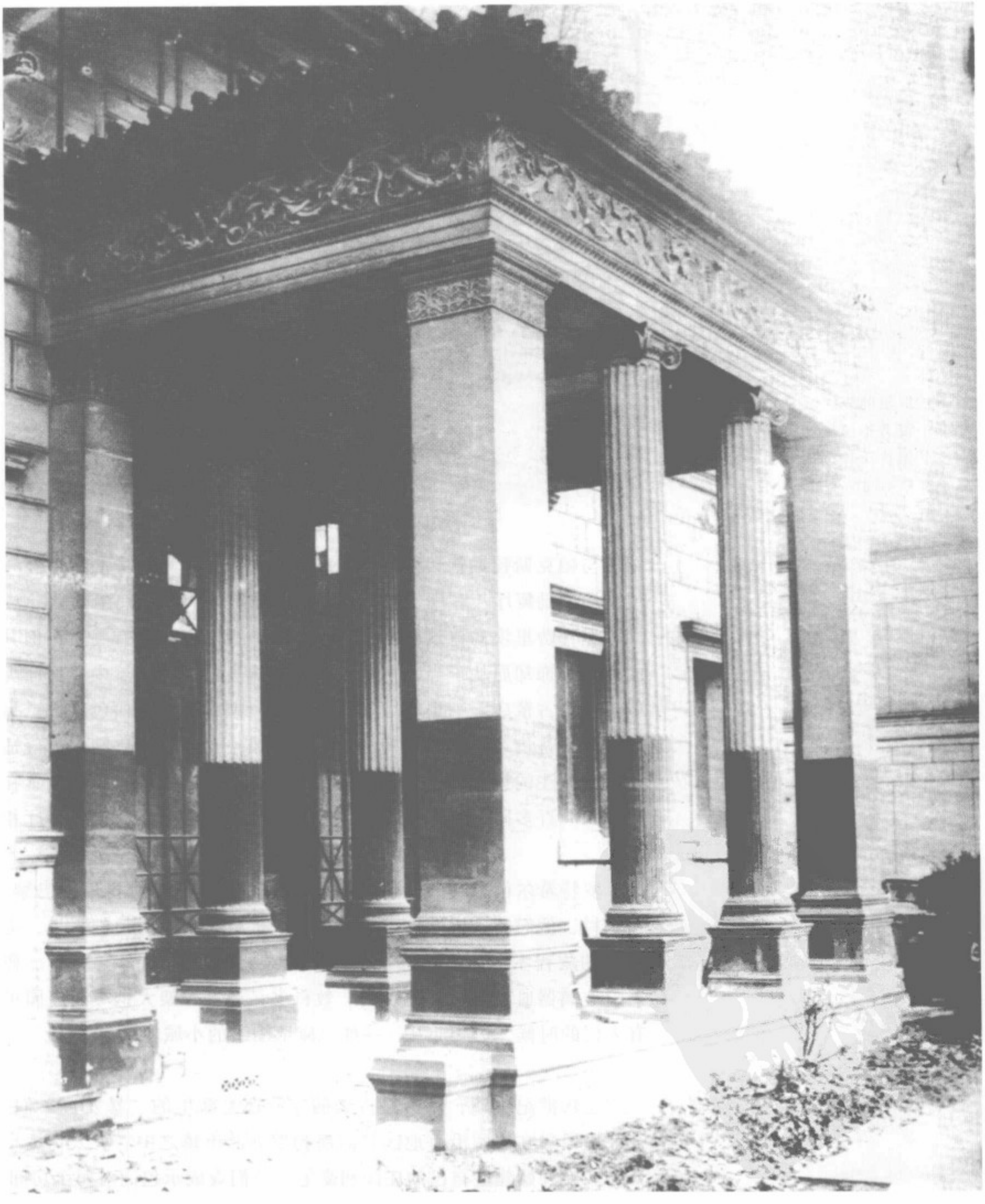
随着18世纪的建筑中出现塔楼城堡和天窗，对新哥特式风格的喜好产生出一些可怕的视觉效果。但一些亿万富翁的文化背景中不包括任何封建社会的装饰观念，因此他们对哥特式风格的弊病有免疫能力。1829年，詹姆士·罗特希尔德从富歇的后人那里买下了费里埃庄园。罗特希尔德家族是欧洲著名的银行世家，发展成19世纪欧洲历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这座临湖的小庄园被推翻后，这位银行家让“水晶宫”（为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建筑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开始拟订重建计划。新建筑的奠基石在1855年入土，工程三年后完工。这个建筑是正方形的，四个角有四个同样的塔楼城堡，正中央是一个有着玻璃屋顶的巨大中心房厅，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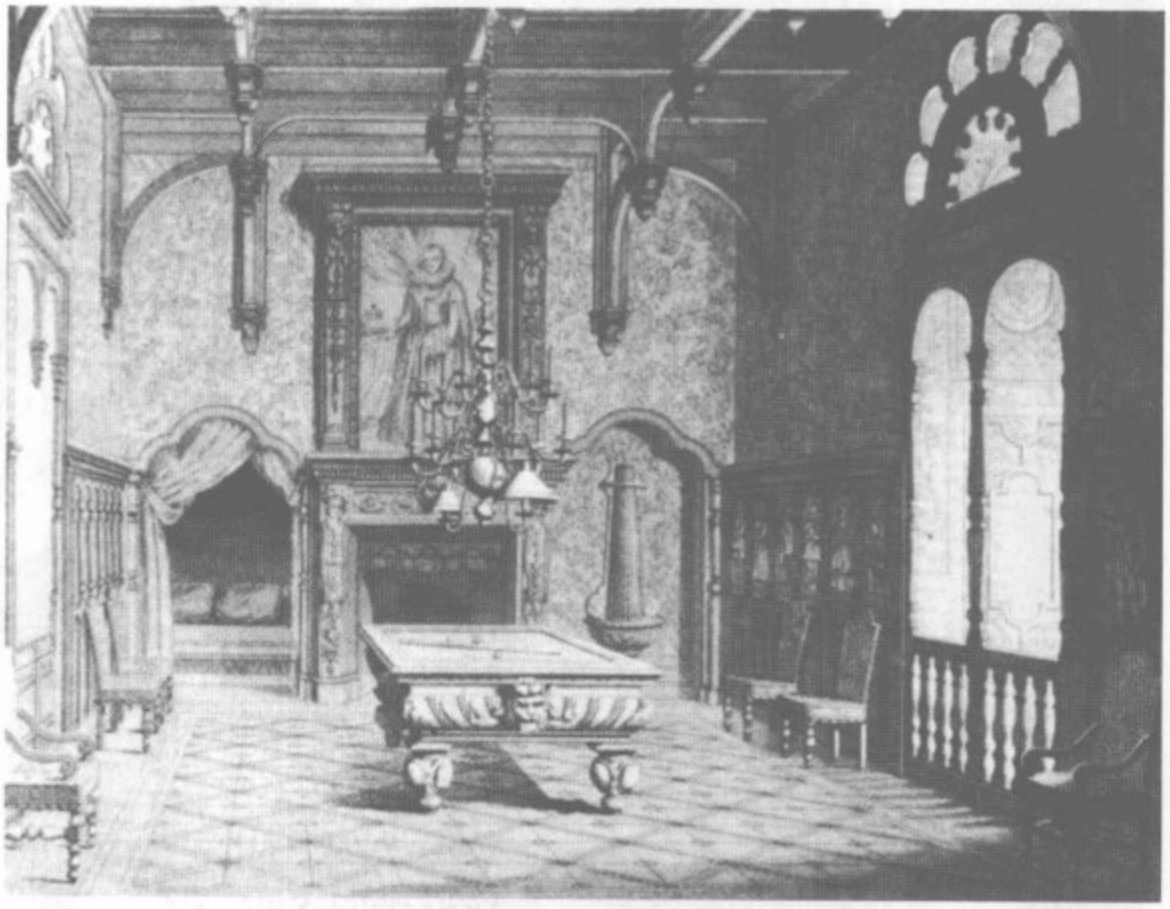
右页图：热罗姆·拿破仑王子对于“时髦”并不关心。他想送给他的情妇、女演员雷切尔一幢富有远古悲剧色彩的豪宅，于是就有了这幢诺曼底设计的庞贝古城（意大利古都，全城淹没于火山爆发）风格的宅邸。注意房子正面有四根柱子的艾奥尼亚式列柱走廊，房屋的中庭起到了房间背景的作用，灵感来自古代建筑。



上图：范登堡：《水彩画》，1890~1891年。在巴黎和外省经常可以发现分离式的玻璃花房。

下图：新哥特式时尚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个有着尖顶塔楼的都市城堡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19世纪的庄园或是中产阶级的宅邸中没有不建台球室的。建筑师们不必偏执于什么传统，只要依从各类客户不同的要求即可。

结构与帕克斯顿最初赖以成名的作品相似。玻璃顶的中心房厅在一层，周围是舞厅、客厅、餐厅、台球室和游艺室；卧室在二层。

尽管费里埃的建筑与巴黎艺术学校教授的模式没有关系，但其内部的装饰却屈从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折衷主义风格。中心房厅类似于一个古董店。一个客厅是路易十六时期的风格，白色装饰；另一个客厅是皮革装饰，含糊的文艺复兴风格。客人的房间中，舒适是最受关注的重点，休息室、卧室、盥洗室一应俱备。厨房设置在距庄园一百多码远的地下，通过配备有小火车的地下通道与餐厅相连。

罗特希尔德家族的人一般在10月初去费里埃，1月份返回巴黎。在乡村，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按法国传统进行打猎。对他们来说，去乡村的旅程不亚于一次远征探险，所要运输的东西包括银器、瓷器、玻璃器皿、孩子们的玩具、教科书，还有一架大钢琴。庄园里有人住的时候，热闹非凡，一如一座浓缩了的小城。

“诺曼底小屋”的显现

在19世纪中期，不管是古老的家族还是新生的“暴发户”们，都开始聚集在法国沿海地区日益蓬勃发展的市镇之中。大人物、小人物们都开始建造自己的庄园和豪宅。他们责成承包商对每个房间

都要附上个人化的色彩，结果，他们的宅邸成了木工装饰品掩映下的新哥特风格、摩尔人风格和瑞士风格的大杂烩。

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在18世纪时就早已遍布瑞士各州的边界地带，成了各个山区度假胜地的时尚宠儿，现在却突然开始出现在各大洲英式风格的花园中，最初的形式只是小小的乡村闲暇休憩之所，后来却成为成熟的乡村住宅。牧人小屋对设计海滨住宅的建筑设计师们尤其具有吸引力，在各地的喜爱者也颇多，各种风格兼具。萨冈公主的别墅类似于巴黎皇宫，蒙特贝洛侯爵夫人的别墅则是一座路易十三庄园的翻版。19世纪末时，建筑中半木料结构的使用受到推崇，逐渐风行，于是产生了所谓的“诺曼底小屋”。科尼利尔斯是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以这种风格为自己建造了一幢“村舍”，而这种风格的派生作品也继续在当时法国的山水风景中蔓延。

玛蒂尔德公主在她堂兄拿破仑三世1857年送给她的宅邸中接见作家和画家们。从上方的玻璃屋顶向下，这间玻璃花房中满是藤蔓、花卉和矮树丛。

可怜的棚屋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占主流的小农场的情况又如何呢？维克多·康斯德兰是一位工程师，也是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门徒，以他一贯活力四射的风格绘制出了他乡村之行所见到的黑暗景象："你会发现全家人，包括父亲、母亲和孩子们所使用的厨房、餐厅和卧室，但同时它们也是地窖和阁楼，有时还马厩和晒谷场。光线只能从低矮狭窄的缺口处透进些许，风从简陋不堪的门窗处刮进来。窗格已发黑断裂——如果有窗格的话，因为在整个其他地方，许多人事实上还不知道玻璃为何物。偶尔会发现有人使用冒烟的油灯来照明，但通常情况下唯一的光亮就是来自火堆。屋内的地面粗糙不堪，泛着潮气，到处是小水坑。一个人走了进去，而孩子们则好像是在泥泞中跋涉一般。我亲眼看到有些家伙就在这样的泥坑中冲洗食物。"

康斯德兰的呼喊被客观的观察所证实。这些情况被写进了省健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调查对象是特鲁瓦附近的一个村庄。报告的作者宣称，在这个有着402名村民的集体中，所有公认的卫生准则在这里都遭到了彻底的践踏。房屋都是茅草屋顶，泥墙，没有地板和窗户，屋中只有唯一一间居住着十人之多的房间，"人们就在这间屋子里准备食物，晾干湿潮的衣服，贮存或悬挂腌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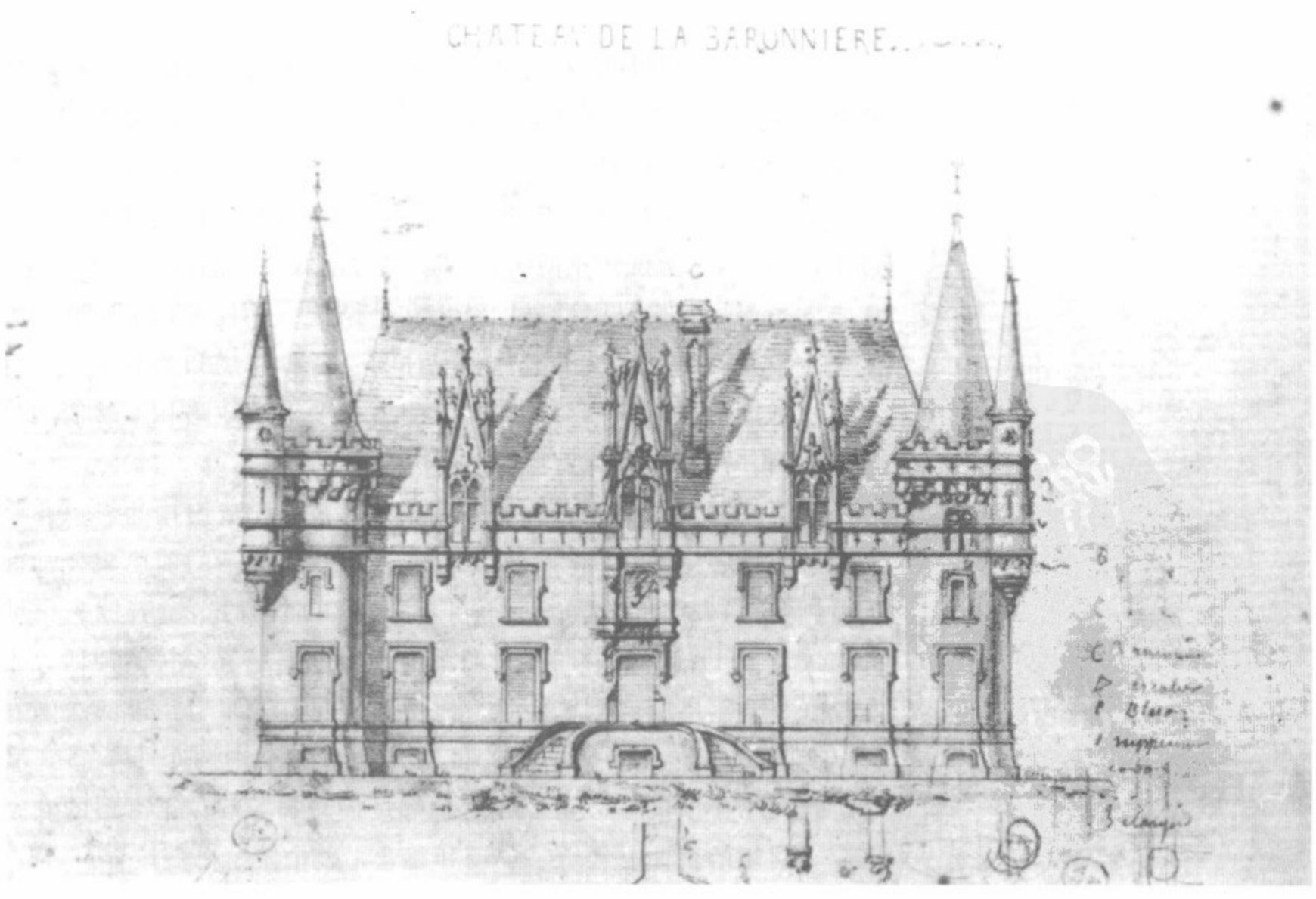
同一时期的一篇医学论文几乎以同样的措辞描写了塔恩省一个村子中的居民，"同样一间破败不堪的小棚屋，既用来准备食物，存放喂动物的剩饭菜，还放着许多小农场用具。水槽放在一个墙角，床放在另一个墙角。衣服挂在一边，腌肉挂在另一边。牛奶制成奶酪，生面做成面包。甚至是宠物也分享着这个房间，吃喝拉撒都在这里。烟囱太短直径又太大，冷气可以从中灌进来，把烟逼回到可怜的住户这里，这就是农夫和他家人的家。"

维尔梅博士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城市，只有一次他离开了城市去考察农民的生活。对于那些在他之前发表的言论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在那随时可能塌掉的农舍中去拜访一下可怜的布列塔尼地区的农民真是太必要了，他们的房顶已几乎垂到了地面，里面因不间断的烟熏火燎而一片漆黑。在这悲惨的小棚屋中，光线只能从门那里进来，当门关上时一切就都黯然失色。农夫和他的妻子几乎是半裸地生活着，家具只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一把椅子、一口大锅、几件木制的或陶制器具。孩子们的床只是一个大箱子而已，农

夫自己则睡在没有被褥的一捆燕麦上面，绝不是什么填充着绒毛的床垫。如果这个家庭运气好的话，在这个阴沉沉的小棚屋的一角会有一头瘦弱不堪、令人作呕的奶牛，它的奶水可以滋养农夫和他的孩子们。”根据从各类官员那里收集到的信息，维尔梅估计，布列塔尼半岛大约有40万农民的住处只有三个或更少的通风口，其中还包括了窗户和门。

在法国上维埃纳省附近的地区，情形也是一样。一位观察家写道：“村子中拥有令人满意的卫生健康条件的住户不到1/10……绝大多数农民的房子只有一层，最多只有两个房间，居住面积不超过270平方英尺。地面上都是湿乎乎的泥土，最好的也不过是七扭八歪凹凸不平地铺了一些石头。天花板不超过7英尺9英寸高。这间棚屋有一扇门和一个约一尺半高的窗扉。厨房中只有几件粗制滥造的器具，和一些农具放在一起。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都住在一间大卧室里。在阁楼中发现四五甚至六张床是很平常的事”。

勒内·奥德设计的庄园的图纸。



还有许许多多相似的描写，在这里没有必要再一一重复这令人绝望的单调韵律。耕种土地的无产者们被迫与他们的禽畜同居一室，毫无健康卫生条件可言。“纯净的田园空气”不可能弥补任何东西，农民们对于它的所谓好处也一无所知。人们在报刊上呼吁：“除非你像我们一样亲自去看看，用你自己的眼睛，否则你绝不会相信我们的乡下居民在衣着、家具和食物方面的悲惨状况。有些行政区内，始终都是父亲的衣服传给儿子穿，唯一的厨房器具就是几个可怜巴巴的木勺，唯一的家具只是一张长椅和一张摇摆不定的桌子。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不知道床单为何物，从没穿过鞋子；数百万人除了水就从没喝过别的东西，很少或从没有吃过肉，甚至连面包也没吃过。”

或多或少地，农民悲惨境遇的起因在于他们的利己主义。在1836年11月16日，埃米尔·吉拉尔丹记述说，巴黎市郊的一个公社总共1540公顷的土地竟然已被“分割成了38826个小片”。如此野蛮粗鲁的人，又有谁会去关心其命运呢？

传染病之源

在第二帝国时期，农村的状况基本保持了大革命前政治经济体制下的样子。主题分别针对四个不同地区的四篇医学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些状况：人畜同居、通风不畅、不清理壁炉、家庭成员群居在一个单一的卧室内。这种环境对于某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再理想不过了，路易斯·卡拉戴克博士说：“这些房屋低矮、潮湿、光照不足，加之人畜混居，极易引发淋巴结核和肺结核，并且所有疾病都有可能产生致命的传染。这种居住状况还易造成骨溃疡和关节疾病。对于农村地区淋巴结核的持续流行，房屋构造上的缺陷和不够清洁是主要原因，甚至超过了食物和遗传因素。”

到第三共和国成立时，工人和农民已被弱化成虚构的形象，而这都是出于各党派自身政治目的需要。为左派说话的前巴黎公社拥护者阿瑟·兰克禁止作家们讨论工人问题。而同时，拿着锄头耕地的农民却成了右派的财产，他们不惜余力地捍卫着乡村的神话。当左拉在1887年出版《土地》时，他受到了起诉，罪名是诽谤法国农民。单纯的描写并不是左拉的目的，他只对书中两个小节感到满意，这两个小节的措辞是一样的，都是描写农场的：“正方形的农家庭院，封闭的三面是马厩、羊圈和谷仓，整个院落已然废弃。”隔

了几页后他写道："三个长长的建筑成为巨大方形农家院的边界，羊圈在远端尽头，谷仓在右边，牛棚马厩和农舍在左边。"

雷耶博士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搜集了法国各地的例子来支持一个判断——谴责从这个世纪初就已存在的农民住房的匮乏："我们认为，让人们知道农民对于自己家中有益健康的事物所倾注的关心有多么少，这是一项责任，在他们的家中，他们显然很乐于囤积任何数量的有害健康的东西。持续的潮湿，用以呼吸的空气循环不足，拥挤，腐败物质散发的怪味儿——所有这些有害的影响都将对他们产生作用。"

在这种环境里，痢疾、伤寒、班疹伤寒和霍乱全都成了地方性疾病。1888年，天花在洛里昂地区夺去了782人的生命；1890年，麻疹在同一地区导致232个孩子死亡。在提交给医疗学院的报告中，切瓦利埃博士甚至宣称，在布列塔尼半岛仍有可能发现麻风病例。

在19世纪的医学界，医学地形学是一个活跃的领域，无数的评论文章重复着同样的发现：农民住房中的不健康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也有堪称典范的农舍，并且在一部又一部的著作中被提及——但这始终都是雇主们的房子，永远都是一小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乡下的法国人才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接受在城里早已被接受的公共卫生标准。当这种变化确实到来时，其速度又是如此之迅猛，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农场组织领导下、人们自己亲手推进完成的。

城市的腐朽

受苦受难的社会阶层的居住环境，太长时间以来一直被那些只满足于将自己的判断局限在审美领域的社会历史学家们所忽视。整个19世纪，来自各个领域的改革者们，从保守党人到"反地主"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公然抨击穷人们那令人叹息的居住状况。巴黎是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很显然，那里的抗议早在19世纪初时就已经开始了。批评家们发现，工人的住宅十分狭促，整体状况十分不利于健康。1832年在首都爆发的霍乱导致了18602人死亡，这一代价已经官方调查证实。报告总结说："到处都是可怕的人口拥挤着住在肮脏狭窄的建筑里，无数人成了传染病的牺牲品。"在最窄最脏的街道，霍乱的死亡率高达33.87%，其他地区是19.25%。

在第二帝国期间，奥斯曼将努力的重点集中在了建造别致的巴

黎城区上，他强迫无产者们搬到巴黎的城郊去住。他一方面创造了宽敞的新的林荫大道，另一方面也导致简陋小屋到处蔓延。独裁政府的行径使以临时搭盖的陋屋为主的地区大面积增加。左拉描写道："破陋的棚屋是用泥建的，搭上旧木板，涂上锌，就像是许多残骸碎片在院子中间排列着。"地主从他们自己的房子中可以俯瞰到这一景象，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建的，坚固耐用，位置临街。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社会分析学家们转向了量化理论，大量的数据支持了不可缺少的定性判断。关于住宅发展状况的官方报告成为那一类社会报告中的经典例子，这类社会报告是由无数的医师和慈善家们提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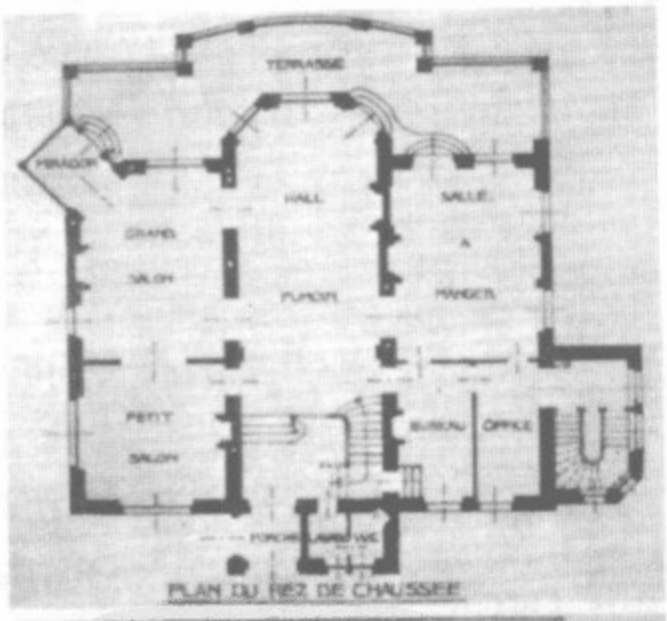
在诸如法国的第11、13、19和20行政区这些工人阶级的聚集区内，调查人员发现了由狭窄通道连接、由有势力的房东管制着的住宅联合体。不动产的发起者们租用土地数年时间，然后建起一层灰泥墙板建筑，他们再把这些建筑分成若干个单元住宅，然后按星期出租。人们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紧邻巴黎防御工事的地带建造房屋，梯也尔（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原本是把这一地带设计为军事上的缓冲区，其内是不准建房的；但这种预防措施的毫无意义在1870年巴黎受到围攻时得到了充分显现。新的移民们没有被毫无意义的繁琐手续吓住，他们在那些业已存在的建筑上面增添新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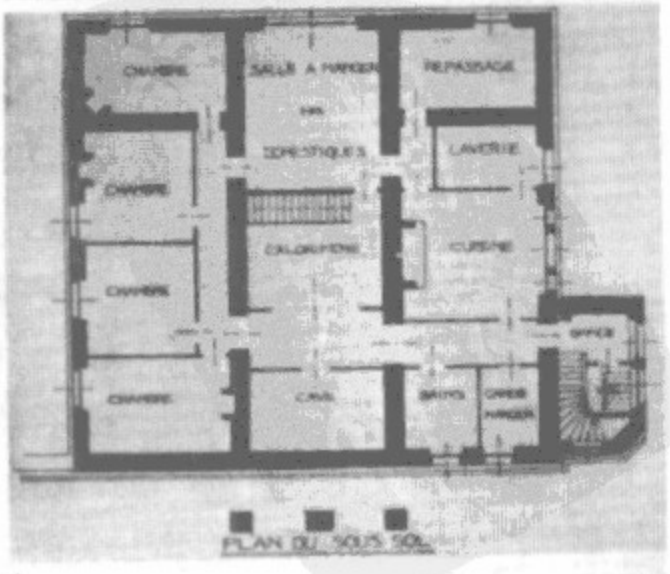
在这些不利健康的环境下，传染病重复爆发并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巴黎，1873年有869人死于伤寒，1882年时是3352人。1884年有986人死于霍乱。彼阔伊博士提交了一份关于霍乱的报告，他发现这种疾病从不会袭扰建筑良好、维修正常的房屋，那里的房主会向房客提供足够的用水，"我们对所有传染病情较为严重的地方进行了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一处遵守基本卫生规则的地方有这种情况。"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霍乱流行是在1892年，在塞纳省导致了1797人死亡，巴黎有906人死亡，疫情最重的分别是第11行政区，死亡104人；第18行政区，死亡116人；第19行政区，死亡106人。

意义重大的调查

最初对过度拥挤的住房状况进行研究的是贝迪永博士，他是人体测量学的发明者的兄弟，也是市政统计署的头儿。为了能将他的

这是巴斯克海岸的一幢庞大的别墅，但并未表现出即将遍布该地区的地方风格复苏的迹象。这幢房屋部分反映出了新艺术主义的大胆：正面不对称，有许多凸出的构造，窗户的设计出人意料。





VILLA de M. Orossen, à Biarritz. (Basses-Pyrénées)
M. CAZALIS, architecte, à Biarritz.
Façade de l'entrée et façade de la terrasse.

数字汇编起来，贝迪永在1891年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使用了特别的调查问卷。但来自郊区的结果证实这种方法不可行，那里很少有人将调查问卷返回，而返回的那部分问卷中又有很多填写得不够精确，因为人们担心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新的赋税。

而在巴黎，只有2%的问卷没有答复，调查关注的主要是那些住在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的人。调查最终覆盖了884345个家庭，但是要用统计学的精度来确切描述法国的居住状况仍然是不可能的，在认识到这一事实后，贝迪永博士用过度拥挤来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下了定义："我们说，每个家庭的人口数超过了房间数的两倍时，就是过度拥挤或人口过剩。举个例子，3个房间的公寓住着7个人或4个房间的公寓住着9个人，就是过度拥挤。"

在首都，家庭规模越大，住房状况就越糟。以每人拥有超过一间房间为标准，两口之家中达到这一标准的家庭占35%，三口之家是27%，四口之家是20%，五口之家是18%，六口之家是13%。巴黎总人口中的14%，也就是331976个巴黎人，居住状况过度拥挤。每个房间中平均居民数最低的是第8和第9行政区，那里的死亡率也是最低的。在第13、19和20这几个人口比较拥挤的区域里，死亡率则更高一些。

最小的单元房（指每年租金低于500法郎的房子）的租金在整个19世纪是稳步上扬的。工资也是如此，在1853年到1891年期间，工资上涨了48%。但受苦受难的阶层，其在居住上的不安全感始终存在着。工资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始下降。当秩序大乱时，工作时数被削减，一些工人被解雇，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将此称为"正常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又怎么可能建立起预算呢？一个工人只有在保证其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收入和支出做一个大致的估计。而对于那些按天来雇佣的劳工来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确定下几个星期或后几个月是否会被雇佣，他们知道的只是明天，想让他们建立一个预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外省的状况也从来没有比巴黎好过，有慈善家呼吁就住房问题进行特别立法。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对健康十分有害，也是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道德的沦丧更是危及到了大城市，那里的人们已越发残酷无情。医学地形学者们和健康领域的研究人员坚持不懈地搜集法国各地关于住宅方面的信息，但官方的努力却显得滞

这一时期的乡下房屋建有倾斜的屋顶以及户外的楼梯，户外楼梯使人们能够便捷地上到房屋的顶层，这种格局在法国各地均普遍存在。

后，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官员敢给他们的研究以支持。他们的研究结果很少有人读，但他们其他的一些报告却读者甚众。朱尔·西蒙是一位反对第二帝国的知识分子领袖，他写的一本书成为19世纪后半叶传阅最广的书籍，书中对城市里的贫民窟进行了充分详尽的描述，对贫民窟作者下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工业城市都有同样的奇观。"

拿破仑新村

在19世纪早期，得到启迪的思想明晓了这样的事实：完善住宅条件是社会安宁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抗击空想社会主义（1848年之后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之一。1849年成立的一家公司，其目的就是在首都所有12个行政区内建造公寓住宅联合体（居住区，或称新村）。新村将提供有益健康、通风良好的公寓住宅，带有一间厨房和一或两间卧室，租金比那些不利健康的公寓还要低。第一个新村建在第9行政区，是法国第一个低租金的住宅工程，今天仍然屹立着，见证着历史。

落成典礼在1851年11月18日举行，并被冠以了皇家头衔：拿破仑新村。当最后一套公寓在1853年被租出去时，这个住宅联合体的200套单元住宅庇护着大约600人；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包含有一个卧室，内有壁炉，一个设施完善的起居室和一个小厨房，同时还兼作入口休息大厅。每层楼共用一个盥洗室和水池。水由庭院中的一眼泉来提供。居民们对于某些便利设施赞赏有加：楼梯由看门人清扫；有一个洗衣房和一个澡堂；帮助看护孩子；还有一个医生，每天早上进行免费咨询，需要时可登门服务。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MAIRIE DE DIJON.

AVIS

RELATIF

A L'EXECUTION DE LA LOI DU 15 AVRIL 1850,

SUR

L'ASSAINISSEMENT

DES LOGEMENTS ET DÉPENDANCES

INSALUBRES.

LE MAIRE DE LA VILLE DE DIJON

Le Mair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ANDRÉ.

当拿破仑新村在建之时，穷人住房的问题在法国下议院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提出这一议题的是阿曼德·梅伦，他成功地将自己的慈善事业转化成了具体的立法。

梅伦在1847年发起成立了名为"经济社团"的慈善组织，在1849年被选进立法会，并立即起草一项与改善住宅中健康设施有关的法案，该法案将宣布不利健康的住宅为非法。他宣称，拟议中的立法绝不是对社会主义者的妥协让步，并且不会对财产所有权形成任何威胁。各个市政议会有权选派专家对建筑进行检验，并阻止任何被认定不利健康的建筑出租。但因为市政议会并没有强制自己获

阿曼德·梅伦和1850年的法律

取这种权利，而且因为占据统治支配地位的是许多大房东和贵族，因此，这项1850年4月13日颁布的法律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效用，几乎就未被执行过；巴黎是个例外，奥斯曼使用这项法律一直到他的末路时分。然而，这毕竟是第一步。

在第二帝国期间，房东地主们对于追随所谓的建筑样板并不感兴趣，但西尔·勒维凯在1854年还是修建了戈贝林新村，这项工程的组成部分就是“一群适合工人阶层需要的住宅单元……消除了和严格意义上的住宅工程有关联的疑问”——其发起人的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毫无疑问他希望使自己避免任何傅立叶主义的猜疑。

研究巴黎慈善工程的学者们注意到，在巴黎最穷的行政区内房东们的利润是最高的。这个论点自相矛盾，但却能够被解释的：因为相对富裕地区贫穷地区的维修费用非常之低，并且已经被最小化了，而富有的地区和商业区内，由于房东不得不经常满足房客们近乎苛刻的维修和革新要求，从而导致了市场价值收益率的下降。

这些茅草屋顶的村舍，彼此挨得非常近，住宅的岩石根底都露了出来。这种“独特的”住处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的许多地区仍然可以找到。

随着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拥护者们的返回，社会主义的危险又起，工人党的成立，无政府主义者们反对付房租的煽动，这一切使得保守派重新发现了“个人积极性”的价值。

在其他地方，情形也差不多，应那些具有远见的个人的要求建造的住宅并不多见。鲁昂的几个贫民窟因为在19世纪的几本著作中亮过相而声名显赫。工程师兼建筑师勒库弗勒在1885年到1886年间设计了一个公寓联合体，位置就在城中最贫穷的那个区，是应一个颇有威望的公民组织的要求兴建的。这个公寓联合体由六幢五层楼的公寓建筑组成，每幢建筑中每层有三套单元住宅，其中两套有三个房间，一套有两个房间，同时在底层还有15家商店。房客们享受着工人阶层此前从未有过的美好事物：煤气、抽水马桶、垃圾通道、下水管道、洗衣房、医务室，甚至还有一个榨果汁机——这是一个罕见的将乡村活动与城市生活结合到一起的范例。

里昂始终是慈善活动的中心。1886年，银行家、政治家爱德华·埃纳与几位铁路大资本家出资30万法郎成立了一家“低租金住宅公司”。1887年7月1日，五幢五层楼的建筑在第3行政区竣工。每套公寓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在118到172平方英尺之间。通过使用一种“以矿渣为原料的复合建筑材料”来使建筑成本大幅降低，因此租金也较低。随后，其他的一些公寓建筑也逐渐建成，其中的几幢近期已被复原。

但所有这些成就都只是引导性的工程，许多情况都是在有识之士的积极促进下才完成的。除去里昂，与巨大的需求相比，其他地区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拘泥于他们自身体制的限制，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即只有当生活标准得到大范围提高时，这个问题才可能开始得到解决。他们对劳动人民仍保持着警惕。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法律

1894年11月30日颁布的法律是第一个有可能使低租金住宅的建设成为可能的方案，但结果却令法案的发起者失望，他们本来期望能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把持着工人储蓄资金的两家大机构都不愿意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因为这些项目的目标是旨在提高工人们的生活水准，他们从中无利可获。

这种一个房间的村舍，厨房、公用房间和卧室都融合在了一个区域内。注意铺了床单的床。铸铁炉子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法国的慈善事业也因此受到了限制。1905年时的状况和1894年之前的情况十分相似；上百万个家庭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一位调查人员基于他在1896年对工人阶层住房状况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工人们尽其所能地生活着，而不是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活着。他不能在宽敞和狭窄的区域之间进行选择。唯一能得到的公寓只有一或两个卧室，三个卧室的极少。不管他有多少个孩子，他必须尽量获取能够获取的一切，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房东的需求总是胜过房客的提议。"也许他的结论在整个法国都是适用的。

这种状况对家庭的影响与对整体道德水准的影响一样糟糕。一位在1898年对马恩地区的工人住房情况进行研究的人员这样表述："花费其工资的12%到15%来付租金，还必须要在狭窄、肮脏、不利健康的住房环境下养育孩子，工人在寻求任何可能从家中离开的机会。因为他自己不快乐，他周围的人也要忍受他的坏脾气。他只好借债，并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而辞职。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工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延续着他的悲惨和不幸，而他的孩子们只能等待，等待最后解脱时刻的到来，那时他们就可以

逃离这个环境了。”

私人在住房上的主动行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失败。这个问题使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但是在一个由机会主义思潮统领的社会中，情况又能怎样呢?工厂主和银行家们已经接受了共和政体，前提条件是只要共和政体的存在不会阻碍资本的扩张。既然债券投机比建造低租金住宅获利更丰厚，统治阶层以及他们财产上的支持者们自然满腔热情地把资本投到了债券上。正如第三共和国一位名为莱昂的领导人所说的：“慈善有其局限，但好的投资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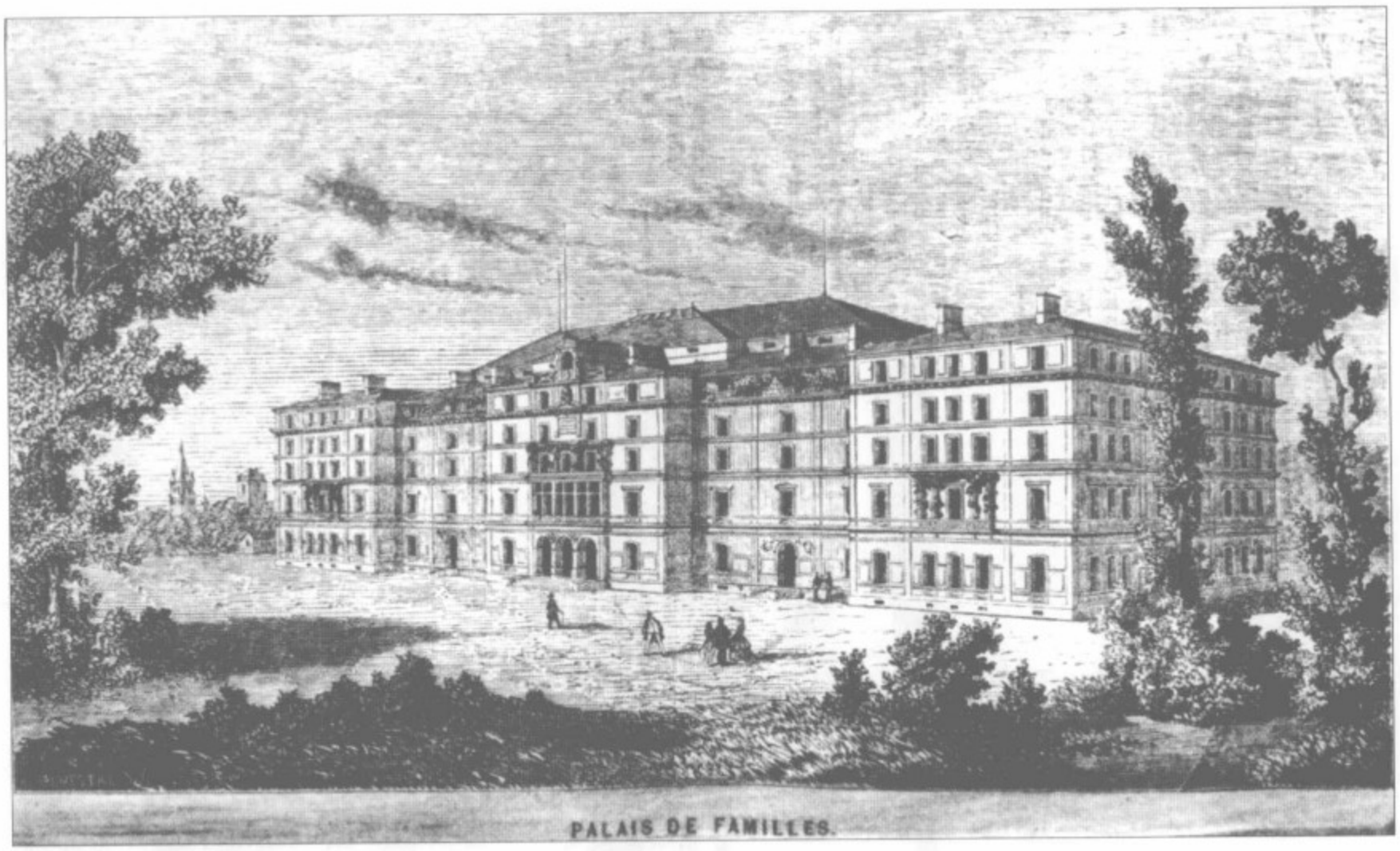
从空想的共产村庄到企业的生活区

查尔斯·傅立叶甜蜜住宅的理念，一直是工人阶层住宅建设的计划及实践的秘方和精神支柱，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但是这位“甜蜜先知”的影响却并未得到充分计量。作为一位精明的时政观察家，他无法对眼前明白无误的事实视而不见，“30个工人，男女都一样，端庄正派地住在一个拥挤狭小的阁楼上，只有具备文明的传统才可能使这成为可能。我们的伦理学者们反对工业联合，却让工人们如沙丁鱼一般拥挤在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无论是“肮脏可怕的城市”还是由“一串串令人恶心的村舍”构成的村庄，傅立叶都亲眼见过，并且亲身在其中居住过。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中的家庭不应该是“乱糟糟的一堆小家庭，一家比一家更脏，一家比一家更乱”，而是存在于大到足以容纳下3500人的“共产村庄”或是“社会的宫殿”之中。他提出了一个这种宫殿的粗略计划，并配有简单的描述。维克多·康斯德兰继承了这种思想，他是傅立叶思想的第一批传播者之一。

康斯德兰提议的一种建筑模式与其老师的建议并非不相像，只是更加详尽，用语讲究，如同在描述一个空想共产村庄的建筑构造，“在这个属于社会的建筑物中，每件事都可以提前预见并做好各项安排准备工作；人是掌管水、空气、热量和光的主人。”每套单元房都配有冷热水和中央取暖装置，“一个总的中央锅炉将把热量分送到建筑中的各个部分，包括画廊、商店、礼堂和住宅。这种单一的热能将由配备了阀门的管道系统传导到不同的房间。通过这种手段，一个人就可以管理调节这个社会宫殿中任何部分的温度。”

这个空想的共产村庄被分成许多不同类型的公寓单元，依据预



卡兰和勒努瓦的《家庭宫殿》，1858年。身为天主教徒的傅立叶思想主义者，维克多·卡兰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希望能用这个"宫殿"来实现老师的梦想，这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拥有的"宫殿"。果丹与卡兰签订了一份合约，但出于某些我们并不知晓的原因，卡兰没有被委任负责建造法米里斯泰尔（果丹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法米里斯泰尔是他所建立的工业合作社，译注）。

算的不同分别进行设计，有些进行装修，其他的不装修。一个大的公共食堂将以成本价格提供餐饮。所有的公寓住宅都与一个四面围着玻璃的庭廊相联通，那里夏季通风、冬季供暖。这个庭廊把宫殿的所有部分都连接在了一起。

这个空想的共产村庄将是一个功能型的建筑，但绝不仅仅是一部用来居住的机器，"水、火、光、花岗岩，还有金属，一切必须协调。所有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必须要经艺术化的手法将其熔铸在一处。这将是一项创作！"康斯德兰在他著述的末尾表示，这样一个理想"并不会因太过完美而不可能实现。"他继续说："也许你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你知道有些人在冬天很冷而在夏天却很热吗？夏天一下雨，他们铺在地上的垫子就会被浸透，满地都是泥泞。上帝创造了人类并不是要让他们住在洞穴中的。他不是一个洞穴动物，而是一个人，一个需要房子住的人。"

当然，反对的声音从来不会少，有些人认为，要建造与人类有机体协调融合的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理想是荒谬可笑的。身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一位军官的康斯德兰十分清楚，

这条中央巴黎街道在哈雷斯区，是从中世纪幸存下来的，尽管在1914年前就已被归类为“不利健康的里弄”，但直到1936年时仍完好无损。

全欧洲每年花在建造、维修、拆毁各类防御工事上的钱有数十亿之多。假如这些钱的一个小小零头能用在更具产出性、又远比造一艘军舰简单得多的投资项目上，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难道，让大海中的1800人有房住、让靠近海岸的1800个团队有房住，会比让1800个农民住在置身于香槟或啤酒中的甜蜜住宅里更简单吗？”

作为第二共和国时期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宪法）的一位代表，康斯德兰在1849年4月14日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授权政府投资，在巴黎附近建设一个500人的实验性公社。由国家承担房屋建筑和农场建设的费用，所有权在公社的租约期满时交还给政府。但代表大会对这个提案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进行就将其否决了。但是傅立叶的追随者们从没有放弃傅立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部分，跟随着康斯德兰的指引，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反复表达自己的提议。

在这些激进主义分子中，首当其冲的是小说家欧仁·苏，他在

这条黑色的防御工事环城带在普法战争后被弃置不用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摧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时间内，以临时搭建的陋屋为主的地区在巴黎很普遍。社会评论家们频繁地加以描述，环境健康专家们对这种地带也很熟悉。

工人中间拥有大量的读者。他是一位竭尽全力传播傅立叶思想的作家。弗朗西斯·哈代是他1844年的作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工厂主，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傅立叶思想主义者。他为了自己工人的利益，在巴黎城郊建造了一处“公共房屋”，这幢建筑与傅立叶思想的规则相吻合，其房间的设置是：带有浴室的一间房的公寓给未婚工人住，三间房的公寓供家庭住。

卡兰和“家庭宫殿”

到19世纪50年代时，仍然没有空想共产村庄在社会景观中出现，建筑师维克多·卡兰使傅立叶的思想重新复苏，并重新为其命名为“家庭宫殿”。他的灵感直接取自其老师，“家庭宫殿是一个社会一体的计划，基础是适应了民主生活需要并存在于一种适合任何地点的新建筑模式之中的个人自由。这个设计的基本目标是最少将100个家庭聚集在一起，每个个体都可以充分享有自由。当然，也鼓励他们以富于智慧的方式汇集起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支出，甚至是他们的社交快乐，从而使他们的能量至少增长5倍。最后，这个宫殿是为了帮助他们从孤立、对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紧密、团结、联合的状态。”

虽然卡兰得到了梅伦的支持，计划建造一个拥有84套公寓的住

宅联合体，60套提供给工人，24套提供给相对富有一些的家庭，但他却没有能吸引资本家投资者的兴趣。但不管怎样，他的家庭宫殿很快就在工人住宅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全要归功于傅立叶的一位信徒的努力，他就是实业家果丹。

人们对这位法米里斯泰尔的创始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他试图在资本和劳工之间建立一种工作伙伴关系的努力。创建法米里斯泰尔的灵感来自傅立叶的空想共产村庄思想，由此引发的对吉斯的法米里斯泰尔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一种纯粹的努力。

据玛丽·莫雷所说，果丹在1842年读了一家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后，深深被傅立叶主义的理想所征服。随后的一年，他与巴黎的空想共产村庄主义者们签订了一份合约，并很快成为一名受到公认的傅立叶主义者。他阅读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必要时会支付活动经费，还经常给一家傅立叶主义报纸的编辑们写信，成为了这一思想流派的热心宣传员，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在所有到过的城镇宣传他的信仰，极力贩卖他的思想产品。1846年，他搬到了吉斯（在法国的恩河），而他制造火炉和烤炉的生意也越发兴隆。他交了财运，但是财富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

早在第二帝国时期，果丹就在他的信件中谈到要为他的工人们建造房屋的想法。比如在1853年3月16日，他在给空想共产村庄主义者康塔戈尔的信中说："我已经问过自己好多次，我的地位是否不允许我在自己工厂的旁边建造一个工人的住宅联合体，让我的雇员们真正舒适地住在里面。"185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果丹的注意力，其标题是"通过提升房客们的所有权来消除租金"，其中的许多话被广为引用。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卡兰，果丹在读过之后给卡兰写了封信。他提到了他要为工人们建造住宅的计划，并对没有人对傅立叶的公共建筑感兴趣而深感遗憾。建筑师们只对孤立的家庭感兴趣。他让卡兰开列出一个条件，也就是问卡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接受委任为工人的住宅勾画蓝图。

勒努瓦是一位建筑师，也是卡兰的朋友，他去吉斯向果丹展示了一些计划，但到此时事情并没有更深一步的进展。1858年，这位实业家购买了一块18公顷的土地，并制定了他自己的建筑计划。奠基仪式在1859年4月举行。对于法米里斯泰尔的完整描述，以及计

霍乱是19世纪的主要传染病，不管多大规模的城镇，几乎无一幸免。

划图纸，都可以在果丹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本简要著述中找到。

自从傅立叶提出这一思想以来，这是第一次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们有了自己的现代化居住之所。康斯德兰提出过关于共产村庄中空气、水和光的调控的一些想法，果丹在确信这些想法是切实可行的之后，开始付诸实施。每套公寓都有一个通风系统。烟囱装在墙内，有口与炉子相连。四周有玻璃的庭院也十分通透，气流畅通。每层楼都有水源。配有绞拧机和烘干房的一幢专门建筑用来作洗衣房。还有公共浴室和有顶的游泳池（面积超过500平方英尺），游泳池的底部有特殊的可移动装置，可以转变为供孩子们游泳的潜水池。每幢公寓楼在正反两面都有窗户，内部有庭院。夜间，所有公共区域都用煤气灯照明。此外，每层楼还有果丹的一项独特发明：一个大得足以处理炉灰的垃圾通道，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果丹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机构”来履行一些服务性的职责，富有的人都是依靠仆人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他在法米里斯泰尔内设立了清洁服务。庭院、楼梯、走廊、水池、盥洗室等等类似

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工程的初期计划图纸，工程中有一个四周用玻璃围住的中心庭院。

的区域，都由雇佣来的清洁工负责打扫、维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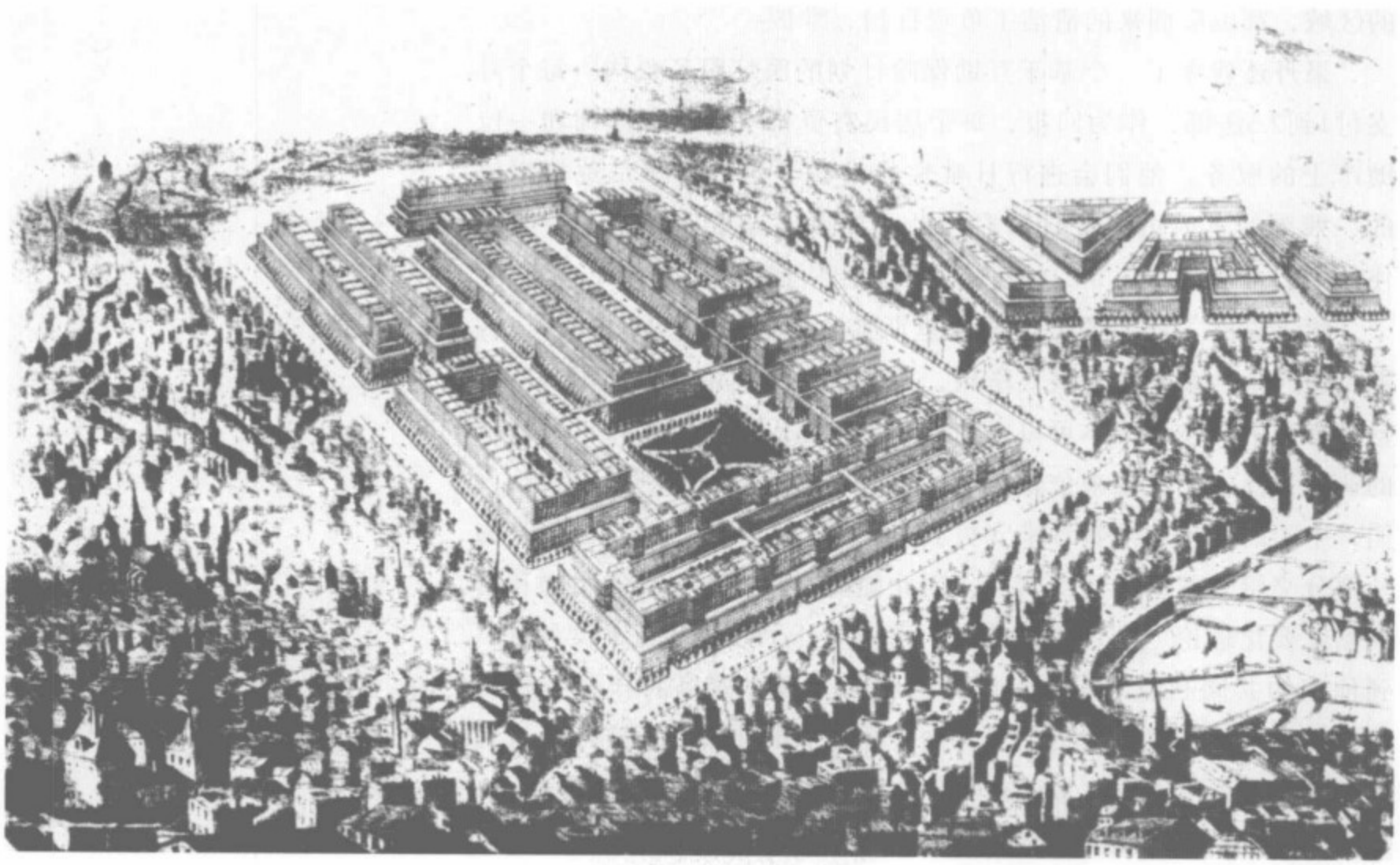
果丹还建立了一个基于互助保险计划的医疗服务机构。每个月支付1到2.5法郎，作为回报，每个居民有资格享受两位医师和一位助产士的服务，他们会进行日常性的出诊。药物治疗是免费提供的，残废的工人可以按日领取补贴。如果病人希望与家人分开居住，他们也可以得到专门的房间来度过生病期。

除了这些方便的服务，法米里斯泰尔还提供“烹调车间”，或者是在其中准备好食物供人享用，或是消费者利用那里的原料烹饪自己喜爱的食物，成本可以大为削减。对这一问题，果丹有着清晰的认识，“商人们批发来公众需要的物品，然后以一定利润零售给人们，中间的差价由消费者来支付。由于消费者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并不生产的中间商，因此他们实际所能买到的食物和消费品就要比理论上可以买到的少。当人们处于分散状态，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时，他们反倒会把大量的中间商看作是一种便利，一种确信可以在就近地区买到所需物品的途径，而实际上这是强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非常沉重的一项负担。”

果丹就这样实现了傅立叶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既然我们不能将工人家庭的小屋或顶楼变成宫殿，我们就选择将工人之家放置到宫殿之中。法米里斯泰尔就是这样的地方——未来的社会宫殿。”穷人最终被授予了“财富的对等物”。果丹的处方如下：“将贫穷的家庭放置到一套舒适的公寓中。为公寓装备上富人家庭中所拥有的所有便利设施和各种优良条件。确保公寓是宁静、令人愉悦和适于休息的。建立公共机构来履行富人们依靠仆人完成的服务职能。”

从1865年中心建筑有人居住那一刻起，果丹的社会宫殿就获得了傅立叶为他的空想共产村庄预言的巨大声誉。来自数个国家的记者纷纷造访那里，以最为崇敬的态度为其著书立说。

面对这样一种实验，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们再也无法保持漠然，很快就引发他们关于标准的争论，对这一现象进行攻击。朱尔·穆勒在1866年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认为法米里斯泰尔中的住宅是这一设施中的“人工牢房”。他觉得公共婴幼儿照顾机构是一个可怕的事物，剥夺了工人妻子最为珍贵的作为母亲的责任。穆勒严词谴责说：“再向前走一步，所有的人都将感觉到共产主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沉重压力。”一定不能再放任这种事物的肆意蔓延，“这只是一



这项住宅联合体的计划被涵括在一个45页的小册子中，由工程师简·博雷在1865年起草，他深受傅立叶思想的影响。

种好奇心而已，并不能真正解决身边的问题。”

将近50年之后，费尔南·杜瓦尔在他的法学博士论文中表达了极其相似的批判。他争辩说法米里斯泰尔是一个倒退，“它剥夺了个体的大部分自由；将其卷入一张压制其主动性的规章的蛛网中。”

左拉不喜欢玻璃房子

左拉通过阅读广受欢迎的傅立叶主义著作，唤起了自己内心的狂热，他也参观了法米里斯泰尔。他的反应十分平淡，这在他为写作《劳动》（1901年）所作的准备笔记中清晰可见，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公社被转化成了傅立叶主义者的联合机构。左拉并未发现果丹的宫殿有什么令人欢欣鼓舞之处，并且他反对傅立叶主义者的住宅理念，“玻璃房子，邻里不信任。没有独处。没有自由……秩序、规章、舒适，但对于冒险、探险和自由刺激的生活的渴望怎么样了呢？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被浇铸在一个模子里的。”

但是一个19世纪的工人，不论他去哪儿所发现的都是同样的贫民窟，那么所谓“自由刺激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又能意味着什么

呢？左拉的担心也许更适于描述美国西部的垦荒者们。这位小说家有着当时统治阶层对个人主动性的神奇力量所抱有的所有幻想。对于那些富有的财产所有人来说，果丹是一个叛徒，他违背了占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准则；但他的确是一种新形式的公共生活的缔造者，这一点毋庸置疑。

雇主的方案

那些能够理解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量和一个家长式运作系统的好处的“可敬的”实业家们，他们的故事就不同了。夏博家族的事业是煤矿开采，他们对自己的目标从不置疑：“舒适、便宜的住宅是解决工人问题的几个机构之一。这些机构在个体人员还年轻时就负责管理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教育和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始终支持他们，在他们工作30年后确保他们的养老金以及住房和取暖。换句话说，将保护工人们免受贫困，维持他们的职业尊严，并在他们劳动生涯结束时提供给他们公正的报酬。”这些矿山企业是第一批为工人们提供家庭住房的工业公司。

在布里亚尔，还有另一位富有远见的实业家，名叫让-费力克斯·巴特罗斯，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在制陶业找到了属于他的一方天地。他在瓷制钮扣和人工珍珠的大规模生产上超过了英国人，法国探险家们把这些产品带到了非洲并广为传播。他的公司在一个竞争者的手中买下的，20年后到1865年时已经雇用了一千多名员工——男人、女人和孩子。从儿童到老人，巴特罗斯每件事都事必躬亲，“他了解他的工人们，也深爱着他们，他们是他的孩子。他知道他们的喜好、他们的缺点、他们的危险。他巧妙地操控着他们，坚定地训练他们，这是他必须做的，但是却带着如此善意的仁慈。为了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工人们提供有益健康的住宅，他建造了大量的公寓联合体，让工人们能感受到真正的宗教祝福正是他的心愿。”巴特罗斯更喜欢一排排单一家庭居住的房屋。在他的公寓联合体中有六排这样的房屋，每排有一百多码长，居住着35到50个家庭。这些房屋伫立在工厂和过去的旧房子之间，富有象征意义。

努瓦希尔

最成功的公司城镇是由埃米尔·朱斯坦·梅涅建造的，1700名工人居住其中，成为所有个人积极性拥护者们的灯塔。果丹是通过向

大众售卖火炉、烤炉而交了财运的，梅涅赚钱则是靠卖巧克力。由于他的努力，法国的巧克力消费量（包括从南非进口的巧克力）从1849年的350吨上升到了1889年的1.5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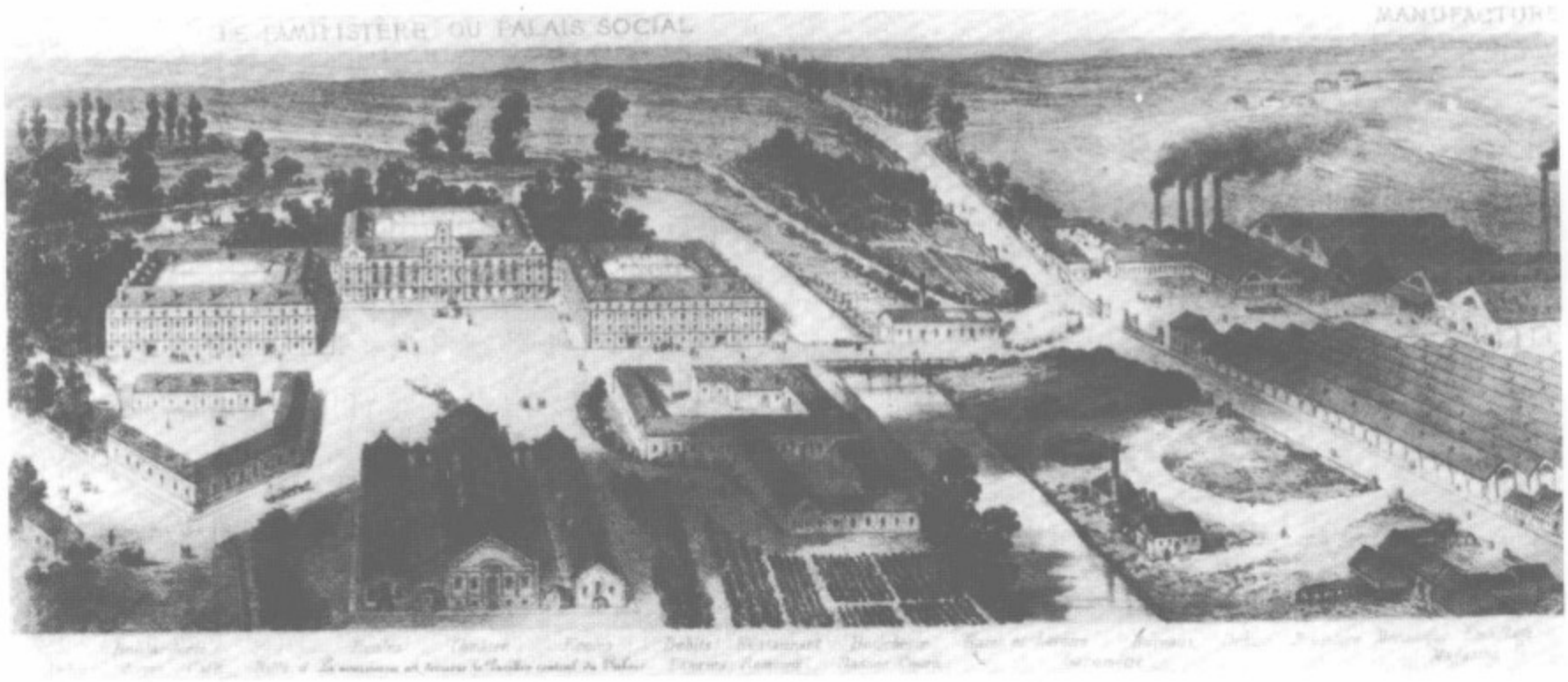
和果丹一样，梅涅对社会问题也极为感兴趣，在几乎所有的法国工厂主们都是保护贸易论者的年代，出版了大量赞颂自由贸易的书籍和小册子。他还提议进行税制改革。1876年被选为代表后，他投身左派，投票支持对被驱逐的巴黎公社支持者们给予特赦。

梅涅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幢金属框架结构的建筑，那是他的一家工厂。此后，梅涅在1874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项创新之中——建造努瓦希尔，那是一个用砖垒建起的城镇，占地二十多公顷，上面建造的是每户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每栋房子的第一层都建造在一个地下室上面，内部有一间有两扇窗户的房间和一个有火炉、水池的厨房。二层有两间卧室，一间父母住，另一间孩子们住，上面是个阁楼。每个房间里都配备有壁炉、壁橱和百叶窗。在院子中是一个有顶的小棚屋和一个简便的厕所；个人的排泄物包裹上可可叶后是所有家庭都使用的优良肥料。水可以从大量的泉眼中获得。建造这种可居住两个家庭的房屋耗资不超过一万法郎，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的建筑成本不超过5000法郎，租金是每年150法郎（每月12.5法郎）。而租金红利则意味着同样的工人们连这样低廉的租金都不必支付。

果丹与工厂以及法米里斯泰尔的第一批董事们在一起，其中包括他的妻子。

和果丹一样，梅涅也建立了许多公共机构。一家商店提供低价食品、饮料、衣物、布匹、鞋子，还有燃料。餐厅向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工人们提供饭食。未婚的工人们可以在两家“旅馆餐馆”中居住和用餐。有一所学校，分为六个年级，同时还有白天照顾孩子们的设施。药品是免费的，患病的工人如果是男性可以每天领取2法郎的病假工资，如果是女性每天的病假工资是1法郎。

就像欧仁·苏使傅立叶的空想共产村庄广为人知并深受欢迎一样，努瓦希尔这个新的伊甸乐园很快就得到了19世纪末期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赫克托·马洛特的赞颂。马洛特是朱尔·瓦莱斯（巴黎公社后少数几个帮助过他的人之一）的一位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位胆小的支持者。在他的小说《家庭》（1893年）中，佩恩达弗涅是一位纺织工厂厂主，受孙女佩兰的影响为他的工人们建立了一家医院和一个日间托儿机构，未婚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们住在两个有餐厅的旅馆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带



果丹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1872年。这幅法米里斯泰尔的鸟瞰图遵循了傅立叶当初提出的计划。

有院子的房屋，每年的租金只有100法郎，这种新模式的城镇被明白无误地称为努瓦希尔，佩兰派了一位助手去那里对日常运作进行调查研究。梅涅的房屋与马洛特的非常相像。马洛特自己拥有一栋单一住宅，这种思想正印证了深深根植于他心中的个人利己主义。

当肺结核肆虐，尤其是在工人当中肆意蹂躏，为寻求防治肺结核而爆发了公众健康运动时，公司城镇却变成了花园，其中的每个房间都被草木包围着。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在这样的工人住宅里找到了工人阶层住房的理想模式。

单一家庭住房

那些认为社会救助和道德拯救的关键在于财产投入的人们在第二帝国期间热心地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们在阿尔萨斯的第一个事业投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位于米卢斯的工业公司是19世纪初成立的一家公司，在1832年成为了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基金会。1851年9月24日，其中一位名叫让·祖伯的制造商向他的同僚们提交了一份关于工人住宅问题的文件，其中包括了一个标准住房的计划，这种住房在大不列颠已经建造起来，他还要求社会党将这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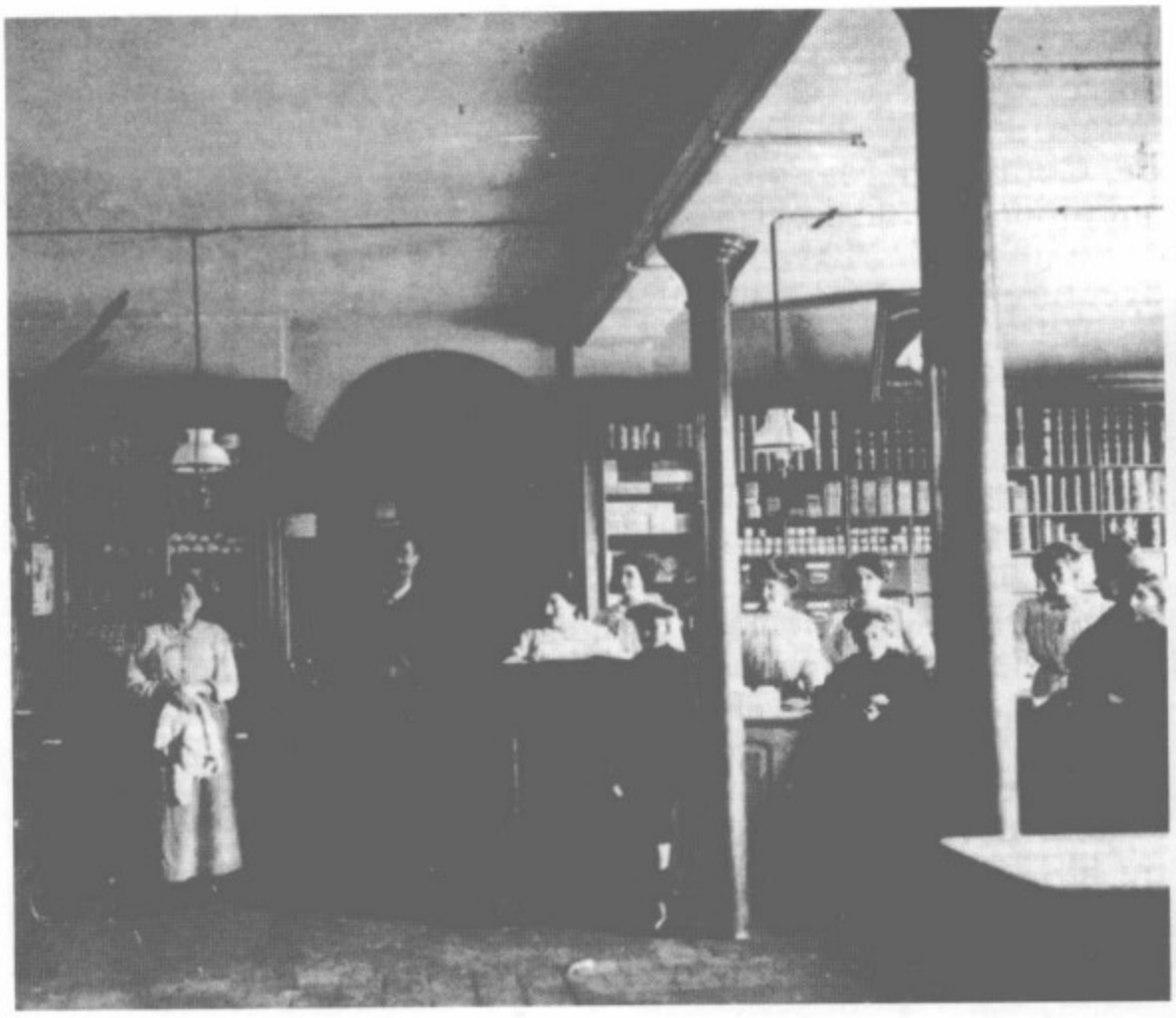
他的呼吁引起了回响。在1852年6月30日举行会议期间，阿希尔·潘诺博士汇报了一项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对象是上莱茵河地

区工人住宅的房主们。他说，工人们的住房可分为两类：许多人共同居住的简陋房舍和个人居住的房屋。基于道德底线的原因，多人共同居住的房舍被否决了，“把许多陌生的家庭聚集到一个屋檐下很难达成内部的宁静和谐，并且可能引发严重的混乱。”

在提交上来的所有住房方案中，祖伯造纸厂的计划似乎最为可行。他们的住房设计方案是：有一个地下室；一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二层是两间卧室和一个贮藏区域；厕所在院子中。一个“社会权威”第一次含蓄地承认了工人们是可以和他们的雇主一样享受同样的舒适的。在总结时，潘诺博士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慷慨的市民们能加入到建造以祖伯造纸厂的房子为样本的标准住房的行列中来。“认真的投机者们”也许很快就会追随他们的领导。

一个名叫让·多尔富斯的制造商立即宣布他做好了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他委托建筑设计师埃米尔·穆勒设计了4栋房子。1853年11月30日，潘诺博士宣布，米卢斯工人住宅公司已在6月10日正式成立，总资本30万法郎（到拿破仑三世时由于接受捐赠，已达到60

每个法米里斯泰尔的内部庭院都有一个可移动的玻璃顶。这种设施加之每层楼的阳台，使得可以在这里方便地举行各种庆典仪式，果丹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参加这种庆祝典礼。



果丹并不是第一个将打折商店引入工人住宅区的实业家，但是他的这种商店因为在货物品种的储备上可与吉斯的任何一家正规商店相媲美而显得卓而不凡。

万法郎)；原始资本分为600股，每股5000法郎。多尔富斯自己拥有35股，其他的分别属于另外11个制造商。公司章程的一个条款中清楚表明："本公司的目的是为米卢斯和附近地区的工人建造住宅。每栋房屋均为单一家庭居住，互不相联。"由于公司成立的目的在本质上是慈善性的，因此股份的红利不得超过4%。

多尔富斯在1853年6月27日向股东们提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7月20日开始破土动工，工地就是公司所拥有的一块面积达8公顷的土地。

房屋由带有地下室的两层楼构成。第一层包括一个厨房和一个大房间；二层有三间卧室，一个贮藏室和一个厕所。所有房屋的售价都有特别限制：在1850法郎和2800法郎之间。根据所选户型的不同，购房者的首期付款在300法郎到500法郎之间。此后，他们按月支付20到30法郎，并以这种方式在5年内付清一半本金以及登记注册的费用和年息，越早付清越好。至于另外一半本金，购房者可利用地产信贷，利息是5%，大约可在30年内付清贷款。

不到10年的时间，在1862年，开发的住宅已有560套，其中的

法米里斯泰尔的学校遵循着傅立叶定下的规则。这些学校后来被整合到法国的国家教育系统当中。

488套到3月31日时已被售出。这种新的住宅区几乎提供了傅立叶主义空想共产村庄中的所有福利：在为未婚工人准备的拥有17间屋的住宅中每间公寓都已妥善装修，托儿服务、医疗服务、配有离心甩干机的洗衣房、公共浴室和游泳池，以低于市场价提供面包的面包店，价格便宜的餐厅，还有以合理价格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所有一切应有尽有。

上莱茵河地区的许多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米卢斯实验（该项目持续扩展，直到1867年时已为大约6000人提供了800套住房）。1854年，实业家布尔卡尔开始在盖维勒为工人们建造住房，并在186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继续他的这项工作。还有几个工厂主的工程也纷纷开工。

但这些努力被保守主义和社会的家长统治作风所控制着。潘诺博士将这些努力描述为“慈善事业的工作，目的是通过向工人们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物主身份的刺激来使他们习惯于节约”。

米卢斯的发展在1895年结束，那时，他已拥有了1240套住房，

居住着1万人，超过了城市人口的10%。（这些房屋至今仍然有人居住。）187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这项开发并未成为单纯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其中的居民所从事的职业有八十多种。但受雇成为产业工人的男人们仍然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应付每月的支出；他们的妻儿老小也不得不做工，而且他们也乐于如此，因为通过工作可以使他们支付得起拥有一个家的费用。

其实早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立法机构就开始过一项对法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不幸的是这项调查鲜为人知。其中受委托进行调查的成员之一就是梅伦。住房问题一直是他主要关注的社会问题，他已提出过1850年的法案，并且他认为这项法案的提出在总的社会影响上还是益处颇多的。至于在第二帝国期间进行的改善工人阶层住房状况的努力，为工人们盖的多人共同居住的简陋房舍并未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这种住房与法国人喜欢独立的民族性格不相一致。更深层次上，这种群居的陋室从道德甚至是政治角度上来看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因此，这些住处需要进行严密的监视。开发单一家庭的住房就不会产生这类问题。梅伦对那些使自己的工人便捷地购买到住房的工厂主们大加赞扬："自己的住房给予了人们可贵的品质：它使房屋的主人更加冷静并努力工作；它使他不必再为那些有害的事务分心，同时与家保持近距离，处于家庭的核心中，在那里他可以尽情享有闲暇的时光。"

梅伦的思想意识中，所有权应该是个人事务范畴内的事；无产者们应该靠自己来获取，而不是如某些人所鼓吹的那样应该由国家资助获得。在1856年发起成立了社会经济社团的弗雷德里克持同样观点。作为一位自由社会无秩序状态的分析家，他是最为推崇"所有权对其所有者有着道德上的利益"这一观念的理论家之一，并且因此而声名卓著。他说："家庭和其住宅的统一不可分，对于工人家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有着最为有益的影响。"这一思想又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社会改革》中得到了发展。

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正确方案

在这部书的第一卷中，弗雷德里克辩称，欧洲最具生命力的传统之一就是家庭住宅的物主身份。但在法国，这一传统只在农村地区残存；城市和制造业中心的住宅大部分都是出租的。这一事实已经扰乱了社会生活的秩序，"供需法则的严格运用已经严重扰乱了

房屋出租地区的社会关系和那里的薪水发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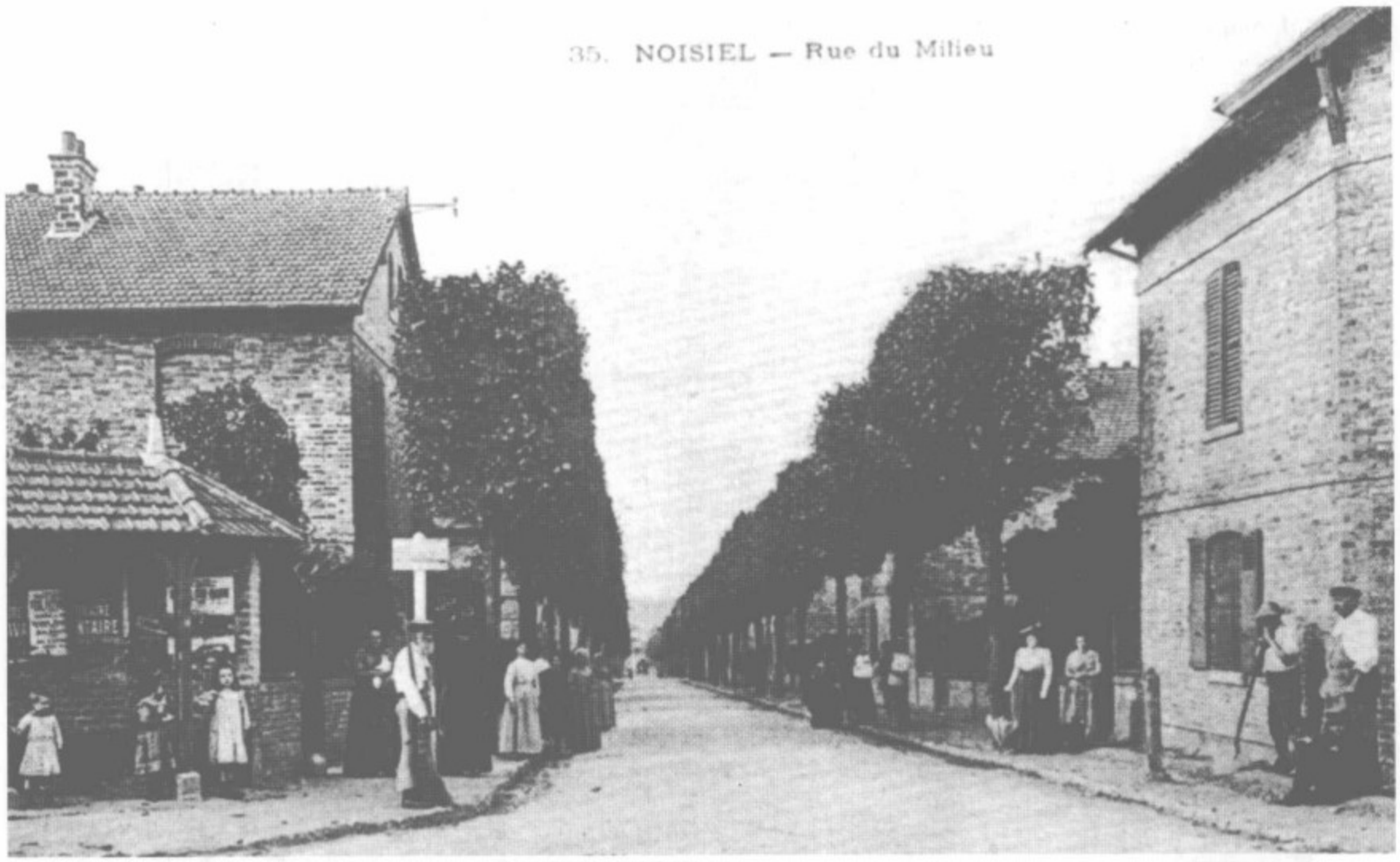
制造业的运营体制已经将人们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中连根拔起，然后又将他们集中到一起，但这些地方却缺少防止放荡恶习的必要机制。家庭负担不起独立的房间，而属于个人的独立房间是“任何文明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们不得不许多人一起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其不利后果是可以预见的，“租来的住处缺少最基本的保证舒适和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家庭已失去了所有的人类的尊严感。父亲几乎始终游离于这个家，或是在工作或是在寻求着低级、自私的快乐。同样是工人身份的母亲，也从家中逃离，或是堕落卖淫或是更加正派地为自己加上艰辛劳动的沉重负荷。男孩和女孩们也在很小时就开始从事重体力劳动，逐渐习惯于放荡和堕落。自己的放纵、他人的剥削，使他们过早地开始衰老，而年迈的双亲也在贫困中、在尚未走完正常的生命旅程之时就死去了。”

对统治阶级来说，治愈这种可怕的荒芜的唯一良方就是主动出击。产业领袖们应该让他们的工厂鼓励工人们存钱，以便能购买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屋，同时劝阻他们的妻子不要出外工作。城市已经毁坏了家庭的尊严和道德，而在乡村，稳定的家庭将得到恢复、进而兴旺起来。一旦人们在良好的住宅中安顿下来，与邻居们保持着令人舒适的距离，他们将不会再“把自己人格的碎片撒在风中”。

人人有家

这个有些怪异的想法困扰着这一时期所有的中产阶级改革者们。从1876年开始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反复地谴责集体居住这一“人工”实践。一位演讲者在布鲁塞尔发言说：“工人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良好状况、公众的健康，还有社会的安全保障，全都依靠每个家庭能有一个独立的、健康的、便利的住房，而这种住房可以通过购买获得。”

两年后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卫生大会上，一位名为埃米尔·特雷拉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题为“工人的企业工人的家”的报告，其中这样说道：“通过让工人们集体寄宿在简陋的房舍中来改善他们住房状况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一个工人接受了企业中集体居住这一条件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他又拒绝了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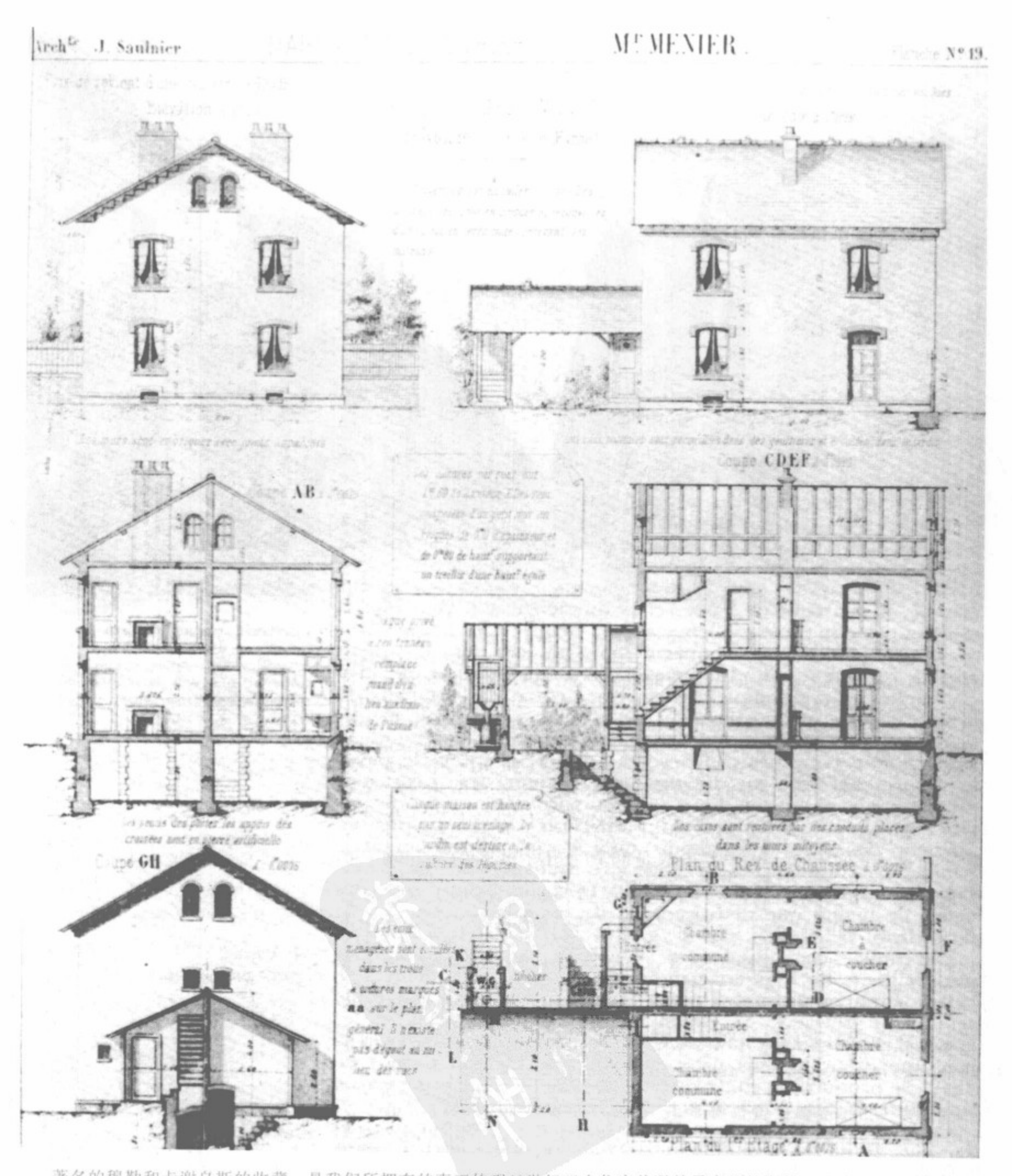


梅涅在诺伊希尔建造的房子每栋居住两个家庭，沿街排列，今天仍可看到。

利益的诱惑，那么，这正是工人的真正人格尊严的一个标志。”特雷拉总结道：“现在已经可以毫无异议地确定，集体居住的企业住宅完全不适于作工人们的住房。”

小家庭住房的倡导者们很快就开始尝试一项新颖的工程。他们将工人们放到巴黎的一个行政区，而这个行政区以前是资产阶级单独享有的。1880年，迪兹-莫内议员和其他几个著名的保守派人物发起成立了一家工人住宅公司，开始建造帕西·阿图尔工程，总资本20万法郎（共2000股，每股100法郎）。按计划方案，建造的住房是四居室，有自来水、煤气和下水管道，其设计者埃米尔·加卡约是擅长小建筑建造的工程师。购买这样一套住房需要预付500法郎定金，在随后的大约20年期限内每年支付约600法郎。到1893年时已建成了67套这种住宅，大约300人居住其中。

但年度付款额太高，除非是“最努力工作而又最冷静的”工人，以及作用非凡的工头和重要的白领雇员，还有下层官僚中的新生阶层成员——这些人的支持都是工厂主极其需要的，其他的普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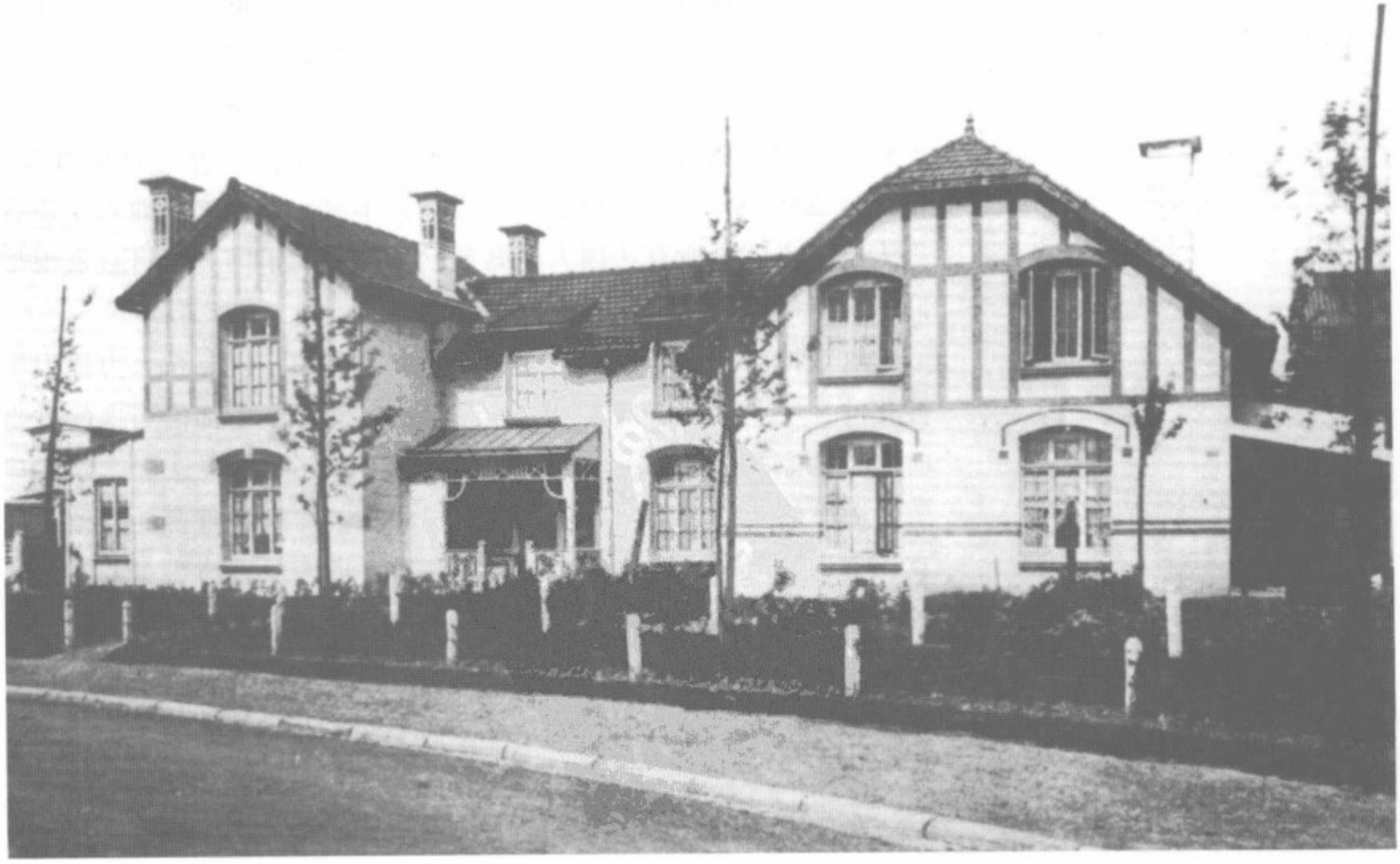
著名的穆勒和卡谢乌斯的收藏，是我们所拥有的真正体现19世纪工人住房状况的最完整的资料。这张图纸展现出了努瓦希尔中住房的优良品质，尽管当时还缺少自来水和下水管道。

工人根本是可望不可及。雇主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倾注了怎样的尊荣啊！

虽然申请者们的心情可能非常迫切，但明辨他们来自哪个阶层才是明智的做法，而公司也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果一个“临时的”房主因“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而声名狼藉，那么就可以解除与他的房产合约，他将被逐出他的房子。依据同样的道理，转租行为也是被禁止的。帕西·阿图尔工程作为自由主义的样板住宅名噪一时；在由共和国总统主持了落成典礼后，外国的高官权贵们频繁地参观那里。

其实，工程的发起者们已预料到了最为有益的结果，这在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一份报告中有着清晰的表述。报告由埃米尔·谢松起草，他是一位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保守派社会改革家，报告中说：“家庭主人的身份影响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彻底的转变……一个小家和一个庭院使工人真正成为了那个可以被正式称为一家之主的人，一个富有道德、谨慎小心的领导，向妻子、孩子

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小型建筑》，1913年。到1909年，杜奇斯煤矿社团已为它的员工们建造了500栋这样的房屋。这是诺曼底风格半木制房屋的黄金年代，这种房屋很快就开始与遍布法国的巴洛克式房屋展开竞争。



展现自己的权威……不久之后，他的房子就‘拥有’了他，它教给他道德，使他安定，然后转变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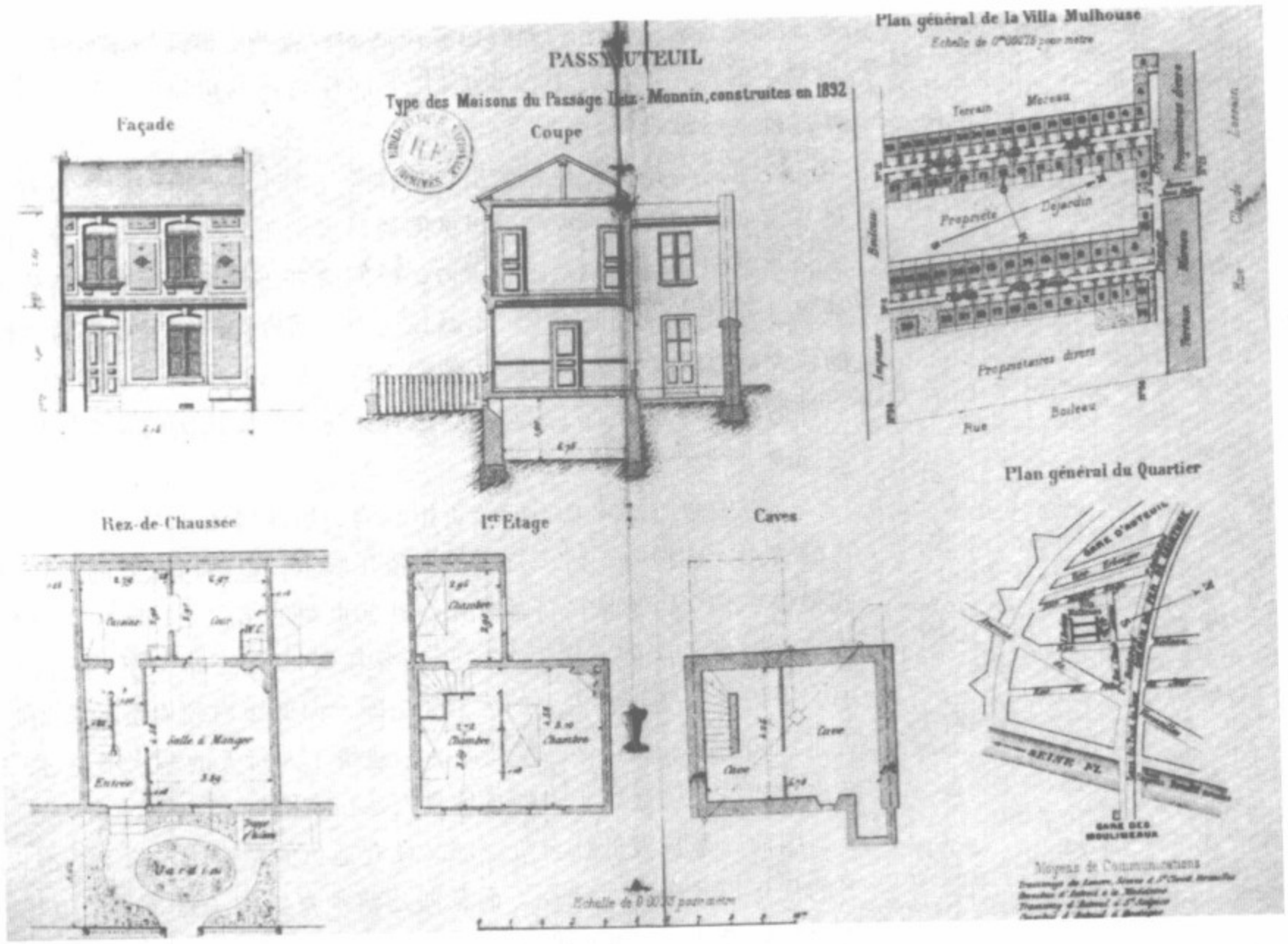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揭示出统治阶层思想家们的真正动机的了。同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一样，谢松是个工程师，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他认为一旦工人被舒服地限制于属于自己的小家之中，他们就将失去对集体斗争和行业联合工会的兴趣。遵循社会理论家们的建议，建筑师们在他们设计的住宅建设工程中使尽浑身解数，尽展其独创性和灵巧性，目的就是要使邻里间的交往联络更加困难。统治阶层担心，居民间的沟通交往将直接导致19世纪时资产阶级的那些可怕产物——性方面的不道德，以及由不负责任的捣乱者煽动的政治狂潮。

为了使工人们更加便利地获得小单一家庭房屋的物主身份，很多地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1889年，在马赛就出台了一个方案，建造单一住宅、三居室的公寓和未婚工人居住的住房。1889年，在勒阿弗尔（法国北部海港）建造了40栋分离式和半分离式（只有一边相连接）的房屋。1891年，实业家鲁普在法国北部城镇博韦建造了29栋房屋。1903年，建筑工业方面的报刊杂志上充斥着即将举行国际博览会的消息，这个国际博览会的主题是“住房、建筑和公共设施”，将于7月30日到11月15日在巴黎举行。一位记者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天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满意心情：“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哲学家、理想主义者、艺术家、工业家、商人、还有工人——也就是所有法国大家庭辛勤工作的儿子们——将会发现他们的梦想已然成真，即便不是全部。”

这个博览会引起了社会权威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大力提倡个性化的住宅。期间展出了几款样品房，每间房子中都恰当地配有当时流行的家具和装饰，上面挂着价格标签。1904年在法国，新式建筑的破土动工确定了发展单一家庭住宅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敦刻尔克、鲁贝、阿尔夫、波尔多、蒙彼利埃、贝塞尔、马赛，全国各地的单一式住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开来。巴黎市郊成为兴建不动产的焦点地区，那里是人们展示社会抱负的舞台，私人建筑成为他们的装饰品。

左拉的认可

在关键时刻，单一式家庭住宅赢得了一位文学巨匠的支持。左



这张图纸所对应的住宅工程中包括了100户家庭住房，每户的前院中都有防护栅栏，这些房子至今仍在。

拉在其1901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劳动》中，选择这种住房作为乌托邦理想之城的模式。在这里，没有空想共产村庄群居式的住房，只有单一的家庭住宅，“自然地分散开来，更有利于和平宁静，更有利于健康（所谓‘自然地分散开来’，左拉是指并不要求房屋一定要沿街道两边排列）。”左拉的想象插上了翅膀，飞上了天堂，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地面上的道路和地面下的下水管道这样实际的问题，尽管在他的理想之城中人们已经坐上双座的电动车四处旅游了。对于点亮每间房屋的电，他也是大谈特谈，但有人想知道他是否忘记了电是需要电线引入房间中的。

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一个对立物挽救了。在想象了“白色房屋的浪潮”将旧式的村庄吞噬后，他描写了其他的房屋。那些房子的风格可就不那么纯粹了，因为它们是用石头建的，装饰着各种陶制品，在1889年的博览会上赢得一片掌声后，这种风格在建筑师中非

常流行，“这些房子装饰着色彩斑斓的沙岩和陶器，珐琅瓷砖，山形墙，窗格，嵌板，中楣和檐口。”同样风格的房屋在今天巴黎的某些郊区已被修复。

左拉的乌托邦理想暴露出了他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财产所有人的真实面目。法国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谋求工人阶层中精英分子的支持来抵制社会主义者们的压力，他们的方法就是将这些精英分子孤立于通过贷款购买的单一家庭住宅中，而资产阶级一度最为憎恨的作家却以其天才的智慧给了他们支持。左拉对单一式家庭住宅这一神话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住房使整个法国的中级阶层为之痴迷。

只有中级阶层才真正能够负担起购买用沙岩和花岗岩建造的住房的费用，这种中产阶级别墅的通俗化版本，以前所未有的独特方式很快在整个巴黎地区传播开来。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巴黎市郊一幢带花园的五居室住宅平均要耗资1.2万法郎。在工人阶级中，平均的家庭年收入大约为1700法郎，而低级白领雇员的年均收入是2200法郎。1911年巴黎地区一个建筑工人每天的薪水不超过5.5法郎，而全法国建筑工人的日均收入是4.86法郎。

因而，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却又怀有抱负的私房屋主除了标准以下的住房模式外别无选择，而某些建筑师察觉到了这是一个市场，纷纷加紧设计。《我的小房子》是一本1905年创刊的杂志，其出版商珀蒂帕十分精明，他成功建造了带有厨房和室内盥洗室（但是没有更衣室）的两居室住房，价格只有1200法郎那么少。出版商热米埃后来描述了他的同僚布恩尼奎是怎样充分吸取弗雷德里克及其跟随者的教训的：“任何一个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人，其生活状态都处于持续的不安全感之中……将家人聚集到真正的壁炉边上，父亲可以避免他们不加选择地与各色人等混合在一处。其结果是，尊严、道德价值，甚至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教育，都将从中受益。”

在这个介绍的背后，则是布恩尼奎建造了一系列的住宅，从工人住的小房屋到商人的临时住处到产业工人的小家再到中产阶级端庄的别墅，一应俱备。即便是最简单的住房也都配备有走廊和楼梯，这正是此类建筑物的一个标准特征。就这样，法国成了一个属于自我满足的私房屋主们的刻板国家，他们反复重复着同样的陈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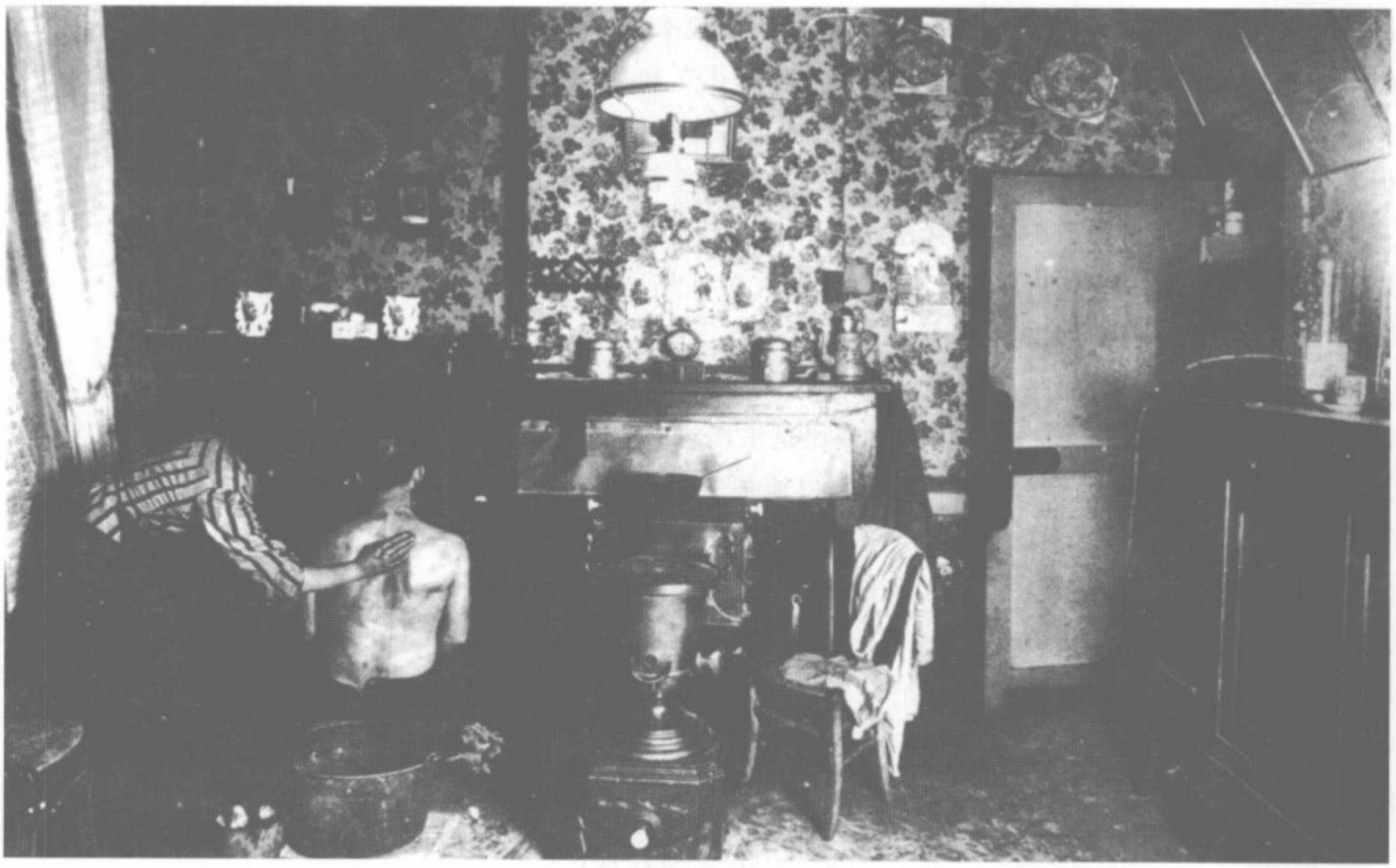
滥调："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在这儿我们很幸福"。每个家庭都把自己关在房中，安全地远离"有钱有势的人"和"外来的陌生人"。这个梦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逐渐失去了光彩。但既然到这时物主身份已被认为是必不可缺的本质性要素，那一切又会有什么分别呢？另外一本有着超过15年出版历史的杂志，被冠以《我们的小房屋》这一名称，这是法国人对任何可以称之为"小"的东西怀有溺爱情结的又一标志。

但为什么一个"甜蜜的"小家就一定会带来幸福呢？至少有一位作家对这一神话进行了抨击。欧仁·戴比是法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无产阶级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仍然不明不白地被忽视，他在1932年写了《别墅绿洲》或称《骗人的中产阶级》一书，讲述了两个在巴黎市郊购买别墅的前旅馆经营者的故事。他们购买的住宅的三层楼是在社会上成功的标记，有围墙的花园使得避免与邻里打交道成为可能，还有一个装饰性的水池和一个汽车库。简言之，根据一个已被复制过千万次的理想住宅模式，这种房屋拥有幸福所需的一切。然而，有时生活是无情的：房屋最终杀死了它的主人。

新的公共住宅

社会主义和社会艺术颇具颠覆性的风潮在19世纪末期触及了巴

对于建造这些房屋的基金会，人们已几乎一无所知。这些房子是展现家庭主人身份的最为适度的方式。



两个橱柜，一盏吊灯，窗户上的几个窗帘，这就是一个舒适的工人阶级家庭。

黎美术学校。一些建筑师显然因备受关注而饱受折磨，这种关注早已远离了他们的前辈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出版了一些可能是由工程师或医生已经写过的著作。

个人积极性接管一切

事实上，一些新的市场将要开放，而这一职业的预言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18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曾经是慈善事业的一项工作的低成本住宅建设，将很快提升其地位，获得投资资本的关注，与之伴随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就这一问题进行技术方面的核查工作将由我们的同僚来负责。"

在巴黎，几个主要的工程都是依据1894年的法律而建的。费兰陶比克公司继续着它的努力：1897年在第19行政区建造了一栋有54套公寓的楼房，1898年又在第18行政区建造了一栋有38套公寓的楼房。但令公司董事会主席乔治·皮科沮丧的是，后来的建筑中平均每个家庭里孩子的数量还不到一个。难道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们的宣传也在这里造成了损害（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

著有《人口论》，认为人口的增长比食物供应的增长要快，除非对人口的增长采用道德的约束或战争、饥荒和瘟疫加以抑制，否则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后果，译注)？但是这里的房客们和公司其他建筑中的房客们一样，仍旧按期支付他们的租金，舒适地住在这里。就这样，到世纪之交时费兰陶比克公司已从巴黎的贫民窟地狱中救助了190户工人家庭，约622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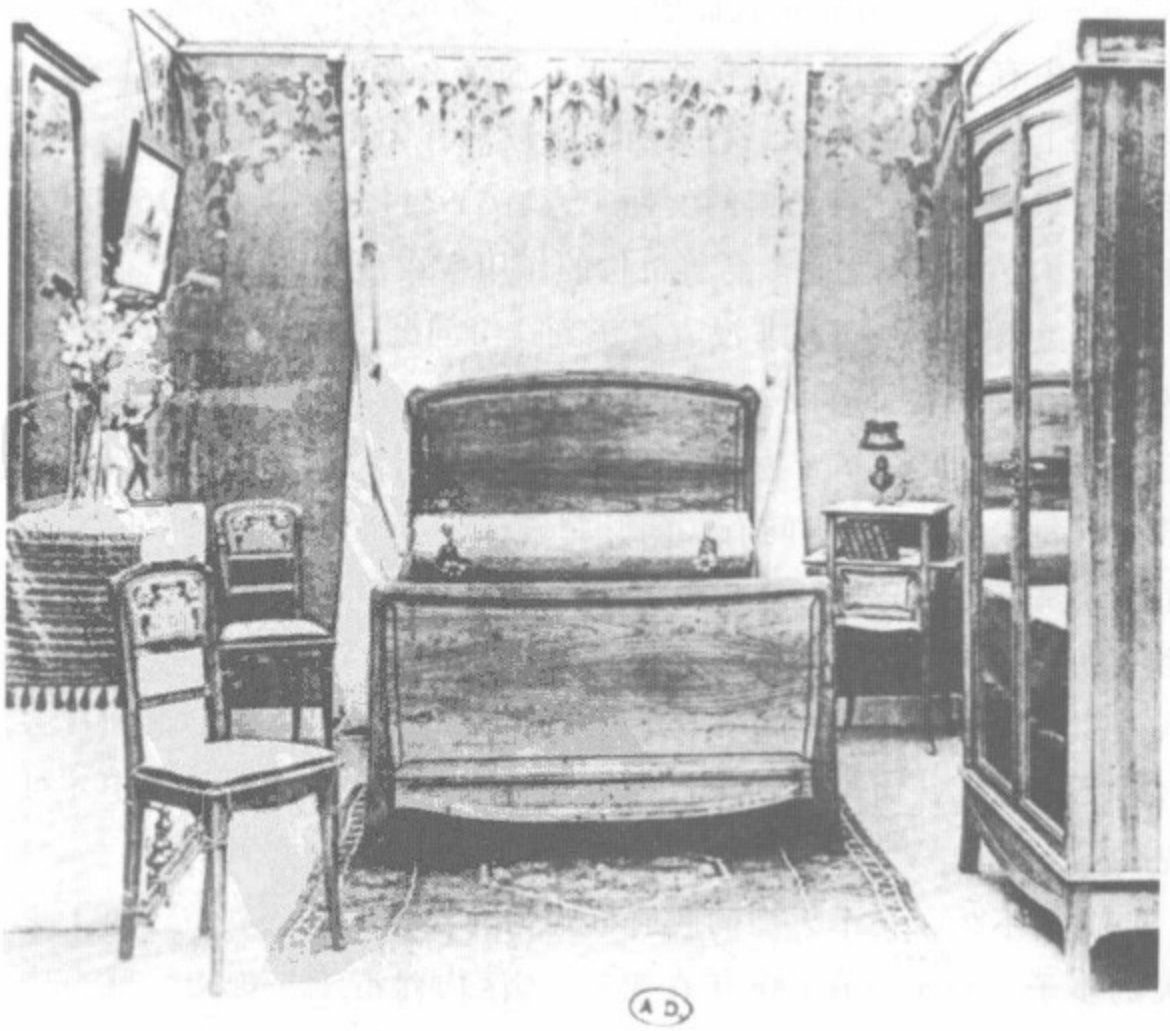
1902年，查尔斯·居容受梅森集团委托在第13行政区建造3栋大楼，梅森集团实际上是由勒邦迪糖业公司成立的一家基金会。这3栋楼包含71套公寓，同时配有诸如图书馆、自行车和童车存放处、洗衣房、晾衣房、澡堂和淋浴，以及广场等令人颇感惬意的便利设施。1905年，还是这个集团，委托拉布西埃在巴黎第20行政区建造了一个含有175套公寓的公寓联合体。圣丹尼斯是紧邻巴黎的一个郊区，一家公司在1902年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包含有11栋建筑、共342套公寓的住宅联合体，还有21栋单一家庭住宅，都是由查尔斯·居容设计的。

包括皮科在内的一些人甚至考虑到了单身女人的住宅问题。弗雷德里克在1900年注意到“寄宿公寓不适合想在巴黎工作的女性工人”。一个高级警务官员告诉他：“我已得出结论，从事卖淫的100个姑娘中有95个是因其居住状况所迫而这么做的。”各种慈善机构为女性工人准备了宿舍，总共的床位数约有1000个。但是根据1891年的人口普查，住在巴黎的女性工人有339344个，其中的165774人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慈善机构的作用实在是杯水车薪。

费兰陶比克公司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对于道德问题的态度一向严谨。在接受了伊思齐男爵夫人一笔50万法郎的捐赠后，该公司在1902年专为女性开办了一家寄宿公寓，位置在第18行政区。每晚1法郎的房间有20间，每晚60生丁（法国货币单位）的小型公寓有36间。房间中没有冲洗设备，但是有每次收费20生丁的浴室和10生丁的淋浴。门卫会在晚上10点钟将大门锁上。造访的客人一律不得停留在房间内。房客们只能在下午5点到6点半期间在会客室接待客人，而男性到访者更是只能在公寓主管的办公室中才可见到。

此后不久，一个大型的政府机构为其女性雇员的利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布里奥在1906年在第7行政区内建造了一栋楼，就在中

在20世纪早期，低成本家具设计的竞争十分激烈。但新设计并未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广为流行，因为百货公司已牢牢地控制了家具市场。亨利二世的卧室设置是最畅销的类型。



产阶级居住区的中心地带。这幢楼房就是邮电管理局女员工的宿舍，是一栋受新艺术主义影响、非常漂亮的建筑，至今仍巍然耸立。建筑中有111个房间，并可以为居住者们提供各种便利设施。

在1906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内，作为1894年法律的扩展，大量的立法得以通过，其目的都是要促进低成本住宅的建设。这些法律对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起到了广泛积极的作用。

买得起的房子获不了奖

1913年，另一家主要刊物，也是中央建筑公司的官方出版物，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刊物的编辑们对工人的住房问题并不陌生，已就这个话题发表了多篇文章，但是他们决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提交给一个负责评审各类建筑奖项的评判委员会的关于住宅方案的报告中，亨利·萨拉丁写道："我看到了工人们的家，他们买得起的房子，低租金的公寓以及更便宜的房子。我不希望被当作批评家，批评家难得有高兴的时候，但是，买得起的房子真的那么重要以至于我们要从艺术角度上接受如此之多的屈从吗？这些住宅方案不值得包括在展览之中，除非它们有着非同一般的优点。它们代表着优良的建筑工程，但并不是艺术之作。"很清楚的一点是，工人住宅永远也不可能进入足够崇高的范畴，从而成为角逐"罗马奖"的候选工程，获奖者的名字总是更多地与大使的宅邸或朝圣的教堂联系在一起。

亨利·索瓦热

1904年6月，商务部长乔治·特鲁伊洛——一个道地的反教权激进分子，为洛齐蒙茨公司建造的第一幢大楼主持了落成典礼，这幢楼位于巴黎的第18行政区内。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佛朗茨·儒尔丹，他是建筑物钢铁架构领域的先锋，新古典主义的死敌。

这幢堪称典范的建筑有六层，混凝土框架，砖墙，是年轻的建筑师亨利·索瓦热的作品，他虽然只有30岁，却声名赫赫。他曾是一所美术学校的学生，但是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学校。但索瓦热却是新艺术主义的领军人物，其成名之作是他在1898年在南锡为家具制造商路易斯·马约尔设计的一幢别墅。

他的设计中融合了理想主义者和卫生学者们坚持工人住宅所必须拥有的所有便利设施和一切令人身心愉悦的事物：浴池和淋浴、福利社（合作商店）、讲究卫生的餐馆、成人教育教室，甚至还有

一个用于日光疗法的花园，这是当时被认为最有效的治疗肺结核的方法。这幢建筑令人过目难忘，绝对是大师之作。

此后，索瓦热又继续以同样的精神为工人阶层设计了多处住宅。

盛宴登场

1905年1月，罗思柴尔德基金会宣布要在一片三角形的土地上举办一次“小型、健康、经济型住房建筑竞赛”，这块地的面积大约有6.1万平方英尺，位于第12行政区。这块地距离里昂的加尔不远，三面紧邻的都是较为繁华的街道。竞赛的要求有意制定得比较模糊：建筑物可以由几层楼构成，能提供普通的便利设施，所投资金能有三到四个百分点的收益率。并不承诺获奖方案一定会得到实际应用，建筑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1905年3月31日，127位参赛者以匿名方式向市政厅提交了他们的设计方案，这些设计方案将在那里的一个接待大厅展出。评审团成员包括6位建筑师和基金会的6位会员，其中包括了谢松、皮科和西格弗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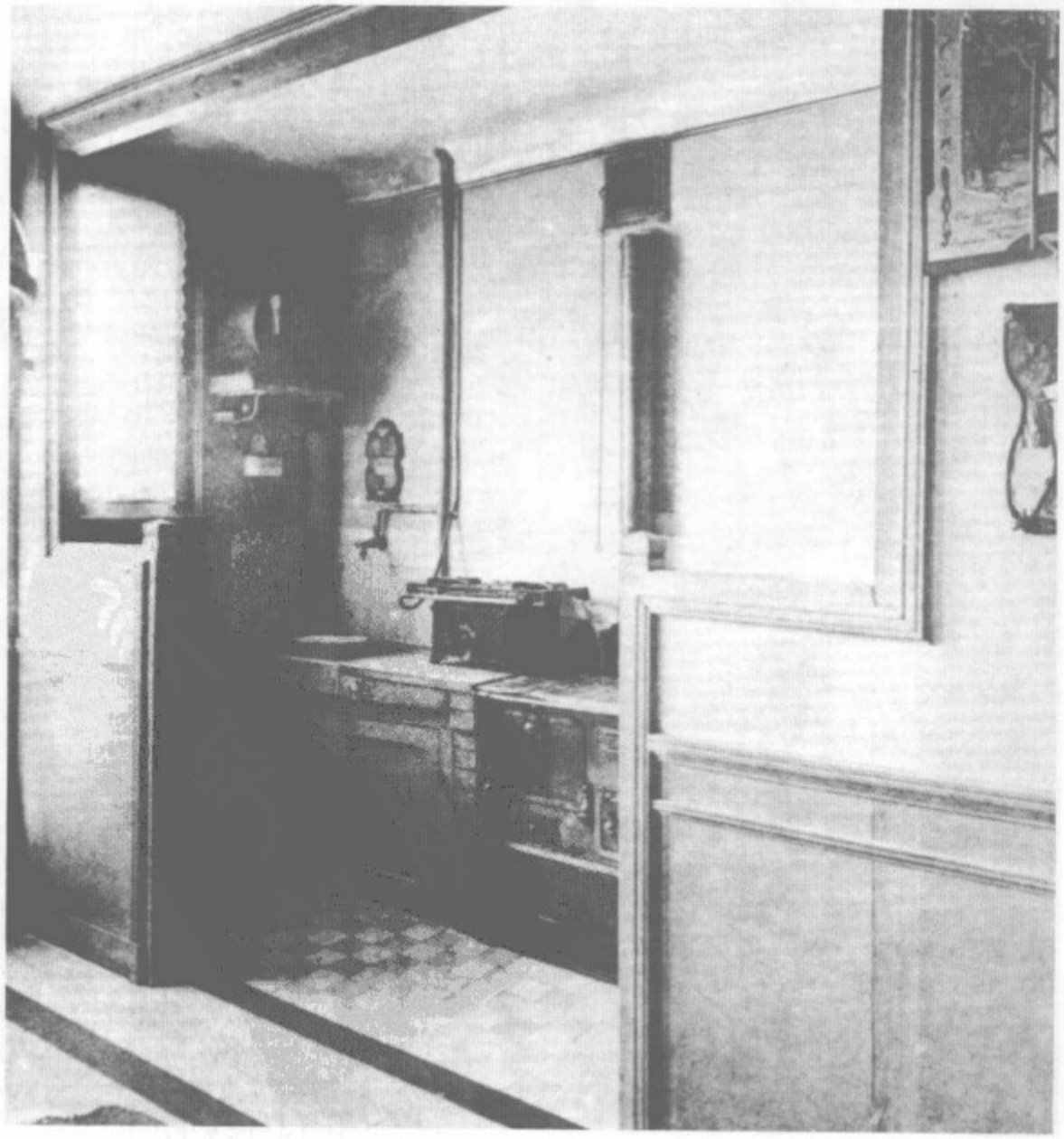
参赛作品先经过淘汰筛选剩下25个，然后又经过筛选剩下7个。1万法郎的大奖由一位赛前并不被看好的竞争者获得，他叫阿道夫-奥古斯坦·雷伊，其方案的主题是“一切为了人民”；9000法郎的二等奖由亨利·普洛文索获得。这两个人都是巴黎美术学校的毕业生，并且都拥有政府颁发的执照，而且，普洛文索还是索瓦热的挚友。来自蒙马特尔（法国巴黎北部的一座小山和一个区，位于右岸地区。以其夜生活和与梵·高、土鲁斯-劳特累克和优特里洛等艺术家有关联而著名。原属蒙马特尔的村庄于1860年被巴黎兼并。译注）的阿纳托·博多在第一轮即被淘汰。曾以“工业城”设计方案而闻名的托尼·加尼尔进入了第二轮，其设计方案完全实现了卫生学者们的梦想，它类似一个疗养院，没有庭院和天井；建筑物以Z字形排列，以使自然采光最大化；所有的公寓单元都很宽敞，并配备有浴室，这可是当时许多中产阶级公寓中都没有的奢侈设施。

进入第二轮的所有参赛者都很推崇开放式庭院的建筑原则。雷伊以其设计的完美而声名鹊起。通风系统像一个立体街道地图般被陈列开来。厨房尤其复杂精妙；每个都配有垃圾通道、贮藏室、橱柜、淋浴间，还有一个通过过滤通风口与外部保持空气流通的食品室。配套的便利设施也一应俱全：淋浴和浴室，洗衣房和晾衣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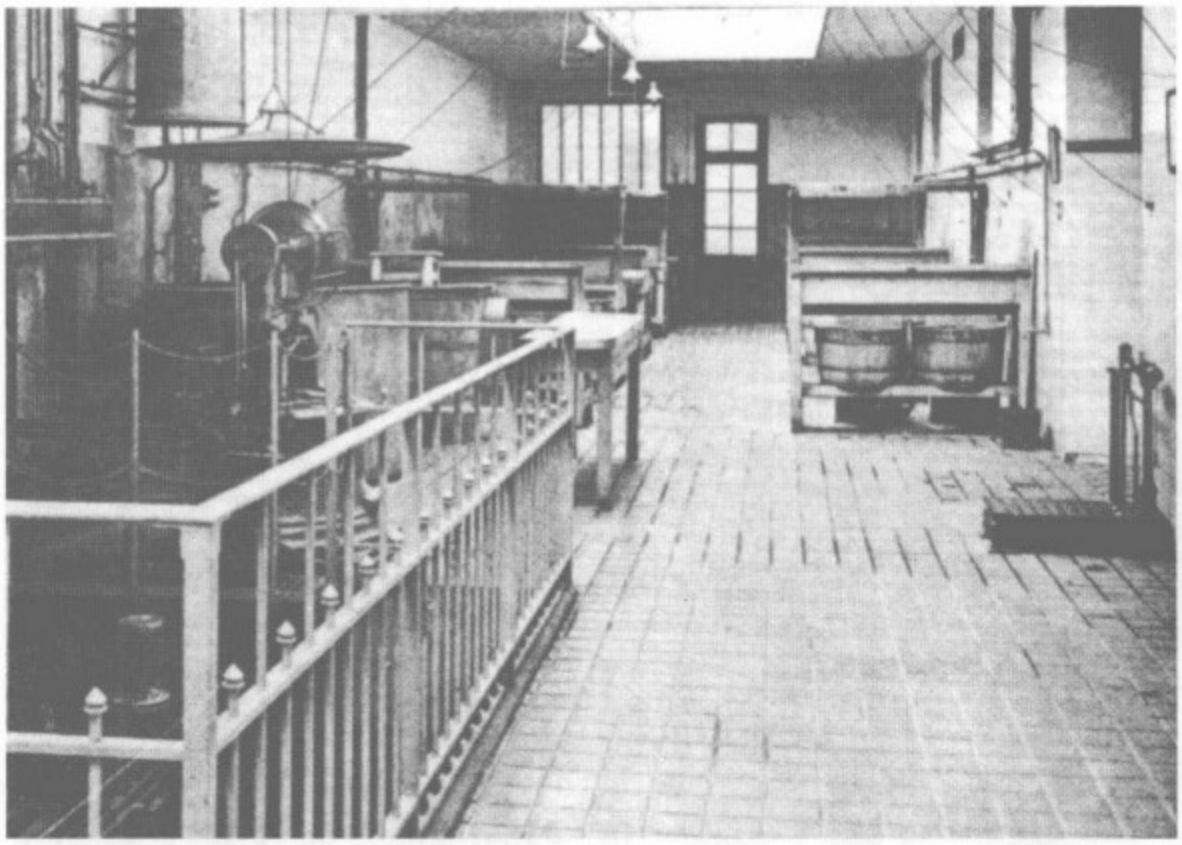
右页图：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小型建筑》。一个人很难想象到，这幢连房楣都进行了特别设计的楼房竟会是一幢低成本的公寓建筑。事实上，这幢楼房是为工人阶层设计的，而且在地下室里就有车间。

自行车棚，讲究卫生的餐馆，会议厅，为单身男女准备的房间，还有晒太阳的屋顶平台。雷伊的建筑理念与索瓦热相似，但他在选择混凝土结构方面比索瓦热做得要更进一步，用混凝土作为主要的建筑原材料在当时是受到“严肃的”建筑师们的鄙弃的，但是雷伊按当时的时尚品位为其附加上了各种各样奇思妙想的装饰，包括伸出的屋顶和天篷。

任何方案都无法回避近30年来卫生学者们一直争论的问题：空间足以容纳整个家庭的公寓，独立的房间，各项需要的合理化。竞争者们在如何处理公用设施方面显然有些棘手。他们是否应该冒着破坏他们神圣的个人积极性的风险，为工人们提供所有他们想要的服务呢？比如，人们会问，托儿所是否会鼓励母亲们放弃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呢？自从19世纪初开始，右翼的社会改革家们就一直在为类似的问题争论不休。



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大型建筑》。A.拉布西埃在1908年在第12行政区为梅森集团基金会建造了一个大型公寓联合体。其中一半的公寓拥有完全装修好了的厨房，通过一个隔断与餐厅分开。对于一个普通雇员的家庭主妇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比传统的结构设置更加适合。



计划为工人建造的公寓中通常都包含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实际上很少真正建造。这张照片展现的就是梅森集团基金会在1907年建造的一栋建筑中的图书馆。

“罗思柴尔德竞赛”引发了整个建筑行业的兴趣，赞誉性的文章频频出现。但是，也有一点激起了相当大的抗议，基金会宣布将成立一个支付薪俸的建筑师代办处，这一举动被各建筑行业组织的领导人看作是对建筑业独立的社会行业地位发动的一次攻击。但是基金会并未注意到这些抱怨之声。事实上，代办处是作为一个团队来运作的。包括大楼巡查人员在内的和建筑有关的所有雇员的名字都被刻在一块大理石装饰板上，置放在基金会的每一栋大楼的入口处。

首先破土动工的建筑位于第11行政区，有76套公寓，于1907年落成。1908年在第19行政区建造了一栋有102套公寓的大楼。1909年，在第12行政区一幢拥有321套公寓的建筑拔地而起。1912年，一栋有206套公寓的建筑在第15行政区开工建设。1913年到1919年，在第18行政区建造了一幢有420套公寓的楼房。这些房屋因其“买得起”以及拥有理想化的便利设施而为人瞩目：配有先进机器的洗衣房，其中包括了热烘干机；淋浴和浴室；备有预防性药品的诊疗所；3岁到6岁孩子的托儿所；放学后的托儿机构；家庭理财课程；每日提供两顿热饭菜的厨房，其提供的饮食健康、合理。这些集体便利设施中的某些项目我们在吉斯的空想共产村庄中均可以找到。

两位获奖者通过竞赛也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大奖的得主雷伊开

不知疲倦的拉布西埃与他的伙伴隆雷，在1911年为单身男子设计了这幢拥有743个房间的公寓住宅。在巴黎的未婚男性工人们第一次有了体面的房间居住，并且可以得到各种服务、利用各项便利设施。

始大力宣扬“买得起的住宅”的好处，为工人们谋福利。他参加了数不清的会议，还写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敦促市政购买土地来建造低成本住宅。

巴黎市竞赛

1912年8月，巴黎市举办了第一次“买得起的住宅”设计有奖竞赛。举办此次竞赛的灵感直接来自于1904年的那次竞赛，新闻界和公众一致认为这次巴黎市竞赛是成功的。总共提交了111个住宅设计方案，58个位于第15行政区的一片土地上，53个在第13行政区的一片土地上。前者的设计要求是多层公寓建筑，户型分五类，范围从有厨房餐厅的四居室公寓（最小面积592平方英尺）一直到带有小厨房供单身汉居住的小型公寓（最小面积193平方英尺）。而后者的设计要求则明显低于前者的水平，其中暗含着对穷人的轻视。尽管组织者细心地提醒参赛者其作品绝不能使人想起“群居的陋室或是老式的民房”，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住宅未来的居住者们根本没有实质性地拥有空间和便利设施。最小的一套公寓中，包括有一间公共休息室，一间带有可移动低隔断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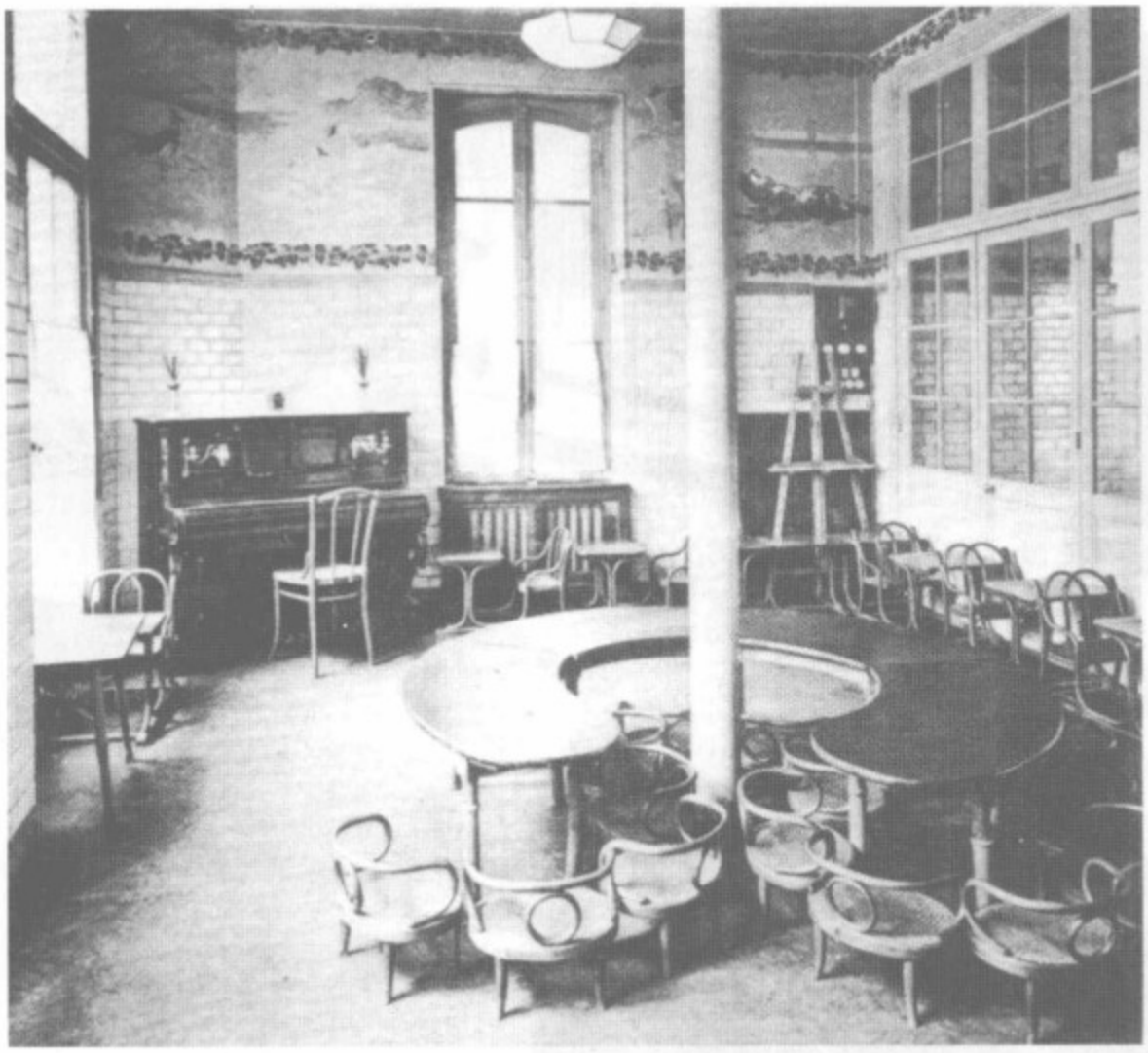
Hôtel Populaire Hommes, 94, rue de Charonne, XIe arrondissement, PARIS

居住面积的下限是322平方英尺。真不知“权威们”给了建筑师们怎样的暗示，以致他们可以不必负为公寓设计配备厕所和自来水龙头的责任。

莫里斯·佩雷特-多尔蒂赢得了1.5万法郎的大奖，其设计的建筑位于第15行政区，有143套公寓。在建筑的两端有两个服务性庭院，车辆可由此进入；中央有一个广场。乔治·阿尔班克和欧仁·贡诺则以他们在第13行政区土地上的设计而获奖。他们能得奖是不是因为他们对节约建筑成本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注呢？公然无视所有卫生学者的警告，他们为每两套公寓只设计了一个厕所，甚至有的情形下是三套公寓一个厕所。获奖使这三位建筑师开始了他们低成本住宅建设的职业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与巴黎和塞纳河地区的“低价住宅公共办公室”的赛里尔联合起来，赛里尔是这个办公室的头儿。

在巴黎市这次值得记功的有益尝试之后几个月，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长亨利·谢隆出席了标志住宅工程全部完成的庆典仪式。试图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激进政府对这项工程始终兴趣浓厚。家庭住宅公

C G
EUBLEMENT



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大型建筑》。这幢建筑的特色在于其典范的托儿中心，托儿中心的设计符合当时的各项健康标准，比如大扇的窗户和白色的瓷砖。弯曲木椅子来自著名的奥地利索思耐特兄弟的工厂。

左页图：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大型建筑》。这幢位于第13行政区内的建筑是由索瓦热和萨拉森在1909年设计的，在避免过多的外部装饰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是幢混凝土建筑，房顶用于日光浴的天井是其显著的特征，装饰物仅限于建筑的正面。

司已经环绕第13行政区的中心花园建起了40栋小别墅，专为大型家庭（有6个或更多的孩子）而设计，每栋小别墅有3间卧室，居住面积215平方英尺。而在此前，从来没有向工人阶层提供过这么宽敞的住处。这些小别墅还可以租住。

让·瓦尔特是一位30岁的建筑师，他的父亲是一位出生在阿尔萨斯的新教徒实业家，瓦尔特在法国东部名气很大。他成功地建成了低价住房，其价格令他的同行们难以置信：带有厨房、地下室和阁楼的三居室住宅只有2400法郎。他的同行们也无法理解他关于大规模制造某种住房组件和使建筑工地合理化配置的理念。

迈向“住宅机器”

如何建造足够便宜的单一家庭住宅来租给那些因低薪而无法获得物主身份的人？瓦尔特的理念指出了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时期，许多颇具勇气的调查人员开始找到低成本大规模建设的工艺技术。1913年，《不动产和东部建筑》杂志这样写道：“大型家庭住宅应该可以通过房屋构件的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得到解决，这些房屋构件包括：木制的、钢铁的、复合的、加固混凝土的，或预

这片公寓联合体是为每日收入不超过6法郎的家庭而建的。与之邻接的是一个公共澡堂，每天开放。

左页图：加斯顿·莱·福尔，《房租经济下的大型建筑》。这幢建筑是普洛文索和合作人在1909年设计的，完全符合同一时期中产阶级建筑的风格。用料讲究，巨大的入口、石头阳台和旨在赞颂劳动工人的浮雕是其显著的特色。

制板的框架等等；门板和窗扇；标准化五金用品；铅管制品和其他设备。标准化、易于安装的原材料及物件的使用可以显著地节约成本，而在外部构造上具备同样的多样性，足以满足4位设计师的不同设计要求。”当然，这种具有实际意义的观察报告是无法获取更高层次的关注，更不可能进入巴黎美术学校的课程的，那里的注视焦点永远是集中在皇家论坛上的。

不过，政府对于这类微不足道的问题还是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就在同一年，也就是1913年，商贸刊物上登出声明，表示劳工部将在1905年向那些研究开发出适用于低收入家庭住宅建设的最佳方法、最佳原料、最佳技术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们颁发奖章。

如果这个很有意义的颁奖仪式能如原计划的举行，那么头奖毫无疑问要颁发给一位资深建筑师，他就是乔治·克里斯蒂。克里斯蒂出生于1853年，在战前是法国国家建筑公司的副董事长，还是几家建筑刊物的编辑，在“住宅机器”这一理念的发展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科布西尔之前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米诺别墅”这一

这幢建筑物上的标语写道："我对法律怀有敬意，但警察们基于房东的利益践踏了法律，除非被武力驱赶，否则我决不离开。"

概念，但后者却从未把这一荣誉交还给他。所谓的多米诺住宅是一种一层楼、有4间屋的单一式住宅，根据严格限定的计划按每4栋为一群体进行建造。克里斯蒂写道："要解决低价住宅的问题，只能依靠发现经济化的建筑方法，即使用标准化的、分类的原材料，我将其称之为住宅建设的工业化方法。"

终于，191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开始产生结果。1914年5月，成立了一个巴黎和塞纳河地区专门的公共办公室来调查研究低成本住宅的问题，并监督管理通过发行两亿法郎债券募集资金来建设的住宅工程。这一公共部门并没有无视私人机构研制开发出的各种住宅建设方面的技术。罗思柴尔德基金会的施奈德和勒博迪基金会的拉布希尔成为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办公室就像罗思柴尔德基金会的建筑办公室一样，是一个联合代理机构。1905年竞赛的获奖者普洛文索和贝斯纳德也成为后来在叙雷纳的花园公寓的建筑师。

但是，请不要误解。第一眼看到"公众建筑竞赛"时可能会让人觉得社会公益性工程很快将大量建成，但业内人士完全了解市场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所有的观察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20世纪的建筑工业将主要以豪华建筑为主。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时间里，人们的生活费用上涨了，房租自然也无法在总体的价格上涨中幸免于难。更高的房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这种来自工人们的反作用力正是各个党派努力组织促成的。1910年1月6日，“租房工人联盟”在法国克里西的劳工介绍所成立，联盟的成立要归功于一个名叫康斯坦的人的努力，他是当地劳工关系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也是运输业的一个工人。无政府主义的暴乱已是过去的事了，以往的政治行动已退化为小打小闹的反抗，尽管也有人将这称之为犯罪。很快，房客联盟就几乎遍及了巴黎所有的行政区，而二十多个市郊的公社更是印刷了一份纲要，左翼的政党最终也不得不表示支持。这份纲要呼吁禁止没收工人们的家具；取消每年必须送给看门人的“礼物”，也就是所谓的“上帝的便士”——这是一种“钥匙费”，当新房客搬入时付给看门人的；确定租金支付周期；调控租金；房主们出资清除不利健康的建筑。

乔治·科生和“房客波尔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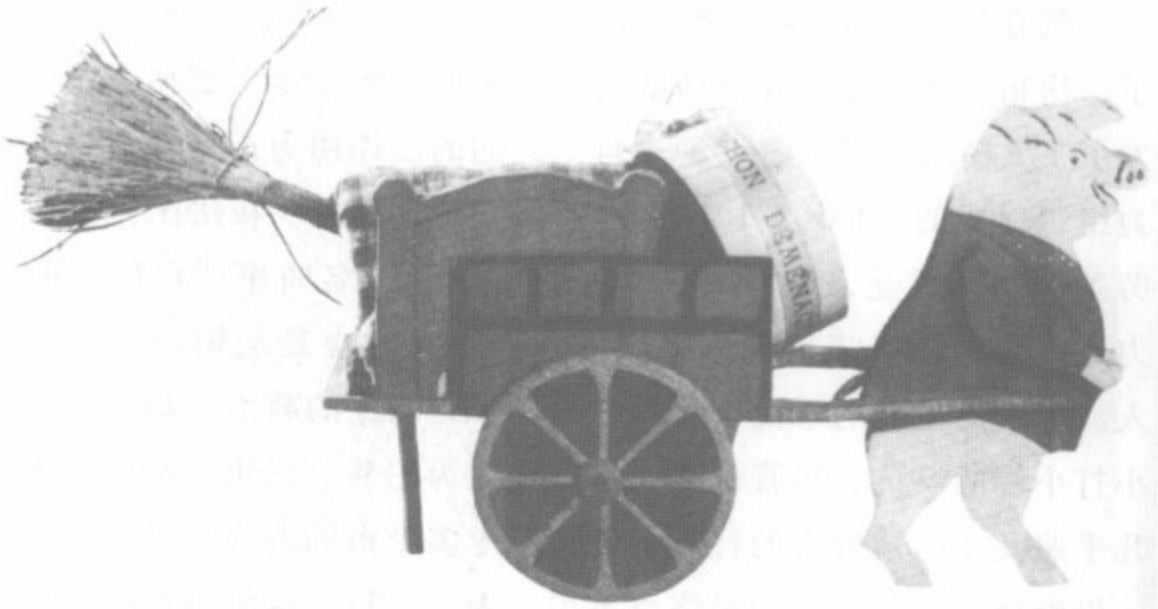
乔治·科生早在1911年就成为了房客联盟的秘书长，他是巴黎的一个工人，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活动家。科生是个具有独特幽默感的人，在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中，他所展现出的智慧无人能及。1913年，他在被驱逐出最初的工会组织联盟后，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和国际房客联合会”，他在巴黎和外省组织上演了一系列蔚为壮观的示威游行活动。

19世纪90年代“反房东联盟”的美好时光似乎再次显现，当时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为了逃避拖欠的房租而采取的“午夜搬家”战术。许多流行歌曲中将科生荣尊为巴黎的罗宾逊；《小猪》（其发音与科生的姓一致，很显然是对歌曲作家们的莫大恩赐）和《房客波尔卡》是当时所有工人阶层居住区内到处哼唱的旋律。亲眼见证了科生所作所为的人会唱起这样的复句：

小猪去那儿了，搬出去，
搬出去，搬出去，
小猪搬到那儿去了，
趁着月光。

或者是

普恩加莱先生，



木头和纸板做的玩具，1900年。乔治·科生的无政府主义幽默传奇煽动起了反房东的浪潮，但随着传奇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峻”的政治活动方式。

是共和国的总统，
而小猪先生，
是小公寓的总统。

再或者是

是小猪，是小猪，
他可不是房东的小猪。
小猪帮一个同志搬家，
小猪是无产者的朋友，
小猪对政府嗤之以鼻。

科生最传奇的一幕就是在1913年7月，在房客联合会的组织下，帮助欠租18个月的8个家庭偷偷搬走，这8个家庭共有35个孩子。科生将他们一一安顿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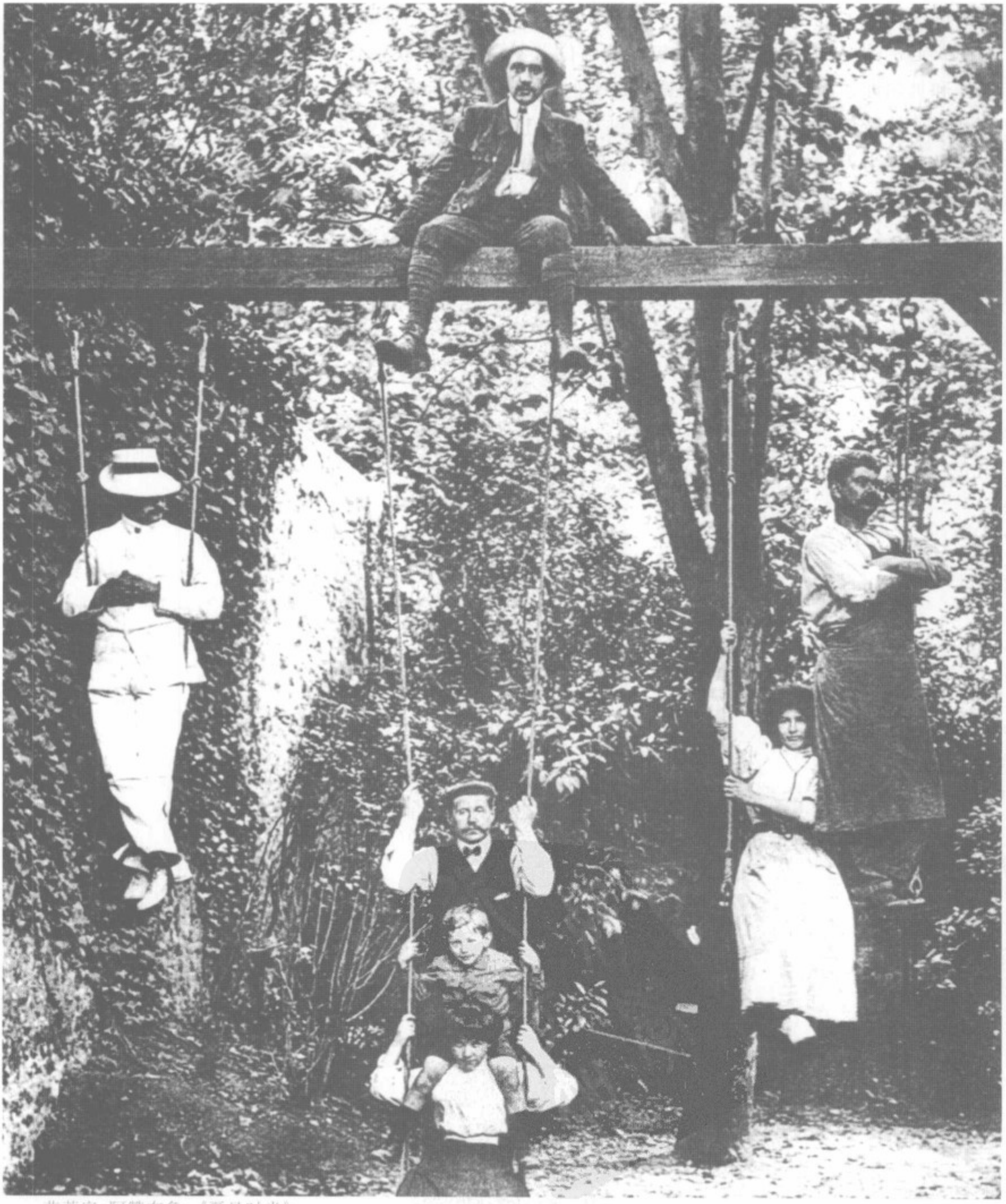
住房问题也引起了那些不太张扬个性而又举止文雅的人士的注意，权威们对这些人的呼声是无法回避的：他们是法国式家庭的拥护者。1896年，雅克·贝蒂容博士成立了“法国人口增长国家联盟”，这是一个最受尊重的团体，其成员中就包括谢松。这个团体十分冷静地限制着改革个人财产税制的呼吁。中层阶级的大型家庭被迫住在更大的公寓中，承担的税赋比小家庭更重。支付了高额的个人财产税并不标志着拥有大量的财富。

大众传媒对科生的举动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因为它们自己的记者也遭受到“无家可归”这种流言的羞辱。1912年，发行量达到60

万份的法国四大日报之一《晨报》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探讨可以买得起的房子的问题，其成员包括了两位“罗马奖”的获得者：内诺和贝尔涅，前者是罗思柴尔德基金会的建筑顾问，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但事实上，并没有工程破土动工，建筑工业并未发动起来为人民大众建造房屋。工人们所能做的不是居住在舒适的屋中，而是上街游行。

米歇尔·佩罗

罗歇-亨利·盖兰



艾蒂安·阿赞布鲁:《夏日时光》。

4
幕　后

前言

左页图：布雷范纳：《文艺复兴时期的门廊》。

路易·迪蒙告诉我们，《人权宣言》的出版标志着个体的胜利。然而，在19世纪，“个体”一词的范畴仍是模糊和抽象的。直到很久以后，公民才获得了他们的全部权利。普选权最终于1848年被确定，此时，普选权还只是意味着普遍的男性选举权。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直到1913年才被承认，而此时法律才最终规定允许使用投票站和使用信封来装选票。

个体缺乏法律上的保护。国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或修改宪法，它本应更进一步地朝着确立个体权力的方面努力，但它却屈从于“环境”，或者，在意义更为深远的层次上，屈从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激进民主主义。这种极端激进的思想阻挡了人身保护权真实原则的传入，这一原则在当时的法国法律中仍属真空地带。然而，对个体人权的关注是确实存在着的。1792年，法律宣布，私人住宅神圣不可侵犯；1795年，夜间搜查被禁止执行。私人住宅和夜里的时间：这些前提定义了个人隐私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至此，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才得到了承认（个体尊严逐渐有所增强，其标志之一就是，一些丧失体面的惩罚手段被废除了）。例如，同性恋，如果它不以一种和道德标准公开对抗的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它将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

19世纪的法理学家还不能确定，应该如何维护与家庭和当局权力背道而驰的个人权利。相应的个人隐私权一直到相当晚的时期才被认可；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当局才废止了拆看通过公共邮局投递的信件的程序。然而，男人却保留了检查他们的妻子所写的信件的权利，寄宿学校和监狱当局在拆看学生和犯人所写的信件时也丝毫没有良心受到谴责的意识。

现代传媒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阿曼德·卡雷尔曾与埃米尔·德吉拉尔丹进行决斗，原因是后者“威胁要在他自己的报纸《新闻

界》中出版卡雷尔的一篇自传”。卡雷尔最终在决斗中被杀死了，就这样，他为了自己的个人隐私权而赔上了宝贵的生命。新闻界渴望获得那些与私人丑闻有关的杂文，在面临这样的攻击时，人们感到有必要逃避、使用笔名甚至采用欺骗手段。整个19世纪就好像是一场假面舞会。司汤达曾写道：“舆论占据上风，在某个方面能获得自由，但是它的缺点却在于对私人生活干涉过多，即使是没有私事的地方它也会穷追不舍。”

“求知意志”——在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世纪里，人们一直坚持着这一点，总是密切注视并倾听着方方面面的内幕消息——也引发了无数的、对各种各样的个人和团体的调查。对个人的保护也因此成为当务之急。19世纪初期，一场极具意义的辩论在夏朗德省展开了。当地医院的主任医师，鲁瓦耶-科拉尔，想为每个病人都建立一份个人的、完整的医药和社会历史纪录，但是院长却极力反对，他认为这是宗教裁判所批判的一种现代形式的东西。在这场辩论中，我们隐约瞥见了一丝现代的作风，在这种现代作风中，科学的力量正同自我关注一起同步向前发展。

不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道德观念中，个人主义几乎到处都占据上风，尽管它极易随着周围的环境和场所而发生改变。法律总是在现实的背后缓缓而行。越来越多的人抗拒着社会和家庭的纪律，并且宣称他们需要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个人想要独自睡觉，能够在平静的环境中读书看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穿衣打扮，随心所欲地来去自由，想怎么吃喝就怎么吃喝，以及爱自己心中之所选，无论是谁。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去追求他们认为合适的幸福。对于这一权利，民主主义给予其合理性，市场刺激着它，而移民也推动着它的发展。城市，这一新的边界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约束，刺激着野心，并且削弱着信仰。作为自由的创造者和幸福的施予者，城市使人着迷，尽管它经常扮演残忍后妈的角色，受到来自道德家的批评和抨击。荒谬的是，城市不仅产生了人群，而且还产生了孤独。它们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变革。

花花公子、艺术家、知识分子、流浪者和行为古怪的人都抗拒大众的因循守旧习性。然而，除了这些少数具有象征性的反抗者之外，其他的、较大的团体却坚持要求存在的权利：青少年、妇女和无产阶级。青少年首先是向家长制度挑战；让我们希望他们的哭喊和埋怨呈现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吧。无产阶级的主要批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制度，然而，在这个时期，尽管资产阶级意识的力量特别强大，但是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劳动阶级愿望的爆发，或是限制劳动阶级事业的多

样性。1890年,维也纳的女工们向她们的老板宣告:“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就像你一样。”自由主义者联盟采用了新马尔萨斯主义关于节育的观点:“大家庭带来的往往是不幸和苦役。所以,尽量少生孩子。”法国总工会的传单也规劝妇女——只有当你选择做母亲的时候,你再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达到了巅峰。所谓的自由环境,其产物不仅包括身体的自由——一种对自然和运动的体验,还包括自由性爱。自由环境的大胆创新与更多的传统观念发生着冲突。

尽管个体的法律权利可能曾一度微弱,但是,自我却获得了新的深度和复杂性。启蒙运动构想出大体上人的概念,即理智的稳定产物。浪漫主义却反对与众不同的个人特征,反对那些充满梦想的夜晚的神秘事物,反对亲密交流的流动性;它使直觉恢复为一种知识的模式。精神世界成为个体所追求和冥思苦想的一个目标,“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片固定的太空,我的太阳和我的星辰都在其中旋转”,阿米埃尔这样写道。同时,精神世界也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世界得以展现自身含义的媒介——维克多·雨果曾说过:“这是一个人自己的内心,他必须看到那些外在的东西。”无意识思想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并解释其行为关键,与之相比,意识只能被归属到次要地位。即使是社会,有时都要屈服于想象的力量。

19世纪晚期,神经生物学上的发现奠定了以马赛尔·戈歇命名的“纯粹的个体”的科学基础。作为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法国的医学犹豫着不肯接受德国的人体主义;法国人仍坚持着肉体和心灵之间的界限,尽管这条界限即将瓦解。难道这种坚持就是造成对心理分析的最后抵抗的原因吗?或者,难道那种抵抗来源于——不愿把家庭的性动态学看作歇斯底里症、精神衰弱症,或更为普通的个性形成的原因吗?又或者,抵制心理分析学的发展是因为,法国的家庭结构要比弗洛伊德笔下维也纳的家庭结构更为变化多端,而父亲的角色也要相对弱一些吗?无论如何,法国似乎想在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上树立一个特殊的例子。

每当大众运动的重要性逐渐增长时,个体便会把它当作一项政治的、科学的并且首先是存在的价值来把握。阿兰·科班将邀请我们来探讨这个有关自我的特殊发现,以及它改变自己同其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真实的戏剧在历史展翅飞翔的过程中上演了,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幕后的情节上去吧。

个人的秘密

左页图：迪斯德里：《分门别类的名片》。在迪斯德里制作的那些名片中，个个都神情傲慢。这些名片看起来必须在家庭相册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里，那些摆姿势的技巧显得非常的老练，也成为自我表现的策略之一。

整个19世纪，个人身份的意识变得越发清楚，传播也更加广泛。这一变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个人命名所依据的体系的历史。早在18世纪，姓之前的名字的种类就已经增多，这一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与天主教教派的宗旨背道而驰，因为后者一直要求限制教名的范围，以突出那些最伟大的圣人们的模范品质。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趋势并没有出现较大的中断；它甚至起到了加速一项已在进行当中的程序的作用。

一个人自己的名字

随着数十年时光的流逝，新的名字以加倍的速度被引入西方世界，这反映了一种逐渐增长的个性化的需求，一种希望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有所区别的愿望，以及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制定的新标准的渴望。确实，某些名字的流行是垂直传播的，从贵族向下到人民大众，从城市到乡村；然而复杂的，但却日益清楚的社会阶层结构却促进了这种世俗化的发展。

同时，人们不再需要遵循那些控制着家族内部名字传播的规则。从传统上来讲，孩子一般按他一个教父的名字来命名，而实际上通常是跟随他的祖父、叔祖父或是婶祖母的名字来命名；大儿子则通常取他父亲或是已故祖父的第一个名字为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夸大了拒绝服从这些规则的趋势，因为在乡下，这些规则总是要比城市里严格得多；然而，新兴的流行时尚确实削弱了旧规矩的影响。为孩子命名的惯例的衰落反映出，在一个名字的影响力下，宗教信仰的力量逐渐衰弱了。因为一个名字赋予了孩子世袭的美德，从而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这种宗教信仰的衰弱使得名字更趋向于个性化的发展。

右页图：《揽镜自照》，1890年。就像那些着迷于这幅画中女子的内心情感、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欣赏者一样，这位世纪末的画家也陶醉在她那两片朱唇所传达的深刻意味之中。

在复杂的家庭结构持续发展，而由于缺乏可用的名字可能造成混乱的地方，命名的体系有时候会显得非常陈旧和过时。这种现象曾经在法国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出现过，尤其是在热沃当地区。在这里，一个人的教名很快就会被忘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普通的昵称。源于父名的名字和“乌特萨尔”或者“梅苏”联合起来，一个和妻子的父母一起生活的男人往往会放弃自己的姓，而改姓妻子的姓氏。人们开始使用洗礼名和姓来记录一个人的出生证明；后来，即使是在乡村地区，这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了。昵称的使用则逐渐局限于一些少数团体，如艺术家、吉普塞人、妓女和罪犯——而其他所有团体，像伴侣或者熟练工人（他们参加了著名的手工业行组织），则按照古老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意地为他们自己定义。

对于正在前行中的姓名多样化进程，个性化的要求当然不是唯一的解释。城市化加大了把同名的一个人误认为另一个人的风险。文化教养和教育上的进步又在个人与他或她的姓和教名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纽带。学生的书包、水杯和笔记本，青春期少女的印章和绣花亚麻布嫁妆，以及寄宿学校学生校服上所绣的姓名的首写字母——这些惯例以及其他的一些习惯都着重强调了教名和姓的重要性。随着在结婚证明上合法签名的新娘和新郎数量的增加，这些新出现的名字也能统计出来。在王朝复辟时期，人们开始在枫丹白露森林的岩石和树木上刻下他们姓名的首字母。这些标记一般都是那些地位卑下的人留下的，因为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地球上的伟人们不一样，将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于是他们指望在自己死后，能够依靠这些镌刻在树干和石头上的姓名首字母的影响力来使自己永生。

在19世纪下半叶期间，邮件促进了个人记号和私有财产标记的推广。到1900年时，每年大约有800万张明信片被寄出。名片和个人记事簿的广泛应用也能反映出类似的变革迹象。即使是家庭宠物也都逐渐有了名字。早在七月王朝时期，欧仁妮·德盖兰就为她心爱的小狗分别取了优雅的名字。

镜子与形体特征

渐渐地，关注自己的肖像不再是一项特权。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全面的、关于镜子广泛而多样用途的研究。但是，还是有很多迹象表明了个人关注自我的历史重要性。在19世纪的乡村，理

发师是唯一拥有一面大穿衣镜的人，而且，这面镜子的使用权还仅限于男性。沿街叫卖的小贩向妇女和姑娘们兜售小巧精致的镜子，她们可以借此来审视自己的容颜，但是，能照全身的大穿衣镜在乡村地区还是很少见的。在乡间，人们仍然是通过其他人的眼睛来了解自己的形体特征，依靠直觉来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因此，韦罗尼克·拉乌姆感觉到奇怪，人们怎么能够“生活在他们自己从未仔仔细细观察过的躯体里”。这个问题应该向乡村社会的历史学家来请教。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存在于乡村社团中的、关于使用镜子的禁忌——农村的人们相信，如果一个孩子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那么他的生长和发育将会受到阻碍；如果在一个人死后的那一天里，有任何一面镜子没有被遮盖住，那么将招致不幸。

在经济富裕的阶层，长期以来，年轻女子即使是在浴缸的折射面里看到自己的裸体，也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她们在沐浴的时候，浴水会被一层特别的香粉笼罩，以避免瞥见自己身体这种不适当行为的可能性。如此这般的禁忌却更增添了人体的魅力，更加容易勾起性欲情感，人体的镜像变成了一种困扰。而在豪华的妓院里，镜子随处可见，再后来，镜子出现在社会精英人物的卧室里，安装在大型衣橱的柜门上。

肖像的民主化

在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肖像的传播。正如吉泽尔·弗雷欧德所写的那样，肖像的传播是“个人努力坚持其个性化和洞察其人格的直接结果”。拥有并陈列一个人的肖像也是一种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的方式，因为肖像确保了一个人的存在将永远持续的一些痕迹。精心描绘的肖像为那些世界性的成就提供了证据；它使得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清楚地为世人所了解。对于那些看重自己的中产阶级，比方说对于存在于另一个时代的，在一个朝代的创始人中扮演着英雄角色的贵族来说，问题不在于该如何在完整延续的世代中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是如何将个人的成就转化为整个家族的声望。作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代，19世纪见证了许多伟大商业世系的创建和兴起。为了与过去的伟人媲美，模仿贵族行为举止的愿望也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肖像艺术的风格。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工艺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越发向往拥有自己的肖像，以至于肖像既是一种生活用品，又

成为施展权利的工具。

曾一度为贵族和富裕的中产阶级所独享的肖像，在18世纪末期传播到社会的其他阶层；与此同时，它也呈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特征。微型人像的出现大受欢迎；小盒子、大奖章和化妆盒，所有这些物品都装饰上了心爱的人的微型图像。巴贝·德奥雷维利就曾指出，复辟时期的中坚分子对以珠宝装饰的肖像有着狂热的爱好。徜徉在圣·杰曼林荫大道上的时髦淑女也把她们的肖像放入挂满祖先画像的回廊里，以表达一种革命性的不认同的象征意义。

从1786年到1830年，吉尔·路易·克雷蒂安的“自然描绘学说”促进了肖像艺术的普及，至少在巴黎如此。运用这一技巧，一个画家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将一名模特的轮廓完全勾画出来。这幅图像接着又可以被转刻到一块金属模板上，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生产出一系列精美的雕饰肖像。只要你想要，你的肖像可以被印刻在木头上

明信片和照片的出现，使得个人在分发自己的肖像时，不再感到不好意思。19世纪早期的贵族奖章也结束了它长期以来以这种合成形式存在的社会血统。

PORTRAITS
INSTANTANES
30
Gratuitement

或是象牙上，或者在肖像的轮廓上加上假发、假睫毛和服饰就可以制作成一幅英国式的侧面像。遗憾的是，制作成成品的肖像，尽管大部分都和本人非常地相像，但仍缺乏生命力和生动的面部表情。银版照相法克服了这一缺点，因而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前景，也越来越为社会所需要。1839年，路易·雅各·曼德·达盖尔就此申请了一项专利，他的这项专利使得他能够在曝光15分钟之后，就在一块金属模板上形成一幅肖像，紧接着他制作的每一幅肖像就卖到了50至100法郎。尽管银版照相法可以制成清晰而精美的图像，但是它还达不到轻松复制的水平。

直到摄影术发明，肖像的民主化才真正变为可能。此刻，普通百姓也才能够第一次拥有并散发自己的相片。于1841年首次取得专利的摄影工序，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吸取了许多改良的技术，从而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曝光的次数逐渐地减少，到1851年，瞬间快照的技术获得完美成功。1854年，迪斯德里开发了名片的格式（6cm × 9cm）。摄影术极大地拓宽了由银版照相术率先打开的市场。截至1862年，单是迪斯德里一人，每天就要售出2400张明信片。现在，一幅快照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拍成，而拍摄一组12张的照片也只需花上12法郎。即使是在最小的城镇里，都有摄影师开设照相馆。那些在路边摊上工作的巡回摄影师每照一张快照只收1法郎。

描绘自身和拥有自己相片的能力提高了个人对自我重要性的认识，并且使得个人要求一个社会位置的需求民主化了。正是因为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需求，摄影师们把他们的照相室转移到了剧院，装上诸如圆柱、帘幕和基座这些附件，开始为人们照个人的、摆出各种各样夸张姿势的全身相。1861年（亦即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开国年）以后，一些摄影师甚至提倡骑在马背上照相的做法。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说的那样，这种对姿态、手势和面部表情——总之一句话，姿势——的戏剧性要求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一种变革。数百万的肖像相片被拍摄了下来，并且被个人虔诚地收藏在相册里，这些相册建立了新的、完全改变了私人生活范围的标准。它们教会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审视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自己的双手。肖像相片促进了学校里所教授的形体规律的建立，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感性准则由此产生——从此刻开始，我们的祖先依照相片来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

照片记录了核心家庭内家人感情的加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孩子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和冗长的准文学作品中的主角。

将近19世纪末期时，欧洲突然被数百万计的明信片所淹没。这些明信片使亲朋好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并且让一个人能够更容易地拓展其交际圈。它们还被收集进纪念册。明信片的铅版印刷格式让写信不再是件苦差事；对于那些在写信表达感情方面存在困难的人，明信片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

迪斯德里和他的追随者们清楚地知道如何在相片中突出母亲的角色。在这幅相片中，摄影师特意把孩子们安排成一座金字塔般的形状，以充分强调这位母亲穿着的裙衬的体积。

行为举止，而思想家也认识到那些姿势同样隐含着深刻的意义。

肖像相片同正式的绘画一样，都被同样的规则所支配着：追求理想化的外观，拒绝丑陋。在1855年的博览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发疯地想要获得修描相片的技术，而这一技术在1860年以后便成为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相片中人的面部特征被柔化了。令人尴尬的雀斑、皱纹和粉刺从脸上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光滑柔润的容颜，整张相片都笼罩着一种优雅的艺术气氛。即使是在乡村地区，一种新的理想美也在向传统的美学规范发起挑战。

家庭相册阐明了血缘关系的构架，巩固了受到经济发展威胁的团体关系。突然闯入社会新时期的相片改变了人们设想生活进程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时间的认识。苏珊·宋塔热注意到：一张相片就是一种死亡的象征。相片更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而对即将逼近的晚年生活的预知，又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对待老年人的态度。

相片能勾起人的回忆，从而也改变了思乡之愁的本质。大部分人第一次能够看到久已过世的祖先和从未谋面的亲戚的肖像。相片也让一个人能够看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们青年时期的梦想成为可能。家族回忆的特征也随之产生了变化。象征性地拥有心爱的人的

相片传递着深厚的感情。视觉上的接触变得比身体的接触更为重要。有了相片，即便心爱的人不在了，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也与以往不同了。死去的人的相片能减轻人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安抚心中的悔恨。

最终，新的技术让裸体肖像增多了，现在人们比以前更容易欣赏到裸体艺术。性欲刺激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证据就是“1900年裸体像艺术”的流行。立法者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变化，早在1850年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大街上销售淫秽相片。1880年以后，业余摄影爱好者也能够取代专业的经营者了，因此，照相的姿势变得更加随意、不再那么精心地安排了。所有的私人生活都暴露在镜头前面，摄影师对亲密场景的爱好也更加不受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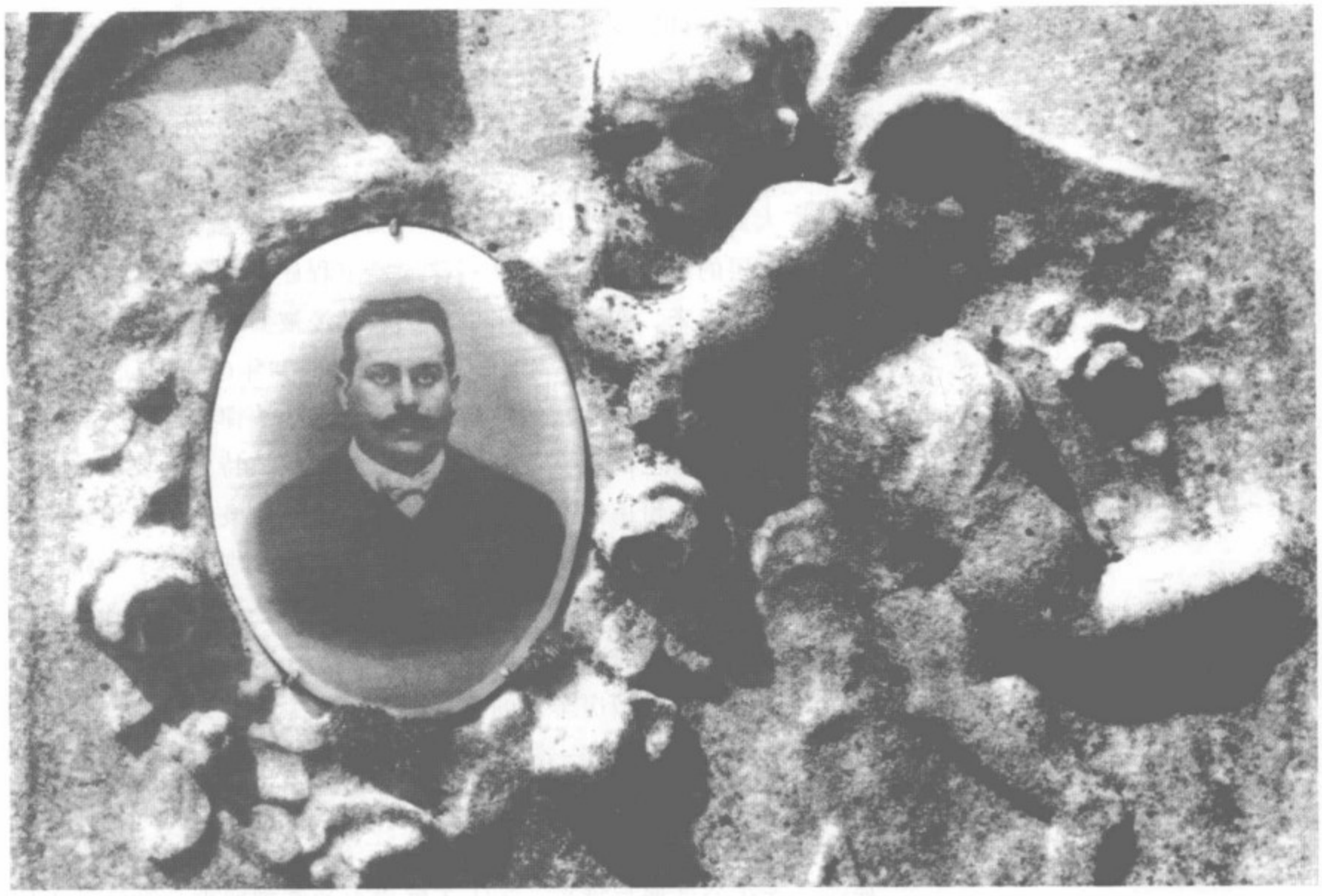
家庭相册中的每一张相片都是巩固家庭关系的一种手段。在兄弟姐妹相继分离、各奔前程之后很久，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将再次唤醒温暖的回忆和情感。

永久的纪念品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永垂不朽，并且记录下自己存在的一些痕迹，这种愿望也同样能在公墓里得到证明。菲利浦·阿利埃斯曾经探索过19世纪早期个人葬礼的盛行和一种新的葬仪的出现。在这里，我对个人的墓志铭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全新的东西。这种新式葬礼修辞的传播方式直到现在才逐渐变得明显起来。在缺乏投票权的君主专制时期，赞扬已故男性，如丈夫、父亲和公民的优点的墓志铭变得更为寻常。隐私不断发展的重要性被如实地记录在这些特殊的墓碑上。后来随着公墓的扩展和墓石的大批量生产，个性化的墓志铭被标准的格式文所取代，但是作为补偿，小型的盒子般大小的照片被嵌进了墓碑里。

这些变化的发展速度在各地有所不同，偶尔还存在着阻力。阿斯尼埃尔是艾因河（位于法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偏僻村庄，这里的公墓，直到1847年才第一次出现墓志铭。1856年，一个平时被周围的公民极度鄙视的小贵族去世后，他的遗孀在其坟墓周围竖起了一圈栏杆。她的这一做法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就连当地的神父也被激怒了，因为他认为，在他自己还完全不知道他那虔诚的教会执事过世后准确的埋葬地点的时候，有关这位绝对算不上完美的基督教信徒的回忆应该用大理石封埋起来。在那些小范围的乡村教区中，墓碑和墓志铭长期以来都被看作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罪过。1840年，欧仁妮·德盖兰不得不在竖立于安迪拉克公墓中心的白色圆柱周围安置一名警卫，以保卫这块歌颂和纪念她哥哥莫里斯的墓碑。在小教区里，致葬礼悼词之前照旧允许验尸。一名店主在死后能够被赋予任何他喜欢的名声。然而，名声的新持久力却刺激甚至夸大了一些诽谤的谣言。

一条中心线索将所有这些增强自我意识的方法都连接了起来：自命不凡的诱惑，绝对自负的过度膨胀。这一诱惑也许和精英阶层的兴起有联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发现许多其他有关自命不凡的诱惑的征兆：荣誉名册和奖学金倍受重视，在客厅或是公共休息室的墙壁上悬挂名人政客图像成为习惯，甚至是装饰品也受到尊崇，讣告的语气也变得神圣庄严。对于许多地位卑下的人来说，能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是一种相当新鲜的感觉。这个时候，只要是在家里、家族的圈子里，任何人都会摆出一种英雄的姿态；而这些新的野心会变幻为多种形式。甚至一些犯罪行为都能反映出英雄式的



那些老套的、千篇一律的碑文很早就被个性化的墓志铭所取代，而镶嵌在墓碑上的照片确实能够保证一个人的模样将会被永远地记住。想要使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永不磨灭，这种尝试就是意义重大的标志之一。

热望和崇拜。在许多近现代王朝统治者的新普鲁塔克式传记的启发下，奥内·苏尔·沃登的那位年轻弑亲者，在他那令人吃惊的自传开头自豪地写道："我，皮埃尔·利维埃拉，已经割断了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和我的兄弟的喉咙……"

社会控制的限度

对于政府当局来说，当匿名取代人名的时候，鉴别个体的能力就具有了新的重要性。日益稠密和安静的人群挤满了大街，他们现在完全没有了从前那种不自然的神态。人群就像是一个个体的集合在移动着，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都为私人的利益所困扰。复杂人口鉴别程序也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1876年至1879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夺取胜利之前，人口鉴别技术还丝毫没有发展。技术上的缺乏限制了对那些所谓图谋权力的野心一目了然的能力，而那些野心也很可能已经被夸大。一项体

制的建立本来就必须基于重要统计数据的记录（这些记录曾一度由教会来负责，但是这一职责却在1792年被俗化，并于法兰西共和国第三年的雨月28日被编成法典）、每5年草拟一次的人口普查表以及选民名册（只是基于有限的选举投票，直到1848年3月，投票范围才被扩大到所有男性人口，1851年12月这项决议被再次通过）。某些社会阶层的人们还必须遵从特殊的鉴定程序，比方说工人。自从领事馆成立以来，在理论上来讲，工人已经被要求向他们的雇主递交一份手册，或者说是一份工作履历表；1854年6月22日，不顾众多雇主的强烈反对，一项法律被通过了，这项法律准许工人自己保留并拥有他们自己的档案记录。士兵也必须服从特别的要求。仆人也被要求出具一份由前雇主所签署的证明。就连妓女都必须到辖区警察局或是地方自治政府去进行登记。弃婴被分别赋予了一张出生证明和一条证明身份的项链。而旅行者，尤其是巡回旅游者和流浪者，也必须在启程前取得通行证。

针对居住在大型房车里的移居型工人和生活在安德尔省的旅行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一领域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虽说不上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实际上，详细的规则与松懈的执行情况是共存的。个人的学识和见闻回忆继续决定着移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然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加上不断增多的管理要求，鼓励着人们去获取、解读并使用“证件”。这种知识令人耳目一新，随着契约在乡村社会的流行与发展，使得那种你将会碰到一个不知道自己年龄的人的现象——就像那个竟然把他自己的年龄说错7年的农民一样，致使欧仁妮·德盖兰大发感慨：“幸福的人，他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计”——变得日益稀少，不久之后也就更加不可能了。从此，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去计算他或她的年龄。因此，虽然计算不可以预言，但未来至少变得可以计算了。当人们开始明白自己的生命长短时，他们也开始详细地描述私人的历史，而私人历史正是认同自我和展现自我的一个先决条件。

当有必要收集另一个人的详细情况时，最为普通的程序仍然是调查其道德状况，或者至少需要一份有关其诚实和庄重的证明。只要有必要，市长和神父都会被请来裁决一个起诉案件、判定一个雇用的候选人，或者一个预期中的仆人。这就要求这些官员能够提供有关他们城镇的市民，或者他们教区的居民的信息和意见。最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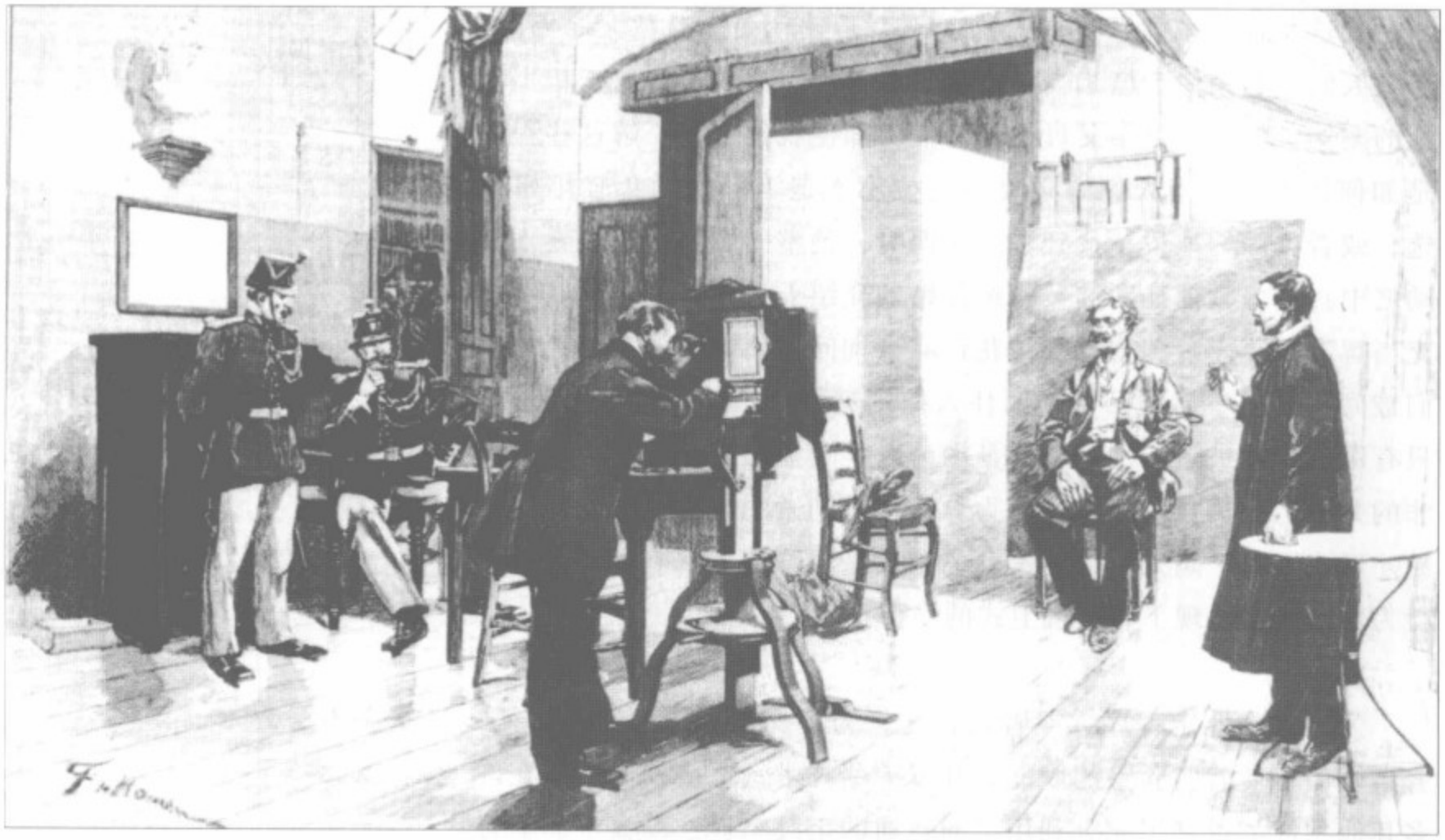
的是，这个惯例虽然造成谣言满天飞，乃致私人生活被大肆揭露，但是人们看起来似乎已相当好地接受了这个习惯。虽然属于相当晚期的案例，但是马尔泰父母之间的信件却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当人们有必要为这位不幸走上邪路的年轻小姐挑选，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一个配偶时，整整一群密探将被卷入行动之中：基督教信徒和神父将担任婚姻介绍人；省里的亲戚姑婆则充当智囊团；律师和公证人被花钱雇来询问他们同僚的意见；官僚们被问到他们下属的品行，而仆人们则被派出去收集留言和传闻。只有医生似乎被遗漏了，也许是因为医学专业人员早已具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信息、建议、压力，甚至是勒索的微妙混合，好不容易才形成了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的私人生活结构，其着魔般的过分行为也向我们展现了它那自卫式的局促不安心理。

警察的盯梢

为了寻求鉴定程序，或者换言之，为了探究个体的不同特征，警察机关行使着实验室的职能，开发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后来在许多其他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普通的市民一样，警察也面临着两个相同的问题：怎样证实一个人的身份和怎样确定另一个人（或者死尸）的身份。

直到大约1880年，一个聪明的人才能够随意改变自己的身份。他甚至可以弄到一张新的出生证明，很简单，他只需知道那个他想要盗用其身份的人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即可。只有一种情况，在相遇过程中有一名目击证人认识被怀疑的对象，才能戳穿这一卑鄙的骗局，而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单纯依靠视觉记忆来识别被怀疑对象，很容易遭到反驳。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使用假身份来作恶多端的坏蛋或复仇者能够让人们胆战心惊了。雅各·科兰的变形、让·瓦里扬的命运和埃德蒙·当泰的策略，很可能无法打动当代读者的心，因为这在现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对小孩子的身份也不能妄下结论，像手镯、项链、美人痣、以及有“灰姑娘”图案的拖鞋等等这些能鉴别身份的标记却是十分重要的。罪犯成了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不说别的，单是确定妓女身份的困难，就导致在执政党统治下建立得到批准的妓院体系的想法成为泡影。

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局继续依靠明显的识别特征



《警察局的照相部》。照相，尽管显然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却无法解决识别罪犯和累犯身份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发明一种有用的、可以明确识别身份的分类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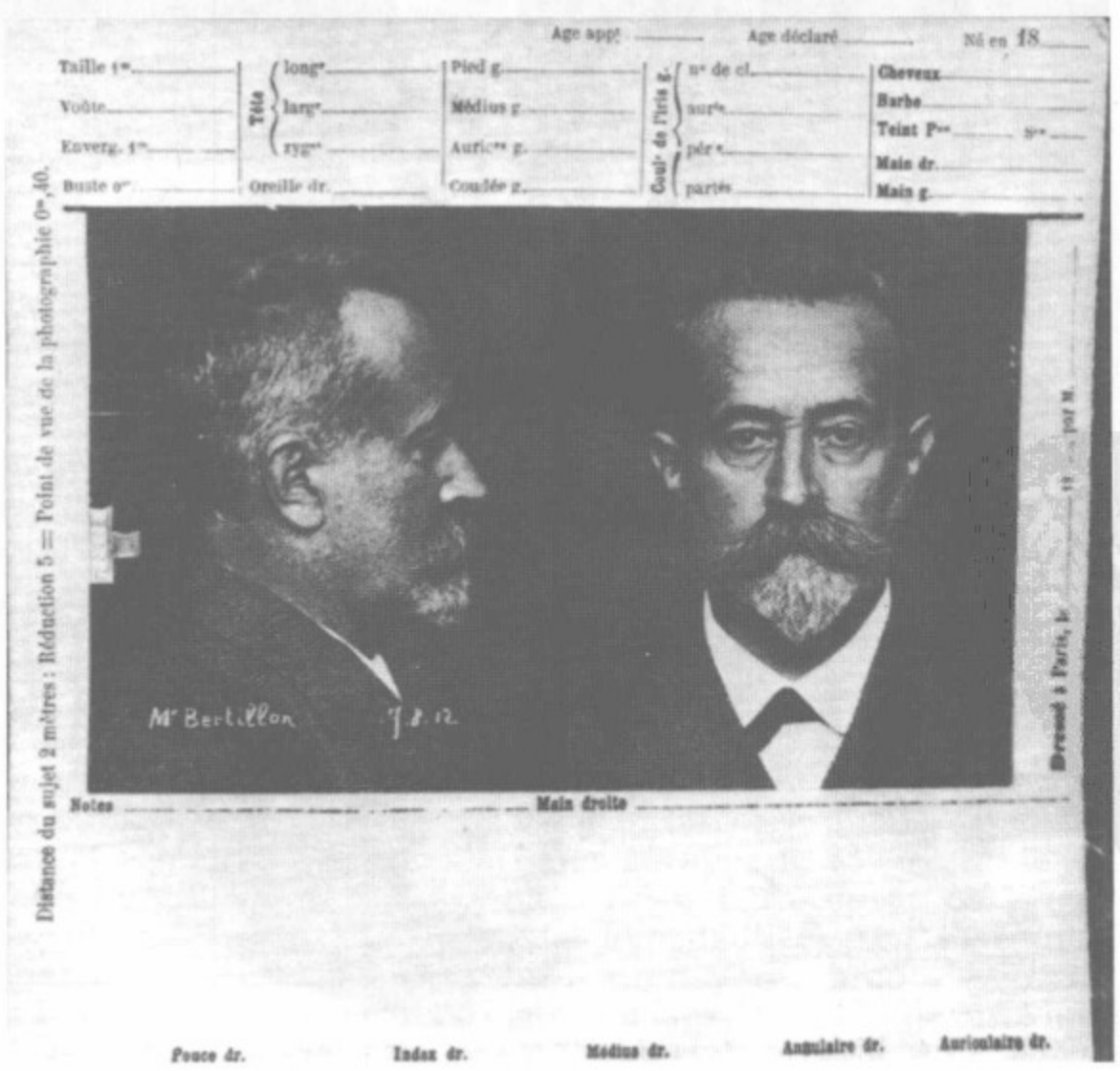
来确认个体的身份。警察记录下每个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估测其腰围的尺寸，并且记下身体上的每一处缺陷。我们只需扫视一眼假释部门、警察缉捕队和监狱的档案，就足以发现这些办事程序毫无效率，因为这些识别身份的方法是建立在虽无偏见，但却不精确的观测之上的。为了看穿罪犯的伪装，警察机关只得依靠个别警官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在1832年8月31日，法律废止了用一块滚烫的烙铁给犯人打火印的惯例之后。按照1808年关于犯罪起诉的法律汇编而成的犯罪记录也采取了这些不完善的方法。直到1850年，当地管区的警察机关仍保持着那些记录；在此之后，这些档案被移交给了法院。

骨骼的测量和犯罪线索的搜寻

19世纪末期，识别身份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新技术使人们有可能把每一个人和一个固定的、容易被证实的识别标记联系起来。这也使得一个人不再可能冒充另一个人，即使是一对双胞胎也不行。出生证明不再可能被伪造。简而言之，变形是不可能的了。正如离婚被重新恢复一样，甚至连重婚都变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人们不再需要忍受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折磨。

1876年，为了达到鉴别身份的目的，警察机关开始使用相片。10年过后，地方官的辖区内就存有大约6万张幻灯片。这些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嫌疑犯面部照片被随意地放置着，无可否认，它们丝毫派不上用场。特别是这些照片不能帮助警察机关揭示一个冒名顶替者的真实身份。但是，随着阿方斯·贝蒂荣发明的人体测量法的引入，这一状况在188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885年5月27日通过的有关累犯的法律很快就需要对犯罪分子身份进行确定，而此时贝蒂荣也能够说明六或七项精心挑选的骨骼测量数据足以证实任何人的身份。

他的这一方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贝蒂荣式罪犯人体测量法”（英语又称之为“贝蒂荣系统”），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巅峰之作；这一系列的努力包括：最为著名的是巴鲁埃尔关于鉴别个人的血液和气味特征的研究工作；昂布鲁瓦兹·塔迪厄德、凯泰雷和人类学学院成员的研究工作。但是贝蒂荣系统却一枝独秀，一直盛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且在此期间从未有人敢向这一系统提出异议。与此同时，贝蒂荣自己又提出了几



阿道夫·贝蒂荣，这位被看作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医生家庭中最没有天分的成员，通过为警察局的工作，赢得了众人的拥护和好名声。他的实验室专门从事犯罪研究。

在指纹采集技术发明出来之前，贝蒂荣只能依靠测量身体各部位的数据来识别犯罪分子的身份。指纹技术的重大发现具有超越犯罪领域的意义，很快，人们就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了。

次改进，如在人体测量的统计范围内再加上其他的鉴别标记，以及在个人的档案上加贴一张照片。

事实上，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贝蒂荣系统只是一个阶段，昙花一现而已。早在20世纪初期，指纹采集技术便取代了它的地位。指纹采集技术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发明，英国殖民者曾经在孟加拉使用过。贝蒂荣的一位朋友，弗朗西斯·高尔顿曾说服他在他的档案里增加指纹采集这一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些识别身份的技术首次被应用到犯罪分子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1912年7月16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流浪者和巡回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巡回的手工艺人和类似的流动人口，必须随身携带“人体测量身份证”。这种身份证上不仅记录了一个人的名和姓、出生年月和地点、父母的姓名和识别特征，而且还包括了本人的指纹和一张照片——这便是现如今每一个法国人都必须带在身边的身份证的一种雏形。

这样的程序给隐私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新的威胁。在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时期，人体测量法激起了德雷福斯的护卫者的愤怒，并且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时，作为忧虑的另一种表现，一连串的抱怨迫使勒比内不得不延缓了一项警察机关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幽会房子”里的女主人上交那些经常光顾此地的妇女的照片。毫无疑问，这种对个人隐私的新刺激还存在着其他征兆。举个例子，菲利普·布特里发现早在1860年，在艾因河地区的某些教区里，人们开始显露出一种先前未知的、对传教士揭示个人行为的偏见。那些把他们自己看作是“雄辩的个人罪行的谴责者”的牧师们，最终认识到私人道德的一个新领域形成了。

在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领域中，变革大约在1860年开始，于1880年左右结束。简而言之，共和国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剧变的关键时刻。个人主义，作为这个世纪的导向精神，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新康德学派的哲学激励着法兰西的新领导者，巴斯德也发现了细菌的存在。如果把生物体比作社会的话，那么导致疾病的细菌就好比是个体。当生物学的典范被应用到社会领域中时，对个体的控制便被看作是群体得以生存的关键。

同时，害怕个体及其秘密受到侵害的忧虑心理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想要揭露其他人的假面具并且探究他们的秘密的愿望。在社会

《在边境受到特殊严密监视的人的照片》。1894年9月，法兰西笼罩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恐吓阴影之中。当局不仅通过在布告栏里张贴嫌疑犯的图像，而且通过张贴照片来逮捕他们。这些嫌疑犯的照片被送往所有的边境检查站。

精英阶层当中也逐渐流行化名去穷人聚集的地方视察民情。那些想要刺穿私人生活的屏障的人开始采用投递匿名信的方法。19世纪末，窥阴癖者开始大量增多。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发现隐藏的线索的侦探成为畅销小说的主要角色。即使是亚瑟·柯南道尔和加斯顿·勒罗克斯（侦探鲁勒塔比耶的创造者），也都象征着新的意识的产生，因为对勒罗克斯来说，警察机关工作的症结不在于识别犯罪团体，而是证实犯罪团体的身份并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人身威胁

如果不去尝试理解肉体和精神长期分离是如何支配人们的看法的，那么你想要了解19世纪对于隐私的观念也就毫无意义了。很明显，身心分离的本质随着社会等级、文化水平和宗教热情的不同而变化。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怀有层层叠叠的、相互矛盾的信仰。人民在每个阶段的行为都影响着其他阶段的行为。这些事实使分析复杂化了，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忽略各种表象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

身心分离

一些人类学家，比如弗朗斯娃·卢克斯就曾指出，涉及肉体的传统民族智慧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人民的思想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说也奇怪，这些传统学识似乎已经忽视了身心的分离。19世纪末期由民俗学者收集的谚语反映了一个世俗化的观点，那就是有机生命是极为重要的。这些谚语说明了一种适度的道德观。他们建议，一个人如果能够行为有度并且坚持一条折衷的路线，那么他就可以保持健康和安宁。在这一价值体系中，健康和安宁远比欢乐重要。这样一种道德规范起源于勤勉的农民阶级，牵涉到努力防止和怀疑那些引发暴力和纷争的穷人的代价。农民的心理很复杂，是悲观和顺从的混合物。这种心理鼓舞农民们密切关注身体所传达的讯息；这种心理也让人相信，那些信息象征性地反映了宇宙的秩序和植物、动物王国的秩序。人们开始关注月球的情况，关注雌性周期的崇高主宰者；当死亡逐渐逼近的时候，他们开始焦急地等待家禽贩子的叫卖声；他们开始估量那棵在某个孩子诞生之日种下的树的生长情况；他们也观察有关胎盘、修剪指甲和掉牙齿的多种禁忌。尽管这些信仰明显有些陈旧，但却占据了大众的头脑。普通的卫生标准指出，没有什么能阻碍自然的身体机能发生，

因此，人们能很好地经受住打嗝、放屁、打喷嚏、发汗和各种愿望的身体表现。他们不会将视线从年老时岁月留下的无情痕迹上转移开来。

这些信仰和态度使卫生学科学原理的传播受阻。在经验不足的护士和仆人的共同错误的引导下，即使是在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反对那些科学原理的背信弃义的攻击行为也逐渐增多。毫不奇怪，社会精英在某种程度上把那些来源于下等群体的标准内在化了。有时，这些被内在化的信仰和常规的卫生习惯保持一致，而推荐这些习惯的、毫无经验的医生同时又是“没有什么需要节制”原理的忠实信徒。

在相反的一端，存在着另一套古老的信仰，它们基于基督教反对身体和灵魂的教义。这种对立的教义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在某些地区甚至被夸大了。对基督化身、基督教圣餐的神秘性和基督复活的忠诚，都给基督教蔑视肉体的教义设立了教条的限制。然而，除了那些限制之外，一项更为悲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教派的创始人时期，特别是泰蒂连。这一传统由博絮埃和詹森教派的信徒们传播开来，它把肉体仅仅看作是一个暂时的寄居之处，很快就会腐化而变为蛆虫的食物。肉体，总是被那里的神父看作是“死尸”，但是肉体是一切本能的来源，本能妥协于精神并且防止灵魂升向其天堂般的家园。因此，人们向任何身体的冲动和有机的动力发起了永久的战争。如果灵魂最终不能容纳肉体，那么肉体将像一条巨龙一样腾飞起来并且征服整个心灵。相互妥协是不可能的。

这种身心分离几乎类似于精神分裂症，它构筑了某些古老的苦行习俗的知识基础。在19世纪，我们通常能在宗教秩序、教会学校和逐渐增长的第三秩序中发现这些旧习俗。一种粗野的苦行和禁欲主义伴随着严格的纪律，一直持续到第二帝国的创建初期。这些习俗通常是极其暴力的，与耶稣基督在受难地的传奇象征如出一辙，虔诚的雕刻师总喜欢把耶稣描绘成伤口鲜血四溅的模样。在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禁欲者的行列，肉体的禁欲也就逐渐失宠。尽管教会指望能依靠妇女引领它的复兴，但是它还是注意到医学专业再三的警告，也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女儿们都是红颜薄命的。不再需要受伤流血和忍受痛苦，取而代之的是教会重又推出了许多较为轻微的、被认为是更加符合妇女需要的苦行。随着

1869年，洛尔泰医生在观测爬山对于人体温度的影响结果。如果19世纪的人们，特别是女人开始密切关注她们身体的内在器官的功能，那么这是因为生理学家激起了她们的好奇心。科学家观测——并且趋向过高地估计——水、阳光、海拔高度和气温对人体的影响。

自我牺牲行为变得常规化和内在化，虔诚的教徒们开始累计他们各种细微的牺牲。

科学家则更加具有创新意识。18世纪末期，在法国广为人知的乔治·斯塔福的著作，对法国人的医学思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不管是蒙彼利埃的医学学校里支持生机说、万物有灵论或者有机论的医学学生，还是大多数的法国医生，特别是那些在女性性欲特征方面颇有建树的医生，比如皮埃尔·鲁塞尔，都同意一个教条——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肉体的权限。具有监督作用的精神秘密地与肉体的召唤一起，指引着肉体前去完成那些使命。因此，决定女性性格特征和证明她们的母性天职的，并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而是精神，只有精神才能同时塑造女人的身体和思想。对于女人来说，母性首先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她们的使命就是在自然的工作中通力合作。

存在感觉

19世纪的医生仍然保留着一个思想体系的许多因素，他们故意忽视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却拒绝承认精神至上的学说。以著名的理论家卡巴尼斯为首的思想家们放弃了精神至上的理论和至关重要的原理。用让·斯塔罗班斯基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试图“统一医学和生理学领域”，因此，他们较以前更加注意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更加留心器官活动、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女性的柔弱特质不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这一定位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采用一个得自于亚里斯多德的古老观念的原因，这个观念如果不是来自昔勒尼学派的阿里斯蒂皮斯，就是由笛卡尔和斯塔赫勒自己传播开来的。这个观念最初提出了类似“内在触觉”或者“触觉”的概念，18世纪末期，这一概念被称作“存在感觉”。这个术语涉及了身体的某一内在感觉，或许更为确切的是提及了器官感觉的整个范畴。卡巴尼斯指出，当这些器官感觉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它们也就等同于本能。

纵观整个世纪，专门医师仍然对“无意识”观念的根本重要性深信不疑，同样用斯塔罗班斯基的话来说，他们把这一“无意识”观念解释为“间歇性地暴露出意识行为的内脏官能的朦胧低语”。由于这一无意识性，人的个性会突然变得全副武装起来。弗洛伊德的天才并不在于他的发现——尽管主观性逃避着意识，然而大部分的主观性仍旧在决定精神活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于他否认器官活动完全控制着无意识，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归入精神装置一类。

在那个时候，归于存在感觉的重要性验证了一种聆听身体讯息的特别方式，一种我们不再能够共享的方式。在当时仍然通用的、通俗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亦即新开业的医生的誓言，强调空气、水和温度对人体的影响，并且使人们开始关注天气和季节对呼吸的轻松程度和节奏、他们风湿病的程度以及心情的稳定性的影响，这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象学。同时许多人还密切关注着人体器官的功能以及它们对精神活动的反应。这些持续的观测首先表现在消化生理学和女性月经周期方面，人们发现普通的痢疾和妇科疾病都能扰乱人体的消化功能和月经周期。一些人还相信性情学说（比方说坏脾气的、身体瘦弱精神迟钝的、乐天派的和紧张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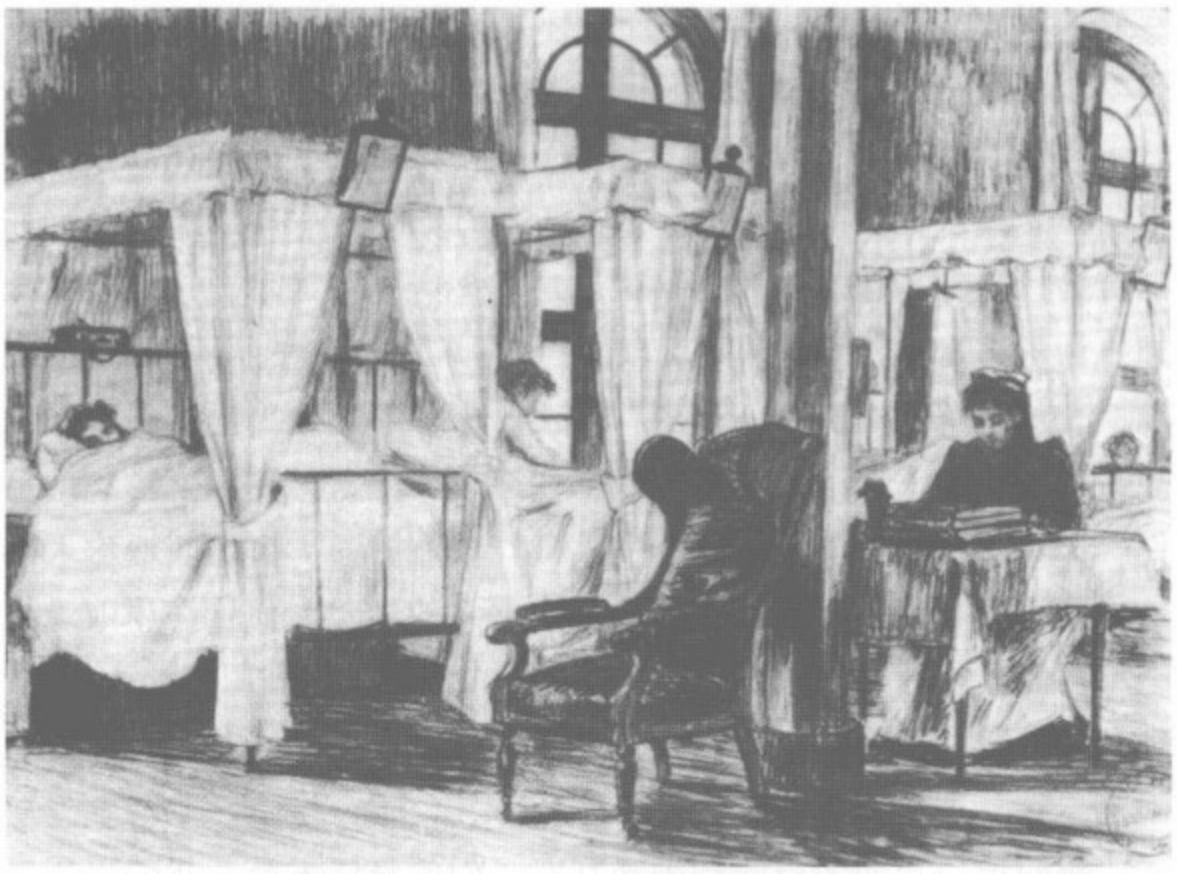
尽管西奥多·赛尔丁对心情学说持怀疑态度，但是他还是注意到性情学说的持续发展和应用。

因此，得益于每天的观测，一个尚未完全发展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概念体系逐渐成熟起来，而且人们开始用这一理念来指导他们的行为，来完善应付他人的处世之道。私人档案显示，这些使人全神贯注的事务构成了真实的私人生活。你只需读一读玛娜·德比朗和欧仁妮·德盖兰的私人日记、查尔斯·费迪南德·盖姆波恩新近出版的文章、维尼耶的布瓦洛家族的往来信件以及马尔泰家的私人信件——引证每隔25年任意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同谈论天气一样，人们开始频繁地交流对于存在感觉的体验，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身体的切实感受决定着人们对于水和阳光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风的态度，至于前者，人们只是想要保护他们自己，而后者则是导致真正的恐惧的罪魁祸首。

我们运用相同的观测结果来判断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之所以提及各种补偿，诸如对城市生活、工作条件、污染和所得到的身体乐趣的补偿，是为了满足我们逐渐增长的自我需求。然而，较早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涉及的内容我稍后将作更为详细的叙述。这场革命的主旨在于逐渐论证有关身体的学科（心理学意义上的学科）；这一论证的含义之一则在于检验人类对于自身有机的、动物般的本性的蔑视。人们开始把食欲看作是本身既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从外在发出的紧急、同时却又是吸引人的需求。这一变革具有欲望的性质，而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历史学家，则很有些冒着犯心理学上的时代错误的风险。

一个人的一个房间和一张床

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王朝末期，人们的生活空间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拥挤。这一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长期以来作为女修道会和修道院的标准之一的单人床，被用来当作一种卫生防范的设备，特别是在医院里。为病人开设的私人病房的出现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它最终还是出现了，奥利维埃·富尔在里昂的做法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因为隐私影响并妨碍了各色社会人士的习惯，而后者同时又希望在医院里得到很好的休养。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个人希望将住处从公众场所转移到私人场所的改变。1832年流行的一场霍乱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过



阿尔贝·莫朗：《硝石库》。即使是在像硝石库那样为女人准备的地狱般的房间里，隐私和单人床也占领了它的市场。

度拥挤而且随意混住、鱼龙混杂的工人阶级居住状况将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氧发现者拉瓦锡的发明和对于呼吸作用机械原理的全新理解的激励下，以及在给养充足的好处的说服下，医生们发动了贯穿整个世纪的反对使用公用床铺和混杂居住的战争。渐渐地，他们的劝告和建议被世人接纳了。我很难夸大他们那来之不易的成功的重要性。单人床的孤独感令人感到新鲜，它增强了人们的个性和独立意识，并且为个人的内心独白提供了广阔空间。每个人祈祷的方式、幻想的形式、睡眠与失眠的情形以及梦幻与噩梦的经历，都戏剧化地发生了转变。当兄弟般友爱亲近的热情逐渐消退时，孩子们开始寻求洋娃娃，或者一只令人安心的母亲的手的安慰。

在小资产阶级当中，一些人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卧室。对于卫生学者来说，私人的卧室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主题，他们为别人规定卧室的大小，并且建议人们严禁仆人外出以免家丑外扬。一个少女的卧室现在是她私人生活的神圣殿堂，一般都适当地装饰着各种各样的标志性饰物。与其主人浑然一体的私人卧室证明了个性的独立。放置在角落里的小礼拜堂、精致的鸟笼、插满鲜花的花瓶、印花的墙纸、摆着一本相册和几封私人信件的写字台，也许还有一组书架——所有这些物品都会让人想起凯瑟琳·比洛多或者昂里埃特·

热拉尔，甚至是欧仁妮·德盖兰的一个代表形象，因为她们的日记就像一首没有止境的赞美歌，歌唱着居住在自己卧室里的无穷欢乐。卡罗利娜·布拉姆也经历过类似的欢乐。

女裁缝师那具有田园风格的双重屋顶房屋，充满着得体的氛围，同时也是一种美德的象征，这种房屋是同一样式中最受欢迎的。即使是得到许可的妓院，风化纠察队也对其保持着严密的监视，按标准来说必须是每个人一个房间。在乡间的农舍里，农夫和妻子也逐渐采取一些方式来保护他们的隐私，他们用门帘和蚊帐将床铺围了起来，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采取竖立隔离物的方法。当一个大家族的家长决定将财产传给他的后嗣时，他在文件里要规定并详细说明他的礼物的条件，即必须有一个卧室是专门留给他自己用的，如此一来，他便能确保自己能够安静而隐秘地度过临终那段日子。这一情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俗。

逐渐增多的私人盥洗室设备促进了人们与自身的交流。对于一

在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的卧室里，堆满了象征着她的各种爱好的物品，尽管屋子里的空气是那样的寒冷，但是她显然在尽情地享受独处的乐趣。

右页图：邦雅曼·欧仁·费歇尔：《美人出浴》，1891年。在这里，洗澡只不过是借机赞美女性身体的一个托词，而通常来说，此时此刻的美人应该是一丝不挂的。

位新搬进工人阶级单元住宅楼的居民来说，当他拿到位于楼梯平台上的公共卫生间的钥匙时，他便开始了熟悉排泄物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为他充分提供了一种有关隐私的全新感觉。在1900年左右，当盥洗室和浴室最初开始安装门锁时，人们才开始有可能欣赏和审视自己的裸体，而不怕有其他人闯入。由于浴室基本上不可能使人沉湎于肉欲，因此变成了一个清洁和庄重的场所，一个凝视和鉴赏自己身体的地方。

修饰

清洁工作方面的进步很大地改变了私人的生活和关系。在20世纪前后，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清洁的重要性重新得到重视，这种重要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女修道会和修道院的情况。随着有助于排汗的机械装置的发明，以及疾病传染原理的伟大发现，人们开始意识到任由携带着病菌的灰尘堵塞毛孔是多么地危险。后来，人们开始相信逐渐风行世界的净化观念，相信对人体的排泄器官进行及时仔细的清洁是极其有必要的。身体对精神的公认影响作用赋予清洁和干净以新的价值。新的规矩改造了行为方式；社会的精英分子要求具有更高的智慧，人们开始避免器官的损耗，因为这会唤起他们对自身的兽性、过失和死亡的注意。简而言之，净化观念促进了卫生的进步。另外，社会的精英分子也被一种愿望驱使，想把自身和污秽不堪、恶臭扑鼻的平民大众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改变好色与禁欲的状况，而这两者交替推动着新的卫生习惯的产生。

许多负面的信仰使人们对新的清洁方式持保守态度。人们对水的精神和物质好处都评价过高，因此要求大家在使用水的问题上提高警惕。基于性欲、年龄、性情和职业的严格规则决定着沐浴的频率。为了避免体虚、自满、自恋，甚至对手淫的种种顾虑阻碍了卫生习惯的传播。人们对水代表着无菌状态这一观念深信不疑的想法，也限制了女性卫生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卫生观念的进步仍然缓慢地从上流社会向小资产阶级传播开来。连仆人都向下层社会的小部分人介绍了新的修饰习惯，尽管这些修饰习惯仍旧只涉及了人体的某些特别部位。人们开始勤洗手；每天都洗脸和刷牙（至少是前面的门牙）；每个月洗一次或两次脚；但是却从来不洗头。一个女人的洗浴时间表由她的月

E. FICHEL
1895

经周期来支配。在这一点上，19世纪大部分的女性秩序，仍然遵循由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所制定的原则。19世纪末期英式浴缸的引入，以及相当缓慢的淋浴方法的采用过程，都影响着人们在修饰上面花的时间。人们认为淋浴是极有好处的，因为淋浴时人们充满活力的行为动作减轻了他们对洗澡会导致身体虚弱的担心。不管怎样，沐浴在治疗方面的好处仍旧是重中之重。1881年，塞夫勒人埃科勒-诺马勒制定的规则中，限制生病的学生使用淋浴，除非同时有一名护士陪伴。至此，为什么性卫生学一直没有取得长足进展就应该一目了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尼韦内省，有名望的资产阶级都不使用坐浴盆或者妇女卫生纸。

在乡村地区，当天气逐渐变得炎热的时候，孩童们习惯在小河里洗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农村仍然保持着旧的卫生习俗，没有受到修饰习惯变革的影响。诚然，市政当局确实要想方设法地保证淡水的供应。喷泉式饮水器、淡水贮槽和洗衣房，这些卫生设施在各个地区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王朝复辟时期出现在诺曼底的下游地区，七月王朝期间出现在尼韦内省，而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才出现在沙蒂永朗的迈诺特。医院、监狱以及后来的学校乃至军营，都为教育并培养农村人口的卫生意识的伟大事业做出了贡献。无数乡下医生发动了这场不屈不挠的教育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贝纳希斯医生。然而，正如先前所提到的那样，卫生方面的科学概念经常与通俗的信仰相抵触：经常洗涤亚麻布制品会损毁布料；小心仔细的家务管理确实浪费时间；表面结着一层污垢的皮肤肤色往往很好。医生规定的条条框框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在很多情况下，卫生概念被看作是一种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干涉，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干涉。

1886年，人们流行在喷泉式的浴盆里洗澡，这种浴盆比常规的浴缸和浴室都要出现得早。

事实上，当这一观念面向普通大众的时候，社会精英分子对卫生的诠释，最初也只涉及了外表。外貌端庄得体只是意味着除去衣服上的油垢和污点（在里昂，清洁工人被称为“去油污的人”）。卫生意味着使粗鲁的行为举止优雅化，梳顺头发，常洗手(和胡须)，随后就是往自己身上喷洒科隆香水。而对于勒·列那尔·拉戈特来说，卫生意味着知道喝汤的正确姿势。其时，在拉戈特的邻居菲菲尔·米涅波夫的家里，孩子们被派去擦干滴落在浴室地板上的经血。所有这些赞美都是褒扬共和国学校在提高卫生水平和促进他们的清

埃德加·德加：《浴盆》，1886年。德加是一位着迷于妓院世界的艺术家，他在这幅画中展现了女人最为隐秘的姿势，也就是卖淫的早期象征。通过这一姿势，他赋予了这位裸体的入浴者以全新的敬意。他不但详细地描绘了这一形象，而且笔画勾勒之间还颇具赞美之意。

洁检查仪式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不论这些赞扬堆得有多高，教育机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雄心勃勃。为了让我们自己信服这一点，我们只需拜读一下《两个孩子的自行车环绕法国之旅》。在梳子的使用和净化学科的指导上，人们同旧习俗展开了至关重要的斗争。男孩子们必须停止用他们的手指来梳理头发，而女孩子们则必须勤换内衣裤，保持清洁。

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左右。在公寓和家里安装新式卫生设备的有限进展，体育俱乐部里淋浴间的使用，新的公共卫生机构的努力，以及逐渐增多的豪华旅馆和妓院——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浴盆和有柄水罐的普及。但是，彩饰和铁铸的水槽直到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而淋浴间和浴室直到1950年才开始普遍化。仅仅是在那个时候，一场彻底的卫生学革命才真正地发生了。

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斯：《浴缸》。经久耐用的锡制浴缸向来是现代化浴室的首选安装品，浴缸的位置可以由管道系统来固定。逐渐地，一处新的私人空间被开辟出来了，在这里一个女人可以放松身心，可以阅览群书，还可以在绝对隐秘的环境中做着自己的白日梦而免受他人的干扰。在这张图片中，女人身上穿的那件轻柔的薄纱睡衣，和她的姿势明显表露的倦怠神情，都会让人联想起古老的沐浴治疗的说法，而不会激起观看者的性冲动。唯一蕴含着色情意味的地方就是雕刻在水龙头上的斯巴达王后勒达的天鹅的脖子。

欲望的威胁

每个人都在私下秘密地准备着如何面对他人的凝视。他的自我介绍往往建立在社会所确定的身体形象的基础之上。在这里，同样也出现了一场变革，由此产生的舆论谴责则完全影响了个体的私人行为（基于家庭与世界其他方面的更深层次的对比，这些规则后来丧失了一些威力）。人们不能再穿着睡衣在卧室以外的地方走动，因为这象征着一种勾起性欲的亲密感，即使是最轻微的甚至是含蓄的暗示，都会被认为是下流的。尤其是已婚妇女穿着睡袍的时候，这种女式睡袍有点类似于小姑娘通常穿的式样简单的男用长睡衣。一整套的便服现在也成为了可能，但是没有哪个正派的女人会愿意别人看到她身着长睡衣、慵懒随便的样子，除非是在她的情人面前。日益增多的精致晨衣和透明的内衣急需添加些许端庄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费多的书名“不要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家庭主妇只有在家里才放下她们的长发，因为只有女仆和妓女才会公然以这副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些规矩仅仅是更加广泛的禁律体系的一部分，这个禁律体系限制着妇女进入公共社交圈子的权利，但是它却规定只有在一个庄严隆重的场合上，女人才能够抛头露面。国内和国外的差别同样影响着男性居民。没有哪个巴黎男人会穿得像在家里一样随便地出现在大街上。

妇女贴身内衣的发明和流行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一

些款式新颖而大胆的内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致和美丽，这些款式不但升华了女性裸体的价值，而且还加深了它的神秘感。正如菲利普·佩罗所指出的，女性的身体从未像1830年到1914年之间那样包裹得严严实实。女睡衣被发明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女式短衬裤。这种灯笼裤一直风行全国，备受女性的青睐，直到第二帝国早期，裙衬才取代了它的位置。到1880年时，穿着裙衬已经成为一项严格规定，至少在资产阶级当中是如此。与此同时，女式紧身胸衣也经受住了来自医学专家的猛烈抨击。后来，紧身胸衣能够“慢慢地”系紧，也就是说，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女人们能独自穿好衣服，这同时也让情人们在做爱时更加自由、更加方便。

19世纪末期，女性的贴身内衣开始镶有比以前更多的华丽刺绣和花边。端庄的不正当影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当脱衣服变成一个阶段的问题时，男人们那急不可待的手指就不得不忙于对付那些层出不穷的、错综复杂的绳结、挂钩和钮扣了。除非是在漫画里，对女性内衣的色情想法绝不会被形象地表现出来，但这些想法的堆积却改写了淫荡的神话。女式内衣的新款式迅速地流行开来——比卫生习惯的传播还要快得多——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久以后，即使是乡村青年都将不得不在约会的时候面对并克服这种空前的、由内衣所带来的障碍。

值得考虑的是，这种异常复杂的流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要考虑到在资产阶级青睐的装饰织物、家具套、包装和室内装潢中，明显显示出一种过分夸大的色情思想。想要保存的愿望，想要留下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对阉割的恐惧以及无所不在的对欲望的威胁的提醒，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一种神经质般的冲突。

19世纪末，比奈和克拉夫特-埃邦描述和记录了拜物主义的产生，但是在此之前，左拉却早已详尽而细致地分析过拜物主义。因此，拜物主义的流行应该说丝毫不会令人惊讶。女性纤细腰身和瘦削背部的神秘感，作为欲望焦点的柔和的胸部曲线，纤纤细足和皮靴所附带的性感含义，以及想要扯断女人的发结以便从容地尽情享受丝丝秀发所散发的芬芳的欲望——所有这些恋物情结都变成了意义重大的历史事实。对围裙的恋物情结也是如此，围裙象征着亲密，它明显让男人们觉得有资格享受同他们女仆的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那些证明了性行为、疾病或者犯罪行为的私人衣物都将在他

欧仁妮·文森特·维达尔：《穿粉红色紧身胸衣的年轻女人》。紧身胸衣的设计旨在突出女性的优美体形，它着重强调了苗条的年轻姑娘的胸部和臀部曲线，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审美天赋”。在这幅画当中，新款的“松散低垂的系带”方法，让这位年轻姑娘可以以一种极为优美的姿势系紧她的紧身胸衣，而聪明的画家则正好捕捉了这美丽的瞬间。

们的谈话中泄漏出来。根据这些象征着亲密关系的标志，仆人和洗衣女工散布着各种谣言。私下对这些秘密知情的人就隐藏在最为精美的亚麻布织物下，城堡里的洗衣妇是各种小道消息的丰富来源，她们在村子里享有一种特殊的威望。

修饰外表的艺术

人们都在私下里打扮，以便在公众场合亮相。长期以来，这种修饰只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在1880年到1910年之间，这种毫无收益的、徒然的行为迅速地传播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男人和女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打扮着自己，加强了性别角色之间的区别。香水、化妆品、颜料、丝绸和蕾丝花边是女人们的专利，她们还对一种严酷的“塑身法”顶礼膜拜，这种方法要求她们通过“塑身”来展现自己的体形，好像是在反驳任何怀疑她们属于劳动阶级的想法方面。而对处于艰难生活中的男人们来说，女人行使着广告的职能。男人得工作，他们不得不穿着丝毫没有样子的黑色或灰色衣服——一种褐灰色斜纹布衣服，它使得波德莱尔发出这样的惊呼：男性看起来似乎总是在戴孝。男性的内衣同样也欠精致。19世纪的男性并不为他们的身体感到自豪，除了偶尔以他们的发型为荣。对于女性来说，时髦的发式就是浓密的卷发和烫发，这种由理发师用新近创造的方法做出来的发型风行一时。理发师为男人们提供了多达15到20种有关胡子、络腮胡和连鬓胡子的选择。

这些流行时尚的历史重要性不能被漠视并付之一笑。它们开辟了一种私人生活的新风尚。此外，至关重要的变革似乎出现在1860年到1880年之间。直到那个时候，乡下人似乎才对所有来自城市的东西表示怀疑。在集市日里，乡下人仍然自豪地穿着传统服装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1840年到1860年是乡村经济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传统的地区服装的黄金时期。之后开始的是一个模仿的时期，乡村的传统被丢掉了，传统服装也不再有人穿着，只有那些民俗学家们才虔诚地、当宝贝似的收集它们。当软帽和工装裤逐渐消失时，流行的痕迹开始出现在最偏远的乡村地区。通过邮购的方式，普林汤普百货公司的地方分店、小城镇上妇女用品商店的开设，特别是19世纪末期裁缝人数的剧增——都推动了变革的进程。正如伊冯·维尔迪埃在她关于迈诺特的作品中所论证的那样，青春期少女的生活发生了转变，现在不得不紧跟最新的流行时尚。然

当空闲的时间日益增多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外表的修饰上。一位漂亮的资产阶级妇女，正在女仆的帮助下为出门做着准备。由于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全套服装要穿，所以衣柜里的衣服必须经过精心的整理和摆放，以免把卧室变成戏院后台的更衣室，四处都是衣物，杂乱不堪。

而，她却没有注意到，某一流行时尚只限于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

这些变化对城市工人的影响也不例外。在过去，一个男人穿着打扮的方式反映了他的职业。到第二帝国中期时，人们已经很容易将工人的宽松工作服和地方官员的黑长袍以及办事员的硬领区分开来。然而，1860年之后，人们已很难抵抗在每个星期日“盛装打扮”的诱惑。这时，一个工人也许会穿着资产阶级的华服，和城市人快乐地混在一起。星期日的正餐具有了新的意义。盛装打扮就证明你熟悉新的清洁标准。年轻的女工们则采用最新的诱人时尚：齐踝的短靴，香喷喷的手帕，垫高的胸脯，甚至一种新的姿势。当女人们时刻采用新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时候衣服不再合适时，上街购物便成了一种困扰。莫泊桑笔下许多源自1900年左右的故事和歌曲反映了这些变化，其象征便是服装店的外勤女店员或是裁缝助手的出现，她们是后来的女店员的前身。

亨利·伊冯博尔：《周日漫步》，1899年。当工人运动和神职人员联合起来，一起坚持星期日应该成为一个休息日的时候，长期以来只限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周日漫步惯例突然变得大众化起来。涵盖市区和郊区的闲暇时间，以及一种想要炫耀自己最好的服饰的愿望也同样促成了这一现象。这种现象趋向于模糊社会地位的差别，并且激起那些偶然相遇的人的美好幻想。

羞怯和羞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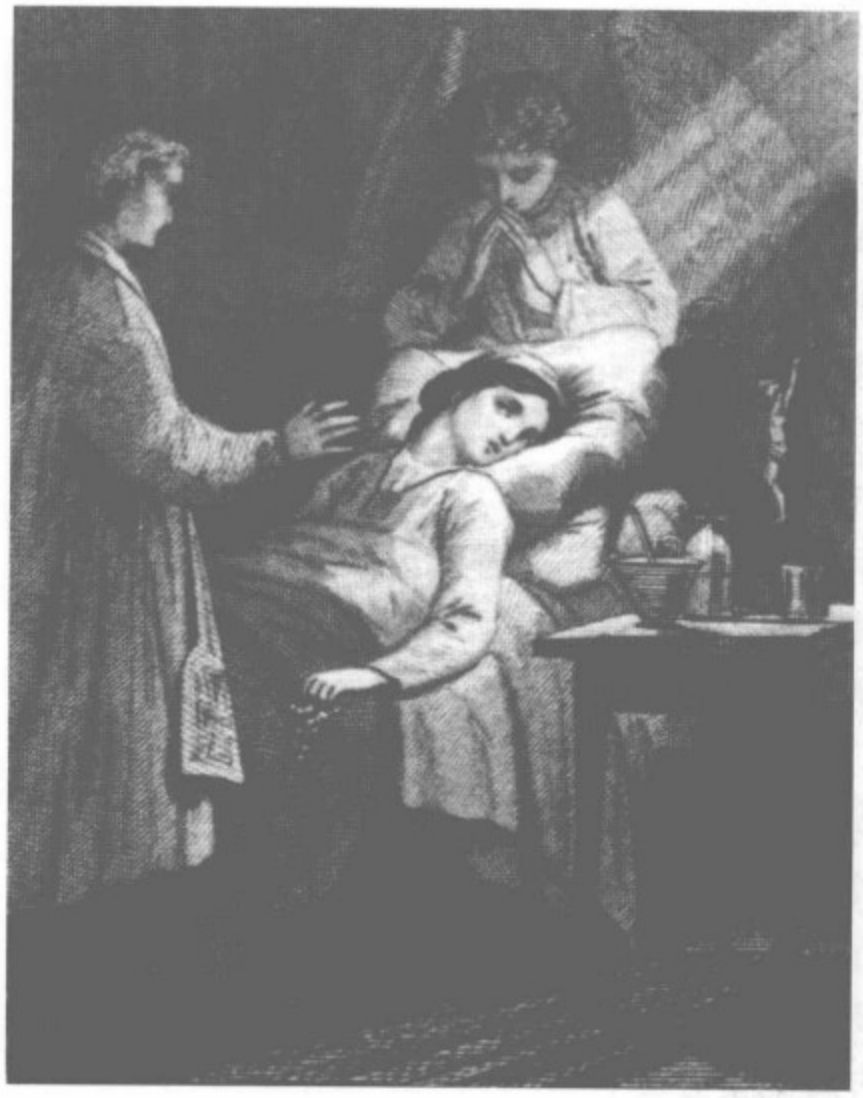
19世纪，羞怯和羞耻是决定行为举止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条件背后隐藏着两种畏惧心理：害怕允许另一个自我——身体——表达

自己；害怕一时的轻率泄漏自己最为隐秘的秘密。当人们试图防止任何显示身体存在的器官表现时，第一种畏惧心理便导致了自我约束的产生。理查德·塞内曾描述了一种“青春疾病”，这种疾病呈现出一种便秘的形态，一般出现在女性的身上，主要是由于她们担心在公共场所放屁而强自忍耐所造成的。医生把这种临床症状称为“脸红恐怖”症，即谦虚的第二程度：一种对于不能避免脸红的病态的恐惧。第二种畏惧心理则是其他情况的原因所在，它导致医生都不愿使用医学检查用的扩张器，因为长期以来这种扩张器的使用被看作是“医学强奸”。19世纪晚期，公娼制度的反对者们继续在他们的抗议活动中提出了这一意见。同一类型的忧虑来源于妇女的“白色疾病”，也就是说，她们因为害怕被生人见到而拒绝走出房子的病态心理。

从这两种畏惧心理中滋生出一种坚持“羞怯”举止的想法。这种想法构成了修女教义的重要部分。那种教义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抑制孩童的自发性，自然的冲动被抑制起来。但是除了这一点，年轻的活力的根本来源也被削弱和耗竭，而构成这种活力的色欲则被严格地控制着。自从肉欲被定义为邪恶的根源之后，年轻人便必须学会小心谨慎。他们不得不学会让他们的双手忙碌不停，避免目不转睛地看人，低声说话，或者更加严格的是让他们自己沉浸在沉默的美德之中。

19世纪中叶前后，女修道会里教授的规则变得更加严厉，紧接着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自由的时期，虽谈不上具有真正的自发性。当许多年轻姑娘实际上已经把天使视为理想榜样的时候，人们对肉体存在的否认便被强化了。这一幻想很快就得到了普及，部分归因于新柏拉图派哲学的影响。在祈祷时采用的姿势中，极为值得注意的是，天使论伴随的是对童贞的赞美和一种新的讴歌贞节的抒情方式。这些态度的一个有启迪意义的标志是，1834年以后圣-菲洛米娜礼拜的迅速传播。尽管菲洛米娜这个人纯属子虚乌有，但是无数有关她的传记问世了，而且祈祷文、徽章甚至是贞节带都应运而生，供那些希望保持她们处女童贞的姑娘们使用和佩带。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男人的言论占统治地位的世纪里，女人的思想就隐匿在身体的矫情、凝视的高尚和手势的炽热当中。

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新的行为特点是如何传播的呢？苏珊



在年轻女性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虔诚形象，体现了她们坚决要求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想法。在这两幅图当中，女主人公意识到了自己内心中激情燃烧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她将无法抵抗舞会的巨大诱惑。歌颂守护天使的高尚形象，在虔诚的少女心中经常被误解为崇拜宗教的、渴望升上天堂的女儿。

娜·瓦尔关，一位有着体面背景的女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份记录，其中描述了1805年到1809年期间她被迫在圣-梅丽女子修道学院经历的一段真正的见习期，以及她后来的学徒期的情况，她从9岁开始就不得不和那些可悲的诺曼底老处女们待在一起。尽管如此，浪漫主义时期复苏的天使的人类学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是直到1850年天主教派发动了一场反对运动后，才开始普遍化。自我约束的方法在修道院里发展起来，并且传播到普通的善男信女中。经过耐心的探索，民间纪念学家玛丽-若丝·加尼诗-梅里特画出了一幅特别的肖像画。在这幅画里，她描绘了1900年到1914年期间，年轻的姑娘们的行为是如何被布昂桑塞尔瓦的修女们严密而详细地审查的。一些乡村教区中设立了年轻人的集会，同时还涌现了无数的圣母玛利亚的孩子、圣母玛利亚的仆人和获得贞洁美德奖的少女的仆人的协会，贞洁少女指的是那些因为具有善良而贞节的行为而获得一个玫瑰花冠的女孩子。马蒂娜·萨嘎隆曾指出，这种组织的数目有1000个左右；它们强化了由共和国学校分配的道德教义和行为准

则，而这些教义和准则大部分来源于拉萨尔的礼貌手册，其初级读本在七月王朝时期被广泛应用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在都兰地区，市长和教区长将共同来挑选乡村的贞洁少女并赠予她们荣誉，在举行授奖仪式的当天早晨，这些贞洁少女必须出现在医生面前并接受检查，以证明她们的处女身份。而在南特尔地区，非基督教化的特质证明了一点：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家庭和私人的美德典范的保留。

在普通的家庭里，人们开始关心具有优越的特质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制定了新的身体约束准则。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分期付款方式的结束》中，叙述了那位年轻的英雄所遭受的折磨。那个年轻人被迫在他父亲——一个办事员和他母亲——一个巴黎中心商业街上的店员的手下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这里不是列举各种政体的地方，但那些曾经的公众行为正是依靠这些政体转变为私人行为的。在这些习俗当中，如今经过深思熟虑的“可耻行为”指的是：在同兄弟一起钻进被窝之前，公然地脱衣服；在其他人面前修饰自己；以及在家庭卧室里做爱。

正值婚嫁年龄的青春期少女引起了如此多的道德家的关注，她们的情形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索。厚厚的生理学和卫生学书本是专为青春期少女编写的。一本学问精深的书往往能激起一个被吓坏了并被她自己体内所发生的基本质变所震惊的孩子稀奇古怪的想象，而这些质变的标志就是月经来潮。她可能成为一个有着难以理解的嗜好的奇怪生物，然而这更加危险，因为她仍然没有了解女性生理状况的本质，同时也因为她对那个时候发生在她体内的自然力量有着太过亲密和真实的感觉。她的异常，主要表现在倦怠无力、叹息和不知不觉的落泪上，而这就需要她身边的人对她付出关心。她的存在必然要被许多的禁忌所包围和保护，但是无可否认，其中的许多禁忌被忽视了。医生指出，此时她对于性爱方面的事情的好奇心还没有被唤醒。“天真无邪的人”的数量因此剧增，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城市化，城市化剥夺了年轻人目睹动物之间交配的机会；部分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性关系现在属于他们自己卧室里的隐私。那个关于小孩子是由白鹳衔来的荒诞说法竟然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天真无邪到底有多少是伪装出来的；而外在的姿态和内在的想法之间又到底相差多远——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当科莱特笔下的女主

人公克劳迪娜和她的校友们互相比较胸部，看看谁的胸部最大时，我们才瞥见一丝完全不同的关于年轻女性的印象。

独处的乐趣

由孤独的性行为引起的恐惧，为人们研究伪善的最深层次提供了一条有用的索引。从让-路易·富兰德安到让-保罗·阿龙，这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医学家们对于一个从前就为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的灾难性的和难以置信的警告。1760年蒂索医生的著名论文《手淫》得以发表，它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篇论文直到1905年时仍被重复再版发行。在关于手淫的现象是否在增多的问题上，专家之间存在着争论，但是，数量上的历史记录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启示。晚婚、城市里真正的单身汉聚居区的产生、乡村地区婚前性行为的传统方式的消失、男子寄宿学校数目的增多、住宿条件向单人床和私人房间的转变，以及对性病不断增强的恐惧——都显示了手淫现象的增多，除非我们假设思想的高尚化将以某种方式和所有这些变化并驾齐驱。一切升华个体思想境界和鼓励个体与他自己内心对话的事物，其发展必将趋向同一个方向。其他对手淫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犯罪的迷恋，施展诡计和罪恶的快感，妻子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一种想要补偿或者报复的欲望，外加一种对找一个情人很困难的恐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手淫这一习惯还没有蔓延开来的话，道德家们反对手淫的斗争就绝不会达到这样一种狂热的程度。

让我们回到医学家们那可怕的修辞问题上，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劝戒作用。作为由米歇尔·傅科勒特提出的一个更广泛的孩童时期产生性关系的策略的一部分，医生们没完没了的谴责和抨击首先是基于失落的幻想，基于一种需要、一种调节宝贵体液的每一次支出以获得一个健康的精液系统的需求。男人们被再三地警告，手淫将迅速耗尽他们的库存。肺结核、未老先衰和死亡标志着那些体力明显下降的男性的生命历程，这些似乎已经塞满了医务所的男人们大多形容枯槁、面色苍白、步履蹒跚。临床记录的簿本反映出一种担心：手淫过程中精力的支出可能会消耗一个男人的体力并且致使他丧失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些记录暗含着一种拒绝学习愉快的心理，一种对性行为的享乐功能的否定。

没有男性参与的女性性欲高潮似乎特别难以忍受。“手淫”体

现了罪恶的基本本质。对于男性来说，它代表着绝对的秘密，比性交的狂喜还要隐秘得多。就女性来说，体力消耗的风险不是问题，因为女性的“性交能力”似乎是无比强大的，但是，其他同样恐怖的惩罚也为那些违反这一禁忌的女人准备着。不止一份关于女色情狂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或者妓女的临床或传记记录，都是以一个惯于行恶的小女孩的形象开始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19世纪的医学专家们对阴蒂的众所周知的敌意，阴蒂被公开指责为一个纯粹享乐的工具，而丝毫不具备生殖功能。

当家长和老师的监督都不奏效时，唯有一种特殊的整形外科装置能够镇压住青少年那抑制不住的独自释放的需求，并且把他从珍贵的体液流失导致的未老先衰甚至是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

对手淫者的监督

家长、牧师，尤其是医生共同发起了反对手淫这一灾难的斗争。厚重的大部头书告诫家长，要一直把孩子置于家庭的监督之下。对神职的教育家来说，睡觉被认为是死亡的等同物；床象征着坟墓，而醒来则象征着复活。在女子寄宿学校里，一名修女会在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出现，以确保大家的谦虚仍被保留着。在那段时期，让一个孩子长时期独处而不管他，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在由乌尔苏拉会的修女管理的学校里，规章规定每一个女学生都必须一直待在几个同班同学的附近。医生建议人们远离温暖而潮湿的床铺；他们规定了柔软的羊毛围巾和几种毛毯，还指定了正确的睡觉姿势。女人要是骑在马背上都会引起他们的质疑，他们对缝纫机也是如此的态度，1866年，医学院对缝纫机提出了公开的反对。

制造商和整形外科医生也加入了努力预防手淫的大军。1878年，专门的医师推荐人们使用卫生间，这种卫生间装备了门，并且顶部和底部都装备了保险装置，以方便检查所有者的姿势。某些医生还建议，男孩子穿后面带有尾巴的长衬衣。对于那些坚持手淫的顽固分子，一直到1914年还有可用的特殊绷带；而对女孩子来说，则有“自我约束带”。在精神病院里，女性色情狂患者被扣上手铐或者用皮带捆起来，有的时候她们的大腿之间还会被放置一种特殊装置，以防止两条大腿相互摩擦。如果她们的痛苦仍然持续的话，医生就要尝试为她做外科手术了。对尿道进行烧灼的方法似乎流行甚广。西奥多·塞尔当引证了一名年仅18岁的县百货公司售货员的殉难例子，这名店员竟被烧灼了七次尿道，表面上看来是被当作强制性遗精来对待。更具启迪意义的是阿米埃尔所遭受的折磨，受害者本人详细地叙述了其痛苦过程。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由于定期“屈

服”于“遗精”，一位专门医师告诫他，“每一滴污秽物都是一把插向你眼睛的匕首”。阿米埃尔吓坏了，从那时以后便记下每一次的夜间遗精。他许诺要悔改并再三痛下决心。每天晚上，他都会洗冷水澡，吃玻璃粉并且用醋清洗腹部。然而，这些方法丝毫都不起作用。1841年6月12日，他决定从今以后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而且睡觉的时候还只能坐在一张扶手椅里。

对阴蒂和阴户进行烧灼的手术并不常见，而阴蒂切开术就更加罕见了，尽管早在1837年罗伯特医生曾实施过这一手术，而本世纪末德米特里厄斯·赞巴科医生也执行过一例这种手术。尽管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切断确实意义重大，但是其次数却不应该被过高地估计。

很明显，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困扰。对存在感觉的模糊迹象的感知、对诱惑的警惕性、对无所不在的危及谦虚的危险的敏感性，以及对普遍存在的犯罪可能性的迷恋，这一切都趋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存在上。人们现在避免看到动物的交配场面。简单的暗示便构成了黄色笑话的基础，而现在看来，那些笑话一点都不幽默。唱歌俱乐部和社交圈的组建只是为了听到和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深深隐藏的裸体激起了男人无限的幻想。萨比娜伯爵夫人，左拉的著作《娜娜》中的一位女主人公，她的客人们不断地在心中揣摩着她的大腿的形状。通过对比，如今备受吹捧的沉湎于色欲的放纵似乎并不严重，人们甚至可以对此表现得若无其事。

了解和自我控制

当内在性质在文学作品中盛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感到一种理解自己的需要。随着后特伦托宗教会议努力恢复宗教纪律，加之天主教徒倡导人们进行精神锻炼，自省变成了平常事。人们对内心的检查和审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了，甚至当信奉天主教的人数减少时，对于道德神学的要求的全新理解，使得那些非神职人员的大众也能够接受曾一度是精英阶层专有的精神约束。静修与布道，正是人们进行自我审视与忏悔的机会，这也是“王政复辟时期”的一个普遍特征。克劳德·朗卢瓦曾指出，瓦恩主教教区的普通民众就参与了这些宗教静修活动。根据热拉尔·肖维的叙述，1821年3月24日，6000名手捧白蜡烛的人参加了标志着伟大的蒙彼利

埃传教使命顶点的公众忏悔仪式。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后，在沙斯拉代的乌斯通，一个边远偏僻的热沃当地区的小公社，在1866年传教士来到他们的山村之后，这里的山野村夫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且突然发现自己解放了、能开口了。在19世纪，几十年来，听取忏悔的神父总是推迟赦罪，直至时间流逝、听到人们第二次忏悔为止。阿尔的一位神父建议人们除了正常的忏悔之外，还应在其间进行不断的自我反省，形成习惯，这位神父在七月王朝期间成为了一名固定的传教士。这些方法使人们备受鼓舞，促使他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搜寻哪怕是最细小的罪恶记忆。

与更为接近的良心检查一道并行的是不断增加的规章制度和更加详细的决议。传教士和宗教教师劝诫虔诚的信徒们要掌握这些新技巧，以便对私人行为加以控制。根据修女们的建议，家长对自己的女儿施行了严格的标准，把她们从寄宿学校接回家，以便保护她们免受一种似乎注定会变得懒惰的生活的诱惑。利奥波尔迪纳·雨果那令人感动的《决议笔记本》使我们了解到这些规章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好心人甚至鼓励那些还处在十分娇弱年纪的女孩子记日记，当作完成忏悔圣礼的一种帮助。在马赛地区，一个年仅12岁的小姑娘伊莎贝尔·弗雷斯内被要求每天写下数行日记。成年人同样也把他们的精神进展记录在纸上，通过这种做法来减轻他们对于每天感受到的细小罪过的悔恨。1850年之后，女人们开始写转化日记，模仿的是斯维切太太的日记，这位太太的日记由法卢出版。这些日记反映了一种类似的愿望，即想适应不断增长的、以某种教训意义为宗旨来描述自身需求的愿望。

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因忏悔而产生的自我理解的技巧被世俗化了。在19世纪，人们开始为计算他们的时间而困扰。这不仅仅是他们因所犯罪恶而产生的困扰。他们的这种需要源自其对于所失去的东西的一种幻想，这些幻想促使他们记录下琐碎的家庭账目，并且造成了某些恐惧心理，比如害怕浪费精子，或者害怕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随着每一天的过去而变得越来越短暂。一种想要阻止这些损失的决心导致了记私人日记习惯的产生。

在1810年由退休军官朱利昂所写的非凡的《关于利用时间的评论》，或者《调节时间利用的方法》和《获得快乐的主要方法》当

中，这一点非常明显。作者声称他的灵感来自洛克和富兰克林，而他的著作却受到了富尔卡罗的大力推崇。作者建议把每一天分成3个时期，每一段为8个小时。第一时间段专用于休息睡觉；第二时间段则用于学习和履行“个人工作的职责”；而第三时间段则用在吃饭、娱乐和体育锻炼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建议大家记3份日记，或者说是“公开的账目”，这其中充满了对个人健康、道德成长和智力行为的观察。每隔3到6个月，就要准备一份“剖析回忆录”和3个部分的状况表；这些总结将呈交给一位朋友般的志愿者，由他来判断个人的进步。在这里，期盼获得内心启迪的愿望，加之因失去而产生的困扰，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这种规范是无法通过与上帝的任何形式的对话来加以证明的。结果将是一种永久的、强迫性的自我检查，这种自我检查是不以一个人对他自己和他人的看法为转移的。这种前进中的内心独白使每一个人都能控制住他用以看待他人的方法，从而使得他自己在众人眼里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对个人隐私的强烈渴求促成了对自省的要求。

19世纪上半叶，那些伟大的日记作者们不懈地追寻着他们的目标，即内心得到启发，他们甚至丝毫没有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野心。他们的作品，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记录着他们的工作、开销、休闲活动和爱情故事，就好像是一把公尺记录着每一次损失。坚持记私人日记将造成一种对死亡的忧虑，而同时，写这样一种日记的目的也就在于驱除这一焦虑。通过对一个人浪费钱财的方式的察觉，日记变成了节俭策略的一个要素。“通过记录过去一切有感而发的东西，”德拉克鲁瓦于1824年4月7日写道，“我活在两个世界里；过去的生活随时都会重新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将来却总是摆在那里。”一本回忆录，当然也是一副专治健忘症的良药、一种纪念的工具，就这样成形了。

记日记同时也是内心约束的一种形式。经过内心深思熟虑的忏悔被记在了纸上，变成了白纸黑字。把东西写下来，就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分析自己的内心罪恶、记录下性欲的缺乏和失败以及自己无力去付诸实践的萎靡想法，他只会暗下决心，准备再次去尝试。

许多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这一令人着迷的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对马涅·德比朗来说，记日记是发现男人们在观察上的学问的一种方式，最终也是理解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式。许多历史因

素加深了个体的自我意识，而所有这些因素都驱使着每一个人去进行自我探索。在这些历史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而滋生出来的不安全感。日记作者们对他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提出了质疑，并且推测着他人的看法和意见。社会无声的存在时刻萦绕在日记作者们私人的、独自的生活周围。城市化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模式则成倍地加深了人们的自恋创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挫折，从而导致个体转而寻求内心的庇护。1816年，马涅·德比朗预言了心理复仇的需要。他预见了一个时期，亦即当“人类疲于感觉的时候，他们将会发现，退回他们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容易，在那里他们将寻求依靠、平静和种种安慰，而所有这些情感我们只有在心灵的最深处才能找得到”。

正如马涅·德比朗再次感觉到的那样，不断增长的固定财产，与对个性化的追求并不是毫不相关的。在他对于财产的记忆当中，他的朋友，修道院院长莫尔莱已经发现了“每个人对他自己、他的才能和他的自我所拥有的”财产权。对此他感到很高兴。

菲利普·若利埃：《一封书信》。当时，共和国的学校系统已经建立，这使年轻人第一次可以用各种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撰写自传

哪种类型的人会写自传呢？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只要我们专门注意那些为历史所认可的人，如那些伟大的日记作家。当时的社会禁止女性出版自己的文章，因此许多妇女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是为了满足她们对于写作虽说不上是癖好的强烈欲望。欧仁妮·德盖兰也承认，写作缓和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拉马丁夫人，那位诗人的母亲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记日记的人通常有以下三种：那些并不非常适应社会，却不得不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那些没有能力与他人交流并为此而痛苦万分的人；还有那些很难做出决定的人。1848年5月，阿米埃尔27岁，他不断地考虑着婚姻的问题。马涅·德比朗当时也为一种他所谓的“当务之急”而困扰，其实我们应该称之为他的焦虑，他把这种担忧归因于“对他自己的不信任和猜疑”；而他自己也承认：“我凭空地为我自己创造了那些幻象和困难。”

伟大的日记作家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至少是一个害羞的、不成功的人，由于他没有能力做到令人满意，他被一种同性恋的倾向控制着。地方的资产阶级家庭是私人日记的理想滋生地。核心的家庭结构促成了子女对母亲和孩提时代的依恋。比阿

维科泰斯·德西斯泰罗：《回信》。一位贵族或者资产阶级小姐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当中。信件，有助于巩固团体内部的关系，同样也在爱情关系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通奸行为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期，当男人们碰巧看到一封情书或者一篇日记时，通常会发现自己妻子的罪恶秘密。

特丽斯·迪迪埃证明，记日记的人遭受一种退化、一种想要回归母亲子宫的愿望的折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日常的零星散记就好像是一种永远的课堂作业或者课外作业。

一篇日记，在根本的、或许是最重要的意义上，是一种活动。它需要费力的工作：想一想阿米埃尔所写下的1.7万页日记吧。对于那些对内心独白甘之如饴的人来说，记日记同样也是一种练达的欢乐的来源。“当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马涅·德比朗宣称：“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得紧跟我的思想和意念的活动；探索自我；审查我的意向和我存在的各种方式；提炼我内心中最美好的想法；记录下那些偶尔在我的脑海中灵光一现的念头，或者是通过阅读所获得的启发。”在这一点上，日记是隐私世界中至高无上的乐趣——马涅·德比朗承认：“在回到亲密的家庭生活中时，我渴望变成我自己。直到那个时候，我才会是我自己；别的什么也不是。”然而，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日记更是婚姻幸福的敌人。妻子们尤其不得不

秘密地记日记。欧仁妮·德盖兰就是如此，即使是她极为敬重的父亲，她都会瞒着他记日记。她一般都在晚上，在她的小阁楼里，一边凝视着满天星斗一边写满她的笔记本。比阿特丽斯·迪迪埃注意到，记日记的行为确实具有手淫的特征。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得估量日记的社会分布情况，它在许多方面遗留在文学评论的专门领域。许多日记作品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一事实导致人们对它们的数量估计过低。众多迹象显示，这些日记作品形成了无数生命的一个对照。即使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日记也并非是不为人知的，P.H.阿则的日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位有着正派背景的巴黎自学成功者。在这一水平上，日记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家庭日记账的延续，同时也是账簿的同时期产物。此外，我们有理由猜想，那些把她们的感情倾注在日记上的年轻女孩子肯定为数众多。卡罗琳·布拉姆的名著是在一个跳蚤市场上被发现的，玛丽·巴斯基尔特塞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同样，伊莎贝尔·富朗斯尼也不例外。

剪贴簿的流行同样应该在这里提及。皮埃尔·乔治尔注意到，在七月王朝期间，每一个好家庭的女儿都拥有一本剪贴簿，并且在亲朋好友当中四处展示它。拉马丁仔细阅读了利奥波尔蒂娜·雨果的剪贴簿，小迪迪埃在里面记录了她的游戏、她那幼稚的梦想，以及她直到13岁时的读物。后来，她还回想起当第一个爱慕者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时，她为此又是叹息又是自我坦白。她开始关心她的容貌，关心她在舞会和游戏中所注意到的谈论，同时她还在旅途中记游记。剪贴簿就是一个万花筒：在它的一些页面上，贴着成绩单，独特而生动的版画也零星地点缀其中。在利奥波尔蒂娜结婚之后，她的剪贴簿连同其他笔记本一起，被搁在了家庭档案的新博物馆里。

剪贴簿的象征性等同物，又或许日记都只存在于社会的下等层面。难道一个青春期少女的嫁妆上，绣的不是一种对她私人情感和未来梦想的记录吗？它的作用当然不只是为了确保她结婚后亚麻布制品够用。阿涅斯·菲讷曾描述过，在比利牛斯山脉地区，达到适婚年龄的少女们用红线专心致志地缝着、绣着，并且在这些绣品上绣上交织字母。这些被姑娘们视若珍宝的亚麻布制品后来被证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连年轻的女性继承人都投入了这项仪式般的活

动，尽管以她们的情况来说这些嫁妆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女人们极其迷恋这一象征性的收藏物，当卡贝在《伊卡里》中建议没收这些珍贵的嫁妆时，他遭到了多方的强烈谴责。《听任摆布的劳动者》的作者加利阿从她母亲那儿继承了装满精致的亚麻布绣品的衣柜，对此她十分珍视，而且她确实想从中挑选出一件能跟随潮流的漂亮东西。

慎虑的野心

日记作者们对以往自我的回忆和寻思带来了遗憾，也激起了无限乡愁；同时还赋予了志向以崇高的价值，鼓励着每个人去梦想他们的将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段关于野心的历史，一段我们仍然无法了解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非常谦虚的。如此这般的小心谨慎正好与一种肤浅的观点相抵触，这种观点认为19世纪是一个欲望无限的世纪。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现状的诱惑，以及维持这一现状的强有力机制。长期以来，普遍的对保护人的依靠、推荐、裙带关系和纷繁复杂的家庭策略，共同阻止了精英阶层的兴起，即使是在共和国取得胜利之后，实力主义的发展仍继续为其他因素所控制和抑制。对努力过度和劳累过度的担忧，加之医学智识对这种担忧的推波助澜，有助于人们遏制进取的雄心。尽管今天力图将其的影响缩减至最小，但古典人文主义在其间也起了作用。有多少贺拉斯的读者、多少成熟的男人不是排除万难去争取悠闲舒适，并且坚持“及时行乐”的原则？在他们当中，不乏有文森特·莱特笔下的诗人般的长官，以及迪朗蒂在其剧本《昂里埃特·热拉尔的不幸遭遇》中塑造的纳维尔地区的总统和地方官员。在人们对装饰物的迷恋中有一种很明显的渴望获得公众尊重的愿望，这种热望经常胜过了对财富的渴求；同时暴发户所面临的困难显示，社会流动性并不仅仅是一个财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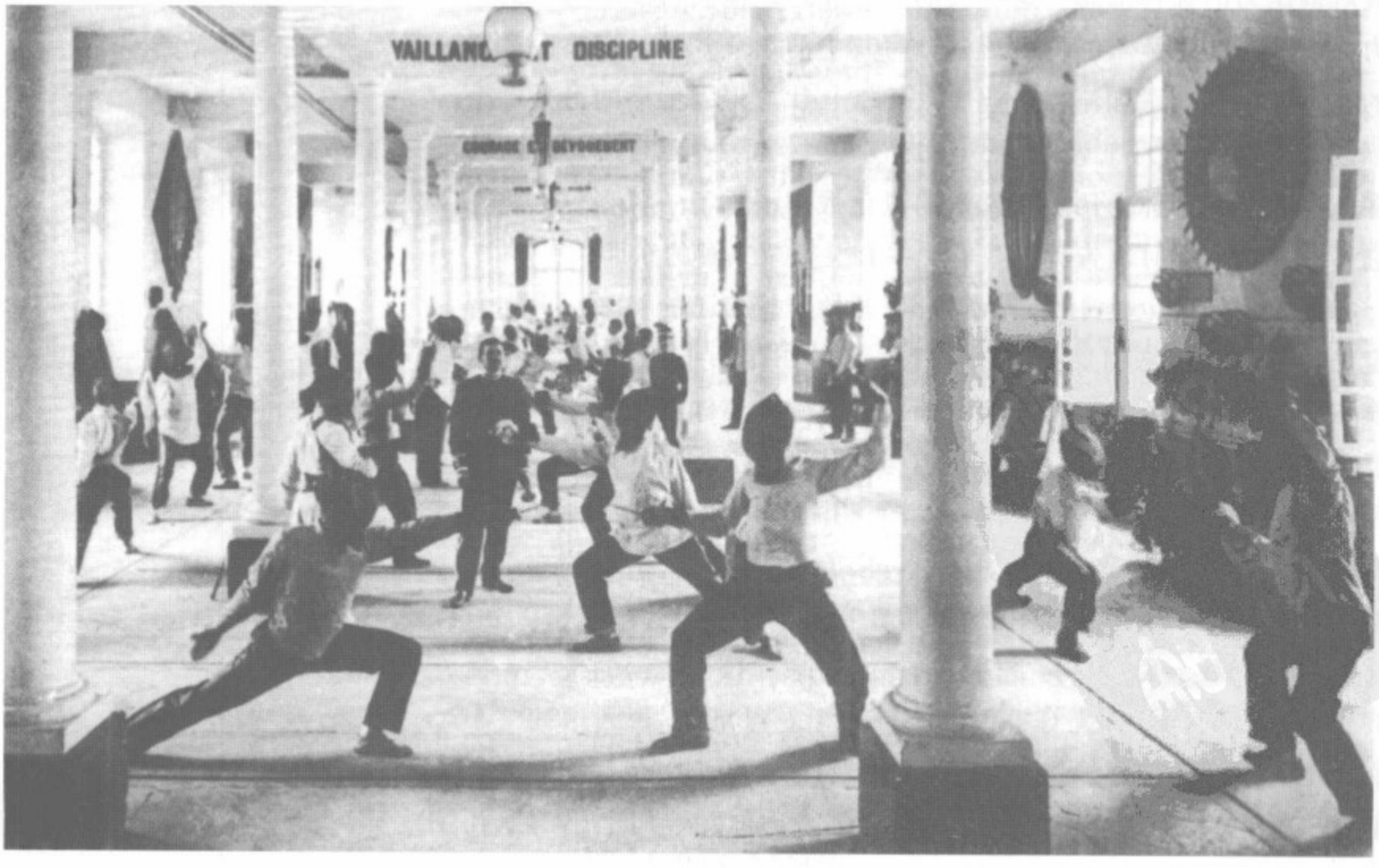
有了这些事实，我们便胸有成竹，也更加容易理解量化了的历史的一些结果，例如职业和文职工作的持续魅力。1864年，迪律伊曾下令进行一项调查，调查有关在省内的国立高等学校学习古典名著的学生的情况，这项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计划进入圣-斯于尔的法律学校、医学院或者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资产阶级宁愿选择去政府机构工作也不愿去经商。克里斯托弗·查尔勒已经能够评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机制的耐久力，以及高等政府机构持久稳固的吸引

力。各种技术学校和其他的著名高等院校强烈地吸引着资产阶级的年轻一代，即使在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反复漂移的专业至今仍有待发展，因此，进入政府机构工作并不是聚敛强大财富的一个可靠方式。

相反地，那些为他们自己的技术和专门技能感到自豪的工人们，却没有急于脱离他们的社会背景。因此，从事一种特定行业的人的子女中的联姻率非常高，而向上的流动程度却很低。代代相传的职业变动频率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掩盖社会状况的全面稳定性。

然而，在1830年到1850年之间，一小部分工人遭受了一次新的挫折并深受重创。这些工人指的是那些注定要从事某一职业的人，那些因为他们的工作纯属虚掷光阴而深感痛苦的人，而不是那些备受压迫的工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为一种奢侈的感受所困扰和备受煎熬，为了减缓这种痛苦，他们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入了“卧室里的白日梦”中。这些产业工人的夜晚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同时也时刻萦绕着个性的幸福感。他们过着和工人一样的生活，却努力争取能拥有像资产阶级一样的谈吐和文笔；这一小部分工人经历了自我对待压力的独特形态。这些人的雄心壮志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研读一些晦涩难懂的巨著，抄写其中的章节并且熟记整段整段的文章以便能倒背如流。产业工人的雄心壮志得以传播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在七月王朝期间，参加夜校学习的巴黎工人人数的增多。这些非凡个体的历史为枯燥的量化数据增添了一抹亮色，赋予它新的意义，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欲望来源的东西。

在乡下地区也是一样，人们渐渐开始梦想自己的将来。事实肯定要比言语更能证明这些尝试的第一步。如此一来，皮埃尔·利维埃尔的恐怖罪行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个体对一种集体的精神萎靡症的反应。个人野心的规划导致家庭结构以某种速度缓慢地走向破裂和瓦解，这种速度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与家庭结构的种类有关系。遗产的策略被破坏了，如何对付家族中年轻一代的问题却正好被巧妙地解决了。格雷戈尔·达拉曾经在奥尔良省研究过农民阶级，根据他的调研，发展中的个性化削弱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不安全的感觉，并且摧毁了一种“小农经济”，否则这种“小农经济”也许还能够抵抗得住正在进行当中的经济震荡。家庭成员们没有转向内部发展，并且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们宁愿土崩瓦


DISCIPLINE

解，宁愿割断曾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感情纽带。对于不断增强的忽视家庭成员的心理和家庭感情的蒸发，我们可以举出无数迹象。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王朝复辟时期，候鸟般迁徙不定的流动工人开始拒绝把他们的积蓄上交给父亲，不久以后，他们便不再回家，去拥抱他们亲爱的母亲和众姐妹。

乡下地区的年轻人在三种类型的野心之间疲于奔命，这些野心主要受微妙的家庭内部等级制度的影响，而其家庭内部等级则主要是由兄弟之间的年龄决定的。首先，这其中包括拥有土地的传统野心。与过去相比，人们现在更容易得到土地；它反映在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农场的破裂以及大面积的空旷地的重新开垦上。其次，农村的年轻人有一种愿望，希望通过在某一种农村副业上谋得一个特殊的职业，例如磨坊主，或者尤其是酒店主，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些职业是加来海峡省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获得社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他们的第三种野心是永久性地迁移到城市中去，在那里，流动工人形成的网络将减小他们被放逐的危险，并且还能为他们提供团结，帮助他们找到住处和工作以及共同进行防卫。这些网络通常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它们已经在城市里发展壮大起来；在一代人当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关系，使得后来的世世代代有可能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升。

左页图：英雄主义、男子汉气概、文学和艺术创造力以及雄辩的天赋，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了自我实现的梦想之中。19世纪的精英阶层依靠法律学院和医学院使自己获得了重生——特别是依靠所谓的著名学府，这两幅图中所展示的高等学府的制服继续吸引着野心勃勃的年轻学生们。

宗教职业

野心的最高境界便是从事宗教职业。想要过宗教生活的难以抑制的强烈愿望不时被破坏，在一些情况下，这鼓舞了19世纪的家庭生活。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神职人员人数的增多明显地反映出这一职业的高潮。那些进入教会工作的人的社会背景各不相同，正是因为各个主教教区的神职人员社会背景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企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总的说来，无论如何，与过去相比牧师明显具有一种更为乡村化的色彩。最初的召唤经常在一个年轻人参加第一次圣餐礼的前夕来临；在那个神秘的关头，乔治·桑德感受深刻，事后她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不幸的卡萝琳·布拉姆也怀着如此强烈的感情亲身体验了她的第一次宗教礼仪。1850年之后，天使的象征主义，圣母玛丽亚般的虔诚信仰，圣灵怀胎说的教条，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圣徒的复活，以及反神秘主义思想的逐渐薄弱——这一切都鼓励着一种青少年的多愁善感

情绪，这些青春期孩子的冲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身体的否定。处女的幻象，从1846年的拉萨里特到1871年的蓬特芒，都证明了其神圣的存在，并且刺激着另外一些召唤。

宗教召唤的长期一致性同样也值得注意。某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这就表示他们把自己当作是人民的使徒了。查尔斯-费迪南德·甘姆波恩，一位极其富有的绅士，由于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因此他的一生中有15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拒绝了家人和未婚妻的恳求，宁愿忍受狱卒的阴险折磨也不愿祈求国王的宽恕。当他最终获得自由时，他又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了共和国的事业中去。无数的工人阶级斗士在巡回的传道中过着一种几近使徒般的生活；那些女权主义者选择终身保持童贞，或者至少一辈子不谈婚论嫁；还有禁欲的教师们都在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模仿那些行使宗教职责的古老典范的行为举止。弗朗索瓦兹·马耶也说明了她在严格的师范院校的生活多么类似于一家女修道院。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回顾由孜孜不倦的让·梅特罗出版的《工人运动词典》中的简短传记体评论，以了解他们对于有关个体生命的献祭和许多人梦想中的一个人的死亡的解释，是富有成效的。

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有关野心的简短历史的结论，有一点是明确的：失望是一种平常而又意义深远的经验。1864年，学习古典名著的学生们梦想着成为工业行业的首领和带头人，成为伟大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应该从事学校教师、会计师和法官秘书的工作。而姑娘们则梦想着嫁给一位理想的求婚者或者一名英俊的手工艺人，但是她们却完全明白家庭的婚姻策略，她们对于家庭政策的要求熟记在心，同时也知道这一策略将最终迫使她们投入某个头发灰白的单身汉或者倒霉痴呆者的怀抱。

精神错乱

在19世纪上半叶，旅行方面又出现了一场革命。每一种新的经历都将在人们的梦想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一些主要的城市里，一种平和而安宁的古老旅行模式已经画上了休止符，而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旅行方式。这种新模式最早产生于18世纪，是建立在这样几种模式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索斯律尔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旅行，雷蒙·卡博尼阿热前往比利牛斯山的远足以及康布里前往菲尼

于勒·雅姆·鲁热隆：《一位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入会仪式》。在罗马教皇与各君主间的宗教事务签订协约（1801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期间，女性从事宗教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法兰西的教派指望能依靠妇女在社会，同时也在家庭中驾驭人类的精神。

斯泰尔山的远足。旅行的主要目的变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修养。

旅行者整装待发，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与正常环境之外的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新感觉。他们渴望能亲眼目睹雄伟壮丽的风景和粗犷自然的景色，或在山腰野营，以便能远眺洒满落日余辉的山巅，俯瞰沉静而深邃的山谷。他们博览群书，其中游记方面的典故邀请着他们将自己与旅行地的原始人相比较。源自瓦尔韦莱小说的高地人和烤大牛排的印第安人的形象导致了一种粗野人种学的产生，当然，这种人种学主要是由幻想组成的。学识渊博的凯尔特人研究院成员和其他学术团体的考古学家都指出，可以在土壤的深处找到过去的痕迹；他们还提出了矿物质、植物和人类之间神秘的一致性。

空间的崭新体验

一些在人头攒动的旅游胜地游玩的旅行者，会组成小集团冒险前往附近山脉的山脚地带观光游览。1816年，梅讷·德比朗和拉蒙冒着极大的危险爬上了比利牛斯山的大斜坡。七月王朝期间，《旅行指南》得以出版，其中详细地说明了各地的景色和优美景观。这些指南连同带插图的期刊以及不久之后发明的快照一起，培养了公众的洞察力。倍受欢迎的旅游线路层出不穷：继阿尔卑斯山和奥韦格涅之后，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尽管为游人提供的住处并不充分。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期间，新兴的旅游观光事业紧紧地抓住了各阶层人的心。在不同旅行时尚的时间选择上，社会的差别很容易得到解释。当来自鲁昂的上层资产阶级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佩里肖却在冰的海洋上勇敢地向死亡发起挑战，这是布朗克山附近的一条大冰川。

即使是普通的漫游行为都发生了改变。人们想要找到一处避难所，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交谈，并且享受能安抚人心的自然美景——总而言之，就是想要分享卢梭在圣-皮埃尔的亲身经历——这种愿望一直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但在这个时候，其内容却被现代化、被改进了。适合于沉思的理想地点现在变成了天然山洞、微风拂面的乡村田园、波涛汹涌的海岸，以及矗立着灯塔的海角。勒内和多米尼克的读者们很快就采用了新的旅行时尚。让-皮埃尔·夏兰发现，无论鲁昂的资产阶级离海岸和沙滩有多么近，他们都更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到森林和田野里享受独自沉思的乐趣。

七月王朝期间，人们转为寻求一种新类型的体验，福楼拜和迪康穿过布列塔尼半岛的远足便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再寻找来自地球的新发现，不再搜寻超自然的和人类学的意义，更不再推测那些神秘的一致性。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开放，他们自己身体所传达的讯息也得以公布于众。在这种新形式的远足过程中，人的身体比过去更加深入地卷入了其中。身体得以暴露的第一步明显地表现在：库尔贝笔下的裸睡者和莫泊桑的划船人参加的郊外野餐中；去海滩旅游的风尚中，人们去海滩并不是为了晒太阳浴——那时还没有这一说——而是为了呼吸清凉而新鲜的空气；还有就是在不足13摄氏度的海水中洗浴所引起的寒战中，关于这一点迪丹·雨果在她的剪贴簿里有所提及。

在美丽的埃普克，全家出动前往崇山峻岭探险的旅行方式开始风行起来。人们在体育运动上的新兴趣让一项前往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远足观光的古老兴趣得以复苏。

对于有教养的年轻人来说，伟大的“东方”之旅——前往西班牙、希腊、埃及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旅行——的启蒙作用是同样重要的。日益普通化的蜜月旅行如今已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同时这也是一种在两层意义上得到启蒙的机会。年轻的夫妻一方面被威尼斯和突尼斯的优美景色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对布列塔尼半岛的海岸和挪威的海湾眷恋不已。

旅行更是消除平凡生活苦闷的一剂良药。人们在旅行返回时，总是带回一大堆的纪念品；这些纪念品的重要性即使到现在都很难以想象。一本本剪贴簿里贴满了断断续续的印象和模仿当时流行的《皮托雷克游记》的印刷品，这些剪贴簿就是不可缺少的纪念品；许多由伟大的作家出版的备忘录和旅行故事，从司汤达到福楼拜，从戈蒂埃到内尔瓦，都证明了旅行体验的强烈程度。然而，随着旅游列车的引入，特别是“朝圣者们的攻势”（1871年至1879年）和群众朝圣组织传入之后，乡下地区的群众也开始体验这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行为，而与此同时，这种经历已经丰富社会精英阶层的生活达一个多世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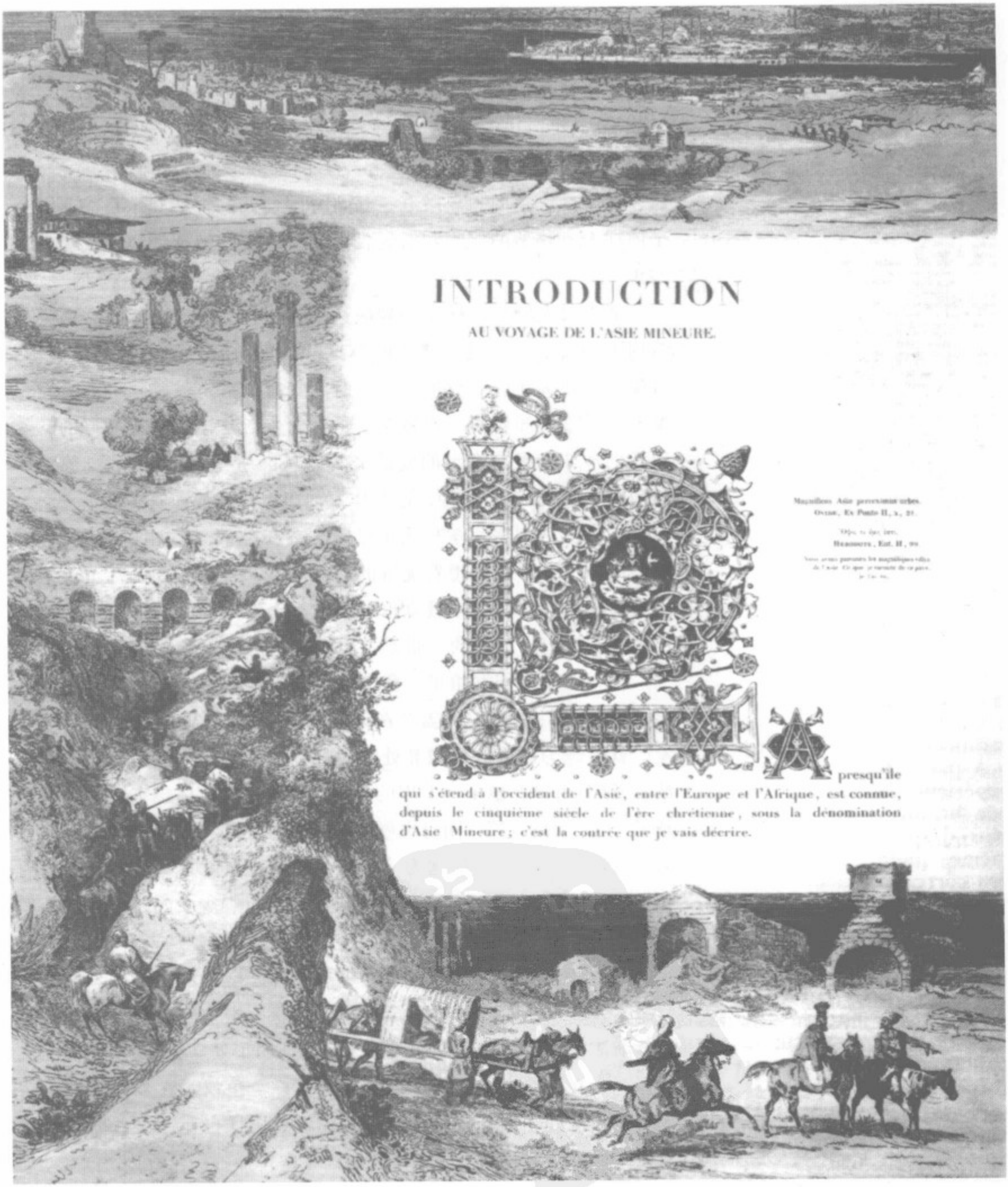
雨果曾经注意并且记录下城市里爱闲荡的人，或者说是流浪者的出现，波德莱尔也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这一现象不但反映了公

关于远足的英勇无畏的回忆帮助加固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尽管工人们不再进行临时旅行，但是旅游观光业仍然把体验方面的一个新行列拓展到广泛的人类交流中去。新景点的发现也不再是巴黎的精英人物和富裕的外国游人独享的兴趣所在。

共空间的转变，而且反映了隐私新的重要性。在流浪者穿过城市中多石的林荫路四处闲荡的过程中，他发明了占用公共空间的策略；因此这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变迁的象征。在这一城市内的探险活动中，他搜寻着一些也许有可能重新组建私人生活条件的地方。在他的眼里，街道本身就好像是一间公寓。在七月王朝期间，由城市规划者们建造的带有拱廊的街道和那些隐身其中的咖啡馆，正好为公共行为的新形式提供了理想场所。对流浪者来说，它们是伪装的所在。后来，在使城市和街道奥斯曼化的时期，火车站和大百货公司——那些新兴的商品云集的场所——将变成流浪者最后的避难所。如今流浪者则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离奇有趣的、古怪的形象，他逐渐放弃了人行道，并且把它让给了匆忙赶路的人们。那些神情压抑的路人满脑子都在担心他们的安全，并且沉浸在他们自己的当务之急中，没有闲暇功夫去留心路两边的街景。此时街道的景色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家庭的外延。

幻想的途径

众所周知，浪漫派以一种大胆创新的精神改变了想象，照亮了幻想的新途径，丰富了内心独白的形式并且使他们的读者陷入沉思和默想，甚至是入迷的状态。在这里，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给出有关



拉博德：《东方之旅》，1837年。

这一伟大变革的简短概括。卢梭和后来的拉马尔蒂纳都进一步阐明了感官的幻想，人们在幻想中思考着自己的内在生活。这个新的流派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它提倡把私人的沉思默想与死亡的主体、时间的飞逝（由过去的遗物所勾起的回想）、汹涌的大海、繁星满天的夜晚和夜莺的动人歌唱相比较。1830年之后，宽阔的大道向想象敞开。具有异国情调的神话和传奇故事介绍了前往遥远陆地的探险和对远古的追溯，这些神话故事取代了私人幻想。

文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围绕在私人生活周围的新屏障，更为严格的卫生学，更加激烈的、发奋的锻炼，对谦虚的新关注以及更加紧密的时间安排，肯定鼓励了一些人在想象中寻求逃避和解脱。年轻女孩子们的生活是被控制得最严的，然而她们却依旧做着虚无的爱情美梦。从巴尔扎克到埃德蒙·德贡库尔和马赛尔·普雷沃斯特，这些作家的小说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男孩子们则被送到寄宿学校去上学，远离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他们同样也在梦中幻想着优雅的窈窕淑女；一些男孩子甚至去尝试不太体面的性行为。在教堂里瞥见的一个纤细的侧面剪影，或者是出现在一扇窗户后面的一张鹅蛋脸，就能完全激起他们的幻想。

在青少年的档案馆里，我们可以找到无数有关这一偏爱幻想的嗜好的线索。欧仁妮·德盖兰在墓地里的散步似乎也是因为受到了启发，就连她为死者的肖像和处女所打动的特别姿势都是如此。利奥波尔蒂娜·雨果在她十六七岁的时候保存的那本“体例书”说明她超越了“沉思的论述”，同时也展现了她对沉思的技巧的一种令人惊讶的熟练掌握。她的一篇题为《夜晚》的文章，就是一篇关于幻想的长篇大论。乔治·桑德叙述了当她还只是个青春少女的时候，她是如何想象坐在凡尔赛的一座公园里的，而那个公园她从未见过。后来，年轻的奥罗尔还进一步阐述了她容易让自己全神贯注地投入瞬间的幻想，并且任由自己沉溺在最为疯狂的念头当中的习惯。奇异的幻想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狂躁症。她的作品证明了处女行为的诸多方面，这些观点在涉及医学的文学领域引起了广泛争议。在梦幻中生活而不是为活着而生活，这种福楼拜式的诱惑同样也在这里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我们并不能估量出它在社会中传播的广泛程度。

梦中的影像

让·布斯凯相信，19世纪的人们比较早时代的人富有更多的梦想；这也许能说明他们在这一主题上拥有极大的兴趣。梦想应该能揭示个性的最真本质，然而在那个时候个性却隐藏在无数的遮盖物之下。弗洛伊德的影响已经趋向于模糊某些19世纪有关梦想的信仰。在19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仔细思索着精神的夜间状况。梅讷·德比朗相信一点，那就是当身体入睡时，人的精神也同样进入了休眠状态；然而，儒弗鲁瓦却坚持认为此时精神仍是保持警觉的；勒卢则主张人在休息的时候精神也是静止的。对于浪漫派来说，做梦完全不亚于一种精神的复苏，梦想揭露了生命的最深本质。

长期以来，做梦的机械系统的科学价值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理论家们在存在感觉上的兴趣；二是身体影响精神的信仰。来自身体各器官的讯息，特别是大脑的讯息，决定了梦的内容；前一天心中所想的事情和每天感觉的残余记忆都是至关重要的。梅讷·德比朗，以及后来的莫罗·德图尔斯、阿尔弗雷德·莫里和马卡里奥，区分了感官、情感和智力的梦。

1845年至1860年，一群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彻底革新了有关梦的理论。他们指出，梦只是众多机械系统中的一个，正是因为这些机械系统，更高的精神形式才会衰退和解体。因此，梦被归属于病理学及暂时的精神错乱和疯狂的领域。研究者们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梦游病现象及入睡的过程上，确切地说就是专心于研究当一个人的思想不再连贯时，他在梦的开始所经历的那种不准确的感觉。梦的“精神病化”很明显地反映在莫罗·德图尔斯的著作《有关梦的状态和疯狂的特征》（1855年）当中，同时也反映在对纳尔瓦的《水母》一书的迷恋中。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梦的科学一直盛行而从未引起争议，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直到心理分析的传入。

一个更难解决的历史问题涉及了梦的现象学和做梦习惯的社会分布情况。布斯克以一句不容辩驳的宣言开始了这场辩论：“仅仅是从大约1780年以来，人们才梦到了一些奇怪的场景和稀奇古怪的毫无意义的幻象。”而这些正好组成了现代梦想的实质。在他看来，梦的形式、内容和作用，都在18世纪末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尽管如此，专家们仍然同意一点，即有预兆的梦在这一时期消失了。梦想不再聚焦未来。据乔治·斯泰纳所言，牛顿的宇宙论学

说的传播，以及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传播，使人们有可能在夜晚的黑暗和朦胧中寻找到未来的些许征兆。然而，那些由叫卖小贩散布的“梦的钥匙”仍然是下层社会最畅销的——它同时也是理论超过实践发展的速度和陈旧的信仰观念在下层民众中得以存活的证据。现在，梦经常涉及到做梦者本人的私人历史。浪漫派以他们的主张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梦代表一种回归生命最本源的东西，它保存在孩童时代的早期记忆里。对孩童时代在家庭中的整个位置的回忆也因此被重新评价了。

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同样肯定的语气来说明，性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18世纪的文学作品经常涉及到性梦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仅仅把注意力局限在这些文学作品上，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地发现，性梦出现的频率在逐渐减少，一直到1840年或者1850年左右，才被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形象所取代。梦因此便发展成为和白日梦极其相似的风格。然而，1850年之后，性爱的主题又有了显著的恢复。联想到妓院的一些淫秽而猥亵的梦，例如那些由福楼拜记录的性梦，开始第一次出现。根据尚塔尔·布里昂的论述，这一变化出现在1850年到1870年之间。即使是睡觉的那几个小时都会萦绕着金钱交易的色情服务的诱惑和皇帝般狂欢作乐的放肆思想。在这一色情思想的回归中，阿尔弗雷德·莫里看到了一种他称之为“解除压抑”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目的大概在于抵制当代宗教发起的反对肉体欢愉的活动。实际上，性梦发展的高潮正好与天使影像的传播相符。最容易屈服于性梦诱惑的人便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女和犹如处女般纯洁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备受夜间遗精的痛苦），“那些从事脑力劳动和智力思索的个体”（引自马卡里）也是这样。埃德蒙·德贡库尔报道的一些梦，甚至是朱尔斯·勒纳尔在他的日记里叙述的那些乱伦的梦，都证明了一种深刻的认知——当心理分析的种子被播种下去时，对梦幻与性欲之间关系的认知。

有关旅行、公共马车、火车和风景的梦出现的频率也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它趋向于确定新的时间体验的心理重要性。莫里自己就曾经梦见他作为一个旅游者在心里盘算的宏伟景象和壮观画面。在他叙述的梦里面，出现了不下6个城市的模样。在涉及到入睡前感觉的一种特别形式时，他承认：“当我在外旅行时，首先我会受到这些独特的幻想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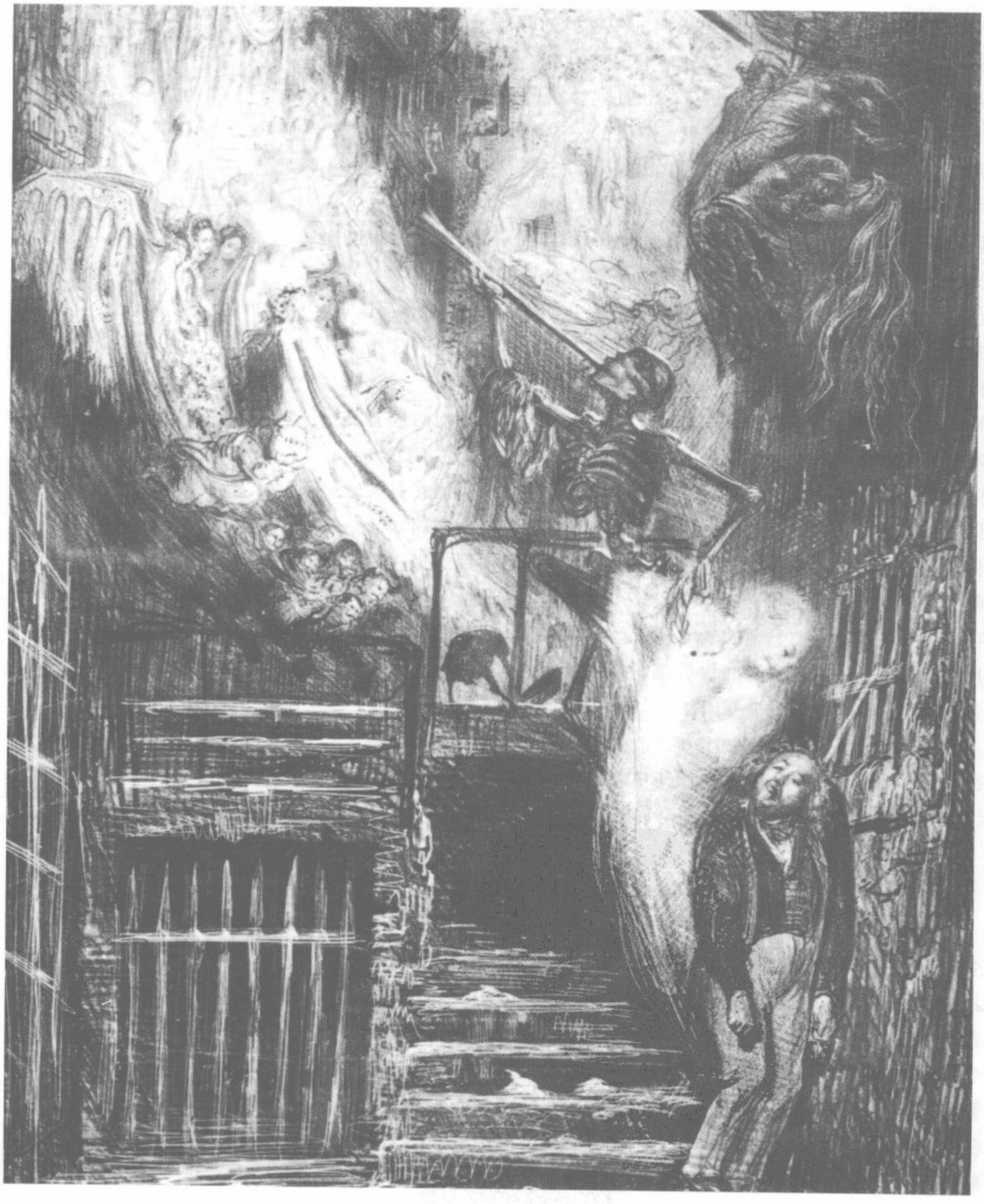
把那些突然出现在19世纪人们的梦境中的政治主题列成目录，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革命行动是有关梦的文学作品的主题。这也许正是对革命深忧远虑的一种无意识征兆。在柏格森选定莫里的奇异梦境作为分析对象之后，莫里曾梦见的关于断头台的梦境变得非常出名，另外他做的关于镊子的梦也广为人知，这个梦境主要由六月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引起的。但是，也许这些梦境应该被解释为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梦的实例。按照尚塔尔·布里昂的说法，有虐待狂倾向的梦在19世纪末期变得十分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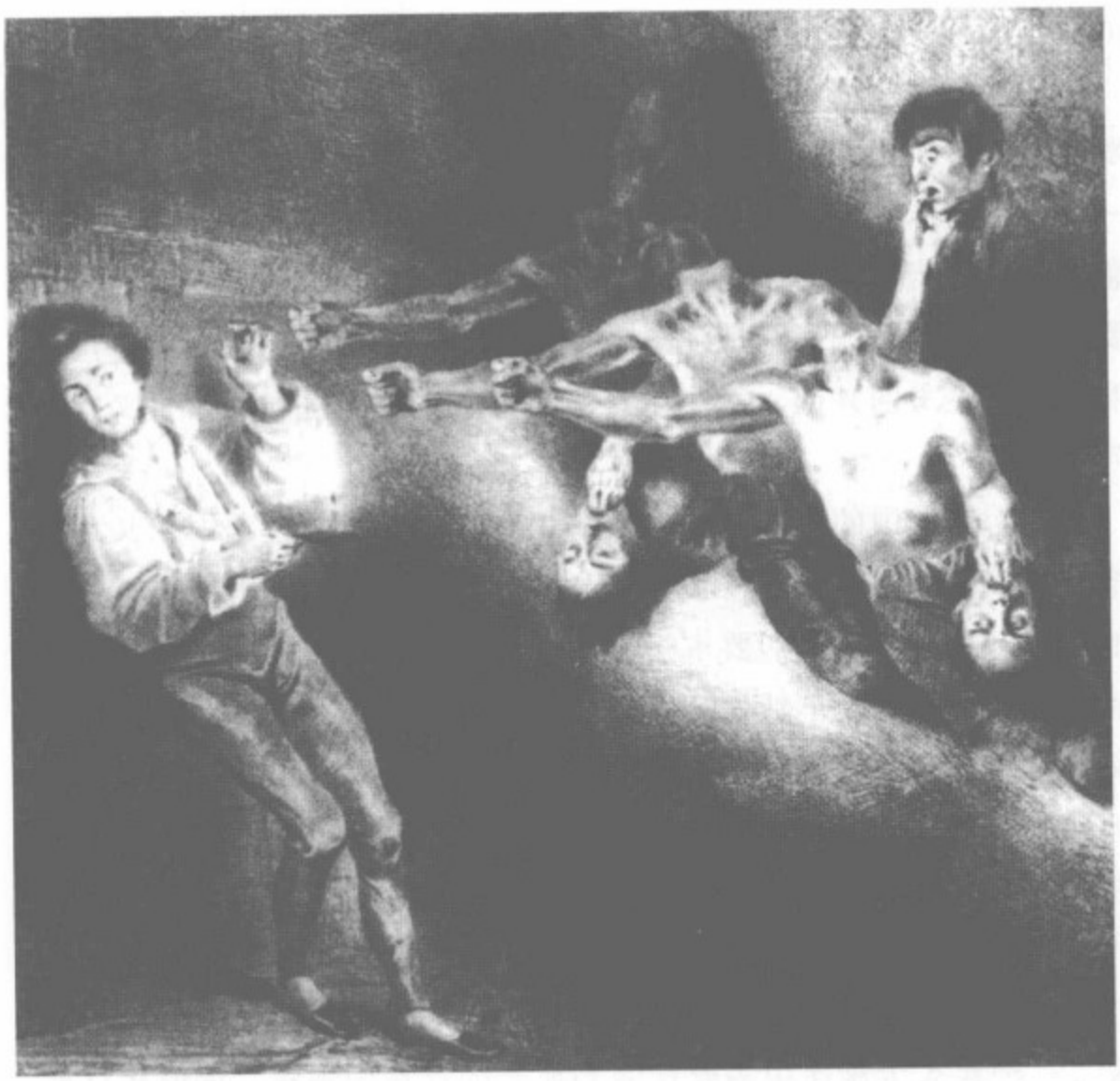
在对几百本关于梦境描写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让·布斯克得出并建立了一个严格的体系。与之相比，以上我的这些评论可能显得有点杂乱无章。依照布斯克的说法，原来只限于天堂和地狱象征的各种各样的梦中幻影，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垮台之后，逐渐扩展开来。在众多有关伊甸园的梦境分流中，我们必须把有关花园和自然景观的梦境计算在内；而在有关地狱的梦境派生物中，有关于洞穴和城市的梦，又有从众所周知的精神错乱状态滋生出来的焦急的梦。这些新生的恶魔般的幻影改变了噩梦。梦同时还传达了压抑、无意识的行为和分裂的性格的意念。在1850年之后，两种类型的梦境逐渐会合到一起，就好像做梦变得日益凡俗化了一样。从那时以后，同时代类型的梦幻、荒诞主义或者奇异之事便自由地发展开来。

布斯克的入迷调查，加上我之前的一些评论，证实了反弗洛伊德假说，亦即梦也具有它的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想象的历史和梦的内容的发展演变之间有许多的相互关系。

独白的催化剂

在第二帝国的高潮时期，再版的古典名著要比新近出版的作品多得多。如果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散布在下层阶级中的文学作品上，我们将发现，与过去的连贯性可能更加显著了。事实暗示我们，宗教上的虔诚情感和个人祈祷的形式发展得极其缓慢。精神实践仍然严格地遵照以前的教师的教导。拉芒纳为效仿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有很长一段时间，效仿一直都是广大热心的基督徒们最习惯的向导。阿尔的“好教区长”就是一个没有时间范畴的精神折衷主义的典范；虔诚的信徒欧仁妮·德盖兰依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拜





路易·布朗热的名为《警觉的眼睛》的平版画，引自中世纪的叙述体故事。噩梦中的创造物拥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在断头台的发明和世界末日之间，某些折磨形式的消除和各种新的焦虑和苦难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做梦的方式。

读圣-奥古斯丁、圣-弗朗斯娃·德萨莱、博絮埃和费内隆的作品。王朝复辟时期的传教士从以前传教士那戏剧化的语调中受到启发，从而获得无数来自地狱折磨的灵感。浪漫派对死亡这一主题充满了浓厚兴趣，他们一想到泰蒂利昂和圣-伯纳德那可怕的话语就全身发抖。最后的沉思，很自然就能找到通向精神忧郁症的新的戏剧化之路。

独自祈祷和沉思

即使是在所有正当的连贯性都被考虑到之后，我们仍然不可能否认19世纪在虔诚问题上有所创新，然而，这个主题已经被专注于估量不信仰基督教的范围的宗教社会学家们过度忽视了。当我们分析祈祷的目的和感恩的表情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与以前相比，人们去祈祷只是为了更特殊、更细小的目的，而且更多地牵涉到家庭问题和琐碎事务。希望转化或拯救一个丈夫或者兄弟的祷告，加上希望生意兴隆和成功的祈祷，融入了传统的祈祷之中，即希望个人从疾病中康复，希望越洋航行能够一路顺风，或者希望为国报效

左页图：古斯塔夫·多雷：《维耶埃-朗泰尔内的一条小巷》，1855年。

的战士能够安全归来。

还愿物从来没有像19世纪时那样分布甚广。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还愿物的数量直到187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还愿物是一种人们表示感谢心情的物质象征，它具有小资产阶级解决当务之急的特点；当然，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还愿物成了表达感情的首要形式之一。人们逐渐把注意力专注于受益人身上，这一点再次证明了个人主义的兴起，而我们其实在每一步都能碰到利己主义这个问题。

在为炼狱中的灵魂祷告的祈祷仪式逐渐普及的过程中，其不断增长的家庭导向本质同样很明显。一个虔诚的儿子，大概是听到了他那些已故家庭成员们要求祈祷的呼声，为了减轻他们在炼狱中的痛苦，他花了一大笔钱请众人来举行祷告仪式，接受圣餐，念祷告文并且竭尽全力以求获得特赦。1884年，一名乡下地区的助理牧师，比尔吉埃神父戏称自己是“炼狱中游历的灵魂的推销员”，他在拉夏佩尔-蒙特里热昂创建了一个有名的组织，名叫“作品赎罪的祭献”。它的成就十分令人吃惊：截至1892年，它以拥有三百多万名会员的庞大阵容而深感自豪。这种快速的增长证明了一种需求，一种在人生旅途中需要伴随着死者的存在的需求；同时也证明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第二帝国初期所流行的、席卷文明社会的唯心论中得到了反映。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敬而将家庭的宗教仪式编撰成文，这只会增强人们想要同阴阳相隔的灵魂接触和交流的愿望。着重点从炼狱的烈焰和短暂的折磨转变为一种更为安心可靠的、与灵魂交流的形象，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人们的想象中，这一形象正在一种菲利浦·阿利埃斯称之为“会客室”的小房间里等待着你。

精神生活的本质发生了改变，那么心灵便不得不经受新的人生通过仪式。与此同时，不可知论和自由思想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他们的信仰。性别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当年龄在16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开始尝试过成人生活时，他们几乎总是满怀疑惑，没有什么信心。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隐藏着“背叛的教士”的可悲形象，这位变节的教士在大革命期间嘲笑和批判教会的神职人员。这一形象也引发了巴比·奥雷韦利的灵感，让他写下了最为光彩夺目的小说作品。相反，信仰的转变使人们达到了新

的思想境界。热心的传教士们一生都在追求把新的灵魂领入教堂，他们在叙述转变经历时，也是满怀喜悦的。从斯韦谢夫人（1815年）到爱娃·拉瓦里埃尔（1917年），从于伊斯芒斯到跪在巴黎圣母院大柱子旁的克劳德尔纳，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皈依者，宗教信仰的激励和驱使，将有助于他们压制心中的疑惑，并且减轻那些已经背离宗教信仰的人所遭受的折磨。

痛苦的加深

19世纪可以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标志就是一种巴洛克式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王朝复辟时期达到顶峰；正如肖像学和虔诚的文学所证实的那样，在这种敏感性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痛苦的加深。人们几乎是以一种虐待狂般的现实主义来描述耶稣基督所遭受的苦难。格鲁的《耶稣和新娘的内心》及其译文的出版，安妮·凯萨琳娜·埃梅里奇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生活和他那悲哀的热情的想象》一书的出版，分别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一些可怕的文章还描写了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耶稣蒙难地)所遭受的痛苦折磨。在这类文学作品中，鲜血从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流淌出来，四处飞溅，浸湿了他的衣裳。然而正是这类作品激励着新拉马丁学派的信徒们。把耶稣的肖像描绘成头戴荆棘花冠，就好

这幅图中的还愿物说明了祈祷的结构性已经发生变化。留给神圣的助理主教的空间变小了，而更多的空间被贡献给了能引发感激之情的私人生活片断。

像全身缠绕着一条荆棘带的模样，这已经成为惯例。耶稣一根手指指着他胸膛上的几个洞的形象也已经很常见了。浪漫派甚至把婴儿时期的耶稣也变成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圣灵的儿子被血迹斑斑的花冠所环绕的肖像画法形成并发展起来。我们的“七悲夫人”和“圣母哀悼基督之歌”的形象便成为圣母玛丽亚虔诚品质的焦点所在。后来在1846年，圣女拉萨莱特便具有耶稣受难的象征性。

宗教惯例反映了这种悲剧式的敏感性，而受难耶稣的鲜血流淌过整个人类历史的信念更加强了这种敏感性。无数的妇女甚至年轻姑娘——她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三修道会的会员——效仿那些著名的神职人员，穿麻布衣服，甚至系可怕的金属腰带。阿尔的神父鞭挞着他自己的“尸体”，而拉科尔德尔则安排人们踩过他的身体并且朝他脸上吐口水。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效仿耶稣基督；新的祈祷方式升华了人们向完美的庇护所前进的理想。他们再三强调，只有对耶稣的伤口进行沉思，才能得到充满耶稣心灵的神圣观念。同样的敏感性滋生出一种惯例，一种参观由14幅耶稣受难图组成的连环图像的做法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十分普遍，从而对阿拉斯和奥尔良主教教区的调查予以评价。与其他任何时期相比，19世纪有更多的耶稣受难像在各地被竖立起来。

向一种天使般的虔诚发展

在1848年2月互助革命发生之后，宗教的虔诚变得不再那么强烈。早在10年之前，特拉普派的医生皮埃尔·德勃讷就已经严厉地批判了禁欲生活的残暴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容易引发歇斯底里症和肺结核。一种更加带有感伤色彩的宗教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恐惧和反麻醉观念发起了挑战。肖像学向着更为平静的主题发展进化。圣母玛丽亚的新幻象和教会教义的发展促成了一种天使般纯洁的虔诚思想。那位容光焕发的卢尔德的白衣女郎与拉萨莱特的母亲多卢罗萨的形象相差甚远。塞斯的圣灵感孕说的文雅形象与守护天使那令人安心的图像共同存在且相安无事，而守护天使的画像很快就被复制成彩色印刷图片广为流传。即使是圣女伊苏迪的圣灵都不再带有任何的悲剧色彩。

母亲和孩子在一起祈祷，象征着新兴的不受拘束的虔诚。宗教手册对这一“动人的生动场面”大加称赞。母亲必须把孩子放在膝

上图：艾米莉·夏洛特：《游行的尾声》。

下图：朱尔斯·布雷多尼：《一座基督受难像的安放》。遍布法国乡村地区的大多数耶稣基督受难像均可追溯至19世纪，证明了那一时期的宗教敏感性的悲剧性一面。画中的女孩子们都身着白色长袍，在另一方面，一袭白色长袍说明中世纪的人们处于圣母玛丽亚的虔诚的深刻影响之下，其虔诚也具有一种天使般纯洁的面貌。

头，把他（或她）的小手合在一起做一个祈祷的姿势，并且鼓励他（或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他或她的第一句祷告。年幼的心灵将因此而把圣女和婴儿时的耶稣形象与母亲联系起来。这种温和的问答教学法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宗教体系，而我们对于家庭内的宗教知之甚少。最后，在1910年时，它导致罗马教皇颁布了卡阿·森凯拉里教令，这项教令批准了私人宗教团体的存在。

对“最神圣的圣餐”的尊崇，以及日益频繁的领取普通的圣餐，都进一步地削弱了人们的虔诚程度。于1852年在奥尔良主教教区创建的“永久的崇拜者”组织，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又在阿拉斯主教教区复活了，这个宗教团体带来了一个新的个人感情的来源。即使是最单纯质朴的基督教信徒都对新兴的平等主义留有深刻的印象，正是平等主义使得他们能够独自撑起一片天，能够面对面地与他们心中的上帝交流。在“好的教区长”周围，人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故事，讲的是无知的农民经常在小教堂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别的什么都不理会，光知道死盯着耶稣的雕像发呆，当人们问他沉

私人生活的新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部的礼拜方式。祈祷和宗教教育拉紧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由基督幼年时期的画像所引起的感情多半强化了多愁善感的情感生活。

思默想的本意时，他回答道："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这种庄严的"毫无架子"的祈祷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念玫瑰经和沉思其神秘性的重要性。随着古老的宗教团体的复活和新团体的产生，在1850年到1880年之间，这些惯例影响了不断增长的人群，并且蔓延到众多的下等社会阶层中。

在1850年之后，个人在私底下的崇拜迅速地扩散开来。明显与宗教雕像的新流行不同的是，祈祷的分散和新的对话者的指定，被证明是一种精明的调整，因为它使得教会能够对抗人们对创造奇迹的圣人们和神奇泉水的普遍崇敬。然而历史学家持续不断地在夏郎特省、利穆赞地区、卢瓦尔和谢尔河、莫比汗等地发现人们秉持着这种虔诚。同一种策略也许能够部分地说明许多主教教区和行政区里朝圣组织的复活或者创建的原因。在经过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以及巴黎公社的短暂插曲之后，圣母升天说的拥护者们在全国范围内精心组织了多次大型宗教盛事。

虔诚的雕像全力以赴地加深着耶稣基督的痛苦和磨难。这些广泛分布的圣灵祈祷卡片使得那些敏感的心灵都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死亡的主题上面。

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宗教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它变得严肃、道学化，并且无比精明，对于自发性的冲动毫不关心。虔诚的讲道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的风格。谢恩的奉献物的流行证实了祈祷的新功利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则改变了禁欲主义的本质。资产阶级使用的祈祷台变得更加的舒服，与此同时，以前的禁欲主义对身体的虐待被美德与过失的积累所取代。每天对冲动的约束、劳动的奉献以及对适当节欲的遵守，鼓励着人们不断地反省和思考自身的心灵状况，从而导致祈祷融入了日常的私人生活之中。

洋娃娃和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要求无声的对话者永远维持灵魂的高尚状态。在19世纪，有三个这样的对话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一个就是洋娃娃。

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洋娃娃类似一个不是小的，而是缩小比例的女孩子，她那精心设计的服装紧紧地跟随流行的趋势"。洋娃娃那纤细的腰和丰满的臀部反映了同时代女性的美丽标准。洋娃娃的种类有碎布制成的布洋娃娃和中间填满锯屑的羊皮洋娃娃。她的头部和脖子由制型纸板做成，牙齿则由麦秆或者金属制成。小姑娘们成天抱着她们的洋娃娃走来走去。因为洋娃娃模型的档次、嫁妆的豪华程度和玩具屋的大小反映着社会等级制度，所以洋娃娃

开始让孩子们逐渐意识到她们的社会身份。因此，孩子们很容易凭借洋娃娃来假定谁是她的心腹朋友。许多关于洋娃娃活过来并且开口说话的故事促成了洋娃娃能够履行这种心理作用的能力，同样这些故事也推动了技术上的进步。早在1824年，能说话的洋娃娃就已经被生产出来；第一个会走路的洋娃娃出现在1826年。

19世纪中叶左右，就在1855年，一场革命发生了。如今，越来越多的洋娃娃由古塔胶制成，它们时常代表着年轻的女孩儿，并且经常被不恰当地称作“婴儿”。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新的模型大受欢迎，因为它更容易让孩子们认同这些孩子般的洋娃娃。洋娃娃促使女孩们去思考她们和自己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次想象合适的母亲形象。在第二帝国时期，成人和“婴儿”洋娃娃的共存促成了一种异常强烈的模糊性。为洋娃娃缝制嫁妆、以她的名义组织一场舞会，并且构思她即将来临的婚礼，这一切都鼓励着年轻女孩们去认识她们将来作为女人的角色，并且让她们自己去熟悉社会的风俗习惯。

由于洋娃娃开始代表年幼的小孩，所以这种行为的心理容量便相对减少了。当第一个“看护洋娃娃”于1879年出现的时候，它的服装减少到只有尿布和襁褓，而玩具屋则缩小到一个摇篮的尺寸，这个时候它要得到认同是不可能的了，洋娃娃也不再适合当女孩子们的知心密友了。新的玩具对于学会扮演任何角色都没有什么用处，除了学会担任母亲的角色之外。这一转变明显地体现在孩童时代的新语言中，后来，又体现在家庭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中。

到1909年时，转变结束了。在那一年里，一种新型的洋娃娃出现了：一个新生的男婴。他的成功流行是迅速的，接着在1920年，他又被一种赛璐珞洋娃娃所取代，这种洋娃娃你可以给他洗澡。其时，已经喂饱了的动物登场了。这些动物“繁殖”着——并且刺激着——一种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20世纪中继续发展着。

动物，宠爱的对象

宠物的历史强调了在第二帝国中期出现的转变的重要性。直到那个时候，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遗留下来的杰出人才的行为仍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路易十六的宫廷早就否决了基督教的一条教义：对没有灵魂的动物的一种（虽说不上怀疑的）不关心；它同时也否决了笛卡尔哲学的关于动物机器的观点。人们不再模仿马勒伯

在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洋娃娃的样子仍然类似年轻的小姑娘，因此它有助于小孩子建立认同感和信心。到本世纪末，这些洋娃娃已经变成了教导小孩子母性的责任的主要教材。

亨利·劳伦·德斯卢梭：《给洋娃娃洗澡》。

朗士的行为举止，这个凶残的人照着他那只怀孕的母猫的肚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并且还责备它的叫声好似“动物幽灵”。连沙龙都深受卢梭为他的狗付出感情的影响。人们不再把动物看成活生生的玩偶，开始把它们当作值得付出感情的个体来对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动物的钟爱已经不只是简单地容许，而是稳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这种感情有两种初级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一个女人和她的狗之间的关系。温柔的笑容，慈爱的眼神，“单纯的爱抚”和“野性的游戏”，这一切都证实了女性倾向于亲切温柔和富于同情心，一种在医学文学中公认的倾向。这些女性的同情行为就是向男性传达的信息。动物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家庭内部的功能；它们教会孩子们什么是感情。

同样，在年纪稍大的小孩和他们的同伴之间也发展着感情联结。许多重要文章都标志着狗的忠诚的逐渐升华：拉科尔德尔关于那个老人最后的朋友的说教；《乔斯林》一书中那位教区长的白色小狗；最后是维克多·雨果的《笑面人》中奥摩的侧面轮廓，以及那条不知疲倦的狼。

如果富人们现在在他们的家中善待动物，那么穷人们在公众场合对待动物的方式则显示出暴力性。屠宰动物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但也是一个继续被认为是对社会有害的场景。在七月王朝期间，政府开始下令要求，至少在巴黎，屠宰动物的行为必须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进行。1850年，立法机构通过了《格拉蒙法》，这项法律规定公然地打家里的动物是非法的，然而，除了能加强早已树立在私人生活周围的墙壁的坚固性之外，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在浪漫主义盛行时期，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善待宠物的例子。欧仁妮·德盖兰深爱着她的一群小狗；她爱抚它们，修饰它们，而且还为它们祈祷。当其中的一只小狗不幸死去时，她痛哭流涕，并且坚持要为它举办一场尊贵而体面的葬礼。她感情生活的这个方面在她的日记当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空间。她那温柔的爱同时还环绕着小鸟，特别是夜莺。她的关心甚至还延伸到某只迅速跑过她的书页的小昆虫身上。动物已经被转变成一种舒缓孤独的痛苦的安慰物。当1841年司汤达发现他自己在西维塔韦克基雅孑然一身、没有人可以去关爱时，便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他的两条狗身上。梅里美老年时就是同一只猫和一只乌龟孤独地生活在一起。维克多·雨果也非

右页图：瓦莱丽·鹿特恩伯格：《乞怜！》。女人和狗：一种日益普通的二重唱。对宠物的温柔和亲切很好地切合了女性情感的思想。

常依恋那只随着他被放逐、背井离乡的忠心耿耿的狗。当冈邦在他的记事本中提到有关宠物的感情问题时，那段文字总是特别地有启迪作用。48岁的人总是能够被一头公牛的眼睛、一匹马的欢闹或者一头绵羊的柔弱所打动。就好像西尔维奥·佩利科，他在他的牢笼里喂养了一只蜘蛛，并且和一只蜗牛交上了朋友。在杜朗、马扎和贝勒-伊尔地区，他饲养了许多鸣禽和莺，这些可爱的小鸟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一个贫穷的利穆赞农民，从他的一个难兄难弟那里听到了金翅雀的美妙歌唱，还尝试着想把这一天籁之音转录为音符。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一个关于普通人对动物的关心和尊重的指示。我们一定不能被所有关于运货马车夫对他的马的残忍，或者那些安排斗鸡和斗狗比赛的人的狠心狡辩所蒙蔽。在19世纪20年代，奥南-塞尔奥唐地区的农民为皮埃尔·里维埃拉残酷的捕蛙和捕鸟行径所震惊，并且为他折磨马匹的方式深感气愤。从奥多阿尔·德梅居罗尔的信件当中，我们了解到，德龙省地区的农民们并没有屠宰那些为他们任劳任怨地服务的动物。而诺尔地区的工人对鸽子的感情也是众所周知的。1839年，J.B.罗夏·赛昂出版了他的小说《一匹骑兵战马的故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年轻的农夫为了追随他那匹已经被军队买下的马，竟然不顾一切地参军入伍，一点儿都不惧怕。当他因患肺结核而不幸死去时，他的马也拒绝继续活下去。

男人最好的朋友被一种银版照相法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做纪念。

1860年之后，当一场真正的集体精神衰弱症开始流行时，宠爱动物的感情发展得更加强烈了。1845年，保护动物的社团已在巴黎创建。这个社团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亲英派的反映，但是它同时也反映了由帕里塞医生所领导的法国动物爱好者们所做出的努力。在第二帝国时期，在公寓里喂养宠物，特别是狮子狗，已经变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于是狗的展览开始流行起来。当人们开始迷恋动物的血统和修饰宠物时，家庭宠物的相片便开始出现在家庭相册里，和孩子们的照片摆在一起。把不幸死去的宠物埋在院子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宠物墓地开创了一种对死者尊敬的新形式。狗甚至给铁路公司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得专门给宠物们新增几节车厢。与此同时，从资产阶级的保姆到女裁缝师，这些年轻的妇女都在她们的私人房间里或是顶楼上用笼子喂养各种小鸟，并且

查尔斯·特雷弗·加兰：《小姑娘保护她的猫咪》。在19世纪末，私人空间中依赖的关系被倒转过来。

把这当作她们敏感性的一个标志和美德的一个象征。1856年，米什莱写了一本关于鸟类的书，进一步地加强了这种感情。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动物的地位有了些许改观。自由思想家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使得人类和动物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友爱关系。保护动物的权利、关心动物的健康，是缓解人类新的孤独的良方。问题并不是在生态学方面形成的，而是在鼓舞人道主义情感和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用方面形成的。初级学校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动物身上，助社会一臂之力。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兽医学的发展和畜牧业的成功拓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新的友爱关系的发展。拟人说的发展也到达了一个顶峰，类似阿尔芳斯·图斯内尔的《富有激情的动物学》的作品，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人们新发现的想要同动物交流的欲望。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巴斯德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诚然，对细菌的恐惧虽然使得一些人相信只有戴上手套才能够安全地喂养宠物，但是这种担心明显没能抵抗住人们对于宠物的依赖。那

种恐惧却恰好有利于家养的小猫，因为家猫比它的死对头——狗身上的臭味轻得多，而且人们一般认为家猫能够更好地照料它自己。在此之前宠物猫只限于上层社会和艺术圈子，现在却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宠物。皇族的家庭一般都喂养波斯猫，而戈蒂埃和波德莱尔则选择宠物猫来作伴侣；只有看门人才表现出一种新的欣赏猫的优点的方式，而不仅限于欣赏它能控制老鼠数量的功能。到20世纪末时，动物不再依赖于人类，人类却开始依靠动物，至少在感情的意义上是如此，并且动物已经快要成为家庭内部空间的至尊主人了。

女人的麻药

当埃德蒙·德贡库尔把钢琴命名为“女人的麻药”时，他真的是丝毫都没有夸大其词。在19世纪的小说作品中，丹尼尔·匹斯通已经发现了2000次出现钢琴的场景。其中有一半的场景牵涉到年轻的单身女性；有1/4是关于已婚女人的。钢琴这种乐器的盛行始于1815年。过分的拘谨和假装的正经促进了它的流行，因为竖琴、大提琴和小提琴开始时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在七月王朝时期，钢琴传播到了小资产阶级当中，而且此后完全被民主化了。到1870年时，钢琴已经被认为是比较普通的乐器了，其流行程度开始下降。

从匹斯通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最明显的结论，那就是乐器的社会功用是最重要的。一个孩子如果会弹钢琴，那么这一技能将为她树立良好的名声，并且公开证明她拥有良好的教养。艺术鉴别力，连同“审美天资”的保持，都被包括在婚姻的策略之内。然而，钢琴很少是一次恋爱交流或对话的背景，那个角色应该属于歌曲，特别是情歌。尽管如此，在19世纪文学作品的四个常用场景中，通常在晚上由一个孤独的女人独自弹奏的钢琴，可以被看作是充当朋友、知己或者心心相印的伴侣的角色，同时也可以被视作自我表现的一个助手。随着钢琴从知心密友向毫无生命力的笨重家具的角色转变，这些习惯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即使是一个琴技不怎么熟练的年轻姑娘，她那天真的手指都能够表达出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正因为这个原因，巴尔扎克建议他的妹妹，洛尔·苏尔韦勒去买一架钢琴。这种乐器被看作是生性胆小羞怯的人发泄感情的一个出口。因此，在文学写作上便形成了一个惯例，习惯于描写一个坐在钢琴旁边的年轻姑娘，她相信自己是孤独的，并且向一个轻率的听众倾诉着纯真的、不容怀疑的感情。

钢琴使这个姑娘的灵魂升华到了理想的崇高领域，甚至于让她自欺欺人，对自己隐瞒起那些感情来。

一般来说，钢琴还表达了爱情受挫者的思乡愁绪，或者充当了向一个缺席的情人表达感情的使者。同样，钢琴还能够传达因为爱情末日来临而心灵受伤的痛苦情绪。依照埃德蒙·阿布所说，一个男人送一架钢琴给一个他已经抛弃的女人，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老套的文学写作中发现这一惯例，这种陈辞滥调描写的通常是一个善良但却不怎么美丽的女人，她敏感而又富有同情心，尽管她早已伤透了心，但是她却随时都表露出痛苦的情绪——朱尔斯·拉福热是这样描述这类女人的："她用肖邦的几小节音乐来完成对自我的分析。"

文学写作上的第三个惯例是最为常见的。在这种惯例里，钢琴就好比是抑制不住的流露感情的出口。正是钢琴使得朗格埃公爵夫人的强烈感情归于平静。在这个角色中，钢琴这种乐器取代了骑在马背上的狂奔和顶着暴风骤雨前行的愚蠢举动（解释三种语义场的类似性）。埃德蒙·德贡库尔发现，恰好在心理分析引入之前，在弹奏钢琴和手淫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最后，钢琴有助于女人在等待一个男人到来的数小时里消磨时间。依照希波吕忒·泰纳所说，弹奏钢琴帮助女人们把她们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女性社会地位的无效行为"。然而，所有这些形成惯例的场景都证明了钢琴在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记录首先告诉了我们男人是如何想象女人弹奏钢琴的场景的。长发披垂、掩映在烛光下的脸庞、眼神迷茫，这位弹奏钢琴的女人被描述成一个男性欲望的牺牲品。

独处的悠闲和秘密的财富

在19世纪上半叶，书籍十分昂贵。在王朝复辟时期，一本新出版的小说需要花掉一个农场工人一个月工资的1/3。因此，进入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书商已经所剩无几，书籍出租店变成了权威机构。在王朝复辟时期的巴黎，阅览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藏书被一本本地借出去或者以交付订金的方式被借走。一名将要出发前往他或她的乡下老家的读者，可以一次性借走20到100本图书。4万名巴黎人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藏书，其中大部分人显然是新兴资产阶级，

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小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书籍的租借制度。在书籍出租商店里，你不仅可以碰到靠收租金生活的人和学生，而且还能遇到许多与上层社会的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人：清理房间的女仆、校舍管理主任和女店员。仆人们被派出去借书，然后在圣-杰曼林荫大道上读书给他（她）们的主人听。在教堂的管区里，成批的租书店客户包括女裁缝师、女店员和手工艺人；工人们则从不涉足此地。书籍出租店一般在各个省都有，但是外省的租书店远没有首府的租书店发展得快。在七月王朝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在利穆赞地区的县所在地，缝纫用品商人的妻子，通常是寡妇，偶尔也会从那些稍微便宜点的租书店里借上几本小说。

居住在遥远的乡村地区的人们不得不通过邮局来定购书籍。一本书就是一件珍贵的日用品。意外收到一本作为礼物的书，是令人欣喜万分的事情。当阿尔比附近的贫穷地区卡耶拉的居民收到了沃尔特·斯科特或者维克多·雨果的著作时，他们会被莫大的幸福与快乐所淹没。通常是来自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叫卖小贩们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巡回游走，兜售一些主要出版者发行的书籍。这种卖书的方法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延伸到了最远的范围。这些出版商的手下排挤掉了那些谦逊的旅行推销员，尽管他们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已经散布了无数的著作副本，如《泰勒马克》、《奶油气的西蒙》、《布拉邦特省的吉纳维芙》和《罗宾逊·克鲁索》。

在19世纪60代，一个更为有效的书籍传播体系建立了。公共图书馆继续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它们的古典名著和科学著作藏书，部分是古老的修道院和女修道会遗留下来的，这些书几乎吸引不了什么人，除了专门的医师；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众多的图书馆浏览群书。在这些制度严谨的公共机构里，要求读者保持沉默，而且还要穿着得体，这些规矩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工人阶级的习惯本性背道而驰。这些因素不允许公共图书馆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城市居民有权进入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书店去看书了，这些书店都是由火车站图书馆贴补建立的。与此同时，便宜的、在大众中流通的报纸的出现，将19世纪早期陈腐的大幅印刷品粉饰一新。然而，农民继续在他们的老年历中寻找有用的知识。

阅读习惯的改变

三种不同的图书馆系统产生了：教区图书馆、大众图书馆和学

院图书馆。教区图书馆，专门收藏与宗教有关的、敬神的书籍。在七月王朝期间，即使是最小的城镇里都出现了教区图书馆。大众图书馆建立于1865年，经常光顾的人一般以年轻人居多，他们已经在学校里培养了一定的阅读品位。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则都是一些珍贵的书籍。对于那些渴望读书识字的乡村人民来说，贫乏的书籍来源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也不足以填补在兜售书本的小贩消失之后、一个大众流通的地区出版社还没有形成之前的空白。

随着书籍传播系统的改变，阅读的本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家里大声阅读的习惯逐渐消失了，边听边写作的习惯也是如此。在七月王朝期间，鲁昂的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着在晚上的定期集会上围着壁炉读书的习惯。然而，这种阅读活动逐渐被看作是过时的，只适合于病人和老年人。它被唱歌、演奏乐曲和画画等娱乐方式所取代。因此大声阅读便只存在于心爱的女儿或者同伴为满足年老长辈的需要而读书的情况下。阿尔的家庭女教师和神父乡间别墅的女主人每天都为不识字的仆人们诵读好几遍宗教书籍，而现在这种习惯也同样过时了。

相反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声阅读变成了农民中的

德戎热：《弹钢琴的姑娘》，1880年。会弹钢琴使一个女人在婚姻市场上能拥有更多的机会。灵活的手指能营造出一种欢快的氛围，当孩子们玩耍时，琴声能使他们安静下来；琴声还能激起恋爱中的男女的美好幻想。当一个姑娘出嫁之后，她的那架放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的钢琴会时常勾起她父母的美好回忆，提醒他们自己有多么想念女儿。

一个传统活动，他们经常在晚上聚集在一起开展这项活动。大声阅读的文章必须很短。他们的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谈话欲望，为在场的所有人提供一个讨论的主题。这样的一种活动自然与资产阶级定期聚会的单调而又很可能让大家昏昏欲睡的阅读方式大相径庭。19世纪末期，法国中西部城市里摩日的瓷器制造工人在他们的车间里相互大声阅读，这是一个后来的例子，这种习惯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修道院的食堂，而且现在的宗教寄宿学校仍旧保持着这一习惯。但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大声阅读让路给了无声阅读。

无声阅读并不一定意味着独自阅读。人们在图书馆、俱乐部、咖啡屋和阅览室都可以读书。但是，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确实意味着聚精会神和心无旁骛——简而言之，就是下层阶级长期以来排斥的一些态度。相反地，对于一些人来说，独自阅读又是一种自觉加入一群其他的读者的方式，一种参与和假想的伙伴谈话的方式。在七月王朝期间，在沙龙聚会中自顾自地读报纸的男人其实正在参加公共生活，他的行为也因此被意识到了。在吕西安·勒旺时代订阅《南锡日报》就是参加正统王朝派的小圈子。相反，鲁昂的资产阶级阅读了大量的福楼拜的作品。上流社会的谈话充满了对一天所发生的新鲜事的评论，也彰显出在闯入社会之前个人通过私下阅读所获得的知识。他们的这些阅读都是在客厅或者卧室，在花园的长凳上，或者视野开阔的户外完成的。

阅读曾一度是优秀人才的娱乐消遣，现在却随着文化的进步传播到各个社会的角落。巴朗特·杜夏特勒惊奇地发现，一些妓女也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来看爱情小说。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在1830年的革命之后，夜间的阅读强烈地吸引了一小部的工人阶级中坚分子。即使早在1826年或者1827年，阿格里科尔·佩迪吉阿巡游法国期间，他就曾养成一种另类的、随便的阅读习惯。除了贪婪地阅读叫卖小贩兜售的各种书籍和沉醉于熟练工人的歌谣之中以外，他同时还对18世纪一些写作手法最为平淡无奇的作家产生了兴趣，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刚刚被限量出版发行。

阅读习惯普遍随着年龄和性别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人们永远都试图把孩子们的读物局限于神话故事和传说。除了佩罗尔和德奥鲁瓦夫人的作品的无数新版本，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著作。这些书籍的作者，从德塞居尔公爵夫人到让·马赛，都试图抓住孩子的想象的

路易·泰松：《沉思》。研究19世纪文学的历史学家们早已注意到窗户在表现女性情感方面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独守空闺、一心等待她们的男人回来的年轻女人们来说，窗户为她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一角。女人们可以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前读书，还可以透过窗户观看外面开阔的景色，但是户外的喧嚣与吵嚷却被玻璃完全阻隔、拒之门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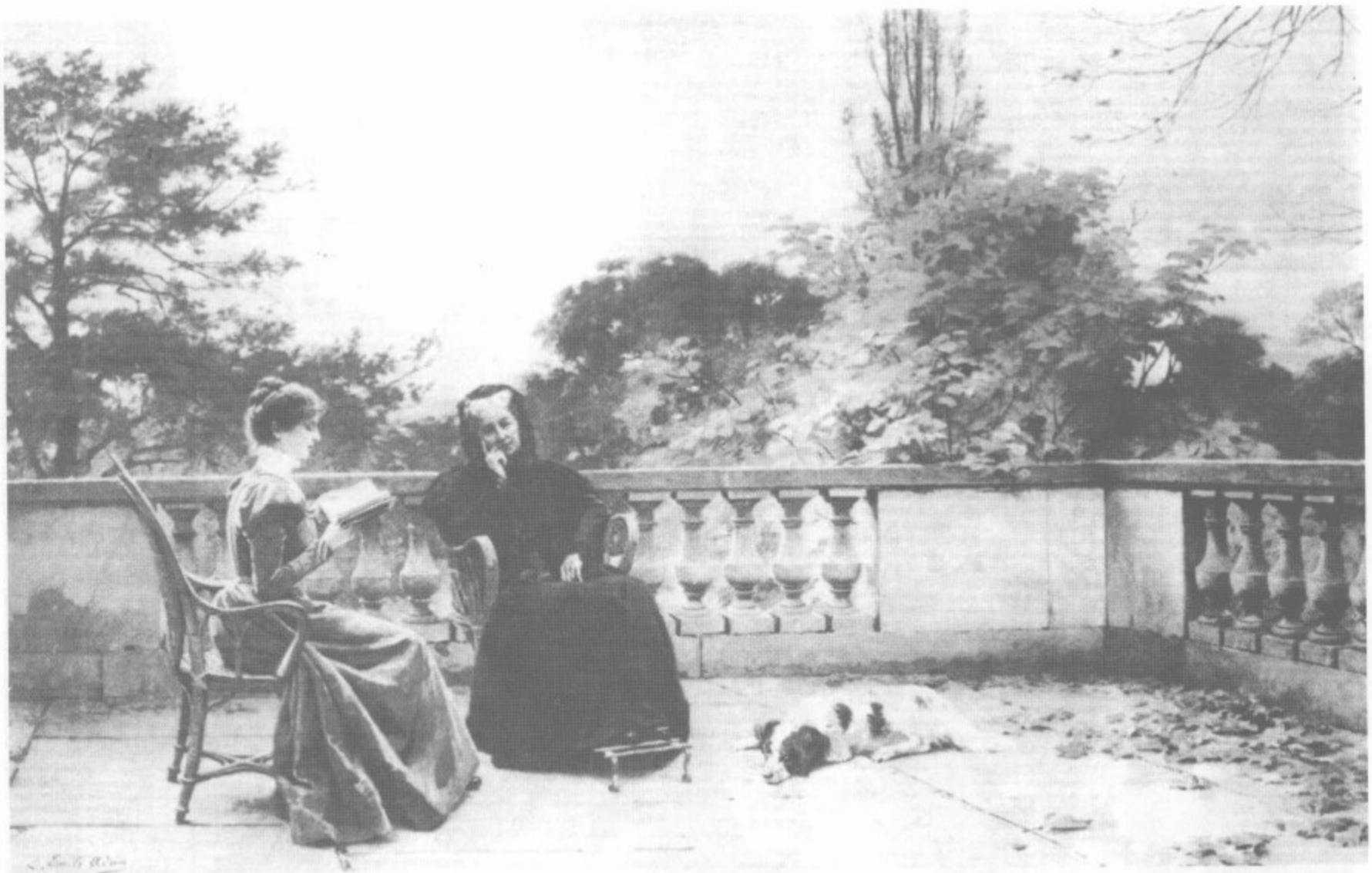
左页图：奥古斯特·雷诺阿：《弹钢琴的女人》，1875年。

历书的内容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仍然维持着农民的基本阅读方式。在晚上的集会时间里，它娱乐了整个团体。在某种荒谬的程度上，它还帮助农民们了解了更加广阔的社会。

特性。因此，一种新的文学产生了，它瞄准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小孩，并且旨在以精神优势的原因证明其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在内克尔·德索斯于尔夫人和吉佐夫人的领导下，一大批主要的、出于善意的小姐们都从德热丽夫人所塑造的一个模型中获取灵感。所有这些女性都同意医生的话，也即年轻小姐的读物必须被严密地监控。所有这些都公开抨击了小说的邪恶影响，小说也成为欲望和禁忌之间紧张压力的焦点所在。

一个读者的社会背景明显影响着他或她购买书籍的方式。在学院图书馆出现之前，渴望读书的年轻农民别无选择，凡是认同的就去读。有的时候，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所读的书的重要性；随意阅读的影响是巨大的。皮埃尔·里维埃拉对他在1820年所读过的书籍做出的反应，与卡洛·甘兹伯研究的17世纪弗里于利昂的磨坊主的反应如出一辙。两者都是散漫习性的不幸受害者。萨特在《晕船》中就曾经无情地嘲笑过，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学者将继续深受他们对已出版作品的无限制胃口的危害。在阿格里科尔·佩尔迪居埃之后半个世纪，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谢纳的矿工朱尔斯·穆塞隆，一旦从地下的矿井中冒出头来，凡是能够找到书，他都会爱不释手，贪看不已。贝尔-埃普克的女工还不是那么大胆；她们在看

玛丽·格林娜：《短篇小说》。显然，这位年轻的小姐正在阅读的并不是一本敬神的书，而毫无疑问是一本小说，但是这本书仍然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足够教会年轻姑娘一些纯真的东西，一些她也许无法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的东西。



埃米尔·亚丹：《读书的人》。大声阅读，曾一度是沙龙聚会的一个惯例，而在19世纪晚期却很少被采用，除非像这幅图中一样，一名陪护为一位年老的妇人读书消遣。

书时，感觉好像在偷取本应该投入工作的时间。她们从不对自己的阅读自吹自擂，也很谨慎小心，从不表达出个人的体会。然而，她们却狼吞虎咽地读着这些流行小说（其实这种类型的读物只适合于逐段逐章地细读），然后在车间或者上下班的公车上相互谈论。

书籍的内容

一旦人们到了一个他们可以为自己自由选择读物的年纪时，他们会选择什么书籍呢？文学作品的历史也许是容易被误解的；最具意义的流派并不一定是最有声望的。在1861年，虔诚的宗教著作广泛流传；遗产清单揭示了专业图书的重要性。普瓦捷的地方官员在他们的藏书室里堆满了法律书籍，而乡下地区的医生则在他们的藏书室里放满了医学图书。人们书架上的古典名著继续向上堆积；巴黎的资产阶级则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持鄙视态度。欧仁纳·布瓦洛1872年退隐到他在维格涅的城堡中，终日专心注释赛内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他从这两位作家身上总结出了个人的行为规范。19世纪的人们普遍喜爱阅读诗歌。对诵经台的熟悉，聆听长篇

大论的宗教祈祷文的需要，在主要的双语人群中对拉丁诗人的体会，在正餐之后朗诵业余爱好者的诗歌、之后再把它们如实地抄写进家庭的剪贴簿这种习惯的流行，诗歌社团的增加，以及也许是意义最为重大的歌唱的流行和工人阶级诗人人数的逐渐增多——所有这些都确保了诗歌在社会各阶级的重要存在。在这里，我只举这种普遍存在的两个迹象：在贝尔-埃普克，几乎所有瓦朗谢纳地区的矿工的女儿都拥有记录歌曲的笔记本；同样的习惯也存在于奥德流域的制帽匠当中。

同时代的人记录下了小说对古典名著作家和历史著作坚定不移的攻击和损害。从七月王朝开始，连载小说就一直盛行不衰，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出版商夏庞迪埃成功地验证了价格越低廉，版本量也就越大，连下层阶级的人们都喜欢上了看小说。在学校里，关于科学和爱国价值观的教育促进了当代作家的成功。在19世纪末，克勒兹省小村落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收藏一些像样的书籍，其中雨果和保罗·玛格丽特的著作与凡尔纳和埃尔克曼·夏特里昂的书并排放置着。

人们对学习独有的乐趣所抱的热情日益高涨，这足可与默读带来的进步相媲美。19世纪，收藏有价值的物品仍是男人们的主要消遣活动。正是男人发明了这项活动，并将之发扬光大。相比之下，妇女的发明则显得微不足道。批评家对在1892年和1895年举办的妇女收藏品展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些破烂玩意儿完全出自一帮游手好闲之人，看不出它们的丝毫价值。女人很可能受感情支配，或热衷于摆弄写字台抽屉里的家庭纪念物。

19世纪上半叶，收藏活动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受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那些一度有助于研究贵族状况的收藏物流传至民间，甚至沦为遗弃之物。古玩店里，许多收藏品起了翘角，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作的名画《四、二十、十三》。当能够将众多收藏品进行集中展示时，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土崩瓦解。

新的收藏家应运而生。购买市场诞生于1815年至1840年间。像巴尔扎克的旁系表亲、古玩商，虽然他们中许多人社会地位卑微，但很快收集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收藏品。在1840年与1845年间，收藏活动摇身一变，竟成了一种时尚。一时间，古玩店前门庭若市，

家庭博物馆

左页图：朱尔斯·特拉耶：《图画书》。翻阅图画书可以把兄弟姐妹们都团结在一起，书籍为后院的喧嚣提供了一种安静的、沉思默想的选择，同时也有助于塑造循规蹈矩的孩子的想象力。

众多资产阶级人士云集于此。因此，新的规则形成了。为开展长期性的研究工作，人们研究古玩，拜访古玩店。排除市场因素，七月王朝时期是研究考古学、国内博物馆及收藏活动的黄金时代。收藏家们对古玩爱不释手，他们的理想就是保护历史，而不是毁灭历史。当收藏家不幸辞世时，其心肝宝物就会传给他人。甚至在法国各省都可看到收藏家们的活动身影。图卢兹省就有十几个收藏家。

到1850年时，古玩生意运营甚佳。古玩实现了其真实价值。巴尔扎克旁系表亲的珍贵收藏品毁于波比诺特无知的双手，这个事实预示了金钱利益开始发生效用。收藏家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群腰缠万贯的收藏家起到了主导作用。所有的富豪商贾都觉得有必要聚敛一些有价值的收藏品，这种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银行巨头受到了这些收藏家的重创，例如，在圣-霍诺尔拥有一座宾馆的皮埃尔兄弟，再如，在费希埃尔拥有一座宾馆的罗斯奇尔德夫妇。许多其他的实业家也如此：尤金·舒内德收集了荷兰的绘画作品，他把这些宝物死死地锁在一间房屋里，不让任何人进去观赏，无论何时何地，钥匙都不离其身。虽然大多百货商店老总都是爆发户，但也无法抵挡从事收藏活动的欲望。博希考特收藏了珠宝，而拉·沙马利太恩的创始人——厄尼斯特·考格耐克和路易斯·简收藏了18世纪的艺术品。

同时，所有这些收藏家也是艺术品的主顾，他们对时尚潮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象派和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人士的作用。1870年以后，伟大的收藏家不忍心看到其收藏品在去世后受到丝毫伤损，为在死后也能留下一个好名声，他们愿意将其收藏品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这样在博物馆里就可留下其大名。

收藏家收藏物品的动机有两个。对于那些想夺权执政的人来说，收集象征性的物品是使其获取的社会地位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收藏活动本身就能为人们带来社会地位；当它与保护人的身份联系起来时，能促使一个人去影响艺术的品位和作品。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变得如此地困惑，以至于像阿尔诺·迈耶这样的历史学家都会被误导，至少在法国的事情上是如此，分不清资产阶级的折衷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

学习独有的乐趣

左页图：《禁果》，基于奥古斯特·图尔穆谢的一幅油画，1865年的沙龙。图尔穆谢在暗示我们，尽管由克劳德·萨瓦尔特论证的宗教文学作品分布广泛，但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年轻女性仍然知道如何从上层书架上找出一些书来自娱自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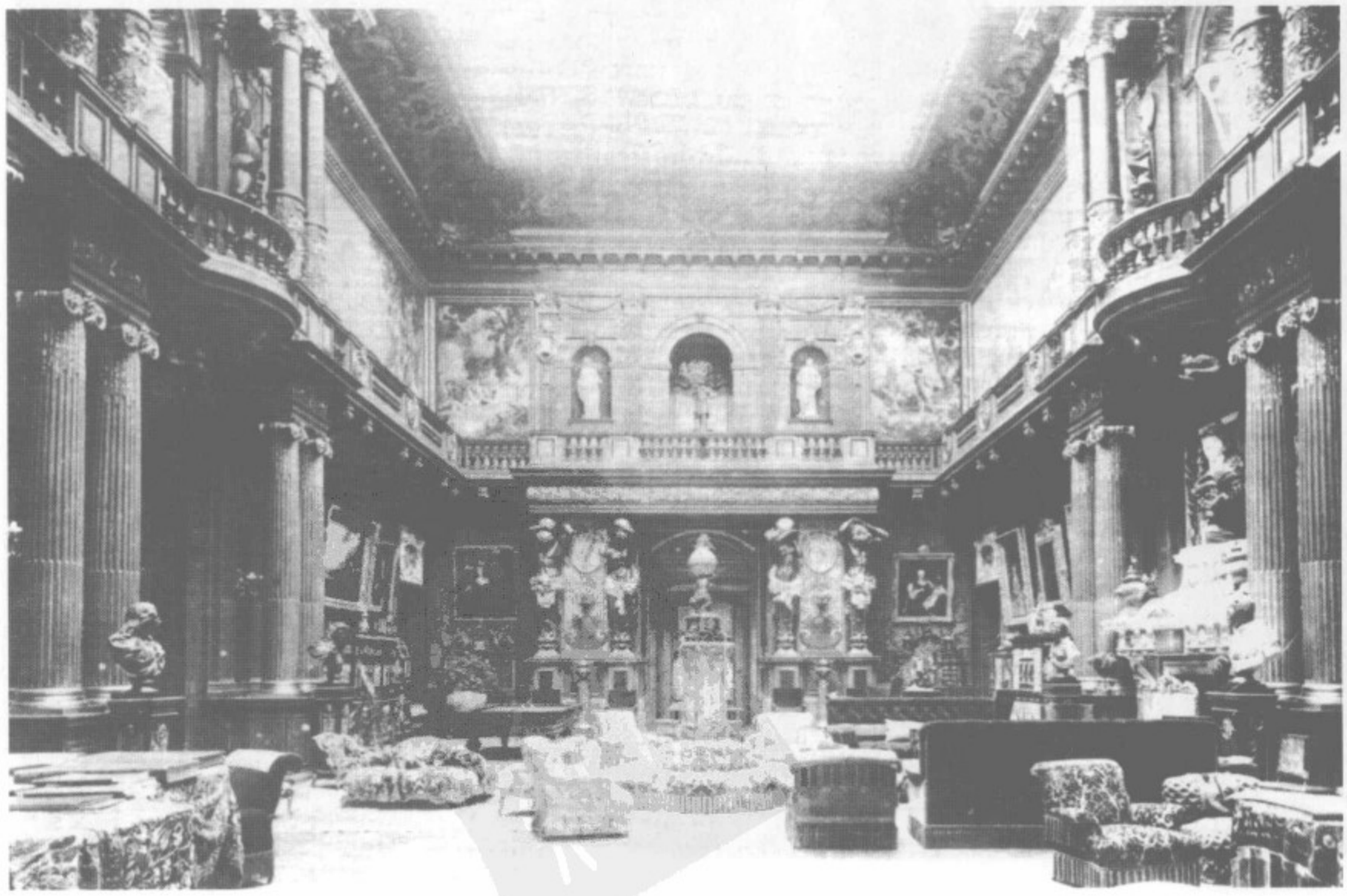
收藏的愿望反映了一种隐藏在私人生活中、有着深厚根源的心理状态。许多不同的愿望引导着人们在他们的家中建立私人博物馆。一些收藏和个人纪念品的积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内尔瓦尔珍藏着珍妮·科隆的一缕秀发和装有情书的柜子，如同那些能勾起福楼拜对他和路易丝·科勒在克罗塞特度过的美好夜晚回忆的、香气扑鼻的美味佳肴一样，都是个人幸福、思乡愁绪和焦虑之情的源泉。导致这些行为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一种想要控制或制止性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40岁以上的男人身上极为常见。

作为一种无须经过功能鉴定的纯粹性拥有，收藏满足了个人想要拥有私人财产的热望。然而，在一些情形中，收藏同样也是一种逃避的激烈方式，一种在不亚于个体自我陶醉的等同物当中寻求庇护和安慰的方式。假充内行和获得审美上的愉悦有时纯粹是托词；我们感到，对于一些人来说，收藏实际上是一种弥补现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失败的方式。当君主政权摧毁了二流文职官员亨利·奥多阿尔的事业时，他退隐到尚特梅尔，专心地投入了编录其家庭档案、收集贝壳和奖章的工作中。这种退回家庭生活的方式更加确定了一种与他人联系的失败，一种明显地反映在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内部流行的明暗搭配法中的失败，这种明暗法推崇豪华舒适的家具和厚重的墙帷。我们能否把这种退避解释为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群恐惧的迹象，或者是一种为聚敛珍贵物品的掠夺行为感到自责的迹象呢？德塞塞特（于伊斯芒斯的著作《反向》中的人物）的神经衰弱症暗示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促使人们坚持记日记的回溯性程序，可能同样是私人收藏的一种表征。这两种消遣方式都是想要用魔法驱除死亡的幽灵，两者都给人们带来了独处的快乐，然而两者同时又都是导致自我毁灭的方式。无论其含义是什么，收藏的普遍存在是19世纪上流社会历史中最为明显的事实之一。想要忽视这一事实，就会完全误解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领导者的动机。

收藏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阶层

收藏，长期以来只是社会精英人物的行为，最终却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当人们在1890年到1914年之间开始尝试新型的收藏方式，如明信片、贝壳、奖章和玩偶的时候，集邮早就已经流行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县里的小资产阶级，很快就屈服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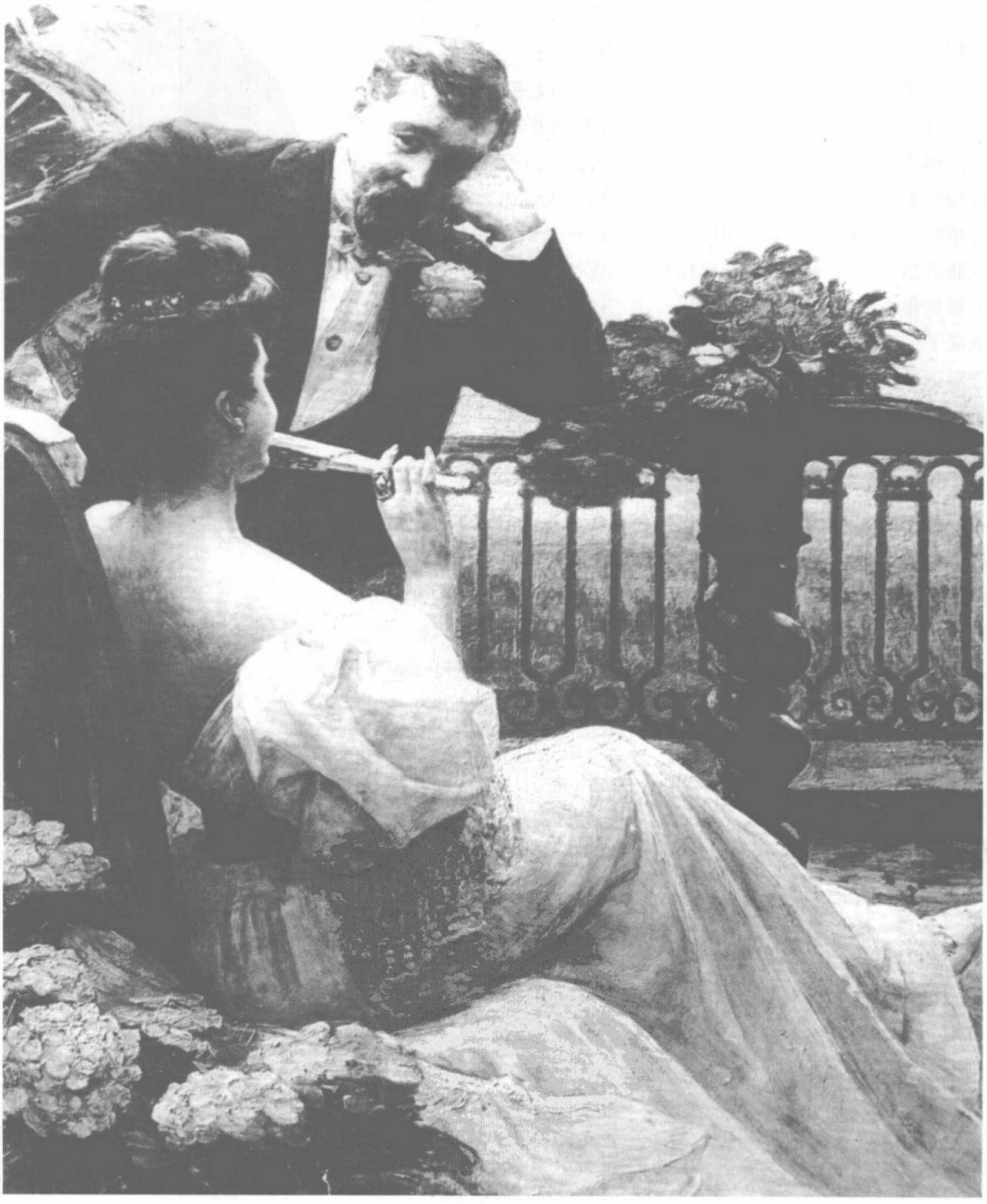
这些照片可以向上追溯到第三共和国时期。

集家庭档案和收藏纪念品的欲望。这些习惯向下传播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亨利·奥多阿尔虔诚地收录其家庭信件之后不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开始收藏相片、镶嵌物、结婚礼服、花束和新娘花冠。这些手工制作的珍宝将和法律文件和参军履历表一起储藏起来，构成一个在死后变得毫无用处的虔诚的纪念品宝库。这是一种促使收藏变得平民化、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想要仿效有钱人的愿望吗？当然是。但是它同样还代表着一种意识到过去的价值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拒绝接受代代相传的连续性被切断的想法，已经散播到整个社会中。无力确保这一遗产的传递，在社会的这一阶层造成了一种新的内疚感，正是这种内疚感驱使人们去收集那些至少能够记录过去一丝痕迹的物品。同样的一种愿望导致私人墓志铭不断增多。一个不出名的地主在他收藏的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约瑟夫·布鲁内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我这么对你说的时候，请你相信我。"

其他现象也带有几分仿效程序的性质。在19世纪80年代，当资产阶级的内政变得更加奢侈时，有着更为正派背景的人们成为了复制品的贪婪购买者，仿制的古董交易变得活跃起来，人们甚至开始收藏赝品。"路易十五"的卧室摆设和"亨利二世"的餐厅摆设，改变了人们的家具和住宅的方式。私人生活的整个进程受到了影响。

詹姆士·科林森：《空空的钱包》。这位年轻小姐把她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图画、小装饰品、鲜花和小摆设——这些女人的"收藏品"的典型物品上了。

左页图：亚瑟·亨利·罗伯茨：《索瓦热奥先生的书房》。一个被明显占据了所有可用空间的无关物品包围的"囚犯"，这个收藏家似乎正在检查橱柜上的锁。



亲密关系

左页图：查尔斯·克雷：《情人的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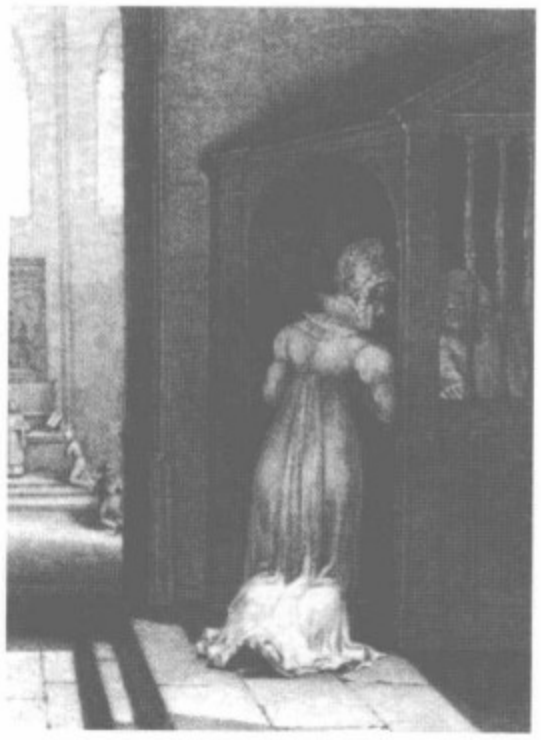
在个性化进程中，人们总会感受到自身的脆弱；与人交往失败后，统治阶层的成员们被迫退而追求独处的快乐；而更加严苛的性道德教条的内在化，则强化了人们的负罪感。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更加期待能与另外一个可以倾吐心声的人偶遇。忏悔之后，新的自信被点燃了，忏悔所带来的快乐与痛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高度。

忏悔的世纪

人们把19世纪看作忏悔的黄金时代。上帝的法庭成为菲利普·布特所谓“自省式宗教”的核心机构。聆听忏悔的牧师“执行调查和指认犯罪”。事实上，自省成为了19世纪天主教的特点，而天主教拯救信徒的两个主要先决条件就是自省和忏悔。忏悔其实是教堂道德拯救战略的一项重要因素。自省能将青年人从悬崖的边缘拉回，防止通奸，以及杜绝离婚。它们还能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形成德伯内神父1853年所说的确保“法国自我拯救”的“社会屏障”。

有时，牧师们会在私人家里聆听忏悔。不过他们很少做这种访问，基本上这种服务也仅提供给病人或者是那些有钱举行私人礼拜或雇用私人牧师的人。忏悔通常在教堂或是忏悔室里进行。最开始的时候，忏悔的形式十分简单，但逐渐变得繁复，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忏悔广为传播。牧师倾听忏悔的过程中，坐在一个简单的，侧面由两块木板构成的扶手椅里，但是更多情况是，牧师和忏悔人待在由光滑的橡木构筑而成的华贵忏悔室里，在阴影里处于一种私密的状态，正是这种情况引发了米切雷的嘲笑。

有时候，人们在忏悔和心理治疗之间会作一种表层的比较。毫



米切雷拜击忏悔室是“橡木壁橱”。在全国四千多只“橡木壁橱”中的一只里，牧师聆听着一位妇女的忏悔，并估量其悔过的程度。

无疑问，这两者是有相似性的：和医生一样，牧师们必须镇定自若、全神贯注、明察秋毫、处事慎重。牧师们隐身在窗子后，绝不能露出脸或是眼睛。在整个世纪里，忏悔中所透露的秘密都会受到尊重，这也是牧师们的荣誉所系。不过事实上忏悔者的行为与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鲜有共同性。从态度、姿势以及着装上，忏悔者都表现出了谦卑。一个女人在忏悔时，正跪着，除去了帽子，双手交叉，面纱拉得低低的，早已屈服于牧师所作的判断。他或她用忏悔的语言陈述出一串罪行，对习惯于用最强硬的语气表达意见的农村人来说使用这种语言并不容易。

忏悔常与悔恨相伴，直到牧师给予了忏悔者化解罪恶的宽恕，确保忏悔者得到了拯救。在18世纪中叶左右，牧师们开始拒绝给予忏悔人宽恕，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拒绝给予宽恕是一个激烈的举措，它意味着公众开始排斥复活节圣餐，其结果是有罪的人可能遭到指责。让-马里·维内会毫不忌惮地告知他的一个忏悔人：“我的朋友，你迷失自我了。”他还警告另一个说：“我的孩子，你将受到谴责。”

完全区别忏悔和精神检测是一种误导性的行为。僧侣、年轻的女孩、热情洋溢的妇女、显赫的贵族、资产阶级和一些碰巧住在教堂附近的老处女们，都享受到了持续性的私人精神检测的益处。但是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然而，一次忏悔也是一场判决，而且总是屈从于精神领袖的权威。在苦修前发出的只言片语和让人改正错误的劝告，组成了一种精神引导的模式，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原生态模式。

右页图：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对圣母玛利亚热爱的风气下，虔诚的信众寻觅的不是一个女人反倒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个活生生的男人。这位“仁慈的神父”，也就是原地不动令人们向他靠拢的布道者，肯定是一个聆听忏悔者。他日以继夜地回答信徒的提问，安抚受到折磨的心灵，谴责不知悔改的罪人，与他的忏悔者一道流淌着泪水。

理论上天主教徒应该向本教区的教士忏悔。直到1830年左右，乡村的僧侣们还警惕地维护着这一特权。在此之后，一定的自由选择得到了认可。心怀虔诚的忏悔人进行这种选择成为了一种习俗。对一个从寄宿学校回家，准备开始踏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这一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年轻的方妮·沃多德的信件就表明了倾听她忏悔的牧师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位西伯修士后来成了巴黎的主教。虔诚的妇女们常常谈论不同牧师的优点。在城里的教区中，一些牧师擅长倾听特定种类的忏悔：有的倾向于聆听儿童和青年的，有的则倾向于仆人们的。有些牧师还名声在外。当出现一些有关道德的案件之后，他们的判断可能成为法律上的参考。在这些布道者中，

阿尔的神父是首要的。在近30年里，他每天接受17小时的忏悔，在他的忏悔室外，虔诚的罪人们排着队，急切地注视着引导员。这种基于宗教的有效治疗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充分证明了圣礼的重要性。不过让-马利·维内并不是唯一杰出的聆听忏悔者。在66岁时退休到富尔-维埃的P.A.墨西神父就曾经在4年里聆听过2000个悔过者的忏悔。

不满足于日常忏悔的天主教徒可以采取一种对罪行进行全面忏悔的形式，皈依者们通常会采用这种形式。44年没有找过一位神父的忏悔者，因着迷于阿尔的神父就选择了进行全面忏悔。有时，一次全面忏悔标志着一次静修、一次布道或是一次朝拜的顶点。对一个有知觉的将死之人来说，往往趋向于进行一次这样的忏悔。

忏悔的行为

从1800年到1830年，在维内主教教区里，进行忏悔的次数是因人而异的。对中学生而言，这一时期每月进行一次忏悔是必须的。虔诚的信众，通常是一家人都已经养成了经常忏悔并领圣餐的习惯。忠实的天主教徒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主教就僧侣们额外增加的工作量表示出了关切。不过，也不应该过分估计这些新信众的数目。在这个世纪里，贝雷教区的乡村信徒们并不喜欢经常忏悔。而在阿赫教区，由于信徒们标准严格，牧师们必须小心地面对忏悔。在上布列塔尼，直到20世纪时日常忏悔才普遍出现；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天主教徒们均满足于一年做三或四次忏悔。

19世纪，在宗教行为上，性别的不同也普遍影响了人们悔过的圣礼。奥尔良教区的迪庞卢先生所编辑的文献表明，基于对拜访了阿尔的神父的悔过者的定量分析，以及根据牧师们对到访者的种种抱怨，总而言之，根据所有的材料，圣礼体现出了女性为主的倾向。布特所谓的“依赖型忏悔”强调了这一趋势：牧师被指定的任务往往是监控年轻女孩保持纯洁、妻子们维持忠诚，以及让仆人们保持诚实。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僧侣们并不关心孩子们的忏悔。在布列塔尼，孩子们在他们首次领圣餐之前，也就是12岁以前，从不进行任何忏悔。1855年，罗马教廷对于这种延误提出了批评，法国的僧侣们这才着手进行改革，出台了新的规章。1861年，布雷顿主教大

会要求牧师们认真礼貌地聆听年轻人的忏悔。从此以后，孩子们的忏悔变得越来越频繁。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地效仿了他们的长辈。在1910年，根据教皇颁布的“卡阿·森凯拉里教令”，主教教区内开始创建私人自省这种圣礼。不过试举一例，在圣布里俄主教教区内，人们对新的举措心存疑虑。

首次领圣餐后，大量的年轻人就停止了频繁的忏悔。但是，由于地区的不同，缺乏男性忏悔者的程度也是不同的。19世纪末，在莱斯-瓦莱有60%的男孩在复活节时领取了圣餐，然而，在相邻的阿赫多瓦，这一人数仅仅为20%。一些年轻工人们都经历过令人失望的忏悔。诺伯德·特奎就开玩笑地回忆了他是怎样弄得一位不错的牧师当下里瞠目结舌的，而后者的反应是马上询问他的忏悔人是否犯了“窥视妇女”的罪行。为了把男人们拉来做忏悔，在大部分牧师都放弃了这种尝试的情况下，这位神职人员不但弄得精疲力竭，而且无功而返。这时知道如何应付规章是十分必要的。1877年的时候，蒙彼利埃的宗教大会就颁布条令建议牧师无须让男人们等待忏悔，从而避免花费太多时间在这些性欲旺盛的家伙们身上，同时也显示了教会的宽容。

朱里斯·艾利克斯·穆涅：《问答》，1891年。在七月王朝时期，在问答课上，仁慈的神父针对的是倾听者的情感。在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僧侣们已经学会了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关注。

理论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方面的规章以及对待忏悔的态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从政教协议时期到1830年左右，法国教堂都推崇严格主义，这是教宗权限主义派的重要原则；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还更趋向于詹森教派。奉行严格主义的一个结果是布道的内容常常是关于世界末日的。拒绝给予忏悔者宽恕或者延迟给予宽恕变得很常见，尽管这一行为通常是针对声名狼藉的忏悔者或是习惯性的罪犯，而不是神学家们所指的那些偶尔犯错者。精神病院里住满了因宗教错觉而备受折磨的妇女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女人们经常自我惩罚来折磨自己，抑或节食，让上帝不要因她们的罪而惩罚人类。

在一些僧侣们无法掌控的狂欢节日中，对忏悔采取严格主义尤其被强调。节日里，各种舞会层出不穷，布雷顿人举办谅解日（一个民间节日），酒馆里村民们聚集一起（一种晚上的集会），婚宴，青年人的狂欢，以及代表对身体的骄傲的单纯的寻欢作乐，所有这些都触犯了肃穆的圣礼。关于猥亵的服饰这一老话题，通过对断头台的可怕描述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而断头台本身是对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的无情报复。让-马里·维内批评当时的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当时维瑞兹的圣礼是禁止村民们跳舞的。即使是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在弥撒之前，小湖地区的牧师也会在教堂中踱步来检查妇女们的服饰，当他发现有的头饰从未见过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之加以修整。

然而，到1830年以后，这些严格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被终止了。在此后的20年里，阿尔冯瑟·达·李择利的理论经由托马斯·顾瑟翻译，由各种研讨会和牧师会议传播开来，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牧师，如贝勒的主教戴维的帮助下逐渐有了影响。这些新的道德原则教导牧师们要谨慎和耐心，避免让忏悔者感到失望。安抚心灵被认为是远比恐吓更有意义的拯救行为。耶稣会士、拉蒙南派以及随后影响逐渐扩大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虔诚行为，都有助于人道主义地对待忏悔者。一旦大量的信徒开始接受这些简化的道德教条，宣传这些条文就不那么困难了。即使是曾经十分可怕的神父现在也成熟圆滑了，他也不再拒绝和他的忏悔者一起悲哀、哭泣了。

在第二帝国时期，严格主义造成了某些东西的复苏。婚姻中的性问题成了教士们最关注的焦点事项。当布杰莱医生在他的办公室

里研究“夫妻间的欺骗行径”时，神职人员们正决定抨击“体外射精”的避孕方式。从1815到1850年，让-路易·富兰汀叙述道，在这一领域教会明显是很宽容的。这是一段避孕被认为是明智举动的时期。在阿赫教区，人们普遍控制生育，而且正如布韦尔先生所记载的那样，在列蒙教区也很常见。然而，罗马的神学者仍旧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根据经验一个女人知道她的丈夫会采取体外射精的措施，她也应该有性生活。教会认定这是一种防止虐妻和通奸的途径。

但是1851年后，罗马的态度转变了。在男性和上帝之间究竟由谁来控制生活成了导致摩擦的原因，这一对立与日俱增。即使是妇女主动而且丈夫们采取避孕的形式，圣座的神学者们也严厉地谴责任何形式的性交。法国教廷接受这一新态度的速度远比富兰汀曾经认为的要快。早在第二帝国刚开始的时期，巴黎教会就告诫阿赫的神职人员们要更为严厉。1860年时，贝勒的新主教也采取了一种相同的姿态。这些小社区的失利助长了新严格主义。那些先前对肉体方面的话题十分审慎的神父们如今在这方面会涉及更深。他们不等忏悔者提及就会触发这一内容。

神职人员阴险的力量

与此同时，神父们开始询问更多的问题，反教权的行为受到镇压。米切雷写于1845年的《牧师女性和家庭》一书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小说家们很快就尝试了这一主题：左拉（《普拉桑的征服》）、爱德蒙·德贡格（《乔瓦瑟夫人》）、乔治·桑德（《昆地涅的夫人》）和贝拉丹（《最大恶行》）都把忏悔作为当下一个主要问题。小册子刊物的作者们将运动扩大化了。1885年，列·塔西和卡尔·米罗出版了《关于忏悔的讨论》，好斗的反对教权的报纸一时充斥着他们的文字，还伴有关于神职人员不道德行为的报道。许多人都参与了抨击运动。早在1839年多皮埃尔-昂多贝的农民们就举行请愿反对圣礼，依其陈述，他们的问题在于“教士管得太多了”，也就是在年轻人的头脑中灌输了不道德的观念。即使是在忏悔室的阴影里，教士们也常常传播流言。对工人们而言，这种审查被认为是持续性的骚扰。

对于教会的攻击主要有四项内容。据称，教士们运用他们阴险的力量，阻碍个体的自由发展。教士的判断有悖于个人的自治，而

路易斯·希门尼斯·阿朗达：《忏悔者》，1902年。在第二帝国时期，牧师们将注意力放到了有关肉体的罪行上，这也成为了与反教权者争论的中心内容。我们很难设想这幅作品的作者想要描述的不是一位跪在地上的漂亮忏悔者。

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自治是道德上的里程碑。人们还断言，教士们在对待人们生活的私密方面轻率而挑剔。为了控制大家，他们向家庭成员们发问，向邻居们发问，导致产生米切雷所谓的“超人类主义”的危险，造成个人自治的丧失。

神职人员性方面的行为也遭到了各种挑战，有时这些方式是对立的。在肉欲有罪的借口之下，神父们询问了太多问题，在不同的纯洁心灵里激起了一种邪恶的兴趣。14岁的苏珊·瓦奎就因对神父的话感到害怕和恶心，决定停止去做告解。

另外，人们指控神父常为女人所困扰，两者在服饰和敏感程度上不无相似。神父们被要保持纯洁的誓言弄得心灰意冷，而在女性坦率的忏悔面前又易受触动，这些忏悔能轻易地震撼他们，挑起他们的欲念。反教权的文学作品里，神父尽是些玩弄女性的色情骗子。格瑞维还指控，神父提问坚持要知道丈夫和妻子之间所有的事情，甚至是发生在床上的。在刺探出所有私人的秘密后，他会力求控制夫妻间的关系。婚姻的乐趣要取得他的同意；结婚的计划会因他对于处女童贞强加的关心而遭到破坏；一个自由思想家的女儿甚

至可能因在忏悔时所受的劝告而进入女修道院。

由于嫉妒丈夫的权威，牧师会成为丈夫们的对手。反教权主义者虽然坚持认为女性具备许多美德，却不是维护女性自由的斗士。牧师们好管闲事的言语动摇了他们的正确感觉。牧师们是嫉妒的入侵者，他们自己也承认由于拥有拜访人们家庭的便利，他们想要控制人们的私人生活，当妻子们脆弱的心灵可能受到他们的阿谀奉承影响时，他们总是很关注那样的时刻。让·法利将牧师们的这种嫉妒称为是“反教义的男子汉气概”。

反教权运动最后一个主要内容涉及聆听忏悔者对人们愿望的影响。这引发了家庭财产被侵犯的威胁。为了保护家庭财产，民法第909条规定牧师不得继承忏悔者的财产。对反教权派来说，给教堂的许多馈赠实则是教廷的一种掠夺形式。

这些争议到达高潮时产生了有关火刑重要性的一些观念。在反对者看来，忏悔威胁到了家庭的私生活和新个人主义，以及米切雷所梦想的友爱夫妻的发展。拥有这场关于犯规、违法的对话所有资料的历史学家能够深入研究到私人生活的核心。

有人发现了一个藏有大量信件的隐秘处所，从而揭开了忏悔这场戏剧的幕布。厄杰·布瓦勒是一个富有的反教权主义者，他收集了有关牧师罪行的剪报。在1872年到1873年间，他在给未婚妻写的一系列信中，解释了他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的理解。通过读他的信，他未来的妻子对一位聆听忏悔的牧师产生了恐惧，因为看起来牧师不但会夺走她的财产，还会引诱她，愤怒的布瓦勒命令她终止和这一恶棍的所有关系。后来这对夫妇的孩子没有受洗。

性的忏悔和医学的秘密

承认道德的缺陷或性疾病有多困难呢？对某些字眼的难以启齿意味着这一困难之大。在有教养的社会里人们不会露骨地谈及性器官或性行为。当小说家涉及阳痿时，都是隐晦地暗示问题；梅毒需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受害者被说成“经常地遭遇圣维罗妮卡”。1902年 之后，有这方面问题的人被描述为已经“变烂”。这种相当温和的表达方式来自于布里厄的戏剧，最终人们能小心翼翼地在会客室谈论这些主题。在布里厄的家庭所收集的1.1万封信里，性犯罪和性疾病从未被提及过，乳房疾病也只字未提，这些都受制于类似的禁忌。

涉及医学的文学作品证明了这方面忏悔的艰难。《无辜者的梅毒》这本书的作者阿弗雷德·富利教授描述了一位由于接吻而感染梅毒的处女，尽管她浑身都已溃烂，还是不肯告人。她的未婚夫，一位军官，在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就开枪自尽了，这样他就不用写信告诉自己的未婚妻他患上梅毒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不会告诉他的母亲他感染了性病，更不会告诉他的父亲。“不要害怕告诉我”，这是马里-劳伦特·沃多瓦在写给他在巴黎读书的儿子亨利的信里说的话。

在这个领域里，大夫几乎是首要而且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但即使在充分保护人们隐私的医疗疹室里，坦白也是困难的。医生经常抱怨让年轻的手淫患者承认他们的罪行有多么困难。贝杰雷不得不拿出自己全部的耐心劝说自己的病人坦白婚姻中的不和谐问题。妇女们不愿意接受反射镜的检测。在19世纪80年代，人们被先天性疾病所困扰。在关于遗传性梅毒的问题上，起支配性作用的教条加速了对几乎不可能的治疗方式的探索。病患被认为终生不得生育并将过早死亡。优生学看起来具有诱人的前景，医学秘密受到了挑战。

事实上没有人能真正得到完全保密的治疗。当男人们从军时，他所有的医疗史都将被公之于众。在医院里，肺结核病的患者被展示在医科学生们面前。夏尔科将萨尔佩特里尔的歇斯底里展示给巴黎的上流社会观看。性病患者们待在巴黎的卢尔西涅和圣-拉扎尔，梅毒患者被禁闭在各省医院特殊的病房和部门里，他们像囚徒一样，隐私一览无余。精明的皮条客们招揽那些出院的妓女。男人们知道哪些地区的妓女是健康的，哪些不是。在农村，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谁的血液“肮脏”。直到这一世纪末，圣路易斯医院的皮肤科才开始对病人使用代码，普通人得到了保持相对隐私的新特权。

对于上流社会来说，医生们对待他们私人病人的情况，又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遗传上的缺陷对于一个家族的联姻策略是潜在的威胁。对一个大家知道患有肺病的年轻人而言，仅仅通过一次治疗就想修复其受损的前程是远远不够的；再次犯病的危险始终存在，同时还有疾病可能遗传到小孩子身上。因此保密至关重要。马瑟家族就害怕这个年轻的诺曼底女子的歇斯底里症会破坏她和勃艮第的表兄间的婚姻前景。值得庆幸的是，刑法第378款迫使医生们要严

守秘密。

1862年到1902年期间，一些主治医生受到盛行一时的有关遗传病的观念影响，对守密信条提出了挑战。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带有病患的下一代出生。布鲁阿荷德尔教授、拉卡萨日那和吉尔贝·巴勒建议人们要为此找些借口。例如他们可能会建议未来新娘的父母要求女儿的未婚夫就生活保障制度提出申请，那么这个未婚夫会被迫接受一次严格的体检。布鲁阿荷德尔还建议双方的家庭医生见个面，这样医生们彼此都能够在不泄露彼此病人秘密的前提下对顾客提出建议。迪克洛还提议让未婚夫凭荣誉来说出他的秘密。由路易斯-阿道夫·贝迪荣所领导的一小部分医生则提议应该颁发给每人一张个人医疗记录卡，卡内记载此人的就医史和其先辈们的情况。加尔东的一些追随者则认为，男人们体检后要发给他们一张证书以表明婚姻上他们所具备的资格，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建议才被付诸实施。由一个慢性病研究机构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一些医务工作者对婚姻法是心怀敌意的。这个时期“遗传

路西恩-艾克多·让纳：《内科医生》。内科医生的私人患者来自资产阶级。即使在有几个顾问在场的情况下，如图中所示，隐私也比在医院病房里容易受到保护。医生严肃的神情，毫无演讲家般傲慢的姿势，都是谨慎的保证。

论者”的恐慌减少了很多。比起贝内迪克·莫雷尔和普罗斯佩·吕卡的门徒们，帕斯特的弟子们少了很多恐惧。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涉及保护有关自己私生活的隐私时，上流社会就特别地警惕。

孩提时代的信赖

资产阶级人家的子女总是被小心翼翼地和下层的社会生活隔绝开来。受严格礼教的管束，他们的社会活动旨在鼓励建立一种排他的充满热情的友谊。忏悔之难促使人们想要向一个精心选择的同伴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孩提时建立的信任是尊重两性差别的，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这种信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寻找到密友在青少年的生命里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规矩的女孩中，母亲们鼓励她们建立一种长期且完全坦诚的友谊。母亲们希望的是在朋友间建立这种坚定的友谊，而不是在跨入社会时随便认识一个什么人，这种友谊能在女孩们的一生中起到帮助作用。当孩提时代的社会礼仪不再奏效时，乡间有一种类似的使孩子们结成特殊友谊的方式。对信仰天主教的女孩们来说，其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孩子们首次领圣餐时的同伴。1976年，当布昂桑塞卢瓦的年长女士们被问及此问题时，她们都承认这种特殊友谊的重要性。

当一个小女孩突然从家庭的温暖里投身到寄宿学校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时，她感到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朋友。从马泰依夫人那时开始，关于这一制度的规则竟然开始鼓励年纪稍长的孩子将年幼的新生庇护在其羽翼之下。乔治·桑德就留下了关于这一特殊友情的详细叙述。在学校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与异性分隔的情形促成了一种暧昧的亲密关系。女孩们互换照片和誓言。这种友谊被证明往往是十分持久的。“长大成人的女孩”离开寄宿学校等待婚配时，会互相寄出长信并互访。有关这种快速结成的友谊的事例不胜枚举。欧仁尼·德盖兰惊讶地发现她建立了一个镇定、温柔的女孩网络，她们大都由于家庭中有人去世而早熟。

表亲间的友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在布瓦洛的家庭里，表亲们用英语交流，抨击着他们古怪挑剔的父母。法妮和萨比娜·奥都阿尔互通的信件里，满是关于她们在尼梅和梅居霍家的成百上千个小秘密。她们的通信是严肃的，两个女孩讨论的不是白马王子而是道德和其执行原则的问题。当霍乱爆发时，年轻的法妮保持了必要的

警觉，她将私人信件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为接下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这一阶层的女孩们习惯于担任家庭中的护士和穷人们天使般的募捐者，女孩子们对苦难并不陌生。男子主义的观点认为，年轻女孩最好奇的应该是她好朋友新婚之夜发生的新闻，而此类通信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不过在从《新婚记忆》（1842年）到《心爱的人》（1889年）的大量文学作品里都存在这种观念。

男性的友谊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有相同的热情，女性的友谊与发生在寄宿学校、大学预科以及大学讲堂里的友谊是一样的。多数青年男子都有过性经验，但这一猥亵行为是不能与家庭成员讨论的，这些青年也压根不去做忏悔。他们的性伴侣也不会欢迎他们性方面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女伴都是别人，是牺牲者，男人们是不愿意在她们面前暴露出自己的。这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在心底虽然知道他们最终会是律师或公证人，但许多都怀有无尽的野心。他们痛恨平庸，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干大事业的。他们的文化给予了他们这种骄傲。在男人的情感和性教育方面，友谊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提供了就经验进行探讨的机会。从弗劳伯的经验里可以看到讥讽、嘲笑和玩笑这些重要因素，萨特称这种经验来自鲁昂大学的“本科生通病”，其中幽默处于重要地位。

这种形式的友谊是一种集体经验，然而，个人间亲密的友谊是另外一回事。在夜晚的炉边谈话或是晚间拜访时，朋友间敞开了心怀。弗劳伯就很珍视他在克罗塞特的一个晚上的回忆，当时他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正抽着烟——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维、欧内斯特·谢瓦利埃或马克西姆·杜康中的一个。朋友们往往仅限于在乡间长时间散步，有时也会一道去逛妓院。萨特发现，“妓女是普通的玩物，男人们分享她们，互道彼此嬉闹时的故事”。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言谈背道而驰，像是“希望牺牲异性来成全男子式的同志之爱，这种爱不仅男性化且有轻微的同性恋倾向，就像所有值得夸耀的男性特征一样”。充斥着性经验的大量通信将这一友谊维系到了未来的生活中。保留在妓院的战绩，嘲弄资产阶级的开销方式以及讲一些老笑话，这都是治疗由成年后的生活引起的伤痛的方式。

1872年，当兵役制开始实行时，人们普遍认为“军中伙伴”是重要的人。其时，城市的年轻工人们为了寻找就业机会和住所不停

苏珊·于雷尔。历史学家们极少关注友谊和这种相互信赖的谈话所带来的愉悦。

地搬家，因此对这些年轻男子来说形成这种快速的友谊比农民或上层社会的男性来得困难。农民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上流社会的男性享有保持隐私的特殊优待。在存留下来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的备忘录里全是关于与同事或是一块住宿的人相遇的温柔记忆，结果结成的往往是仅维持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的友谊。移民中，工人阶级的友情也大体如此，但对移民生活人们知之甚少，所以也得不出什么确切的结论。

兄弟和姐妹

回到有关资产阶级的话题，在他们两性的屏障之间是存有突破口的。兄弟和姐妹之间常享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经常被人们忽略了。母女之间存有这种亲情，这种亲情由于严格的性别差异而更强化了，毫无疑问，在孩提时代，兄妹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这种亲情的影响。哥哥或弟弟是可以与一个小女孩亲密相处的唯一男性。同样的，一个姐姐或是妹妹也是唯一可以让一个男孩亲密了解的女孩。严苛的道德风气和严格的法则控制着男孩和女孩间的交流，扩大了同胞关系的重要性，也限制了感情的范围。同胞

间相互的爱维系了一种秘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曲旋律，不受命令的控制也不惧怕死亡的威胁。伏劳伯在写到他深爱的小妹卡露琳的时候就改变了他的风格，回避了以往那些粗鲁的故事。

经常受到习俗和男性社会压迫的姐妹们所感受到的则不仅仅是尊重，她们还怀有一种热望，对她们的兄弟抱有一种母性的关爱。她们希望她们的兄弟不要患病，不被人背叛，不要遭遇失败。父母指望着女儿向儿子灌输道德观念。艾杰妮·德于安对她兄弟马里斯的献身精神无疑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诸如此类，莎碧·沃多对她的兄弟亨利也存有强烈的感情，亨利是巴黎的一个学生，莎碧对他远比对家里替她找的平庸丈夫更为亲近。在以上两个例子里姐妹对她们兄弟的情感都比她们的兄弟来得强烈，两个姐妹常常抱怨她们的兄弟寄信不多，也不把秘密告诉她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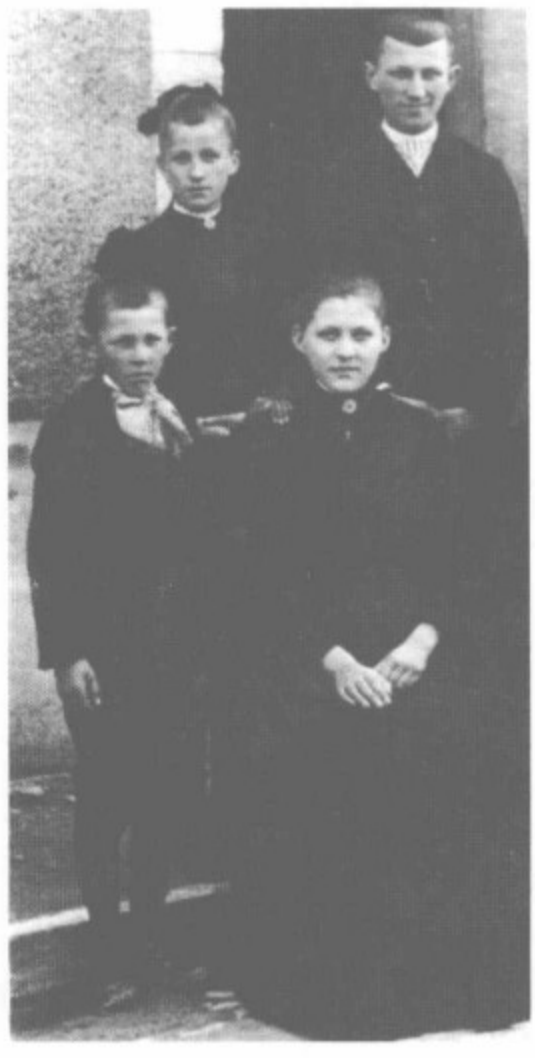
姐妹们像是柔软、富有延展性的蜡，而她们的兄弟则乐于饰演希腊神话里的皮格马利翁，悄悄把她们塑造成自己的替身。设想一下吧，她们其实是为她们兄弟的婚姻而备的理想爱人，但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这婚姻不得不推迟。从雷内和露西的麻烦关系开始，人们可以列出许多这样的同胞兄妹：巴尔扎克和劳拉，斯坦德和波林，马里·德福拉维尼和茉莉斯，当然还有于厄兄妹。兄弟和姐妹，一个为另一个而备，就像再造的神话中的两性人一样，这样的两个人所拥有的荣耀像浪漫的爱情一样永不消灭。到世纪末，兄弟和姐妹间的这种关系就不再那么亲密了。朱斯·雷纳德的姐姐虽然是个甜蜜优秀的女人，却再也不能触动他了。

在这个时期，给家里写信是人们一项特别的义务。家庭成员虽然分散各地却都互相保持着联系。这些信件是留是毁得由机遇来决定，不过无论我们怎么看，无论是墨库罗的沃多阿德的信件，还是项多拉的达翁或是维内的布瓦勒的，我们发现这些信件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写信是一种家庭间交往的必不可少的礼节。由于所处的地方或职业和社会关系的原因，亲戚们的通信常伴有能为对方提供的礼物和对方喜爱的东西。信件里传达的是人们的信息、个人的建议、股票市场上的消息和其他意见。通信的模式表明了家庭的层次，这一部分由出身决定，部分则由个人的成就决定。圣艾汀安的工程师艾

枚·达翁事业相当成功。作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兄长，他对妹妹阿瑟安有一种强烈的喜爱之情，后者正与两个成年的孩子住在一起。虽然身在异地，他还帮助他的家人处理大量的政治事务。他给他的兄弟描绘养蚕的新方法，告诉他变动的丝绸价格。他也将从义父那里认识的熟人介绍给他的兄弟。此外他还为侄子和侄女们选择寄宿学校。

在成年人的信件里，很少能找到隐私或是个人忏悔，也很少涉及性。成年人的通信更为保守，他们的幻想比年轻人信件中的要少得多。稳定下来的成年人无疑没有那么多轻率的事件要表达。但是他们的信件里包纳了许多家族的秘密（布瓦勒的信件会为一群亲友们大声朗读出来，里头就没有什么隐私了，对以上法则来说这是一个例外）。为家庭造福的责任被这些壁橱中的骷髅掩盖住的巨大秘密困扰着。沃多阿德最担忧的是大儿子奥格斯特的精神病，还有一位古怪叔叔的罪行，由于一些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位叔叔被强制待在特拉普派的修道院里。马瑟的家族则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隐瞒秘密。家里的女儿曾经和车夫上过床，这一罪行在写于1892年的早期信件里非常直白地提及过，但这是在提到她继父患有梅毒前很久的事了。女婿将“梅毒”这个可怕的词脱口而出，在此之前，母亲被掩盖的“不幸命运”，女儿的歇斯底里，这些都曾引起读者的疑惑。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场表兄弟姊妹之间的联姻为什么激起了如此的恐慌，我们也读懂了马瑟终身未婚的姐妹爱雷诺的悲惨命运了。与这一悲剧相比，左拉的传奇中，黛德姑姑的形象就显得沉默了一些。



在人们试图将骷髅掩藏在壁橱中的时候（隐藏巨大秘密的时候），家族忽略了等级观念。保守秘密是最重要的。作为绝对禁止将秘密外泄的补偿，家庭内部无休止地回顾其本身的不幸；这种冗长的私下讨论减少了将秘密公之于众的诱惑力。奇怪的是，这其中的一些上流阶层采取的回顾过去的行为和人类学家们在乡村中发现的类似。捷瓦丹的农民们认为隐私相当重要，事关家庭的荣誉，这正如北方资产阶级所认为的。在所有地方，刺探其他家庭的隐私也很重要。罗泽的农民就派自己的孩子到咖啡馆里去了解流言蜚语，这在规划家庭的婚姻战略时也许将起到作用。资产阶级的家庭将婚姻的未来发展作为一项投资，他们同样也会利用一些智囊团。

感性的教育

爱和与其相关的行为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里人们关于性的渴望和所感到的紧张。在这件事情上，太多的念头和行动都戏剧性地变化着，但是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忽略了19世纪的文化背景因素。教授则会沉迷于统计数据，热衷于对婚前受孕的定量分析和对私人通信的定性分析。

浪漫之爱

就爱情而言，把握过去是十分重要的。古老的方式继续控制着人们的感官。19世纪的情人们无论是否意识到了，都受到了许多传统模式的影响：高贵的爱情和它深思熟虑之后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天使般的人类学说；古典的甜言蜜语和对激情风暴的修辞；反对革命的牧师关于“愚蠢爱情”的指责等。很明显，从思想启蒙中继承来的理论影响更为巨大。精神疗法家对于灵魂本质的反思，内科医师和精神病医师们关于感情本原的观点，两种性别特性的存在，生理透支的危险，对于性罪行的重要性在神学上引起的论争，所有这些形成了爱的行为。

不过重要的现象是，对于浪漫的爱情人们一开始是小心经营的，然后激情就慢慢减退了。在这一有关爱情的新观点之后，有着关于灵与肉关系的大量不同理论，我不再就此主题进行探讨了，因为通过考察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理念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东西。19世纪时人们相信女人有双重人格，她既有好的一面又有邪恶的一面，我认为这一信念是了解该时期人们爱情态度的关键因素。由于受到与毒蛇所订立的远古契约的左右，夏娃之女生活在制造罪行的经常性危险里，驱除邪魔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贴近自然的缘故，女人具备有关生和死的隐秘知识。人们假定女性易于获取地球上的能量，女性的色情狂症状和歇斯底里就是明证。简而言之，女性其实是郁积的火山，一旦爆发，基于她性别的狂躁就被释放了出来，她会贪得无厌地追求爱情，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她的表现会和那些发了疯的男人一样。这个1世纪前就逐渐形成了的新表征体系触动了19世纪末期的艺术家们，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关于女性的谜团上。他们所描画的女人既有野性也不无纯真：如同女性的斯芬克司，腰部环绕着毒蛇，眼中闪耀着野性的光芒。就像克劳德·昆杰在其富有才华的分析中指出的一样，现代主义神学的编码需要这样

的一个代表符号。小说家们，特别是左拉，从贪婪的女人中塑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形象，甚至还将这一形象用在对工人阶级的描绘上。男人们出于对女性的困惑往往急于在性行为上抚慰他们的伴侣，让她们臣服于男权的原则之下。

宗教的符号主义也影响了女性的形象。夏娃的后代同样是继承了圣母玛利亚精神的女儿，处女代表的是女性特质中积极的一面。在早期，美以美教派教会就提高了女性的形象。19世纪视女人为男人的守望天使。女性是来自天堂的使者，易于被同情所感动，她们生而慈悲。因为据人们所知天使是存在的，那么人类和上帝之间也必定存在有介质，否则这链条将无法维系。女性的天职就是让自己变得高贵，从而能够扮演这一中介角色。她也可能以来自上界的天使的面貌出现从而激励男性。

早在1854年完美主义概念的教条成为教廷官方奉行的准则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偶像崇拜风行欧洲（1846~1871年）之前，虔诚的文学作品和神秘的绘画就描绘了从肉体及其负担飞升的情景，揭示了人们效仿天使的热望。由于受到光照派教义的影响，路易斯·让默的绘画就反映了这一热望。在他的杰作《处女》里，一位年轻的女士仰望着天堂，从而令她的同伴能接触到看不见的世界。在这幅画里爱塑造了第二个天堂，一种和同享的精神历程相联系的亲密关系。

在忏悔的过程和爱情的辩证法里发展出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路西安·伏拉比-马朱表示这就像被镇压者遵循着镇压者的道路卷土而来一样。浪漫的爱情借用了忏悔时圣礼的形式、宗教语言中的誓词、对苦难的拯救以及对回报的期待。在爱情里，女性是精神领袖，她们判断着孰对孰错。

浪漫的爱情比这种叙述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它源于宗教式的语言和新模式的感情的混合体。爱情是一种混沌的感情，一种激情澎湃的事物，一种狂热的形式，这种关于狂热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7世纪，盛行于1720年至1760年这段时期，而如今爱情的级别已有所降低。在1820年至1860年间的法国，爱情被彻底改造。爱情被还原成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电能，优于爱情本身。充满热情的能量在两个人之间创造了一种纽带，引领他们进入一个奇迹般的氛围里，自然的东西转化为了诗情画意的事物。爱情造就

了一种精神上的亲和力，两个人被如此地拉近以至于他们相信彼此间的和谐能够一直存在，直到永远。波尔·霍夫曼写道："完整意义上的爱情是远离现实的，存在于生活的边缘，现有的和不存在的事物在那里被混淆了，爱人们的脸庞和记忆及梦中的影像混为一谈。"

女人的职责就是唤醒男人，激起"他们心灵中的混乱"，并鼓励有关这种主张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各方面都完美的形象在卢梭的浪漫主义作品中得到了继承，正是卢梭改写了有关精神两性人的神话故事。认为索菲无非是一个拥有驯服伴侣的男性沙文主义的典范，是一种归谬的做法。卢梭将古代的神话重新加以塑造，神话里男女起源于同一个体，从而引起了一定性别上的含混，在让默的画里这是明显可见的。这种性别的混淆，允许男人和女人为了寻找一种兄弟般的情谊走到一起。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同样的这种对于性别的混淆也会把我们带到女权主义的对立面。高高在上、精致美丽的处女由于完全抵制了对伴侣的性欲，最终成了一个烦人又恶毒的老处女。那些拜倒在他们奉为天使的女人裙下的男人，最好驱除掉自身的兽性。

一见钟情

通俗文学用有教训意味的范例和故事来阐明新的恋爱行为。这套陈词滥调是这样开始的：在第一次见面时，女人就像"精灵"一样，她们的影子在一瞥之下就闪过了。比起凉亭来，花园小径和自然形成的小路是完美的调情场所。爱情的甜言蜜语是彼此的桥梁；来自远方的消息比直接的交流还来得重要。眼神、来自远方的声音、甜蜜的滋味、轻柔的服饰里充斥的自然芬芳，所有这些形式的交流保护着女性的谦逊，即使在有了婚约后也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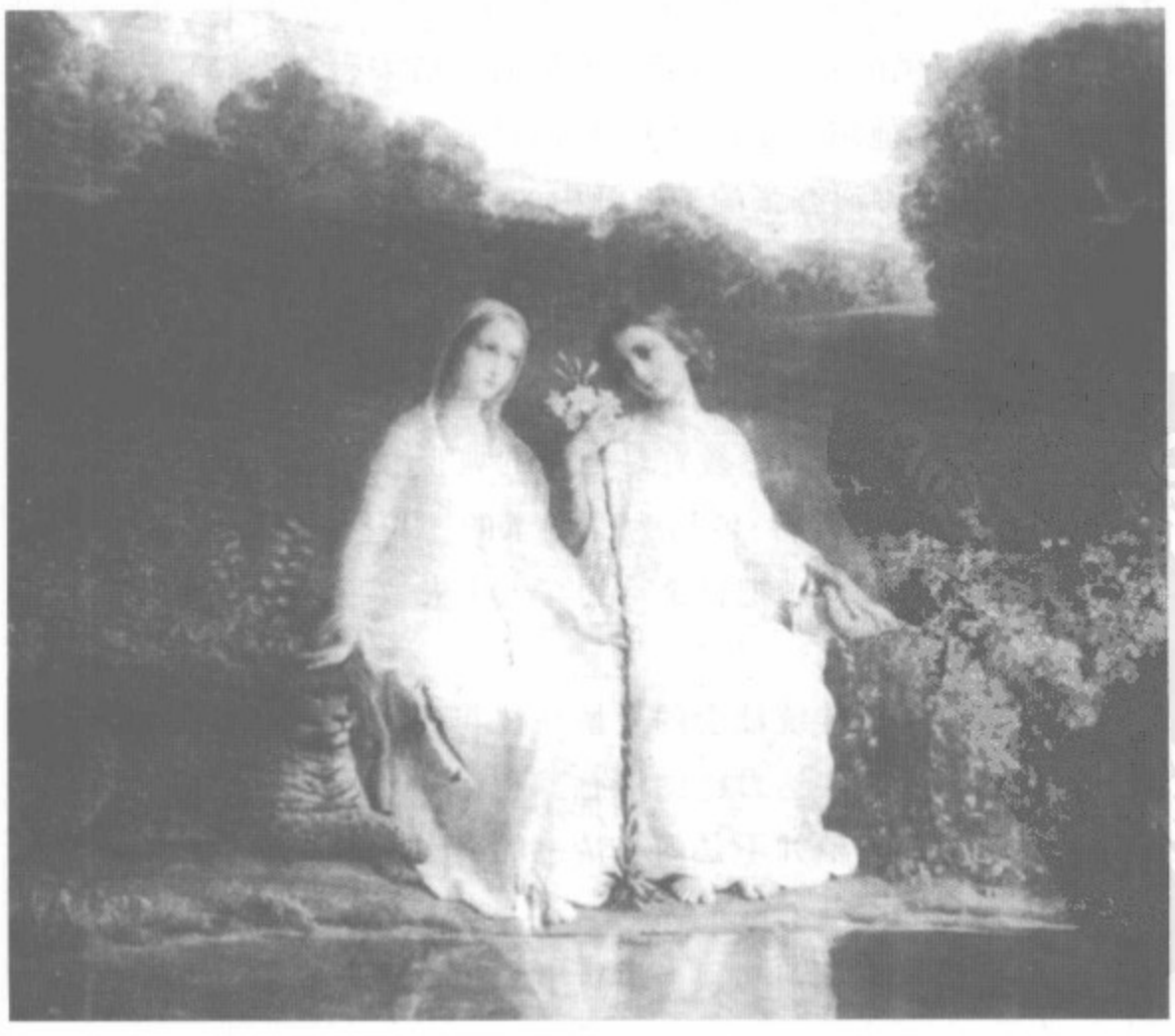
浪漫之爱影响到了人们的忏悔，加重了羞耻感，也引发了判断的新形式。性爱倾向被高尚化，克服男性欲望和女人所保持的天使似的形象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可能性。在言语会造成侵犯的情况下，眼神、微笑以及轻轻的爱抚会取而代之，而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求爱失败、面红耳赤或是保持沉默。

以上这些构成了情感教育的课程，这是爱情文学的主要内容。在人们成熟的过程中，情感教育是其中难度最大的一部分。女人要弥补男人所丧失的母爱。她所提供的舒适感，所激起的自信心将会

保罗·阿尔伯特·斯德克：《旋律》。19世纪晚期，符号主义对女性的形象影响巨大。通过强调女性形象既有高贵的一面又有邪恶的一面的两重性，符号主义表达了这一时期男人心中由女性激起的恐惧。

使男性的第二次新生成为可能，让男性在遭遇苦难后得到补偿，重返乐园。瓦恩夫人、赫那夫人、顾安夫人、默赫萨夫人，还有其余许多女人都扮演了第二母亲的角色，她们参加评析某位男子渴望的情爱启蒙。不过，这些母亲是难以接近的。在爱情文学里女性角色的背后总潜藏着一个可怕的、被阉割了的女人，对于所付出的浪漫性爱，她要求获得丰厚的回报。

1850年后，虽然劳伦斯仍然继续在描绘理想的角色，但浪漫的爱情作为一个延续性的模式已经不存在了。“爱”字虽然在语意上没有变化，但是这个字的不同衍生意义不再属于一个系统的范畴。弗劳伯对1848年这代人的失败进行的讽刺是登峰造极的，这标志着女性天使般的形象的终结。贝里卡阻碍了情感教育的进程。人们不再忠实于浪漫爱情的模式，这种行为得到了扩散且代代相传——人们甚至会说这是一种民主。丧失忠诚的爱情成了一种消费模式，甚至是一种日用品。爱玛及其爱人幻想期待有像《勃瓦日夫人》那样的结局，这种幻想充斥了不连贯的爱欲因素，它在感官中漂流着，就像在小溪中漂流的落叶一样。这种不连贯因素在未来的50年里仍将持续。一旦斯芬克司取代了天使，一种暧昧的、情感的复杂转换、



路易斯·让默：《处女》。在针对梦幻的、精神上的浪漫爱人的暧昧理解方面，没有人能比让默更优秀了。

幻想、纪念物和恐慌就会取代对信念不可抵抗的冲动。

真实行为

对于爱情的表征，近年来历史学家们知之甚多。现在我们所需做的是研究人们的真实表现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先期的工作表明，浪漫模式的爱情是有影响力的，在其日渐圆滑成熟的细节和人们真实的行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尼果·卡斯丹写道：到18世纪末，关于激情爱情的花言巧语已经渗透到了社会最底层，新的漂亮话已经凸显出了其影响。甚至连目不识丁的人也说起“温柔的誓言”和“倾泻不止的眼泪”，折射出卢梭的《卢维尔·海洛薇兹》的多愁善感。通过对19世纪初以来的私人信件的研究，让·玛丽·戈迪埃发现，热情洋溢的语言方式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数年里曾一度狂热。爱情变得疯狂；嫉妒表现为愚蠢的行为。情感是那样地排山倒海，甚至受到了死亡的吸引。简而言之，眼泪的私人化与导致疯狂的爱情传统力量的激烈化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女性开始被描绘成天使的形象；宗教比喻变得寻常可见：情侣是“神圣”的精灵，受人崇拜。

半个世纪后（1850~1853年），小资产阶级开始沿用这些同样的比喻。年轻的朱尔斯·奥都阿尔发现自己疯狂地爱上了一位乡村女教师，她是农民的女儿。他写了大量的书信来表达暴风骤雨般的情感带来的创伤。他用信笺传递他“长而热烈的吻”。他把他流着血的心比作耶稣的心，好似夸张的圣像画中的描绘。“我的上帝……祝你的意愿能达成”，当他不能从他情妇的身体获得“神圣的安慰”时写道。在花园里漫步，匆匆一瞥，表白，牵手，标志着维克多·雨果的爱情的初级阶段；司汤达对梅蒂尔德的激情没能长久。新教徒富郎斯瓦·吉佐严格的情感教育是当时的典型教育课程，一如吉佐本人所认同的。伊波利特·波塔为他母亲的一位挚友重温了吉佐的激情。后来的政府倾向于把自杀行为与人生失败区别对待。

在乡村里调情

就爱情而论，传统社会的爱情往往与现代社会的迥然不同，19世纪的农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利穆赞地区的移民写给他们妻子的为数不多的书信并不是内心情感的表白，而几乎千篇一律都与经营农场有关。

这种情况表明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们从那些按人种学者的眼

光来审视乡巴佬的人士那里所获得的信息，是由偏见产生的狭隘观，受启蒙运动中人类生物学的影响，他们视农民为莽夫，需要适应缓慢地朝着文明进步的“思潮”。这些观察家是盲从孔狄亚克和伊德卢盖的追随者，仍然鼓吹男人的能力正与其另一种能力交锋：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蛮力乃至于暴力，以及农民们居住的不卫生的生活环境阻碍了他们的感官。因此他们的情感是在极其微妙的歧视性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头脑在构造上，比其他男人要少一些敏感的神经，欠文雅。因此，农民只能采用粗暴的方式来体验情感，他对浪漫的爱情毫无感觉，浪漫的爱情需要某种微妙的交流。活力论者指出，农民粗俗的外表正是他们精神贫瘠的写照。粗野的本能或是迷信的节欲——这两种极端的方式概括了农民的情爱体验。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解释过这种方式。他们所认知的爱情是乡村社会真正认同的。马蒂娜·塞葛昂评论说：“人们谈论爱情，并享受情爱。”但因为他们的爱情方式与当时的观察家的爱情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后者的解释容易引起误解。此外，爱情的表现还存在相当大的地域差异。

爱情通常不是用言语来表白，而是用行动来证明的。在节日聚会或露天集市上，在夜晚守夜时或集会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会彼此投以赞许的目光。男人往往吝于表白，承认其内心喜爱的唯一方式就是否认。他会用嘲弄而又拙劣的玩笑来逃避，举手投足可以反映出恋爱的进展情况。情人间的握手是那么地轻柔，握得骨头都酥软了；他们手挽着手，碰到彼此的臀和腿；肩上轻轻的一拍，背上缓缓的一抚，可能都意味着情感在相互交流。人人都明白这种举动的意思和反应的逐渐变化。

随着双方家人的认可，年轻人可以开始“示爱”，更确切地说，就是“求爱”。就这一点上，他们的拜访是一个严格的礼节问题，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监督。求爱常常在沉默中进行。满足婚前性需要的各种方式都被采用了。爱抚和拥抱受到家人的许可和监督。婚前性行为因为相互手淫而得以克制，但女孩们愿意裸露她们的胸脯，任由自己的乳房被爱抚。

解释的困难

对各种行为已经知之甚多，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调情和与一个特殊的情侣调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情侣的选择反映了个人的喜好，这种关系受他们个人标准的影响。爱情的公开表白往往遵循一种非常仪式化的模式，对此，人类学家很快就已经指出，但这种表白可能已经被更为深思熟虑的诱惑超越了，这种诱惑逃避了外界旁观者的注意。年轻的男女有很多机会相会：放牛时，去集市时，步行去教堂时。毫无疑问，在这些从社会控制的制度下得到的短暂自由时刻，真实的情感才得以表白。

据爱德华·肖特所言，第一次性革命发生在18世纪。渐渐地，年轻人感觉到：挣脱所有礼教和家人及同伴的监督的愿望正与日俱增。一种新的、更为独立的恋爱方式形成了，起到激发作用的是：农村的迁离导致乡村模式的瓦解；两性关系日益变得具有自发性，也更加微妙，往往是心领神会。上述浪漫爱情模式的传播和我附的一幅插图很相似，这幅图可能让我冒犯了肖特的论断，然而，相信传统社会准则的认同从而证明个体感受的消失是不正确的。家庭策略并不总是与个人感情相矛盾。正如皮埃尔·布尔迪翁在贝阿恩的诉讼案中指出的，这些策略为灵活机动以及个性的伸张留有一些空间。无论如何，家庭规范从年少时期就已经内化，因此影响了个体对浪漫感受的特别的敏感度。

婚姻策略在19世纪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昌盛了。一场成功的婚姻比以往更加势在必行，尤其是自幼就被指定为财产继承人的孩童。兄弟姐妹间的隔膜实际上是加深了；幼子们比以前自由些，但兄长们的举止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同样，一位临时工的女儿比被选定要继承家庭农场的女儿来，要享受到更多的自由。罗那德·于贝斯谢尔指出，在帕德卡莱农村，有些姑娘有非常体面的家庭背景，能赢得地位更高的男士们的心。

两性间维持比较严格的距离的价值不应忽略，其结果导致1870年到1880年间教权主义支持者的攻势达到了巅峰。在那10年里，某些地区的乡下青年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在比昂桑塞罗瓦，对女孩的监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严格异常。

恋爱行为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社会经济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年轻人可能都曾向往自由，但这种众人皆知的愿望在实践中往往是他们在仿效某种值得赞美的行为模式。从农民的浪漫爱情比爱情的传统形式更为个性化这一点看，肖特的确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浪漫爱情的自发性不应忽视，那些流动到城市的农民的自

左页图：爱德华·热纳：《筹划未来》。

由也不应该被夸大。所有对自由的形象化比拟都源于一套古老的陈规，起先是资产阶级担心所谓的危险而创作的，接着影响了整个下层社会。一些史学家在研究城市新移民的情况时，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陈规。城市的周边地区被从某些特殊地域移民而来的工人占据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政府管辖下的乡村社会是一样的；同样，自由受谣言的限制。

关键问题是确定浪漫爱情是如何传播到社会的较低阶层的。教堂的教化使女性天使般的形象广为传播，据一位观察家指出，有关爱情的新表征还被言情小说和聪慧的诗歌所推广。七月王朝期间，这位观察家在利穆赞乡间备受欢迎，同时，人们通过书中扣人心扉的情节、阅览室以及连环小说熟悉并欢迎他。1870年以后，咖啡馆、音乐会和音乐厅帮助塑造了上流的奥德-瓦勒的情感。1890年后，情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可以用明信片来表白心迹、波澜起伏的情感以及情人节的心意。明信片将爱情的表白民主化了。

成年人的性爱在整个社会中往往是不对称的；一个学生可能会长期包养一个女裁缝做他的情妇。然而，这种不协调的组合却加速蔓延了爱情与引诱的浪漫想象。年轻的资产阶级宣称，有时不知不觉地就对他的女店员有了新的表示和态度，这样一来，一场爱情戏剧再度登场。冷淡的表示，沙发上的勾引，某旅馆单间内的彻夜缠绵，乡间的野餐——一切都是新的浪漫方式的尝试。

浪漫时代的性爱

性的学科是一片黑暗大陆（指性方面未被开发的领域）。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性”在历史上毫无地位，“性”还是被沉默的重重包裹封闭起来的大陆。因此，即使是象征性地进行尝试性的探索也是有益的。19世纪60年代又是一个转折点，因此，让我们从为变革的重要时刻作准备的半个多世纪——执政政府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全盛时期——入手。

愉悦的形式

性的表达方式形成梦并支配行为。忽视表达方式的重要性就会有犯时代性错误的可能。据布罗尼斯拉·巴卡科所言，“性”这个词在1859年（或许更早，在1845年）首次使用。首先，它揭示了生物特殊的性特征。在满腹经纶的性主义者详细阐述之前，人们就已

经谈论“爱情”和“恋爱的热情”，谈论“欲望”和“本能”，谈论“肉欲”或“做爱”。医生则使用“性交”和“交媾”这样的术语。对肉体之爱的描述实际上是男性的专利，然而恰恰是男人不能自主地谈及这一话题。只有医生们能公开地讨论性，他们借用“本能”的概念来区分性和情感。性因此被描述成物种繁衍必需的原动力，从而属于较低的层次。对人们认为的各种可耻的性关系，医生们唯有耸一耸肩。他们认同所有的性行为，并对各种各样的性高潮予以分类。一些医生已经严辞谴责了他们视为本能“失常”的不正常的性行为方式。“体外射精”是性病理学萌芽领域的首要目标。

肉欲之爱是小说和诗歌中不变的诱惑。淫秽的内容无所不在，蕴涵在文章的深处，驱使读者在阅读时去挖掘这方面的信息，由此增加了越轨的愉悦感。省略、曲言、借代、隐喻等描写手法使读者浮想联翩，相关的情景是性高潮的描写。在这类文学作品中，男人“占有”女人，同时女人“接受”男人。“愉悦”——有时是性，有时是感官——由“无法言喻的兴奋”、“极度的快乐”、“狂喜，几近痉挛的狂喜”交织而成。小说曾经在自由文学的领域探索或者至少涉及了性生活的隐秘之处，它们提到了性冷淡、阳痿以及同性恋丑闻中的快感。

笑是另一种策略。“直率、健康”地作乐是露骨和淫秽的情绪的一种托词。猥琐歌曲常可以追溯到崇尚贵族化勇敢精神的浮夸年代；这种歌曲在小资产阶级和下层社会中非常盛行。淫荡的小调应该是鼓舞了人们的热情。有时，一个故事的含义用一幅画谜来隐含。斯本内现象使得读者可以解析文中淫秽的提示。淫秽歌曲和文学作品的修辞使男性自恋者感到满足。玛丽-韦尔-奥尼克·科蒂埃观察发现，“歌曲作家梦见的总是热切的女人，她们的目光集中在使她们愉悦的乐器上”。性的象征常常与爱神和战神联系在一起：女人永远都是“躺在他们的臂弯里”，男人则是“射击斗牛的眼睛”。

积极否定女性的双重性影响了性愉悦的表征。正如让·鲍里曾经指出的，理想主义和堕落主义是不断交替的，天使般的向往有时会无情地滑落到妓院的深渊。按照浪漫爱情的方式，女人希望自己在床上的表现是非常贞洁的，今天人们可能对这种描述只能报之一笑。女性的欲望被禁止，所以女人们只能假装被男人俘虏，她们只有在被撩拨得无法自持的情况下才会“释放自己”。体验完“激

阿尔弗雷德-菲利普：《恋爱中的女人》。

情”后，曲折地表达出自己愉悦的女人又都被迫伪装出先前的纯洁姿态。路易斯·科尔不是一个故做正经的女人；当她和年轻的福楼拜一起乘出租马车时，她主动投入了他的怀抱 。甚至当他们在一个不知名的旅馆第一次做爱后，她仍在床上陶醉着，“她的头发散乱在枕头上，眼神已步入天堂，双手搭在一起，表达着她疯狂的话语”。斯塔尔特在对这一场景评论时指出：“1846年，资产阶级社会的妇女表现得如同野兽一般，却被要求扮成天使的模样。”

男人们的性自卑感与日俱增。当穆塞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谈起他的性愉悦时，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能够多次高潮。19世纪的文学作品强调了性愉悦方面的突发性。不仅小说家，内科医生也注意到了个体完全的放任自流，沉湎于自我毁灭——甚至是沉湎于自我堕落。内穆纳完全沉沦于她的性高潮之中，那种高潮就是“一丝轻微的颤栗，一阵极度的苍白，喉咙的震撼，一种亵渎/(和）低声呢喃着一些无意义的话语。”

这种肉体快感的浪漫主义表征，与从其演变而来的萨丹愉悦大相径庭，它伴随着一种对性交逻辑思考的迷恋，对身体消耗和损耗的恐惧的关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男子需要对他自身的威力放心，或者至少对持久规律性的一种逻辑证明放心。事实上，维尼和雨果计算了他们性兴奋的次数，福楼拜对他的精力支出也做了统计，米什莱坚持对他的生殖器活动进行记录，这使我们不由得想到，这种性行为的记录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一定很平常。

肉欲的戏剧，沉醉与堕落纠葛其中，呈现在社会的边缘。愉悦的形式被界定在妓院内、街上邂逅时、高级妓女的豪华公寓内以及通奸的过程中。

婚前性行为

在19世纪，从青春期到结婚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女性而言，由于初潮年龄普遍提早了两年，这一时期就显得更长了。日常生活花销的提高促使人们在更长时间中等到遗产后才能完婚，因此独身的时间延长了。同时城市犹太区也在扩大，其结果是产生了对婚前性行为的强烈要求。移民中的工人居住在巴黎市中心租来的房子里，士兵在首都驻防，办公室和商店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收入盖起他们梦想中并不奢华的房子——这些男人让女性的美德不断遭到挑战。此外，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下，城市中挤满了无数的永久性移

民,在有些邻近的社区中,男性和女性在数量上明显失衡。而在家庭系统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地区,较之过去,年轻的男子更需要为生存而挣扎,许多人都明白他们很可能找不到妻子。在贝里,不断扩大的仆役阶层的成员们就遭受着性生活被剥夺的困苦。

医生们承认"遗传本能"式暴力的存在,并试图要测出它出现的频率。对这一存在的确信调整了人们关于性道德存在双重标准的信念。奉行现实主义道德的神父们,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提倡不要把最为兽性的行为看得过于严重,容忍让男性性需求得到满足的复杂体系存在。他们努力限制导致性罪恶行为的范围。为了抵制这一行为的恶劣影响,有人创造了一个爱欲天堂——路易斯·雅莫的爱情天使们在这个天堂里坦白地表达着欲念。理想的爱情弥补了横流的低级性欲。

第一重地狱

性爱地狱的第一重——手淫不应对我们造成困扰,但统计数据表明,婚前性行为还有其他形式。1750年到1860年间,非婚生育和认可婚前性行为观念的人数增多了,这一事实自然十分重要。不过不幸的是,单纯靠数字还不足以对其进行分析解释。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些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自由地选择性爱。在爱情这个领域,个人主义日渐膨胀,结果是选择婚姻伴侣的传统规则受到了破坏。这些规则限定了订婚后所允许的行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这些规则逐渐完善,大致基于人们的自控。对这一规则的破坏是十分明显的。应该看到教堂一直并不反对年轻男女相处,尽管这种行径中潜藏有罪恶的种子。如今的年轻女子已不再受到同伴们的监视了,她们变得容易被引诱。

另外有些人认为,婚前性行为在数量上的增长表明,较之过去,更多的青年男子被迫迎娶他引诱过的女人,但非婚生育这一数字的平行增长质疑了这一假说。非婚生育的增长恰恰可能反映了家庭婚姻策略的增强而不是削弱,"非法"的爱情得不到保障,而只会在棚厩和草地上发生。

在19世纪,一些乡村地区的婚前性行为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有时交友原则允许年轻男女一起过夜,但他们并不一定会有性行为。在科西嘉,青年人会婚前同居。在巴斯克的乡下,盛行试婚。在莫尔旺,人们期望当奶妈挣钱的女人们在婚前就怀孕以显示她的

多产，这样她们的收入才能得到保证。阿拉斯教区40%的新娘们怀了孕——据伊夫-马里·伊莱尔所说，女人们被迫证明其生育能力。而人们对此也很宽容。在1838年到1880年间，15岁到17岁的年轻人成双地到密室、阁楼或是“秘密地点”去，而且这种行为最终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

同时存在的一些不太形式化的结合行为。在热沃当的乌斯托，年轻男子在马厩里和女仆做爱，这些女人教给他们生活的真谛。一个老练的女仆会离开她雇主的臂膀而引导他饥渴的儿子初涉爱河。在洛泽尔省的一些地区，生活中充斥着兽性。没有机会结婚的年轻男孩在强暴了一个牧羊女后是不会被惩罚的。如果他比通常情况下的更为暴力的话，村庄中也没有人会谈论他，因此警察要揭露犯罪人并不容易。在这里，独身者的性行为直接导致了对下层女性蹂躏的默许。在乌斯托，人们对他们的“女性继承人”看得很紧，以确保她们的贞洁。在这种虔诚的环境下，怀孕的女孩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时为了制止流言，女孩们会将自己牢牢束缚在衣裙里，忏悔时不花过多的时间，只做做领圣餐的表面文章，还会分外努力地工作以期转移人们对她们处境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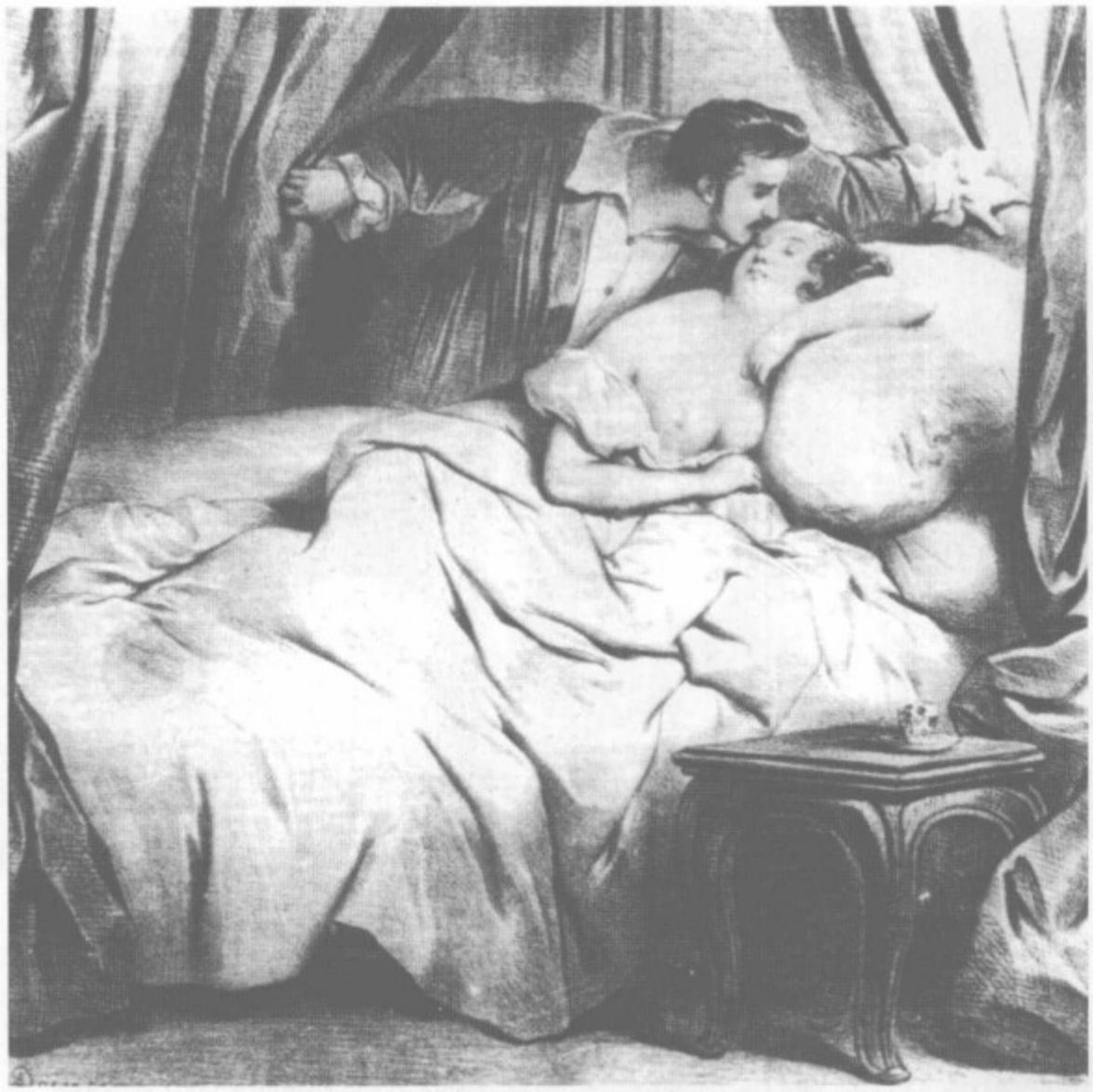
同居的形式

路易斯·谢瓦利埃，以及更后来的爱德华·肖特都断言，19世纪早期城市工人们的同居行为成了一种新形式的非法性行为。这些年轻的移民工人们刚刚脱离了农村的束缚，现在又身处社会之外，而他们厌倦了为人所控制，于是就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关系从而能够对人说出自己的感受。因此工人阶级被认为创造了当时一种新形式的私通关系，而此时中产阶级中核心家庭的形式也得到了加固。

不过这些事实并没有提供足以支持工人阶级婚前性行为的理由。七月王朝时期，米切尔·弗雷在巴黎考察了8588对未婚恋人的情况，其中只有2/3的男性是有工作的人，而9/10的人在同居。另外，以上这些人中，做工的男人大部分都是技工和店主，只有少数是仆役、苦力和摊贩，仅有10.4%的人是工厂工人，但几乎所有的仆役和苦力都是同居者。这种不平衡的情况表明同居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此外，弗雷还表示1847年在巴黎工人阶级的命运和盛行一时的同居现象之间并没有联系。而且，在更早一些时候，工人阶级就流露出了明确的想要结婚的倾向。

于贝尔-德尼·艾特切韦尔：《陶醉》，在这个引诱的场景中呈现的是奢侈和华丽的装饰，女人的姿势预示或者表示要放弃。带有软垫的沙发使这位女子陷了进去，但她似乎又惊诧不已。不像在床上，在沙发上她可以假装陶醉或者被征服了，这样便安慰了她的道德心。

这些研究虽然有限，但也表明了保持谨慎的必要。“同居”实际上包含有多种方式。关键是人们不能否认非法性行为在社会的穷困阶层中普遍存在。由于婚礼花费不菲，许多人装作已经结婚，只是延迟了正式的婚礼而已。比如说在里尔，结婚礼服的钱，婚礼器具的钱，弥撒和结婚预告的花销，结婚宴会的费用使得恋人们就举行婚礼这个问题要再三思量。要办齐政府所要求的文件也不容易。对离开家乡的人而言，要获得必需的文件就意味着要写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信件，要填一些花钱买来的申请。在1850年前，穷人们还享受不到免费填表的福利。1844年在莱昂那斯结婚的制丝工人中，20%的人曾经同居过，而大量的人（80%）在他们的婚姻为法律承认时已经有了孩子。“显然，”劳拉·斯特吕芒热贝表示，“根据技工们的生活法则，性关系和孩子的出生并不是结婚的充分理由。”



阿希尔·得韦里：《晨与夜》。得韦里是七月王朝初期在性爱场景表现方面显得有些腼腆的一位画家。这里的描绘有所保留，看起来更倾向于描绘婚姻关系，甚至是新婚夜，而不是过度的纵情声色。女人的姿势欠优雅，她已经沉湎其中，任由男人将她抱入睡床。次日清晨，她表情中满足的痕迹掩饰了她的克制，证明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她那裸露的乳房是晚上激情的唯一见证。

城市人比农村社会更为宽容。在城市里，家庭的控制同样不再那么有力了。同居和结婚被视为同一回事，继承权不会因此受到威胁，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允许女儿“享受青春”。在任何情况下，自己挣钱的年轻女性都能通过必要的途径表达自己的需求。社会调查员反复重申在大城市里没有男人的女性会活得多么艰难。由于同居的处境对于她的伴侣来说是件低级的事情，因此对女性而言将他们的结合合法化变得困难。年轻的城市男子比起他们农村中的同龄者而言，也会较少受到尖刻流言的攻击。

随着同居时间长短的不同，其本质也不同。1847年在巴黎有43%的未婚恋人至少已经同居了3年，这种结合被视为试婚。而34%的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6年多，这种持续的同居表达了一种对于正常标准毋庸置疑的轻蔑。

我们已经看到一种终会导致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现象，弗雷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的非法行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在依附关系

下的同居，那是在大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分子与女裁缝、洗衣女工或是女店员发生的关系。在有的案例里，如学生和女工们的关系中，男人们满足性欲的需求就在结婚的需求之上。通过小说我们熟悉了这样的情形，坦诚但不贞洁的年轻女子喜爱跳舞，也给予她来自中产阶级的伴侣在郊外生活的精力、知识和真挚情感。在学生们结束学业时，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彻底崩溃，而这种普遍存在的简单且轻率的行为无疑不会让这种关系的崩溃那么愤世嫉俗。让·埃斯特贝曾经分析过第三共和国部长们年轻时的行为，他认为，所有重要学校的学生们都依赖与这些年轻女人们热切的激情，在学生的风暴线上，她们是永恒的固定成员以至于被称为是大学生。每一个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女店员”，她们还陪伴他参加班级聚会。随着时间流逝，年轻男子在找情妇方面会采取一种更为确定的态度，或者只要他力所能及，他会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伴侣而遗弃他的女友，抑或更为省事地直接付钱给妓女，将其当作情妇。虽然花钱找妓女使人们忧虑，但最终狎妓行为会取代消失了的“女店员”。

对军官们来说，由于严格的纪律、频繁的换防以及供养妻子的艰难，结婚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人都等退伍后才成家。为了避免成为妓院的常客，只要关系足够审慎，而这个女人也有一定优点，军官们就被允许同居。许多第二帝国的军官们顺其自然地采取了这种临时的解决方案：艺术家及其模特之间的性爱是小说中的常事，但由于缺乏研究我们不能判断其是否符实。

这种依附性的关系有的是持久的。稳重的单身汉会有成立“家室”的迫切需求。在当时，一个男人操持家务是很难也是很古怪的，这会占用他大量的时间，迫使他时常在家里露脸。照看炉火、打水、倒垃圾、做饭、处理亚麻布这些都是额外负担，正是在这些负担面前，不止一个厌烦了在廉价餐馆吃午餐的未婚店员最终选择结婚成家。在农村，如果一个男子允许自己干“女人的活”，人们会大嚼舌头。因此和一个良好、文静、有保证的女人成立家庭对一个孤单男人来说是耻辱的，这样的家庭中，男人对妻子的热情很难比对一个仆人更多。在杰瓦当的乡下，与仆人同居的主人能够避开嫁妆的问题。在期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的时候，他会采取这种唯一对他有利的结合形式。

艾德蒙·德·贡戈：《妓女伊丽沙》，1877年。这一妓院场景是艺术家在看到临近军事大学的军队妓院里的一幕而创作的，以各种古怪的姿态描绘出了妓女们的疲惫。它与德韦里阿画中女性的含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舒适的家庭安排像是一个新天地，避免了已婚男人出于对年轻肉体的渴望而出轨的情况。像他们以往所做的那样，在乡下，年长的男人会继续猎艳寻欢。在一些杀害小孩案的法庭记录里，我们获悉“主人们”在妻子甚至是继母的唆使下解雇了因他们而怀孕的女仆而不带任何的悔恨。不过到18世纪末，南特的一些情形证明这种带有金钱色彩的附属关系逐渐让位给一种稍高尚的，甚至情感更深的关系，男人们倾向于在自己的公寓里包养年轻的女友。尽管仔细搜寻，但能表明当时的男人比以往更乐意卷进婚外情的证据并没有被发现。在这方面，民法条款也许起到了一定作用。

七月王朝时期，被包养的女人成为了一种为人熟知的城市角色。巴尔扎克的小说《双重家庭》就解析了小心翼翼区别开来的与妻子和情人生活的愉悦和困苦。隐私的流行甚至影响了男人对其情妇的行为，在公寓里，来自资产阶级的男性期望能找到家庭中所有的舒适，同时还有作为奖励的性爱来调剂生活。一个从不背叛爱人的情妇和可靠、得体的妻子极为相似：两个女人都生活在对男人归

来的不耐烦的期望当中。

有代价的愉悦

妓女和高级妓女完全是两码事。帝国和七月王朝当局首先开始设想建立规范的妓院。他们发展了所谓的法国体系，这成为了整个欧洲的典范。当时，持执照的妓院的作用大体有三个：虽然遭到了官方法令的禁止，但首先启蒙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年轻学生；第二，它满足了来自性欲横流的犹太区未婚男子的“生理本能”，这类客人多数来自工人阶级；第三，它无微不至地为心灰意冷的丈夫们服务。许多事情会促使男人逛妓院：妻子不驯服，老旧无用的妻子出现在不合适的婚姻中；神父聆听忏悔时制造的扫兴；古怪的母亲；经期、怀孕哺乳引起的经常性性行为的中断；更年期后性行为的终止；流行的妇科疾病；避孕的需要等。妓院还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公民能够得到放松，忘掉他拘谨的形象。着迷于“动物般的行径”和下层社会的低级语言，同样会引发一些男人与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的裸体女人待在一起的欲望。

甚至在建立规范化的妓院以前，持照妓院中的佼佼者就梦想着能有一个为不加抑制的强烈欲望提供安全而谨慎的发泄场所。在这种性服务场所里不存在圆滑的性爱和激情的迸发，这些行为是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生理需要。与非法的妓院不同，持照妓院被当成实用主义性生活的殿堂。注册妓女要接受警方医生的检查；她们的身体时不时地被细查，老鸨会密切地监视这些行为。妓女的任务是使她的客人心满意足而且安全地将他交还给家庭和社会。

实际上，1830年这个系统达到了不断完善后的顶峰，当时是芒让，随后是巴黎的官员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想将城里所有的妓女都限制在持有执照的妓院内，这一行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脱网从业对女人来说是容易的，警方从来都不能彻底取缔非法妓院。即使采用帕朗-杜夏特勒精确的现实主义方法也无济于事。无照妓院继续营业。悲惨的下等娼妓为了几个钱在建筑工地、接近城墙的沟渠里出卖着自己。虽然对当局很恐惧，但追随军营的妓女仍然在兵舍周边的地方聚集。在明亮的灯光下，人们在有照妓院间来来往往，而无照妓院则在可疑的阴影里“繁荣兴盛”。

同时，一系列来自工人阶级的女性的性形象在人们心中扎了根。这种形象与恶臭、污秽、疾病和死亡交织在一起，迄今仍影响

着历史学家们的看法。我们还要考虑到各种粗俗的快乐所起到的狂欢作用，当局希望将这种快感限制在较低的层面上。

一些出身卑微的女性即使善于利用她们的迷人特质也免不了做人情妇的命运。暧昧的店主为他的被保护人招徕老鸨和客人。在七月王朝黑暗的偏远地区，舞台专为名妓和其他妓女的胜利而设，然而对于这种历史之外的“皇家盛宴”，我们所知甚少。

婚床

现在让我们回到婚内性行为上，在这个世纪，它是处女生活和梦想及焦虑的终结，也是年轻男子启蒙时期的结束。对19世纪的作者而言，也许是因为那种有庇护感的生活的开端令他们震惊到哑口无言，又或许是由于其中没有足够的丑闻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很少论及婚床这个主题。历史上的人口统计追溯了人们生育的周期行为，但是其结果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了得到快乐人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神职人员含混的咒骂和医生们更为意味深长的处方。对比所有阅读材料形成了一些重要结论。首先，新婚之夜对新娘的启蒙在整个世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医生们含蓄地提到了新婚女子的羞怯、恐惧和无知，事实上新婚夜对于这些女人来说是一场仪式般的戏剧。无数的证据表明，时兴的蜜月旅行部分是源于想将与处女性交的场景从尴尬的家庭转移到别的地方，由于许多丈夫直到新婚夜才流露出真实的本质，所以开头总是粗鲁的。1905年，福雷尔医生指出，他的病人期待这样的洞房：由于良好习惯的限制，人们不会谈及他们行房的需求。

初夜后，丈夫的责任是控制妻子的性需求。像一切女人一样，她有可能容易甚至是不经意地成为无节制的感官主义者。一个丈夫只有调节好了妻子在性方面的胃口才能让她免于遭受仰慕男子的侵扰，或是稍普通一点的“衰弱症”。庆幸的是，人们一般认为女人的欲望是需要刺激才有的。因此医学专家们在丈夫们的肩上压了一副责任的重担，我们也会更加容易地理解青年男子在发现他的妻子在性方面太过精通时的忧虑。

医生们反复告诫男人们警惕纵欲的危险。为保持普遍的上流社会态度，他们提倡要小心地管理精液的储备。过度纵欲，尤其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很容易损害丈夫的健康。以利格纳克的尼古拉和韦内尔特的老工人为基础，医生们推荐了指导方针，开始为不同年龄

的男性建议性生活的次数。当然，要知道这些指导方针如何被遵循是不可能的。医学专业反对上了一定年岁的人过性生活。性关系对绝经妇女和不育妇女而言也是多余的，医生告诫男人要克制连伴侣怀孕期间都不能熄灭的永无止境的性欲。许多医生认为50岁是男人性生活的上限；过了这个年龄，沉湎于性生活只会加速死亡。

人们认为，频繁的性生活增加了成功怀孕的可能。医疗文献没有把做爱技巧和性生活质量或触觉的灵敏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男性的性交能力和速度联系了起来，令女性非常失望的过早射精问题被忽视了，虽然常提到的遗精问题说明这种现象很普遍。性交过程的短暂无疑是影响了整个世纪的准则，由此看来，同时带来的性高潮可能很少。1905年，福雷尔特别提到，在他的资产阶级顾客中，性生活中能达到性高潮的非常少。

把这一观点（指性高潮）放到这一时期是时代错误，人们完全没有过多地去注意自己的伴侣是否愉悦。七月王朝末期，人类对卵巢的发现证明女人并非仅仅是“管道”，一如亚里斯多德当年所言。更贴切地说，伽林曾推测卵巢在人们的观念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然而与伽林的观点相左的是，性交并不需要女性体验快感。排卵是一个机械性的过程，女性的满足被理所当然地忽略了。科学证实了雄性激素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开创了一个时期，一个对女性的性兴奋质疑和不友善地对待无用的阴蒂的时期。但是，该发现可能解放了一些不愿受孕的妇女，她们故意避开性兴奋，这在观念上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在19世纪末，一些女性拒绝相信她们是在怀孕，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感受到排卵，如果需要证据，这正是有关科学知识与日常行为间存在距离的证据。

考虑到对贞洁的崇拜、浪漫的天使般的形象和对端庄的赞扬，虔诚的资产阶级禁不住把卧室想象成一个避难所，把婚床想象成执行神圣的生命繁衍任务的圣坛。年轻的奥古斯特·瓦克里在他妻子的卧室里摆放了一张祈祷椅。床、圣像、祈祷器乐加重了屋内的宗教色彩。出于谨慎的要求，做爱应在黑暗中进行，在任何镜子都照不到的地方。医生推荐夫妇最好使用“男上女下”的体位，18世纪的医师和神学者赞成诸如“男后女前”的体位，他们认为这种体位对怀孕具有帮助作用。

在不违背谦逊原则以及不引起他们伴侣的轻视或反感的前提

下，男人要有多大胆？女人能接纳多大的愉悦？丈夫们的欲火能燃烧多久？对这些问题，各种资料均未加以记载。当一对夫妇去法庭办理离婚时，除了掩饰地说成是“残暴”或“侮辱”时，性生活不和谐是从不会被提及的。直到19世纪末，女性才敢于公开表示她们拒绝口交。

危险的时代错误

时代错误的危险

性是现代婚姻生活的核心，但在19世纪，它仅是婚姻生活的一个背景。资产阶级家庭团结在一起是为了保护继承的财产。法律文件，如遗嘱和捐赠（当事人健在时有效）常规定，在子女们都成家后，所有遗产都应留给死者的配偶——一种真实情感的表示。在这个社会单元里，一个无儿无女的丈夫对他自己家族的眷恋很少会超过他对妻子的情感。遗嘱的特别表述部分进一步证明了丈夫和妻子间的感情，极少数的分居夫妇另当别论。

农民夫妻间的性关系鲜为人知。但是，在未加批判地接受农民

尤金·爱德蒙·塞利：《阁楼上》。这个年轻学生或是职员和他的女店员一起享受着令人愉悦的间歇。这样的作品回顾了19世纪资产阶级在情感教育方面的自由时刻。

家庭里没有隐私和随意乱交的论断时，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乡下居民的做爱场所并不拘泥在床上，谷仓、干草仓、树林总是可以谨慎地满足欲望。乡下人还不穿贴身内衣或胸衣，他们对其私处的卫生一无所知。然而，一如马蒂娜·塞格莱提醒世人的，我们不能低估丈夫和妻子间存在的感情。在经营农场和养育子女的艰难任务面前齐心协力，使他们产生了紧密和长久的婚姻联系。在马尔勒的卢瓦尔谷的一个小村庄里，雅姆·勒南发现，婚后取得双方财产公证的结婚人数剧增，同时，领取丈夫和妻子间财产转换的证明的人数也在急增。

性爱的来临

性现代史始于1860年前后。沉闷的隆隆声冲击着传统文化，性爱的表征也随之改变。“性”一直都被封闭在私人的领地里，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其伦理道德的束缚。狂野奔放的下层社会性爱的传说打破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禁锢，显现出迷人的美景。流莺夜晚的诱惑更为撩人。当实业家埃纳博窥视到年轻雇员做爱的情景时，他深刻的感触揭示了这种性渴求的无穷奥秘：“只要有某位女子心甘情愿躺下，把她整个身心都交付给他，让他从她身上开始新生，他愿意为欲望而死，因为人总有一死。”

性爱想象的转变

浪漫主义的情爱方式逐渐消逝。随着女性对性事的渴望，勾引变得寻常可见。放荡不羁的现代“唐璜”看起来只是一个怪诞的反面角色。情人间无须再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情感，但炙热的情感不得不因为惧怕发生“各种复杂问题”而熄灭。与此同时，男人对女性的担心也增加了。法国在普法战争及紧跟其后的巴黎公社中失败后，特别担心所有小心建立起来制约女性性欲的藩篱会摇摇欲坠，因此企图建立一种“道德秩序”，但收效甚微。他们担心的是下层社会的淫欲会渗透并玷污资产阶级，激发躁动不安的性渴望。文学作品纷纷选取一些卖淫题材。马克希姆·迪康严厉抨击了这种堕落的交易 。左拉则竭力在其作品《娜娜》一书中描述这种情形。一幅令人想入非非的新画作表现的是肉体的诱惑。引人入胜的是那炙热的眼神，醉人的凝视，若隐若现的睡衣，楚楚的泪光，悠长的叹息，羞怯地吐露着的心曲。这代表的是另一个时代。现在，女性

有意表现自己热切的欲望，她们在身上喷洒迷情麝香。欢场女子使无数男子神魂颠倒。不久，这些风骚的女子开始用葡萄藤蔓或者异域植物装扮自己，极力将自己打扮成象征性爱的女神的模样。

与此同时，从莫利到伊尔斯克菲尔德，从费雷到比内，从克拉夫特·埃宾到福雷尔等一大批研究者详细阐述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性爱观，这种观点改变了性科学的方法论。这第一代性科学家对好色之徒和隐秘的同性恋者进行了分析，并把他们的行为定义为“病态的性行为”，从而来引导人们的认知。此前，这种行为遭到的只是“不道德”的谴责和非议。这一历史背景为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石。色情还渗透进家庭，那里才是性革命风暴最猛烈的地方。

西奥菲勒斯·亚历山大·斯坦雷：《围猎》。只有在当局禁止有照妓女转到地下，也禁止无证妓女勾引客人的情况下，卖淫规范化才能实现。警方因此要做周期性的扫荡。这种专制的行为激起了废除主义者的愤慨，他们借抓捕无证妓女的场景来攻击警方行为的非法性。

近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年轻男女在接触异性时开始采用新的方式，这种对后来一个世纪西方年轻人恋爱观的形成有着深远意义的变化，现在已无从考究。从文学作品中试举一例，引用莫·德鲁韦尔的术语要胜过马赛尔·普雷沃的“半贞洁”，请允许我把有关这一变化的发言权交给该领域的专家——奥古斯特·福雷尔。如同缱绻的浪漫主义方式，新的调情方式要求男女在接触之初保持距离。福雷尔强调邂逅前神交的重要性。四目相对，彼此交融：这是汹涌澎湃的爱情体验的第一步。其他先决条件还包括：“轻触”到对方的服饰，之后是皮肤，接着是紧紧地握手。两人因吸引而靠近，紧接着在桌旁、马车内或是铁路机动车内幽会。继而是调情：拥吻、爱抚、触摸。据福雷尔说，这种节奏的欲望乐章往往将彼此引入“情欲极度亢奋的境界，不需要任何言语的交流”。许多年轻人“避免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恋”。调情营造了一种绝妙的“情欲在无声中交流”的氛围。

调情

这种新的求爱方式很快便与一些特定的场所联系在一起：温泉度假村、海滨胜地、游乐场、豪华宾馆、疗养所。调情在满足必要的情欲需要的前提下又保持了彼此的纯洁和谦逊。甚至许多已婚妇女也对这种方式迷恋不已，只暗示自己性欲的女人不会危及自身。此外，新的性爱方式需要技巧。这种技巧体现了整个调情过程优雅和复杂的一面，需要发挥灵性和才情。约会的礼仪很快就受到了这种新方式的影响。尽管这种复杂的调情方式有其“不利”的一面，然而，在福雷尔看来，男男女女们更喜欢选择浪漫的调情而不是简

左页图：皮埃尔·朱尔斯·唐尚：《崩溃》。当一个男人将要结婚时，他通常告知情妇一切都结束了，希望能避免“困扰”。在贝尔-埃普克，包养一个情妇比引诱一个已婚女人更危险。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勒韦：《阴云》。这幅画作可能是以婚姻争端开场的。反映出对情感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兴趣逐渐高涨。这与保罗·布尔热撰写的流行一时的色情小说基调一致，这些小说受到一些妇女的欢迎。

单的做爱。当今，调情看来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它是故作矜持及现代纵情女性间的分水岭。她可能会对旺盛的性欲感到满足，她亦能体验到仍然难以启齿的性愉悦。

有关调情与其他婚前性行为方式的联系还存在众多争议。埃德瓦荷·肖特相信调情是一种新的发展，这有力地挑战了让·路易·弗朗丁的著名假想：一把大遮阳伞下，一对年轻的夫妇躲在沟渠里互相手淫。这种假想不过是早期幼稚性行为的过时纪念物。尽管弗朗丁是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互手淫”是博杜安在1900年以及一位文丁的牧师早在1880年描绘的传统方式，但这种方式可能一直受上流社会的实践的影响。弗朗丁在他的结论中有点过于草率，说当时在资产阶级阶层中不存在这种类似的行为或现象。互借以及文化流通的重要性不可低估。1905年，福雷尔发现调情方式对下层社会的冲击有如潮涌。就他的观点而言，这种低俗的调情方式只不过是对上流社会调情方式的一种愚蠢的、拙劣的模仿。因此，

“相互手淫”没有理由不能复兴，也没有理由不受上流社会中流行的那些受新的微妙细节影响而产生的新方式的影响。

婚姻的色情化

调情方式为婚后性生活新添了一抹亮色。显然，现代“半贞洁”的方式并未以与早期“纯贞洁”方式相同的姿态出现在婚床之上。妇女不再羞于启齿承认她们感受到的愉悦。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丈夫和妻子开始感受到更加亲密以及和睦融洽的需要。在了解性知识或聆听神父的指令时，丈夫和妻子不再被分开。共和国的宣传者描画了一对新式夫妇——共和国夫妇的肖像。这些新政权下的宣传者，是与卡米耶·塞共同致力于为女学生打开中学大门的同一批人。丈夫和妻子开始互称“亲爱的”，年轻女人不再羞于阅读当时最畅销小说中神秘的性描写部分。

随着女人进一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男人也更加关注其配偶的愉悦，一种新的默契开始形成。共享愉悦取代了自私的性侵犯。一些道德学家和教育家都极力鼓励这种可喜的改观。1903年，性病的威胁促使比尔吕容博士为年轻女人撰写了一本有关性教育的初级读本。在女性教育工作者和母亲们的敦促下，“卫生和道德预防委员会”采取了措施。各方压力都指向了巴黎教长路易·里，但由于他害怕给对手留下攻击的把柄，不敢将性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正式课程。

早在1878年，达赫缇热医生就出版了《论经验的爱情或19世纪女人通奸的动机》一书。该书包含了对肯定女性性高潮的辩护，达赫缇热认为这是防止通奸行为蔓延的最好方法。同时蒙塔勒邦博士和他的几位同事也很关注女性伴侣的愉悦感受，并劝告丈夫在爱抚时要更加轻柔和富有耐性。在避孕措施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展，它预示着一种更情趣十足的性爱生活的转变，并摈弃了一味强调传宗接代的性生活。

毫无危险的愉悦

19世纪50年代后期，内科医生首次对“体外射精”予以抨击。1857年，贝尔热埃医生在阿尔布瓦通过他的病人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体外射精是最常见的。这一方法需要一种自控力，很好地遵从了新康德学派有关道德自律的要求，也被共和国体制公共教育的创立派所推崇。贝尔热埃医生还严厉批判了相互手淫

（他形容这种方式是一种极不光彩的性服务）、口交（他称之为“口腔的性交”）、肛交（如果菲欧克斯医生的见解令人置信的话，肛交比口交更常见）。有钱人使用避孕套，工人们仍然相信站立着做爱可以预防怀孕。

19世纪末，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传播促进了节育。保罗·罗班和尤金·亨伯特组织了“人类联盟”（1896年），该联盟出版了《生育意识》一书（1896年），号召“母腹罢工”，即子宫罢工运动。马尔萨斯主义者把工人阶级作为他们努力的一部分目标，他们的宣传甚至推广到了诺德的工人阶层，同时还在巴黎的第20郡风靡一时。一些官员指出，工人们对避孕措施趋之若鹜。一些小册子中纷纷介绍比体外射精更可靠或更简便易行的避孕方法，福雷尔医生的顾客所采用的避孕方法几乎完全相同。有些女性选择注射含醋剂的温水避孕；其他一些女性则先把棉球消毒后放入阴道或采用更为费事的“子宫套”避孕。马泰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了子宫套避孕。薄软的橡皮避孕套刚开始广泛使用，它的价格比用动物肠衣制成的避孕套更低廉，因为动物肠衣避孕套要经过非常细致的工艺处理。简而言之，避孕措施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性卫生保健的发展。“英国的橡胶”与坐浴盆结合起来。

1882年，消毒技术的传入使得接受卵巢切除手术的人数增加。1888年1月至1891年7月间，佩昂医生在圣·路易医院做了777例卵巢切除术。1897年，一位令人震惊的医生——埃蒂安娜·康医生估计仅巴黎就有3万到4万名妇女接受了外科切除手术。左拉公然抨击了这种“夫妻间的欺骗行径”（这种行为对丈夫们是一种欺骗，结果导致不育）。在费康迪，甚至还有人接受更可怕的手术，虽然很难说这种手术是否频繁进行：所谓的鲍尔温·玛丽术，即重塑一个人工阴道。

然而在19世纪末，实现避孕和居伊·泰拉蒙1902年倡导的“永久性爱”，意味着人们必须忽略神父和大多数医务人员的嘱咐。多数医生仍然确信“夫妻间的欺骗行径”导致了各种妇科病：“可怕的出血症”（贝尔热埃）、胃病、肺病、体质虚弱、精神病都在折磨着女性，但她们的欲望并没有因为月经尤其是不断的怀孕而消除。

许多病人也认同她们医生的观点。马泰的家人担心她的丈夫因为纵容她的快感欲望会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当马泰的母亲注意到，

不怀孕使她女儿丧失了许多女性的柔媚性情时，不由得对女儿的身心健康担心不已。而马泰丈夫的亲人则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觉得马泰正在耗尽她丈夫的精力。

避孕措施的宣传仍然含糊不清。雅克医生19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宣传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夫妻间的欺骗行径”仍在剧增。男人们频繁到妓女那里求教，她们是注射剂的一贯用户，这可能让很多男人熟悉避孕手段和这些手段的色情潜力。

虽然一小部分农民传统上采用体外射精的方式，但工人对妻子的多产仍然充满着男性的骄傲。这种骄傲带有许多男人对女人的傲慢态度，从而制约了避孕措施的推广。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安格斯·迈克拉让所提倡的“家庭女权运动”在工人阶级的妇女中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性疾病传染的比例下降了。妇女的团结一心使

费利西安·罗普斯：《按摩》，1870~1880年。

费利西安·罗普斯：《对潘的臣服》和《无花果树叶》（右页）。罗普斯的所有作品意在表现性爱的重要性。女人赤裸裸的身体和风骚大胆的作风勾起了男人的性欲，同时他们又被女人无拘无束的性欲困扰着。

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成为可能。工人阶级的妇女在开始使用避孕用具时不如资产阶级妇女得心应手，也无法坚持让她们的丈夫采用体外射精的避孕措施，很多人开始求助于流产。在超强度劳动、草药堕胎、针剂注射等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妇女们转而去找产婆（产婆，人们所知的非法为人堕胎者）。许多妇女甚至自己堕胎，但是最后还得匆匆送进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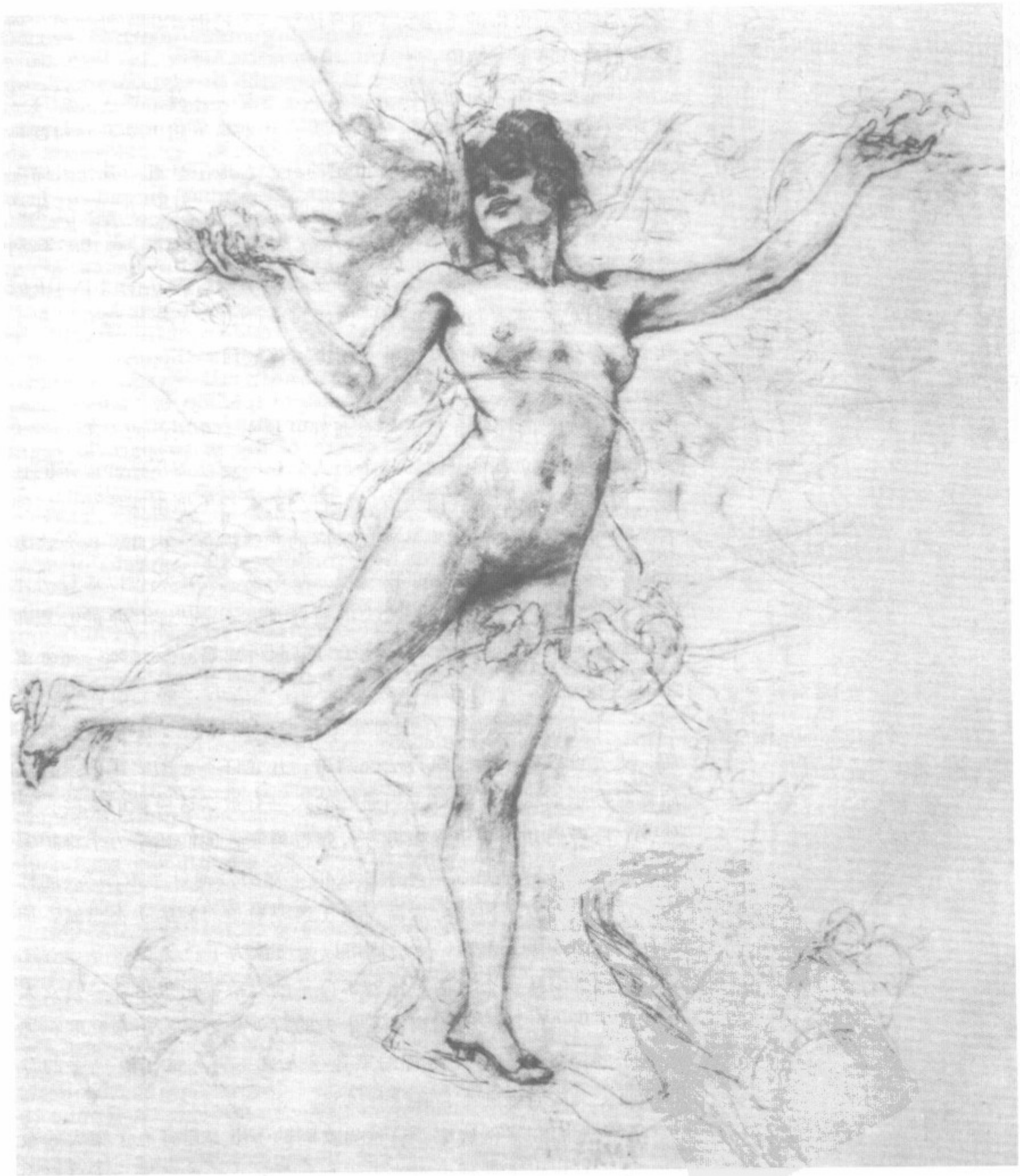
人们的观念逐渐开放起来。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流产的人数便迅猛增长。专家们曾估计，每年各地有10万到40万的孕妇终止妊娠。19世纪初，接受流产术的年轻未婚女性和寡妇还冒着名誉受损的危险；而现在已婚妇女已担当起大批流产者的诉讼委托人。妇女在决定流产时，通常采用的是不顾一切后果的紧急措施。

正当资产阶级妇女为自身体验的享乐主义感到羞怯时，通奸的迹象又再度跃上地平线。拥有女仆已成为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每一位中产阶级主妇都想有一个。一种新型的男女乱交行为常常在十分狭窄的公寓房间内盛行。一个年轻乡下姑娘的出现，为一向宁静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诱惑。以前奥斯曼式的城市改建和后来的城市建筑改造，使很多女仆转到公寓顶楼居住，这就让男主人更有可乘之机蹿到女仆那里一试风流。给予男主人安慰，倾听他内心的苦闷，使女仆能向作威作福的女主人痛快地进行报复。

外界的诱惑

较年轻的一代资产阶级由奶妈一手带大，习惯于被仆人阶层的女子服侍来满足其物质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青春期的到来，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爷可能轻易就转向较熟悉的女佣。她们的身体不过是少爷们发泄性欲的众多对象中的一个罢了。心理学家或许能为我们列举大量有关围裙的魅力的例子，围裙象征着家庭里的亲密行为和可以利用的女性身体。有时，女主人也愿意让位给第三者。有这种举动的女主人一般体弱多病，或者是性冷淡，或是自暴自弃，她们这么做很可能就把她丈夫（或她儿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了她筑起的围墙内。与女仆的亲热不会有浪费家产或有损男方身体健康的危险。这是避免“复杂化”的一种办法。

小说中充斥着这种通奸的纵情行为。左拉、莫泊桑、米拉博在其书中反复描写了这样的情节。但这种愈演愈烈的行为无法得到控制。因为这些作家们的丰富想象都过于明显地反映了男人们由于对



《一次羞愧的坦白》，1907年4月13日。20世纪初，流产的不再只是妓女和性变态者。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母亲已不再害怕搜罗赤脚医生和“产婆”。

身边那些唾手可得的下层女子的身体痴迷不已而产生的性幻想，所以我们应该慎重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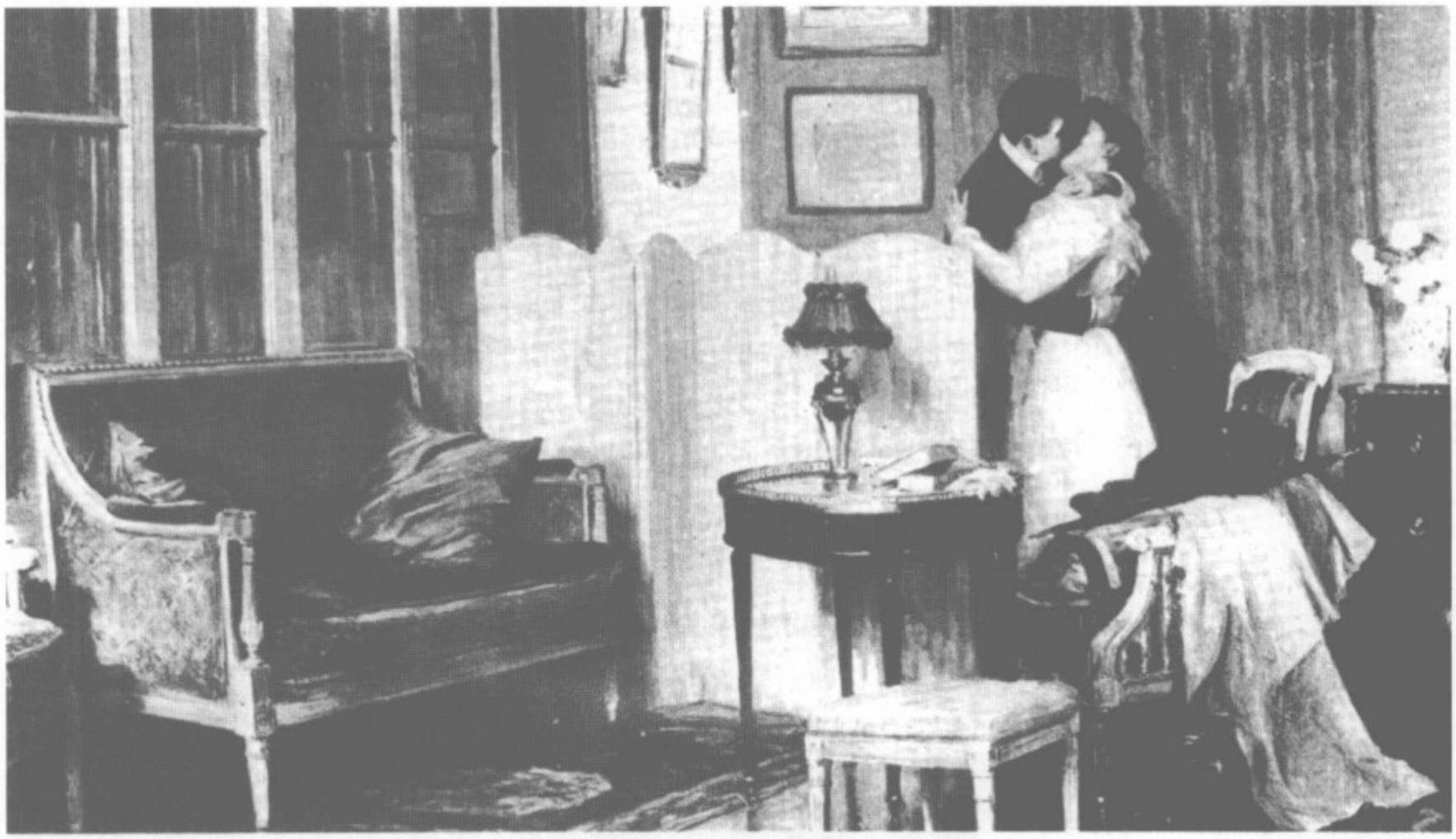
在依赖性性关系的潮流下，老板尤其是工头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还应该一提。一些积极抗争的工人，特别是工团主义者常对这种新的初夜权表示愤慨（这是中世纪的典故，地主享有与其仆人婚配的女子的初夜权）。据这些积极抗争的工人称，对劳动妇女身体的蹂躏损害了工人阶级的道德，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稽之谈。1905年,利摩日爆发了反对一个虐待女工的雇主的示威游行，弄得这个雇主满街被追打，并被大骂是“淫棍”！这起事件引发了严重骚乱，那一年人们看到，这座漂亮城市的大街上血流成河。

已婚妇女的性欲导致人们对通奸的担心。在法律的天平上，丈夫和妻子的地位迥然不同。一个男人如果不与他的情妇和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他是不会因为有通奸行为就被送上刑事法庭的。通奸行为近乎于重婚，被认为是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因此，也允许妻子将丈夫告上法庭，之后可以获得大量赔款。妻子还可以通过法律与其丈夫分居，特别是如果丈夫的通奸对妻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创伤时。从1884年开始，妻子可以起诉离婚。反过来，如果妻子有通奸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在哪里发生的，都一律被视为有罪。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有被判处两年监禁的风险。在起诉和取证后，丈夫可以要求暂缓执行法院判决，并允许不忠的妻子回家；之后再对妻子动粗。与家庭主妇通奸的人也有被送进监狱的风险，显然，立法者们并不希望偏袒男方；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力求维护家庭的和睦。法律总是像纳基埃所说的“对男性通奸半鼓励”。同样的，在丈夫和妻子协议分居后，妻子还要被迫对她的丈夫忠诚，而一旦家庭的女主人不在，丈夫则可以为所欲为了。

通奸和求爱

法理学家从两个方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提出理由：一是女人是从属于男人的，她们无权对其丈夫的行为是否忠实追根究底；二是妻子的通奸行为有使祖传的家业落入另一男人的子女之手的危险，而丈夫的通奸则不会有这种风险。

事实上，在案例法中，这种男女间的不平等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妻子有权以下列理由对丈夫进行起诉：丈夫的通奸行为已经声名狼藉，丈夫有暴力行为（1828年），丈夫对他的家庭不管不问



爱德华·热纳：《回家》。这位画家直接渲染了婚姻生活的性爱色彩，这幅作品里没有沙发、没有光彩夺目的奢侈品，除了着力突出热吻的场面外别无所有。这一场景拉开了夫妻在自家客厅做爱的序幕。

(1843年)，丈夫拒绝与妻子同居（1848年），丈夫拒绝与妻子发生性关系（1869年）。1890年至1914年，女人通奸与男人一样不再受到严厉的责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女性在法律上的从属地位已经纯粹是理论意义上的了。

1816年至1844年，欺骗仅仅是夫妻分居的次要原因。起诉人主要是女性，她们为了免遭丈夫的毒打而寻求保护，这种行为在某些时期已经越来越不被姑息。1884年以后，虐待和缺钱比通奸更多地成为离婚的原因。

诸多因素导致通奸人数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对成年女儿的监督更放松了；性卫生也有了适度发展；沐浴、打网球到后来骑脚踏车，这些方式让他们投身到性爱中——所有这些改观，使人们从宗教传统中男女授受不亲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而获得性体验。新的婚后性爱观，避孕工具的使用，正如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指出的：妇女坚持获得性愉悦的权利破坏了良家妇女的风范。调情技巧的不断娴熟，对性病的恐惧，在无法自制的时候发泄的需要，促使男人们把他们的猎艳对象转向已婚妇女，她们比以前

更为感性也更加唾手可得。

已婚妇女的欲望

奥斯曼式的城市改建工程使妇女们有机会到巴黎街头抛头露面。到19世纪80年代，妇女们可以出入户外闪烁着煤气灯光的小咖啡厅，到后来是电气灯、电灯。为赴约而找出的百般理由以及一些可能的约会场所便应运而生了。人潮涌动的大型百货公司变成了她们脱身去赴约的好场所。甚至许多慈善机构也是她们约会的好去处。1897年，许多男人都认为他们的妻子在慈善会的火灾中丧生了，但之后又万分惊喜地发现他们的女人毫发无损地安全回来了——大约传闻是这样的，不管这一故事是否真实，这一琐闻还是有意义的。出租马车、私人寓所、“幽会的房子”为他们的短暂相逢创造了机会。婚姻生活正常的安排被许多新的而且相当长的活动打断。铁路旅行、单独假期、集体朝圣、在小湖或海滨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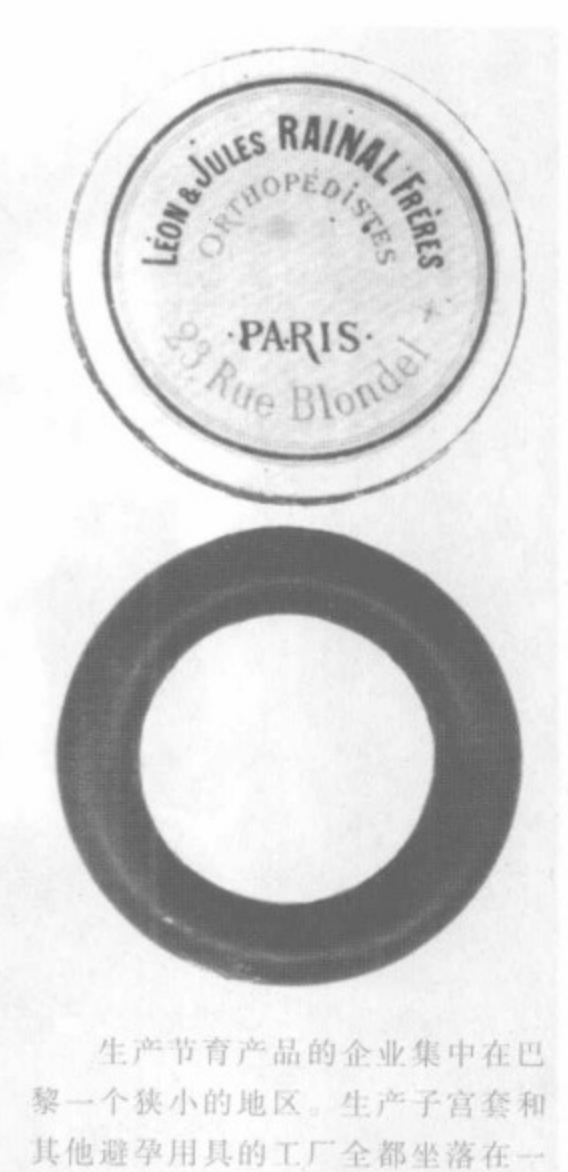
《背叛的镜子》，杜布勒去世后出版，1863年。欣然被揽入怀中，已然习惯于偷偷摸摸和热切拥抱的女仆的出现，旨在烘托资产阶级家庭的色情氛围。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的致命祸根。男主人的谨慎和老到与女仆的卑贱和不时坚决反抗的自由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地逗留或整天的短程火车旅行——所有这些活动制造了冒险的机会。

通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高层政坛，让·埃斯特伯公然表示拥有一个情妇是正常现象，“与一位上流社会女子的风流韵事甚至能吸引欣赏的目光”。小说和歌剧对通奸行为予以颂扬，亚历山大·仲马、费司、费多、贝克、巴塔耶在剧本中没完没了地表现通奸爱情的主题，剧中第三者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资产阶级婚姻的全部功效。不合法的风流韵事镇定了神经，刺激了感官。拥有秘密是一剂调味品。那些猎艳高手能避开任何有损他的健康或名誉的危险。通奸的激情剧比婚外情中的愉悦要多得多。戏剧还缓解了人们区分合法与非法时模糊不清所产生的茫然焦虑。一个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去观看费多的喜剧，与此同时他也在克制着自己的担心，担心他的情妇可能会以某种手段破坏他的家庭。

极少数自由派对婚姻予以批判。一些新潮人士主张随心所欲的情爱。1907年，莱昂·勃鲁姆对婚前性行为予以了肯定。15年后，乔治·安克缇在几本书中将男人和他的情妇描写成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成员。

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通奸的频繁程度，大部分人还是对这种婚姻礼法的新变化避而远之，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女性仍然保持着她们善良的德行。德国不得不再度强调为母之道是女性分内的责任，这种强调理所当然还可以理解为另一种焦虑，但这种强调是为了巩固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对法国北部的妻子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后，工业家博尼·史密斯呼吁对这些受人尊重的女性的美德予以关注，这些女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做善举。1890年至1914年期间，由参议员贝朗热和各新教徒领导人倡导的“道德联盟”，带头对淫秽、放肆的公共行为以及纪律松弛的军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达到顶峰时，这些联盟似乎又取得了一些进展。忽视婚姻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被纵容。一个举止轻佻的妻子是地方长官或地方次级长官的绊脚石。谣言和匿名的中伤还对仆人这一行业构成威胁，人们希望仆人能有所保留。



生产节育产品的企业集中在巴黎一个狭小的地区。生产子宫套和其他避孕用具的工厂全都坐落在一条街上，它是巴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帕莱-罗亚尔充斥着大量避孕套零售商贩。

在贝尔-埃普克，一场持久的风流韵事与自由的单身女子的不

合法恋爱有所区别。轻佻放荡的女人的关系往往是不正常的；在安娜·玛丽·索的研究中，有半数以上的情人是资产阶级成员，通常是单身汉或鳏夫，这些人的情妇一般是较早时期的女裁缝的后裔。福卡尔基耶地方行政长官的情妇是一个年轻的女裁缝。反之，行为不检点的妇女欺骗她们的丈夫，委身于同一阶级的另一个男人，其目标通常是与她年龄相仿的绅士。法院的记录显示，妻子瞒着自己的丈夫找单身情人，内心往往也有隐约的负罪感。她们把她们的风流韵事视为不美满婚姻生活的必然结果。在一些案例中，女人的背叛是出于对丈夫的花心或性病的报复。换而言之，这些女人的叛逆行为看来是说明了对当时婚姻制度的批判。有关“嫁妆制度”弊端的讨论是对名利婚姻存在质疑的另一种反映。但是小说中提出，当婚姻以金钱为目的时，往往是母亲而不是妻子追悔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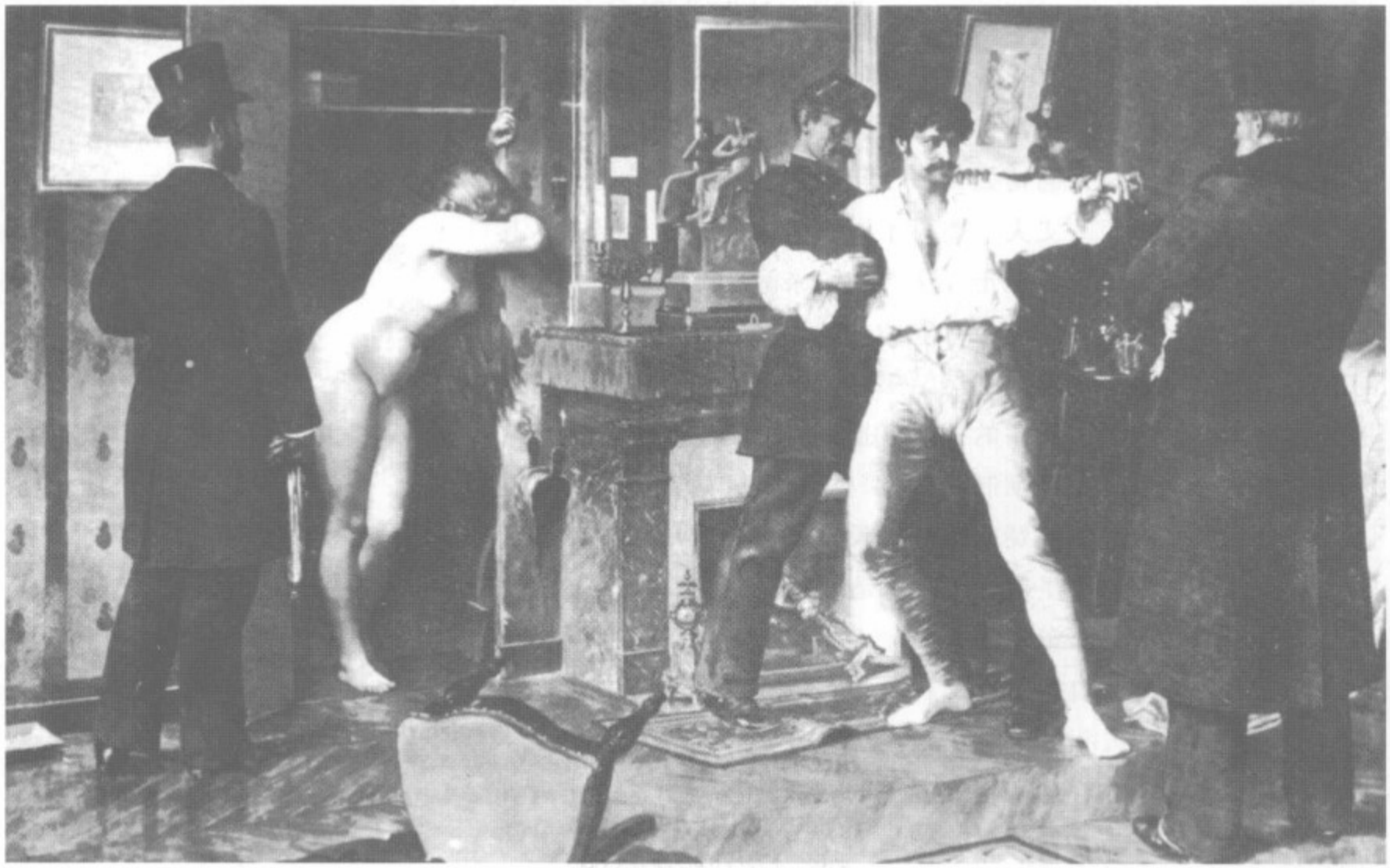
如果一个女人的通奸行为暴露，后果将视她的社会地位而定。资产阶级内部通常以自愿放弃这种不检点的行为而告终。在这个阶层，恼羞成怒的丈夫很少会诉诸法律，即使有一些人告上法庭，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并合理解释其妻子的行为，愤愤不平的丈夫可能会谴责她的越轨行为是精神失常所致。在下层社会，受到刺激的丈夫们往往会寻求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一现象在法国南部尤为突出。发生在这个阶层的多数刑事犯罪和谋杀事件都是那些一直蒙在鼓里的丈夫们制造的。在贝尔维尔，相当多的刑事诉讼案的起因都是对一个已婚妇女品德含沙射影的诋毁和侮辱。

工人们喜好晚上喝酒解乏，更喜欢对他人的私生活品头论足。一些不堪入耳的谣言就来来回回在狭小的街区传来传去。男人往往会因对女人类似“婊子”、“女同性恋”的侮辱性谩骂挨上一记清脆的耳光，随后整个街坊邻居都会插手进来。

对已婚妇女而言，不管她身处什么社会阶层，发现其丈夫的不忠行为简直就是一幕情感剧。妻子们从离婚的阴影中振作起来，然而丈夫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丈夫们觉得很难接受原本属于他们的女人重新获得性自由，结果有时会导致暴行发生。不合法的通奸行为一旦结束，被抛弃的单身女子往往会采取疯狂的报复手段。一个与某鳏夫或单身汉长期姘居的女人，往往很难忍受被姘夫抛弃后独自面对公众舆论的压力。激情的魔力是她们漠视道德的托词，而且事情的结果往往又攻破了所有的理由。男人往往会遭受一些报复。

左页图：埃米尔·塔巴黑：《通奸》。看起来，通奸行为不仅发生了，而且是在资产阶级的客厅里。这幅作品中，作者着力铺垫了一种悲剧色彩的后果。婚后，男主人愈是放荡不羁，他妻子的肉体就愈容易被另一个男人占有。

斯瓦尔多·托法尼，素描，1896年。通奸可能会导致夫妻分居或刑事处罚，但也可能会因为丈夫的宽恕而告终。不论富裕或贫穷，19世纪的女人都惯于请求怜悯。施舍怜悯时的惬意与男子权利的过剩相平衡。



《捉奸》，1885年。这幅作品在法国恢复离婚法后的一年发表，反映的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莫泊桑在他的《俊友》中也有描写。这里在悲情场景展现的女性裸体。自觉羞愧难当的女人，头发低垂着，其裸露的身躯暴露在黑衣人面前，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那些执法的黑衣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的职责是干涉男女主人公的非法姘居。

一些被抛弃的女人会到处传播流言蜚语；其他一些女人会写诽谤信为自己出气。有些女人甚至会往她们的前任情人身上泼洒浓酸以示报复。

一些男人企图通过支付分手费来摆脱情妇的纠缠。苛刻的于勒·费里打发他的弟弟夏尔去圣-乔治大街，与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女裁缝学徒解除关系。一个被激怒的情妇可能会向当局抨击她的前任情夫。有少数男人居然认为杀人灭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公众舆论总是倒向男人，因为人们对这种女人持有怀疑，从而使她们无法摆脱公众的质疑。毋庸置疑，年轻时与浪荡女子有过风流史的男人婚后会追求时尚的通奸。

腐化的通奸行为的神话

为适应仍驻足不前的婚姻性革命，娼妓业也随之调整。男人们不再支持娼妓合法化，因为他们都很排斥妓院，而赞同更为优雅的娱乐。妓女们春光乍现的身姿和唯命是从的神情令许多嫖客感到不快甚至厌烦。附近的妓院迅速衰落，特别是在仍受传统礼教冲击的

偏远省份。合法妓女又受到左翼激进派倡导的废除娼妓制度的新运动的冲击。妓女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嫖客们新的需求。1872年，沙勒-贡利埃的老居民对当地娼妓愿意提供口交服务而强烈不满，因为早前是禁止妓女提供此项服务的。

19世纪后期，巴黎的大部分妓院体现了这种发展。通过别具匠心地使用迷情熏香，豪华气派的装潢，穿衣镜、地毯、五彩缤纷的灯光，使整个妓院变得神秘而令人向往。“美丽的少女在卡里普索的山洞里等待着她们的情郎”。一些妓院还向嫖客提供特殊服务。

娼妓业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嫖客新的性需求。七月王朝时期的舞女最早为愿意付费的崇拜者提供性服务。这种新的潮流蔓延到下层社会。小资产阶级的男子梦想着自己能像贵族般风流潇洒。咖啡馆、音乐厅、舞厅、酒吧使他们能在幻想的良辰美景中自由欢愉。这些新的娱乐场所雇用了一些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不得不在惬意的包间里向那些醉醺醺的绅士们献艺。在富有拉丁风情的酒吧，女孩子为男学生制造爱情的幻想，以弥补轻佻的年轻女缝纫工的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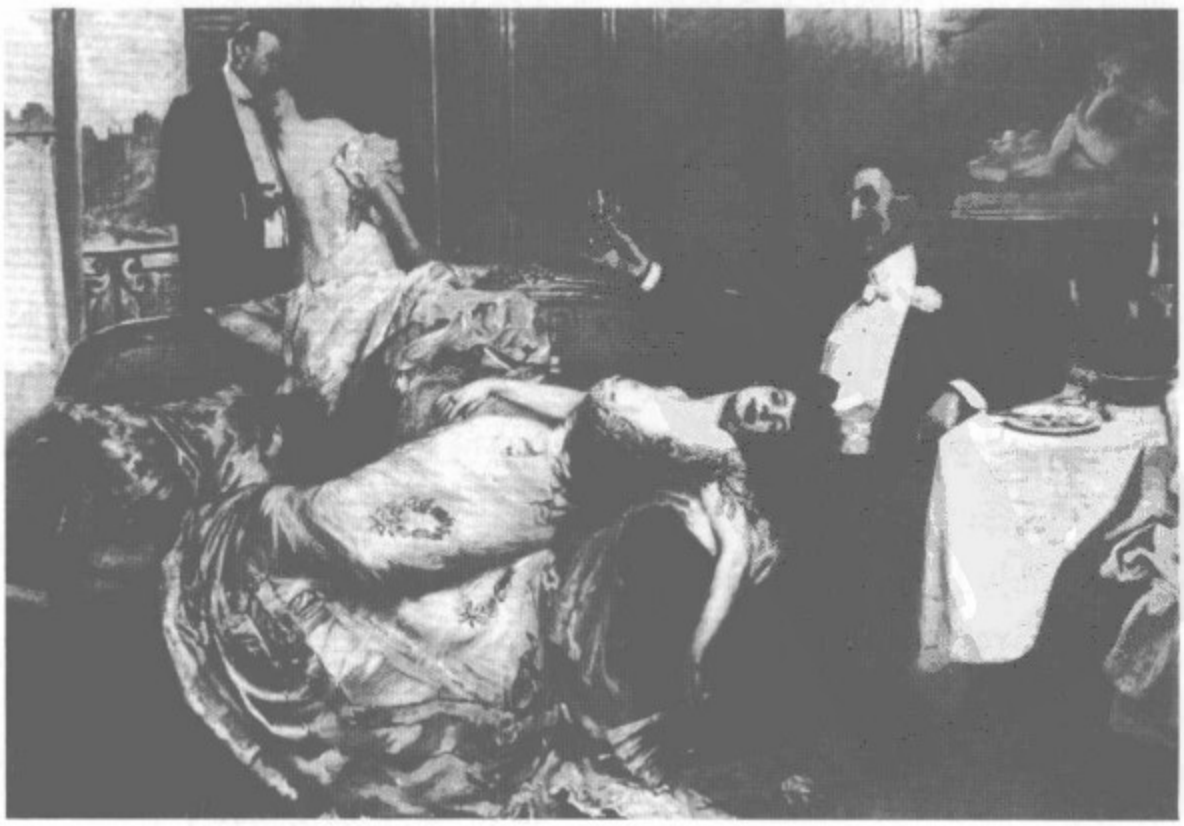
因性需要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是秘密或至少是谨慎的“幽会的房子”。“幽会的房子”是如此地不可或缺，因此巴黎最奢华的妓院——勒皮涅决定保留它们，最好是有人密切监管。“幽会的房子”一般由一位面目姣好的女士掌管，这些房子通常占据气派的妓院的主要楼层，而且只在白天营业。向嫖客引荐妓女通常在装饰考究的大厅里进行。妓女出来时往往都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打扮得就像是上流社会的妙龄女子。丝毫没有推诿，她欣然与嫖客共入富丽堂皇的卧室，两人在卧榻上翻云覆雨、绵绵不绝。走时绅士们当然不会忘了留下礼物。频繁出入妓院的男人们希望花钱能买到时髦的私通般的感受，他们是那种对朋友的老婆垂涎三尺却又缺乏魅力去征服她们的那种男人。鸨母总是强调甚至欺骗地说，她们妓院的姑娘们都是如花似玉的可人儿，或是因为时世艰难不得不步入风尘。许多粗俗的高利贷者在光顾过其中某个妓院后深感无法抗拒其中无穷的诱惑。无论如何，神魂颠倒的于伊斯芒斯和莫泊桑，在风流过后定然要溜走时，一般不会羞愧地从有名的“房子”，而是豪华的妓院里溜出来。

至少需要制造一点感情假象以维持与他或她的性伴侣的联系，

因为这个性伴侣可能影响着从上到下的社会各阶层。法律杠杆的放松使得酒精饮料在19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这为娼妓在酒楼、客栈坐台创造了契机，这种场所比起妓院赤裸裸的性交易来，更容易被嫖客和妓女接受。在19世纪80年代,地下娼妓的景况也是峰回路转。有的妓女在林荫大道上假扮举止端庄的良家妇女，巧妙地诱使那些城外的土包子们倒过来“勾引”她们。

从第二帝国鼎盛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半个世纪的重要意义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也同样突出。缓慢但却深刻的变化正在进行着，变化之一是两性间的本性改变了，同时为性道德革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绝不能对任何僵化、呆板的维多利亚道德观点漠不关心。在我看来，这半个世纪比执政政府时期到第二帝国时期的60年更具创新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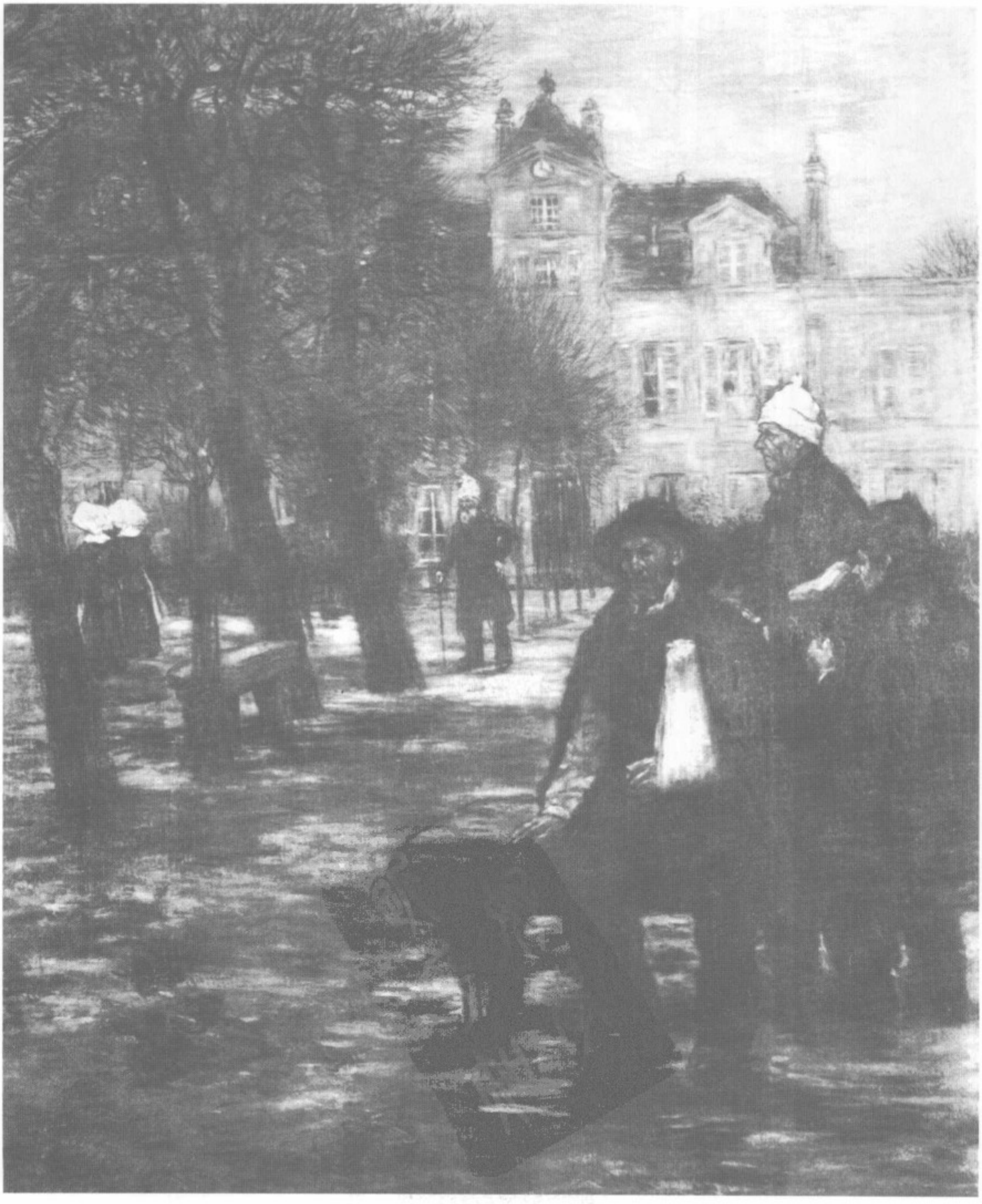
1860年后转变私人生活模式的改革的巨大动力来源于模仿。行为方式的革新首先在贵族政府中开展起来。人们公开对下层社会的性行为迷恋不已，事实上，在工人们信奉家庭模式以前，性自由在七月王朝时期的工人阶级中已经发展。但这些下层社会的方式并不是多数人所采纳的方式。法国现在的性开放是从上流社会形成的。剧作家、左翼政客、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自由性爱观鼓吹者，特别是创立性科学学科的科学家，在塑造现代敏



莱昂·洛朗·加朗:《聚会》。第三共和国穷奢极侈的狂欢场面并未脱离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这幅作品在情景的处理上运用了模糊手法。这些女人是妻子还是情妇?观者无从知晓。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成熟男人惬意、风流的私生活。

感性方面，要比路易斯-菲利普斯地区巴黎的移民做得更多。

这是一家比隆德雷大街上的娼馆更加气派的妓院。画中仅仅表现了大幅的地毯、窗帘、壁挂，意在烘托这个妓院和资产阶级的沙龙同样体面。所有东西，包括壁炉架上的小工艺品，都丝毫没有暗示淫荡的意思。



呐喊和低语

个体苦难的表征

左页图：让·佛朗哥·拉弗利：《老病人》，1892年。19世纪的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社会中的老年人问题，在这样一个年轻人占主体的社会中，他们的孤独和寂寞根本无人理会。

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使人生的苦难有了新的主观形式。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萌发理想，而这样的理想又造成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人们逐渐对从前确定无疑的生命意义产生了怀疑；而这时，每个人还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强、等级观念的逐渐模糊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交叉融合不仅使人们的人生目标开始多样化，而且使人们产生了彷徨、困惑和焦虑等情绪。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使人们开始讨厌甚至是憎恶自己的行为。他们的日记中充满了对自己的不满。这时的竞争体制也比大革命之前完善了很多，这样一来，人们更加担心失败，于是他们开始超负荷工作，继而心情更加焦虑。从孩童时期起，人类对失败就有一种恐惧感。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以及对落后的恐惧使许多人开始退缩。人们对这种目标意识的僵化感到非常痛苦，艾尔弗雷德·马斯特称之为时代的苦闷。

这时人们开始刻意营造一种幸福的感觉，这使原本就在不断消亡的确定性变得更加复杂化，这种幸福感改变了欲望和痛苦之间的关系。在当时，人们把心灵的空虚看作是一种不幸的体验。那时普遍存在的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充分体现了这种新的自我原罪意识——这就是鲍德莱尔所说的“忧郁感”。

从这一时期人们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种焦虑的心情。精神病患者的不断增加正是上面提到的压力太大的表现。疾病分类越来越细，对精神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

的心态也更焦虑。癫狂病和狂躁症这些新型疾病的产生使专家们得以了解藏在人们看似平静的内心深处的精神问题。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从广泛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在面对自己身体时的态度。在此之前的入伍体检中，有许多新兵都非常害怕医生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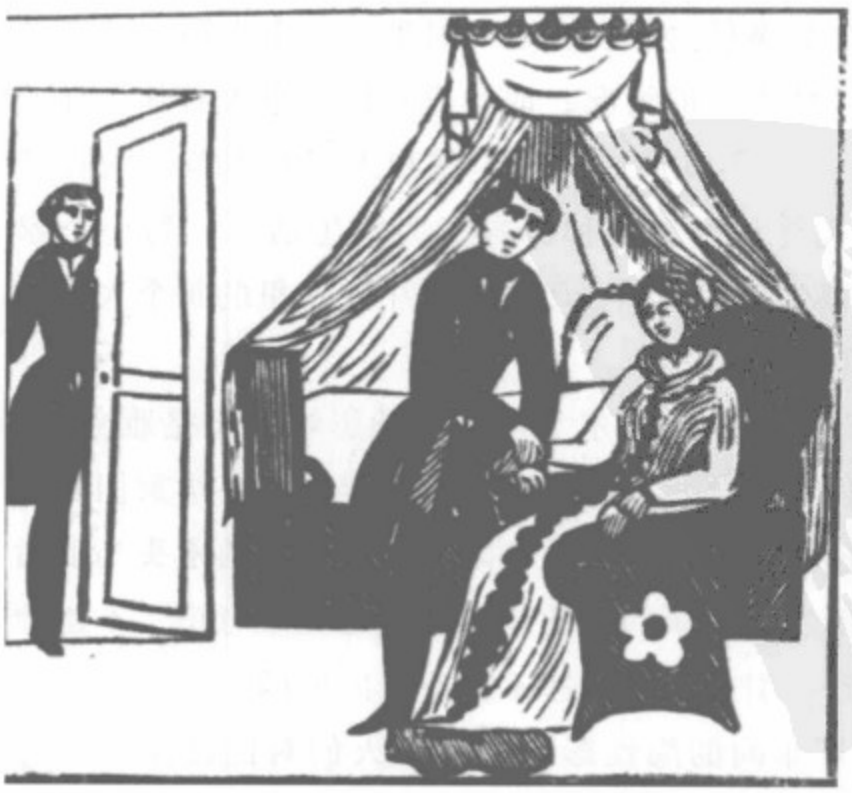
变态心理的演变

上层社会人士的内心深处经受着两种原始欲望的煎熬。城市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迅速壮大，他们对生活充满了厌恶、恐惧和狂热等复杂的感情。铺天盖地的小说更是唤醒了人们的危机意识；社会研究人员开始对此进行分析；慈善家则试图帮助人们消除这种感觉。复辟时代那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在七月王朝时期转变为一种悲观情绪。法兰西的仁人志士纷纷退隐山间，他们发现了许多未开化的族群：山林间淳朴的猎人、里昂海岸的渔夫、普瓦图田间的农夫，还有生活在栋布和布雷讷地区的黑人原住民。这些人一直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靠天吃饭，过着比动物还要野蛮的生活。

在和这些原始族群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滋生出焦虑的情绪，而这时人们又发现了自己藏匿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变态心理。许多耸人听闻的犯罪案件使人类注意到自身兽性的一面，这其中最轰动的案例就是谋杀亲父的皮埃尔·里维埃拉案；1817年的食人女妖塞莱斯塔特案，这个女人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然后用孩子的大腿和卷心菜炖了一锅汤，并给自己的丈夫盛了一块大腿肉吃；还有1823年的葡萄酒商安东尼奥·莱杰案，这个人挖出一个小女孩的内脏，还吮吸女孩心脏内的鲜血。这些血腥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悲观绝望的时代中人们内心所经受的痛苦。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处死，人们开始恣意放纵自己心中的魔鬼。琼·皮埃尔·彼得说："再也没人要求作者只撰写童话故事。"1831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确认了人魔合一的存在。

人民公社的衰落使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但是社会上依然充斥着各种暴力行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潜伏着这种暴力倾向，并以一种狂热激情的方式将其释放出来。当时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死者会复活过来，然后危害人类的生命。

在七月王朝时期，人们对于心理变态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尽管法庭不再严刑拷打犯人，恐怖时期的记忆和国王被处决的厄运依然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这使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谋杀兄妹、父母或者是幼婴的案件。



病态家庭

病态家庭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这一观念对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世纪的思想家们非常重视传承这个古老的观念，那个时代的医生认为年纪越大的父母生出的孩子越容易患病；父母越疼爱孩子，孩子就会越漂亮；而父母酒后生出的孩子一定会是个怪物。为了缓和这种极端的想法，新派的希波克拉底学派建议人们尽量培养自己的多种性情。随之而来的工业学和城市病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歇斯底里症”的恐惧，以及在艺术家中非常流行的神经病都反映了社会文明进程与人类物种退化之间的联系。这使当时的许多医学专家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物种》一书打破了人类是创世纪过程中的完美物种的童话，它认为人类将在原罪意识的惩罚下逐渐退化。在布赫兹的启发下，本尼迪克特·莫利在1857年为这一古老的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他认为人类已经偏离了自身原始的自然性轨道，并开始逐渐退化。因此，人类逐渐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原始的欲望开始征服他们的思想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越来越接近动物的水平。从1857年到1890年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从这一理论的表面形式来认识病态遗传学的。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孟德尔遗传定律，他们认为后天养成的性格也会遗传，因此认为人类物种将不断退化。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导致怪胎产生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社会畸形学。社会畸形学列举了大量的怪胎、畸形人以及退化的事例。遗传也被简化为一个病态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一个人脸上或者体形上的特征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情况，而是表示他的祖先有什么样的缺陷。莫罗·图尔斯的“不良遗传倾向”观和人们对大范围潜在缺陷存在的认知使人类终日过着一种碌碌无为的生活。“每一个家庭，”让·博里说，“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城堡中，家里的每个人都非常恐惧地退缩到地下密牢的深处。”

1870年之后，医学界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于是雅克·伦纳德等人开始用进化论的观点重新思考遗传的定义。科学家们找到了从各种不正常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缺陷，这样人们的矛头马上指向了穷人阶级。穷困、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缺乏卫生意识、不道德以及酗酒都成了导致、引发或者加速不良遗传的原因。人们认为来自于街头巷尾、工厂车间的隐性影响威胁着人们对优良品质的传

承。人们开始担心受到小市民的影响，这种担心又转变为对退化的恐惧。由于神经学在当时占主导地位，这种恐惧首先又集中在神经病理学上。

仅仅是一念之差就酿成大错，这种罪孽意识使每个人肩上都多了一些责任感。梅毒会遗传的说法使人们的欲望成为极度危险的诱因，让·博里称之为“饵雷”（伪装的或巧妙隐藏的爆炸装置，能出人意外地发生爆炸）。瘟疫成为小说和图像材料中最普通的范例。哈伊曼笔下的英雄和弗利西·罗普笔下的丑恶的画像集中反映了梅毒困扰下的人们的焦虑心情。道德败坏的情况日益严重；人们认为这种病已经无药可治，这种无望的认知取代了或者说是增强了人们心中对罪恶和苦难的恐惧感。病态遗传的观点更要求人类从动物性中解脱出来。

弗利西斯·罗普斯：《强奸和卖淫统治着这个世界》。

这些新产生的恐惧感本不应被夸大，然而人们却拒绝接受新的观点。科学家依然遵循天主教的传统模式，乐观的共和党人又都是空想家，老一代的医师则更热衷于把新希波克拉底学派和生机说结合起来，再有就是那些不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巴氏传染病学家们——所有这些人都认为病态遗传是可以避免的。这时，韦斯曼粉碎了人们对后天特征遗传论的希望，伦纳德写道：“微生物病因论的发展破坏了遗传论者的论调。”许多科学家开始提倡通过社会改革和卫生措施来改变环境，他们认为统一行动会有很大的收获。有些人甚至希望利用科学来指导人们的生育行为。优生学的观点使人们对男婚女嫁这些传统的习俗提出了质疑。优生学在促进了性教育和性自控发展的同时，也使新婚夫妇更有远见、更加和睦幸福。

阳痿和神经衰弱症

在这一时期，个人身体不适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议题。人们不厌其烦地检查身体，害怕出现问题。常人和病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理和心理上的焦虑、失望以及失败感使人们整日萎靡不振。由于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工作上的挫折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这时男性和女性的痛苦程度也是不同的。

男性把自己对苦难的理解强加给女性。19世纪是一个自我控制的年代，然而男人的痛苦是很隐性的——至少在公众场合是这样。根据莫罗·图尔斯的观点，每一次遗传上的缺陷都是一个无声的实例，一次可以供其他人借鉴的教训。当然人们会尽量隐瞒自己的痛

苦，男人则通过指责女人来发泄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

男性的不安情绪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女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反映了男性在对待自身欲望时的矛盾心理。对夏娃似的性感诱惑的担心，对女性特质阴暗面的不安，对女性的性渴求以及对女性神秘感的恐惧——这些矛盾心理最终导致夫妻双方无法共同享受性爱的乐趣。医学论文主张人们尝试用手淫或者是放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这样更容易使人产生罪恶感，从而最终导致阳痿。

在19世纪男人的性幻想中，隐藏着对失败的恐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滕德豪和妓女亚历山德里娜以及弗洛伯特和路易丝·科利特之间的关系。埃德蒙·冈科特这个温文尔雅的爱情骗子则担心自己的男性器官在关键时刻不能发挥作用。劳伯德医生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冗长的论文，说男性可能因为羞愧而引起自发性的阳痿。斯滕德豪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叙述过他和5个25岁到30岁之间的英俊男子之间的对话，他说："除了一些宁死也不肯说出真相的自大狂之外，我们所有人和自己最心爱的情人的第一次都是失败的。"由于不太了解勃起的特点，许多男人很怕阳痿，一些江湖郎中就乘机大捞一笔。报纸，尤其是春季的报纸上充斥着人工鞭打法、灌注法、按摩法、电疗法、荨麻拍打阴茎法、针刺疗法以及磁疗法等各种治疗阳痿的广告。

对生命的留恋以及老年期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许多人性失常的案例。通过精神病专家的不懈努力，精神病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直到1860年左右，医生仍然相信精神病原论。在19世纪稍早时期，忧郁症患者急剧增加。忧郁症的患者大部分是男性，尤其是职业男性。到了19世纪末期，社会上开始流行神经衰弱。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使头痛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时的文学领域开始出现第一位精神病患者。1887年，在距西奥菲尔·高太尔撰写《鸦片梦境》和尼弗撰写《水母》40年之后，蒙帕斯特在《李·霍利》中塑造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可怕形象。从此一种新的担忧又诞生了，直到20世纪，人们还一直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如今，这种焦虑情绪除了表现为人类的兽性欲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形式。人类的心里都暗藏着这种变态情绪，这种心理的存在最终会导致人性的分裂。

患贫血症的青年女性

19世纪的女性受到的困扰和男性所受困扰的症状不同。医生发现女性有着很神秘的生理特征。他们对女性阴柔的特性充满兴趣，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女性的问题都是由她们的性器官导致的，并冠之以“妇女病”的名称。这些疾病困扰着每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家庭医生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当一位年轻患者成为萎黄病的第一位受害人之后，这种疾病马上就流行开来。小说和医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有着惨绿色面颊的年轻女士。在以往的观念中，女性天生就是天使和纯洁的象征；到了后来，人们开始刻画兼具“雪白的皮肤”和“苍白的脸色”的女性形象。事实上，这种苍白恰好中和了女性的精致和脆弱。

纯粹的学术论文和各种各样的科学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由此引发的担忧。直到1860年左右，许多相关的理论依然模糊不清。医学专家们仍然墨守着希波克拉底学派的陈规，认为萎黄病是月经失调的结果，是女性被唤醒的性欲的自然反应，因此可以采取预防的方法治疗萎黄病。所以除非是真正的喜事，也就是要走进结婚礼堂，他们不允许患有此类疾病的女性接触任何可以引起她们欲望的东西。更有许多谨慎的医师认为萎黄病是由肠胃机能失调引起的，也就是说子宫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些人认为萎黄病是生命活力不足的结果。因此，萎黄病并不是多血症或者是潴留所造成的，而是像让·斯塔罗宾斯克所说的那样是“做女人的悲哀”，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萎黄病会遗传。这一理论使人们开始对女性青春期重视起来，小说家和医生更是如此，左拉笔下的英雄人物遇到并克服的种种困难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相信萎黄病和月经初期会像歇斯底里症一样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而这些问题和“青春期狂躁症”又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又一种新的观点在19世纪的后30年间流行开来。这时人们相信萎黄病是由于身体的某种缺陷引起的。对贫血病新的认知，再加上研究红血球的新科技的发展论证了用增加体内含铁量来治疗这种疾病的传统方法的科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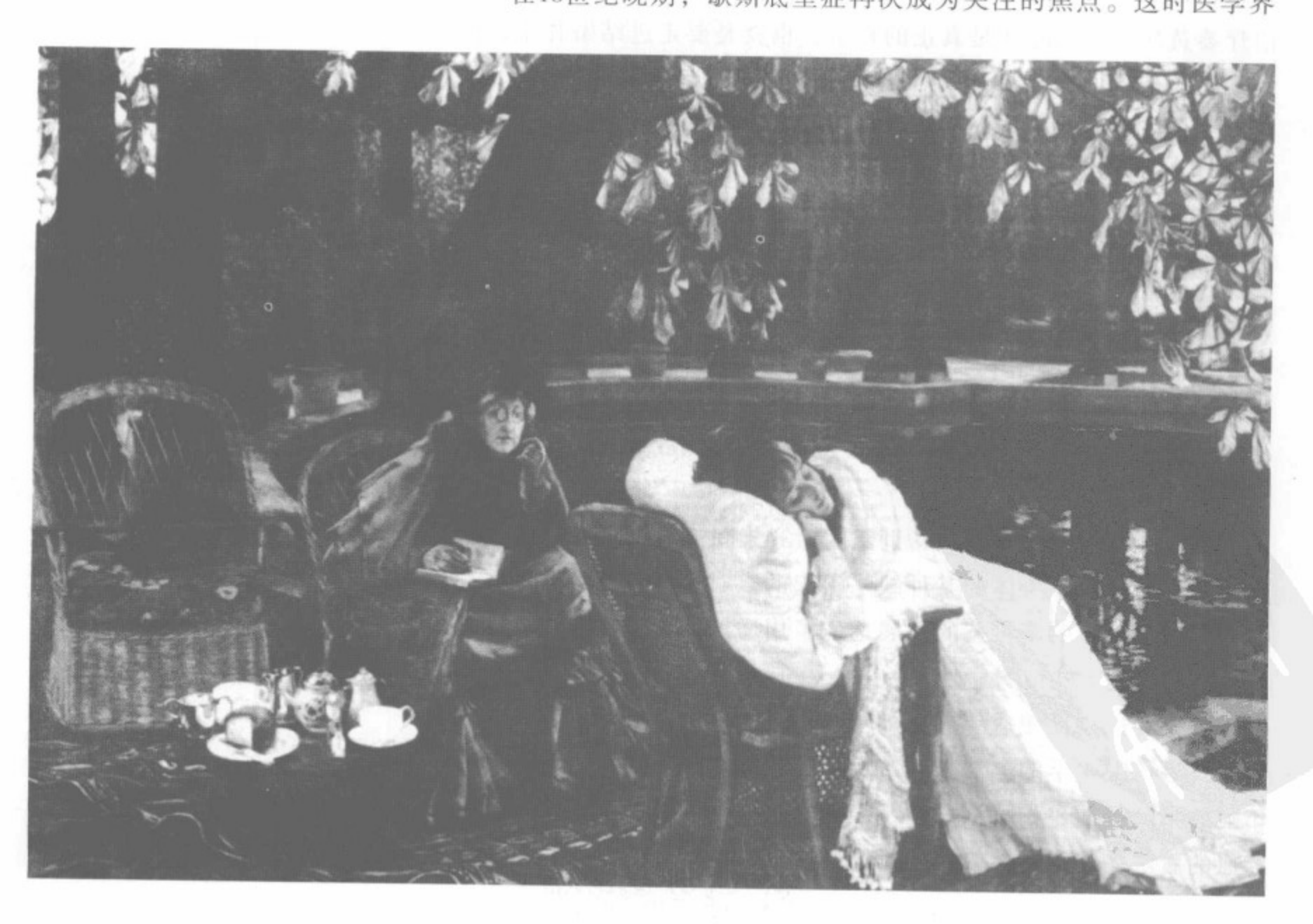
科技的进步促使成年人更加注意对少女的性启蒙，他们甚至希望通过道德卫生学的方法来延缓女性的性发育时间。随着女性初潮年龄的不断提前，妇科病的性别病源论认为女性应该早婚。对女性经血的看法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子宫和歇斯底里症

另一方面，人们对歇斯底里症的看法就更有影响力了。它对人们的家庭生活、性关系，甚至是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巫婆的形象在舞台上消失之后，歇斯底里症就开始入侵到个人的生活中。在19世纪差不多整整100年的时间里，歇斯底里症几乎就是女性的“专利”。尽管当时有人提出男性也可能患此类疾病，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间，人们才开始接受男性歇斯底里症的观点。第一份死于歇斯底里症的男性的图片资料出现在1888年。歇斯底里症没有任何生理症状，它给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学专家们出了个难题。古代的医师认为问题出在子宫上面，认为这是雌性动物生来就有的自然特征。他们以此来解释歇斯底里症突如其来的症状。古代医学认为人的身体和自我是彼此独立的。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身体里有一种黑暗力量，这股力量征服了这个女人的抵抗力。他们还认为这样的女性一定有罪。

在18世纪晚期，歇斯底里症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时医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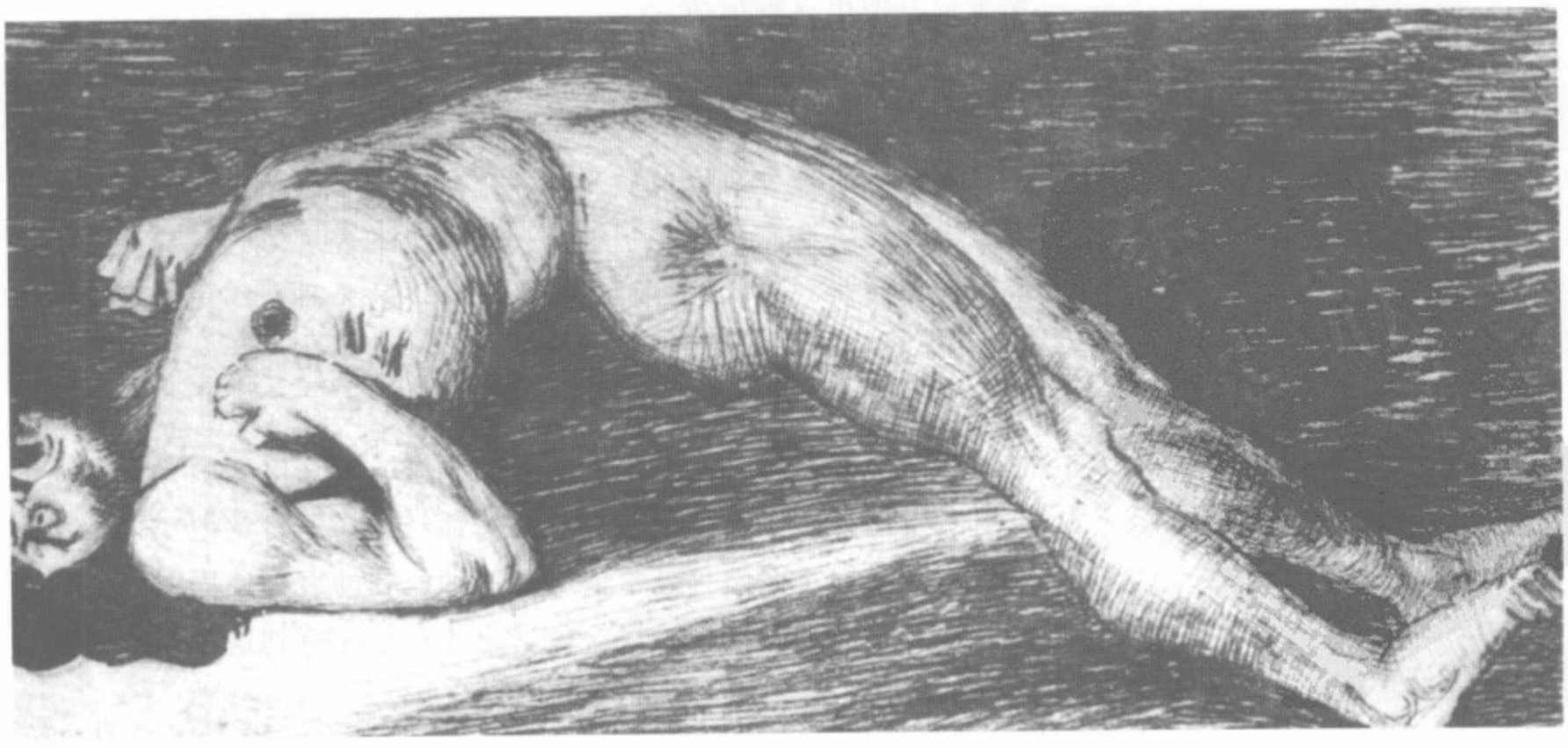
詹姆斯·蒂斯特：《恢复中的病人》，1875年至1876年前后。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常常会心存担忧。在青春期到结婚的这段时间，这种敏感的担忧常常以一种奇怪并且非常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女性周围的人们就开始对她们实施周密的监护和医护治疗。



逐步形成了一套循环理论，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女人天性的结果。19世纪的医学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遵循着这一理论，他们把治疗的重点放在子宫和性欲上面，歇斯底里症患者被送到妇科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在米歇尔特开始研究排卵机制之前，这种理论影响着许多外行人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注意自己的妻子在月经来临之际的反常表现。当然，还是有些细心的丈夫密切留意妻子的月经周期，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而，在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中，生殖和神经系统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医学界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在19世纪中期，人们的观点趋向于注重大脑。布里奎特在1859年把歇斯底里症形容成一种脑神经衰弱症。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把歇斯底里症和女性的阳性特征联系起来：只有那些太敏感的人才会得这种病，由于她们的感情太丰富细腻，她们更容易受到打击。正是由于她们的这些女性特征使她们更易受到歇斯底里症的威胁。作为好太太和好母亲，她们有着很多的优秀品质。一时之间，歇斯底里症不再是一个病理学的问题。我们发现，在完美理念成为教堂的固定教条和卢尔德出现圣母玛利亚的幽灵的5年后，布里奎特发表了他的著作。这一时期出现的女子寄宿学院所反映的是教会的善意的人类学思想。

无法名状的痛苦：查科特用来描述歇斯底里症的语句。



从1863到1893年间，查科特一直在研究神经系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神经休克”会导致病态遗传，而歇斯底里症之所以不会在人体器官上有任何反应，是因为它只会影响大脑皮层的功能。

不管歇斯底里症究竟是子宫疾病还是大脑疾病，它都是人体自身产生的问题，因此这是一种客观的情况。格拉迪斯·斯温曾经说过：“对于患者来说，歇斯底里症就好像是一种自身携带的疾病。”很多女性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无名的力量，就好像她们不得不向男性的威压屈服一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淑女——这里并不是说性冷淡的女性——或许会像另外一个年龄段的疯狂女性一样，向自己的心魔低头，成为一个女色情狂。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专家开始提倡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满足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对歇斯底里症的恐惧使人们开始相信适度温馨的性爱和家庭生活能够让女性充分展现自身的优点，并使她们身心愉快地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一个过于纵容自己性欲的丈夫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

另外一个长期争议的议题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18世纪的万物有灵论者认为歇斯底里症并非是人类和自己身体躯壳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而是神经紊乱的结果。例如，斯塔尔就认为歇斯底里症是一种激情的爆发，是灵魂斗争的结果。保罗·霍夫曼写道：“人类的欲望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灵魂斗争的方式得到满足，但是人们至少得发泄出这种情绪。”

很显然，这种观点开创了主观处理歇斯底里症的先河。正如斯温所说，在1880年至1914年间，这种主观处理方式首先给我们带来了珍妮特的心理分析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歇斯底里症是一种分裂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显示了一个分裂的自我。它表达了一种内在的分裂。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步，它说明那种相信外在病源论、女性宿命论的传统观点正在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逐渐消失。

然而，对于研究私人生活的人们来说，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歇斯底里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女性经常会不自觉地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她们这么做只是希望通过这种疯狂的表现使周围的人注意到她的痛苦。直到这个时候，史学家才开始注意到这种间接表达情绪的方法。

对女性地位的承认

歇斯底里症有时会以一些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歇斯底里的情况在私人和集体生活中都有可能发生。有些情况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的心魔，而另外一些情况是因为那些苦行僧般痛苦的宗教仪式。从1783年到1792年，距离阿鲁西两公里的一个叫做费尔因斯的公社一直是两位叫做邦茹的牧师兄弟的天下。那些不愿遵从父辈意愿的女性被他们招至麾下，受尽了各种凌辱，有个人还被钉死在公社小教堂的十字架上。这其中最疯狂的一位妇女后来成为弗朗西斯·邦茹的情妇，并且为他生了个小“弥赛亚”。从那时起，法国农村就滋生出一种新兴的异教，这种异教邪说一直盛行到第三共和国时期。1855年乔斯林的《愤怒的女性》，1881年普莱德朗的《疯狂的女人》都反映了这种集体性的疯狂行径。

莫因村是阿尔派恩地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这个由于居住着许多未婚女士而小有名气的小村庄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女性社会生活氛围。神职人员一直严密地控制着这里的一切活动，禁止人们进行任何娱乐和狂欢活动。这种对现代生活充满恐惧的禁欲生活使这个村镇越来越多的女性患上了歇斯底里症，而且这种情况一直从1857年持续到1873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女性所经受的痛苦。

1857年春天，村里两个第一次参加宗教集会的女孩子突然发作歇斯底里症，她们不停地尖叫、折腾、咒骂，而且还羞辱企图安抚她们的大人们。这也是这里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很快村里其他年轻女人也疯狂起来，接着就是年长一些的女人。而村里的牧师们并不想让外界的变化波及到这里，他们更希望继续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歇斯底里症同时——或许是从根本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寻找自己定位时的迷茫。这些不能跳舞，又担心找不到丈夫的年轻女子有时只能从一种集体的疯狂行动中找到些快乐。她们违抗父母的意愿，父母转而开始避免和孩子们相处。女儿开始顶撞自己的父亲；妻子开始打骂自己的丈夫。这些对宗教信仰不屑一顾的女性改变了教堂的宗教仪式。1864年4月30日，一位主教由于不允许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拜神驱魔而遭到她们恶意的诅咒。更可怕的是这些女性竟然拒绝工作。相反地，她们整日无所事事、打牌、喝酒，干一些以前男人才能做的事情，而且只吃白面包。

当地的牧师无视上司的劝告，希望可以借助巫术改变情况，结

这些幻灯片都是萨尔皮特尔精神病院的研究成果，它们充分展示了神经疾病对人类的困扰。病人们经常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在镜头前做出各种表演。我们很难了解这其中有多少真实成分。这些歇斯底里的行为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一些在家中或者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女性。

Policlinique du Mardi, 15 Novembre 1887.

Objet de la Leçon:

1°: Syphilis, ataxie locomotrice progressive, paralysie faciale;
2°: Monoplégie brachiale hystérique, forme douloureuse;
3°: Epilepsie partielle.

Mr Charcot – Contrairement à mes habitudes, j'ai fait venir ici des malades que je connais un peu.

Vous savez que d'ordinaire, dans la leçon d'aujourd'hui, je n'examine ici que des malades du dehors venus pour la consultation; vous savez aussi quel est le but de cet enseignement, c'est de vous exposer la véritable méthode du traitement des malades atteints d'affections du système nerveux.

Ce que nous appelons des leçons ex cathedra est chose un peu artificielle. Si vous n'aviez pour vous que cet enseignement, quand vous vous trouveriez en face des malades, vous pourriez être singulièrement embarrassés et aboutir facilement à de redoutables erreurs. C'est pour ne pas vous tromper que je me jette à l'eau et que je procède un peu devant vous comme je le fais dans ma clinique particulière. Je fais venir ordinairement des malades que je ne connais pas moi-même, mais aujourd'hui le cas est différent. Je connais le malade que je vous présente, il est très intéressant et je vais l'interroger comme si je ne le connaissais pas.

Il s'agit d'un cas complexe qui me permettra de discuter devant vous plusieurs points controversés. Le diagnostic n'est pas bien difficile à établir. Ce qui est plus difficile, c'est d'arriver à la connaissance des différents éléments qui établissent l'état pathologique du malade. Je vais l'interroger.

(au malade) Vous avez été atteint de la Syphilis? A quelle époque?

Le malade: En 1880.

Mr Charcot: La chose n'est pas douteuse. Il a été soigné par Mr le Docteur Fournier. En 1880, il a eu une éruption sur tout le corps.

Le malade: Mr Fournier m'a dit quand je suis allé le trouver: votre maladie remonte

查科特医生的周二演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几乎当时所有的名流都曾去听过一两次。在这位成功的名人医生的推广下，神经学成为当时的一门流行学科。通过这篇演讲稿，我们可以看出“性交危险”是当时人们的一个主要烦恼。

果毫无收获。这些情况在1860年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关注。他们发动了一场现代宗教战争，希望可以使这些妇女平静下来。他们在这里铺设公路，设立警卫部队，还组织人们跳舞。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给予精神病医生康斯坦斯广泛的权力，希望他可以借助隔离病人、单个管理的方法，阻止歇斯底里症蔓延到私人领域。而康斯坦斯也终于在第三共和国前夕取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女性的反抗心理还有另外一种发展轨迹。之前我也曾提到一些。1848年，歇斯底里症在巴黎一家拥有400名女性员工的工厂中流传开来；1860年开始波及斯特拉斯堡伊克女子学校的女性；1861年，歇斯底里症波及蒙特默特教区的女性教友；1880年，波尔多女子寄宿学校的许多学生死于该病；1883年，阿尔代什的一家工厂中开始流行歇斯底里症，这里的年轻女性以丝绸贸易为生。

萨尔皮特尔的剧院

1863年至1893年间，萨尔皮特尔上演的戏剧中大量展示了歇斯底里症的情况。在这里，19世纪女性痛苦的呐喊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戏剧中的歇斯底里症最能体现出当时人们所经受的痛苦。

神经学家让·马丁·查科特对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在巴黎的萨尔皮特尔精神病医院首次把一些轻微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送来公开亮相。这些妇女按照查科特医生的命令进行表演，她们热切地希望能够抓住这位伟人的目光，吸引他的注意力。虽然她们为这份痛苦的单恋激动不已，但是她们从来不会为此影响查科特的工作。查科特在一些艺术家、作家、记者和政治家面前展示了他的患者。像拉维格里、蒙帕萨特、列宾这些大人物偶尔也会去听他的周二讲座。在摄影师让纳德和朗德所拍摄的电影中收入了歇斯底里症管弦乐编曲，这一编曲着重强调了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引起了人们对患者神色的重视，怂恿人们对其进行模仿，而且向公众展示了病人的性爱行为。神经科疾病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歇斯底里的行为在巴黎的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莎拉·伯恩哈特最擅长模仿这位名医的患者，或者说是这位名医的女演员。这位伟大的歌剧首席女主角凭借其在1882年上演的《忏悔录》中的表演以及在理查德·斯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1905年）中的一声恶意长啸，一举成为萨尔皮特尔最著名的歌剧家之一。

精神病学和文学艺术之间有着一种敏感的关系。爱德蒙·德冈考特的笔下就刻画了许多讨厌男人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少女爱丽莎》）、虔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热韦尔斯夫人》）以及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年轻女子（《彻尔》）。左拉在《被诱惑的人》(1874年）中所描写的马莎·莫里特的烦恼和J.K.哈伊斯曼在《拉巴斯》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成了萨尔皮特尔剧院编剧笔下极好的素材。同时，受到查科特或是流行时尚启发的作家们或把自己想象成歇斯底里症患者，或承认自己也曾经受过歇斯底里症的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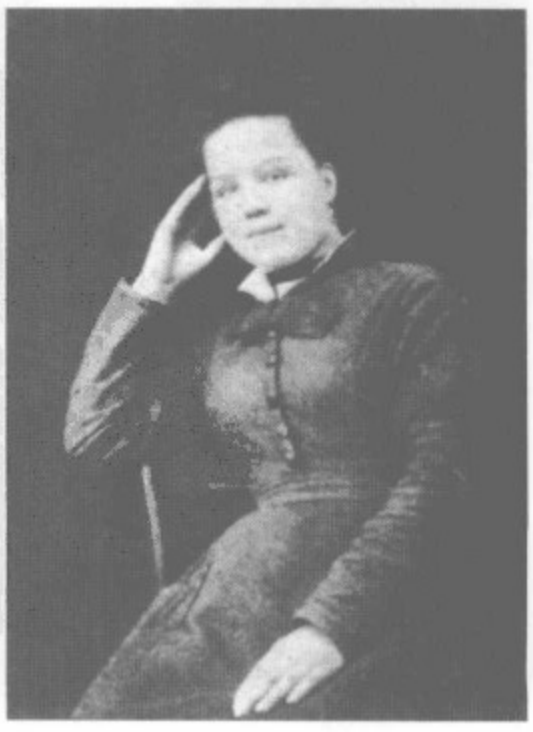
这些女士终日在舞台上模仿自己的样子进行表演，她们认为自己就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歇斯底里症患者飘忽不定的眼神和微笑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女性的病态诱惑。男人们发现女人们歇斯底里的病态行为和异常兴奋的举动与街头妓女的挑逗一样具有诱惑力。任何女人跟男人调情时都一样，不管她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古斯丁是萨尔皮特尔的台柱子。查科特和他的信徒对她十分痴迷，他们迷恋她那性感的眼神、“热情的鼻子”、迷人的风度。他们不停地让她演出被强暴的剧情，直到有一天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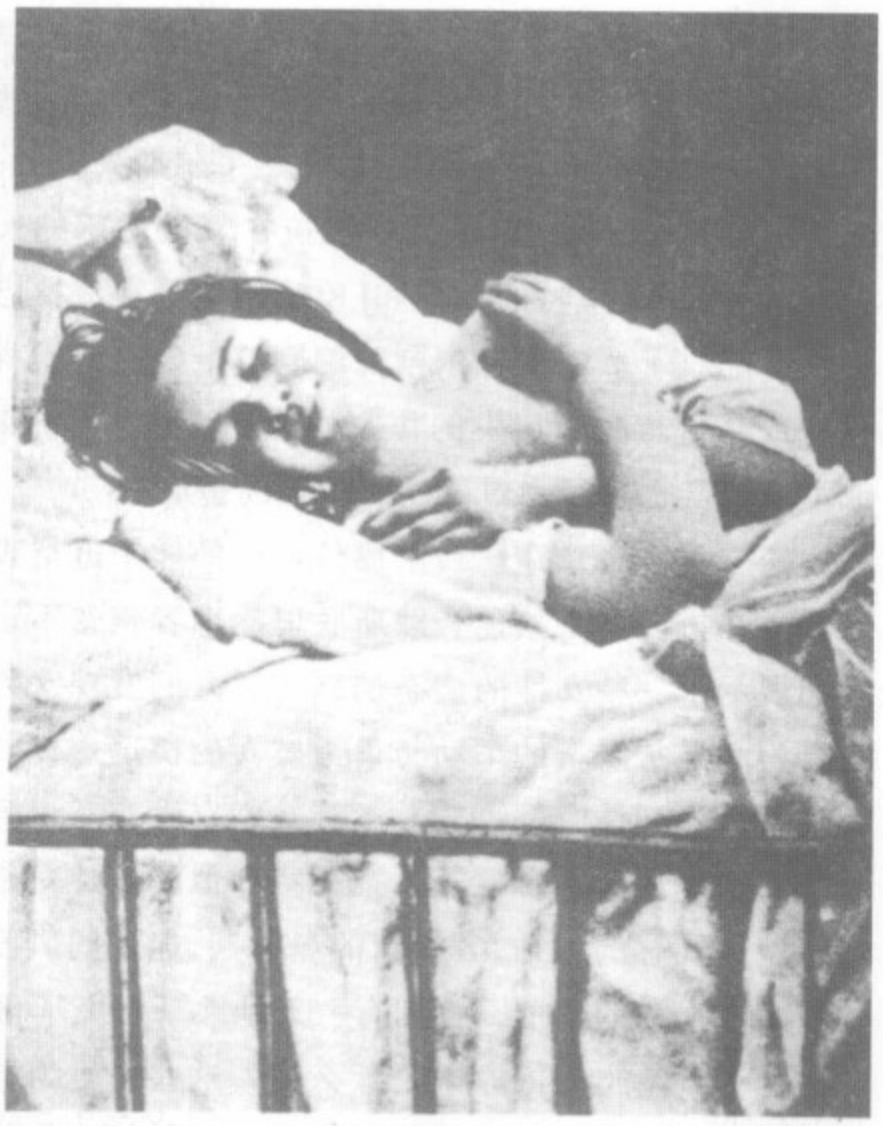
这个剧院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医生为什么会对如此模糊不定的角色转换怀有无尽的兴趣呢？查科特这位伟大的专家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他的追随者——有时候甚至是他自己——都把他当作拿破仑或者耶稣般顶礼膜拜。不可否认，创办这个剧院有一定的治疗目的，但这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查科特热切地希望戏剧展现出那种痛苦而又快乐、销魂而又狂热的性爱欲望，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完善年轻医生们的临床经验。歇斯底里剧院的产生或许只是男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耍的一个小把戏。剧院首先是为了展示患者的症状，然后才在不知不觉中医治了男人的烦恼。萨尔皮特尔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充分反映了人们的表现癖和观淫癖，它以戏剧的方式展示了演出者和观看者双方的病态欲望。

查科特有许多私人患者，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他平均每年要为大约500位门诊病人看病，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医院里会有这么多歇斯底里症患者或是像马莎这样被亲属们看成是患有不治之症的、有着强烈欲望的年轻女子。

为了医治这些疯狂的行为，一些残忍而又无效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了。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剧院本身，萨尔皮特尔精神病院只是

奥古斯丁是一位16岁的小女孩，她是萨尔皮特尔精神病院最可爱的患者。这些照片充分地展现了这个可爱的女孩在表演遭人强暴时以及之后内心深处所经历的痛苦时的“诱人姿势”。





皮埃尔·安德烈·布劳里特：《查科特医生在萨尔皮特尔的演讲》，1886年。

以其特有的戏剧方式展现了病人的症状。最糟糕的是从此以后，子宫切除手术开始流行开来；查科特亲自向人们表演了烧灼子宫颈的全过程；医生开始实验通过催眠术来诱导人们的歇斯底里情绪；许多饱受摧残的女性开始整日沉溺于白酒和吗啡之中。

嗜酒的欲望

喝酒可以让人忘记烦恼，但是它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生的苦恼。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染上了酗酒的孤独酒徒。人们通过两种途径对这种新的陋习进行了抵制。上层阶级通过专业的医学治疗抵制了酗酒的习惯，他们认为酗酒和他们想象中的工人阶级的不道德行为有关。因此，克服酗酒——这种导致家庭分裂、浪费钱财、加速人类退化、造成社会动荡以及损害民族尊严的不良陋习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下层阶级中传教说道。于是人们在1873年发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运动囊括了所有的学校、军营、公寓以及工人阶级休闲娱乐业的监督单位，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利用了女性的影响力。

组织者私底下希望运动可以减少上层阶级的酗酒现象。其中苦艾酒尤为麻烦，因为当时的医学认为苦艾酒会损伤脑细胞，并会导致癫痫。癫痫和梅毒一样会影响统治阶级权力的传承移交。此外，最好还是只有少部分的人看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男士在小酒馆里狂喝烂醉、猥亵恶心的样子。

19世纪90年代，正当巴黎贵族阶级的反酗酒运动逐渐消沉下去之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尽管对酗酒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酗酒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他们认为酗酒不仅是一种新的鸦片，而且妨碍了他们的组织发展。正当资产阶级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工人阶级中的酗酒情况却使他们失去了获得政权的机会。女性再一次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人们希望工人的妻子们能够帮助丈夫戒掉酗酒的恶习，而在早些时候，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们也被赋予了把对宗教信仰不屑一顾的丈夫转变成忠实信徒的使命。

医生们在歇斯底里剧院里从容地指挥自己的病人。催眠术在南希和巴黎盛行了许多年。

尽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起反酗酒运动的动机不同，这种情况很容易对历史学家产生误导，但是所有的情况都表明酒徒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兴高采烈、红光满面、谈天说地的豪爽酒徒，”钱特尔·普朗韦斯写道，“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是一群病态的、堕落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偶尔还会犯法的酒鬼。”这些情况与当时饮酒风俗的变化是一致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子。正如西恩里·费劳特所说，整个19世纪上半叶，法国到处充斥着“庸俗的自我陶醉者”和“吵闹不安的醉鬼”。连农民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喝醉的机会。在赎罪日以及其他节日，赶集或者是家庭聚会，人们都会像过大节一样趁机痛饮一番。资产阶级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在这些节日里，那些来到布列塔尼的巴黎人非常吃惊地看到路旁醉倒着那么多的人，接着就开始大肆宣扬，然而这也只能进一步证实他们的狭隘，在他们眼中，法国西部的农民比动物文明不了多少。

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种令人讨厌的集体迷醉的社会状态被更克制却更漫长的酗酒现象所代替。1849年，瑞典人马格努斯·赫斯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批判，这种情况很快成为导致堕落的根源之一。依费劳特所见，在1850年到1870年这段过渡时期，“人们依然过着这种自我沉醉的生活”。他们只是把场地从公众场所转移到了私人空

间。而当局也默许了这种做法。1873年颁布的法令强调公开酗酒是犯法的，但对私下酗酒却只字不提，因此这些法令只能限制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只能使那些无家可归的酒鬼无处藏身，对这个社会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饮酒和物质浪费

和西部地区一样，法国其他地区随后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也不同。很显然，是资产阶级开创了在私宅喝酒的先河。开胃酒、白兰地和咖啡以及苦艾酒一直都是上流社会独享的饮品，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普及到平常百姓生活当中。饮用苦艾酒是一项冗长的礼节，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活品位，稍不留意就会自毁形象。

酗酒很快就给城市工人阶级带来了一场浩劫，从利穆赞来做工的泥瓦匠比当地的农民喝得还多。这种情况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因为这种酗酒是公开的，是酒馆里正常的人情往来。工人阶级的小酒馆已经打破了公开饮酒和私人饮酒的界限。老板是大家的朋友，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大伙儿都把他当自己人，他会在需要的时候借钱给你或者是投资入股。在这种情况下，喝酒就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且还是私人联络感情的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喝酒就跟忏悔一样，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

喝酒还加强了同事之间的联系。不喝酒的人会遭到别人的排斥，大伙会指责他自私傲慢，“只管自己不顾别人”。喝酒被公认是男子气概的标志，也是树立个人形象的手段。丹尼斯·鲍罗特在《极致》一书中就表达了反对节制饮酒的观点。人逢喜事总是要喝上几杯：过生日、老朋友聚会、远方来信、找到新工作，当然还有发工资的时候。

火辣辣的白酒下肚就好比怀里揣着一个火炉或者是发动机之类的东西，需要不断地添加燃料。这种观点正好迎合了一些人认为酒是好东西的论调。爱喝酒的人认为酒能给人带来一股“冲劲儿”，于是巴黎的泥瓦匠、鲁昂的码头工人以及瓦朗塞尼勒的冶金工人总会定期喝上几杯。他们早上5点钟一起床就喝上一杯酒提神，这样至少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疲劳、工作的危险以及自己贫困的境地。喝酒可以解乏提神，这也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喝的酒多的原因之

弗利西斯·罗普斯：《喝苦艾酒的女人》。罗普斯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刻画女性郁闷情绪的机会：这就是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女酒鬼。

一。女性可以借助一些男人无法利用的方法来延缓身体的衰老。

社会上自斟自饮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历史学家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传统的节日气氛日益淡薄，许多手艺在慢慢失传，工作日益专业单一，薪水不断提高以及闲暇时间增多（虽然可以不再忙碌但是要打发时间就更难了），所有这些情况很容易造成心理疾病，因此工人们开始借酒消愁。事实上，那些经常去喝酒的工人们大多是领完工资以后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才一直泡在酒馆里。

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到来以及1880年政府减轻酒业销售税法令的颁布，酒水的价格逐渐降了下来，城市居民也逐渐增加了酒水消费量。通过对巴黎工人酒水消费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喜好。葡萄酒、苦味药酒、奎宁和苦艾酒都是工人们喜欢饮用的酒类，尽管他们希望隐瞒对苦艾酒的喜好。他们还很爱喝朗姆酒，但是对苹果酒和啤酒却没什么兴趣。而女人们则喜欢喝开胃酒、甜酒和果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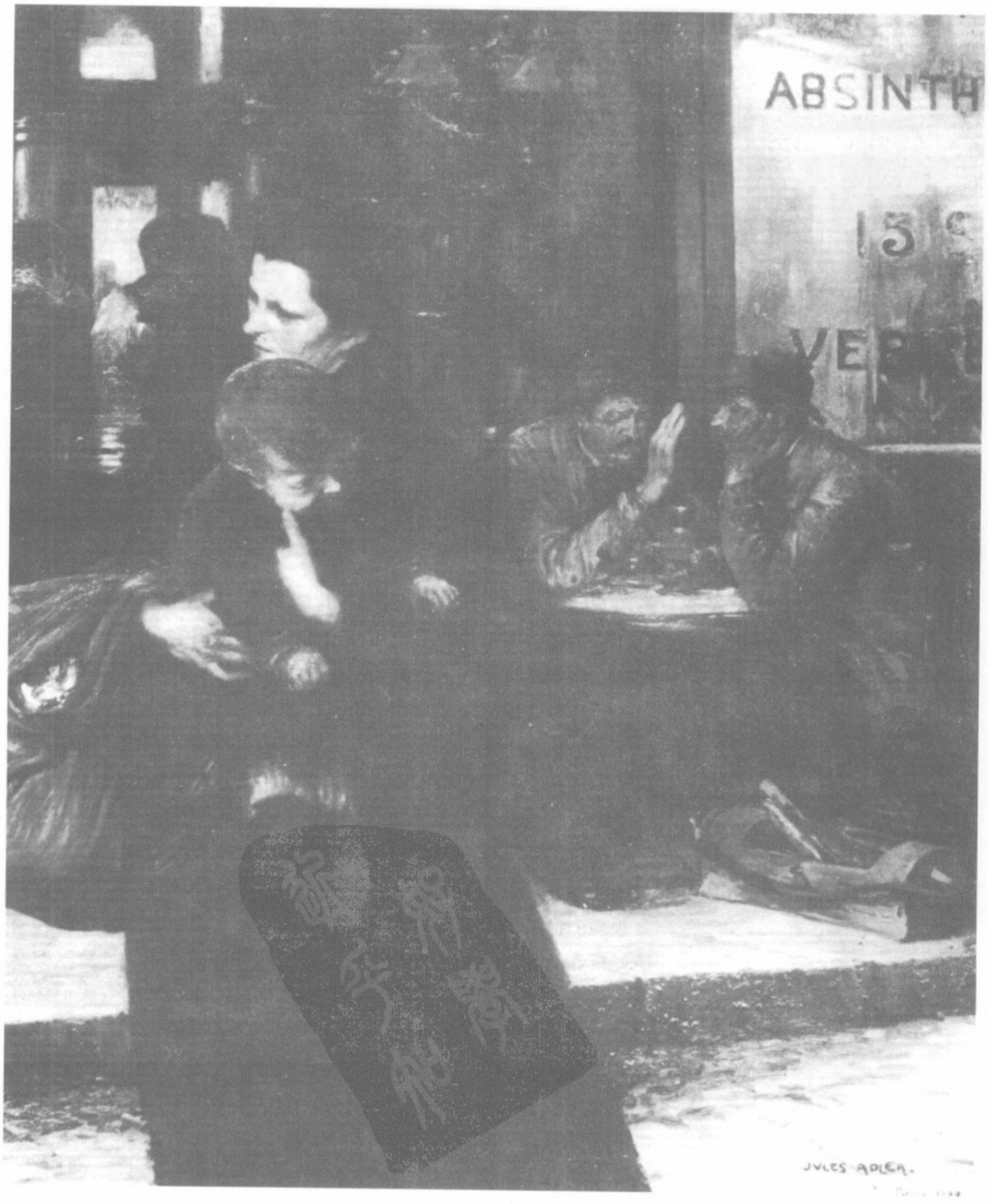
乡村农民的麻醉剂

酒在贝勒维尔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酗酒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纠纷，人们之间嫉妒猜疑的情绪不断滋长，最终导致了家庭暴力。酒后滋事、胡言乱语都是喝醉之后司空见惯的情况。

酒类在征服城市之后随即开始向乡村进发。许多年以来，农民一直习惯饮用牛奶、水、廉价酒以及发酵过的淡味果汁（简称拉布瓦松，一种饮料，盛行于法国中西部地区）。自第二帝国以来，大多数利穆赞农民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喝上几口酒。不同地区酗酒情况蔓延的时间也不同。法国西部地区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喝酒，当时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尽管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一再告诫人们要提防酗酒的危害，但是这种陋习还是流传开来。在诺曼底南部的一些地方，19世纪中期酗酒就开始初露端倪。在法国边境诸如旺代和菲尼斯地区，古老的饮酒习惯有效地抵制了酗酒风气的蔓延，因此这些地区在很久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顺便提一句，造酒地区酗酒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地方好多少。酒厂通过巧妙的广告宣传造成了一种酒商并不嗜酒的假象。

右页图：朱尔斯·阿德勒：《母亲》，189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代表强烈谴责酒的毒害，因为它破坏了许多家庭，并导致了贫穷和堕落。

酒价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对农村影响力的增强以及1872年征兵制的实行，这些都是刺激农村酒


ABSINTH
JULES ADLER.

农民开始在自己的家中饮酒。与此同时，城镇地区也逐渐放宽了对酒水饮料的管制。

类消费的因素。另外，赫维·勒布拉斯和伊曼纽尔·托德还指出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解体和宗教信仰的崩溃也是原因之一。大批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这就加剧了个人和核心家庭的分离。尽管老一辈人还在努力维系家族血统，但是家族的没落使年轻人不可能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下走向婚姻。例如，在克勒兹的乡间，只有一些老年人还居住在农场那些破败的大房子里。自行车的普及更是增加了这些年轻人往镇上和小酒馆里跑的频率。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容易染上酗酒的恶习。在下诺曼底地区，妇女们经常因为抵抗不了酒的诱惑而偷偷喝上几杯。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对这些穷乡僻壤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夫妻俩经常在对饮中找乐子。和城里一样，尽管喝酒并不会导致家庭暴力，但是它确实影响了整个家庭生活的氛围。诺曼底的农夫们终日泡在苹果酒、白兰地和加了苹果酒的咖啡里，日子久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到损害。莫塔纳斯地区的农民也不例外，他们因每天能喝掉半公升酒而闻名全国。

大部分农村家庭每年都要消费50至75公升左右的酒。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家庭消费的饮料品种也在不断增加。波尔茨地区在

埃德加·德格斯：《苦艾酒》，1876~1877年。亨利·德图劳斯-劳崔：《饮酒的女人，或是宿醉》，1889年。德格斯和德图劳斯-劳崔与马格努斯·赫斯一样，都希望突出酗酒者的特点。这两位艺术家并不是要表现人们喝醉酒的样子，他们希望表现出喝酒者独自喝酒时孤独、寂寞的感觉，饮酒者希望这种液体可以治疗她们的伤痛。两位艺术家都注意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巴黎咖啡馆里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1879年出现了苦艾酒，1880年出现了朗姆酒，1889年出现了樱桃白兰地和柑桂酒，1901年则出现了艾酒。而白兰地则一直是深受人们欢迎的酒类。

新情况的产生

18世纪晚期的同性恋情况还不是十分严重，基本上都是偶然现象，而且双性恋的情况比较多。然而到了19世纪，通过临床医生的仔细研究，同性恋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种类。伴随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堕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这是生物决定论的奇特产物，米歇尔·福卡特称之为“性欲的泛滥”。

大部分的“鸡奸者”对珠宝饰物、化妆品以及香水等女性用品很感兴趣，他们喜欢烫头发，喜欢翘起臀部走路。由于人们相信行为和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大家认为这种新人类带有女性特征。这种同性恋者有着女人的通病：说闲话、爱冲动、虚荣、反复无常以及口是心非。为了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真实面貌，法医学画了一幅非常怪诞的画像，这幅画像包含了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模样。安布罗斯·塔德鲁医生在1857年向人们展示了这些人是如何违反卫生和清洁准则以及是怎样地不讲卫生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体态上判断出此人是否是一位同性恋，尤其是那种剧烈的臀部动作。松弛的括约肌、漏斗状或者是可以容纳下一只阴茎大小东西的肛门——只要具备这些特征，这个人就毫无疑问是上述那种新人类。同样，“小噘嘴儿、短牙齿以及厚而丑陋的嘴唇”——都是一个经常口交的人的特征。简而言之，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鸡奸者就是一种新的怪物，一种和狗没有什么区别的动物。他就像公共厕所里的粪便，散发着阵阵恶臭。

对于警方来说，同性恋者就是一群无视社会规范的怪人。那些“非自然”的行为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独有的特点，资产阶级和艺术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些人经常和下层社会的人混在一起。与那些经常光顾妓女的男人相比，他们更愿意和“下等人”一起寻欢作乐。由此可见，同性恋者并不在意和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人鬼混。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许多资产阶级十分憎恨同性恋的行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污染。于是他们就像贵族阶级要保持自己高贵的血统一样，开始提倡健康专一的性交行为。

19世纪后30年间，资产阶级愈发担心这些阴阳颠倒的变态行为。新产生的性科学对性变态行为做了详细的分类，而且夸大了这种行为的威胁性。从裸露症患者到爱护动物者，都被他们归为性变态的范畴之内，而所有这些人又都受到了从“精神错乱”到“生殖神经症”等各种疾病的困扰。马格纳和查科特都认为这种颠倒性别的变态心理在病态遗传中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同性恋（1809年首次使用这个词语）已经不仅仅是某个方面的问题，或是形态上的某些特征，又或是某种性格。同性恋的行为思想已经成为同性恋者生命的一部分。同性恋者小时候的经历，甚至是在母体中的生活，都会对他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时，同性恋者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位患者，一个天生的受害者。他迫切地需要进行治疗。因此，新的治疗法也渐渐产生了，这其中包括催眠术、体育锻炼、户外活动、强制禁欲，或者是另一个极端，强制他们和妓女发生关系。

社会舆论

18世纪，人们在对同性恋行为的压制程度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警方很难找到同性恋犯罪的证据，他们可以容忍贵族阶级中的同性恋行为却不允许社会其他阶层出现这种行为。一般来说，同性恋行为只有在和其他罪行同时发生时才会受到惩罚。历史学家一直没有弄清自由主义在大革命时期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在大革命以后，社会恢复并加强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打击力度。

基于法律和医学角度的考虑，人们认为应该对同性恋进行监控。一位叫做卡勒的警方人员从塔得医生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可靠证据。1810年颁布的刑法典并没有专门把鸡奸列为犯罪行为。1832年4月28日颁布的法典把“恋童癖”定义为和11岁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的同性恋犯罪行为。企图诱奸或者是猥亵儿童也是一种犯罪行为。1863年3月13日把最低年龄改为13岁。而实际上，法院和警方远比这些温和的法令严酷。为了扫除同性恋，警方在1834年开始对公共场所进行清查。1845年7月20日，对蒂利勒里埃公园的清查行动最后发展为一群警察群殴被他们认定为同性恋的人，这次行动也因此而臭名远扬。从1850年到1880年，人们在对同性恋进行压制的同时，开始打击嫖妓行为，事实上，同性恋比嫖妓行为要严重得多。1852年，法官决定把塞恩监狱所有的“职业”鸡奸者流放出

去。1872年有一则著名的案例，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的同性恋男妓因公然引诱顾客而被判处两年牢狱。

社会对同性恋的打击力度使我们可以想象到同性恋者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不得不躲躲藏藏，逐渐在大城市发展出一种特别的社交模式。为了有选择的余地，一些同性恋者开始模仿那些为他们而作的画像。在第二帝国时期，人类学家和医生以及犯罪学家一起对同性恋学科进行研究。同性恋者不得不以某种信号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愿望，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在偏僻的地方碰面，偷偷地进行交往。由于担心警察、密探，他们逐渐开始以某种特别的暗号以及一系列复杂的识别信号进行交往。

菲利浦·阿利埃斯研究发现，社会舆论有时会导致这些可怜的受害者出现自暴自弃的情绪，还有一部分人会因为被人揭穿了身份而崩溃，再也无法摆脱众人的非议。路易-菲利普时期公共教育部的部长威利梅恩就是因为不敢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郁郁而终。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其词，至少在19世纪上半期，像卡姆巴克斯和杰诺特这样的同性恋者还可以拥有辉煌的事业。只要社会不接受男人之间的爱情，他们的关系只能在地下进行，同性恋者就必须忍受下去。巴黎上层社会勉强默认了德斯特·德特雷西和一个空想家的同性恋关系。德卡斯丁侯爵和他的英国恋人圣巴比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约瑟夫·菲夫和一位名叫西奥多的剧作家生活在一起，他们死后还合葬在佩雷-拉克斯的同一个坟墓里。

19世纪的同性恋者成为及时行乐主义的先行者，这种愉悦的性关系注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像菲利浦·阿利埃斯所说的那样，同性恋者最终冲破束缚，坦然地面对世人的时候就是新的男人气概取得胜利的时候。

女同性恋者，男性幻想症的症状

目前我们还没有女性同性恋的历史资料。上层社会的女性同性恋关系史从18世纪晚期的“无雌性”延续到定居在巴黎贝尔-埃普克的富有的美国女性沙弗克丝，再有就是医生和地方长官对妓院和监狱里日益增多的女同性恋行为的长篇累牍的抱怨。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对于女同性恋行为知之甚少。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了解女性同性恋者对于男性特征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也是19世纪男性欲望的病态特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关女性同性恋的讨论和男性同

性恋的讨论有许多不同之处。男性幻想家在用医学方法处理男同性恋问题的同时开始用诗意来美化女性同性恋的行为。在19世纪“女性同性恋者”是温柔、优雅和纯洁的象征。就像让-皮埃尔·雅克所说的那样，这是那时人们的常用词汇。

当然，医生还是不赞成这种没有男人参与的性爱活动。这种同性关系决定了同性恋伴侣中必然要有一个人充当男性的角色，医学专家们认为这种关系会导致更多的阴蒂变大和外阴变形的情况。于是警方规定，女性必须在经过官方的许可之后方能以男性的装扮出现，画家罗莎·博赫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男性看待女同性恋关系的观点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态度。19世纪早期的医学研究成果证明女同性恋与女异性恋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一时期的男性对女同性恋者充满了兴趣。男人们一方面为女人这种惊人的性欲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担心女人在没有男人的时候

1872年，随着帝国时代的终结，伦理道德的风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警察机关依然对“鸡奸者”进行严密的监控。这位入狱六次的年轻的异装癖者就是最好的说明。

也能得到满足。女同性恋是男人谈论的热点话题，他们对于女子闺房中的秘密充满了激情。男人在性爱方面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希望通过对女性旺盛的性欲的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获得快感，他们努力幻想着女同性恋者狂热的激情。《金色眼睛的女人》中就充满了这种性爱幻想，在这些幻想的驱使下，傅立叶和那些窥淫狂经常到那些所有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的剧院里观看演出，到了19世纪末期，窥淫狂开始频繁地光顾妓院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类似于萨尔皮特尔这样的精神病院的歇斯底里症演出中，男人们发现观看女性身体有时竟然可以起到治病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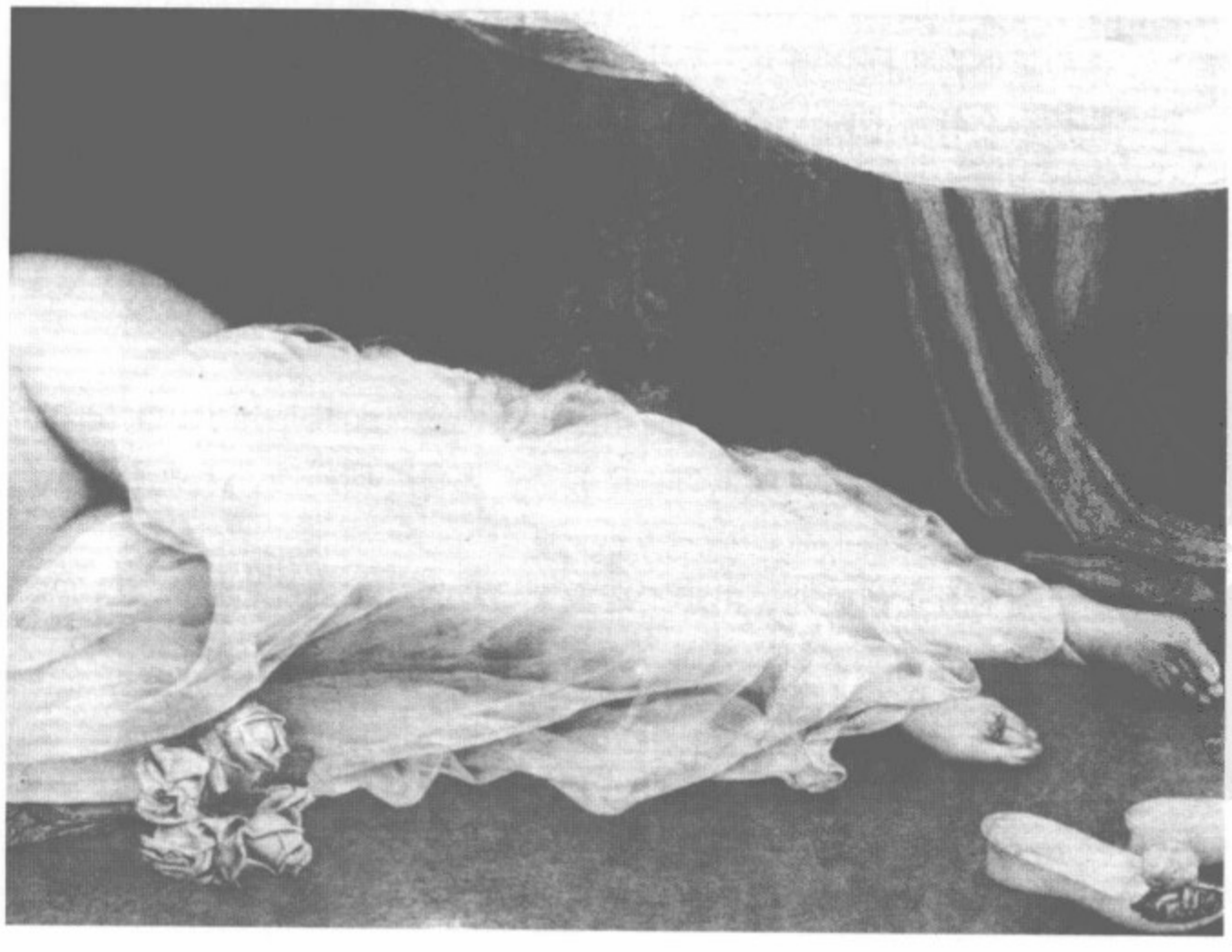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时男人们又发现女同性恋者强烈的欲望正好说明了如果没有男人，女人还是得不到满足，至少是不太满足。因此当男人们看见自己的情人和另外一个女人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好像并没有真正的上当受骗的感觉。冈考特兄弟以及杜斯·德莫尼——一个瘦弱的感觉主义者认为，女同性恋会诱发一个纯洁少女的性冲动，最终只能使男人们坐收渔翁之利。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的男性，例如科利特的《克劳丁》中的那位丈夫，能够忍受可能今天的现代人永远都不会理解的行为。

通过我们所了解的像雷内·维维恩和纳莎利·克利福德-巴尼这样的女同性恋伴侣之间的关系，人们发现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真挚和甜蜜的。每一位女同性恋者给予对方的爱都表达了她们对早年某次恋情的深刻怀念之情。根据玛丽乔·邦尼特的记载，纳莎利的沙龙已经成为一个“激情和自由的熔炉”，它诱惑着女同性恋者打开心扉，走出自己的密室。女性终于把自己从男人的注视中解脱了出来。

自杀率的上升

一个人常常会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认为非常痛苦的生活。自杀行为其实表达了一种无助的呐喊，也是对失败的一种绝望的抗议。19世纪欧洲各地的自杀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法国也不例外。在1894年之前，法国的自杀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当然，这其中的全部或者说部分原因是因为1826年建立的统计数据体系不断改进。

自杀一直是人们永恒的话题。主流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格里、奎特里特、法里特、布赖尔·德博伊斯蒙特，当然还有涂尔干都曾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对于巴黎的普通家庭来说，去停尸房认领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冷冰冰的尸体已经成为家



让-亚历山大·科拉博夫：《放纵》。在整个19世纪，女同性恋层出不穷，画家们终于找到一个描绘诱人的裸体女性的借口。这幅以《放纵》为名的画并没有使1909年沙龙的主办者感到吃惊。人们站在一位男同性恋者的画像面前肯定没有这么放肆。

常便饭。

日益加重的危机感逐渐削弱了人们生存的意志。涂尔干在1897年分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杀行为和道德沦丧的自杀行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前者是幻想破灭的结果，后者则是无止境的欲望和相互竞争的结果。种种统计表明，孤独寂寞和各种社会因素都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19世纪的单身、丧偶以及离异人士的自杀率相当高，而结婚或者是有了孩子等情况都会阻止人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导致自杀的原因到底是社会，还是个人精神或者遗传因素这个问题纠缠不清。

受害者和目击者所提供的理由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为有时候家庭和政府当局会采取种种手段掩盖真相，伪造证人，销毁证据。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860年到1865年间，精神病是导致自杀的首要原因，其次是“爱情、嫉妒和道德沦丧”，最后才是贫穷和家庭危机。

男人上吊自杀，女人投水自尽

官方的详细调查使我们对19世纪巴黎的自杀人群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在不同时期，男女自杀率也有所不同，男性自杀率一般是女性自杀率的三到四倍。奎特里特很快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杀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有些人认为在不同的职业群体中自杀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争议性。一般而言，社会派别两个极端上的自杀率会比较高。食利人、学者、专业人士以及军官，尤其是在殖民地服役的军官，这些人中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这些情况表明，所受教育程度越高，自我意识越强，自杀的几率也就会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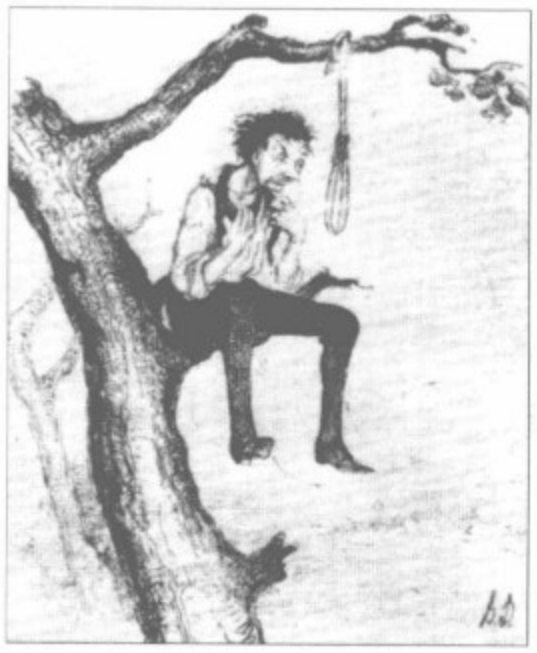
与此相同，家庭佣人的自杀率也非常高，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许多佣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地位。同样的，无业游民和罪犯的自杀率也很高。

在七月王朝时期，由于不适应大城市无处可逃的生活方式，巴黎的自杀人数非常多。然而，与如今的情况相反的是，19世纪农民的自杀率很低。

一大半的男性会选择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有1/4的男性会选择投水自尽，还有15%到20%的男人选择饮弹自尽的方式，这是上层人士选择的“高贵”的自杀方式。而有一半的女性会选择

投水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也会有20%到30%的女性选择上吊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选择窒息而死和服毒自杀的方式。

对于农民或者是工人阶级来说，上吊是男人自杀的首选，而女人大部分会选择溺水或者服毒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9世纪，大部分自杀行为发生在上午或者下午，偶尔发生在傍晚；夜间自杀的可能性很小。工作日比周末的自杀率高；上半年的自杀率呈上升趋势，而下半年则呈下降趋势。灿烂的阳光、热闹的人群、美丽的自然景色反而比孤独的夜晚、痛苦的深夜、寒冷的冬日更能激发人们但求一死的欲望。

医疗改革

19世纪初的贵族和资本家亲身经历了医疗专业化的迅猛发展。这些人的家庭医生有着和他们相似的生活环境，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患者和家人们一起认真听取医生的意见，按照医生的吩咐进行治疗。他们懂得如何接受治疗，当然更不用为医疗费操心。正如雅克·伦纳德所说："他们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决定了他们对科学治疗的尊重。"正是基于这种亲密关系，那个时期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走动很频繁。我们很难说清这种交往是出于友情、礼貌还是一种纯粹的义务关系。这些家庭医生经常和他的病人一起喝茶聊天，有时甚至会在他们家中过夜。医生这种特殊的职业使他们和当地的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家庭医生的八面玲珑也使他们在和当地名流的交往中如鱼得水。朱尔斯·桑德的"好医生赫伯"，斯藤德豪笔下的桑瑟芬医生以及巴比·奥利维利的《幸福的罪犯》中的愤世嫉俗的托特都向后人展示了当时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到了19世纪末，乡村医生开始很自然地结交学校教师和当地的大小官员。在木材商人、牲口贩子、小饭馆老板、磨坊主和屠夫这些不断增加的新兴商人和本地乡绅中，能和医生结交已经成为有教养、有身份的象征，他们开始轮流充当传播先进科学知识的文明使者。

这些富人们自然有能力支付医生的出诊费用，他们一般都是签字付钱，然后记在家中的账簿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加感激他们的家庭医生，这些人因为有知识而备受人们尊敬，而他们所做的贡献也是无法估量的。

妇女和医疗卫生

家庭医疗有它自己的特点。医生一般都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需要，他会在一位病人家中待很久，这样即使他的医术不怎么高明，他也可以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一位礼貌又有教养的客人。每位家庭医生都熟悉患者的家庭生活，甚至是他们的隐私。他会在患者家庭需要的时候坚决地站在他们身边，替他们隐瞒一些家族丑闻，帮助他们解决麻烦。他还会给家中的孩子们介绍对象。每个家庭的女人很自然地成为医生们的同盟。当然这些家庭医生也一定要会讨好女性，因为她们负责家中所有人的健康问题。对“妇科疾病”的不断重视更加说明了妇女的重要性。要巧妙地和这些外表端庄、内心细腻的女性周旋，颇需一些功力和技巧。当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碰到一些有关房事、性需要等隐私性的问题时，他心里应该明白有些话不能说透，但另一方面还要给病人提出合理的建议，而不是简单地拒绝病人的要求。如果一位家庭医生总是以父亲或者是丈夫的形象出现，多年之后，他们的权威将大为提高。而他们也逐渐学会利用女性作为他们的情报员。“同时，”让·皮埃尔·彼得写道，“他们还担负着救人性命、做月老以及帮助人们保持健康等各种责任。”

有人经常会抱怨这种全新的由医生制定的原则打破了女性治疗的传统习俗。谨遵医嘱的教导不断受到传统的由母亲向女儿传授医术的观点的冲击，而事实上，专家医生的建议越来越影响着父母养育孩子的观念。医生坚持有孩子的家庭应该雇用家庭保姆，他们反对用襁褓包裹婴儿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他们还提倡不要突然给孩子断奶，而是逐渐给孩子吃一些固体的食品。母亲们在医生的帮助下，开始逐步了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但是这时我们还是不能过高地估计儿童治疗的进展速度，因为这方面的变化依然很缓慢。

医生和穷人

医生和穷人家庭之间的关系跟他们同富人家庭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别。医生与这些病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总会使他们之间产生误解。医生在给穷人看病时，从不会像给富人看病一样尝试着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治疗。而当时的平民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进行医疗检查，例如传染病等急诊病，或者是必须由医生进行诊治的重病等。医疗总是和慈善事业密不可分，穷人的医生一般都是由慈善机构派送的，这样的医生肯定不会为他们下太大功夫。而在给达官

显贵们看病时，医生则必须通过医术提高自己的信誉，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权威性的地位。

通过对民间谚语的研究，我们多少了解了当时乡村医生的一些观点。村民们的想法是很悲观失望的，对他们来说，疾病就好像是不可避免而又无法医治的。这些乡间的农夫们根本不相信生理科学对疾病的解释。基于对动植物王国和宇宙次序之间的假设性比较，他们情愿更相信医治的症状。他们认为病人应该对自己的病情负主要责任，而疾病也是由于自身粗心大意、作风不检点等原因引发的。为了治病，患者首先得描述自己的症状，然后还必须以一种谨慎的禁欲主义精神与疾病做斗争。因此，人们认为即使请来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也无法给一个不会说明自己病情的孩子看病。病人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同情并不能解决问题。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医生只是几种治愈病痛的手段之一，他们希望医生能够迅速有效地解决接骨和缝合最深的伤口等问题。然而农民们对待医生的态度是很不友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很不信任的。那些心浮气躁的年轻人还经常和他们发生冲突，动作稍微缓慢一点还会遭到抱怨。对医生冷嘲热讽也是这些农民报复统治阶级的一种方式。

在巴斯德灭菌说盛行之前，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对待疾病的态度了解甚少。面对日益加快的工作节奏，工人们确实采取了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他们很自然地找到一些防止身体素质下降的基本方法，例如为了预防结核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放松身体，以更好地保存体力。

民间医学

医学人类学家发现传统的民间医学在19世纪开始繁荣起来。这种结合了巫术和古老习俗的传统医学在避免和社会基本信仰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现代医学的一些实践手段才得以生存下来。在整个19世纪，人们生病时都是向女巫和草药商求助；他们对“圣徒”和魔水顶礼膜拜，虔诚之极。这些正骨师、巫师等乱七八糟的“江湖医生”蹩脚的医术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

并非所有神医巫师的医术都比专业医师差很多。尽管民间医学和早期的医学科学在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上分属不同的观念系统，民间医学依然借鉴了早期医学中的一些有用成份。不同的文化层次总是在不断交替中发展。必要时，医生也会借助于其他的方式方法，

有些医生甚至会建议自己的病人去朝圣。19世纪到处都是拿着资格证书的庸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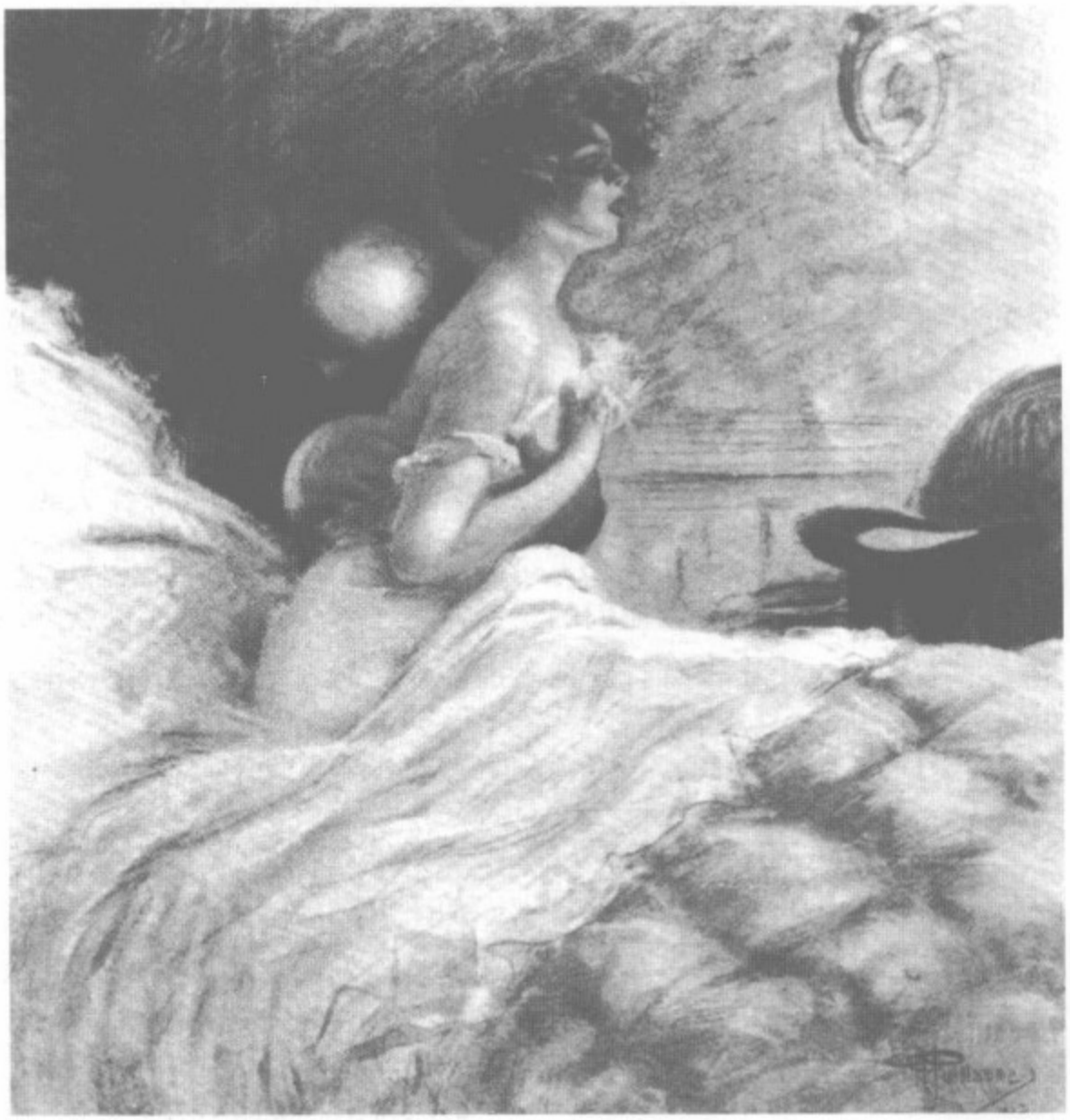
在上流社会中，除了正式的医疗方法以外，还流行许多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宗教学校任教的教士和修女以及牧师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建议。达官显贵们的城堡里都备有一些常用药品；庄园里的小姐太太们也可以用到下层农民们用不上的贵重药物；上层阶级的阔太太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祖辈遗留下来的珍贵药物来治疗一些小病小灾——拥有许多常用药品，所以他们很少找医生看病。

与此同时，街头的小商小贩也出售各种医疗用品，从合法药品到各种辅助设备样样俱全。日子久了，这些贩卖合法药品的商贩们就成为民间医生的先驱。他们的药品改变了农民的宿命论观点。还有一些赤脚医生由于没有行医证不能随便行医，这些人后来逐渐受到外科手术和矫正术的影响。

家庭卫生和传染性疾病

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医学专家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直到1880年左右，医生在资产阶级中所享有的声望才开始逐渐高于他们的医术声誉。当时大部分的医治方法并不重视医生的医学理论分析，而仅仅限于灌肠、放血、拔火罐等一些简单的操作。药品的缺乏就引起了人们对提高家庭卫生条件的重视，其重要性无须赘述了。由于受到性别、年龄、地位、职业、体质、风气以及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每个家庭的卫生情况也不尽相同。社会开始鼓励讲究个人卫生。家庭饮食乃至个人的行为方式都开始发生各种变化。卫生学家——那个时代的每位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卫生学家——认为应该有规律地进行一些体育锻炼，例如骑马、跳舞、阅读以及两性生活等。医学科学还认为应该控制感情冲动、乱发脾气、反复无常、胡思乱想等行为。这时梦境的内容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一般而言，医生主张适度平和的生活，反对走极端。

人们在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自然医学和一直被错误定义的生态学的结合过程。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工业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新兴的都市病理学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开始怀疑人类的身体健康是不是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上层社会。在七月王朝时期，医生建议人们多呼吸新鲜空气，多喝矿泉水，这样的



艾伯特·吉勒米：《种痘》，1908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矜持的女士们一直无法接受听诊这种治疗方法。但是到了1908年，一些年轻时髦的女性已经不再穿着拘谨古板的衣服，她们大胆地穿起一些袒胸露乳的服装。

建议让矿泉疗养地和海滨度假区受益匪浅。资产阶级在对待结核病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大部分人认为把结核病人和神经病患者隔离，主要并不是为了防止传染，而是为了避免对家族基因产生不良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传染病理和巴斯德灭菌说的盛行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看法，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医生希望证明自己高明医术的治疗效果，他们的工作不再是鼓舞病人的士气，或者是控制他们的情绪。治疗过程的明确简化了医生的工作。而此时卫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灭细菌。水、肥皂和抗菌剂的推广使过去复杂的处方显得过时。这一时期的医生在给患者治疗之前总会很仔细地洗净双手，这给其他人做出了榜样。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给人一种体贴的印象，他们好像希望赶快完成工作，然后就离开。如此一来，人们更加不愿原谅医疗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家庭卫生"贯穿着整个19世纪医学界和临床医学领域。家庭医生的诊断巩固了他们和每个家庭主妇之间的关系。这些妇女又把治疗方法带回家中。

新的医疗理论强调人们需要注意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传染病原所带来的危险性。而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逐渐认识到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虽然维莱明早在1865年就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直到1876年医学界仍不能接受这个结论。皮德克斯就认为尽管有传染的危险，但是最好视而不见，以免家属们抛弃患者。直到1882年科克发现杆菌之后，人们才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

细菌的发现过程

在发现细菌之前，医生尽可能地帮助穷人减少因为拥挤的居住条件而感染传染病的危险。那些乡间医生经常以顾问的身份被人们请到家中，帮助他们打扫房屋以及附近地方的卫生。这就是那时所能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了。1880年之后，医疗实践开始更加系统化。新的医疗方法在人们开始掌握消毒知识的同时传播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例如，现代医学在1870年到1890年间就传播到了尼弗奈斯。

爱德华·洛维:《圣路易斯医院结核病治疗成果》。继科克发现杆菌、证明结核病是一种无法医治的传染病之后，结核病病人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患者家属一直视他们为累赘，对他们不再抱任何希望。疾病使人们失去了罗曼蒂克的兴趣。

我们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巴斯德的继承者们并没有在社会条件下，而是继续在环境条件下研究分析细菌的危害。医学新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效果，这些理论促进了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改革的进行，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对每个家庭的督促作用。卢卡·博尔坎斯基发现新的育儿法在工人阶级中根本无法推行。预防传染病和研究病情发展的需要使专家希望模糊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他们希望把传染病人从家庭生活中转移出来，然后开始观察预防措施的效果。由于人们用肉眼无法看见细菌的存在，所以情况开始复杂起来。因此预防措施就必须比先前采取的发现和转移传染病原的方法范围更广，更具有系统性。

这时第一次出现了护士和社会工作者。贵族小姐们对穷人所进行的传统性慈善慰问活动为采取更具系统性的措施扫清了道路。这些富家小姐们因为急于脱离家庭和其他类似逃婚这样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尤其是在和结核病的斗争中。卡尔默特医

生率先提出了向利莱的工人家中派驻“健康督导”的观点。这些“督导”很快荣升为“社会健康督察”。许多培养这种新型健身的学校也应运而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03年开始在巴黎鲁阿莫特开办的健身学校。

这些社会新职业的产生发展，确定了增强医疗能力和巴斯德灭菌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这一成果使雅克·伦纳德非常轻松地重现了“卫生改革”的历史。

精神病学和私生活

现代人一定无法理解在1800年到1914年间人们为什么对精神病学现象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不同的是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反应发生了改变。至少在19世纪的前60年，人们认为精神治疗是徒劳无功的，对于萎黄病、歇斯底里症、多疑症、情绪失控的治疗方法都是长期的、综合性的，他们还相信人的肉体和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理智而又善良的医生们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病人采取了残忍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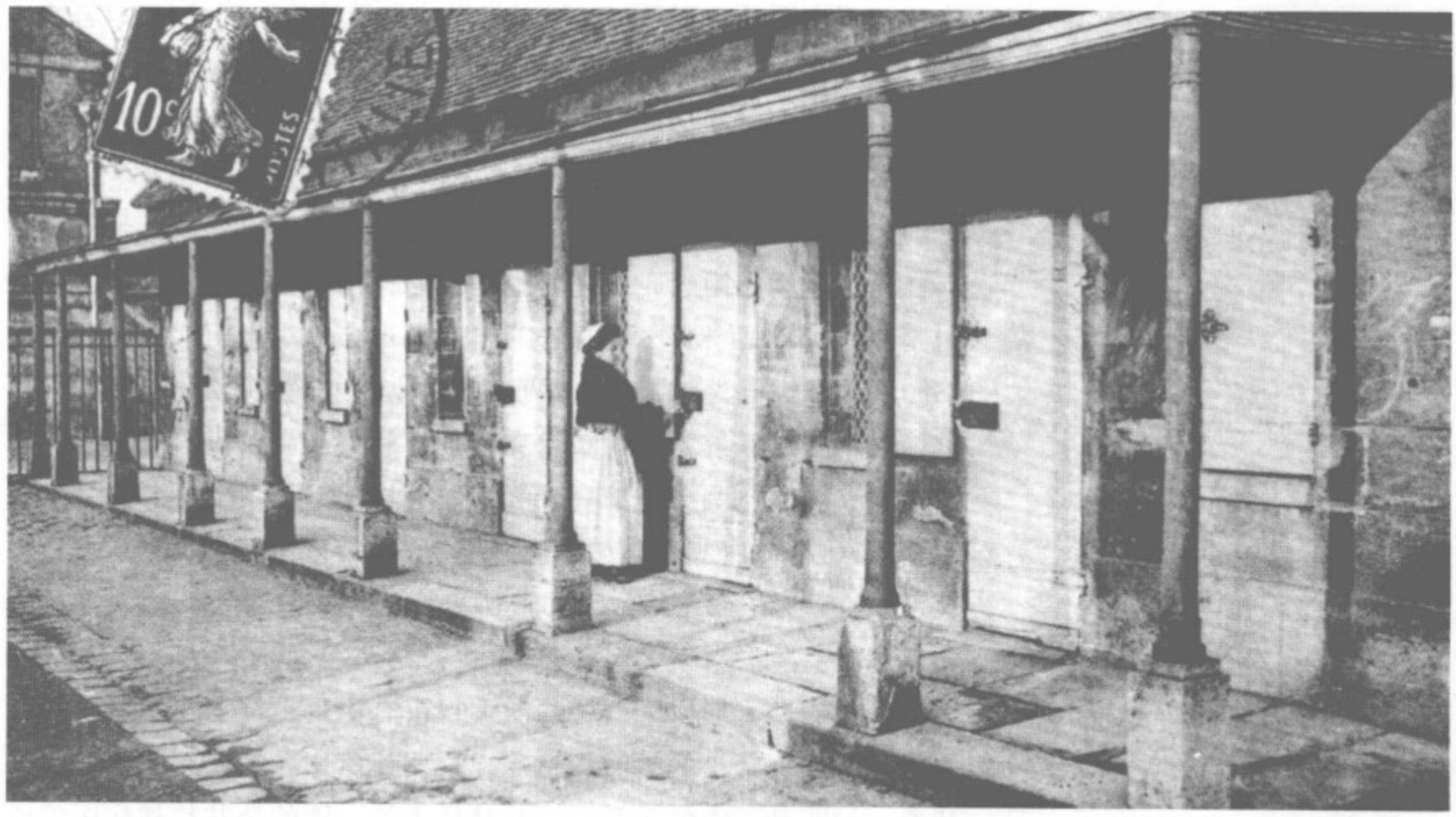
第二帝国时期，民间医学在医学保健领域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

有效的精神治疗法。尽管民间医生远不如今天那些优秀的精神病学家专业，但他们也没有忽视头晕、噩梦、恐惧、情绪失控等症状。

较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和医生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家族或者是社会群体出现了精神病患者都会引起更多人的恐慌。精神病是个可怕的隐私，它有可能使家族的名誉受损，或者破坏一桩婚姻协议。如果这个精神病患者是个孩子，把他留在家中接受照顾是很自然的。奥古斯特·奥多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些精神错乱的表现。刚开始他被拘禁在卧室里，后来被关在他父亲办公室旁边的书房里，最后被转移到了自家庄园鸽棚的一个小格间中。他的妹妹桑比和朱利安负责给他送食物、剪头发。他的家庭医生还向精神病学家咨询了一些意见。直到现在我们对早期的精神病疗法仍然知之甚少。1866年的时候，有58687名精神病患者是由家人照料的，另外有323792名精神病患者住在精神病院。

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建立起现代医院。医学治疗逐渐取代了慈善事业。和旧的慈善医院不同，穷人们来到这儿不再只是为了能舒服地死在床上，他们来医院是为了治病。

人们一般不会把成年的精神病患者留在家中，他们通常把病人送走，尤其是未婚的女士，因为这些女精神病患者对于家族的兴盛



萨尔皮特尔精神病院病人的居住条件引起了人们对禁闭精神病人现象的愤怒。

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在1838年政府制定法律对精神病做出明文规定之前，这类问题一直无人理会，这些家庭只需要把病人交给市长、牧师，或者是当地的某个官员。另外有一些情况是法院对精神病患者做出结论之后再由病人的家属来处理。在梅因，1835年之后，这些移交的手续必须经过医生的审查方可生效。到了后来人们试图通过法律规范移交过程，因此1838年的法律就规定移交过程必须有医学权威人士的参与。一旦这个家庭送走了这些精神病患者，亲戚朋友们很快就会忘了这些病人。根据雅利克·瑞帕的记载，巴黎精神病医院在1844年到1858年间遣散了他们所关押的29%的女病人。而在同一时期，被关禁在巴黎市精神病院的巴黎女性只有3%得到释放。

在公共精神病医院里，有一部分特殊基金是专门为那些付钱的病人保留的。不同级别的病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例如查林顿、利蒙格斯、马尔威利（南希附近），以及扬（在下塞恩区）。有钱的病人可以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的房间比其他病人的要大，还可以随意挑选食品。医院还为这些病人配备了专门的佣人，这样他们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私生活。等到他们恢复到一定的阶段，他们就可以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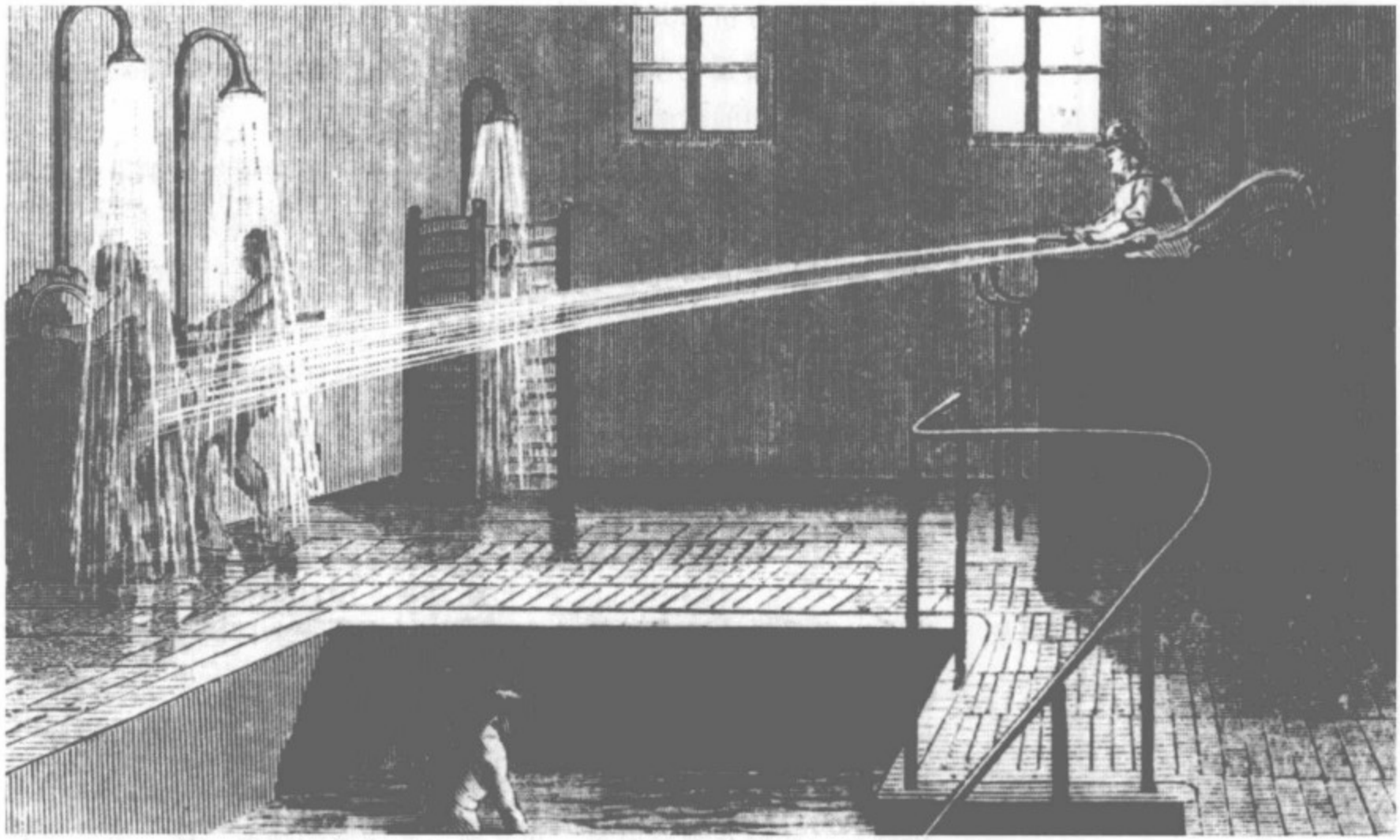
定的范围内活动。到了1874年，住在特殊精神病医院的40804名精神病患者中，有5067名患者已经被免除了一些常规的限制。

一种叫做“小房间”的医院可以说是私人精神病院的先驱。这种地方是专门为有钱人准备的。在1874年，有1632位病人生活在25个类似的组织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埃斯科尔。埃斯科尔曾经坐落在巴黎植物园附近，后来迁址艾维瑞；位于法国纳伊地区的圣詹姆斯城堡是卡西米尔·平内尔工作过的地方；另外还有帕西诊所。1853年，杰拉德·德纳尔就曾两度带着他的家具和收藏品入住梅森·都博斯精神病医院，成为布兰克医生的病人。在放松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转院到另外一家诊所治疗，后来盖伊·德马帕森特也住进了这家医院。在巴黎市其他稍差一些的私人诊所，例如1829年格雷英医生在曼恩-卢瓦尔开设的诊所里，都为那些有钱的病人准备了私人房间。

大量的私家诊所为这些物质上很富有但是精神上很痛苦的患者提供了舒适、轻松的生活环境。在这些诊所中，病人和医生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其他千篇一律的公共精神病医院所不具备的优势。后来的精神病医生就是在这些私人诊所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根据病人所属阶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的理论。

新的心理疗法的需要

在19世纪最后15年中，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对心理服务的需求，这种服务与精神病无关。这种需求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私人生活，而且还反映了私人生活的一些本质情况。人们称之为心理学家的职责，夏洛特私人诊所的规模见证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了产生各种身体不适的原因。对于疾病遗传的担忧，精神病理学牢固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心理疗法功效信任程度的不断加强都引发了人们的这种新需求。深受巴斯德理论影响的普通医生也开始向传染病发出挑战信号，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耐心地倾听病人们无休止的抱怨，因为这时倾听已经成为一种专业的治疗方法。医学领域的变化与科学的进步是同步进行的。希普波里特·泰恩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用于心理试验、钻研智力的新规则。这个全新的领域很快就成为皮埃尔·珍妮特的天下。艾尔弗雷德·比利特和西奥图·里波特的研究成果以及博格森的自省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这时的心理学出现



水疗法是19世纪最流行的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当时几乎所有药品的疗效都很差。

了两个主要发展方向。1889年珍妮特首次阐明了心理分析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大的革新。从此以后，各种协会开始研究类似于个人心智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潜意识的研究，人们相信潜意识在某些方面与思维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智力测验。科学家相信天才和白痴之间智力的差别只是一条线上的两个不同点的区别。比利特和西蒙在1903年到1905年之间把智商研究和测验发展成为法国心理学的一个崭新领域。

新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启发。心理分析学家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治疗观点。这些观点摈弃了催眠术以及以往的一些权威理论。珍妮特的治疗方法也从看转为听。就算是在吵闹的精神病院里，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也必须保持安静。就这样，精神病学家抢在心理分析学家之前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实际上，法国的不可知论者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弗洛伊德的泛性别主义持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仍然抵制这种观念在法国的传播。1903年，西奥多·弗卢努瓦和一位来自于普瓦蒂埃的无名学者试图把弗洛伊德的思想传播开来，但是收效甚微。

然而，心理分析和其他一些心理试验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今天心理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比利特的恋物论和查尔斯·弗雷的精神病理学就是其中的范例。

迄今为止，义务教育改革所提倡的智力测验依然影响着许多儿童的生活。用罗伯特·卡斯尔和让-弗朗西斯·利塞尔夫的话来说，比利特的研究发现使学校成了“民主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的很多情况，例如变态、白痴、低能儿以及其他一些精神方面有缺陷的孩子。以前毫无区别的孩子被划分为弱智、反复无常以及反应迟钝等各种不同的情况。到了1909年，政府颁布的法律甚至将有障碍的人划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实施这项法律。

身体锻炼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对人类体格的要求，这种要求又逐渐影响到学校的体格和体态教学，这些体育规则进而引发了一场身体解放运动。而另一场被心理学家称之为“主观体质”的运动也随之传播开来。各种体育规则在19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仍然有一些没有划分出来。和其他一些领域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只注意到当时的人们说了什么，而没有看到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一直在研究拉索伊文明手册中所倡导的文明形体语言，而当时的学生、战士以及罪犯所接受的体格及体态教育，普通工人的行为和休息放松方式以及“美好时期”（指从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段时期，以法国社会百科繁荣及巴黎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的生活为特征）人们表现出来的自由形体的追求等等，都属于历史学家们尚未涉足的领域。

体育训练及其副作用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个人行为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基本的差别。农村在这方面的变化依然非常缓慢。在我们看来，米利特的农夫简直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居民，而事实上是我们的无知造成了这种偏见。盖伊·特威利尔是唯一一位对此做过研究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尼弗地区农夫行为方式的研究，他发现直到19世纪中期，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类学家和文学艺术及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也对这一艰难的领域进行了探究。他们首先假设从14世纪到1850年之间，人体姿态以及人们对厨具的使用没有任何变化；从1850年到1920年，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

在19世纪，治疗运动性共济失调效果比较好的是矫正术。矫正术经常利用一些残忍的械具来矫正不良体态。

高才开始缓慢地影响到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1920年之后发生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最终导致构成人类日常行为的根本性转变。我们急需对这个编年表进行充实。菲利普·朱塔德很明智地指出人体姿势是一个完整连贯的系统，它们并不是毫不相关的。我们可以从农夫扛大袋干草的方式和他们做爱的姿势中找到很多联系。

当时的人们认为身体的形态可以通过一些矫正技术得到重塑。19世纪的接生婆喜欢改变新生儿的头部形状。经过改造之后的襁褓更便于幼儿活动手臂。人们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设备和方法改善自己的身体形态。一些中产阶级的母亲们开始强迫自己的女儿穿上钢制的束身以显示其瘦美的线条，并且希望能以此增加她们尚待闺中的女儿的“美貌资本”。

端正态度，杜绝懒惰

乔治·瓦伊格洛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体育锻炼的历史。19世纪上半期，机械学对人体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51年之后，人类的体形观又受到了热力学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身体是一套完整的动力系统，后来身体又被看作是一种发动机，而我们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塑造它，而是要对之加以训练。在过去，体育锻炼就是为了军事斗争，而现在新的体育锻炼的目的是在于增强人的体质。

人们为了拥有端正的体态付出了许多努力。男人必须扣紧腰带、挺直胸膛、收紧腹部，而女人们则必须穿上紧身胸衣以保持良好的身材，所以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深受脊椎变形之苦。大人们还经常教导孩子要挺胸收腹。为了避免传染结核病，人们开始进行呼吸练习，增加肺活量。矫正术也发生了改变，有助于进行体育锻炼的设备取代了原来用于重塑身体的装置。而建立在发展体育运动基础之上的系统的体操锻炼也随之发展起来。

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影响了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发展。老师和家长都教育孩子们不要形成散漫的体态，从而养成懒惰的毛病。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学校和工厂这样的地方，新的体育锻炼规范了人们的体态，人们的空闲时间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接着人们便把锻炼的重点转移到乔治·瓦伊格洛的“肌肉加强运动”上，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60年之后，对衰老的心理恐惧和微生

上图：朱尔斯·斯凯伯特：《快来参与！》。复辟时代之后，法国人开始流行到海滨游泳。这时的游泳已经不再是《贝尔·埃博克》中所说的一种治疗方式，已经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锻炼和娱乐活动。

下图：又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

19世纪末，上层社会的女性已经开始骑自行车，特别是在丈夫的陪同下。

物学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这些体育项目的信心。

在这个世纪末，就像尤金·韦伯和马塞尔·斯皮瓦克所展现的那样，体育运动成为全民抵御疾病的一种手段，体操锻炼也成为公民的义务。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生必须和士兵一样接受训练，而人们也经常进行长途徒步旅行以增强体质。体操逐渐和贵族阶级其他一些不很激烈的运动形式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些新的体育项目。人们从英语中借用一个新的词语“运动”以概括这些新的项目。全国上下掀起骑马、狩猎以及各种球类比赛的热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德国的战争威胁使体育运动的重点有了新的改变，人们希望通过体

育锻炼达到独立自强的目的。

新的体育自由

19世纪晚期体育运动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趋势。医学顺势疗法鼓励人们到乡间漫步、爬山远足、到海滨游泳，以及骑自行车健身。经过许多年的发展，这些运动逐渐脱离了医学领域的范畴。这时人们做运动不再是为了锻炼或者是健身，而是为了达到身心放松的效果。巴黎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唤醒了世人对远古的渴望，然而她的舞蹈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肢体语言达到真正的身心自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自由与心理学治疗和婚姻中的性爱要求是一致的。人类的身心不再受到焦虑不安情绪的困扰。人们开始注意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连最严谨的保罗·瓦莱里也开始研究分析裸体海水浴给身心带来的愉悦。

马塞尔·普劳斯特不会骑自行车，但是他发现在沙滩上观看别人骑自行车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变革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用“变革”这个词来表现19世纪人类私生活发展的变化并不为过。

米歇尔·佩罗

阿兰·科班

带着勾引歌星或者是舞蹈演员的梦想，一些小资本家纷纷云集酒吧的舞会。只要施以恩惠，他便能从中找个女人来满足他们的幻想。这些歌手和舞蹈演员大部分都是妓女。18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的这种独有的放荡行为开始向社会的低层次蔓延，进而传播到更为复杂的中产阶级中。

5
结　语

在个人与公众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政治理论也一直希望在两者间找到平衡。卢梭的梦想就是达到一种完全通透的状态："如果我必须选择出生地，我希望出生在一个所有人都认识的环境之中，这样，无论是罪恶的品行还是谦虚的美德都会得到人们公正的评价和监督。"与此相反，托克奎利则强调个人主义的好处，他在1850年将个人主义称为"近期新造词语"。他认为个人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个人社会关系，"个人主义会让人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它使每个人得以离开喧嚣的人群，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建立起自己的小圈子。"在20世纪初期，利昂·布儒瓦把社会连带主义看作是成功调解个人权利和义务——作为大社会中一员的小个体对社会必须承担的"债务"——之间关系的手段之一。作为社会组织必然结果的"社会公正"不仅防止了放任主义的自由涣散，而且防止人们用极权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它恰当地加强了社会的干涉力度。

19世纪，人们把个人和公众的关系固定在父权主义的家庭里，希望这种极端的措施可以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似正常之际，这种稳定性已经开始削弱。20世纪则采取了另一种现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市场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科技的发展都成为刺激消费和贸易往来的因素。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人们的购物欲望；不断改良的交通工具也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火车、自行车和汽车的普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以及货物的流通；人们的装扮也丰富多彩起来；照相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形象。然而，在有些时候，这些现象的明显改变只是为了隐藏其背后没有改变的实质。

在现代社会，个人相对从时空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在不断选择理想目标时感到一种空虚的自由。人们开始关注个人发展、身心健康以及对其复杂性的理解，刚刚受到人们关注的精神的深度以及从生育和婚姻中解放出来的性爱理念——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美学和哲学的中心议题。

个人主义的上升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城市。举个例子，如果工厂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工人就开始强调他们的休息时间，坚持应该拥有个人空间。工人阶级的觉醒与他们希望上升到更高阶层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在四处流动的农业

工人的影响下，即使是祖祖辈辈都过着一成不变生活的乡下人，现在也无法再接受这种陈旧的生老病死的生活方式。

有三种人成功地打破了旧习俗：青年人、女性以及科技界和艺术界的先驱人士。“理想、奋斗、生活”，这就是27岁的罗吉尔·马丁·杜贾德在1908年撰写的《变化》中总结的三个人生理念。这时的女性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并且获得了新的自由，她们开始要求工作、休息和自由恋爱的权利。女权运动在19世纪还只是在国家政权动荡不安时才偶尔出现的现象，在20世纪已经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并且发展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力量。通过《投石党运动》这样的报纸，通过组织集会进行宣传，妇女们开始要求和男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以及政治权利。她们要求在社会角色以及母亲这种逻辑上具有天赋的角色上享有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如果女性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人，那么社会为什么要把她们当作弱势人群对待？“新女性”立刻成为席卷欧洲的一个重要词语，并且受到一些急于改变男女间性别关系的别有用心的男人的欢迎。

这些刚刚上演的改革还没来得及完善就遭到宗教、社会伦理以及政治权力的干预。这些干预得到了旧制度残余势力的支持，正如阿诺·梅厄所说，在大革命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猖獗。一些类似男童子军的组织试图把这些刚从家里解放出来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由于女权运动动摇了男性的社会地位，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性别角色被颠覆，社会上蔓延着一种恶意的反女权运动的情绪。人们谴责妇女应该对道德的沦丧负责，因为道德的沦丧进而会导致国家的沦亡。各种道德运动马上应运而生，人们开始清理街道和书店，色情演出和色情读物被查禁。这段时期社会风气的特点之一就是作家莫里斯·巴里斯态度的转变，他曾因宣扬个人崇拜主义而名噪一时；而现在他提倡朴素的生活和继承传统的美德。

欧洲各国政府希望利用心理学对大众的影响巩固其政权，这种做法在20世纪尤甚于其他时代。政府提倡国防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909年未来学家马尼福斯特曾预言：“我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展览馆和图书馆，同道德主义和女权主义作斗争……我们就是要歌颂战争——一门真正的全世界卫生学。”

1914年战争的突然爆发使人们意识到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和个人

1915年5月12日，第16批离开巴黎蒙帕尔纳斯码头的人群。

主义的狭隘。法国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年轻人纷纷加入到这场有政府和新技术强力支持的战争。历史再次让男人和女人退回到他们原有的位置；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虽然战争使个人主义让位于国家利益，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永远干涉个人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必须掩藏起一些私人的生活，特别是在他们不能为战争做出直接贡献的时候。历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战争造成的结果：它阻止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产生了什么。

然而，一种新的关系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开始形成。这些充满热情、怀着必胜信念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心中在想些什么呢？当他们信心十足地加入这场游戏，却对其残酷性毫不知情时，他们心中在想些什么呢？那些挥舞着手中的手绢、视国家利益高于自己生命的年轻或者是不再年轻的女人心中又在想些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友谊和爱情在战争中结束了呢？哪些旧的希望破灭了，又是哪些新的希望取代了它们？芸芸众生，个个不同又彼此相似，在那一刻都化作一个主题，被历史的潮流带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火车站和火车最恰当地表现了现代社会的命运特征。

米歇尔·佩罗

黑版贸审字 08-2007-056 号
原书名：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Editions du Seuil, 1985 et 1999
Chinese Copyright © The North Literature & Art Press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人生活史Ⅳ：演员与舞台 /（法）阿利埃斯，（法）杜比著；周鑫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17-2304-2

I. 私… II. ①阿… ②杜… ③周… III. 社会生活—历史—世界
Ⅳ.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0605 号

私人生活史Ⅳ：演员与舞台

作　　者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法）乔治·杜比
译　　者	周鑫等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封面设计	烟　雨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6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6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304-2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私人生活史Ⅳ

演员与舞台

该书自1985年出版后,在国际上广为传播,英文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图书馆会刊》

◆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建议上架类别:历史

ISBN 978-7-5317-2304-2

9 787531 723042 >

定价:68.00元

私人生活史

☆法文版编辑评论

这是一部介绍古代私人生活史的优秀著作。本书主编乔治·杜比通过艰辛的研究与探索,为我们讲述了有关古代人私生活的有趣故事,勾勒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画卷。作者渊博的学识及对历史事件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我们清楚了解那段社会历史大有裨益。从城堡的宏大建筑到农民普通的服饰,本书都一一提及。我极力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关于作者

本书由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共有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被称为20世纪下叶史学界一项"革命性的成果",它革新了历史的观念,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关于本书

在中世纪,欧洲从封建时代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不分(即"公私混淆")逐步过渡到"公私分明"的世界,私人生活得以形成,个人心灵得以彰显。正是这种自由的社会空间,个人心灵的内省功能的形成,才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基础。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正是植根于那久远过去的肖像演化中。

☆关于本系列书

从微观史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围墙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从家庭争吵到王室血案——本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

☆私人生活概念

私人生活空间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逸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私人生活史（五卷本）

古代人的私生活

肖像

激情

演员和舞台

身份之谜

☆法国年鉴派

口号：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

介绍：所谓“私人生活史”,指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所开创、专门探讨人们的私生活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创造的方法论的产物,它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年鉴学派最先采用其他社会学的方法与原则来研究历史,这种方法摒弃了以往把战争与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平凡人的生活”上——也就是非达官显贵和将军们的生活。本书主编阿利埃斯和杜比是该方法论的先驱和倡导者,是继享誉法国和世界史学界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之后该学派的领军人物。

策　　划：西南西
推　　广：光明书架
中文版主编：烟　雨
统　　校：洪庆明
责任编辑：刘　薇
特约编辑：王　忻
封面设计：大象設計工作室·杨震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84005022

销售咨询：010-86056892（陈芬）
投稿信箱：lightbook@sina.com
网　　站：www.lightbooks.cn